

# 文革词典

wenge cidian

## 第一、二卷合集

《文革词典》与文革词语的关系，是解剖刀与解剖对象的关系。当僵尸还在散发毒气危害人们时，解剖刀不可能停止它的工作。这不是解剖刀的意志，而是健康、理性生活的意志。

老来偶兴 编辑

编者之言：

网络上有很多人致力于编撰文革词典，他们都是民间修史人士。其中名为 scheler 的作者独树一帜。

scheler 的帖子一出现，或被立即删除，或被加锁，这种被封杀悲凉不仅仅是属于 scheler，而是属于中华

民族……也就是说：被封杀者悲哀，封杀者也悲哀。

所以，我向 scheler 表达敬意。

好在 scheler 像是一头默默耕耘的老黄牛，含辛茹苦的做着他的事。一些被删除的词条还会继续更新的，比如“社会帝国主义”、“一小撮”……等等。我热切期待第三卷、第四卷……的面世！

老来偶兴

# 文革词典

(第一、二卷合集)

提交者: scheler

## 写在前面的话

想做《文革词典》10多年了。其间读了一些书，积累了不少材料，断断续续试写了一些条目，但总是进展缓慢——总量不超过二百条。一则生性疏懒，兼兴趣多样，见异思迁，缺乏韧性，二则原始材料处于被封锁状态，收集为难，三则出版、发表无期，推动乏力，功利之心未泯，迁延难免。去年末学会上网发帖子，无意中找到一个发布、传播的管道，兴趣陡增，故逐日整理一些旧词条，随写随发。这于我也是一个从无意识到比较自觉的摸索、学习过程。

慢慢的接受网友建议，把分散的词条集中起来，10条为1辑。到现在已经积累10辑了。又有网友（倚栏读简）建议编者做一长贴。编者不大懂得长贴的含义和做法。但估计是为了集中，方便读者。所以便把10辑合起来，仍按贴出的时间顺序编次（偷懒，重新编次也许需待结束、出版时再弄），做成“卷一”。完成这“卷一”，用了大半年时间。希望能在3—5年时间里，做到“卷十”。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才如编者却还迈不过“不惑”的坎儿。为一些大惑的问题所困扰，借此机会说说，以就教于网友们。

第一，收词的尺寸、范围。好些词条贴出后都有人议论，这不单属于文革时期，它前后都有。——这是一个大问题，关系到词典视线所及的大小（词义网络体系的广狭）、整体的特点、阐释的深浅。有些词如“十六条”、“忠字舞”等事件性条目的界线清楚，只出现在文革时期，有些词如“一小撮”、“自绝于人民”等抽象些的条目，就很难说只出现在文革。但是我还是把它们收录了。为什么？因为文革不是从天而降的怪物，它有一个很长的潜伏、酝酿期，还有很长的尾巴，十年只是它的爆发期；所以时间上仅限于十年收词反而会遗漏许多东西。我收词的主要标准，是看该词是否在文革意识形态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否构成文革逻辑链条中的一环。

（问题：严格以时间尺度裁量，还是适当延伸？人物、事件、词语，是否需要分开？）

第二，材料的取舍汰选。首先是取。以前较难，本来处于闭锁状态，加之编者虽然不算孤陋寡闻，但毕竟有限。而现在神奇的网络引擎使搜索一下子变得容易了许多，大大节省了材料搜寻之费。不过它的短处却在于，只钟情于当下人们的趣味，许多纯历史的细节都被过滤、遗忘在网络的视野以外了。我的体会是，如果取材于原始材料的词条就容易有原创性，如果从二手材料得来就显见得一般些。其次是舍，没有采用的材料就是舍了。舍的也有原因多种，不可靠的，过于琐碎的。但我比较倾向于有闻必录，留待大家批评、订正。

（问题：只用一手材料，还是一手、二手兼取？）

第三，阐释的视角、表述的分寸。我的原则是中立解读，还原词义；以小见大，以实涵虚。客观既是指不带偏见，尽量回到当年的语境中去释读——找到并严格按当年的材料、例句的原义去阐释；同时也指对各种解释一视同仁，并列展

示、不存偏私。即使材料取舍、阐释视角都确当了，还须有精确的表述来保证，否则仍然要功亏一篑。《庄子·人间世》说：“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做词典的，当然更得时时警惕溢美、溢恶的可能。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文革词典》的特殊性，也由于编者仍然是或一意义上的当事者，它毕竟牵动了那么多人的命运悲欢、恩怨情仇，要笔者完全超脱是过分的苛求。同时编者对词典的功能也有不同于一般词典的想法，即，它不但要从理性意义上还原词义，还要从感性意义上让没有亲身经历者也能进入文革词语的细节、环境，懂得它的用法，和前文革、后文革的种种联系。因此我才有意地保留了那么多枝微末节的材料，使得它不象正宗的词典。

（问题：中立是否必须？或至少不能突破的中立底线在何处？是否需要挖掘词语的感性意义？阐释的体制，是词典、事典，还是百科？简略还是详尽？）

以上种种，希望得到网友们的指点。可以是宏观的，大到收词、体例的讨论，可以是微观的，小到一个词的阐释。通过指点，使编者能集思广益，澄清问题，改进工作。

最后罗嗦几句为什么要编词典。不少网友问过编者：您老是古墓派的？（齐东野人）是不是恋尸癖？（无欲则软）成天文革文革？有意思吗？（无欲则软）事隔这许多年，还有人在拿已经有结论的文革说事，这种心思明眼人一看就懂，喋喋不休可以止也。（竖起的猫眼）这些讥刺、质疑或出于调侃（无恶意）或出于不同意见，本来已经答复过了，编者仍愿意在此再总的说说。

作为政治存在的文革已经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具僵尸。中共及其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了重建合法性，对它进行过彻底否定，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立论的。但从意识形态、从文化角度看，它还远远没有得到清算，它还存活在一些似乎并不起眼的词语、观念里，在那些昏昏冥冥蛰伏着，时时来一点小发作，默默地妨碍我们更健康、理性地生活。它又不仅仅是一具僵尸。《文革词典》与文革词语的关系，是解剖刀与解剖对象的关系。当僵尸还在散发毒气危害人们时，解剖刀不可能停止它的工作。这不是解剖刀的意志，而是健康、理性生活的意志。

认识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它是一个过程，尤其对于文革这样给我们带来巨大灾难、创痛剧深的事件，如果没有持久、深入的认识，它会再次重复。难道我们的教训重复得还少吗？二战到现在过去了多少年？直到今天，还有大量研究在继续、书籍在出版。而对于文革，这一切是才刚刚开始，还是尚未开始？

认识也不是谁的特权（记不得作者了，1980年代初期的那些日子读着《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心潮澎湃），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义务来面对历史作证，共同忏悔。虽然它是痛苦的。但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编者在这里试图重返语言，就是要通过它重返历史现场；还原词义，就是通过词义网络的重建，还原历史的现场。从治疗学上说，精神疗法主张，治愈精神创伤的方法之一就是回忆找到造成创伤的成因，编者也希望通过词义重建找到造成文革精神创伤的成因而克服之。编者的野心，是把《文革词典》作为准备性工作和基础材料，有朝一日做文革意识形态（或曰精神现象学）的研究。或许限于编者才识视野等原因力有不逮。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有人主张“彻底否定文革”。编者想问问，这个底是全盘否定，说它没有价值，或只有负面价值，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恐怕怎么说是次要的，随着时间的进程认识本身也会不断修正、深化的，重要的倒是怎么找到发生文革的原因，从制度上、文化上防止它的发作、再度为患，从而克服它。——这才是编者理解的彻底否定文革的“底”：不是妖魔化，而是制度、理性和感性的重建，而是系统克

服。

谢谢 蒙泰尼里神父、云山雾罩、倚栏读简、资料、春雪、蜀汉、宁致远、中间偏右、iloveyy、废话一筐、简单虫子、lyx760、干货公司 等网友的回，质疑，辨正，补充，提供材料，蒙兄还多次点题，让编者有机会修订词条，在轻寒、寂寞中感到丝丝暖意、慰藉。

也感谢 斯基里茨、老拖、无欲则软、齐东野人、竖起的猫眼 等网友的不满、责难乃至搅局，让编者更加谨慎、细致，激起了编者的反思。

2005.6.8. 补记

从随写随贴的分散词条到汇集的小辑，再到这次的卷一，都多少做过一些修订。采纳了不少网友跟贴中的材料、辨正、观点乃至表述，在词条中基本都作了交代（或许还有遗漏）。这里一并致谢。编者说过，认识历史（包括史料的挖掘、释读、还原）是人们共同的志业。希望有更多人以各种形式来参与这一工作。

如果明年文革四十周年纪念时能做完卷三，开始准备卷四，编者将感到非常欣慰。

2005. 6. 11.

## 修订感言

传统编写词典，是一个板凳甘坐十年冷、惨淡十年磨一剑的寂寞过程。在网上边写边发帖子，使我初学与网友互动，有人支持，有人异议，有人痛骂，有人热心点题、提供材料……颇为热闹。无论持哪种意见，或只言片语，或长篇大论，只要是认真的，都能使我受益——屡屡启我蒙昧，催我思考，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工作。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甚至当我受到非难时，网友还勃然大怒，比我还激烈（无论怎样我始终希望理性是恰当处事的必要条件）。编者深信，即使价值取向不一致的人们之间，仍然有可能求同存异，共同面对我们趟过的同一条时间之河。

Gfv 为我提供《卷一》目录稿本，年长者也顶贴、提供意见，还有更多过路一见的网友，使我想起一首影视插曲的煽情歌词“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对此，编者深怀感激之情，感到知识生产中互助的美好、可贵。

我也正是在网友的推搡下，从零星发贴到 10 词一辑，再到 100 词一卷，由卷一而卷二，一步步走到现在。边写词典，还就编写中的感触、问题、所得，写下一些长短不一的札记。虽不成体系，却是实有所感，关于词典编撰、关于文革意识形态学……点滴积累，也许能够帮助编者清理思路，慢慢从暗中摸索走向相对清晰的明天。

《卷一》贴出后陆续仍有修订，因此把近期收获再次贡献于此。恳请网友们批评。今年晚些时候（大约年终前），编者将尝试编出一个电子版《文革词典》放在“猫眼”上。办法可能笨一点，仍会使大家不够方便。

编者的感谢之忱，只有更好地改进词典编撰，以使这项词语文革博物馆的工作坚持下去，并且有一个基本的质量保证。我深知成事不易，求精更难。好在有这么多名网友同行，吾道不孤。

## 毛主席像章

名词。以毛泽东像为表现主体的像章，文革中一种崇拜礼器。也可简称“像章”、“红宝章”、“纪念章”。当时各大小单位都争相设计、制作各式各样的毛泽东像章，佩戴、收藏、赠送、交换毛泽东像章，成为一种时尚。除了黑五类等被打入另册者不能佩戴以外，男女老少都得戴，连进入大陆的外国来访者也要戴。

最早出自 1937 年东北抗日联军颁发的银质毛主席奖章。1942 年延安制作出第一枚延安毛泽东像章。1945 年，电影艺术家凌子风设计了最早的毛泽东金属像章。建国初期，一些地方就开始限量生产毛泽东奖章和纪念章。但真正形成全社会狂热则是在文革的 1966 年夏至 1971 年夏；高潮在 1967 年春至 1969 年夏的各级革委会成立时。前后 5 年时间制作的种类约 1 万种、总数 20 亿枚。有材料显示：1966—1968 年全国有 2 万多家工厂企业总生产各种毛泽东像章、语录章 80 亿枚，耗用铝、铝合金、有机塑料 6000 吨以上。止于毛泽东明达和无奈、狡黠和昏聩兼半的幽默话语：“还我飞机”。

像章主体是毛泽东的头像（向左）、半身像或全身像，多为红色底金色像。配以毛泽东的手书、林彪的“紧跟”题词，或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天安门等革命圣地作背景，环绕以松竹梅日月星等吉祥物、八个样板戏之类的图案。一般为圆形，也有桃心形、五角形的；形制越做越大，最大的能达到 20 多厘米直径。不能用别针佩戴，只能用绸带挂在脖子上胸前。材料以铝质为主，也有铜铁、镀金、纯银、水晶石、塑料、有机玻璃、陶瓷、荧光（夜光）等 20 多种质材。其中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星形毛泽东像章、条形“为人民服务”手书两枚一套，俗称“军星儿”，最为精致、珍贵。与另一种“七分钱”（当时售价）的红地金像，共赠发、出售了 1 亿枚。

当时形成一种风气，各省地市、系统、单位召开大型的重要会议，就要制作、赠送毛泽东像章。而且要比一比谁做得更精致、更豪华，形成无形的打擂台——谁的像章越大、质材越好、加工越精、设计越美，谁越显得忠心。

一些人收藏毛泽东像章成癖，每见有新样式的像章，总想弄一枚到手为快。其中以叶群收藏有全国各地“敬献给林副主席”的近 1 万枚像章为最。因此当时便出现了以像章换像章的非法交易市场（“黑市”）。

1980 年代末期以来，毛泽东像章成了一种有收藏价值的、有利可图的商品，被搜集起来，甚至还有赝品被制造出来[注]，出售给外国旅游者；各地都有某某搜集毛泽东像章的收藏家的事迹、设立家庭毛泽东像章展览的消息，被陆续报道出来，甚至还出版了不止一种的毛泽东像章图册和专著。据旅居美国的桑晔 1990 年代初的报道，他个人收藏的像章就达 7000 余种。日本人村松伸、樱井澄夫等，收藏毛泽东像章的早期像章多达 170 余种，列早期像章收藏之首。大陆有名的毛泽东像章收藏家有四川王安建、宋一凡，贵州周继厚，上海黄淼鑫、沈玉贤、顾念之、江缘钟，陕西许韧，北京的阎新龙、马京军，广东饶贵祥、汤国云、李云庄，江苏史明，江西陈和平等。

上海市毛泽东像章研究会《收藏通讯》介绍：两组 20 枚的“语录像章”，参考估价为 1000 元；一组 30 枚套的“红卫兵系列像章”，参考估价为 1 万元。内蒙古包头的银片压制毛泽东像章系列（5 种），直径从 8 厘米到 18 厘米，全套市

场价达 4000 元以上。

互联网上设有毛泽东像章收藏网

(<http://www.maobadge.com/luntan/list.asp?boardid=5>) 等网站, 供收藏爱好者交流像章分类知识、收藏体会和藏品信息(藏品名称、市场价格)并提供网上交易平台(网页名称“以藏养藏”)。

[注]所以意欲从事像章的收集、投资者, 必须事先学习专业的知识和鉴定技能, 如无系统濡染、修养似不宜染指。

(参考资料: 桑晔《残阳如血·文物也是书》, 载《读书》1991 年 11 期, P68; 《毛泽东像章的收藏价值》, 原载《中国文物报》, 新华网转载于 2003 年 9 月 29 日; 吴伟忠《毛泽东像章升值快》, 载《中国证券报》, 大众网新闻转载于 2005 年 2 月 15 日)

## 红宝书

名词。崇拜礼器。广义地说, 所有毛泽东著作都是红宝书; 狭义地说, 它是特指《毛主席语录》、“三合一”(详该条)等袖珍、简易的毛泽东著作选编本。据估计, 10 年时间里, 各派红卫兵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印制的除外, 仅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红宝书, 就有中外 50 多种文字、500 多种版本、总印数 50 多亿册。

仅《毛主席语录》一种, 据有关部门统计, 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版本从 1964 年到 1976 年, 全国共出版汉文版 4 种, 少数民族文字(8 种文字)版 8 种, 盲文版 1 种, 外文版(37 种文字)和汉英对照共 38 种, 总印数 105549.8 万册。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 截至 1967 年 10 月, 世界各国以 65 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 853 种, 其中有 20 个国家的 20 种文字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 共有 35 种版本。

文化部召开了专门会议, 研究、制定印制、发行计划, 要求保证提供充足的纸张、油墨、印力, 优先印制、发行红宝书。据称, 为了“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 按人民出版社出版物目录记载, 除“文革”的第二年即 1967 年 2 月出版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4 月出版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外, 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就再也没有出版马列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卷的出版工作中断了, 甚至 1969 年、1970 年印制成书的 4 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布面精装和纸面精装两种)共 8 万套全部封存在仓库, 未能发行, 理由是不能冲击学习毛主席语录。

因为这类读物都配有红色塑料封皮(另有布面、绸面、皮面等)作装帧, 色彩和内容和谐一致, 形式庄严而激动人心; 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 所以称“红宝书”。开本多为 64 开本。其他常见的开本还有 32 开(据称最大的开本为 4 开, 与《参考消息》一样大)、100 开、128 开(最小的开本为 512 开, 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其形制小巧的功能是使它可以放进衣兜, 便于携带, 可随时取出来“联系实际”进行学习、应用。又有精神原子弹的力量、崇高而近乎神圣的地位, 所以被称为“红宝书”。购买时不能说“买”, 以免亵渎, 只能说“请”。与买宗教圣物只能说“请”同理。

同时, 它也被当作毛泽东思想的象征符号, 握在右手举过头顶频频挥动, 以示欢呼或声讨性呼喊的辅助物。林彪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 最早挥舞红色语录

本（“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后来成了对他的概括和讽刺）；自此这一动作成了呼喊口号时的规范的仪式。

红宝书甚至成了一些特定场合的礼物，例如会议公费购买赠送或私人祝贺新婚夫妇等，都有送红宝书的。以致于不少人家里的红宝书存积起来，堆成一大摞一大摞的，成了一种负担却又不肯随意处置。哪怕是无意中污损了红宝书，都可能成为莫大的罪名、受到严厉惩处；所以有时手握红宝书又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而这种心理负担大到极限，就会形成强迫症。

国外的报道和著述描写习惯称“红宝书”为“小红书”，既是因为没有中国人的崇拜心理，带有客观描述的色彩，亦不无讽刺意味。文革后中国人也接受了这种称呼，其中包含了反思和否定的认知。

2000年代一些书商给各式考（政治、英语）研辅导书、GRE词汇备考书、保险业务代理人咨询系统、健康顾问、网络安全教材数码摄影机（显卡、笔记本电脑）说明等实用手册之类的书籍，都冠以“红宝书”的名称作为广告。由于实用性强，很受读者追捧，已经成为考证经济中的一种新时尚。

（参考资料：张琴《心爱的“红宝书”毛泽东语录影响中国几代人》，新华网重庆12月15日电；《“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出版史话》，《中华读书报》2004年07月13日；佚名《红宝书不慎掉入厕所后，“燕南社区”“思想·文化·评论”<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4991>）

## 鸡血疗法

流行于1967年初的一种保健术。前后历时大约10个月左右。各地流行（从大都市北京到穷乡僻壤的西双版纳）的起讫和流行的具体时间、长度略有不同。方法是抽取小公鸡（也有说4斤以上重的纯种白色“来航鸡”最好）的鸡血几十到100毫升，注射进人体，每周一次。

据传，这是1965年流行于内地某省“上层社会”一种的时髦。其“缘起”是，某国民党“中将”军医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判了死刑，行刑前献出这个“秘方”以求自保。称，其疗效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治愈百病；在台湾的蒋介石就靠鸡血活着[注1]。不但当地行政首长依法办理，还有一帮效仿的下属。文革中该首长被批斗，在催逼追问下坦白了打鸡血的事情。于是被当作“延年益寿，抢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深揭狠批，并印上传单，广为流传。造成了打鸡血在全国范围的大流行。

据考，鸡血注射在皮下肌肉（而非静脉注射）里，异物蛋白进入人体所引起的免疫反应，对某些特殊疾病可能有一定疗效。一些人有进补后的感觉，浑身燥热，脸色红润。在医学、医药条件相对低下的当时，可能具有某种类似替代性作用。但它的疗效和适用范围，显然被极端夸大了（一种夸张说法称它对半身不遂、脑中风、妇科病、阴道搔痒、不孕症、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咳嗽、感冒等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而且由于鸡感染的疾病较多，鸡血的质量情况也不明确，带来副作用的可能性不易控制（也有个别注射后被传染鸡的疾病，引起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的病例）。鸡血疗法本身的科学性没有得到理论和临床的证实，使用它的除了个别正规医院外，多是城市的街道诊所、县乡医院等边缘性医疗单位。有病无病的人都去赶这个时髦，高潮时候还需要排队注射。

一时间竟造成了小公鸡因紧俏而涨价，在低工资、高就业、物价稳定的当时，

成为极罕见的现象。据称，被抽过血的公鸡瘦骨嶙峋，烹饪、食用时没有香味。

文革激发的非理性认知模式，使中国老百姓在作为原始信仰的血液崇拜[注]面前，产生认同感、亲和感。打鸡血的流行便显得顺理成章了。大量非正常死亡、流血，使人们意识到生命的脆弱、易逝，因此特别重视肉体生命的保全。只是借助于西洋注射器械，又有了些“洋为中用”的科学色彩、现代意味，似乎愈发增加了可信度；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哄而起、应和者特别地多。1980年代，相声演员姜昆曾创作《红茶菌和打鸡血》对其进行讽刺。

[注 1] 情节离奇得有点像一出戏，而戏剧性是当年人们在虚幻阶级斗争观念驱动下普遍的心理期待。

[注 2] 这是一种人类起源很早的信仰。从原始人类开始，血液一直被视为生命的象征。人类自古就杜撰过无数嗜血的精灵：中国、印度、爱斯基摩人都有从嗜血精灵到吸血僵尸之类的传说。由于它们是生命泉源——血液的掠夺者，因此被想象为凶残冷血的恶魔。以一种否定方式表达了对生命丧失的焦虑，对血液神秘性质和魅力的崇拜。近代医学广泛应用血液于疗救生命、治愈病人，似乎是血液崇拜远古遗风的现代印证。

(参考资料：桑晔《域外读书·国人梦已醒》，载《读书》1992年4期，P141；《健康的误区》，载“朝华网”“女性频道”)

## 饮水疗法

1970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以后流行的一种辅助性治疗方法。民间传说这种疗法源自日本，难以确定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真有事实根据。

办法为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空腹喝一盅（或量化为500毫升）凉开水。据说可以清洗肠胃中的残留废物，保持人体所需水（水分在人体体重比例中占70%多）的正常供应，对慢性肥厚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消化道溃疡、慢性肠炎、慢性消化系统疾病有一定疗效。

后来又有说，它有降低血黏度，流畅血液、预防中风的效果；对便秘、胃酸过多、下痢、膀胱炎、尿道结石……等，均有缓解之效；传得更“神”一些的是，说它有冬天预防感冒、减肥、延年益寿、纠正羊水过少和矫治异常胎位等作用。

由于这种疗法简易可行，不需复杂的技巧、操作程序，额外耗费金钱，迎合了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相对缓解的间隙里，人们讲究养生的心理要求。喝过的人都说神清气爽，胃口好，消化功能增强，于强身健体有明显疗效；不知道是自我暗示还是实情。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互为补充、互相促进。总之通过这样的口口相传，互相模仿，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广为流行。无意间推动了乱世苟全、重视此在生命的意识涌动。虽然那个时代人们行为总体上带有反智性从众特点，但它对经济落后、医疗条件欠发达状况下的健身防病，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补充。其盛况比较前些年的鸡血疗法更有过之。

但也有持专业眼光的人认为这样会造成有益菌群失调，反而不利于保健。尤其是出汗后喝水，血液中的盐分流失过多，吸水能力就降低，水分通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使细胞水肿，严重者会出现头晕、眼花等“水中毒”的症状。一次饮水量过多，大量的水积聚在胃肠中，使人胸腹感到胀满，不利健康。饮水过多，还会冲淡胃液，导致胃肠的吸收能力减弱。因此提倡“少量多饮”。[注]



一些文革回忆文章常把它和“鸡血疗法”、“甩手疗法”、“红茶菌（海宝）”、“针灸治聋哑”并列；其实饮水疗法和甩手疗法这两种方法，似乎都比“鸡血疗法”、“红茶菌（海宝）”显得可靠，立足于人体自身免疫力的增强，实际流传时间也更长一些。

[注] 据称，正确的方法是，每次饮水以 200 毫升左右为宜，最理想的饮水是凉开水、淡茶水。开水在自然凉到 20 至 25 摄氏度时，溶于其中的氯气等减少一半，而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并不减少，其张力、密度等理化特性与生物细胞内水的化学特征极相似，易被机体吸收。凉开水特有的生物活性，易透过细胞膜，增加血红蛋白量，改善免疫功能。常饮凉开水的人，肌肉中乳酸积存减少不易感疲劳。

（参考资料：《老年人多饮水可预防冠心病》，载“冠心病”网；《“健康人生”：喝水也中毒？》，《解放日报》2002 年 9 月 5 日，“健康与发展”  
<http://sdep.cei.gov.cn/shcun/files/2002090503j.htm>）

## 甩手疗法

1970 年代中期开始流行的一种民间健身法。与饮水疗法等大致同时。

方法是：身体站直，脚伸直，腿稍弯，肛门上提，脚趾用力抓住地下，两脚距离等肩宽，两臂同向前后摇甩，向后用力，向前不用力，由随力自行摆回，两臂伸直不宜弯，两眼平视，心无杂念。动作要领为：上宜虚、下宜实、头宜悬、口宜随、胸宜絮、背宜拔、腰宜轴、臂宜摇、肘宜沉、腕宜重、手宜划、腹宜质、跨宜松、肛宜捷、跟宜稳、趾宜抓。甩手次数无一定之规，视各人情况而定。较好的方法是由二三百开始，逐渐做到每回一千多至二千多次，约半点钟；每日上下午、晚上三次。

其原理从中医观点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甩手可通气血，疏通经络，刺激脑细胞，增加食欲，促进新陈代谢，补气益血，镇静安神，缓解挛缩的肌肉，改善体质，消除百病（有说源自“易经筋”，疑为攀附虚构）。所以说此法对关节炎、失眠、便秘、高血压、中风、半身不遂有一定疗效，多少合于人们常识；至于说可治便血、哮喘、白内障、沙眼、色盲、近视、食道癌、颈部淋巴瘤等，就让人存疑了。

古希腊时就有甩手疗法。相传苏格拉底曾向弟子传授甩手法，一年之后坚持每日 300 次甩手的只有日后终成大器的柏拉图一人。据信，苏格拉底 60 岁还娶妙龄少女为妻，柏拉图活到 83 岁，都与此相关。

文革间歇期，人们感到无法主宰自己的政治命运，业务上也无能为力，却唤起了对脆弱肉体生命的关爱。尤其人们面对生老病死无法抗拒的恐惧时，自然无不渴求练就超自然力以摆脱困境。从社会心理层面，侧面折射出人们对文革的厌倦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趋众心理使用甩手疗法大行其时。往往带有自发性、狂热性、非理性、暗示性的特点。当是时也，晨练人群排阵如林，手臂甩动，煞是整齐，蔚为壮观。真是挡不住的诱惑。姜昆作品《红茶菌和打鸡血》（1980 年代中期）也捎带讽刺了甩手疗法。虽不能治愈百病，但甩手毕竟是一种有益、有效的运动，其健身效果能间接抵抗疾病。而且简易可行，运动量不大，对老人尤其相宜；所以后来一直有人沿用此法。

有轶闻记者报道说，解脱释放后的前空军司令吴法宪（以“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名义判刑治罪）仍保留了当年实行甩手疗法以养生的老习惯，小楼晨练望之者众。让知道原委的见者会心一笑。

（参考资料：《活动手病赶走》，载“体育学科”网；《佛教甩手疗法治百病》，载“祈福中华”网；《走出秦城监狱的吴法宪》，摘自《山东商报》）

## 红茶菌

流行于 1970 年代中后期的民间养生疗病方法。红茶菌俗称又叫“海宝”、“肉灵芝”，有的地方称“太岁”，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把它收入“菜部”蕈类，称其为“本经上品”。是一种像海蜇的生物。用红茶水加糖泡养，就会慢慢长粗长厚；味道酸酸甜甜的。治病就是喝海宝泡水。

本源于我国渤海一带，后流传至高加索被用于制作红茶菌发酵饮料养生（一村老人长寿，有生育能力，无患高血压、癌症死亡者。当地人称之为“茶科瓦斯”），由日本俄语教师乌居带回国内，再传到世界各地。据传，它含有乳酸菌、醋酸菌、茶、糖、维生素等多种天然营养物质。饮用时酸甜可口，清凉鲜热。医疗保健功效多，副作用少；具有营养、预防、保健、医疗、康复等作用，对癌症、心脏病、脑血管、肠胃、肝肾、肥胖、斑秃等 20 多种疾病有明显疗效。传得神奇时，更说是能够延长性年龄、减少更年期障碍、帮助消化、润滑肠道，治疗消瘦、贫血、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便秘、前列腺炎、痔疮、痤疮、妊娠呕吐、核黄素缺乏症、胆结石等。

它的机理，据施塔伊克劳斯等人报道（1996 年），红茶菌汤的抗幽门螺旋杆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肿胀脓杆菌作用主要是来源于发酵过程中生产的醋酸。其解毒作用因葡萄糖醛酸能与毒素（重金属或环境污染物质）酸化结合有利于将之由肾脏排出体外。毒素在体内积累引起的痛风和肾结石能使症状得到缓解。酵母菌细胞壁膜产生的“B 古鲁 4”物质被认为是有希望的抗癌药。

因为不清楚红茶菌的分子结构、药用原理，当时人们觉得神秘，反而增加了它的吸引力。那时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在养红茶菌，亲戚朋友之间还写信、打电话推荐，交换食用心得。一传十，十传百，在口碑效应作用下食用队伍呈几何级数增长。这种另类食物的口感、疗效，确有神秘之处。这种治病方法在全国维持时间较长，实际上 1980 年代还有人养。姜昆作品《红茶菌和打鸡血》（1980 年代中期）对它的流行进行过夸张描述和讽刺，把它看作浩劫年代的怪现状。直到 2004 年通过 Google 引擎仍可从网上查到“836 项符合红茶菌的查询结果”，其中大量信息是产品介绍、推销。而人们在提及鸡血疗法、饮水疗法、卤硷疗法、醋蛋疗法等迹近荒唐的文革往事时，总会会心地想起它。

（参考资料：林新菊《红茶菌的制作方法》，“世界名人网”2003 年 9 月 14 日；赵允《“神秘肉团”究竟是个啥？》，《精品健康导刊》2004-11-10）

## “卤碱疗法”

1967 年开始流行并被正规医院采用的民间治病偏方。卤碱又称“卤干”、“681”，说是可以用来治疗癌症。起源于大字报传说服用的卤碱（也有说用于内

蒙某盟某旗草原上某个水塘里的卤碱作成针剂，注射穴位的)能治消化性溃疡，后来就传到能治疗癌症，越说越玄，直至百病皆治。有的“药厂”就立即生产出“抗癌”的“卤干粉”，美其名曰“681 抗癌片”。

医院和医生在既没有履行新药研制、临床实验前后、试产期和正式生产的报批审核手续、批准文号，也没有确证化学结构研究、稳定性实验、工艺标准、制订临床用药质量标准、确证主要药效和毒性试验、三期临床实验的系统数据、报告的情况下，也起用了未经国家药典收录的“药品”治疗癌症。不管是肺癌、肝癌、胃癌、肠癌，不管是腺癌、鳞状上皮癌及未分化癌，只要是癌，就用“681”。成为一种“抗癌行市”。因为那是一个破除条条框框、解放思想得连党政管理部门、公检法机构都可以踢开、砸烂的革命年代。医院方面但求相安无事，谁还会去惹火烧身呢。只要在以讹传讹中病笃乱投医的病家相信、要求给“药”，医生也只有体恤病家意愿，不敢贸然违拗。只是尊重生命的职业谨慎就被暂时放逐了。

事情起因据说是一位普通的机关干部提出这项发明，受到压制，于是贴大字报控诉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专政”“围剿”，在北京批斗会上对走资派、学术权威进行血泪控诉，“卤干治癌”的消息就不胫而走。虽然卤硷治癌的根据竟只有“以毒攻毒”一个抽象理念，却很符合“卑贱者最聪明”的时代精神。

不幸的是癌症病人用上此药以后，非但不能延长病人的生命反而加速了病人的死亡。最轻微的不适也是入口苦涩难当，咽喉、胃肠俱有灼痛，大便干燥难下。这个“新生事物”前后闹腾了一年多才收场。医药总要以疗效来检验的，所以疗效的反馈彰显就是假冒伪劣药物的极限。患者的生命苦难成了这场不受控的非法药物实验的代价。

卤硷疗法曾受到基于临床和理论各方面的普遍批评。1990 年代一个名叫胡万林的江湖游医又拣起了这套把戏，非法行医敛财，终至锒铛入狱。其间还得到小说家柯云路的推许，著有《发现黄帝内经》(作家出版社 1998 年版，首印 10 万册，盗版未计入)为之广告、助阵。一时声名大噪。

(参考资料：张侃、赵仲龙《健康的误区》，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8 月版；《新药研制申报程序》，载“[www.bast.cn.net/kxmc/](http://www.bast.cn.net/kxmc/)”)

## 羊肠线埋藏法

最初流行于 1960 年代中期、以后屡有改进完善的一种治疗方法。学名“穴位埋线疗法”。

“羊肠线”本是给牲口动物术后缝伤口用的，后来被移用于人类疾病的治疗。它是指在消毒条件下用针具把羊肠线埋藏腧穴皮下组织肌层，利用埋藏的羊肠线等在腧穴内的持久刺激(异性蛋白质磁化)以防治疾病的一种方法。这是在针灸疗法治疗小儿脊髓灰质炎基础上改进的，选用能在体内缓慢吸收的物质(主要是羊肠线)达到同样疗效。埋线一次治疗时间可持续 1 个月以上；既减低了治疗次数和成本，又提高了疗效(1960 年代)。以后逐渐扩大到治疗哮喘、胃炎、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肠炎、癫痫、中风偏瘫、面瘫、肥胖症等 40 多种疾病，埋线物质也从羊肠线，扩大到了狗脾组织、兔脑垂体、牛副肾活体组织等 7 种。据鼓吹者称此法对慢性、顽固性、免疫低下性疾病疗效尤其显著(1970 年代)。

据施治者声称，这种疗法是经络理论与现代物理医学相结合的产物，通过羊

肠线在穴内的生理物理作用和生物化学变化，融合穴位封闭、针刺、刺血、现体组织损伤后作用、留针(埋针)及组织疗法等刺激效应，将其刺激信息和能量经经络传入体内，以达“疏其血气，令其条达”，治疗疾病之目的。但治疗机理和疗效都没有得到实证科学的反复系统测试、检验。

但由于当时手术不施麻药，病人疼痛难忍，留下累累疤痕，临床反应和预后都欠佳。一时狂热过去，人们理性渐归复位，羊肠线埋藏法便被医病两家抛弃，当成了笑谈。久而久之也就被淡忘了。它不但成本高于鸡血疗法、饮水疗法、甩手疗法等，疗程长、副作用大、后遗症让人难堪，而且流行范围也远不及后者。

一直到 2000 年代再次被市场推广到时尚的美容上，广告攻势锐不可挡，人们才想起文革史的那段荒诞“趣话”。2004 年通过 Google 引擎能查到“121 项符合羊肠线埋藏法的查询结果”，大多数是声称具有各式神奇疗效的医疗广告。让人真伪莫辨。

(参考资料：刘鸿志《不堪其苦的“新医疗法”》，载“汉网”2003 年 6 月 12 日；《埋线减肥》，载“信和中医美容”网)

## “爬乌龟”

风行于 1970 年代末期的民间偏方，流传的范围不广。是那个年代可信度最低的治疗方法，即使在当时也被人径直称作骗术。

方法是让病人平躺在床上，将小乌龟放在病人的肚皮上任其自由爬行。乌龟爬着爬着不再向前走，那停留处就是生有肿瘤的地方。所以“神龟”可探查疾病。更神奇的是据说将乌龟放在生癌的体表部位，让它趴着不动病症就会“不治自愈”。

利用狗的特殊嗅觉，训练警犬搜索疑犯、毒品、炸弹；带电的感觉器官对于在海、河或湖中捕猎的食肉动物很派用场，仿生学试图通过在技术方面模仿动物和植物在自然中的功能，对解决技术难题提供设计思想……借助动物的特异功能，延长、替代人的感知，是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方法之一。乌龟除了长寿以外，其感觉系统有无特异、优长，迄无科学报告。更不用说特殊的感知能力了。

因为没有科学根据，连一个正式的疗法称谓都没有，只有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俗名，不仅经过职业训练的医生不会采信、使用，即使病笃乱投医的患者也觉得过于离奇、荒谬，太远离人们的常识。只是受“死马当成活马医”的侥幸心理驱使，偶一试之。很快他们也明白过来——连现代化药物化疗、放射治疗和手术治疗都对付不了的病，就这样轻易地被克制，实在令人怀疑。很快就被病家弃绝了。失去病家市场需求的疗法，其存活期可想而知。

这也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1970 年代末期虽然蒙昧积习犹存，智慧未启，封闭格局尚未被真正打破，但毕竟风气渐开，求助于科学常识者已经多起来。而且治疗癌症的新药、新方法正被陆续介绍、推广开来，取得可以验证的广泛疗效。所以“爬乌龟”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供作对遥远年代的笑谈。

(参考资料：张侃、赵仲龙《健康的误区》，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8 月版)

## 针刺麻醉疗法

被推许为“新生事物”、“文革成就”的传统中医治疗技术。又称“针刺经络穴位麻醉疗法”，简称“针麻疗法”。

该疗法创始于 1958 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用以进行扁桃体摘除术取得满意效果（尹惠珠）。随后在陕西、湖北等省市推广应用，手术种类涉及临床各科达 90 余种，基本上是中小型手术——脑瘤摘除术、二尖瓣窄分离术、胃切除术、子宫切除术、脾切除术以及肾、膀胱等手术。1965 年 12 月国家科委秘密颁发了关于“针刺经络穴位麻醉应用于胸腔（肺）手术的临床研究成果报告”，报告上海第一结核病院与上海市针灸研究所用手针针麻临床施行肺切除手术 186 例，成功率 95.5%。1966 年 2 月国家科委和卫生部在上海召开针刺麻醉研究工作座谈会，制订了“针刺穴位麻醉研究工作二年规划纲要草案（1966—1968 年）”。

1970 年 5 月上海举办了第一期全国针刺麻醉学习班，进一步推进“针麻热”。当时全国有 26 个省、市、自治区的 203 个单位开展针刺麻醉，累计病例达 57, 156 例。其中 1966 年 6 月后积累的有 24, 538 例，为“文革”以前八年的 5.8 倍。手术种类接近 100 种，几乎遍及各科常见手术。1971 年 7 月 18 日新华社首次向全世界正式报道了“我国医务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创造成功针刺麻醉”的消息：针麻技术突破了外科手术必须使用麻醉药物的旧框框，这种技术具有安全、简便、经济、有效的特点。累计病例 40 多万。并指出“从针刺治疗到针刺麻醉，是我国针灸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使历史悠久的中国医药学大放光彩。针刺麻醉的出现和发展，将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经络学说等中医基本理论的实质，同时对现代生理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等基本理论学科也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注]为此，同年《红旗》9 期专门辟出“关于针刺麻醉理论原理的讨论”刊登了三篇文章。

1972 年美国尼克松总统首度访华时提出要求参观针刺麻醉手术，形成了至今仍风靡欧美的“针灸热”。1973 年 3 月朝鲜针刺麻醉考察团参观访问南京医科大学。于是针刺麻醉被安排为接待外宾的常规节目。1976 年中国邮政发行四枚一套“医疗卫生科学新成就”（T-12）邮票，“针刺麻醉”赫然列在第一位。汤沐黎创作的油画《针刺麻醉》被中国美术馆永久馆藏。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1979 年）彩色科教片《针刺麻醉》广泛上映。连传承数千年的针灸也跟着沾了光：一曲红遍全国的花腔女高音独唱《千年铁树开了花》（千年铁树开了花，开了花，万年的枯藤发了芽，发了芽，如今咱聋哑人说了说了话……），针刺治聋哑的戏剧性奇迹更把人们的热情抬到了空前高度。

随着对“一根针，一把草”的神化，许多医院都恢复成立中医科，中医（药）师队伍扩大，并成为独立科室。选派人员外出进修中医；针刺麻醉工作达到高潮，并广泛应用于各科手术。穴位刺激的方法也发展到了激光麻醉、指压麻醉、头针麻醉、手针麻醉、面针麻醉、鼻针麻醉、耳针麻醉、体针麻醉、推拿麻醉及粗针麻醉等。1979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针灸、针刺麻醉学术讨论会，除国内代表六百余名，还有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 多位外国学者。大会交流论文共 534 篇，其中针麻临床及原理研究的论文约 300 余篇，占一半以上。到 1979 年全国针刺麻醉手术总例数跃增至 200 万例。但近年也有研究者指出，由于缺乏政策上的平衡性，过分强调中医传统医术的偏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他

分支和整个医学的全面、稳定、健康发展。

1980年代以后，针刺麻醉下甲状腺手术、前颅窝(颅脑)手术、下颈椎前路手术、拔牙术、剖腹产术，陆续通过鉴定。针刺原理研究从形态、生理、生化、心理等多学科充分证明，从外周到大脑皮层由多途径、多水平，神经与体液等综合性因素作用是针刺麻醉的形成机理。从1971—1992年的12年内，有关针刺麻醉临床应用和原理研究的论文已超过3000篇。1976年创办了专门报道针刺麻醉研究的学术性刊物——《针刺麻醉》(季刊，1980年改名为《针刺研究》)。1985年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把《针刺研究》发表的文章正式纳入他们编辑出版的《医学索引(Index Medicus)》，使我国针刺麻醉和针灸学的研究成果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国。

[注]“吹”的就在于：一，没有确切地说明适用范围，有夸大的倾向；二，没有给出科学的各项统计，以使未亲历者客观判断；三，在过程中就给出了只有事后才能作出的判断，而且许给的评语过高(抽象就不易证伪)。

(参考资料：《针刺麻醉法》，载《中医五绝网》“医学常识●治疗技术”；《针麻发展史》，载“大众医药网”“医学知识”：[www.windrug.com/index200706.php](http://www.windrug.com/index200706.php))

## 两报一刊社论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同时刊出的社论(因《红旗》仍按原周期刊载，有时就会出现同期刊有几篇两报一刊社论现象)。《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红旗》杂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解放军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始于1967年10月1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结束于1978年4月1日《神州九亿争飞跃——欢呼全国科学大会胜利闭幕》。

由于其时原有党政军权力运转体系已经出现脱节现象，政令无法按既定形式畅达，两报一刊社论就成为打破常规，越过所有行政层次直接传达中共中央最高层声音的一个渠道，显示领导核心团结、运转正常的象征。在当时的舆论体制下，它具有中共中央文件的权威性，是以公开形式发布的中共中央文件。它的撰写多数不是出自两报一刊的自主行为，而是中央领导核心的授意，从主题、立意、阐述角度、材料、结构、风格到作者、发表时间都有明确安排，有最高层舆论主管官员(如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等)的参与、修改、审定。社论经常担负传达毛泽东对运动的战略部署、最新指示(如“清理阶级队伍”，无引语标识的用黑体字标出)并给以阐释论述的职责，有的是事务性、带有日程表的说明论述(1968年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有的是直接政治性的批判论述(如批判刘少奇的《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有的是意识形态的理论论述(如1967年11月6日《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一次正式完整地论述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引起长久批评而成为历史事件的著名社论，莫过于1976年9月16日《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披露毛泽东“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被判定为伪造遗言的夺权宣言)，和1977年2月7日《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提出的“两个凡是”(被后来学

者定义为导致华国锋倒台的政治纲领)。社论的功能定位要求对全局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按规定,全国各地报刊要头版头条全文转载、广播电台要播送。这样的社论远远超出文本范畴,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具体说,它是非常时期的一种组织形式和社会动员形式:两报一刊社论发表前(前一天晚上7点)有预告(有重要广播),社论文本由新华社发电讯通稿;中央机关、军队、地方(各省市县)和单位领导要组织收听、记录,收听完要组织敲锣打鼓庆祝游行;要在最快的时间里安排贯彻落实,成为制定工作规划(大计划小安排)、政策法规的根据,作为国家意志的表述具有法源的效力;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都要以此为中心,组织文章、报道,阐释社论精神(据一个不完整的统计说,仅仅1976年9月17日至30日14天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社《内部参考》、《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7种报刊就有236篇消息和文章登了“按既定方针办”内容),编写学习辅导材料,报道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反响;政治学习要反复宣读、宣讲,座谈心得体会,联系地区、单位、个人实际,重点在怎样把社论精神变成单位和个人的思想、行动;甚至被收入课本,作为政治课、语文课的教材。难怪外国观察家把它当成了在信息匮乏条件下收集、感知、判断中国动向的宝贵的信息源。由于挟持最高权威,在当时受众心中社论论说高屋建瓴,文风气势磅礴,修辞精确生动,成为人们竞相模仿的对象,作文论证引证的经典。塑造、影响了文革时代的文风。个别地区还曾一度流行把《两报一刊社论集》当作婚礼礼品的民俗。

后来的研究者也把它作为剖析当时的思维、话语范式的典型文本。他们认为,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畸形政治的产物,其赖以运转的政治/社会结构是一元化政党统制体制,话语方式是用领袖/政党学说话语代替新闻学术话语(词汇频率最高的是“革命”、“阶级”、“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斗争”、“专政”、“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美帝国主义”、“批判”、“路线”、“伟大”),经济/文化基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统一的舆论宣传,舆论生态是“‘党报’本位”的封闭型环境。学者刘小枫把这种语式称为“‘社论’语式”。认为它是“一种道义-权力诉求”,指出“这种特定的言述形式比其指述的内含一道义权力更有约束性”,被“阶级的标签”的“‘社论’语式”成功地颠覆了传统的种种自在语式并进而独占全语域”,“甚至像抒情诗这种最富私人心性的言式,亦曾‘社论’语态化”。以致“不同程度解除了道义-权力诉求理念的文人学者那里,‘社论’语式(表现于某些特定的选语造句)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1990年代以来,因其固有的地位权威性依然,但它往日的神圣、神秘不再,在人们的口语里也逐渐含有贬义,成了调侃的素材。

研究文献:1967年至1978年《红旗》杂志;席宣《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载张化等编《回首“文革”》[上]第9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王忠人《发表“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始末》,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日]村田忠禧《如何活用计算机网际网络进行日本与中国情报分析》,载“阿里巴巴”“金狐论谈”论坛 2004-01-09;刘小枫《我在的呢喃》,载《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三联书店1996年版。

于会泳

(1925-1977) 出生于山东胶东县于家村。从小就通过盲人演唱接触了福山大鼓、蓬莱大鼓、荣成大鼓、海阳大鼓，熟悉掺合着皮黄、奉调、犁铧调、西河调、高拨子等的民间曲艺小调、民歌小调，通过自学掌握了二胡、三弦、笛子的演奏技巧。1942 年任教于解放区海阳所小学。1946 年参加胶东文工团，先后在美术队、音乐队工作。由于刻苦学习音乐业务知识，工作积极，1949 年抽调参加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音乐教育专修班”。被院长贺绿汀看中，边学习边代民歌课。其间加入中共。1950 年毕业时因学习成绩总分第一留在院属音工团，边参加创作演出，边旁听作曲系本科的和声班的课。同年调入本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主攻曲艺说唱。出版有收集、整理的《山东大鼓》和参与整理的《陕西榆林小曲》（音乐出版社，1957）、专著《单弦牌子曲分析》（1958）。先后创作有民族管弦乐合奏曲《闯将令》、歌曲《渔歌》、《杨柳叶子青》、《伟大的毛主席》、《北京的朝霞》、《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等。担任戏曲音乐讲习班教学。1959 年发表《关于我国民间音乐调式的命名》（《音乐研究》）。1960 年开设“民间曲调研究”专题系列讲座，次年开始“腔词关系研究”（1963 年完成；全文 12 万字、附有 230 个多曲谱的油印本），被称为“在分类研究基础上的综合研究……为形态学的非程式性研究起了先导作用……影响是深远的”。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和专修科的指定必修教材。1962 年晋升讲师，1963 年任民族音乐理论系副主任。1964 年发表《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上海戏剧》）。1965 年奉调上海“戏改创作小组”参加《海港》的音乐创作，和《智取威虎山》音乐的后期润饰工作，发表《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文汇报》）。1966 年 6 月被上海音乐学院定为“三反分子”，被揪回学院“小牛鬼组”看押监督，写检查交待，看大字报接受批判，参加劳动，受到抄家的冲击。10 月接中央文革指示，参加样板戏进京公演，得到张春桥回校造反的密旨。12 月写出《十四点质问》等大字报，参加“教工造反团”、“钟望阳专案组”。1967 年担任上海京剧院领导、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任。1968 年主持、参与批斗贺绿汀的大会，在《让文艺界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5 月 23 日《文汇报》）一文中首次提出“三突出”。1969 年作为代表参加中共九大，被增补为上海市革委常委。1970 年担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全面主持样板戏工作，试验运用中西混合乐队为样板戏伴奏，负责把《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样板戏剧目拍摄成电影，举办京剧训练班，为《杜鹃山》作曲，督阵、指导《平原作战》《龙江颂》的加工修改。尤其是《杜鹃山》的念白用词曲长短句式的韵白体制，柯湘唱腔采用歌剧主导动机的系统结构进行设计，取得很好效果。1973 年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1975 年任国务院文化部部长。以江青、张春桥的亲疏任用人选，大量提拔自己的亲信把持文化部，全面贯彻他们的政治、文化主张。在其指使下，负责“初澜”、“江天”写作班子，积极组织了对晋剧《三上桃峰》、北京饭店国画、无标题音乐、1975 年邓小平整顿文艺的批判，扼杀电影《海霞》、《创业》，组织拍摄为阴谋政治服务的《欢腾的小凉河》、《反击》等电影。1976 年 10 月被列入四人帮组阁名单，拟任职务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76 年 10 月被免去一切职务，并被审查逮捕。被隔离审查半年多时间里写出近 17 万字交代材料。1977 年 8 月底服苏来水自杀身亡。终年 52 岁。与其妻女中音任珂育有二女一男。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威海典藏”



## 毛主席说

引用毛泽东语录时对引语出处、版权所有者的交待、说明、提示。这既是文革时说话、作文的通行格式(略带炫耀色彩的时尚),也是对引用者立论根据、权威性的强调,一种加强说话、作文气势的修辞手法,常常就省略、代替了论证过程。挟持领袖权威,把引语直接当作结论本身。

由于天天读的演练,当时毛泽东语录引用率之高,达到了离开毛泽东语录就不能作文、顺畅发言的程度。不但报刊、书籍的报眼、扉页要引用大量毛泽东语录,独立文章的正文前已有毛泽东语录,文中还要引用,乃至多次引用。这种引用起初是抑制、后来竟完全代替了人们最低限度的独立思考。能熟记、活用毛泽东语录的人就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话语权威。不但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政论、哲学、军事著作被广泛引征,用作理论阐述的根据、种种实际应用的凭借,连未公开出版的早期著作和谈话、诗词,甚至很冷僻的话,都被频频应用于各式场合(官民朝野)。如,“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体育之研究》,《新青年》1917年4月1日第3卷第2号);“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

于是就有一类语言变体现象在民间交际中出现——不是毛泽东原话,也被冠冕堂皇地冠以“毛主席说”。其主要类型可以分为五种:(1) 僻典急用。毛泽东一时一地对人的具体评价,由于不具有普遍性而未收入毛泽东语录的,被用作撒手锏抵制红卫兵的过激行为。如“陈毅是个好同志”(文革中流传最广的有关批斗的著名的政治笑话之一)、“朱德是红司令”、“王恩茂打不倒”。典型地表现了毛泽东话语的政治权力性质。(2) 基本合理的。有的虽非毛泽东原话,却是意思约略相近;有的毛泽东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言论,但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从逻辑上能推出,可以包容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范畴之内。如,农民在生产队评议返销粮的分配,争得不可开交时有人会祭出撒手锏:“毛主席说,不准饿死一个人。”客观上拓展了毛泽东话语的阈值和应对现实的张力。(3) 借用,或称滥用。把普通常识、生活习惯及内容上不会引起异议的类似于公理的话都归到毛泽东名下。如,“惊蛰过了是春分”,“盐蛋皮蛋,下酒下饭”。虽然也越出了常轨,却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客观上把毛泽东话语世俗化了。(4) 伪造,用旧语言说,称为“矫诏”。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借助毛泽东的威望,生造一段毛泽东的话,假传圣旨。如,知青为了不吃粗粮,对生产队会计说:“毛主席说,知识青年不喜欢吃粗粮,就算了。”为了给偷懒、邋遢合理化找借口的:“毛主席说,真正的牛仔是从来不洗衣服的。”(5) 游戏的。如划拳时的口令:“毛主席说,酒是一包药。”利用音韵相协的粘连(在四川话里说“shuo”和药“yo”押韵),突显语言错位的无逻辑,造成戏谑效果。这种口令在许多民间酒宴上可以听得到;虽然未必有意,但语涉嬉戏、轻薄,实足的流氓口吻,全然没有一点起码的敬畏。第五种方式的出现可能要晚到1980年代中后期,却是前四种用法带有恶意的拓展延伸。“毛主席说俺傻

“文坊（2000 年代语料，是某网站给自己的定名），则把第五种类型进一步做了曲折复杂的变形，成为一种亲昵体贴的调侃。

作为语言变体的“毛主席说”，初期是因为有意无意的模糊，或借助毛泽东话语权威的实用主义外推（方便、偷懒、安全），后期逐渐带有语言游戏成分。这是一种非正式场合的话语方式，但又是被官方话语允许、诱导的话语方式。但沿着话语运行的自身逻辑，它的嬗变滑向了对个人崇拜盛行时在肯定意义上使用的“毛主席说”的反弹、异化，是民间语言自然演变中孵化出来的反叛因子。是由正剧而喜剧、由喜剧而闹剧（解构的王朔型话语形式）。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钟辰等《毛泽东（领袖交往实录系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标语口号

名词。标语指张贴、悬挂于机关、学校、工厂、军营、广场、街道、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大型建筑和场馆）的宣传性文字招贴，其内容是口号；因此常常将二者连用、合称。口号除了书写，还可用于呼喊。口号是对各种运动（以政治运动为主）的目标、任务、政策、措施、意义之概括、扼要的表述，具有纲领性的作用，用以发动群众为实现它而努力工作。是政治鼓动的重要手段，以意识形态推动社会动员的运动文化的器物性承载者。[注]古代圣人常以“一言兴邦”砥砺自己的道德文章，要承担天下的重担。这种近似虚妄的励志期许却成了中共政治运作的现实。每个运动都要产生一批口号。以致于人们私底下的议论里有“口号治国”之讥。

口号在表现形式上通常是一句话，其特征是高度概括，突出当前运动的主要精神内容，必须简略、舍弃相关方面和细节，所以虽然明确凝练却趋于简单化（难免伴有片面性），以方便群众理解、接受、照办。口号的句式多是肯定式或否定式，命令式的，没有祈使句、疑问句、陈述句，排斥怀疑、商议、反诘，与科学表达的前提预设、讲究分寸感无涉，其谓语多为描写动作的动词“打倒”“拥护”“坚决”“坚持”，强烈情绪宣泄的“……万岁”，或非此即彼的“宁可……也不”“谁……就……”“要……不要……”等，诉诸情绪、冲动而非理性、理知，接近并直接导引身体行动。由于标语口号需要过滤枝节和杂质，讲究旗帜鲜明，以光明、积极精神的激励人，所以总是高亢激越、雄心万丈、整饬畅达、干净漂亮。用简单化的口号代替具体政策，据以指导工作，解决各种内容和性质不同的问题。这种方式，有利于鼓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先天秉有“敬惜字纸”的心理定势），对他们进行社会动员；而社会动员是中共政治组织的主要手段和文化传统（从土地革命时期红区的打土豪、斗劣绅、分田地、“扩红”到解放战争的“反饥饿、反内战”；从建国初期的大跃进运动，学“三面红旗”到文革的“斗私批修”、“继续革命”、“批林批孔”）。这种简单化、直线化的认识方式，甚至还反作用于主政者的判断，成为 1949 年以来左倾错误不断发作的原因之一。标语张贴在所有显眼的地方，几乎无处不在，具有一种强制性覆盖效应，凝聚着群体意志和行政权力的威压胁迫，不由得行人不看，形成反复刺激、渗透，乃至进入受众的潜意识。因其可视性强，有制造、渲染气氛的直观作用，能收立竿见影之效，被

列入运动期间工作检查的基本内容，运动的指导者与被指导者、检查者与被检查者都很重视（双方的共识是，标语数量越多说明重视程度越高）。但常常成为应付差事的官样文章（量化的统计数字便于写进总结），流于形式；立意太高的目标无法落实，就让它停留在口头里、纸面上。上下双方都心领神会。同时由于口号的制定有较强的政策性，在正式场合（报刊、官方组织的群众性集会、外交场合）使用，需要专门的宣传领导部门负责拟制、审定，以统一宣传口径，防止出现不协调的声音。例如国庆游行的所有标语口号，就都要经过分指挥部、总指挥部、国庆筹委会、北京市委等层层审批。而它的制作、悬挂、张贴，则是各级行政组织的工作内容，由他们去贯彻落实的。文革中官僚行政体系被冲垮，群众性造反组织自己制定行动目标和策略，口号的制作、审定权就在自己了。批斗会、辩论上呼的口号常常视现场情况变化冲口而出，随意性极强。“炮轰”、“油炸”、“火烧”之类施虐性话语，滥行于时。文学艺术作品（小说、戏剧、电影）对革命者在黑色恐怖下张贴标语的英雄刻画、临死高呼口号的一贯描写，更赋予标语口号一种悲壮、崇高色彩。有意无意给标语口号创制、接受提供了政治上正确的心理预设。文革标语的特点是：书写的大小尺寸繁多，小到手挥的三角旗，大到1米多见方一个字的巨幅标语；书写工具从用大小毛笔到各式排笔、刷子、扫帚；书写载体，从纸张、各式质地的大小条幅、建筑物墙体，到道路的地面，甚至写在、贴在被批斗者的衣服上、身上……最重要的是，它已成为运动的象征形式、组织形式，宣泄污辱、谩骂、恫吓，煽动群众情绪不断升级达至狂乱的重要手段。当时的标语口号从内容到书写方式都具有很强的行动性诉求，含有显著的攻击性、暴力因素。比如写“打倒”谁谁的标语常把人名颠倒书写，并打上红叉叉（类似于古代的镇魔巫术），等等。

[注]据说，“时日何丧，吾与汝偕亡”就是伐纣的口号。以后汉末黄巾军起义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呼，辛亥革命有“驱逐达虏，恢复中华”之呼，抗战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之呼，大跃进有“人民公社好”之呼，文革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呼。

（参考资料：武法瑞《振奋过中国人的标语口号》；孙振军《标语口号的妙用与文明》；周伟《标语口号——时代呐喊最强音》，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

## 大字报

作为张贴于墙壁的大字书写的壁报，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1980年代的流行于中国大陆的言语-书写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之一。它既是一种言语-书写形式，却又不单纯是言语-书写方式，更是一种政治工具，与当时频繁政治运动相关联的阶级斗争、政治暴力的实现方式。毛泽东曾说，“中国自古产生（？-前522，春秋时期郑国人）时就产生了大字报。”毛泽东把古代的揭帖认定为大字报的起源，是想借用古已有之赋予大字报的合法性。而古代的揭帖，只是私人张贴的启事。广义地看，现代所有张贴在公众场合的大字海报、告示、通令、传单、标语口号、表扬稿（或批评、检讨）、商品广告，都可以称作大字报。但作为具有特殊政治功能的大字报，直接起源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

1957年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疑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的产生方式。接着有人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于是一张张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很快反右斗争利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提意见的大字报成为反党言论的罪状，在包括批判大字报的裹挟、反击下，50余万人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开除公职、流放（返回原籍或下放农村、农场、边疆）、判刑等处罚。在整改、“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了广泛使用。毛泽东（1958年）因此称赞它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群众创造”的“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曾在校园里遭到围攻。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毛泽东批准下播发了聂元梓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毛泽东被授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的桂冠。同年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下的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炮打司令部》，就被冠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副题。8月9日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内容与大批判一样，是政治宣判式的而非说理的。其固定格式为：以毛主席语录、国内外形势大好开篇，抓住被指控者的只言片语，利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的办法，上纲上线，以“砸烂狗头”、“横扫牛鬼”结尾。私下议论、日常琐事乃至个人习惯、好恶、情愫、隐私，都被强行曝光，纳入公共话语评判的范围。不讲事实证据、逻辑推导，只需大帽子乱扣，嗓门越大越好。开始是用以打倒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后来用来打派性战争。为了争夺显眼的有利位置，不同派别组织之间互相覆盖大字报引发经常性的争吵、斗殴甚至流血冲突，形成“保留三天”的通例。常在大字报的天头、地脚写上辱骂和威胁的字句。从外表看，大字报的发表似乎是完全自发的，无需任何审批程序，实际上仍然服务于毛泽东动员舆论以整肃现成党政系统的战略需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大字报作为政治运动的形式，除了个别失控的相对无政府主义时期（如派性武斗），总是与中央精神协调的。被指控者根本没有自我辩解的权利，一旦大字报缠身就意味着灭顶之灾。从形式上看，大字报不仅五颜六色，有红的、绿的，有用书写纸，也有用旧报纸写的，体裁上也门类齐全，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丰富多彩。张贴的地方，从学校、机关、厂矿、街道的墙壁、门窗，甚至人身上。时间上也是天天有新内容、新花样，不断更新。由于大规模的大字报耗费了大量的纸张、笔墨，时有纸张断档的现象发生。大字报经反复覆盖糊成了厚厚的一层，成了回收废纸者丰厚的收入来源（只能夜里偷偷地撕）。看大字报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有抄录、收集大字报内容作为借鉴或情报的。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及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分别将“四大”列为“社会主义大民主”和“人民的民主权利”。美国专家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等在华工作人员也参加了大字报的书写，抗议给他们特殊待遇是“修正主义”做法。受内地冲击，香港总督府外也曾贴满大字报。文革反对派也利用大字报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有伊林\*涤西（北京农业大学附中学生）《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白志清（重庆）《我爱我的祖国》《评张春桥》、李一哲（广州）《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在 1976 年“四五”天安门事件，1978 年反对“两个凡是”的西单民主墙中，大字报都曾扮演了重要角色。

1980 年 2 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相反妨碍了人民正常地行使民主权力。同年 9 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取消了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1982 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取消了“四大”条文。1990 年代中期以来，仍有人因受到损害无处申诉、利益冲突中处于劣势，或出于不公平竞争的目的，利用大字报形式表达意见。个别人因此受到程度不同的处罚。国外也有类似表达形式，如高秋福的《在国外看大字报》就描写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加拿大国会大厦联邦广场、德国科隆大教堂的大字报墙。有人把互联网与大字报进行类比，说它们都是非主流的民间媒体，没有言论“守门人”（编辑或主持）的开放园地，不用刊号、书号，真正贯彻人人平等原则，名流或小人物，教授或学生，高明或平庸，都有同等发表权利。其区别仅在于：公共场合与私人空间，群众围观与独自收看，手抄件与印刷体……互联网是抽象、无形地展示在私人书桌的屏幕中；大字报是具体、直观、乱七八糟地覆盖在繁华街道的墙壁上。

[附：高秋福《在国外看大字报》摘要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十月广场列宁塑像附近，参加过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老红军战士用核桃大的俄罗斯文字或乌克兰文字那书写的，苏联刚解体造成的卢布贬值。位于渥太华河畔的加拿大国会大厦南边是群众经常聚会的联邦广场，魁北克青年人抬着一块大木牌，上面用法文详细地写着他们要求独立的主张和理由，企图以示威影响国会对魁北克独立的辩论。德国中西部莱茵河畔科隆市科隆大教堂的大字报墙出现于 1990 年代，被当地人称为“和平墙”。神职人员把它看作忏悔的一种替代方式。书写大字报的文字主要有德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荷兰文、俄文、中文、日文、朝鲜文等语言。内容有议论时政的（如“新纳粹该死”、“法国必须立即停止核试验”）；祈祷和平与吉祥的；感戴上帝并忏悔的（如“感谢万能上帝，我们夫妻和好如初”、“我犯了罪，请我主饶恕”）；抒发个人感受的，向亲友祝贺或问候的，给游伴留下游踪的（如“施特劳斯，明天早班飞机去柏林”）。教堂管理人为使大字报更有秩序，用木杆子和铁丝在教堂门前搭起一道新墙，置备了长约 70 公分、宽约 50 公分的硬纸板，供人们写大字报使用。为防止日晒或雨淋，准备了规格一致的塑料薄膜套在大字报纸板上，方便长期保存。无论是谁只要登记一下，就可得到几块硬纸板和塑料薄膜、几段细铁丝书写、悬挂。]

（参考资料：罗平汉《大字报在中国的兴衰》，“人民网”2004 年 10 月 13 日）

## 红卫兵

1. 文革初期由工农兵、革干（革命干部的简称）等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组成的青年组织。1966 年 5 月 29 日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被公认为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随后北京许多中学都成立了类似组织。同年 8 月 8 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俗称“十六条”）肯定了“群众所创

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在学校中，……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戴上红卫兵袖章，公开表示了对红卫兵的支持。并在短短100天内8次接见1300万红卫兵，展开大串联，使这一组织立即就遍布全国大、中学。红卫兵的宗旨是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资产阶级保皇派”造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手段是大字报、大批斗，“破四旧”、“抄家”中进行了打砸抢，他们的造反行动冲垮了各级党政机关现成的运行体系，成为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达成其政治目标的工具。整个社会因而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与此同时，老红卫兵（如骆小海、彭小蒙、王战胜、宋彬彬、张承志、谭力夫……）中的一部分人看到父辈被打倒，认为文革方向出了问题，起而保卫现存官僚机器，有代表性的就是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等组织。这部分红卫兵被称作“保皇派”（亦称“保爹保娘”派）。1967年进入夺权阶段后，围绕权力分配（在新成立的革委会里名额的多寡、谁分管有实权的部门）纷争吵闹不休，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毛泽东于是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逐渐失势，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随着1968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作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组织终于解散。但其骨干力量，还进入革命委员会并以其他方式，成为前中央文革小组依赖的社会力量在政治舞台上或隐或现地继续活动。

2. 文革复课后，在中学取代当时已经被废黜的共青团组织的青年学生的群众团体。除任务、策略、作用已不同于文革高潮期的红卫兵外，其组织路线（阶级论，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加入红卫兵受到一定限制）、意识形态（继续革命思想，是中共的思想路线）等仍基本一致；仍然是后者追慕的精神偶像。以后共青团恢复后，还并存了一段时间。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取消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学校共青团组织早已恢复，工作在不断加强；少先队和学生会也正在恢复。红卫兵的存在，使学校中学生组织重叠，学生干部负担过重，矛盾很多。普遍认为，红卫兵组织可以不再继续存在了。”于是宣布取消各地的红卫兵组织。

3. 文革发展到1967年以后和1976年的文革后，红卫兵成为造反派的同义语、代名词；已不限于指称学生红卫兵，而涵盖了文革中的所有造反派组织（包括工人、农民、科教文卫从业者、机关干部等人群）。他们全盘接受了红卫兵的价值观、行为目标和方式。因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右臂佩红袖章，手握红宝书，这一装束加上腰间的武装带，遂成为红卫兵的标准装。男孩蓄平头，女孩剪齐耳短发，或扎短辫。至于军装要洗得越旧、越白越好——显示其父辈的参加革命早、资格老，自己的血统纯粹。新军装的草绿色被认为赝品，差了档次，被称为“鸡屎绿”。这一形象，已成为后文革影视作品中红卫兵的漫画相。但习惯上还是把红卫兵小将作为学生造反派的称呼，工人造反派则多称无产阶级革命派。作为政治力量的红卫兵运动在上山下乡后自然消失，工人造反派则因被吸收到权力结构中，仍然或隐或现地存在着。它的躯壳被青年学生群众团红卫兵顶替，只留下一个名义上的光环，而内核已经被抽空。作为普遍名词，在文革后该词含贬义。

4. 具体指参加红卫兵组织的人（个人或群体）。例：“来了一群红卫兵。”

（参考资料：参考资料：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版；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

学出版社，1996，页 260)

## 红司令

崇拜敬语。红卫兵的红司令，文革中对毛泽东的特定称谓。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宋彬彬给毛泽东左臂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红卫兵当时即有“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口号。从以上具有戏剧性的象征举动到公开宣言，都蕴有把毛泽东倚为红卫兵最大靠山的政治暗示，成为红卫兵合法性的最有力的保证。在学校和其他一切阻止他们行动的党政领导者面前，便有了说“不”并自称是“毛主席派来的天兵天将”的充分理由。其后前述口号被红卫兵反复书写（大标语）、呼喊。毛泽东臂戴红卫兵袖章的新华社照片在报纸、画报等出版物不断传播，绘制的巨幅画像（宣传画、版画、油画）被不断展示，也强化了这样的感性认知。毛泽东本人对这一称谓也甚感欣然。从思想联系和政治现实两方面看，称毛泽东为“红司令”都丝毫不勉强：一则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红卫兵的创立完全听从了他的号令，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在酝酿红卫兵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二则红卫兵的思想武器（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杜绝资本主义复辟的继续革命）都是从毛泽东那里接受来的，毛泽东从编辑《湘江评论》到拿起枪杆子武装夺取政权的造反者形象也激励着红卫兵的想象，他实际上就是红卫兵的精神父亲；三则毛泽东曾写信赞许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造反有理”，戴上红卫兵袖章，后来的八次接见红卫兵，驱逐工作组，发动遍及全国的大串联……更是从公开的政治表态到政策倾斜、情绪满足各方面，全方位支持了红卫兵。事实上，红卫兵也成为毛泽东推行自己文革战略，动员舆论和群众打倒党政一线运行体系的政治力量。毛泽东公开发言质疑刘少奇的文章《炮打司令部》的副标题“我的一张大字报”，就采取了红卫兵的言语方式，强烈暗示出他本人就是一位中共中央的红卫兵。文革前（文筹会）后期（革委会）里的政权都给红卫兵、造反派留有席位（包括中央委员会）。于是从后者视角看，他更是当仁不让的红司令了。

（参考资料：本报记者《毛主席同红卫兵在天安门上》，《人民日报》1966.08.19；本刊评论员《红卫兵赞》，《红旗》杂志1966年第12期）

## 上纲上线

动宾结构的联合词组。也简称“上纲”。作为思想方法、话语方式，它不始于文革，却是文革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集中表现。“纲”和“线”，就是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大是大非。这种方法要求，看待人和事物不能就事论事（实事求是），而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所有问题都提到重大原则的高度，即，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把所有问题提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根本上来分析、认识、评价。才能站稳政治正确的阶级立场。其表现为，经常把一般问题、非原则问题，也当作原则问题看待、处理，使其显现出特别的严重性。丢一个吃剩的馒头、迟到几分钟、穿高价时髦衣服、看西方哲学文学名著、对党员干部个人的不满、经济计划指标的高低，如果只以一时一地的行为失当、个人兴趣或对个别人的局部、业务上观点看法视之，就要被这种认识方法看作丧失原则、和稀泥、骑墙，必须从生活作风、组织纪律、思想意识、崇洋媚外、对党和国家的态度，从资产阶级

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争夺政权和是否还继续革命的角度来认识。局部问题被夸大为全局问题，认识问题被夸大为立场问题，发展战略问题被夸大为路线问题，成了流行病。在科学理性看来，这些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是小题大做、吹毛求疵、神经过敏。夸大个别现象，无限制地从个别跳跃到一般，超越概念的固有外延，随意地联系—联想，无根据地到处虚设假想敌，用僵化的框框去套复杂的社会现象，导致曲解和武断，常常会伴随严重后果……是这种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一般特征。用这种简单化（没有例外的一刀切）、绝对化（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人对人，不是个人品质、个人行为特征，而是整整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的特点。上纲上线成了只赚不亏的投机生意。在当时的形势下，越是敢于上纲上线，越是敢于突破“纲”和“线”的限制的人，越是勇敢，觉悟、水平越高。政治前途越远大，越能得到重用。这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一种流行文化。在此背景下，人们的言行充满了无事生非的特点，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造成强烈的不安定的气氛，弄得人人自危。生怕偶有疏忽就会被人抓住把柄，不敢说话，不敢做事。

报纸广播等舆论工具这样宣传，大小工作（包括技术工作和社科学术）、人际交往被框进这样的框框，文艺作品也这样描写生活……形成了无所不至的网络，让人没法不被推搡着效仿、顺从。这样随大流，彻底放弃认识、行为的主观能动性，把自己的命运和组织捆绑在一起，就推脱了个人责任，不但使自己处于安全境地，也省事省力。在这种惯性支配下，人们不但在认识外部世界时使用这种思想方法，在反省自己的检讨或总结里，也给自己上纲上线，以求得深刻的评语，成为屈膝邀赏的姿态，卑琐被当成了崇高。在被迫的认罪时，上纲上线、自我贬损就成了态度端正的过关技巧。

（参考资料：于佳临《坚决相信群众才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人民日报》1967.11.23；李洪林《两条思想路线》）

## 向毛主席保证

盟誓语。主要流行于1960-1970年代（向前向后延伸是个别情况）。一般见于口头语言，用在非正式场合。赌咒起誓时使用的，想要取信于人，向他人证明自己言行的真诚和真实性的说辞。同时还要举起右拳到右耳平齐。多在同龄孩子之间或孩子与家长之间。青少年偏爱使用这种虽不规范却颇具表现力的口头禅。属于一种亚文化形式。[注]拿这种说辞起誓的人，脸上会露出发急的表情，那是因为不被信任而产生的痛苦，渴望表白的冲动。当然也有神色漠然地说出这个誓言来的，其时语调平缓，因为它已经制度化地织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早请示晚汇报”、“挑战书”“决心书”“保证书”“检查书”等许多场合，虽然不明确使用这样的盟誓语，也是直接或潜在地把毛泽东作为盟誓对象的。成年人也偶有使用这样的口头禅，因为它虽然不直接是主流文化，却与主流文化相通、相融。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惯性。所以也偶有在正式场所这么说话的。毛泽东不在场而把他当作起誓对象，显然与中国祷祝传统有关：旧时代拿鬼神充当祷祝的对象，文革时则无意识地把伟大领袖当作了天上至高万能的神明，认为他可以洞察一切，并能对有意的恶行、谎言施行惩戒。与国人对祖宗、对人格神的崇拜，超过了对超自然神祇的敬服相通。在个人崇拜（“他是人民大救星”，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突出政治（“忠不忠看行动”）的环境氛围中，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



不妥。把毛泽东当作了话语流通、质押的硬通货。从现世意义上说，向毛泽东保证是面对最高权威，战战兢兢，不能、不愿、不敢说假话；从业报来说，意谓如果提供的情况、盟誓不真实、不真诚，愿意接受毛泽东所施加的惩罚（甚至这也是一种荣耀？）。它带有较强的民俗性、民间色彩。似乎包含了对民间残存的宗教习俗的摹仿：汉人“对天发誓”，基督徒“向上帝发誓”，穆斯林“向真主起誓”。既是一种严重的盟誓，可能伴随巨大灾难性后果（盟誓形式欲具效用本身需要预设的惩罚，即使是心理暗示仍然有着不可小视的威慑力）；也是一种无法验证的语言诡计，存心取巧而无伤大雅的语言游戏。盟誓者和接受者都有心领神会的不与计较。1990年代的影视、小说曾借此作反讽，以调侃、解构文革话语。2000年代前后，这一口头语再次成为流行时尚（《足球》报2004年3月31日报道国奥队备战的消息，就用了这样的标题“国奥将士韶山向毛主席保证

阎世铎诗抄雄心壮志”），被年轻一代挂在嘴边。是一种与政治态度无关的复古表现，却与大环境——人们对现实不可预测，随时可能有大难临头的风险、焦虑感到不安，对毛泽东时代不无怀念——相关连。

[注]蜀汉网友提供语料说，四川山区三线建设单位的孩子（流行北京方言）中有“敢毛儿保证”——“敢向毛主席保证”的口语变体。见“猫眼看人”2005-3-31“跟贴”<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20061>。

（参考资料：Tina《恩典从此伴随着我》，“中国福音网站”2003年12月2日；邵燕祥《想起了“向毛主席保证”》，《湘声报》2004年10月21日）

## 《东方红》

歌曲名。曲调取自陕北民歌，陕西省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1903—1955）1942年冬作词。原名《移民小调》，有十多段；经公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词作者）等人删削修改成三段，重新定型为现名（作曲家李焕之参与了曲谱的整理、完善）。从黄土高原乡村民歌到政治颂歌，经历了从民间自然的情感抒发到意识形态刻意制作并高度政治化的一个过程。

1949年以后，此歌被收入歌曲集、灌制唱片、编入教材、经常性咏唱、宣传鼓动。1964年，创作了歌、舞、诗三位一体的、以《东方红》为名的音乐舞蹈史诗。该剧集中了当时最权威、最著名的作词家、作曲家和歌唱家，编导组以陈亚丁、周巍峙为首，动用了3000多人的大型阵容，成为崇拜型作品的典范。1965年拍摄成艺术片全国播映，造成了更为广泛、持久的影响；实际上成为以后文革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的先导。文革中，对《东方红》的咏唱、多样化运用，成为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重要形式。广播电台每次节目开播时，都要播送《东方红》乐曲，是播送频率最高的歌曲；“早请示晚汇报”时要唱《东方红》，召开大小会议要唱《东方红》，是群众性演唱最多的歌曲。每当样板戏、电影作品的矛盾冲突达到高潮，总有《东方红》的主旋律出现，隐喻主人公在毛/泽东思想中、从毛/泽东形象里，汲取力量战胜了困难。在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华彩部分，也出现了《国际歌》和《东方红》穿插交错的变奏；成为当时音乐创作中成功化用《东方红》旋律的经典范例。由于《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田

汉被打倒,变成有曲无词,《东方红》遂非正式地作为代国歌使用了近10年。1970年4月2日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就用20009兆周频率播送电磁振荡模拟的《东方红》乐曲,以此作为中国卫星的标志音乐。1990年代中、后期有人曾尝试调侃地改填新词使之俚俗化,以解构、颠覆《东方红》的命意和崇高风格。[注]1990年代末以来,有许多学校(中小学、外语学校)、公司(饭店、鞋业、影视、网络)、网站(教育网、股评网、报业网)、商品(音箱、烟卷、推土机、药品)、注册商标、地名(农村村名)、艺名,都借用东方红的名义,使之世俗化,并赋予了它新时代的复杂含义。

[附:《东方红》源流的另一版本(记者戴晴采集)红军剧社老民间艺人方宪章传授了陕北民歌《芝麻油》(1937):“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诗人安波为了配合国共合作抗战,需要鼓动士气,替它改填了新词《骑白马》(1938):“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的是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我顾不上。”(试比较:“骑白马,挎洋枪,二哥出门找姑娘。姑娘座在绣楼上,呼呀嗨哟!茶饭不思想情郎。呼呀嗨哟!茶饭不思想情郎……”)后来一名小学教师迎合毛/泽东被选定中共领袖的政治需要,为这首歌填了新词《东方红》(1943):“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作为劳模又能唱山歌的李有源,被安排成了此歌作者。此曲后来陆续被人续上大生产的内容或民主联军的内容。作曲家刘炽参与了该曲的加工整理。1990年代被改填的歌词是:“西方白,月亮落,中国出了个邓开拓。他让人们富起来,嗨哟嗨哟,他叫大伙儿各顾各。”

[注]试比较:“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与《东方红》心态有怎么不同?

(参考资料:《红色音乐经典之“东方红”》,“新华网”2005年01月16日)

## 红色

名词作副词。释义同“红( )”。从结构方式看,“红色”不如“红( )”结合紧密,两者的结构关系(偏正结构)却是一样的;从当时的能产性看,构词能力略小一些,如“红色江山”、“红色战线”、“红色专家”、“红色战歌”、“红色摇篮”、“红色堡垒”、“红色保险箱”、“红色接班人”不及“红心”、“红线”、“红旗”、“红花”、“红专”、“红学”、“火红”、“红海洋”、“红太阳”、“红五类”、“红卫兵”、“红小兵”、“红外围”、“红战友”、“红司令”、“红光亮”、“红宝书”、“红头文件”、“又红又专”、“根正苗红”……;从时间维度上看,由于“红色”作为构词词素与被结合词素的缝隙较大,所以弹性也稍大、韧性更强、跨度更大,如“红色中国”、“红色先锋”、“红色警报”、“红色警戒”、“红色名录”、“红色风暴”、“红色文化”、“红色文艺”、“红色经典”、“红色精品”、“红色传说”、“红色主题”、“红色旋律”、“红色网站”、“红色年华”、“红色童年”、“红色青春”、“红色恋人”、“红色天空”、“红色摇滚”、“红色时尚”、“红色系列”、“红色旅游”、“红色土地”、“红色井岗”、“红色安源”、“红色家园”、“红色代码”、“红色资本家”、“红色康乃馨”、“红色冲击波”、“红色通缉令”(胜于“红朝”、“红墙”、“红门”、“红楼”、“红盾”、“红客”、“红网”、“红酒”、“红磨房”、“红土地”、“红帽子”、“红嫁衣”、“红地毯

”、“红孩儿”、“红玫瑰”、“红苹果”、“红樱桃”、“红蜻蜓”、“红鹦鹉”、“夕阳红”）……都是1990-2000年代新生或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

在中国传统文化象征体系里，红意味着平安、吉祥、喜庆、福禄、康寿、尊贵、和谐、团圆、成功、忠诚、勇敢、兴旺、浪漫、性感、热烈、浓郁、委婉；意味着百事顺遂、驱病除灾、逢凶化吉、弃恶扬善……所以它有着很广泛的使用：从朱门红墙到红木箱柜；从孩子的贴身肚兜到以红色调为主题基调的婚礼；从本命年的腰带、佩玉的流苏到寿星的寿服寿桃；从添丁进口时门楣上挂的红布条到孩子满月时做的“满月圆”；从舞龙灯的绣球到锣鼓唢呐的饰物；从深闺女儿的红头绳、香囊到扭秧歌的舞绸；从开张大吉的剪彩到恭贺新禧的贺卡；从铭刻着权力的印泥到记录着功勋的锦旗；从过年过节悬挂的灯笼到家家户户张贴的春联、倒福和窗花，从“压肚腰”的压岁红包到除旧迎新的爆竹；从闻名遐迩的“红、绿、黄”唐三彩到景德镇最负盛名的“祭红”瓷……从语义色彩上看，文革时强调政治性，主要从革命、合法、正义、崇高等意义上使用，潜伏着较多的对抗性、攻击性甚至杀机（非此即彼的政治判断）；而后文革时代有更多商业色彩进入，强调革命、喜庆、生命勃发、时尚等世俗化的修辞性含义。商业文化利用人们的怀旧心理（传统的喜庆和毛泽东时代生活的远距离审美——与遗忘相伴）和对社会现实矛盾、体制的疑虑、不满，通过广告、传媒的制作、煽情，推销另类文化（相对于当下主流文化）和旅游产品之类。不具有排他性，较多的是一种时尚的标榜，更加助长了“红色”作为词语的复兴。崇高化作往事如烟，再难追忆，固然让人惘然，惆怅，却感到重返人间的亲切。

（参考资料：李素君《中国红》，“凯迪社区”“文化散论”）

## 红（ ）

形容词。作为基本词素，造词的能产性极强。如“红旗”、“红线”、“红专”、“红卫兵”、“红色江山”、“红太阳”、“红宝书”、“红海洋”、“红彤彤”、“红五类”、“红色恐怖”、“红光亮”、“红领巾”、“红管家”等。

从物理性质看，它是通过能量来激发观察者的可见光谱中长波末端的颜色，波长大约为630到750毫微米，类似于血液的颜色，是三原色和心理原色之一。其本义指像鲜血、石榴花的色彩，象征生命、光明、吉庆、正义，引申为借喻革命或政治觉悟高。这是中共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就说过：“我喜爱的颜色：红色。”中共武装力量草创时期称“红军”，其政权组织苏维埃称“红色政权”。由于突出政治，红色便成为文革中压倒一切的流行色——从建筑装饰、工艺制品到花纹图饰，无不以红色为时尚。都到了单调的程度。当时的姓名（包括新生儿起名和更名）中以“红”字作基本元素组成的很多：“卫红”、“向红”、“永红”、“继红”、“红梅”、“红军”、“红霞”；以致于重率名较高，带来区别、辨识方面的麻烦。

“红”作为定语修饰名词，在当时通常起定性作用，革命、合法、进步、光明、正义、生命等含义，标明它冠名对象的政治合法性、正义性，如“红卫兵”（“红色政权的卫兵”、“毛主席的卫兵”）、“红色江山”、“红色保险箱”，像是什么驰名

商标、尚方宝剑、质保证书。似乎它真具有什么点金术，连恐怖这样“践踏人类尊严”的东西也能在它的点化下变得理直气壮、美轮美奂（“红色恐怖”）。它也可以作为道德的评语如高尚、纯粹、俭朴等，对中心词起限制、修饰作用，如“红心”、“红专”、“红管家”。作为一种消极修辞手法，它暗示着喜庆、健康、积极向上、欣欣向荣，如“红彤彤”、“红艳艳”、“开门红”、“火红”、“万紫千红”等等。在“色彩/政治倾向”的无意识中，存在一个“感觉—意识—政治性”链接通道。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它的修辞功能，既具有让政治的影响借助于修辞形象的力量夸张、强化它的冲击力，扩张到无远弗届的领域里去的作用，同时又兼具赋予意识形态以形象，通过淡化它过浓的政治色彩，使其转化为润物无声的无意识的作用。

（参考资料：爱伯哈德《中国文化象征词典》，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

## 红小兵

1. 由小学生组成的造反组织。1966 年文革开始，一切既有党政系统、群团组织都被认作是党内走资派所操纵的官僚化御用工具，缺乏革命性，群众自发组建的造反组织才是最彻底的革命派。小学生受大、中学校红卫兵的吸引，仿照他们的做法，绕过少先队（被称作缺乏革命性的“全民队”），组织了红小兵；最早由北京香山路小学发起。

红小兵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主要是附和大中学红卫兵的口号和行动，配合小学教师中的造反组织，批斗学校的领导、教师——被称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执行人。因此他们还不能在文革中扮演有影响的角色；但它仍构成了当时紧张、恶劣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参加红小兵组织也要贯彻所谓“阶级路线”，“出身好”的孩子可以参加，家庭出身“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的都会受到限制。班级单位由“班”而改成了“排”、小组升格为“班”了，原来的班长变成了排长、小组长变成了班长。1967 年 2 月 4 日中共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追认了这一既成事实，“小学可以组织红小兵”。

2. 在小学校中取代少先队的少年儿童组织。1967 年 12 月 22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北京市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的材料。这份材料认定“少先队基本上是一个少年儿童的全民性组织，它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红小兵团是少年儿童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它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作为法定的在小学范围内取代少先队的制度化的群众团体，历时 11 年。

其组织发展比少先队更讲究阶级路线；日常活动内容、形式更加配合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建制以年级为单位组成红小兵连（下设排、班）；标志为印有“红小兵”字样、红底黄字的袖章。

1978 年 10 月 27 日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决议，少年儿童组织仍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名称；撤消了红小兵。在恢复少先队的时候，凡是过去的红小兵，以

及 14 周岁以下的红卫兵，都全部转入少先队。

3. 指参加红小兵造反组织的小学生。其外貌特征同红卫兵。由于智力和行为能力限制，他们热中于一些形式主义的“革命”活动，诸如在公路上到处设关卡，挡住行人，要对方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放行。作为小留学生被外交部派到美国学外语的洪晃，就是红小兵。从思维方式、行为特征到志趣品位，都是红卫兵的翻版。

4. 红卫兵为表示对毛泽东的崇敬、忠诚、追随，以此自称的谦词：“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在自豪、谦卑、恭敬里带着亲昵、撒娇。

5. 由上海愚园路 1136 弄 14 号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一种半月刊《红小兵》。竖排 64 开本，每本仅 16 页，定价为 2 分，发行时间为 1968 年 9 月上旬至 11 月上旬。

(参考资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红旗》杂志评论员《红卫兵赞》，《红旗》杂志 1966 年第 12 期；彭浦《偶得“红小兵”半月刊》，《北京娱乐信报》2004 年 11 月 17 日)

## 红外围

名词。文革初期指因家庭出身属于非红五类（花五类[参见该词条]和极个别黑五类—后来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无法参加红卫兵组织却又和红卫兵成员关系友好的青年学生，及由他们组成的组织。他们被看成红卫兵的外围组织，称之为“红外围”或“红战友”。这一概念，既可指人，也可指组织；但主要是指组织。曾得到周恩来的支持。

他们是正牌红卫兵的附庸，宏观宗旨、具体行动都与之保持一致，完全没有独立性，只是成员身份低一级的附属。有人形容，两者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

血统论因干扰了打倒走资派（革干）的战略部署、很快失势后，红外围也就融入了造反派红卫兵之中。他们与其他非革军、革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一起，就成了最坚定、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他们天然地疏远主张血统论的老红卫兵。经历了最初被排挤在运动外面的失落、孤苦后，他们更加珍惜得之不易的发言权、参与机会，在从众倾向和恐惧感的双重驱使下行动更积极，对自己道德纯洁性的要求更高。他们为了赎罪，为了证明自己革命的彻底性，往往比其他人群更“左”，更激进，对牛鬼蛇神、走资派的批斗下手更狠。因为他们在这样的组织里，到底能够得到比在组织外更多血肉相连的认同、温暖，和实际庇护。

但他们在与红卫兵一起行动时往往只有做事受累的份，不能参加批斗会、抄家等重要活动，较多被安排从事事务性（抄写、张贴大字报一类）、无需抛头露面的辅助工作，没有论功行赏的资格——每当他们要到前台活动时，总觉得理不直、

气不壮，很容易成为对手攻击的软肋。仍受到政治性歧视乃至个人欺负。他们勤勤恳恳地做事，清心寡欲地生活，严厉、苛刻地约束自己，到了近乎自虐的地步；但同时面对更弱者时，有时就会露出虐人的倾向。

（参考资料：遇罗文《我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陈丹燕《亡者遗事》，“左晶论坛”

## 红战友

释义详“红外围”。

词语的理性义虽然一致，使用的语境、情味（感性义）却有不小区别。若要仔细区分起来，同样都是局外人使用，称“红战友”却比“红外围”透着亲切，有种自己人、哥儿们、不见外的感觉，是当面的称呼。而“红外围”就显见得要疏远些，是背着当事人、对第三者时的称谓。似乎可以借此拉开一点什么距离，以免受“红外围”阶级出身不纯、革命成色不足的连累，避避晦气。

因此认真细究品味，这样的称呼里其实已经暗含了歧视的成分——对处于劣势者的宽容、优待、提擢。不过红战友完全没有向红卫兵计较的可能、机会和本钱，只能听之任之。而他们对于歧视的敏感，在无助、无奈的忍耐中，被磨砺得尖锐到了神经质的程度。

这种挫折在内心淤积，日积月累。当它的能量积攒到一个可怕的量度，就会寻找突破、渲泄的方向。如果它选择了自我发散或建设性的方式，可能是一个无害或好的结果，如果它选择了破坏性的方式，就会变得难以预测的危险。

（参考资料：王俭《杂感廿一篇\*外围组织》

## 红海洋

1966年夏季开始席卷全国的，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的大幅墙体涂成红色，寓意“革命化”的环境赤化风潮。这一时尚的功能，是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为神化毛泽东、渲染造反气氛造势。

当时中国的大环境“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第一版，社论《好得很！》）在这种氛围刺激下，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总部要求驻各地的联络站，组织人力物力，迅速展开“红海洋”活动。他们带头在街道的店铺门面、广场上，机关、学校的大门、房屋、院墙墙壁，涂饰红油漆，再用黄油漆写上各种标语（忠于毛泽东的口号；“抓革命，促生产”等）和毛泽东语录，并绘制向日葵、红太阳、毛泽东头像的木刻图案等。

于是这种风潮，立即蔓延到全国各地的企事业单位、居民区和农村的每个角

落。其绘制方式有油漆涂刷、喷枪喷涂。当时的商店、机关、学校、工矿、医院、车站、港口等公众场合的大面积墙体，都被淹没在红色油漆之中。连厕所的外墙也不放过。除了现成的连片墙体外，还设置了大量语录牌、标语牌，置于公路旁、田埂边等地。涂饰红海洋的日日夜夜，人们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不辞辛苦，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始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造成红油漆供售的空前紧俏。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每一个角落，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就会降临了。这与当时人们对红色象征革命的观念，和对象征力量的精神作用的崇拜（“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无知狂迷，和从众行为（怕当群众的尾巴、宁左勿右）有关。

196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所谓“红海洋”的通知》：“……最近城市中有些党政机关部门，借口写毛主席语录，‘美化城市’等等，大搞所谓‘红海洋’，就是用红色的油漆把大门和大片的墙壁涂成红色，甚至强迫群众挨家挨户出钱。……除了‘红海洋’还搞了大牌坊，还有别有用心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想用这个方法使群众没有贴大字报的地方。……不但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是一种抗拒大字报、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劣行为。中央认为，各级领导必须坚决制止这种错误做法。”（转引自江沛著《红卫兵狂飙》P151，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此风遂猝然而止。

继续涂饰的行动虽然停止了，但人们不但没有立即清除红海洋的痕迹，还任其长期保存下来，无意间成为文革高潮的见证。所以它的遗迹仍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城乡，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至今仍依稀可见。

文革后的这一现象，已成为许多描写文革的绘画、影视惯用的那个时代的视觉形象的代用品。这一现象本身，则被有的学者认定为愚昧时代的形式主义，而有的别具现代艺术眼光的学者则将其认定为“红色波普”（大众艺术、通俗艺术、流行艺术）。

（参考资料：江沛《红卫兵狂飙》P151，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李庆霖

（1928-2004）福建莆田人。因上书毛泽东反映知青困境导致政策调整的乡村教师，被称为“中国知青之神”。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

1972年底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揭露地方干部利用职权为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从知青家长的角度沉痛地诉说了父亲的困惑与悲苦，不平、不甘和不安。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973年4月25日）。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

不久被誉为“反潮流英雄”；省委书记韩先楚亲自过问他的落实政策、入党(毛泽东授意)问题。后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在 1973 年第 11 期《红旗》杂志上发表《谈反潮流》的文章。福建造反派头目认为他与中央首长江青等说得上话，故极力结交攀附以壮声势。

1976 年 11 月被隔离审查，1977 年 11 月正式被捕入狱。1979 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崇安县监狱里管理图书室，播放广播、出版墙报。连续两次减刑，1988 年减为 10 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在莆田四中工作的妻子张秀珍受牵连，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虽停止了她的“监督改造”，但没有恢复公职。

1994 年 8 月提前出狱后赋闲在莆田东门凤山街居仁巷 15 号百年老宅中。毛泽东汇给的 300 元，一直存在莆田市工商银行凤山路储蓄所，从未取出；只取过利息。靠县民政局发放的 210 元生活补贴（后有调整提高）度日。生活拮据，老伴住院开刀，是同事、朋友相助才支付了医疗费。晚年患有神经官能症，常常觉得气喘心悸，靠服用安定片入睡。曾多次婉拒记者的采访，白云“一生坦诚，功过任由评说”。

由于这个小人物的一封信，改变了 1700 万知青的生活状况和命运，他被称作“李青天”；当年的知青始终对他心存感念。听说他在劳改农场，就有一些到武夷山风景区旅游的知青买了水果、糕点，步行 10 多里去探望。出狱后时而收到市信访局转交的全国各地知青来信和汇款。2004 年 2 月他辞世时，人们才从得悉消息时发现，他的名字已经永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联系在了一起。

（参考资料：温乐群《“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刘晓航《今日李庆霖有怨无悔》，“华夏知青网”

<http://www.hxzq.net/wangyouwenji/liuxiaoh/101.htm>)

## 革命造反歌

红卫兵歌曲。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文娱委员少华，1966 年 6 月 4 日替同组学生阎恒的快板诗《文化革命干一场》谱曲，以此作为本组织战歌。曲调为队列歌曲中典型的进行曲式节奏，通俗明快，高亢奔放，铿锵有力，富于鼓动性。一旦脱离了既往校园生活模式的束缚，面对革命（文化革命、教育改革、阶级斗争）和未知历史的召唤，他们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憧憬。红卫兵自己作词、作曲，自己演唱，直接源于生活的品格使这首歌格外贴近他们的思想感情，非常传神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被狂热所鼓动的青年学生的精神亢奋状态。

最初的歌词为：“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敢想、敢说、敢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在流行中加工定型、显得更加完整的歌词由三段构成：“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在实际演唱时，通常要在结尾处加上呐喊声：“杀！杀！杀——嘿！”以渲染加强气势。）



同年7月1日在北大附中的海淀区各中等学校红卫兵集会上演出，并从此跨出校门在社会上广为传唱。在传唱过程中被定名为《革命造反歌》，[注]还给配上了肢体语言简单夸张、热烈煽情的街头群舞。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是与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名的最早的学生造反组织，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而名声大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统一在红卫兵名号下。这样纯正的老资格组织背景，也为这首歌的流行增加了过硬筹码。新华社播发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消息时（8月21日），把现场高唱的这首歌与《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并列在一起，有很强暗示性。

此后每当红卫兵走上街头，进行集会，集合，演讲，张贴传单、标语和大字报，抄家、开批斗会时，都要唱这首歌。它成了红卫兵的“国际歌”，成了红卫兵的文化标志。凭着这样的歌声，他们在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战友。

1966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由周恩来安排，该曲以300人合唱队庞大阵容，向中外来宾演出。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该曲录音，并在节目中反复播出，其传播速度更快；甚至飘扬过海，传到了日本和亚非欧美国。一时间，成为造反派组织共同的战歌，是1966年中国流行最广的群众歌曲。甚至被亲切而不无夸张地称为“《国际歌》的儿子”。

安东尼奥尼纪录片《中国》（1972），和文革后姜昆相声《如此照相》、电影《枫》（1980）的配乐（作曲傅庚辰）、谢晋《牧马人》（1982）、贝尼托的奥斯卡获奖影片《末代皇帝》（1987），都选用了该曲作为文革最有代表性的背景音乐。它于是很容易成为对文革进行类型化（简单化、道德化）的方便的反讽象征。

个别流传的版本里词作者署名“彭小蒙”，系误传。网上“孔夫子旧书店”2004年10月曾以5元成交价出售西安市抗大中学红卫兵印制的《革命造反歌》传单（署名“北大附中《红旗》宣传队词曲”）。

[注]另一版本的《造反歌》：老子英雄儿好汉（或：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一作“要是革命你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呼口号）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参考资料：秦晓鹰《历史的错位》，《迷狂的音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P188）

## 红光亮

联合词组的名词。是后文革出现的，试图概括绘画整体风格（带轻蔑、批评色彩）的词语。意指文革时期，尤其是1969年以前的红卫兵绘画，表现主旋律和时代精神的政治要求，在绘画造型语言上表现出来的特征。但是它的隐性影响，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出现了形式语言的探索才真正结束。

“红”是描绘领袖、英雄人物和工农兵群众的形象要强壮健康，红光满面；”

光”是绘画技巧要求写实，逼真，光滑，工整；“亮”是画面必须明朗，充满阳光感，干净、漂亮、鲜艳，用色纯度高，作品的倾向性鲜明，格调高昂，必须突出正面人物和主题的战斗性。这一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描述乐观故事和美好生活，表现歌颂性时代主题、充当政治观念注脚的绘画路子，形成了固定的意识形态模式。文革绘画完全抹煞个人风格，完全割裂、屏弃了西洋、俄罗斯绘画（1950-1960年代的灰调子曾占据了中国学院绘画的主流）的艺术传统；甚至抹煞了绘画样式的规定性特征，无论油画、版画、国画、年画，均需遵循整齐划一的要求，其面貌也单调类同。看上去甚至让人怀疑画作者患有偏色（色弱）色盲症（“道尔顿症”）。

这种追求崇高豪迈、气势磅礴（实则矫揉造作、虚张声势）的视觉趣味、形式语言，表现为夸张的人物造型、舞台化的戏曲亮相组合，题材选择挖空心思地在政治上翻新并往社论语式上靠，主题先行的叙事型文学构图（强调戏剧性），刻意营造所谓宏大（骄矜、硬撑）的史诗氛围，色彩倾向取消典型环境的多样性都偏向火红、响亮一路，笔触运用细碎平滑。其缺乏变化的媚俗模式，与文革的政治狂热、虚假煽情、夸张虚妄是一致的，同时它与建国以来农民画那种通俗朴素、光润、悦目的喜庆感、幸福感、阳光感、小康理想相贯通，即是政治显意识的刻意营造，又是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董希文著名油画《开国大典》（1953）那勾线+立体造型的年画式的在政治化和大众化的夹缝中萌动的时代画风。

其代表作品有文革初期的《东方红》、《毛主席去安源》（刘春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可能创绘画命名长度之最）、《祖国山河一片红》（一些作者成了流星一现的一夜天才），和中晚期的《广阔天地新苗壮》（张绍武）、《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高虹、彭彬、何孔德）、《渔港新医》（陈衍宁）、《女委员》（汤小铭）、《你办事，我放心》（彭彬、靳尚谊）等（其中不少在艺术禀赋上颇有才气、日后另辟蹊径的画家也仍然被限制在当时狭小的语言样式里，显得呆板木讷）。

（参考资料：刘骁纯《作为视觉趣味的红光亮》；易英《从英雄世界到平凡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钱浩梁

（1924- ）浙江绍兴人，艺名浩亮（经江青改名，即以此名世）。京剧表演艺术家、政治活动家。

出身梨园世家，1949 年考入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实验学校，先后得到尚和玉、李少春、盖叫天、刘砚芳等武生名家传授。1958 年毕业留校实验京剧团工作，195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 年调入中国京剧院。1963 年以李玉和 B 角参加京剧《红灯记》创作排演，因 A 角李少春生病顶替出演 1964 年全国京剧汇演。从此暴得大名。由于得到江青关心、支持，文革后成立“红灯记战斗团”起而造反，对昔日师友和剧院、文化部领导反戈一击，不久担任中国京剧院党委副书记（实际的一把手）。发表《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红旗》杂志 1967

年第8期)。1968年参与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创作演出；后来京剧、钢琴伴唱《红灯记》都拍成了彩色电影，在全国公映。

1972年任文化部副部长。投桃报李，每谈样板戏都把功劳归于江青；同时抹杀原创人员的功劳、突出自己。积极、全面贯彻当时主政者的政治文化主张，迎合他们的人事亲疏，被指认参加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活动。经常参加文化、外事方面的国务活动。

因曾被纳入四人帮组阁名单，拟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被称作“上了‘四人帮’贼船的人”；1976年10月后被撤消职务、逮捕审查。国家邮电部邮政总局1976年发出停止出售、使用“钢琴伴唱《红灯记》”等邮票（共5枚）的通知。由于被认定罪责较轻1981年免于起诉；恢复行动自由。其结论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1982年到河北省戏曲学校任教。编写了《戏曲基本造型五十功》的教材，还为学校排演盖派名剧《一箭仇》、《雁荡山》等。1988年7月号《中国戏剧》刊登吴钢《浩亮近况》报道。同年评上副教授职称，与妻子曲素英共同参加中国戏曲学院校友募集教育基金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三天义演，出演《艳阳楼》。从此恢复了登台演出，曾多次赴美国、台湾和大陆各省市等地巡回演出。

1996年在济南演出中突发脑中风，失音并瘫在床上。后治愈坚持练功至恢复登台，参加了原班人马整齐阵容的《红灯记》演出。平常演出多为传统剧目《野猪林》、《连环套》、《战宛城》、《龙凤呈祥》等，结尾仍以《红灯记》选段压轴。2000年代网上影音制品仍有他录制的京剧《红灯记》全本、钢琴伴唱《红灯记》（三碟装）和传统戏曲（《艳阳楼》等）VCD在销售。

（参考资料：胡金兆《“文革宠儿”——浩亮复出记》，阳木编《“文革闯将”封神榜》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和璐璐《共同回忆“红灯记”》钱浩梁：老伴助我重登台》，《北京晨报》2001年05月24日）

## 黑（）

词头。贬义。在名词前起限制、修饰作用；能产性、使用频率均极高，有很强的表情作用、感情色彩，被当作政治定性、道德审判的工具。

1. 从政治角度着眼：反动的、反革命的、敌对的。只要与执政当局，甚至与有利害关系、私怨的基层执行者立场、观点不一致的（哪怕纯粹出与技术原因），被他们判为异己的，都可以说是“黑的”，如“黑帮”、“黑线”、“黑旗”、“黑风”；2. 从道德角度着眼，凡是悖于公认行为规范的（在当时条件下不承认少数派的权利），坏的、邪恶的、卑劣的、腐朽-衰落的、不祥的、狠毒的，都可以说是“黑的”，如“黑老K”、“黑画”、“黑苗子”；3. 从组织程序、合法性角度着眼：个人的（即非组织、非集体的）、私下的（不公开的）、非法的。只要未经执政当局批准、备案的，都可以说是“黑的”，如“黑会”、“黑手”、“黑货”、“黑后台”。

从语义分布看，属于义项1的最多，客观反映了文革语言的政治、暴力性质。

义项 3 是义项 1 的附庸、连带产物，凡属于义项 3 的释义都可以从义项 1 逻辑地推导、派生出来。相对说来，属于义项 2 的则比较少。

这是语言暴力的典型例证。它是糅合了道德判断(杀伤力甚至大于政治判断)的仇恨修辞学。其外延既确定又极其模糊，从现象描述到政治性判断没有清晰边界，可以随意逾越，且性质判定带有借喻性质，虽不是严谨、缜密的判断、陈述，但其后果却又极其严重。政治性借喻的滥用，概念外延的随意扩张，是文革语言的主要特征。使用这类语言，无需任何证据，起决定作用的是附着在说话人政治权力上的话语权。给某人、某物冠以“黑”的定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语言事件，绝非像法制社会里那样无足轻重。它是终审宣判性的，不容反驳、上诉；可以不经任何法定程序核准，就置人于贱民的境地，甚至据此给人以行政的、经济的、人身的直至刑事的惩处。

它首先是专属于阶级敌人的，对已经被排除在人民范围以外的他们，怎么打击、镇压都不为过，何况用一“黑”字。对不合心意的其他中间分子也可以戴上“黑”帽子，作为消极的、负面的描述，只是它可以随时向更坏的方向转化，变成政治性的；不需要任何过渡。其杀伤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与它的这种不确定的确定性——性质的严重性和界限的模糊性、随意性。

这类词具有的扩张力极强，具体表现在外延指称和构词的繁殖能力、孳生的话域三方面。例：黑八论、黑帮、黑材料、黑党、黑党委、黑店、黑风、黑纲领、黑干将、黑高参、黑话、黑画、黑后代、黑后台、黑话、黑会、黑货、黑老 K、黑九类、黑据点、黑路、黑苗子、黑幕、黑牌子、黑旗、黑伞、黑书、黑手、黑司令、黑头目、黑窝、黑五类、黑《修养》、黑线、黑账、黑状。“黑”的所指、能指联结和话语转化功能，皆起源于文革前，但它的杀伤力和大面积滥用，却是在文革中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参考资料：爱伯哈德《中国文化象征词典》，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

## 黑帮

名词。原指由具有越轨倾向的亚文化群体结成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职业犯罪团伙，引申指政治上的反动集团或其成员。文革中指称被打倒的对象，主要是指领导干部和老干部，尤其是单位的一、二把手主要负责人，和他们的上下联系(后来的强调称谓是“走资派”)。

1966 年 5 月批三家村时最早提出“邓拓黑帮”(冠以“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等帽子)。6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控“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号召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第一次在组织系统的政治意义上使用“黑帮”概念。6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牛鬼蛇神”，都叫做“黑帮”。其间蕴涵着运动指导者由此及彼、由点到线、由线

到面的战略步骤。随后在全国掀起了揪斗、打倒黑帮的浪潮。

由于“黑帮”外延模糊，带有团伙性质，最初提出黑帮概念的表面是指政治上表现反动的人，同时也暗示文革针对的是组织化的走资派集体、系统（文革最早被抛出来的黑帮团体是彭、罗、陆、杨和北京市党政宣传系统）。这一提法，起了既宣示运动目标，又麻痹在位官僚警惕性的作用。又由于该概念的模糊性，揪斗、打倒的范围在实际运作中很容易被任意附会，无限蔓延，由此及彼，藤蔓株连，举凡政治主张相同、上下级关系、思想趣味接近、同乡朋友，都可以被网络到“帮”里去“黑”一下。实在找不到整人罪名就给戴个“黑帮”帽子，弄得人人自危，形成了普遍的恐怖。被当权派作为防止文革造反野火蔓延无际的防火沟。概念的设计者和使用、推广者的初衷、利益不一致，在指向和阶段上有错位。

层层揪黑帮，层层领导都抛出一两个下属当替死鬼，丢卒保帅，成了一时奇观。在南京是匡亚明（南京大学校长），在四川是马识途（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张黎群（四川日报总编），在重庆是郑思群（重庆大学校长）……甚至连最普通、微不足道的基层单位，也可以揪一个出习惯舞文弄墨的人来当黑帮。促使人们——从官僚到普通百姓——都在尽力批判别人的积极表现中，开脱、保存自己。这一防护机制到工作组被否定以后，也顷刻失效了。官办由上而下的揪黑帮，因而转向造反派组织民办由下而上的揪黑帮，对走资派的攻击才正式揭开了帷幕。造反派组织民办揪黑帮宣泄了底层淤积多年的干群冲突，其反弹力更足、更大、更疯狂、更持久。

“黑帮”是一个过渡性概念，其作用就是要引导出“走资派”概念。一当后者被提出来，前者虽然还在使用，但它的风头就被后者抢去了。它不如走资派那样贯穿文革的始终。由此可以看出文革的重点所在。

（参考资料：本报记者《把邓拓的黑帮连根拔掉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能够戳穿反党黑帮的画皮，搞掉反党黑线》，《人民日报》1966年5月13日；本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

## 红色江山

喻指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用“红色”修饰“江山”，除了正面含义确认现存政权是从压迫者、剥削者手中夺过来，代表了原来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工农兵和小资产阶级）利益，因此具有情感上的亲近性（认同感）、政治上的合法性和道德上的优越感；还基于一个负面的暗含前提，即，国内失去旧日天堂的被统治阶级不甘心失败，幻想着卷土重来，和国外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随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和变修（“江山变色”）的可能。

“红色江山”概念对假想敌的潜在描述，让人们在资讯贫乏情况下，展开外部世界充满敌意的恐惧想象：地主藏有变天帐，资本家和遗老遗少在引诱干部、青年腐化，羡慕剥削阶级的糜烂生活方式，特务藏有电台，坏分子破坏交通、生产，各种坏人在通过收听敌台建立与帝修反的联系，里应外合，蒋匪帮蜷缩在台湾随时准备反攻大陆，美帝国主义的无人高空侦察机窥视我国防机密……个性萎缩

的老百姓只能认同于、依附于现存执政党和国家，由此获得安全感和归宿感，不但无条件地拥护它，还把它当成自己的家园。

“红色江山”的外延包涵，抽象的有政治性的国家、政府、军队、公检法、工农业经济实体，情感性的家乡山川、人文历史，具体的有大到国家领袖、省市党政领导人，小到单位负责人、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由于高就业、大福利，人们的社会参与热情高涨，由于缺乏比较，人民相信从广播、报纸到政治学习……所有的舆论宣传，对日常生活充满其乐融融的幸福感。长期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更让习惯停留在感性层面的人们对“红色江山”存有温暖的怀念。它又具有政治动员作用。

作为喻象，“红色江山”不但在观念形态上具有召唤属于人民阵营者（自我）同心同德的修辞学、美学功能（崇高），能够汇集起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而且成为一种进行尖锐激烈阶级斗争，对他者（被妖魔化的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等黑五类、黑七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充分理据。在保卫“红色江山”万年长的准战争状态下，即使是超过必要程度的暴力手段也允许，至少是可以谅解的。亲与排（仇）他，是这个词两位一体的两面。

（参考资料：李友秀《红色江山 坚如磐石》，《人民日报》1966.05.24；苏牧《“影片分析”》，北京电影学院精品课程）

## 红色保险箱

名词。喻指绝对有把握不会犯错误的包票。“红色”主要指政治上的，也由此辐射到生存环境的其他方面；“保险箱”本义是特制材料和锁钥构成的防盗防火的铁箱，这里喻指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环境，不会接触危险、感染病菌，就像进了医院的无菌真空舱，或注射了百毒不侵的疫苗获得免疫力终身似的。

在讲究阶级路线的年代，有了一个好的家庭成分（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尤其是军队干部和革干子弟，就被认为感情上、立场上是先天与党和政府一条心的，是“自己人”，过了政治关、感情关，思想纯洁、阶级觉悟高；政治上的保险系数自然提高了许多倍。这是在硬件的组织人事部门政策规定，和软件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上都有一整套制度安排作保障的。不以个人的认识差异为转移，保护的是整整一个阶级。他们不但升学、就业、升迁、分配、福利（从摇篮到墓地）、政治参与上获得了优先权，择偶上获得了优势地位，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也获得了豁免权。在运动准备阶段的排队时不会列入运动对象名单，而永远是依靠的基本队伍和骨干。

哪怕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毛病（如组织纪律涣散，业务能力不强，个性倔强，生活作风浪漫等等），也会被认为无关大局，还是属于各级党团组织的基础力量。即使出了事情，也能冲抵、注销一部分罪责。理由是“好人犯错误”。

文革受运动冲击，党政高级干部被当成走资派批斗，他们的子女也成了狗崽子，受到不公正待遇乃至残暴的虐待。他们当中的个别人被送去当兵，借此在与

世隔绝的军营里避免了种种厄运。称作进了“红色保险箱”。入党提干进入了体制化利益集团的圈子，也是一个进红色保险箱的阶梯。它的保险系数与有效期，与提供保险人的政治权力呈正相关且相始终。讽刺的是该保险箱往往不保险。

偶尔也会被赋予负面含义，接近“红色包袱”的语义，与“自来红”等同。谁在这样的意义上被指称，就说明他被优越的家庭出身所耽误、拖累，成为放弃思想改造、背弃组织的压力，离滑向阶级敌人的阵营不远，变得非常危险了。

(参考资料:《毛泽东思想照红了五湖四海战士的心 “南京路上好八连”党支部组织干部战士活学活用 “老三篇”的体会》，《人民日报》1966年12月3日；肖荻《那年那月：悲忆反右—交心的代价是22年的青春》，《炎黄春秋》2005年4月26日)

## 红色经典

名词。这是一个后文革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文革记忆。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文革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两者在其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同一性。

属于前者的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主演刘庆棠）《白毛女》、现代京剧《红灯记》（主演钱浩亮、刘长瑜）《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后加上《龙江颂》《杜鹃山》[主演杨春霞]《平原作战》《磐石湾》）、交响音乐《沙家浜》（主演童祥苓）、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演奏殷诚中）、钢琴协奏曲《黄河》（同前）。

属于后者的有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柳青）《山乡巨变》（周立波）《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被合称为“三红一创，山青保林”）《上海的早晨》（创作于1950年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年以前），电影《中华儿女》《铁道游击队》《烈火中永生》《红色娘子军》（导演谢晋）《英雄儿女》（创作于文革前）《闪闪的红星》（文革中）《开国大典》《解放战争三部曲—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周恩来》《焦裕禄》（文革后），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保卫黄河》（1949年以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唱支山歌给党听》（文革前）《党啊，亲爱的妈妈》《春天的故事》《我的祖国》《走进新时代》（文革后）。

由于文革十年反复播放样板戏，人们已经养成听唱的习惯，1976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样板戏的选段仍然被照常播放。曾陆续引起巴金等人的批评，遂渐次淡出。1980年代晚期开始有人（崔健）试图以翻唱《南泥湾》等方式，对红色经典进行解构；后来这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创作。这种诉诸感性的颠覆方式（文学方面以王朔为代表）比理性批判的效力更大、更直接。19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在市场冲击下感到惘然的人们和演艺界借助市场运作手段经营两股动力推

动下，出现微弱复兴迹象。从 2002 年到 2004 年的两年间有近 40 部“红色经典”电视剧列入规划批准立项，共约 850 集。2003 年初文学杂志《江南》刊载取材自同名戏剧又加以改写的小说《沙家浜》，引起了一场反对戏说、侮辱红色经典的轩然大波。沙家浜镇、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分别向《江南》杂志社提交了抗议书。包括《芦荡火种》的原作者文牧先生的夫人以及上海沪剧院的党总支书记金女士在内的人士，均对所谓“戏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谴责，文牧夫人则表示保留法律追诉权。

2004 年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禁止戏说红色经典。认定这些改编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低俗化”问题，改编者没有理解乃至歪曲了原著的核心精神、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英雄人物身上编织太多情感纠葛，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肆意扩大原著容量，“稀释”原著，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但也有批评说，“如果红色经典真有什么‘亮点’，它也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渗透和侵犯，来自民间意识在审美形态上依然被顽强地保持并制约所谓革命文艺路线的限制。”“应该让历史来检验，而不是急于禁止。”“‘经典’是被历史所证明的代表着整个人类文化传统的根本的一些文本，……所谓‘红色经典’，连几十年的时间考验也没有过，如果不是出于眼下商业炒作的动机，就被人们遗忘了”。

(参考资料：邱红杰《中国文艺捍卫“红色经典”》，新华网 2004 年 5 月 24 日；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 1950、1960 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 黑材料

名词。贬义。本义既是指记录着某人罪行、错误和污点的文件，又指领导人或其他人暗地以非法手段，恶意地收集或编造别人的不慎言行乃至罪行的记录，可以用来指控和迫害人。广义的说，本人或者别人所写的思想汇报（向党交心）、会议发言、大字报、检查、日记、通信、个人档案等等，都可以成为“黑材料”的构件。档案材料是组织对一个人的“风闻纪事”，是在阶级斗争观念占主导地位时代对一个人表现各方面的记载。它的收录原则是“宁可冤枉，不可放过”。所以量上不断积累起来的材料自身便会发生匪夷所思的质的异化：即使此时此地没有问题的言行，到彼时彼地就可能成了问题——在政治运动频繁、主题多样、政策多变的时候，尤其如此。

在文革中，它最初特指 1966 年 6、7 月向学校派驻工作组时搜集的指定运动对象的材料。感到运动危机的当权派本能地运用收集、整理材料的武器对付潜在的造反对象。毛泽东下令驱逐工作组，这些材料（排队统计表格、大字报抄件、会议记录、简报）被定性为“黑材料”，并要求予以销毁。后来逐渐泛化为统称历次政治运动中，暗中整理的个人或群众组织有关政治、思想、言行、生活等方面的材料，也包括图书馆的历史资料（书籍、报刊）和敌特档案等。



这类材料有本人自述交待被引申、附会、歪曲了的，有屈从于强大压力用无限上纲、凭空捏造等手法，编造出来以求过关自保的假话，有第三者向上级反映的某人有越轨言行（私人信件、私人交谈亦被搜罗其中）、历史污点的材料，有历次政治运动填写的个人履历表格、评定记载，或者是这些材料的规纳整理。这类材料的整理意图本来就多出于领导收益，往往能引起他们的格外重视，但多半由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悬置起来，却又被塞进了档案袋，成为下一次政治运动寻找阶级斗争对象，与新的运动需要、斗争主题对位的根据。这些材料有的来自单位内部，有的来自公安部门。由于官方档案制度的完备，它会跟随当事人终生，因此极具杀伤力、威慑力。政工部门的权力不仅在于其职权定位是专司人事管理的，而且还在于掌握了档案材料。

对文字信息的占有权、处置权，是领导人其他权力的基础、一切权力的关键，而 1966 年以前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级领导人，随其官僚化、脱离群众、滥用权力的程度不同，也不同程度地把档案材料、涉及群众言行的各种文字记录，当作是管制和驯服群众的有效工具。在毛泽东经由中共中央的授权下，受迫害群众要求平反、恢复名誉，而领导人则要捍卫其治理权的神经中枢——对官方文件的垄断权。

在以阶级斗争观点看待、分析一切的年代，黑材料就可以整倒一个人，即使整不倒也足以使他被打入另册，导致当事人不被信任、不被重用。1966 年 10 月这些材料已经成为开展文革的障碍（群众怕运动后期“秋后算帐”而畏首畏尾），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说：“凡是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销毁黑材料的计划，被纳入实现毛泽东打碎既有国家机器、官僚体系的整体目标的一部分。

整理黑材料、打压群众运动的内幕被揭发了出来。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安排各校工作组在各校师生中搞左中右分类排队、整材料。写揭发当权派大字报的师生被排在右边。每五天排一次队，向上汇报一次。大学组下设的联络、情报、宣传、研究等组专门负责搜集（公安厅经手）赴京告状学生动态（组织名称、人员、名单、家庭历史、本人政治面貌、观点）。从 1966 年 6 月到 12 月，公安厅搞了五百多份黑材料，大专院校联络总站（前身就是省文革小组大学组）搞了上千份黑材料和简报，外地学生接待站搞了一百二十多份简报（涉及到 30% 以上的运动参与者）。

围绕黑材料的销毁，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造反组织对官僚不仅有和平的谈判协商（通常在领导人与群众组织代表之间），也包括比较激烈的形式，如请愿、绝食、包围和占领政府办公场所，直至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抢夺和肉搏战。在领导人一方面，面对群众要不到就“抢”的策略，采取了各种各样“藏”的对策。藏的地点，通常是本单位的机要部门、保卫部门，甚至转移到公、检、法、军队机关等具有特殊法律地位的单位。1966 年 12 月“浙江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组织

一千多名造反派在“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策划支持下，以追查省委存放在省军区的黑材料和揪省委书记陈伟达为目标，发生冲击杭州市浙江省军区大院事件。作为当地造反派的跨行业联合行动，二十多天后继发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冲击军区，导致了持续半个月之久的军民对峙危机，震动全国和中央高层核心。

造反派群众夺取了黑材料之后，出于报复或追查到底的心理，又将黑名单之类公布于众，引发新的矛盾冲突（导致后来一烧了之政策的出台）。文革后曾对这类材料进行过清理，或退还本人，或当面销毁。

（参考资料：萧喜东《文革初期的迫害与反迫害（续）：围绕“黑材料”的斗争》，载《中国与世界\*文革研究专辑》2002年增刊第一号）

## 嚎歌

名词。亦名《认罪嚎歌》、《鬼嚎歌》、《牛鬼蛇神队队歌》、《牛鬼蛇神嚎丧歌》；由于没有在官方媒体正式发表，都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口头传播到全国的，各地名称不尽一致。最早有书面材料记载的是1966年8月18日（《李伯钊文集\*日记摘抄》《“改造”日记\*》）。曲作者是周巍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曲作者），他被迫谱写的。有多种版本。根据李伯钊的版本（题为《牛鬼蛇神号丧歌》），标明节拍2/4拍，演唱风格为“哭丧地”。其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王友琴在《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里提供过一个词曲合璧的版本（歌词是北京第四中学学生在1966年8月写的）：

这是文革中被打倒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集中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在监管人员督促、逼迫下唱的。歌声凄厉、惨恻，像是从地狱传出来的。这是他们继被揪斗的戴高帽子、坐飞机、游街等体罚之后，进一步“触及灵魂”的惩罚、折磨。让已经完全丧失反抗能力的人们，屈从强权，违背自己的意志，自己往自己头上泼脏水。就像猫逮耗子，并不把耗子一下子吃掉，而是先要反复戏弄、扑噬一样。人性的残忍、卑劣，尽在于斯！曹禺、新风霞、李伯钊、陈荒煤等人都在他们的回忆文章里，记叙过此事。不少能歌善舞的人，由于不甘忍受屈辱，唱不好《嚎歌》，就被罚出列单独练唱（末代皇帝溥仪亦曾在被罚之列）。因缺少娱乐，贪玩的幼儿当时也把它当成儿歌嬉唱。

1967年初，作曲家马思聪携家逃离中国大陆。同年4月在美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列举了所受到的种种凌辱，其中就包括有强迫“牛鬼”唱《嚎歌》。从此《嚎歌》恶名就传遍了世界，成为文革骇人暴行的代表。

文革研究者何蜀提供过四川省内江市流传的《嚎歌》外省版本（1968年10月）。在街头游行示众的“牛鬼”边敲著破锣，斜抱竹扎纸糊刘少奇模拟人像（上书“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边拖声唱著：“刘少奇，垮了台，儿子儿孙哭哀哀……”用的是四川旧时民间哭丧的调子。

(参考资料：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何蜀《文革年代的“红色歌曲”》)

## 红太阳

专用名。特指毛泽东的转喻。出自陕北民歌手李有源作词、首唱的《东方红》里的著名比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在文革初期（1966年至1968年）[注]达到高潮的个人崇拜中，从李有源的朴素比兴衍化出的“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这一短语（一度甚至夸大到把“我们心中”僭妄地改称“世界人民心中”），成为与毛泽东等价的固定词组，是当时乃至整个文革（1976年后仍有涟漪）的文艺作品——绘画、图案中直观的太阳形象、歌曲中的《东方红》旋律、变奏等、诗歌中的比兴、隐喻——中出现的最多的意象。

太阳是地球光热的供应者，是生命的原动力，泽被万物、君临一切的自然力量。红象征生命、光明、吉庆、革命、正义。把“红”与“太阳”组合在一起，比喻领袖，就赋予了领袖至高无上、超自然神力的品格。这一意象，把作为人间政治领袖的毛泽东神化为先验的、绝对的价值，上天的权威。由此必然地向人们发出了跪拜、祷祝的精神吁求。

而这一跪拜、祷祝姿态，既出于毛泽东的首肯（从“划分两种个人崇拜”到“要有一点个人崇拜”）、林彪等政治领导人的诱导（“要迷信到盲目的程度”；“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制度安排（学毛著、讲用会），也出于信息匮乏状态下无从选择和愚昧的盲从、狂热。从抗战边区的自发歌唱，蜕变为强制性的制度化灌输，作为文革舆论动员的造神运动的组成部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流行歌曲把群众情绪煽动到了热血沸腾、盲从盲动的地步，积蓄了充裕得无从宣泄的心理能量，一举越过常识的理性域界，极大地满足了当时的政治需要。

至今还有一些学校、企业集团、俱乐部、演艺中心借用红太阳的名义，1990年代以后更被商家抢注为各类商品（电视机、酒类、游戏软件、茶饮连锁专卖店、湘菜馆等）商标、大奖赛的冠名。就是充分利用这一著名喻指的知名度，利用了转型期人们心无所属、向后看的迷茫所产生的传播效应。

[附：情人的“红太阳”]

文革中某青年被揪出来批斗并关进牛棚，其罪行是在给女友的情书他说“你是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艳艳的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他竟然把他的女友也称为红太阳——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这个倒霉鬼被揪出来批斗，也就理所当然了。（“凯迪社区”“猫眼看人”2005-2-14 gwb555“跟贴”）

编者按：把政治话语当成情话来使用，难怪被揪斗。这是一方面。可以说那

小子被情爱冲昏了头脑、不识时务（却颇有修辞才能，却选错了时间、地点，不懂得那是与诗意为敌的时代）。但是把情话当成政治话语，不仅是逻辑错误，而且侵犯个人私生活，又是那个时代注定要被唾弃的人性理由。是时代悲剧。这又是事情的另一面。]

[注] 查“人民日报’ 49-97 数据库”的该词分布，1966-1969 年 4 年共有 1856 条记载，为 53 年总数的 75.82%；年均 18.94%，是其他年份的近 40 倍！

（参考资料：陈章翰《“江山如此多娇”诞生始末》，21 世纪新艺术网 <http://www.newart21cn.com/hhsb/hhsb121.htm>；晓理《心中有个红太阳》，<http://unet.cupl.edu.cn/special/show.php?id=14>；《千丝万缕织就“红太阳情结”》，“北方网”2003-12-26）

## 阶级

名词。中国古代的“阶级”一词指官阶薪俸的等级。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中，它是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意指与特定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是社会冲突、对抗的主体。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阶级（政党担负起它的组织任务、是它的自觉形态）是社会变革、进步的主导力量。而在现代社会学中，它是社会分层的结果和基本单元；与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分工相关，是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的基础。与此相关的概念有社会流动、社会控制、社会变迁等。按照列宁的经典定义，这种概念把社会人群划分为阶级“这样一些社会集团，它们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取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阶级能够占有另一个阶级的劳动。”据此中共二大《党纲》（1921 年）规定的“纲领”是“（一）以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至阶级的消灭为止。（二）采无产阶级专政以完成阶级斗争的目的——废除阶级。”在 1949 年建政、1956 年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三大改造后，中共八大本已认定，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经过匈牙利事件和 1957 年反右，1958 年毛泽东提出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它反动派”，另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思想政治上的阶级”“还没有消灭”；把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1959 年 8 月的庐山会议上，他把对彭德怀的批判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在观念逻辑上已经预伏了酿成日后灾难的远因。文革中的运动对象，首当其冲的就是此前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加上新增加的资本家、走资派。敌对阶级的存在，被当作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威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前提，证明需要把狠抓阶级斗争置于社会生活中心、发动经常性政治运动、保持人际紧张，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必要的。而红五类（革命军人、烈士、干部、工人、贫农）则是革命的主力军、运动的骨干力量。他们成为中共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基本依靠对象，其精神（文化、知识）和物质的双重匮乏（短缺）可以在对阶级敌人的劣势生存状态中得到满足、补偿。虽然是虚幻的补偿，毕竟也能使他们的焦虑、紧张得到一种释放、

缓解。作为文革关键词的“阶级”，不但本身具有极强的能产性，能够派生出阶级性、阶级矛盾、阶级觉悟、阶级立场、阶级本质、阶级感情、阶级友爱、阶级路线、阶级调和论等词语，而且处于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理论等概念体系的核心位置[注]。阶级一旦被作为政治运动划分敌我的界线（阶级立场、阶级感情），就成了人与非人的分野，造成了把敌对阶级、群体作为非人对待，造成了跨越人道主义底线的一系列野蛮、暴烈的人间惨剧（河北大兴县和湖南道县对黑五类的灭门事件）。文革后中共出于把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方面转移的战略考虑，放弃了曾经带来巨大灾难的阶级概念，却保留了其建党学说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阶级斗争学说，成为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怪论（1970年代末）。针对这一理论软肋，在利益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社会冲突频仍、恶性事件不断发生之际，2000年代新左派提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及资产阶级是否重新产生”的尖锐问题。

[注]还可以继续构词如下：阶级关系、阶级成分、阶级出身、阶级基础、阶级阵营、阶级观念、阶级观点、阶级意识、阶级分析、阶级教育、阶级兄弟、阶级烙印、阶级社会、阶级联盟、阶级仇恨、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投降主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参考资料：李谷城《中国大陆政治术语》，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米切尔主编《新社会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版；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

## 聂元梓

（1921— ）女，河南滑县人。中共党务工作者、政治活动家。

1934年就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其兄聂真为中共滑县组织创始人之一。受其影响，1937年到太原市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1938年在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并加入中共。1939年到延安学习、工作。1947年调任哈尔滨市委理论处处长。1953年定为行政12级，进入中共高级干部行列。1963年调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第一次婚姻存续了15年，育有3个子女。1965年的第二次婚姻存续期不到一年。

1966年5月25日在《五一六通知》刺激下，与曹轶欧（康生妻子）接触后，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经批准，6月1日向全国广播。赶走工作组后当上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8月18日被安排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毛泽东接见。

11月组织“新北大、新师大（华东师大）联合造反兵团”，煽动揪斗上海市委和华东局领导人常溪萍、曹荻秋、陈丕显。1967年组织“除隐患战斗队”，指控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为“叛徒”，在《新北大》报上连续刊登攻击朱德的文章，印发55万份。签名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的大字报。当选为北京

市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春夏北大拥聂反聂两派大规模武斗，8月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同年11月当选中共第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后，被分到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

1971年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1975年转回北大仪表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被捕入狱。1983年3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4年6月她准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假释，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在北京海淀区亲戚家的一幢楼房单元老旧二居室里独居。曾化名王兰做生意致富，资助家乡建设。1999年起每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取600元生活费。晚年生活简朴，患有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坚持锻炼健身疗病。著有自传《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网上已有部分批载。

（参考资料：江沛《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涂光群，《聂元梓——从造反到炼狱》，见《人生的滋味》，中国工人出版社）

###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名词。简称“可教子女”。文革中对家庭出身不好（多指所谓“黑五类”、“黑九类”）的青年的泛称。政策的贯彻执行。源于毛泽东1968年的指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按照大多数省区规定，这是指196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所划定的阶级敌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等10种人的子女。名义上，“可以教育好”的帽子是肯定他们现实政治表现好，敢于背叛反动家庭和自己的阶级出身，把他们自己和“反动父母”划清了界限，实则是假定他们有原罪（体内流淌着先天赋予的黑血、留有无法改变的阶级烙印、阶级本质），需要特别的、法外施恩的宽大优裕，反倒为其打上了贱民子女的制度标记。

在实际掌握中，任意扩大“可教子女”的范围的，如把家庭是非劳动人民出身的，亲属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归侨或说不清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子女，也都划了进来。还有“查三代”（祖辈、父辈、本人）式的隔代株连，把祖辈甚至更上代的成分定为子女的成分。他们受到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政治待遇，禁止听文件传达，实行变相劳动改造，剥夺参加民兵资格，同工不同酬，招工、招生、入党、提干都被排除在外。经农村基层推荐招工、招生后，发现是“可教子女”的又被退了回去。

虽经多次政策纠偏的敦促，在各种积极分子代表会、招工、招生（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升迁中，都规定应该有一定比例的“可教子女”的代表，仍然无法落实。无法杜绝歧视现象。因为这是巨大人口压力、资源偏紧条件下，实行阶级路线本身的题中应有之意（红五类优先仍是阶级路线的主流；给出路[可能性]是有出路[现实性]才给，没有出路[现实性]就不给）。如果有谁要认真执行对他们的“给出路”政策，谁就要准备承担被对立面指控为右倾的政治风险。

这与其说是“给出路的政策”，不如说是一种诱饵，即，给一点渺茫希望，诱使你为此做遥遥无期的、扭曲自己的努力，处于上不能上、下不愿下的被悬置状态，苦不堪言；有的“黑五类”、“黑九类”子女为了争做“可教子女”，争取一条出路，普遍的是划清界限（参见该条），严重的甚至做出了对父母、对别人伤天害理的事情（实际成为诱使他们向人格上猥琐、道德上卑劣坠落的催化剂）。仍然苦无出路。因为他们一是出路极少，如在教育口能上大学的比例仅为 2%<sup>[注]</sup>，而且还不能是黑类中最黑的，如有点地位的右派、被镇压（枪杀）的反革命分子等等；二是怎样才算政治表现好，敢于背叛反动家庭和自己的阶级出身，并无一定的标准，可以任掌握评审权的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而成为执掌权柄者对他们进行勒索（性的如委身，人格的如不断悔罪、做坐探，经济的如行贿）的合法口实，替前者开辟了一条索取个人好处的捷径。

他们中大多数人比同龄人更老实本分，勤勤恳恳工作，积极参加所有被允许的政治学习，反复为不是自己的过错检讨忏悔，说话做事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以此赎罪、避祸、度日、争取个人出路。对知识的学习，由于他们有家庭养成的环境习惯，有寻找书籍的途径方法，一般也优于同龄人。其中一些意志薄弱者出于对前途悲观，工作、生活消极，放任自流，自暴自弃，早恋成家，甚至被坏人乘机敲诈、强奸、迫害。由于无法通过正当努力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无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招工失败、失恋等重大人生打击后轻生的，并不鲜见。

<sup>[注]</sup>一个统计数字说，1972 年北京 11 所院校所招新生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仅占 0.13%。因为额定的政策指标经常被侵占。

（参考资料：本报评论员《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民日报》1978 年 2 月 18 日；本报讯《坚持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 清华大学推翻迟群等人炮制的那个欺上压下的假报告》，《人民日报》1978 年 10 月 19 日）

## 毛家湾

名词。林彪住处的代名词。位于北京西城区平安里东南、中南海西北、皇城根附近的两条小巷，南巷称前毛家湾，北巷称后毛家湾。两条小巷中间夹着几个大院落，院中有院，院院相连，从外面看只是一堵毫不起眼的普通灰色高墙。东邻解放军总政治部，北邻解放军出版社（平安里 3 号），环境幽静。这里 1953 年以前曾经是高岗的住所。经扩建，1966 年前迁走了东侧院的医院和 60 多户居民，建筑面积达到 1.13 万平方米。仅土建费即达 380 万多元人民币。

前毛家湾一号门是工作人员的宿舍门，三号门是警卫中队驻地门，七号门是

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秘书室办公室；后毛家湾有一道不常开的大门通向林、叶住宅后院，另一道小门通向林办秘书室办公室。林彪住 4 间（1 间卧室、2 间会客室、1 间起居室），叶群住 3 间（1 间卧室、1 间会客室、1 间书房），林豆豆、林立果各住 2 间，此外还有 2 间电影放映室、1 间电视室、3 个图书馆、2 间文物室（藏有 3000 多件国宝级古玩字画）、2 间唱片室、2 间照相暗室、台球室、面积达几百平方米的室内恒温游泳池、能容 12 辆以上专用车的车库等。在毛家湾常驻的除了警卫中队，秘书、贴身警卫、内勤、医生、通信员、管理员、汽车司机、厨师、锅炉工等 20 多人，另外还有临时被借调来帮忙的摄影、写字的、裱糊的、常备咨询的学者，等等。并设有一个党支部。

虽然林彪春、夏两季还另有苏州别墅和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夏季空调恒温）两处住所，但真正长住的还是毛家湾（北京的秋季格外宜人）。林彪喜欢常在园庭里信步散心。

由于林彪在文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位高权重，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成为党章法定继承人，他的住所成为军队系统和中共高层领导人经常拜访、汇报请示的地方，许多事件都与他相联系。因此毛家湾就成了中央高层乃至民间在非正式场合对住宅主人林彪的代名词。被赋予浓重的政治意义。而这里 24 小时全天候戍守、戒备森严的警卫，来车、来人进出都要检验通行证、登记车号、证件号；更使之抹上了神秘色彩。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从这里搜索到的林彪、叶群的题字条幅、笔记、文件、藏书等，被集中、索隐、延伸、阐释、谋划成为批判林彪的材料根据。

1980 年代以后改为中共中央档案馆所在地。因为此地林彪以前高岗住过，高岗倒灶，林彪住上就也不得善终；那宅子特点是其住户虽然开始非常火爆，但后来都没好结果，以后就分给谁谁也不住了。2000 年代有报道（“猫眼看人”liusongluo）说原址“现在有少量办公楼，大部分地皮盖了一幢 6 层的住宅楼（中央单位宿舍），土地利用率高大大提高了”。

（参考资料：文川等编《林彪 1959 年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张云生《近看“文革”中的林彪与毛家湾》

## 殷承宗

（1941- ）出生于厦门鼓浪。中国当代钢琴家。

7 岁学琴，9 岁（1950 年）举行独奏会，12 岁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1959 年以“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无懈可击的技巧”获得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和平友谊节钢琴比赛金质奖，1962 年屈居“莫斯科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大赛”亚军（因中苏关系紧张的政治原因），1965 年殷承宗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到中央乐团担任首席钢琴演奏家。

1968 年完成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创作、公演，被列入“八个样板戏”名录，



成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与中央音乐学院的储望华、盛礼洪、许斐星、刘庄、石叔诚等6人合作，借用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主旋律改编创作（1969年）并演奏（1970年）钢琴协奏曲《黄河》。气势磅礴，感情饱满。据传周恩来听毕惊呼“冼星海复活了”。[注]探索了用钢琴演奏京剧、古曲使之融入时代大众的通俗化道路。当时曾改用名“殷诚忠”，表示归顺依附心意。1971年随中央芭蕾舞团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英、法、意六国，在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演出前加奏《黄河》。成为当时普通百姓心目中的中国钢琴第一人。

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提升为中央乐团党委副书记，又被任命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曾列入四人帮组阁名单，拟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76年10月后被作为“四人帮在中央乐团的代表”，受到四年政治审查。

1983年移居美国，同年秋天在“卡内基音乐厅”首度举行个人钢琴独奏会，随后在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演出。1987年5月殷承宗在伦敦韦格蒙音乐厅举行钢琴演奏会，1990年秋天应前苏联“柴可夫斯基明星协会”邀请参加柴可夫斯基150年诞辰纪念演出。先后与费城管弦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莫斯科爱乐乐团等乐团合作。被西方乐评家称许为“结构严谨，声音纯净，色彩丰富，内涵深厚”。1993年为中央电视台35周年台庆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第四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中国所承办的最高级别国际音乐大赛）于2002年10月在中国厦门举行时，他荣任总评委会主席。

为世界各地灌制近二十多张唱片，包括他参加创作的著名黄河钢琴协奏曲（中国唱片公司1971年同中国中央乐团合作演出的唱片发行了数百万张）。并把中国传统古典乐曲和民间乐曲改编创作成钢琴曲进行演奏，如《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梅花三弄》《平湖秋月》《百鸟朝凤》等。与其妻陶宗舜育有一女。

[注]也有批评认为：“总觉得意犹未尽，大段大段地重复原作的旋律，基本上是整段的照搬，听上去更象组曲，缺乏一个主题的丰富变化和发展。因此作为交响乐还是没有达到一个高度。……结束时出现《东方红》和《国际歌》旋律让人一头雾水，离题太远。《黄河》应该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颂歌，所以觉得不搭界。”

（参考资料：殷承惠《殷承宗：钢琴述说岁月》，《广州日报》2002年9月14日；《革命钢琴家殷承宗的人生四季》，

## 阶级敌人

名词。指阶级斗争中处于敌对关系、敌对状态的人和政治—社会集团。对外它是指帝（美）、修（苏）、反（日蒋），对内是指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黑七类、黑九类。

后者是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这些人被规定为专政对象，成为所有政治运动的靶子。他们是所有基层单位、街道治保工作的重点控制对象，没有自由活动、通信、交往的权利，必须经常向管理者汇报其行动和去向。对他们可以不经

批准就采取隔离、搜查等措施。他们是制度化的被统治阶级、人民公敌。无需审判，他们就被剥夺了选举与被选举，参加早请示、晚汇报，写、贴大字报，佩戴毛泽东像章等政治权利。

只要不属于人民范畴就没有公民地位，没有政治权利就没有法律权利——甚至连属于法律底线的人身、尊严、住宅、通信权利都不受保护，更谈不上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了。所有这些，随时可以以革命（阶级斗争）的名义实施剥夺。

他们是最现成的阶级敌人、阶级斗争对象，最容易获取的猎物。其作用，是证明毛泽东阶级斗争论断的正确性、政治运动的必要性、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性，必须保留庞大的国家机器，以维持阶级斗争的最低限度兴奋和日常进行。他们被舆论工具妖魔化为留恋旧社会、仇恨人民、心狠手辣、阴谋复辟、危险异常的恶魔。对他们不适用人道主义的原则，不管怎样严厉残酷都没有错。无论人们对阶级敌人有无直接经验，都被调动起仇恨前者可以通过施虐于后者，取得心态平衡，转嫁了紧张、烦躁情绪。在对危险的恐惧中，人们只能寻求无产阶级专政的庇护，并转移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物质匮乏的注意力，工作中的所有失误挫折都可以方便地推到“阶级敌人”头上。人类怯懦、侥幸的心理缺陷因此得到了安慰、满足（“至少现在我还是安全的”）：他们一边用攻击戴上阶级敌人帽子者来证明自己划清了界限，保障自己的安全，一边更加无条件认同现存体制，到了不惜践踏理性（比如人道底线）的地步。由于存在组织把人从人民群众划到阶级敌人中去的可能，前者也人人自危，生怕因触怒组织而被划进后者队伍。对后者“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公开训斥，同时也是对前者的暗示警告。通过这一系列运作，有效保障了社会安定。

在日常语言运用中，它不仅是集合概念，还是一个个体概念：个人也可以被称作“阶级敌人”，成了可数名词。如，某某是“阶级敌人”，“有几个阶级敌人”。这种用法导致的严重后果是，让具体的个人（生命个体）承担抽象的阶级的罪恶，使所有攻击者因此获得了最正当的理由，弃绝了罪恶感（尤其是没有个人责任）而无所不用其极。

当“阶级敌人”作中心词时，一系列贬义词被派作该词的固定修饰语，成为对其进行妖魔化的操作手段：“一小撮”、“少数”、“极少数”、“一帮”、“一个”、“国内外”、“本单位”、“共同的”、“各种”、“暗藏”、“深藏”、“隐藏在人民内部的”、“漏网”、“混进党内”、“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反动的”、“恶毒的”、“凶狠的”、“凶恶的”、“险恶”、“怀有刻骨仇恨的”、“死不悔改”、“狡猾的”、“罪大恶极”、“包藏祸心”。当“阶级敌人”被放在主语位置上时，描写它的谓语是：“蠢蠢欲动”、“贼眉鼠眼”、“窥测方向”、“钻空子”、“捣乱”、“破坏”、“下毒”、“进攻”、“暴露”、“和平演变”、“拉拢”、“腐蚀”、“教唆”、“煽动”、“人还在，心不死”、“散布……谬论”、“转移……方向”；当“阶级敌人”作宾语时，支配它的动词是：“认清”、“警惕”、“抓”、“斗争”、“打击”、“镇压”、“清算”、“消灭”；当“阶级敌人”作定语时，跟在它后面的中心词是：“魔爪”、“阴谋”、“狗崽子（黑崽子）”……经过这样的灌输，在小孩子心目中，阶级敌人就和妖魔鬼怪一样邪恶。当他们因害怕黑暗而不敢去某处时，就会推脱说“那里有阶级敌人”。

在后文革时代的意识形态运作中，仍然保留有阶级敌人的概念前置。只是它改换了名词，凡被认定为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恶意为敌的异见者或国内外异己力量、敌对势力，都可以“阶级敌人”视之。

黑五类的子女因株连，也被划入了贱民的行列，不仅向上的社会流动之路给堵死，在利益分配上受到种种歧视，连起码的尊严和基本的生存安全都得不到任何保证。他们虽不是阶级斗争的直接对象，但也是阶级斗争的株连对象和其继续延续、发展的候补队伍。使得人们的欲求紧张，从比他们生活得更差的贱民身上获得某种释放、补偿。

2000年代的口头语言里，还偶尔出现阶级敌人这个词。但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调侃的素材，如称小偷为“阶级敌人”，老师自称怕成为学生的“阶级敌人”，称呼日常生活的麻烦制造者为“阶级敌人”，等等。以此表现说话人的机智、幽默，甚至无奈，已经全无当日的如临大敌和狰狞。

(参考资料：顾光燧《富农亲戚》，转自“新浪城市联盟\*如东论坛”；里巴人南人《贱民阶层》，“猫眼看人”2005年4月20日)

## 黑手

1. 以肢体指代人，以人指代行为，由破坏行为来定义人的政治性质，从而给人下判断。其中又分别两种情况，其一是意指阶级敌人本人、罪大恶极分子，如“这个人民公敌的黑手”；其二是意指本来未直接划入阶级敌人范围的，因破坏行为（多数过失在当时都被指认作有意破坏）而被指认为坏分子、异己分子，如（误写反标的）某人是“破坏文革的黑手”。2. 喻指从属于某条黑线（组织路线）上的人（另一等值的词是“爪牙”），被指控为这一黑线为首（首恶）者的延伸，如“刘少奇黑手控制下的旧美术学院”。3. 喻指情况未明、指代未定的幕后破坏者、主使人，如“工宣队背后有‘黑手’”（蒯大富语；毛泽东回答“黑手就是我”）；与现代汉语的基本语义“比喻暗中进行阴谋活动的人或势力”接近。

这一称谓及其使用，是在阶级斗争观念笼罩下，用你死我活（非我即敌、非此即彼）模式指导认知行为时，给世界、对象命名的一种典型状况。它的指称语义是高度政治化的，“黑”是指称反动的、恶意破坏的、道德上邪恶的、与人民为敌的、阴谋不轨的、命运不祥的，“手”是指称对象（人和他的行为）——即，敌对势力及其蓄意的敌对、破坏行动。是可以致人（集团）于死地的政治宣判式的命名方式。在这里，没有（也不容许有）任何中间状况存在，即使有中间状况也注定被划入敌对状况之中去了。这就是文革认识论的阶级斗争观念、敌情观念。所有温情主义或事务主义地认定中间状况存在的人，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染有这种倾向、思想病毒并且可能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害的危险分子。

在文革的派性斗争盛行时，“抓黑手”是一个出镜率颇高的词。其意指为对立派别是被阶级敌人所利用了。从法理责任上说，被利用者是胁从而非首恶，有从轻的情节（有意卖个破绽：既显示无意得理不让人的高姿态，又引诱被罪者对能够逃脱心存侥幸）；从政治性质上说，被利用者站队站到利用者的敌人一方去

了，又应该被打垮摧毁，无可宽宥。抽象宽容，具体从严。从话语策略上看，用宽容给人定罪，用从严给人治罪，由论（痕）迹到诛心（思想），是一种诱人入彀的陷阱诱捕方法。“黑手”多数是指幕后的走资派，或者有右派、历史反革命等问题的年龄大的长者（被称为“长胡子的人”）。这种揣测不是客观的真实情况的反映，而是为了满足锻炼人罪的需要。

（参考资料：《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68年7月28日）》；《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 红头文件

名词。最初特指中共中央文件；后泛指各级党委、政府等上级机关下发的文件。后者多为指示或通知，因抬头印有套红大字“XX（单位）文件”等字样而得名。文革前，普通老百姓是看不到指导中国政治运作的中央文件的。文革中由于原有政府行政系统在打倒走资派中被摧毁，为了强调政令的权威性，尤其是增加对指控刘少奇、林彪等人的离奇材料的合法性、可信度，只能采取将中央文件一竿子插到底、发至基层的做法。老百姓由此得以窥见政治运作黑箱的冰山一角。红头文件的传达范围本身，根据保密制度，有一定的级别规定；也要经过行政级别逐级下达，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的程序，划清、保持权力的层次级别，以使处于权力圈外的人们对此有足够的敬畏。这种基于利用的虚幻参与感，满足了他们部分好奇心，诱发他们产生盲目的信任感。而这类文件，是不传达给黑五类等被打入另册的人听的。红头文件戏剧性的现身显形，在法律废弛的混乱年代，无意间公开了中共权力意志肆行、缺乏制衡功能的体制病。从此各级政府甚至基层单位为了强调自己行政决定的权威性，也兴起使用套红大字置于文件天头的风气。红头成了权力和权威的象征、保证，在老百姓眼中格外具有庄严感、神秘感。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也要问问那些对自己不利的处理（运动落实政策、调资、分房等等）有没有红头文件做依据？找熟人，托关系，打听红头文件的规定，往往成为老百姓自发争取、维护自身权利的起点。这成为后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一种常见景观。

红头文件制订、传达的政策，往往是行政机关调整各方利益的阶段性规定，是行政机关、首长意志的正式表示，不像成文法律那样具有权威性、稳定性，却比成文法律更管用，因为它是出自各级官员之手。而不同阶段、不同（包括层次、区域的分别）行政部门之间利益、意志的不同，常常导致红头文件之间的互相矛盾。越是利益格局变动、调整急剧，中央权力受到挑战的时候，红头文件的出台越频繁。

1990年代以来，作为计划经济财政支撑的城市公用基础设施等公用产品，要应付市场经济的运转需要，捉襟见肘，各级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各种名目收费，红头文件就成了到处设立关卡的金牌凭证，划地为牢进行资源割据的通行证。争项目、争资金，在双轨制下做官倒，批指标，也要从上级机关弄红头文件做起。部分红头文件已经成为制度化的恶法——企事业单位面临的利益倾轧、挤压下的无序经济、政治环境的一个公害。

1999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除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立法的行政法规外，公民、法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身合法权益，其所依据的“规定”（包括国务院部门、各省市、县乡政府制定的红头文件）不合法，可以在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具体行政行为时，一并提出对其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规定”的复议。虽然这样的法律实施，还不完全具备可操作性，暂时难以兑现，但却已经否定了立法程序以外的政府行政机关意志的天然合法性。清查、审理、废除一些过时和不合理的红头文件，正在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向依法行政、依法治权目标努力的自律行为。

（参考资料：王亦君等《杰出法学家建言法治大计 许章润：法律抵不过文件是法之悲哀》，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5日A2“法治”）

## 毛远新

（1941— ）湖南湘潭人。毛泽东之弟毛泽民的儿子。幼年随父母在新疆蹲过监狱，父亲1943年被盛世才秘密处死。1945年后进延安保育院。颇得伯母江青照拂、相处甚洽。1961年从清华大学转至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初曾下连队在云南空军导弹部队当兵半年，后留校任教员。《毛主席与毛远新的谈话纪要》（1964年）关于培养接班人和教育改革的对话，曾在青年中产生很大影响。

文革期间，组织发起“哈军工红色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派》。历任解放军沈阳步兵学校负责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辽宁省书记、沈阳军区政委（后被称为“东北地区的太上皇”）、毛泽东“联络员”（1975年9月以后）。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曾树立张铁生为“反潮流英雄”（成为反教育回潮的典型），创造批林批孔运动的“哈尔套（公社）经验”（与小靳庄呼应），曾预闻、批准枪毙张志新。任联络员期间与四人帮来往、联系密切，政治倾向一致；向毛泽东反映“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动摇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1976年四五运动时，毛泽东听取他对政治局会议的报告，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作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决定。1976年10月后他被免去党内外职务并被羁押，1983年被判17年有期徒刑。

服刑几年后，剩余刑期转到江西其母朱丹华的住处“监外执行”。1990年首次露面参加姐姐毛远志的葬礼。1993年刑满自由行动，以“李实”的名字（1965年夏天他下乡搞“四清”前毛泽东给他起的）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职务是“办事员”。所长对他来历的公开解释为“李实同志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毕业后一直在空军工作，1989年转业到江西省公安厅工作，考虑到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现在调到上海，来我们所工作。”不久便成为所内技术管理的骨干，负责制订、实施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并顺利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多次评审；几乎年年被大家推选为研究所的先进工作者。1997

年后同事也知道了“李实就是毛远新”。1996年迁入上海市政府分配的新居。其工资从1993年的600元逐渐长到了2001年的1600元。2001年2月他退休，按高级技术职称标准，每月领取1080元的养老金，并享受烈属待遇。

与其妻全秀凤1977年育有一女李莉；因高烧长时间大量使用青链霉素，导致双耳失聪。2000年毕业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聋哑人成人教育大专班。

（参考资料：于福存、王永昌《人民的审判》，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马社香《一个女革命者的历史见证》，《中华文摘》2003年5月号）

## 改名风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女生、高干子女（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为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询问宋的名字，宋回答后，毛说“要武嘛”。〔注1〕这一情节被新华社以新闻稿方式报道。宋彬彬将名字改为“宋要武”，她所在的北京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宋彬彬即以“宋要武”之名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8月24日毛泽东为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写“新北大”的刊名，被《人民日报》誉为“破旧立新的动员令，兴无灭资的号召书”。

于是作为破四旧的一个组成部分，全国都兴起一股声势浩大的改名风，成为一种时尚：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都为自己改了个更革命的名字，如向东、卫彪、立新、志红、永革、兴无等。单位、街道、商店、公社也争相改名：长安街改成了“东方红大街”、外国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改成了“反帝路”，瑞趺祥绸布庄改成了“立新绸布店”，四川饭店改成了“工农食堂”，协和医院改成了“反帝医院”，荣宝斋改成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颐和园改成了“首都人民公园”，天桥剧场改成了“红卫兵剧场”。在上海，《新民晚报》改成了《上海晚报》，大世界游乐场改成了“东方红剧场”，上海江南杂技团改成了“工农兵文工团”，豫园改成了“红园”。而天津劝业场改成了“人民商场”，广州《羊城晚报》改成了《红卫报》，西藏历世达赖居住地罗布村改成了“人民公园”……

改名风针对的首先是有鲜明个性特点、历史传统的名字，其背后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意识形态命名运动。它裹挟着赫赫声势、僭妄的现实性和肤浅的满足感，强烈地暗寓着旧秩序的颠覆和新秩序的建立。“捣毁旧世界，建设新乾坤”的口号此起彼伏。它刺激着年轻人热血沸腾的虚幻想象，成为推搡着他们不知不觉走上越轨之路的强大动力。也因为投入小、产出大，颇具形式感，类似《阿Q正传》里赵秀才和钱洋鬼子去静修庵革“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又显眼，立竿见影，轰轰烈烈。

改名故事里不少悲喜剧：文革名人更名的有浩亮（原名钱浩梁，江青改）、殷诚忠（原名殷承宗）。还有个别人运气不好、改名“学彪”的，1971年林彪出事后那个悔呀（赶紧办手续再改，只要不被人抓小辫子就阿弥陀佛）！但也有名字改了，人们还是习惯用旧名字相称，弄得正式名字和口头称呼脱节。由于时髦的革命字眼贫乏、选择面狭窄，重名者众，一呼数应的情况多有发生。

作为官场时尚，后来包括江青在内的一些党政领导人也纷纷附骥模仿毛泽东的举动，动辄就以替人更名[注 2]来塑造自己的亲民形象，博取公关效果。

[注 1] 毛泽东为之改名的还有：何宝珍(1902-1934，在安源与刘少奇结婚)——何葆真；黄叙钱——黄永胜；许士(仕)友——许世友；苏吊蛋(志愿军战斗英雄)——苏兆丹；袁坑(福建上杭县才溪乡)——发坑；福音医院(福建长汀)——中央红色医院；渡口市——攀枝花市；《芦荡火种》——《沙家浜》。

[注 2] 江青为之改名的有：钱浩梁(《红灯记》男主角扮演者)——浩亮；殷承宗(钢琴协奏曲《黄河》创作、演奏者)——殷诚忠；吴琼花(《红色娘子军》女主角)——吴清华；周福兰——周克周；王淑贤——王树先；于瑞芳——于芳；王孝岐——王灭孔(以上四位均天津郊区小靳庄社员，批孔讲用者)。

(参考资料：秋文《何必改名》，《香港商报》2004年12月05日；蒙泰尼里神父“跟贴”，“猫眼看人”2005年3月27日)

## 红五类

文革用语。先是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后来也泛化到指称他们的子女为红五类。作为家庭成分(政治身份之一)的特定指称，带有彼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复杂的、不易为后世所理解的感性意义。

“红”指这五类家庭成员在现实社会的阶级分层结构上，与执政党、现政权(“红色江山”)的性质是一致的，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确性(“自来红”)，是其阶级基础、主体和依靠对象。[注]因而在种种资源占有、利益分配(升学、招工、晋级调资、分房、医疗等社会流动的机遇和福利)上，他们享有优先权；在政治参与(参军、提干、参选人民代表、从政为官)、接班人的培养(入队、入团、入党、选拔各种积极分子和入选干部后备队名单)上，享有优先权(因为“根正苗红”)；在运动对象的选择、甄别上，享有豁免权。

他们在文革以前就已经实行的阶级路线中便早获得了多数优待，在文革中阶级路线被强调到绝对的情况下得到了更多倚重；与此相对，“黑五类”、“黑七类”及其子女则被公开打入另册，列入专政对象。

这种一边倒的政治情势造就了红五类的优越感。在同龄人中，红五类子女比其他阶级、阶层出身的子女处于更优胜的社会主流地位，不但在正式的公众生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即使在非正式的人际交往里，都拥有更多话语权、更多的交友机会，他们是交友选择的决定者，交友规则(范围、活动类型和内容、趣味、禁忌、处罚)的制订者和游戏的主导者、裁判者，而其他阶级、阶层出身的子女只能是被动适应者和响应者。性情温和的红五类子女对后者都握有合法伤害权，不用说其中性情暴戾、极端者对后者更是动辄打骂、虐待。

这种情况在文革的高潮期、约1966年夏天达到顶点(代表是西城红卫兵纠

察队，甚至私设刑讯、羁押场所)。后来毛泽东为了摧毁第一线党政官僚系统的需要，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对血统论进行了批判，情势渐趋缓解、回落。但它的影响真正消除，是1970年代后期以至于1980年代以后的事情。其后这一称呼不仅逐渐消失，而且由于其他阶级、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角色的巨变，竟至具有了某种“旧时王谢堂前燕”讽刺的含义。

[注]他们宣称：“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接无产阶级的大红旗，老子拿下了这个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一代一代往下传。……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正说明了老一辈的革命传统怎样传给了革命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血统。……”（见北大附中“红旗”战斗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

（参考资料：北大附中“红旗”战斗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载“猫眼看人”2005年3月27日，蒙泰尼里神父“跟贴”；叶永烈《陈伯达传\*三十一 批判血统论》）

## 黑五类

名词。它是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在中共阶级路线的政治版图（敌我友的分类排列、统战谋略）上，他们被排斥在人民概念之外，属于阶级敌人（敌我矛盾）的范围。他们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每有政治运动最先被列入整肃名单的就是他们。

划归黑五类就意味着当事者被取消了基本人权，只能被动接受所有类型的处置而没有申诉的权利。甚至连称呼形式有时都简化到了只以“分子”（黑五类分子、五类分子的简称）称之的地步（有时是侮辱性的轻蔑，有时是善意的为了免于刺激的规避）。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可以是一般性的管制，定期汇报自己的思想、行为有无越轨的记录，接受有理无理的批评、批判，离开驻地需要请示审批（由单位和居住地段的基层组织负责监督实施），迁徙户籍下放农村或边远、艰苦的流放居留地（北大荒），也可以是刑事性的拘押、劳教，完全地丧失行动自由。甚至无须任何形式的宣判，只要当事者单位一纸请求，公安部门就可以直接做出强制性处置。

他们不但不能有正面顶撞、托故间接不服从的行动，连一丝表示委屈的怨言、情绪也不能有。那叫不服从改造，心怀不满、态度不好。会招致更严厉的惩处。人们被教育以“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时，就只能把他们的每个具体的人也当成阶级整体来对待，必须以仇恨视之（甚至越狠越革命、越纯洁），失去了正常（人性）相处的可能性。

黑五类概念的可怕在于其自动延伸性。一旦它与子女挂钩，就使他们也被打入了万劫不复深渊。入队（少先队）、入团（共青团）、入党（共产党），升学（高中、大学）、入伍、招工，考核晋级、调资、分房甚至就医（文革中医院紧张时），



都要贯彻阶级路线。黑五类子女要么被排除享受权利的序列，要么被排在所有人的末尾（结果都一样）。在阶级路线的观念系统里，即使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下一代，没有亲身经历过剥削阶级的日子，其思想倾向、感情方式、世界观上仍然会受家庭的强大影响，被打上阶级的烙印，他们像未出生就被赋予了原罪，血液里就流有黑血一样。连他们自己也为自己的出身感到成了有负于大多数人的罪人。屈辱与不幸注定与无辜蒙冤的他们终生相伴。这种与早年经历血肉相连的记忆创伤，到文革后许多年仍然无法平复。

在不同时间条件下，还另有“黑六类”、“黑七类”、“黑八类”、“黑九类”（分别参见各条）的称谓。但最常见的，是“黑五类”、“黑九类”二种。“黑九类”是1966年红卫兵兴起时，为了便于组织发展净化队伍的需要，在“黑五类”的基础上，又加上资本家、右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四类而成。其规律是，阶级斗争形势越紧张、尖锐，列入被打击的敌人、异类名单越长（最多达到21类，参见“公安六条”）。对敌人、异类名单的细化、网罗无余，与革命纯洁性的提高、革命事业的进步和胜利，被建立了一种虚拟的正相关关系。这种依靠家族株连来建立秩序的方法，把阶级仇恨、歧视、压迫给予制度化、合法化，文革后因其不利于经济建设的社会和解和社会安定而被废止。

1979年轰动一时的话剧《报春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出品、崔德志编剧）中主人公白洁，就是为了给“黑五类狗崽子”翻案而塑造的“时代新人”。其父是历史反革命，母亲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她虽受歧视、污辱和打击，但内心芳香，一贯热爱党，“为人民无声地工作”，“四年干了五年活”、“创造全国奇迹”，是值得歌颂的先进人物。当时的评论说，“白洁形象的塑造，加深了人们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仇恨，增强了人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

文革后有研究者鉴于这一分类名单变动不居的特性，为适应它的不确定性，用了一个生造词“黑类”来涵盖“黑五类”、“黑六类”、“黑七类”、“黑八类”、“黑九类”的不同称谓，以避免名实间的时空错位。其间，既有名实相称相应的理性考量，也包含了对这种荒唐身份定位方法的轻微揶揄。

文革后有人为某些有色食品注册“黑五类”商标（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品的黑芝麻糊），是包含取巧（借用其知名度）因素的一种黑色幽默。亦被批评为“往伤者（人权歧视的受难者）的刀口上撒盐”。

（参考资料：贵州省军区政治部《贵州省军区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体会》，《人民日报》1967年4月12日；黎之彦《塑造站在时代前列的新人形象——评话剧》，《人民日报》1979年11月5日）

## 铁姑娘

名词。用性质坚硬、坚强的“铁”修饰姑娘，是1960年代、1970年代对中国女性去性别化（或称男性化、中性化）行为方式的称誉性评价。对中国传统之于妇女德容工言须“温柔”“贤淑”的弱女子性别规范，是一种颠覆。其语义与中国古

代的穆桂英、花木兰形象相似，指称女性中可堪与男性媲美的豪杰。但却是从毛泽东“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诗意想象中汲取意涵，创造出的专属于那个时代的新的女性象征性符号。潜伏的意识形态 功能为怂恿女性自动献祭、化作工具的诱饵、招贴。妇女作为工业化的人力资源被动员起来加入劳动大军，1970 年代全民所有制企业女工比重达到 28.3%（低于实际的妇女参与劳动率），1980 年代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达到 80%以上（比世界平均水平高 15%），是 1949 年以来重要的社会进步之一。女性作为重要的劳动力资源，被鼓励进入重工业、重体力劳动行业——女飞行员、“三八女子测量队”（“三八女子 XX 队”成为了固定格式的命名方式）、“三八钻井队”、“女子高空带电作业班”、女炼钢炉长、女建筑工、女子架桥班、三八女子搬运班、三八女子掘进班、雷锋女子民兵班、女拖拉机手、女子海洋采殖班……被媒体广为报道，刺激着、塑造着人们的想象。但据研究者调查，女子专业队也多集中在生产建设兵团、石油系统和电业局等大型国有企业和基地，不像人们想象（被媒体渲染所诱导、营造）的那么普遍。实际是计划经济下统一调配劳动力造成某些局部、暂时的性比例失调，以妇女从业方式来缓解。而通过组织女子专业队的方式激励妇女做超出她们体能的重、累、脏、险的活，往往比男女混编更行之有效。

她们中的风流人物是第一代知青邢燕子、侯隽、大寨铁姑娘郭风莲、江水英（《龙江颂》里的女主人公）。梳双辮、留短发，宽肩粗腰，大嗓门，身着蓝色工装（裙子有“小资”嫌疑），皮肤黝黑，结实而强壮，神态活泼开朗；从不在乎自己的容貌，忌讳个人情感，“同志”、“战友”取代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副肩膀两只手，一根扁担两条腿”，在生产劳动中“誓叫大地换新颜”——江青所摄“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女民兵”照片就是典型的铁姑娘形象。任何肯定女性身体性征美（秀发、玉肤、红唇、高乳、长腿）的展示都被斥之为“臭美”，把这些令人砰然心动的人体美许给了狐媚的女特务、资产阶级小姐。应该看到，1949 年以后这一中国社会性别平等的多层次的、分步的历程，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妇女解放，毕竟拓展了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广度，改变了社会对妇女的能力评价，部分触及到“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以及支持这一模式的文化观念系统，争取女性的权利。是女权权利在中国发展、成长的实际道路。但它同时也是用牺牲了女性福利换来的。罔顾固有女性生理特点，忽视对妇女生理特点的劳动保护，造成了许多妇女病的发生、遗留。铁姑娘形象既凝结了中国妇女的辉煌、骄傲，也凝结了中国妇女的伤痛。只是比较起骄傲来，她们愿意淡化伤痛。但是要向更加人性化的解放、自然的解放前进，仍需要抹去伤痛的骄傲。

1980 年代大陆学界对这样的政策取向进行了批判性审理。[注]1990 年代国家劳动人事部明确禁止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作业、森林伐木及流放作业、建筑业脚手架的组装和拆除作业、电力电信行业的高处架线作业、连续负重（每小时负重次数在 6 次以上）每次负重超过 20 公斤等作业。此时女职工已全线退出重体力、井下和野外作业；初步达到国际公认的妇女劳动保护底线。

[注]姜昆曾有相声“赞”曰：“俺队有个铁姑娘，铁手铁脚铁肩膀。拳头一握嘎嘣嘣，走起路来震天响：一拳能把山砸开，一脚能让水倒淌。”

（参考资料：金一虹《文革时期中国妇女的劳动》；艾舒《女人想要多高的地位？——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专家李银河博士》；潘锦棠《经济转轨中的中国女性就业与社会保障》；非非《百年美丽\*1960-1969：美丽标准》，载《新周刊》2001年3月7日；

## 娘子军

名词。隋末李渊的女儿率领的军队号称娘子军，其后用来泛称由女子组成的队伍。

以原琼崖纵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故事为背景，由梁信编剧、谢晋导演，祝希娟、王心刚、陈强主演的电影《红色娘子军》（1960年，天马电影制片厂出品，获首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及同名芭蕾舞剧（1966年），讲述了一个卖身女奴吴琼花从只知个人报仇雪恨，成长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女指导员）的故事。1980年代在琼海市南门街街心为红色娘子军连树立了群雕花岗石塑像，作为红色旅游景点。碑名由已故胡耀帮总书记题写。

随着电影、芭蕾舞剧和插曲（《红色娘子军连连歌》：“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的流行，这个故事融入当时的时代精神，成为了旧社会妇女挣脱被压迫命运、献身求解放事业（赎身—回报 / 性别解放=阶级、社会解放）的象征寓言。

1960年代、1970年代，该词成为一个普遍名词，用于指称改变了传统“男外女内”社会角色，从家庭人转变为社会人，广泛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职业妇女队伍。与1949年以来中国妇女普遍就业、参加生产劳动、进入社会生活（得到西方女权运动、女权主义者们的诸多赞许）的实际相联系，与其前其后中国姑娘在体育锦标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相联系，由于联想、移情的催化作用，它成了充满激情、褒扬色彩的名词。在毛泽东为江青摄影作品题诗的《为女民兵题照》里，“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诗句，更加激发了妇女们对自身性别的自豪感（夸饰而盲目），对自身形象的意气风发的想象。与中共意识形态与战争的亲和性、推许崇高，习惯于用军事形式进行社会动员相关。

在这一公共形象里，女性的性别角色、性别特征被忽略了，性别解放的内容被搁置、遗忘了，简单地等同于社会解放、社会服务，成为了无性、中性的身体。一如她们被藏匿、舍弃的首饰、裙子、高跟鞋，而代之以模式化的蓝色工装、绿色军装。更勿论对女性基于生理特性的必要社会保护。日本人认为中国妇女解放过头了，其批评重点是针对家庭权力结构变化伤害了女性性感特征和夫妻角色的生态平衡；在家庭地位式微的中国男人也都同感。

可与“铁姑娘”互相参见。但它的起源早于铁姑娘，词义弹性大于铁姑娘，女强人的色彩却弱于铁姑娘，所以文革后在日常语言中的存留也比铁姑娘为多。

（参考资料：陈一鸣 黄婷婷《改编40年》；《红色娘子军雕像与红色娘子

军纪念园》)

## 李讷

(1940— ) 江青独生女儿，生于延安；毛泽东最小的女儿。据说“鼻子和眼睛酷似她的母亲”，清秀；但“脸型、额头和嘴却极像她的父亲，她的肤色微黄，像她的父亲”，身材较胖“也像她的父亲”。

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以“肖力”姓名，供职于《解放军报》。1967年1月13日组织“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揭批胡痴（其时任新华社代社长、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宋琼以及杨子才等领导，左右了报社的运动方向。1月17日林彪签署的《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肯定这一行动“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先后担任军报版面组（一说“中央文革记者站”《快报》）组长、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总编辑）。1973年参加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4—1975年先后任中共北京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副书记。

1976年后曾一度赋闲；两周探望一次母亲，1984年母亲保外就医时一度与其同住。1986年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1990年代退休。住北京万寿路四室一厅单元房。有一专用书房，喜读史书。书法学其父、其母。除了参加家族祭奠活动以外，深居简出。江青对李讷处境的尴尬说得很透彻：你是双重身份——既是毛泽东的女儿，又是四人帮江青的女儿。2003年任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曾有报道说她患有严重的肾衰竭和多种疾病，因透析费用昂贵而不克治疗。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遵其父嘱“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第一次婚姻（1970年）嫁给一位徐姓丈夫（中央办公厅北戴河管理处所属内部招待所服务员），毛泽东以一套马列选集相贺。育有一子徐小宁，离异而终；后与王景清（1929年生，陕北神木县人，延安警卫团战士，曾任昆明军区怒江军分区参谋长）结婚（1984年）。其子改名王效芝，由打工而经商。

（参考资料：邢志远《那年奉命寻李讷》；马社香《红色第一家族》，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张聂尔《拥抱生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园丁《“肖力”是怎样走上神坛的？》，《南方周末》1999年2月12日）

## 谭厚兰

(1940—1982) 湖南人，女。青年时做过教师，加入共产党，1965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结识了日后升任《红旗》杂志副总编的林杰。

1966年最先响应聂元梓的举动，在北师大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领导人，后又对准进校的工作组，受到批斗，酿成了“六二〇事件”。工作组被毛泽东下令赶走，她就成了“英雄”和公认的学生领袖；8月底她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任总负责人。

11月在戚本禹、林杰（亦说康生）授意下，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率队200多人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的万人大会，砸毁国务院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发了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在曲阜的二十九天，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刨平孔坟（经陈伯达批准），挖开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共破坏文物6618件），对其曝尸批判。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被专程解押到场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高赞非等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为孔老二送丧”。

1967年在江青授意下，率千余人冲击农业展览馆的大寨展览会，高呼炮打谭震林口号。同年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在全国主要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影响力广泛。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同为“地派”领袖，在院校武斗中起了一定作用。

1968年10月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被调回北师大以清查“五一六”名义隔离审查，即失去自由。1978年4月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因积极交代且患有宫颈癌，1982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其免于起诉，保外就医回到老家湘潭；终于不治。其终身未婚。作为被历史俘获的人质，她只是侥幸做稳了奴才，比被践踏者更有机会造反并释放出内心的恶。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 三分之二

表概数的数词短语。起源于文革前的1960年代，但文革中使用得更频繁，在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更大、更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它总是与“世界上（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还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人民”的固定词组联系在一起，构成修饰关系。其中三分之一是指已经获得解放、生活幸福的中国人民自己，三分之二是指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人民。西方国家（英美德法日）和变修了的苏联和华沙条约国的人民无不生活在苦难之中。因此它是对在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状态的数理描写（统计略数）。话语间不经意流露出中国人民（三分之一）心怀天下，为阶级同胞忧心如焚的悲悯襟怀、救世情结，和无比的幸福感和优越感、自豪感。已经解放的我们，热血沸腾地憧憬着、渴望着去解放、解救他们。是自说自话、“一厢情愿式的‘瞎浪漫’”（王小波语）。其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的前理解，暗合了中国古代一直以为中华天朝是世界中心（中央之国：秦汉统一以前即已代表同血缘同文化的诸华夏民族居住的地域，泛指黄河、淮海流域的大部分）的天下观。它是官方舆论的独家、反复宣传在人们（主要是青少年）心中形成的刻板印

象。

虽然西方国家得到法律保障的最低工资也比中国的最高工资高，这样歪曲事实的描述只能是鸵鸟似的虚妄无知和自欺。形成了国人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一道心理屏障。但确有自我暗示、心理治疗的效用，即，也是对中国实际“一个月只有二十几斤粮食，不到半斤油票，一年到头就那么两身衣服”的匮乏窘困的日常生活自我解嘲、心理补偿——“还有人连咱都不如呐”，让人在备受挫折的物质生活以外生出阿 Q 式的自我宽慰和精神胜利来。从而缓解因物资短缺产生的合法性危机。所以催眠作用以剥夺思维能力可能是它的实用功能。

同时它也像是一种暗示出来的恫吓、诅咒：如果不跟共产党走，斗争地富反坏右，搞社会主义，被复辟了资本主义，你们就会像世界上那三分之二受苦大众一样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堕入阿鼻地狱，苦难深重。是文革催眠术的组成部分。

与“一小撮”等词语相似，它是文革算术学的典型表现（也包含了日后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等国际地理政治学的部分基因）。具有政治、道德、心理多样化功能：一方面，在我/他（世界：水深火热、地狱）之间对比出“我”（中国：幸福、天堂）的优越，带有福音宣示、政治批判色彩；另一方面，“我/他”（自己人）相融又形成一个占绝大多数的“我们”，对比出敌人（帝修反）的势单力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而多数总是和“正义”、“真理”联系在一起的，极少数则是与“邪恶”、“谬误”、“谎言”联系在一起，带有道德评判倾向。与这样的天下观相适应，毛的高昂、慷慨外援到了偏执、不可理喻的地步（自己还饿肚子呐），到小平时代才被猫论（实用主义）取代。

（参考资料：田奇庄《“爱国贼”、“爱国秀”、“爱国牛”》，《围城杂文》2004年5月21日；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 马恩列斯论 XXXX

主谓词组。中共意识形态特有的立论、论证方法和文体。这种方法要求，根据不同时期、不同范畴的不同需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搜寻切合当下实际的论述，把它们编辑排列在一起，加以注释、引申，使之适应（包容、吸取、同化）彼时的现实。以此作为认识现实、判断现实的根据，甚至代替对现实的认识、判断。它的工作成果表现为篇幅从1、2万字到10多、20万字不等的资料汇编。可以发表在报刊上，或形成一本书、一分内部文件。

XXXX 指代的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共产主义社会”、“空想共产主义”、“继续革命”、“巴黎公社”、“德国古典哲学”、“沙皇俄国”、“近代中国”、“历史科学”、“历史人物评价”、“领袖、政党、政权、阶级、群众的关系”、“农民土地问题”、“人民公社”、“宣传工作”、“报刊”、“广播”、“文艺”、“翻译出版”、“思想方法论”、“学习问题”、“军事”、“科学技术”、“人口”、“环境”、“城市”、“人权”、“法律”、“民法”、“税收”、“用人”、“青年运动”、“妇女解放”、“恋爱、婚姻、家庭”、“人性和人道主义”等各种论题。论述主体中常常增加有毛泽东，成为“马恩列斯毛论 XXXX”。编排方法有按年代次序和逻辑关系

组织结构排列两种：后者先按章节梳理，同一章节按重要程度为序；小标题多由马恩列斯毛语录中挑出精要话语拟定。

从现实问题出发，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作家（马恩列斯）著作里，寻求相同、相关、相似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可以是直接的，可以是间接的，可以是系统的，也可以是零碎片断的。但它们一旦被编撰者从原著文本、体系、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纳入到现实框架内，就被赋予了新的逻辑轨范推衍派生出来的意义。这种思维、认识、论证方式和政治游戏规则、组织形式，源自苏俄共产党的社会实践。当它移植到中共手里，就与中国历史上原道、宗经、征圣的传统一拍即合。中国实用理性的认识传统，凡事都要从老祖宗的本本那里寻求支持，才能获得正宗正统的合理性（孝、礼等道统与政统合一）。教义起源越久远就越纯正精微。即使老祖宗没有看到、无法预见的事物道理，也要从老祖宗的书里引申、附会出来，也要改篡原义以与时俱进。[注]如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因此苏共的方法论在中土不但更加发扬光大，而且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当代中国的经史子集。

除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以外，还有中央党校、中央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宣传科研部门，和受委托的单位和专家，从事这项工作。一些顶级政治领袖也网罗了专业人士，为其编写马恩列斯论述各种问题的专题资料应付复杂多样的政治需要。其制度化的设置，从1960年代中苏论战开始，直到现在。

无论常规的宣传工作，还是党内的派别斗争、解放思想的舆论准备，都多以这种资料的编撰作前导。使这种特殊的立论、论证方法和文体既是冠冕堂皇做文章、讲道理的意识形态运作，又不止于此，而常常越出自己的轨道，成为冷血激烈政治斗争（甚至权力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表现形式。坐而论道的静谧书香里，偶有刀光剑影的寒光一闪。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就编过“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作为其设国家主席的理论根据，遭到毛泽东斥责。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33条（由毛泽东点题，列宁语录23条）。成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运动的张本。

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典作家论述作为认识、立论根据，使这种话语方式在政治斗争中，为胜利者赢得了政统和道统双重优势。他们对失败者的清算，就带上了仁慈宽容即意味着背叛的残忍性。文革反修防修的政治氛围，对道统、政统纯洁性的要求超乎以往任何时期，这种话语方式的杀伤力和残忍性，强烈到了知性人类难以理解的烈度。有学者从维护马恩列斯毛科学性角度指出，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对待经典作家也是一种庸俗化的做法。它作为一种方便的检索工具和论据手册，供意识形态职业写作者连篇累牍地使用，成为套话、官话、老话等党八股的渊藪。而在迅速变化的世界面前，这种认识、论证方式就显出了它的笨拙、迟滞，没有调查研究直接实践品格具有的适应能力和弹性，落后于时代变迁。21世纪论述主体的名单又增加到了“马恩列斯毛邓江”，以此编辑了《论唯物论和无神论》、《论法治》、《论民主》、《论党性党风党纪》、《论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注]原道是认定存在一种超越时空的绝对真理，需从老祖宗的经典和圣人的教训中去探询、追踪那绝对的道。经典和圣人之言是通向道的途径。其实是道、

经、圣的互相抬举，互相授勋——从中捞取让老百姓绝对臣服的好处。意识形态是政治权威的无意识催眠。

（参考资料：吴道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出版五十年》，载《2001年出版年鉴》）

## 阴阳头

名词。又称“牛鬼蛇神头”。文革批斗风盛行时一种侮辱人的做法：把人的头发剃一半、留一半，这样的发型，就叫“阴阳头”。一般是剃光左边、留下右边头发；因为黑五类、牛鬼蛇神等坏人都被划归左中右的“右”里面。个别凶悍的行刑者，甚至对眉毛也同样剃一半、留一半。从野蛮时代遗留的民俗里，只有对小偷、妓女、败坏门风的妇女，才采用这样极端的践踏人格尊严的方法代替肉刑对其惩处，留下耻辱的印记。比肉刑加倍惨厉、残忍。

中国古代认为万物都由阴阳两个相反相成的对立面构成，日是阳、月是阴，暑是阳、寒是阴，白是阳、黑是阴；寓示阴阳的太极图就是一个黑白分割的对抱鱼形。剃掉、留下的头发，形成鲜明对比，就像阴阳两极，所以俗称“阴阳头”。《周书·异域传》，说波斯国的刑法“轻罪则劓、劓若髡，或翦半须，及系排于项上，以为耻辱”。曹操割发代首。它到底是源于古代西域的波斯还是中土自产，已汗漫不可稽考。人们知道的是，古希腊大演说家德摩斯梯尼为了苦练成绝世口才，中国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为锐意著作，都曾把自己剪成阴阳头以闭门不出。

被剃阴阳头的人，当时（1966年）有学术权威、老师、走资派、历次运动屡挨批斗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甚至还株连了他们的配偶（一些是无业的街道家庭妇女）和子女（多半是学生）；有男人也有女人。但主要针对平素习惯于精心伺弄发髻的女性（乌发如云已经融进了她们的天生丽质、爱美天性而成为她们的内在自我）——剃成这样的发型，男女性别的外部特征都看不出来了，特别地难看。加害者就是要让受害者以这样的姿态示众，达到施虐、施暴的目的，摧毁受害者的意志和骄矜。成为批斗的重要内容、目的。剃头的人多是临时拿起剪子来的，根本不会剪发，胡剪一气，奇形怪状、深浅不一，更加凌乱丑陋得刺眼。多数人只有忍着，避免刺激加害者寻衅进一步升级；少数人或者把另一半头发也剃掉，或者用帽子、头巾把脑袋遮起来，以此或勇敢、或曲折地维护自己残损的尊严。虽然有旁观者以为剃阴阳头比起毒打来“不重”，但还是有个别人因此自杀或试图自杀。亲历者体验的羞辱感、精神创伤带来的记忆屏蔽，甚至时间过去近40年，仍然强大到足以使她们在有人调查时矢口否认曾经历过那样的屈辱遭遇。

直到2000年代的中国司法理念才终于原则确定，剃人阴阳头，无论出于何种正当理由、由何人施行（即使是执法者）、施于何人（即使是犯罪嫌疑人或服刑者），都将构成污辱罪。因为载入宪法（2004年3月14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修正案）的人权保护认定：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容侵犯。即使是罪犯，也是罪行可以惩罚，尊严不能践踏。完全实现这样的理念、权利，或许还需要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但至少已经可以据此提起抗诉、指控。据说这一发型2000年代前后又成为后现代小子的时髦。闻之令人悲



喜交集，百味莫辨。

(参考资料：王友琴《文革受难者》，2004；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余华文集》；许三观买血记》，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徐公持《社科院文学所古代组“老先生”印象记》叙述余冠英事，载《岁月熔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Aisopos《剃阴阳头》，转自“欧亚学研究”)

## 忆苦饭

名词。在忆苦思甜活动中，模仿旧社会穷人饭食烹制的食物。进行阶级教育的形式之一：这是为了让学生、青年（工人、战士、机关职员等）不忘本，记住父辈在1949年以前遭受的苦难，对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感到满足、怀有感恩思想（叫“不忘阶级苦，不受二茬罪”）而进行的活动。是学校、部队、单位有组织的一种教育性的社会活动。在这样的制度安排面前，所有请假都是不被允许的。

时间一般选择在春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国庆节或学农的农忙劳动时。个别比较积极、激进的单位选择的时间密度可能达到一个或半个月一次（张宁回忆）。有的是由学校或单位烹制，有的是把队伍拉到农村请农民烹制。这种饭食的选料因地制宜，有的是用玉米面、山芋干、山芋粉蒸成窝头，有的是用麸子和玉米面混合后蒸窝头，有的是用烂菜叶、芋头花、南瓜花、萝卜缨或野菜煮米糠、豆腐渣，有的是麸子和白菜帮加些盐做的糊糊。有的组织者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有意不放盐，或用农村喂猪都不吃的树叶、草根、碎稻壳煮。据说越难吃忆苦思甜的效果越好，有的烹制者就怎么难吃怎么做。烹制好以后，窝窝头、粥状或稀薄的糊糊看上去黑不溜秋的。

吃饭以前，往往还要先听忆苦报告。有的是播放像成占武、冷月英、顾阿桃、收租院等内容的录音，有的是请苦大仇深的人现身说法，说旧社会怎么穷，怎么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怎么牛马不如，怎么饥饿难挡。听得人们难过流泪。还要唱忆苦歌，“天上布满星，月亮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吃的时候，班团干部、积极分子要带头示范。无论多苦涩难吃，哪怕就象嚼木头渣子吃猪食一样，人们都得忍着，强撑着往下咽。不能有丝毫的畏难、抱怨、退缩，甚至不能有生理性的反弹、抵触，因为这是考验每个人思想觉悟和阶级感情的关键时刻。带有宗教性的神圣感和强制性。如果抗不住，你平时的表现（学习成绩好、肯吃苦、工作突出）就都白费了。越是吃得顺当，或强忍难受吃完饭，越是能够赢得赞赏。如果还添饭就更好了。但对好吃与否的评价不能明白说出来，因为怎么说都是错：说不好吃（或偷偷扔掉）是没有阶级感情，说好吃是美化旧社会，都要挨批。

至于是否出现不消化或拉肚子，就是自己去克服解决、吃药的问题了。如果真有这种情况发生，也可视为忆苦思甜成效的一部分。更加能让参加者通过生理痛苦体会到过去劳苦大众的生活真实和新旧社会两重天。只是，偶尔也会出现喜

剧性场面：忆苦饭做得不地道，由于制作者心软而在材料选择上没往难吃的方向使劲，让参加者感觉旧社会的日子也不难过嘛。如果没有人提意见，就马马虎虎过去了。如果被人指出，就要引起严重关注，列入总结经验教训的范围，成为下一次整改的内容。

2000 年代的口语里也保留了把难吃的饭称作“忆苦饭”的用法。有报道说美国一些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盛行“忆苦饭”。办法是安排为期 3 天的“要饭”课，面包制作粗糙，分量不足，菜也只有水煮的土豆块加 2 片肥猪肉（美国人普遍不吃肥肉）。老师教育学生说，100 年前美国无家可归者要比今天高出 1 倍，即使今天在美国仍有至少 100 万无家可归，而全世界至少还有 2 亿人靠要饭为生——他们平时吃的饭菜，比你们这顿午餐更差。长达 3 天的“要饭”让孩子们感到不好过：有的反映说乏力、头晕，有的感觉注意力难以集中，有的说“十分想念”家里“丰盛可口”的饭菜。他们举办这样活动的宗旨，主要是为帮助孩子懂得珍惜粮食，学会同情穷人，并或直接或间接地获取国际知识。

（参考资料：王小波《忆苦饭》；钱武立《难忘“六一”忆苦饭》，载《南京晨报》2004 年 6 月 2 日；杰夫《吃忆苦饭的往事》，载“华夏知青”网；《美国孩子流行吃“忆苦饭”》，载“美食频道”）

## 毛主席语录

名词。一种出版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1964 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言论汇编本。最初在军内印发、使用。“语录”文体原是禅宗祖师用俗语白话解说深奥的佛理，侍者及门徒笔录成文；后代宋儒讲学，亦以白话叙述，门人弟子记录师说传世，也沿袭语录名称。

该书是为了适应文化程度不高，无法系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普通官兵和一般读者，方便他们在突出政治运动中，学习、应用毛泽东思想，而编辑的。《解放军报》1961 年 5 月起开始刊登毛泽东语录，1964 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编纂，并请康生审订。

该书把精心筛选的毛泽东各个时期的各式著作、讲话节录，按内容分为系统完备、逻辑缜密的 33 类（1964 年版 30 类、366 条，1965 年版扩展到 33 类、426 条）以利于检索：（1）共产党；（2）阶级与阶级斗争；（3）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4）正确处理人民内矛盾；（5）战争与和平；（6）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7）敢于斗争、敢于胜利；（8）人民战争；（9）人民的军队；（10）党委的领导；（11）群众路线；（12）政治工作；（13）官兵关系；（14）军民关系；（15）三大民主；（16）教育与训练；（17）为人民服务；（18）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19）革命英雄主义；（20）勤俭建国；（21）自力更生，艰苦奋斗；（22）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23）调查研究；（24）纠正错误思想；（25）团结；（26）纪律；（27）批评与自我批评；（28）共产党员；（29）干部；（30）青年；（31）妇女；（32）文化艺术；（33）学习。每条语录后均注明详细出处。共 8.8 万字。

1964 年版有 52 开本纸面平装、64 开本精装加红色塑套两种装帧，1965 年

版起全部为 64 开红色塑套装，以后又出版了 100 开、128 开本（最大的开本达 16 开，最小的仅 156 开）。书前有林彪手书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6 年 12 月 16 日该书重印时《再版前言》的署名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改为林彪（人民出版社和《红旗》杂志另外筹备编制的《毛主席语录》从此作罢），置于 1967 年 1 月版卷首。该《前言》宣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提倡“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学习方法。1966 年起该书向社会在全国公开发行；据统计，仅 1966 年—1970 年间该书就印制、发行了 10.53 亿册。按人均计算，远远超过了人手一册。该书除了有中文版、少数民族语文蒙藏回朝维、哈萨克文版、盲文版，还翻译出版有英、法、俄、德、日等 37 种世界各主要文字版本和英汉对照版。并出版、印制了 20.72 亿张单张毛泽东语录，作为公共场所、居室张贴、装饰之用（见《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上〉P77）。据称，其发行量应为出版史之冠，超过了基督教的《圣经》。

1966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文件，认为中学、小学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应停止使用，以毛主席著作作为中学政治、语文合开的基本教材，初小各年级学生应学习毛主席语录（《关于 1966—1967 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由于有了《语录》，检索、引用都很方便，写文章、讲演、天天读时，针对当下情况选用相宜（对题）的语录代替论证分析，成为持久不衰的时尚。能否背诵更多的语录，能否灵活、准确地引用毛泽东语录，往往被当作衡量一个人政治进步程度、政治学习好坏的重要标准。

在口语中，经常径直简称“语录”；因为使用频率高，也因为只有毛泽东才有无所不在、无往不胜的权威，简称“语录”不会发生歧义，引起交往中的误解。亦称“语录本”、“红宝书”（详该条）、“小红书”。

1979 年 2 月 12 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从此《语录》在书店中消失。

到 1990 年代它已成为市场上出售的“收藏品”。1999 年 11 月 26 日出版的《邮政周报》上刊有《毛主席语录》“市场价目志”，其中 1964 年 5 月（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的 52 开第一版的参考价是 350 元，64 开第一版 140 元；1967 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 64 开俄文版 130 元；1968 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64 开维吾尔文版 80 元；价格最贵的是“反修医院四红联合兵团夺权委员会”1967 年 9 月油印的 64 开本 64 页版，参考价竟达 650 元。

（参考资料：《红宝书出版不为人知的秘密》，转自“怀旧音乐论坛”；中央教

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 金训华

(1949-1969) 出生于上海。上山下乡大潮中涌现的第一个知青英雄。

上海市吴淞第二中学 1968 年高中毕业生，早期红卫兵、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大串联时曾参观、瞻仰了毛泽东故乡韶山，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受到毛泽东的集体接见、检阅。

1969 年 3 月，参加上海市革委下乡上山办公室组成知识青年学习访问队到黑龙江了解情况，回沪发起“知识青年赴黑龙江插队落户联络站”。通过报告会、批判会、座谈会、家庭访问，反复进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16 岁的妹妹金士英也跟随其兄下乡。同年 5 月底插队落户到黑龙江逊克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仅 77 天。辛勤劳动，要求入党，坚持学习，书写日记。日记中写道：“每做一件事，就想想是否符合人民需要；每说一句话，就想想是否符合毛主席思想；每走一步路，就想想是否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8 月 15 日为抢救被洪水冲走堆在河沿的电线杆（报道称为“国家物资”），不幸溺水牺牲。

其时年仅 20 岁。被迫认为中共党员，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并作出“关于学习金训华同志英雄事迹的决定”。当时“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分别发表长篇报道，并刊登了他的日记和评论员文章《革命青年的榜样》，号召全国青年向金训华学习。后来一句著名口号“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就此流传开来。

水粉画《毛主席的红卫兵——向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同志学习》（作者徐纯中、陈逸飞）将英雄置放在滔天的洪水之中，焦点对准他在水中扬臂呼喊的一刹那，充分发挥了用背景烘托人物的技巧，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作为“样板画”之一，刊登在《红旗》1969 年第 12 期附页。被选作中国邮政“文 19”邮票《革命青年的榜样》。其事迹被徐纯中绘制成连环画《金训华》（43 幅，60 开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9 年出版，首印 50 万册），作者署名依当时惯例为“上海市文化系统出版革命组”。

受到他事迹的影响，1970 年-1975 年间，北京、上海、四川、河南知青纷纷要求到英雄战斗过的地方插队落户。当时逊克县仅上海去的知青就达 5400 多人。其中 193 名知识青年担任了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和大队革委会正副主任，168 名知识青年担任了生产队正副队长。

金训华旧墓地在离县城约 100 公里的双河，为了方便人们祭扫，县里和金训华父母商定，1995 年 8 月 15 日将部分遗骨迁入逊克县城西南不远处的烈士陵园。被金训华从洪水中救出的同队知青陈健，30 年不间断地坚持每年到金训华墓地祭扫至少四次。

(参考资料:《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记为抢救国家物资英勇献身的金训华同志的光辉事迹》,1969年10月27日《黑龙江日报》;《金训华同志日记摘抄(1969年7月-8月)》,《红旗》1969年第12期;费凡平《为金训华守墓三十年》,“上海知青网”<http://shzq.net/hljpd/smsn.html>)

## 顾阿桃

(1914—1998)江苏省太仓县人。祖辈是渔民,没读过书没文化。嫁给一位贫苦农民,生育有四儿一女,全家拥挤在一间半草屋内苦度生涯。

1965年林彪夫人叶群到太仓县沙溪镇洪泾大队(1980年代后改称“村”)参加“四清”工作队蹲点,发现她语言俚俗、生动、合韵,诸如“旧社会把我们当棵草,新社会把我们当成宝”,“我是药材店的揩台布,甜酸苦辣都尝过”,“现在我们的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等等。常有即兴发挥,天然妙得。她记忆力强,能背诵许多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到处有人她请到各地传授学习经验。因为不识字,请人画示意图利用“看图说话”被树立成为讲用心得体会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一个新型农民”。

1966年被邀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她曾双手送给毛主席一份她的看图讲用稿。1969年,当上了中共“九大”代表、不脱产的江苏省革委会常委、地区县的领导成员。每次运动都有记者采访她,报上都有她配合政治时事、紧跟中央的表态性发言,作为社会动员的符号、样板。她的例子,被引用来证明“毛泽东思想已经在我国七亿人民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毛泽东思想培育着革命化的新人”。1976年免职回乡,重新务农。

一位目不识丁的农妇被利用、树为“学毛著标兵”的“顾阿桃现象”遭到人们的批评。有副对联讽刺说“顾阿桃指点陈寅恪做学问,甫志高教导许云峰讲气节”,虽然缺乏同情的理解、宽容,却表达了一种对文革“一切被颠倒”现象的引起普遍共鸣的谴责。

从辉煌重归平淡的她,晚年种责任田和自留地挣钱;靠卖冰棍补贴生活。村里还发放每人100多元的养老金。仍被乡亲尊敬地称为“顾妈妈”。

其1960年代学习毛选的事迹、际遇,2000年代被收录进编纂中的地方志太仓名人录。记者报道该新闻时提供的解读是,它说明人们开始“公正、客观地审视历史,也说明政治包容度越来越大”。被戏称为“中国民间俗语大师”。

(参考资料:刘敏华《顾阿桃:不识字的“学毛著标兵”》,载《关东作家》;倪敏毓《60年代名扬全国的政治明星顾阿桃再次被视作名人》;高松《顾阿桃为啥完全变了样?》,《人民日报》1966年9月10日)

## 牺牲

动词。本义是古代为祭祀宰杀的牲畜,如牛羊猪鸡等。后来引申指为了正义(更大的善)的目的舍弃自己的生命,泛指放弃或损害一方的利益。1950年代—1980年代被集中用于赞誉为历史、社会、阶级、革命事业利益捐弃生命的道德评价。所以它总是与“烈士”、“英雄”的称号、头衔相联系,让人联想起红旗和《国际歌》;成为革命的同义词。这是中共意识形态的规范操作。由于得到通

过新闻报道、文艺创作（报告文学、歌舞、诗歌）演出播映进行的崇高赞誉、评价的反复宣传，无条件讴歌这种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献身，它就发展成为一种绝对化的价值标准、人生产理想。《人民日报》曾一度辟有“大海”专栏（得名于该版的通栏标题“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专门刊载奋斗牺牲奉献的烈士通讯。

他们之中不但有王杰、刘英俊、欧阳海、蔡永祥、吕祥壁等军人，还有平民青少年：少年刘文学因逮偷窃蔬菜的地主而被害，赖宁欲扑打山火而被火势吞噬，知青金训华为追回洪水卷走的木材而葬身激流……都是在这种信念推动下塑造成的。它甚至鼓励了漠视生命的轻率意识，在“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逻辑推搡下，被为了“保卫毛主席”、“全球一片红”的虚幻目标鼓动得不在乎任何物质损失，热中于以生命为代价献祭。他们的事迹广为传扬，其战友、父母兄弟被请去宣讲他们的生平琐事，享受他们的荣光，子女亲人受到种种优裕宽待。成了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军人职业成了当年年轻人青睐的热门，除就业保障、物质待遇、社会声望以外，还因为与战争、献身的想象相联系。

被献身激情诱发出道德优越感的红卫兵，举起鞭子向“社会公敌”黑五类挥去时，没有人性悲悯、迟疑，有的是嗜血的快意和生不逢时缺憾的补偿、满足。两派武斗时更加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教义而热血沸腾，因崇信而壮烈；怀着“心往忠字上想，血往忠字上流！”的盲目激情，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唱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语录谱曲）的战歌，慷慨激昂，视死如归。成为群体性越轨的一个审美助力。

有的投机者竟借机行事。1954年2月22日《新湖南报》发表“新宁永兴乡民兵队长周光宜奋不顾身抢救山林火灾光荣牺牲”并配短评，就是出于武冈师范学校的学生夏贤春的编造。报社在政治正确的误区里觉得稿子“叙述感人，便仓卒刊了出来”，被批评为对真实性重视不够和调查制度不严格。后来一些单位在事故发生时为了掩盖过失责任，丧事当成喜事办，用塑造英雄牺牲的方法化不利为光荣。

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观念的冲击，使社会整体目标、理想的神圣性淡出，个人利益和个体生命的权重在加大。牺牲一词虽然还为官方意识形态所倚重，但已悄然退出流行行列；渐渐地被理性世俗化。有论者指出“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而“放弃或损害一方的利益”的语义、用法，也从新露头：“休息时间”、“家庭”、“健康”、“幸福”、“局部利益”、“土地征用”、“个人”、“秀发”、“形象”、“机会”这些革命时代被当作小小不言的微末事物，也与牺牲这样的宏伟叙事联系到一起了。当控诉文革剥夺、碾碎无辜者的宝贵生命时，恢复了牺牲一词的古义——“为祭祀宰杀”的生命。一定程度上仅仅成了“死”的借词、委婉语。

（参考资料：蜀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走共同富裕道路——七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日报》1991年12月16日；星星《拷问牺牲》，《随笔》2005年第1期）

## 划清界限

动宾词组。意谓与某种思想观念或事物保持距离，分清是非。类似中国古代

的“割袍断义”、“划案而坐”。萧乾把它叫做“革命术语”。因为在中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里，无论是与思想、主张，还是与人事划清界限，其前提都是由于存在不同的阶级；有阶级就有截然分明、对立的阶级利益、阶级立场——不是我们就是他们。这是带根本性、决定一切的大是大非。在这种观念看来，虽然由于地域（同乡）、亲缘（父子姑舅）、师生、同学、同事、朋友、经历等原因，由于思想的抽象性、关联性造成某些边界模糊，但是仍然掩盖不住阶级矛盾、斗争的内在本质。

所以站稳立场，从思想、认识、感情、行为上划清界限，就是组织对于参与者要求无条件忠诚、拥有战斗力的基本保证。划清界限是站稳立场的必要、前提条件。它既是意识形态的逻辑结果，又含有实际的组织功能。既是对所有人“道德净化”的普遍要求，更是对家庭出身有问题者的绝对命令。对他们来说，这是世界观改造的入门主课。连赵朴初《关于中国佛教协会发起经过和筹备工作的报告》也提醒佛教徒：“在思想上行动上继续划清敌我界限，清除混入教内的少数反动分子，特别是受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所指使的间谍特务以及假托佛教徒企图隐藏的反动会道门分子。”

从遗留的语言材料来看，该词使用频率出现的第一个高潮是三反五反，第二个高潮是揭批胡风，第三个高潮是反右，第四个高潮是文革。如果说前三次更多是要求当事者对外与地富、资本家、反革命、右派划清界限，后一次就主要是要求当事者对内——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庭下手。走了一个从改造世界到改造自我（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从扫除外围到消灭社会细胞（家庭）攻坚战的圆圈。

1966年4月29日在北京市东安门大街友谊商店，砍伤出席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第四次全体会议马里代表团团长巴卡里·特拉奥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马罗夫人的“反革命杀人犯”杨国庆（被处死刑），被判决书公告认定“不是同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却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对政府、对人民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是“为了实现他反革命报复的目的”。更为划清界限运动火上浇油。

当是时也，组织会大会小会地专题帮助，派人找他们谈心，忆苦思甜对其进行教育（和风细雨），要求他们相信组织（包括认识能力、处置公正得当），交出私人信件，详细汇报提供情况，交代社会关系，揭发罪行，一次又一次地从思想根源上重新清理、认识、忏悔过去的经历和生活细节、意识；不接受父母的金钱腐蚀，拒绝高档服饰、饮食，疏远自己的家人，断绝与家庭的日常来往，连父母生病或经济上窘困而可以照顾、资助的也绝不施以援手，生怕影响自己进步。有的被推上陪斗台，剃阴阳头，游街，打骂，监禁，遣返农村，触及身体（狂风暴雨），被迫或主动公开声明脱离父子母女关系以示决绝、清白，摆脱株连祸因，惟恐危及自身安全，急匆匆丢弃、烧毁以前的照片、书信、记录，甚至从心里抹去过去的记忆……

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彻底，完全认同于现存秩序，求得被现存秩序所接纳的正果，他们往往比被要求的做的更多、走得更远。夫妻、父子互相揭发、批判、批斗，有的是面对面的斥责、诅骂，有的还贴大字报。在单位、社会的批斗屈辱以外，又见弃于家庭，有的人就在划清界限的压力下深感绝望自杀。用对血缘、家族的背叛去讨好组织，完成亲社会行为，使当事人在德性上堕落为一个背德者、可耻的人、良心上的罪人。严重的心理障碍使他不得不无餍足地依附于组织，而不论它怎样苛求、虐待。因为这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亲情之根。只能像被强奸者依恋她的仇人——强奸者一样。而当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有内疚负罪感产生，乃至

鄙视自己时，只能更加依附于组织，从那里寻找类似亲情的代偿品、归属感。

1990年代以降，划清界限一词被视为侵犯人类尊严、践踏亲情的野蛮行径，渐渐被逐出日常语言，由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向真假的是非问题、技术性事务问题转移。[注]类似行为被认作“人格低下”、“出卖亲友”、“打小报告”，当成笑料，为人不齿。词义感情色彩也含有了贬义或调侃的喜剧意味（如“为了身材和零食划清界限！”“爱情也要划清界限”“《刺虎》与‘戏说’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因资讯发达，使处于边缘、边界模糊、被忽略的事物凸显出来，受到极大人们关注，区分清楚（罪与非罪）或打破其界限（城乡结合部豪华别墅的建设），又成了重大的认识课题和开发主题。

[注]文革后此类观念仍有延续。鲁迅长孙周令飞留学日本时，与台商之女相恋、结婚，因需赴台居住，声明由于私人原因退出中共（1982年）。其父海婴被领导（吴冷西）强令公布断绝父子关系以示划清界限。编者朋友1989年并未参与街头活动，但仍被认定属思想同情，怒而抗议，遂抓住态度不好，责其认错。不理。有人劝曰你这样会连累孩子的（政审时的档案记录）。故即屈服。

（参考资料：新华社《最高人民法院宣判反革命分子杀伤外国朋友案件 枪决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罪犯杨国庆》，《人民日报》1966年6月14日；资中筠《钢琴与政治》，载《记忆1》，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资中筠《残缺的追忆》，《随笔》2005年第1、2期；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

## 浩然

（1932— ）河北（天津）宝坻人。本名梁金广。曾用笔名白雪、盘山。农民出身的当代作家。

在土改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进识字班，边学文化边写稿；自修完大学课程。1954年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喜鹊登枝》，1962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随后又推出了同书的第二部、第三部（1965）。

文革初期，被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推举为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老舍沉湖前一天被红卫兵揪斗，他借口说老舍是“现行反革命”需送派出所，意图保护老舍。成立红卫兵组织，保护本单位作家，不让外单位组织来抄家、批斗。文革中，陷入派性斗争；对小说家端木蕻良、骆宾基、草明、剧作家杜印等老作家看不顺眼，认为他们有问题，对其进行了批斗。老觉得只有他自己根红苗正，唯我独革。仍坚持写作《金光大道》一部（1972）、二部（1975）、三部（1976）、四部（1977）（韦君宜评论说“能编得比较像个故事”，“架子是由编辑帮他搭的”）……他创作的过程，也是当时意识形态干预、渗透的过程。但是浩然对此并不反感，而是积极顺应的，采取的是亲和的立场，抱的是顺从、内化的态度。

小说《艳阳天》及他的写作才能受到江青多次肯定，并在文艺极度萧条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1973年出品，导演林农，主演张连文、郭振清、张明子、马精武）。在天桥剧场、钓鱼台、大寨、人民大会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见。1972年奉命写作出版了表现西沙自卫反击战的中篇诗体小说《西沙儿女》上下篇和《百花川》。参加了中共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人



大。1976年9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常以“文学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义参加外事接待、见诸报端，曾出访日本。

粉碎“四人帮”以后，受到清查，被解除了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职务。结论为“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还是有人肯定他“没有借此踹别人”，“还能把握住自己”，“是个好人”。他在感情上不能接受文革是“浩劫”的论定，“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反思”。茅盾遂以“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称之。

1977年离开北京下了乡。1980年代以来曾出版了长篇小说《山水情》（又名《男婚女嫁》）、《晚霞在燃烧》、《乡俗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和十五部中篇小说，1985年出版了三卷本《浩然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有作品上千万字。曾任北京作协主席、《北京文学》主编。有人评论“《苍生》还是有思想局限，对改革开放理解不是很透，对合作化留恋得太多”。被认为“擅长刻画安分守己、吃苦耐劳的农民”，“作品充满民间文化的泥土气息”。“说他有罪说不上；说他无罪但确实说了假话、获了利”。

1998年秋答记者问时，谈到准备写自传，要“说清楚”自己“不是蠹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其中对昔日辉煌的留念（小说发行350万册），对《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肯定性评价（称“真实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引起了广泛的批评。2000年出版《浩然口述自传》（华艺出版社）。

（参考资料：祖丁远《浩然近事》，《人间》1987年12期，重庆出版社；陈徒手《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人有病 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 语录操

名词。“毛主席语录操”的简称。约在1967年初夏开始全国流行，持续了大约3、4年时间。创作者为北京体育学院（时称“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师生；同时还创编了《毛主席语录拳》、《毛主席诗词拳》。同年10月21日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参观北京体院时，就观看了集体体操《毛主席语录操》。

它是跟着语录歌的旋律、节奏，进行跳跃、表演的一种体操。并不是什么广播体操，只是动作极象广播体操，其动作仿佛哑语。是观念图解和模式化动作的混合杂糅。简单易学，便于普及。创编过程进行了3次大改，在十多个单位试行并征求意见。

有人曾描述过其中的一些段落：双手先向外翻掌推出，然后向胸前收拢作捞公物状，这是“贪污”；将收拢的手向后平伸，依波浪式弧线上下抖动作撒东西状，这是“浪费”；最后弯腰90度并将一双手向后掀起呈“喷气式”，表示该人在挨斗，这是“极大的犯罪”。这些动作连贯起来就是一段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猜谜。当然，这几个动作也能起到治理“中焦”，活动腰背的作用。“语录操”还有转体动作，跳跃动作，共18节，以上仅举其中3节。其他常见的动作有“表忠心”、“高瞻远瞩”、“放眼世界”等，糅进了部分军事动作和中国拳术，动作幅度大而伸展、夸张、雄壮。

“语录操”曾在报纸上刊登过连续动作图解，伴奏音乐通过广播电台播送过，学者以百、千、万计。在学校里课间操改为语录操，工厂、商店用作工间操。[注]

当时的报道称“语录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做一次操，就是上一堂生动的毛泽东思想课”。体操设计时是要把向毛泽东表示崇敬、礼拜的内心意向形式化、身体化。其功能，是通过定时进行的群众性活动，让做体操者在完成这样仪式、身体动作的过程中，使崇拜观念内化、锚入人的性格结构。形式、功能皆类似宗教礼神。

[注]也有人认为，文革时政权的无政府混乱状态，不可能出现有组织的课间操、工间操。

(参考资料：新华社《周总理邀请达达赫总统等贵宾出席文艺晚会 毛里塔尼亚代表团参观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受到热烈欢迎》，《人民日报》1967年10月22日；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福州兰叶《我是根本不相信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好人》[www.cbttta.org.uk/BBS/messages/1939.html](http://www.cbttta.org.uk/BBS/messages/1939.html) 10K 2004-9-23；“猫眼看人”)

## 忠字舞

是一种用于广场（大场地）或游行的队列行进间的歌颂性群众舞蹈。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长江滚滚向东方”）和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流行于文革高潮期，时间约在1966—1968年间；九大以后渐趋衰微。其功能、形式特征与“语录操”相似（可互为参见）。也有用作早请示晚汇报时的祝祷仪式的，据说是一日三次。

其舞蹈语汇是从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照搬过来（有人认为源自内蒙古的“安代舞”[注]），又为了通俗易懂而给予简化了的。舞蹈动作粗放、简单、夸张，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主要动作有，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主席，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如，“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舞者双手按着自己胸部，“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舞者两手放到腮帮，仰头望，手指呈放射状地一闪一闪；“千万颗一颗红心”——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并，画成一个心的形状比在胸前；“要献给您”——舞者单腿的脚尖跳跃着，另一条腿不断后踢，双手把那一个心形向右上方一下、一下地送上去。

跳舞时手里还要挥动语录本（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它的动作有点像广播体操，多僵直的、生硬的、对机械的物理位移的模拟。舞蹈者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荡，但由于舞蹈粗糙、僵硬、稚拙，却又让人产生滑稽的感觉。专业人士和一般民众多批评说没有美感，但有人说舞蹈姿势优美者可与后来劲舞媲美。无意间给革命时代的娱乐匮乏提供了某种补偿。

游行时的忠字舞方阵动辄成百上千人，前后相连可达上万人、队伍逶迤数里，同时载歌载舞前进，有时竟持续十多里路、好几个小时。跳一会儿，步行休息一会儿，交替行进。其场面、规模之庞大，气势之磅礴，真是史无前例地恢宏无比、狂热亢奋。举行“早请示、晚汇报”仪式和庆祝性的游行时，都要表演这样的舞蹈，有点类似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老年健身舞。无需特别舞蹈基本功和专门训练，易学易会，男女老少都可以完成，而且必须参加（牛鬼蛇神、黑五类除外）。因为是政治任务。据说在沈阳火车站，曾发生过不会跳“忠字舞”者被阻拦上火车的事。

湖南诗人胡遐之曾以古风为之写照：“忠字舞，手应锣，脚应鼓；一声号令为军伍。忠字舞，心应鼓，口应锣；舞时更唱语录歌。忠字舞，狂且野，飙轮火被金光射；忠字舞，野且狂，舞兴浓处昼夜忘。左旋右转无己时，男女老少俱难辞。爹娘仆地儿孙赞，忠于领袖有何碍。曲终舞罢祝无疆，更有林总永健康！”（《文革杂咏》四十五首，载《荒唐居集》岳麓书社出版 2002 年版）1976 年、1980 年代后被批评为林彪搞偶像崇拜、造神运动的形式主义，荒诞愚昧。甚至与吃了摇头丸疯狂摇头联系在一起。有人把它称作“当代民俗”，遭到漠视文化专制戕害人们身心的批评。

文革后的反思阶段曾被批判为阳奉阴违的“形式主义”、“造神”的“封建流毒”。2000 年代有人为了吸引顾客在餐饮业搞“忠字舞”表演（安徽马鞍山等地），引得个别观众也上台同舞。受到批评（是“历史的倒退”）和工商部门（理由是借猎奇心理炒作“不良文化”牟利）的查处（停业并重新登记）。

[注]据考，唐玄宗李隆基编导过忠字舞《圣寿乐》：宫女们着五彩衣裙舞姿婀娜，边唱边舞，祝颂皇帝万岁万万岁，并躺身于地，组成“万岁”二字图案。龙颜大悦。有《花蕊宫词》：“舞头皆作画罗衣，唱得新翻御制词。每日内廷闻教队，乐声飞上到龙樨。”

（参考资料：《舞蹈——八亿人民共跳“忠字舞”》，《中国青年》“过去百年大回眸”；肖利民《忠字舞》，《陕西工人报》2004 年 7 月 9 日；《跳忠字舞的柴火酒家暂停营业》“人民网”6 月 13 日）

## 汪曾祺

（1920—1997）江苏高邮人。1939 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写作课教师沈从文影响。1943 年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46 年发表《复仇》、《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1950 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编辑《北京文艺》、《民间文学》等刊物。1958 年被补划为右派，1960 年摘掉帽子。1962 年调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

1963 年参加把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京剧《沙家浜》（与杨毓珉、萧甲、薛恩厚合作）。得到江青赏识，调看其档案后指示“控制使用”。文革初期受冲击，1968 年从牛棚解放出来，继续参加样板戏创作。1970 年第 6 期《红旗》发表《沙家浜》定稿本即出自他的手笔。同年（何蜀考证为 1967 年）“五二〇大会”被安排上了天安门城楼，并得到江青签名题赠的《毛泽东选集》。1974 年担任北京京剧院革委会委员。他对江青有知遇之感，得以在乱世避免许多无妄之灾，又诚惶诚恐，敬重她对京剧内行，把她对《沙家浜》的只言片语都制成卡片当作指示供作参考。参加了《敌后武工队》、《山城旭日》（从《红岩》取材）、《草原烽火》、《杜鹃山》（与王树元、黎中诚、杨毓珉合作）等剧本的创作改编。工作兢兢业业，潜思苦索，文采斐然，应对便捷。

1976 年 10 月后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挂起来”二年，被迫写了十几万字材料。坦承思想受影响，是“御用文人”，但只有工作关系，从未向江青、于会泳写过私人信件。同时发奋改编京剧《王昭君》，写了《裘盛戎》、《梁红玉》、《一捧雪》等剧本。

1980 年代发表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连续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成

为其后蔚为大观“寻根文学”的首倡者。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晚年曾被《芦荡火种》原作者遗孀文牧提起的版权诉讼所苦。

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家乡五行八作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口语化的语言、文体自成一格：疏放中透出凝重，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

(参考资料：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汪曾祺作品集·小传》，载“时代书城”“现当代文学”)

## 钓鱼台

地理名词。位于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金代（公元 1115—1234 年）章宗皇帝曾在这里建台垂钓，故后世有“皇帝钓鱼台”之称[注 1]。清代乾隆皇帝爱其风光旖旎，把它定为行宫。

中共建政后这里是最早（1959 年）建造的专用于招待外宾的国宾馆，兴建了风格各异的 19 座别墅楼（以后陆续有扩建修葺）。占地 43 万多平方米，其中湖水面积为 7 万多平方米，环境宁静幽雅，楼台亭阁间有绿荫花卉、林木石桥，古典情调与现代建筑和谐结合。楼房从钓鱼台东门北边起，按逆时针方向依次编号，为尊重外国人及中国的习俗，没有 1、4、13 号楼的编号。以“八方苑”替代 4 号楼、“芳菲苑”替代 1 号楼排序。全部是二层青砖红瓦楼房。

外国元首多住 18、12、11、8 号楼，毛泽东住 12 号楼，周恩来接待外宾多在“八方苑”。

1966 年初，彭真（时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曾在这里组织写作班子起草《二月提纲》。文革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14 号楼、16 号楼），而康生（8 号楼）、陈伯达（15 号楼）、江青（先 8 号楼，后 17 号楼）[注 2]、张春桥、姚文元（9 号楼）、关锋也都集中住在这里，于是它就成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办公、生活二合一的驻地。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是文革的发源地，并处在运动的领导、枢纽地位，甚至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与国务院、中央军委鼎足而三，居于实际的权力核心圈子：政令从此发出，接见上下内外来访者在此进行，幕后交易在此敲定。各派政治势力都穿梭来往、角逐于这里，或联络示好，或冲突交恶。

钓鱼台四周原是涂绿油漆竹竿扎成的篱笆，约略可见里面的房屋树木，1966 年改筑了围墙，围墙上安了电网。围墙东面、北面各开一座大门。东面大门里是一座假山；北面大门里砌了很大一个照壁，遮住行人视线。照壁上涂有红漆，堆出笔势飞动的金字：“为人民服务”。东湖沿岸安装着带毛刺的铁丝网，原本就游人罕至的这里更加幽深。

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影响渐次淡出，政治运作渐复常轨，这里又成为“四人帮”成员和文革新贵集中居住的处所。后来居上的王洪文住 16 号楼；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等文革升迁上来的政治局委员亦曾住在这里。使他们的交往、磨合，除政治利益和派系上的一致外，还增加了地利的方便。因此，钓鱼台就先后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和四人帮的代名词。作为地理名词的钓鱼台就具有重要的政

治符号意义。其警卫由中央警卫局一、二处负责。

1975年由于陈永贵上书请求搬出钓鱼台，搬到东城区交道口四条一个老四合院里。毛泽东批示曰“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于是住在钓鱼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搬走了。只有江青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才搬往中南海。

1980年正式对社会开放营业。一天住宿费2000-3000元人民币。根据接待处提供的市场报价，标准间（最便宜）298美元一天/夜，总统套房为3998美元一天/夜。

[注1]《日下旧闻考》：“钓鱼台在三里河西里许，乃大金时旧迹也。台下有泉涌出汇为池，其水至冬不竭。”《帝京景物略》：“出府城门南十里，花园村，古花园。其后树，今平畴也。金王郁钓鱼台，台其处，郁前玉渊潭，今池也。有泉地涌出，古今人因之。郁台焉，钓焉，钓鱼台以名。”

[注2]各人均另有专属住宅。但据说江青就长住钓鱼台，而不回中南海毛泽东住处。

（参考资料：《中国国家元首行宫——钓鱼台》；苏叔阳《钓鱼台》；叶永烈《陈伯达传》）

## 滴水洞

地理名词。位于湖南省韶山冲西南约5公里，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幽深狭谷，其南面是龙头山，西为书堂山，北为虎歇坪，东面豁口建有韶山水库。龙头山山脚有一股山泉流出，蜿蜒成溪。溪上曾建有小桥，桥头边有一石洞；洞深约2.8公里，有小溪，幽壑口朝东北而开。洞内滴水，四时不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滴水洞”由此得名。

韶山冲上屋场毛泽东故居距此约4公里。毛泽东的曾祖父母、祖父等先人便安葬于此。滴水洞豁口以下，有毛泽东的祖居地东茅塘和家庙毛震公祠。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回乡的毛泽东暗示下[注]，拍板在此兴建别墅。代号“二〇三工程”。从1960年下半年启动到1962年，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的一、二、三号主体工程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公路，同时竣工。

参照中南海毛泽东住房式样，吸取苏式建筑保暖防寒优点，设计出一、二、三号主体工程。一号楼供毛泽东使用，双回廊，内设主房（卧室）、副房（江青卧室）、办公室、会议厅、餐厅、娱乐室等，朴素、大方而实用。二号楼是两层楼客房，共24间，是陪同的中央负责同志休息处。一、二号楼有走廊相连。三号楼距一、二号楼有百米远，是随行警卫（8341部队）和省委接待同志住宿地方。出于战备考虑，1970年建了一间整体浇筑的防震室和一条防空洞。

从1960年起这里进入封闭、保密状态。房子建好后归湖南省委直接掌握，外围由部队警戒，内务由省委接待处具体管理。

毛泽东总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回韶山冲：一次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留下《到韶山》一诗），一次是1966年文革前夜。

1966年返乡的毛在畅游长江（一次显示体魄、精力的公开亮相）以前7月8日致江青的那封著名通信中写道：“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

此信从论 20 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当时中国的“左派”（林彪等）、“右派”（刘邓）和“中间派”，勾画了文革前的中共高层的政治格局、文革的内在动机；又预言他死后的中国未来。被称为具有“政治遗嘱”的性质（曾有人质疑它的写作时间）。其重要性不亚于《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其中“西方的一个山洞”即指韶山滴水洞。离开那里时毛对地方领导人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写于武汉的信，实形成于滴水洞 10 日隐居深思。

1972 年揭批林彪的中央文件公布了这封信，“滴水洞”从此以其神秘性而名满天下。

滴水洞景区 1986 年对外开放，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滴水洞山谷是由典型的板页岩发育而成的红土壤，具有良好地形地貌，覆盖着茂密原始次生林，形成独特的冬暖夏凉小气候。山间树木蓊郁，夏日清风习习，是避暑好去处。经过韶山管理局十多年保护性开发，已成为红色旅游长盛不衰宝地——韶山最吸引游客的景点之一。2003 年中国邮政发行了“滴水洞”明信片。

[注]1959 年 6 月 26 日毛泽东回乡时，对陪同他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你们……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屋子。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同志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参考资料：胡长明《韶山幽深的滴水洞 毛泽东心中永远的“圣地”》，载《党史博览》；叶永烈《江青传·滴水洞里的沉思》）

## 郭沫若

（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1914 年春赴日本学医。1918 年写小说《牧羊哀话》、新诗《死的诱惑》。1919 年五四后在日本福冈发起救国团体夏社，投身新文化运动，有《凤凰涅槃》、《炉中煤》等诗篇。1921 年他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出版诗集《女神》。1923 年回国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1920 年代创作历史剧《王昭君》、《卓文君》。1927 年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流亡日本十年，研究甲骨文。1938 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创作《屈原》等 6 个历史剧。写下《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史论和大量杂文等。《甲申三百年祭》（1944 年）被用作中共整风文件。

1949 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一、二、三届主席，并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新华颂》、《蔡文姬》等。

1950 年后屡次参与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评论、胡风集团（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请依法处理胡风》）等。

1966 年 1 月，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请辞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职。4 月 14 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发言：“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举世为之哗然。4 月 28 日，在毛泽东首肯下《光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的讲话，题目是《向工

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即席朗诵“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的诗。<sup>①</sup>

1971年10月发表《李白与杜甫》，用当时流行阶级斗争理论研究李杜，迎合毛泽东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口味<sup>②</sup>扬李抑杜（他1953年曾为杜甫草堂撰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后多为萧涤非等论者诟病。1974年抱病捉笔，写下《春雷》两首七律奉呈毛泽东。<sup>③</sup>彻底推翻自己学术观点，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毛的批评，表示要用毛泽东思想“神方”排除头脑中的“蛊毒”。1976年5月12日发表《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sup>④</sup>1976年10月21日填写《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有“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之句。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会议简报组胡平代拟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

小儿郭民英1967年4月自杀身亡。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郭世英（在北大因X小组曾被捕，幸周恩来干预得免）被造反派关押，1968年4月22日从学生宿舍四楼房间的窗口坠落而亡。他整本抄录儿子遗下日记，不止于寄托思念。

注：①《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②例如1958年1月16日毛在南宁会议上就说过：学点文学，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浪漫主义。

③《春雷》：一“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二“读书卅载探龙宋，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駉驹效策驱。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④《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参考资料：阚民《“文革”中的郭沫若》，《党史博览》2000年第10期；夏榆《郭沫若留给我们的反思》，《南方周末》2002年11月21日；《〈科学的春天〉是怎样诞生的》，钱江《党史博览》；《宫廷诗人郭沫若的几首歪诗》，转自“小竹屋论坛·潇湘诗苑”

<http://207.44.151.189/luntan/viewthread.php?tid=9247&highlight=&page=1>)

## 中央文革记者站

它的记者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两报一刊（使用得最多的主要是《解放军报》）记者名义，奔走于全国各大中城市；所调查采写的

稿件，常常被送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案头。归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领导。其活动时间是1966年9月至1969年5月。这是一个是在外界鲜为人知的机构。因当时地方党政机关已不能正常掌握并向中央反映情况，毛泽东提议选派一批记者去全国各地调查了解文革开展情况，以使中央能及时观察和掌握全国运动。是中央文革的耳目（带有情报机构性质）。

它的领导体制是：记者站对外称解放军报记者站，受中央文革办事组领导；派驻各地的调查采访活动，不受当地党政机关领导，只对中央负责；采写的稿件不受任何人审查，只传给记者站，打印报中央政治局常委。记者纪律是：只调查反映情况，不介入驻地运动（实际为中央文革与地方造反派之间起了信息传递、组织作用），遇事不要表态、干预，不要泄密，等。规定的工作方式是：去外地记者持《解放军报》介绍信和记者证，住各地军事机关，由军事机关提供交通、通讯、办公地点等工作条件。在当地党政军民学等各界独立调查研究，自主采写稿件。稿件用保密电话（少量用机要传递或邮寄）传给北京记者站。

报道内容为：地方主要群众组织的成因、力量分布、主要头头、主要观点、主要举动等情况；各派的对立、冲突情况；地方党政机关被群众冲击、被批斗的情况；地方党政军领导对运动、生产的看法；农、工、商、交通等各行业生产经营情况；地方党政机关成立造反组织情况，等等。

外驻记者对重要情况，当天就要电话传到北京。编辑组立即编审处理，分别印成《快报》和《简报》，立即直送中央领导办公地点，做到全国各地发生的紧急事件最迟第二天上午就送到中央领导的案头。

记者反映情况的形式，除写稿传报外还有三种：一，回京直接向中央领导汇报，回答问题。所问的情况，都是相当重要、文稿中不易说清的事情。二，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中央解决各地问题的会议，随时提供必要的参考材料。三，受中央领导的委派，对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作专题调查报告。

记者站设在花园村一号院，邮政代号是北京811信箱。其人员组成为：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编辑（40人）是训练有素的骨干，马列主义学院（14人）、解放军政治学院（26人）多理论工作者，还有来自海空军、各大军区（129人）和中央办公厅（1人）的干部。鼎盛时期向外地派有40个记者站、联络站。派驻各地的记者定期被召回北京参加集训，接受政策指导以保持与中央文革的步调一致。

有一则写于当时的顺口溜反映了记者站和记者的真实情况：“乘飞机、摆渡船、坐火车、背生烟，/ 足踏双轮两脚颠，首都至边关。/ 迎长矛、忍饥寒、访群众，不消闲，/ 调查研究目纵观，呈文过百篇。/ 王力管，肖力（李讷）兼，东兴教，总理谈，/ 导师接见恩如山，永世铭心间。/ 学理论、学路线、学立场、学观点，/ 树立唯物世界观，收获有万千。”

（参考资料：李近川《回忆中央文革记者站》，《香港商报》2003年2月22日）

## 中央文革接待站

文革初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有的文献中称“中央文革上访接待站”、“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其存在时间应与中央文革相始终。

与红卫兵大串联专事接待（以生活安置为主，由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系统统筹）



不同（各地都有），它主要是听取各地、各系统、各单位上访者对违反文革政策规定、压制学生和造反派组织的投诉，并提供政策咨询，转达情况或饬令各系统、地方党政部门解决的一个机构（以电话、电报、信函、批条方式）。是在人民群众信访工作的原有体制基础上，一个非常时期赋有特权的机构设置。

聂元梓大字报广播后，冲击各级工作组、党政负责人和机关的造反行动势头凶猛，遭到被冲击者或组织、主动或自发、消极的抵制及压制。它既是一个集中信息的机构，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在地方基层党政机关失灵时处理地方文革政务以强劲推动文革的上访、办事机构。它成了各地造反派向往、投诉、求助的权力中心，也成为中央文革与各省市造反派驻京联络站热线联系并策动其行动的中枢。在联系外省市群众组织、多方面收集掌握信息、协调处理地方文革紧急事务方面，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据说工作人员佩有“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接待站接待员”标记，来访者需要排队接待，人满为患。据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大事记》载：使其“处于瘫痪状态，不能进行正常工作”。既是中央文革直接面对、接待群众组织的公关形象、权力形式，客观上也起到了隔离层、防火墙的作用。

先后负责人有戚本禹、王广宇等。

因需要处理的事情繁多、隶属关系复杂，后与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待站（中南海西门；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著名号召即是在此做的）、国务院秘书厅接待站（府右街北口）合起来共三家组成联合接待站。

1967年11月制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背面镌有“中央文革联合接待室 1967.11.17”字样）像章。正中上方红太阳中托出毛主席穿军装的头像，下方天安门代表祖国首都。红太阳放射出十六组每组七条光芒线，表示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光芒线照耀当时全国七亿人民。四周外缘三十朵葵花象征着包括台湾省在内的三十个省市，葵花向阳比喻了全国永远心向毛主席。

（参考资料：红河谷《追随红太阳·革命大串联》，“燃情都市”；“新华网”2003-11-27《中央文革联合接待室像章》，

## 余秋雨

（1946— ）浙江省余姚县人。当代散文家、学者。

1957年至1963年就读于上海晋元中学，随即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1968年12月分配留校，到江苏省吴江县军垦农场劳动。

1963发表《中学生也要批判修正主义》（《中国青年报》）。1968年起草《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由胡锡涛修改、定稿，发表在《红旗》杂志1968年第6、7期合刊上。1971年进入上海市高校联合教材编写组，参与写作《鲁迅传》的准备工作，完成了半部（上册），是《鲁迅传》的主要执笔者。也有人说，他由胡锡涛推荐参加“石一歌”（十一个的谐音，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文艺组的外围）。

1973年经朱永嘉介绍调入康平路89号上海市委写作组本部，参与《朝霞》杂志编辑工作。与另一位写作组成员共同协助姚文元修改《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收集资料。在此期间，发表了《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

一场斗争谈起》(《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3期,署名“秋雨”)、《胡适传(五四前后)》(半篇,《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1期,署名“余秋雨”;指斥胡适‘投靠美帝国主义’,是个‘把中国嫁给帝国主义’的‘卖国贼’,是‘一小撮反动派’、‘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读鲁迅新发现的一篇佚文》(《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8期,署名“余秋雨”)、《评胡适的考证》(《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0期,收入《评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4月版,署名“余秋雨”),与人合作用“罗思鼎”笔名发表《在20世纪30年代》(《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1期,王知常定稿),用笔名“任犊”发表《走出“彼得堡”》(《朝霞》1975年第5期;《人民日报》同年4月6日转载);《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4期,署名“任犊”)。另有用“石一歌”名字发表的《鲁迅传》下册末章《鞠躬尽瘁》(发表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8月出版的《金钟长鸣》一书),还参与了《鲁迅传》中的一章《再捣孔家店》的大改(此文为配合当时批林批孔需要提前刊于《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5期)。为小册子《鲁迅的故事》的主要执笔(署名“石一歌”)。

1975年得肝炎后,作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力写手之一,得到组织的多方关照,住进了上海虹桥疗养院这样一般人住不进去的地方。经朱永嘉推荐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

文革后受到长时期审查,虽“是朱永嘉的得力帮手”,“能写、能编,‘还负责统稿’……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并不是写作组决策人,且又揭发了别人,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大体上‘说清楚’了”,没有被定为“三种人”。其时他专心治学,连续发表了专著《戏剧理论史稿》(1983,上海文艺出版社)、《戏剧审美心理学》(1985,四川文艺出版社)、《中国戏剧文化史述》(1985,湖南文艺出版社)、《艺术创造工程》(1987,上海文艺出版社)。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后以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名世,频繁在凤凰卫视做节目,出入各式奖杯评委的媒介活动。

1999年至2000年间,围绕他在文革中的表现,展开了他是否应该“忏悔”的争论。有人(余杰)严厉批评他的回避、否认;有人也认为当年他只是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不能等同于打砸抢的造反派份子,说得太夸张,强人忏悔有文革余风;温和的论者虽然认同第二种观点,却也指出余说“一生可忏悔的事情很多,但恰恰在文革期间最少”是一种“文过饰非”,“缺乏坦然面对历史的勇气”(徐缉熙)。“不能因为参加了写作组就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不能把它看成是需要格外强调的历史污点”(丁东)。

2002年7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武汉学者古远清“侵害名誉权”索赔16万元,次年8月达成法庭调解告终;被告就“有关内容与事实不符”(二处史料的时间差错)道歉,原告“放弃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诉讼费4710元,被告承担100元。2004年胡适远房侄孙胡子暄撰文在网上披露一件当年轶事:余的批胡适文章对其父(胡念柏)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心脏病突发送进医院抢救以致不治。指出余《借我一生》书中记载“‘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过他人的事’,你的话也说得大不像样了!完全是在混淆是非、自欺欺人”。

(参考资料:栾梅健《余秋雨评传》,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余开伟编《忏悔还是不忏悔》,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信》,“关天茶舍”2004年9月22日)

## 精神实质

名词。指称马列毛思想学说、领袖论述、上级指示和文件的宗旨（主要意义），它揭示了客观世界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普遍规律。带有神秘色彩。与之相似、相近的词，还有“科学体系”、“理论精髓”、“政治灵魂”等等。所以在对“精神实质”的“领会”、“理解”、“掌握”、“把握”之前，都要冠以“科学”、“全面”、“准确”、“深刻”、“真正”、“加深”等状语作为要求。这一概念强调的是，政治学习的对象、内容的内涵、本质，不是像人们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不能仅从字面上、通过直观的方法去感知、认识，必须经过反复学习、认真领会、深入实践、不断揣摩、多次修正，才能逐步达到真正掌握的目的。

它把学习对象、内容的真理性绝对化、至上化、神秘化，暗示学习者意欲真正理解的智力困难程度，似乎它有如什么镜中月、水中花那样难以捉摸的话外之音、言外之意，是一个无法抵达的意义彼岸。在具体途径上，既规定要经常不断地、反复地学习，逐章、逐条、逐句、逐字地认真阅读领会，同时又不能采取学院式的态度，咬文嚼字，寻章摘句，从经典著作里为自己意见找根据。提倡学立场、学观点、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更加让人感到闪烁游移、扑朔迷离。对学习者智力的矮化，是对他们精神、人格独立矮化的前提；借此把“精神实质”的解释权、裁决权，集中到了党的组织和领导人手中。

所以要求人们像学习宗教经典一样，匍匐在它面前，顶礼膜拜，取消主体的独立和理性的逻辑认知，代之以朝圣般的信仰、体认，实际上是通过话语操作建立一种绝对服从的权力关系：“转变观念，把思想统一到……上来”。“就是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读毛主席的书，就是坚决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真正做到‘毛主席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做’”，“真正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真正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通过“真学”，达到“真懂”、“真信”（思想深处信、灵魂深处信）、“真用”（贯彻执行）。“真信”是“真懂”的标准，是“真用”的保证。

“言”与“意”、“言”与“物”之间，本来就有距离、缝隙，是自然存在。求真、求知者的努力就是借助于勘查、标记，搭建沟通它们之间的桥梁，弥合其距离、缝隙，就像所有人文学科学者做过的那样。民主、法制社会通过立法来界定法律的底线，司法把政府当作贼一样防范，小心不使它逾越自己的界限。而集权社会则反是，它有意利用模糊语言边界等手段，扩大“言”与“意”、“物”之间的距离、缝隙，为其权力运作保留、腾挪出更大空间（越大越好！）。——这就是“精神实质”概念产生和存在实践并长盛不衰的利益驱动。强调精神实质，不是说有一个客观的至上的绝对精神、绝对真理高高在上地孤悬在那里、无法企及，而是说这个精神实质的解释权在组织手中。领会精神实质就是领会领导意图、紧跟领导意图。因为组织是通过领导来体现的。

1950年代陈伯达常向田家英打听与毛泽东谈天的内容，毛关注的动向、读了哪些书；康生有时还将自己收藏的清人墨迹转赠田家英（其藏品以《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为名于1995年出版）。陈、康党内地位远高于田，却想方设法与田套近乎，就是要通过他弄清楚毛泽东的“精神实质”、窥测方向。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搞“称天才”的语录却触了霉头，就是没有领会毛的“精神实质”；而张春桥1958年写文章主张恢复供给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领会到

了毛的“精神实质”，所以步步高升。

从时间顺序看，对“精神实质”的强调是逐渐增强（以该词在《人民日报》每年出现的频次为例）：1950年代16.5次/年，1960年代19.6次/年，1970年代29.6次/年，1980年代30.7次/年，1990年代53次/年。唯一例外的是1966—1969年的4年里只有14.5次/年。这是因为一，其时对毛泽东的崇拜宣传更为极端、公开，已经不需要用这样暗示方式来进行；二，当时鼓动突破、打碎现存党政权力体系的造反，要求对旧有权威的毁坏。作为补偿，在文革发动前的6年中该词的频次达到23次/年，以为未雨绸缪，对毛泽东权威的逐步升温的一部分。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

<http://www.szlib.com:82/renming/search.wct?channelid=5020>；《解放军报》社论《天天读天天练》，1964.03.26；尹达《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66.03.02)

### 刘少奇一类骗子

亦称“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用于指称林彪的代称。用已经公开打倒的最大“走资派”指代未公开批判的“野心家”，重点指控其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骗子。是一种绕口令式（读起来拗口）的委婉语。出现于1972年初至1973年8月的各式媒体上，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代称。

1972年两报一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元旦社论说：“广大干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里通外国，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以此暗示林彪叛逃而未对外界公开真相，但又已经开始在党内军内对其进行批判清算。这是当局设计的掩耳盗铃的障眼法。因为林彪曾是九大党章载明的毛泽东法定接班人，突然公开批判，不免尴尬。先用代称名义造成舆论，一则缓冲降低受众的心理落差，一则在名誉上把他搞臭再公开，以达到当时宣传预期、认定的水到渠成效果。接着批判文章蜂拥而至。是一种苦心经营的舆论操作技巧。当时的报刊把林彪和刘少奇并列，标准用语是“刘少奇和刘少奇一类骗子”。

而此前的1971年9月中旬中共经内部通知向高级干部通告林彪情况，10月后逐级传达，12月中旬陆续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之一、之二、之三等三批材料。

直到1973年9月，在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才向世界列举了林彪的罪行：“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但是，……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1970年8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1971年3月制定《“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9月8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9月13日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此后对林彪的声讨就直呼其名，不再需要在报刊广播上隐讳了。1974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但有时为了行文省略，在把刘少奇、林彪并称时，也偶尔使用“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提法。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2年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人民日报》1972年1月1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3年9月1日;郑德荣等编《新中国纪事1949—198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 戚本禹

(1931— )山东威海人。1949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

1965年12月8日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攻击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毛泽东称赞:“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1966年后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1966年第7期《红旗》杂志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从此为针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调。有人指称他曾暗示、鼓动中央办公厅造反派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并指使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批斗。

1968年1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中央文革小组“小三”王、关、戚中最后被隔离审查的。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6年出狱后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至1990年代初退休。育有二子一女。晚年和妻子邱云英及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与人合作的《大人物的变态心理》由吉林省时代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曾引起一阵风波(因疏漏在版权页署上了他的名字)。曾与人主编了二百余万字九大卷《中华易学大辞典》,并研究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为真禅法师等人的著书作序。退休后除继续钻研学问、应邀讲学外,曾涉足商海,对金融和银行特别有兴趣。

网上有他与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评论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访谈,说“毛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但“不是封建帝王”。他(李志绥)“写的文革回忆录除了他亲身参与过的支左活动外,其他大部分是根据现有报刊资料和别人写的东西拼凑起来的”。但同时也肯定:“他直接经历的又与他的创作意图不冲突的事情,这些事情他写得满好,满真实。例如毛泽东对自己疾病的态度,在毛泽东身边秘密安置窃听器的事件,毛泽东对击水长江与奋搏海浪的执拗,还有他对江青、汪东兴等人品格、作风的某些描写等等,它们不仅整体就连情节也是真实的。”

(温乐群等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P17;《文革英雄沉浮录》;《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私人医生回忆录〉》,百

## 旧社会

偏正词组构成的时间名词。与“解放前”等价、同义，与“新社会”相对。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或中共在当地建政）为界（所以解放前是它的同义词），是时间标记上“他们/我们”、“敌/我”截然两分的政治学裁断。此前是反动、压迫、黑暗、剥削、丑陋、愚昧、灾难、恐怖、不义，此后是进步、解放、光明、福利、美好、文明、幸福、和平、正义……一是天堂，一是地狱。狭义地说，旧社会指1949年（或中共建政以前）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广义地说，还指1949年以前的整个社会历史，包括北洋政府、清朝乃至更久远的古代，等等，或称旧时代。该词起源于中共建政的同时，一直到2000年代都在使用。但在文革时期，把它的意识形态内涵发挥到了极致。

从表面看，它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时间划分、标记，实际上包含着丰富的话语内容。时间标记的技术外衣，掩盖了它把政治合法性放到括号里悬置起来，作为自明的概念前提来使用的内在过程；抹去了证明的必要。虽然，所有政权的合法性，都既与它的得来（过去）相关，也与它的运转（现状）相关。但这一标记轻而易举地用现实存在否定了合理性追问，阻断、拒绝了所有对当下政治的质疑、批评，在“他们/我们”、“敌/我”的裁断向度面前，所有质疑、批评都被政治化了，都有与前政权同流合污、与人民为敌的嫌疑。因为在新旧社会背后，横亘着的是被组织起来的群众性仇恨和紧张。

因此在它前面冠以“万恶的”定语、粘合“万恶的旧社会”已经成为固定词组。另一个固定词组是“新旧社会两重天”。[注]它们高频率的反复使用，自然内化了人们对官方意识形态附加涵义的认同，使之成为一种无意识，不知不觉驱动人们的认知模式。况且还有一整套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比、忆苦饭）教育制度运作，强化、巩固其观念体系。

文艺作品在渲染、灌输旧社会的罪恶形象以愚民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林家铺子》（水华导演，改编自茅盾同名小说）讲述1930年代初江南小镇上的一家小商铺经营者林老板的命运（倒闭），概括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中国整个民族工商业的悲惨境地（1983年在葡萄牙第12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上获评委奖）。《舞台姐妹》（谢晋导演）通过对春花与月红姐妹间的悲欢离合和性格冲突（春花逐渐觉醒、成熟，月红却日渐堕落），生动地展现了旧社会制度和黑暗势力对艺术和艺术家的残害（获英国第24届伦敦国际电影节英国电影学会年度奖等多项国际奖）。《农奴》（李俊导演）以强巴一家的血泪史为主线，揭露了西藏农奴制的野蛮、残酷和封建农奴主的累累罪行（1981年获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金鹰奖）。

虽然戒毒、禁赌、关闭妓院、打击会道门等雷厉风行的社会改造取得了惊人成功，但由“旧社会”一词造成的观念断裂（一次比一次激进的近代革命到此达于登峰造极）、屏蔽却诱发了一系列误区：既然它指称的社会呈现出整体反动性，那么在这个社会得势的统治阶级成员，就应该被进行专政打入另册，不能讲人道、行仁政（镇反、肃反和屡次运动对历史反革命清算），缺乏积极的社会氛围、建设性的全民和解；对服务于它的政府人员（哪怕做技术的都称伪人员）、律师、报人、教师等知识分子，都视为旧人员而犯有原罪，思想感情、立场观点甚至学术技能都是有问题的，伴随不断运动的世界观改造成为他们的毕生功课；大多数

起源于西方的人文科学如法学、经济学（包括金融学和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宗教学（从中央到地方宗教事务部门全被撤消）、美学、性学都被一竿子打死，宣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说，系科被撤消（北京政法学院等法律教育机构一律被撤消），教授被转行，学说被批判，图书被封存；超越阶级界限、粘合力极强且拥有自治权的民间中层组织（武训兴办的义学是它的组成部分之一），被当成封建性的族权——宗族（又称为氏族）加以取缔……

因扫荡旧社会的道德优越感激发起来的乐观主义、发展焦虑，助长了经济制度改造和建设方面对一大二公、计划的信赖，臣服于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推动下，牺牲农业（重、轻、农），借助强劲行政力量的命令式社会动员（就业率超常）获得极大效率，但反经济规律的穷过渡、大跃进、大炼钢铁、过度密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高积累……却是灾难性的。由于生活在“美丽新世界”，“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个旧社会复辟的可怕预言对人们的恐吓，一方面使他们盲目信赖现实政治及其宣传，一方面使他们对被判为敌对势力的人充满盲目仇恨（哪怕并不了解他或他们的罪行），成为一种合法伤害权。

后文革时期以至 2000 年代的口语里虽然仍保留了该词，但使用频率已经大大下降，作为时间标记的功能还有，原有意识形态涵义还沉睡，只是随着阶级斗争气氛淡化（没有完全失效），它的控诉色彩、政治正确的成分都日渐稀薄，但仍携带着无意识仇恨修辞学的基因。有报道说 2000 年夏衍著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已退出最新版的高中语文课本。并解释说，因为时代性离普通的中学生稍微远了一些，考虑到新旧课文比例问题才做出临时性调整。

作为一种反弹，面对多样化的社会矛盾，在 2000 年代以调侃语气使用“旧社会”的也出现了：面对婚姻市场成本上升的人怀恋“旧社会”的早婚、多妻、女性柔顺；重庆九龙坡凤中路餐馆拿它为名以广招徕（遭到工商部门抵制）；诅咒村干部恶霸、腐败的对比说旧社会地主的节俭；低收入阶层埋怨消费物价飞涨就像旧社会；等等。

[注]被中国近代以来“新=现代、先进、革命”，“旧=落后、保守、反动”的激进主义思维定势所牵掣。

（参考资料：费孝通《我这一年》，《人民日报》1950 年 1 月 3 日；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1918 年 6 月 4 日]，《列宁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第 2 版，第 380 页；章柏青《悲愤的控诉与强烈的反抗》，载《中国电影的发展与曲折[1949—1976]》）

## 重庆红卫兵墓

位于重庆市沙坪公园位西南角、人工湖岸的缓坡的一块墓地（紧邻一座 1990 年重建的天主教堂）。一道高约三至六公尺不等的块石叠砌而成的灰墙，把墓园大致围成船形；墓园西高东低，形成几级梯形台地；墓园占地约 3000 平方米左右（一说 5 亩）。墓群座西朝东，寄寓着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的拳拳之意。

其中 113 座墓莹瘞埋着 1967 年至 1968 年重庆武斗[注 1]期间约 400 名[注 2]战死或意外故亡（个别）的“8.15”派组织成员。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 1967 年 6 月开始，最晚的到 1969 年 1 月结束。死亡者年龄最小的仅 14（二人），年龄最大的 60 岁。死亡者年龄：20 岁以下的占 35.2%（69 人），21—30 岁的 33.7%

(66人), 31—40岁的20.9% (41人), 41岁—50岁的7.7% (15人), 50岁以上2.6% (5人)。死亡者职业: 工人占58.9% (最多, 176人), 学生34.8% (104人), 职员4.7% (14人), 军人(军事院校学生)2% (6人), 干部1% (3人), 教师0.67% (2人)。[注3]

墓园的布局没有统一规划, 按先来后到的不成文法随意分割, 有的位置坟墓密度很大, 有的位置则趋疏朗, 没有对称性。建墓的主要材料是石板、青砖、三合土、水泥。单人独墓的款式一般较简单, 没有独立的碑, 刻石融在墓体中嵌于正前方, 墓志、墓表、墓铭三者合一。而多数合葬墓主体设计摹仿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 再略加变通改良: 南北横亘绵延的墓基适应着多人合葬的功能需要, 其上耸立一座石碑。9号墓摹仿人民英雄纪念碑最为认真与逼真, 墓基四周环绕着漂亮的磨石栏杆。117号墓铭刻悼文的墓裙宽达十多米。碑身、碑顶一般饰有八一五派的徽记, 嵌着派别名号的火炬。墓碑主体题字多为龙蛇竞走、横空出世的毛体狂草: “死难烈士万岁”。点缀其间的有时代特征鲜明的激烈口号: “头可断, 血可流, 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可挨打, 可挨斗, 誓死不低革命头”; 或表示悼念之意的毛泽东、鲁迅诗句: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血沃中原肥劲草, 寒凝大地发春华”等。

碑文一般能提供死者生平较完整的资料, 且间杂许多考绩式的政治评语。如82号墓: “江丕嘉同志简历 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江丕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於重庆小龙坎 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学生红卫兵 六七年三月加入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点五十分为保卫中央赴渝调查组的安全英勇献身 年仅二十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勇敢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 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江丕嘉同志为革命而死 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具代表性的碑文“悼词”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夸张、花俏的抒情性, 被用来寄托对死者的缅怀、称赞之情, 着眼点是以死者性命证明对立方的反动、不义和己方的政治合法性。如105号墓: “血沃中原肥劲草, 寒凝大地发春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晓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 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死难的战友们, 一想起你们, 我们就浑身是胆, 力量无穷,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不周山下红旗乱, 碧血催开英雄花。亲爱的战友们, 今天, 我们已用战斗迎来了欢笑的红云。披肝沥胆何所求, 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 已浸透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 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 已化入八一五熊熊的革命火炬。这火炬啊, 我们紧紧握! 头可断, 血可流, 毛泽东思想绝不丢, 你们铿锵的誓言啊, 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你们英雄的身躯, 犹如那苍松翠柏, 巍然屹立红岩岭上, 歌乐山巅。挥泪继承烈士志, 誓将遗愿化宏图。成千成万的先烈, 为了人民的利益, 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 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 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八一五革命派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六月。”

墓园所有碑文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风化、剥蚀: 碑文姓名不全的有23名, 姓名全无的24名。最严重的是71号墓, 11位死者的姓名全被风化了, 只有死者的岁数尚可辨认; 此碑的死亡人数是根据岁数记载的占位推算出来的。85号墓因有一整块墓碑石块被撬走, 故其中10名死者的姓名皆不可考。



在墓园大量污损、破坏性的游人题咏中，也有个别具警策意味的。5号墓左侧碑身有模糊的锐器刻痕，上面刻着：“人间本无正道 阴世焉有光明 我劝后人擦亮眼 不求主义只求欢。”发现的时间是1993年清明。

[注1] 重庆武斗因占据国家军工生产基地的供应便利，以一夜间打了1万多发高射炮弹的纪录惊动中共最高层而闻名全国。此地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时间的武斗，见于官方记载（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重庆大事记》，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9年版）的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645人死亡。

[注2] 从有确切死亡者姓名、性别、履历、所属团体、死亡时间、致死事件、死亡人数的92座坟墓碑文提供的资料里，实际累加统计出345人的墓葬死亡人数。因文字湮灭已不可考的21座墓，若按92座墓的平均安葬人数（3.75人/墓）相乘，估计葬有约79人。加上已知数字，此地共掩埋424名武斗死难者。若加上估计误差25%，则应在404—443人之间。

[注3] 参见《重庆红卫兵墓园一览表》。

（参考资料：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载《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余刘文 韩平藻《青春墓地埋葬重庆文革武斗》，《南方周末》2001年4月29日；morris《重庆红卫兵墓园一览表》，

## 自绝于人民

文革中对自杀者的政治定性。亦称“自绝于党和人民”。1950年代，这是指责人脱离党和人民的名义，意为“自己割断、断绝与党和人民的联系”。大量使用于1957年反右时对右派的指责、呵斥（《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167条记载中见于1957年就有124条，占74.25%）。文革时升级为强加在自杀者头上的罪名，指“与党和人民对抗而自取灭亡”；不但没有正面价值，而是反社会的对抗行为、罪行。一种类似鞭尸的诛心之词。自杀未遂的人因为“仇视党和人民”，得不到医治。[注1]

文革自杀多见于初期（1966—1969）：1966年占自杀总数的29.03%，1967年占16.13%，1968年占32.26%，1969年占9.68%，1970年以后占13%。一般源于突然而至的社会混乱，价值秩序的幻灭、颠倒，自杀者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失去了适应社会的要求和能力，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无法忍受批斗等肉体摧残、人格侮辱的暴力施虐，看不到出路。他们只能以放弃一己生命的代价，来表现伤心、绝望、无助的最后抗议，并维护自己仅存的尊严。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化的清队运动中自杀的人数甚至超过了暴风骤雨、乱揪乱斗的1966年。

自杀者中，官员约占17.24%、学者占31.03%、作家占27.59%、艺术家占17.24%，将军、运动员各占3.45%。自杀方式一般采用自缢（41.67%）、投水（包括跳河、投井、投池）25%、跳楼（16.67%）、服安眠药（12.5%）、嗅煤气（4.17%）。[注2]

在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看来，历史必然性永远指向进步，掌握着人民大众，人的生命只能属于国家和革命事业。即使是放弃生命权这种消极自由的个人行为，因为是游离于组织之外，打断了正在凯歌行进的大批判步伐，用胆大妄为的死亡玷污革命的名誉，阻碍了革命的部署，是对抗历史潮流和人民功业的反动行为，

就是犯罪。所以要把这种个人行为纳入社会、政治的范围，在个人肉体生命结束以后，再次推上革命法庭进行审判。让后继者以为镜鉴：死不仅不能洗清罪名，它本身就是莫大的罪名，会牵连累及父母兄弟姐妹子女。

这种以历史和正义的名义鞭尸的残忍，与欧洲中世纪教会敌视自杀，对自杀者拖尸游行、肢解示众、不准葬入公用墓地、抄没财产的野蛮行径，毫无二致。它一方面制造了文革罹难者连求死也不得自由的浓重恐怖，一方面确实吓阻、制止了部分理性的预谋自杀者。

从查阅报章情况看，不见用“自绝于人民”指称自杀行为的用法。这并不意味此种用法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悖逆，毋庸说是碍于国际人道主义公例无从公开主张时，基层权力、奴性话语对官方文化的自觉修复、补充。

[注 1]附二个案例：千家驹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肋骨，不给医疗，第二天就拉去批斗，因为“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他痛感“在共产党统治下，竟连死的自由也没有”。1967年4月康生的小姨子苏枚自杀，他坚决不认帐，下令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政法干校联合调查，列了一个重点8人、非重点50人嫌疑犯的名单。终致1名嫌疑犯死去、4名疯癫、7名长期关押。

[注 2]这里关于自杀的统计根据童志刚《文革期间名人自杀档案》，见《今日名流》1999年第三期。因样本偏小，且名单具有明显的非随机性，其可信度尚待证实；但误差也许不会太大。

（参考资料：季羨林《牛棚杂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吴伯箫《“同人刊物”》，《人民日报》1957.11.22）

## 一小撮

形容词化的数量名词。本义是“市制容量单位，一小撮等于一市升的千分之一”（等于1毫升）；极言其少。在中共意识形态中被作了极端化引申，因为它与“大多数”、“人民”对立着的一个概念，所以总“坏”、“反动”、“邪恶”的人和事联系在一起。常被借用来指称人数很少的、反革命的、反社会的，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相对的人群：冠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类阶级敌人或党内人民内部的阶级异己分子之前。比如：一小撮“死硬派”、“反动派”、“财政寡头”、“顽固分子”、“土匪集团”、“坏家伙”、“反革命势力”、“黑帮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地富反坏右”、“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妖魔鬼怪”……

它在文革的不同阶段，与当时运动斗争的对象联系得最紧：1966、1967、1968年是“走资派”，1968年开始与“阶级敌人”搭配，一直延续到、贯穿了1970年代，成为最为频繁、固定的搭配。几乎就成了一个固定词组了。该词出现频率[注]与政治合法性呈负相关关系（所以需要强调多数来替代合法性论证）。

该词蕴含着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社会成员、二元对立的等级观念：多数、绝大多数——我（自己人、朋友）、革命、进步、高尚，是代表肯定、正面价值的一方面；少数、极少数——敌人、反动、落后、卑劣，是代表否定、负面价值的一方面。这两个敌对的阵营，互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视之。是一种对否定性社会势力进行消极描写乃至妖魔化的修辞手段、意识形态魔术。可参见“极少数”。

这两个词的释义虽然基本相同，但是语体色彩略有不同。“极少数”接近书面语，倚多为胜的正义感掩盖在公文化的表面下，相对比较含蓄。“一小撮”接近口语，其轻蔑意味溢于言表，更具有直接诉诸暴力的倾向，对这些“人们内部”以外的人，无论什么处理手段都是允许的、合法的。因为它所具有的负面价值将其划入了非人的行列，不能用人的标准来对待。该词的流行并非仅见于文革时期，但文革中达到恶性化程度。如果某人被划入“一小撮”就意味着：仅发“生活费”，进“学习班”，晚上下班不让回家，不能原来的工作了，打扫卫生，干力气活儿……（云山雾罩）

据资料表明，文革初期的政策掌握超过了中共的常规：不少单位、地区，“一小撮”的百分比在10%左右：上海国棉五厂达到18%，《光明日报》达到40%；连偏僻的贵州六盘水地区盘县矿区，由转业军人、农民组成的矿工里“一小撮”也达到了5.5%。由于强调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每次运动要有新花样，一小撮也一次次积累起来成为一个可怕的比例。弄得人人自危。有的统计认为，全程文革整肃的人员总数为1亿、达到全国人口的1/9（即11.11%，是5%的2.22倍；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这种文革算术学的吊诡，与官员的恐惧和自我保护有关，他们以为先下手为强，打击、批判黑五类，有利于转移以走资派打击为目标的文革斗争大方向。

这种心理又不仅限于官员，掌权的造反派也这样。它是阶级斗争哲学和政治、政策的必然产物。从时间看，也不仅限于文革；只是在文革前还多少能够有所控制，而在文革中因为行政系统瘫痪，就显得特别极端、残酷。

[注]从《人民日报》’49—97shujuku数据库的简单统计看，“一小撮”在1940年代的出现频率1.30%，1950年代10.08%，1960年代51.58%，1970年代28.70%，1980年代2.49%，1990年代0.38。虽然由于1940年代、1990年代的数据不全而被低估。但幅度有限，误差不会超过1/2，即1940年代最多也就2.6%，1990年代最多不会达到1%。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49—97shujuku数据库”：<http://www.szlib.com:82/renming/Outline.wct?Page=6&Result=1005536&SelectID=1&ChannelID=5020&RecID=175>；云山雾罩“跟贴”，“凯迪社区”“猫眼看人”2005-4-18；华林山《政治迫害与造反运动》，见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P219）

## 紫云轩

毛泽东中南海丰泽园住宅（1949—1966年）菊香书屋里沿用旧称的室名斋号。

从新华门（南门）进入中南海，顺着南海西岸马路行至北头一个大院，正门悬着“丰泽园”黑色匾额。曾是清代帝王每年春天在举行演耕仪式时的小憩庭院。园中东配院是菊香书屋。穿过门厅，是南北向、长方形结构，一圈标准老北京四合院形式的院落建筑，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是为菊香书屋主院。周围还通连着几个小院。1949年6月以前，林伯渠、周恩来都曾在此住过短暂时期。

如果说丰泽园古朴敦厚、不尚华丽，那么这里就更显清幽典雅。院内几棵苍劲、挺拔的老槐苍柏，分布在甬道边上，平添几分凝重沧桑。

北房（以北为正）五间呈一明两暗的形式，挂有“紫云轩”匾额（雕刻、彩绘）的高台阶房子是其当中一间（过厅），东侧两间通间是毛泽东起居室，呈东西向长方形。西侧两间有山墙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曾是江青的寝室（但她更多时间住在该院南房）。西侧的里间与西厢房相通，是毛泽东藏书的书屋。据说此处藏书加上1966年移居的“游泳池”书房，共有马恩列斯鲁（迅）全集和《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10多万册。东厢房靠北侧的两间是毛的办公室，书记处五大书记常在此开会。靠南两间是会客室。西厢房安放有乒乓球桌，供毛工作间隙运动锻炼使用。院内有一块菜地，毛偶尔侍弄一下菜蔬以调节思考节奏。由于邻近假山叠翠、溪流潺潺的静谷，毛常到那里散步休息。

南院的东房是毛泽东孩子的集体宿舍。江青姐姐李云露和儿子王博文在里屋附住，外屋住李敏、李讷和儿媳刘思齐，以后又住进侄子毛远新。

不但中共高层围绕着毛转，这里成为请示汇报、奔竞巴结、高层冲突、纵横捭阖、疑云重重的场所，政令权力酝酿、发布的敏感地点，他本人也习惯在私家住宅召集中共中央首脑召开除正式会议以外的碰头会（1949年前中共在野形成的散漫习惯，此时被沿用变化为显示权威的政治权术、隐喻主客实为君臣晋见关系的心理暗示技术），使这里更加成为权力核心中的核心。在这个圈子里，“丰泽园”、“菊香书屋”、“紫云轩”成为毛泽东的代名词。

毛泽东保健医生之一王鹤滨回忆录即以《紫云轩主人》为名。享有丰厚恩泽之地的丰泽园，被人附会“泽润生民”之说暗示毛的治国之道。这个称呼渗透着书卷气、委婉、亲切、威严、神秘等多种意味、色彩和想象。所有集权体制的领袖住地都带有隐秘暧昧、威权震慑的特点，而“丰泽园”、“菊香书屋”、“紫云轩”等古色古香、超迈脱俗的名号却为它镶嵌了一个儒雅、温馨的精致花边。

（参考资料：王朝柱《开国领袖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顾保孜《红镜头中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美]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 联动

名词。“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

1966年11月27日筹备、推选联络员，1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以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为骨干，联合了部分“保皇派”红卫兵。“联动”的组织者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八一学校、101中学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总部设在北大附中。代表人物有牛皖平、于增寿（总联络员）、李单纲、项东平（京工附中）、彭小蒙、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卜大华、马晓军（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任志明、邹平、赵战平、董良翻、孔丹等。

这是一批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多为烈士子女和高干、军干子弟，曾受到毛泽东肯定的最早的老红卫兵。他们发现自己烧起来的“天下大乱”之火，烧着自己的父辈，连自己也成了“黑帮”、“走资派”的“狗崽子”；由于长期自命为“天然接班人”，于是把出身不好的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看成“狗崽子翻天”，他们只能利用“血统论”组织起来自救。其政治纲领，是反对中央文革和“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注]

他们一方面与首都“三司”蒯大富等进行辩论，一方面骑着自行车穿越北京大街，呼口号、散传单、贴标语，“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批评当前运动过火）”，“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但他们也是采取武斗的方式来制止打砸抢行为的。12月中旬到1967年1月上旬6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联动被抓人员，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要“火烧谢富治”。他们联合了全国遍布上海、沈阳、武汉、长沙各地、上百所学校的红卫兵，共同用“四大”武器反对中央文革。他们虽然拥有较多的消息来源，丰富的政治经验，却囿于保父并自保的个人立场，只能逆潮流而动。他们的行动因此受到绝望情绪的支配，知其不可为而为，难免有些显得过火。

由于联动的活动干扰了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战略部署，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说：“‘联动’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红旗》杂志同年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也断定联动是“反革命组织”。被安上“刘邓反动路线的忠实走卒，其矛头直接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指向中央文革，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革命造反组织，指向革命群众”的罪名。清华大学、北航等校红卫兵在中央文革授意下捣毁联动的“据点”，举办“联动罪行展览”，抓捕139人。4月22日得到毛泽东下令后释放了联动成员。5月29日以联动为核心，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红卫兵万岁”的红卫兵一周年纪念会。作为组织的联动从此结束了活动。而个别成员的活动则维持到了1968年春夏间。

在各地，都有类似联动的组织：沈阳“红后代”、武汉“三字兵”、济南“黑字兵”、武汉“特动”（“武汉特别行动委员会”的简称）等。他们也先后遭到了镇压。当年，笔者曾亲眼看到失意的联动成员怒气冲天，把其父的呢料将军装、佩戴的刺刀，裹在大衣里，在同伴面前示威、泄愤的情景。

因北京八一学校学生被认定是“联动”的主体，学校被停办了。

他们中的少数人分配工作、上山下乡时，档案里都被注明“联动分子”、攻击“中央文革”。一些人为了避免麻烦，脱胎换骨以别样面目仕进而改名换姓。但其中真正的中共高干子弟由于是“自己的孩子”，文革后仍被列入第三梯队名单，委以重任。

[注] 可以参见资料《有关联动（老红卫兵）的历史原始资料收集了如下文献：《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内容介绍》、《给三十一中〈东方红〉的恐吓信》、《最紧急通告》、《周总理在八一学校参观“联动罪行展览”时与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同志谈话纪要》、《自来红们站起来了！》、《做顶天立地的人》。

（参考资料：江沛《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三联书店[香港]1993年版）

## 粮票

名词。1955年—1993年间中国大陆购买粮食和粮食制品的凭证。这是适应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采取的配套手段；实行凭城镇户口、按人定量供应粮食的办法，粮食关系与户口紧密挂钩（公安部在人口统计中把吃国家供应粮的城镇居民划为“非农业户口”）。1953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

从此全国统一实行粮票购粮制。

最初的粮票采用 16 两制计量，1959 年改为 10 两制计量，从 1985 年起改为公斤制（公斤和市斤并存、混用）。面额有半两（很少）、壹两、贰两、伍两、壹斤、贰斤、拾斤，甚至百斤、千斤（很少）的。全国有通用的全国粮票，有限在省、市、县使用的地方粮票。还有军用粮票，个别区镇、农场、学校、工矿发行了区域、单位内使用的粮票。需要到异地出差，就要通过相应审批手续，把地方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兑换时按 25 斤比半斤交食油票）。

粮票的发放，凭户口登记簿申办的居民粮食供应本，按月在户口所在粮店领取。粮食定量为：居民 23 斤，干部 26 斤，中学生 32 斤（凭入学通知），特殊工种如炼钢工人基本口粮加工种粮定量可达 45 斤，煤矿工人最高定量 57 斤。到粮店买粮，或进饭馆吃饭都必须凭粮票。1961 年夏吴宓到广州探访陈寅恪，陈就信函告吴，“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事见刘以焕《国学大师陈寅恪》，重庆出版社 1996 年版）。笔者下乡插队时，就常收到父母兄姊周济的粮票。

粮票票面设计均采取线条装饰图案，粮食发行机关印章均为方形，每套票的票幅规格一样，粮票的上边一般有齿孔。1967 年—1977 年间粮票也充满政治色彩，大都使用了“革命委员会”印章；票面以“革命圣地”（韶山清水塘、橘子洲头、延安宝塔）、“工农兵高举毛泽东著作”、“红卫兵大串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象、毛主席语录或“最高指示”（“必须把粮食抓紧”等）为装饰图案的主要表现内容。票幅最大的是 1957 年国家粮食部发行的“军用定额支票”，四枚票幅一致，均为 150 毫米×67 毫米，竟与信封差不多大小；而最小的则是浙江省发行的 10 市斤粮票，为 8 毫米×9 毫米，只有指甲盖大小。

由于粮食紧缺，红薯、玉米粉等粗粮也经配搭进入城市用粮的供应范围，只是需按 5 斤红薯兑换 1 斤细粮的比率兑换。孩子多粮食不够吃的人家愿意与不愿吃红薯的人家交换。有人在黑市上买卖粮票，赚取差价以牟利；成为部分无业者的谋生手段。这样的交易被称之为“投机倒把”，是列入打击对象的。轻者行政拘留、没收非法所得，重者判处管制、劳教、有期徒刑等。3 年困难时期有人因为饥饿画粮票而获罪。

1993 年取消粮票后，它虽然失去了使用价值，却被一些人用于收藏，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集粮市场。一般的市价每枚 5 元到 300 元不等；辽宁省 1955 年发行的第一套粮票，2004 年市价超过 1500 元。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集粮票协会，民间还不定期出版《中华粮刊》、《粮票》等集藏刊物。

据报道，福州南公小区的吴翊斌就藏有江苏高邮粮食局于 1970 年发行的棉值 2 市万斤的粮票，它是“高邮县粮食指标划拨票”，背面注明了“此票只在本县内各企业向粮食部门或粮食部门内部指标调粮使用。使用时必须凭粮食局证明到指定点才能有效”。全套粮票共 9 枚，面额从 500 斤到 2 万斤。类似粮票当年江苏宝应也曾发行过。江西省 1968 年版 2 斤错票，因票面上“备战、备荒、为人民”中的“荒”字印错了，将上部的“芒”印成了“芸”，有关部门责令将印好的票样销毁，但仍有不足 10 枚流落在外，现已成为文革粮票中的特级珍品。武汉市 1969 年 5 市斤粮票，票面为一艘大海中航行的轮船，与林彪“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题词映照，文字和图案一致，形象艳丽生动，和毛主席语录并列，称为“双语”票证。因林彪倒台、粮票废弃日久，“语图同题”票证的市场价格攀升不已。

（参考资料：姚高梧《粮票收藏与鉴赏》，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杨亮

《粮票：收藏投资两相宜》，《光明日报》2004年11月16日）

## 姚文元

（1932— ）浙江诸暨姚公埠镇人。中国当代文艺评论家，政治活动家，中共文革的意识形态主管，被公审判刑的“四人帮”之一。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曾在中国作协、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1955年批判胡风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文艺报》1955年1、2期合刊）引起张春桥注意。

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并讲话，新华社发了电讯。他对照《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三报刊发同一电讯的不同编排形式（铅字、标题的大小、位置的安排等），写出《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的千字文，刊于《文汇报》。毛泽东对此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加编者按予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全国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这成为他在反右以前的高调亮相。后来丁玲、冯雪峰、秦兆阳、李何林、巴人、周谷城、许杰、王若望、方纪、钱谷融、刘绍棠都挨过他的批判。

1965年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注]（《文汇报》11月10日）、1966年发表《评“三家村”——的反动本质》（《解放日报》、《文汇报》5月10日），成了揭开文革大戏的序幕，并为文革一系列批判定下基调。此战功成发迹后，从《解放日报》编委一跃而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再跃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6年），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67年；参与上海夺权）、中共九届（1969年）、十届（1973年）政治局委员。任《红旗》杂志总编、主管意识形态（1970年，接替倒台的陈伯达）；参与组织了批林批孔和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是“池恒”等御用写作班子主管。著有《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1975年第三期）。是刀笔文人出身的“当代英雄”。

1976年10月被捕。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姚文元辩称，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而非反革命罪行，“同林彪、林彪的反革命罪行挂不到一起”。

在狱中是“四人帮”里锻炼身体最积极的一人，身体亦佳。1986年其母周文修为继承父亲姚蓬子遗产激起家庭风波，他写信给妻子动员她让步；终致平息。

1996年获释后，先后在上海川沙、青浦隐居，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撰有42万字回忆录，从1956年写到1976年被捕为止。三家半官方出版社意欲以500万元买断版权。得到“五不准”批示：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又写了5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相当于回忆录的缩写本），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网上多有转载。

据传，江泽民曾批示“不宜出版（回忆录）。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按

月发放给 4000 元养老金。

[注]据考证柯庆施当时已病重治疗，人不在上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诸多要人是亲自参与讨论的，文章写作过程并没有叶永烈先生渲染的那么秘密。……不仅陈丕显和曹荻秋诸公曾经亲自参与讨论，他们看过并对这个文章没有什么异议，这才公开发表的。”（老田《陈丕显、曹荻秋曾参与讨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载于“乌有之乡”“文革专题研究”

（参考资料：于福存等《人民的审判》，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姚文元新撰爆历史真相》，2003 年 12 月《动向》杂志）

## 中央文革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简称。《五一六通知》规定它“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简称十六条）赋予它“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的性质。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务的专门机构。由于当时国家、政治的性质，文革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管理文革就几乎相当于管理国家的全部事务。

该机构于 1966 年 5 月 28 日成立。以原《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增加地方负责人，人员计有：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顾问；江青、王任重（中南局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志坚（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张春桥（上海市委文教书记）为副组长；成员有谢镗忠（总政治部文化部长）、姚文元（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力（中宣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主编）、关锋（《红旗》杂志编委）、戚本禹（《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尹达（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考古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穆欣（《光明日报》总编）、郭影秋（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郑季翘（东北局吉林省委文教书记）、杨植霖（西北局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长）等。

同年 8 月 2 日增补陶铸（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任中央文革顾问。穆欣曾任办公室主任。下辖有办事组、接待站、宣传组、文艺组、理论组等。办公地点在钓鱼台 14 号楼。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它主管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事务。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它有了十六条赋予的权力，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毛泽东多次批评国务院工作的老爷作风、畏首畏脚，夸奖中央文革联系群众，“敢”字当头。1967 年 1 月 12 日《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起草）联合署名。“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中央军委，紧跟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当时的政治口号，“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名词。

1966 年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尹达先后在原单位被打倒。担任顾问的陶铸、担任副组长的王任重、刘志坚，于 1966 年 12 月至 1967 年 1 月相继被打倒。1967 年夏秋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被剥夺权力。这是一个人事更换频繁、易于获罪的险地，不少人从这里被投进了秦城监狱（如穆欣、金敬迈、矫玉山、王广宇等人）。

1967 年因“二月逆流”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刘、邓、陶、贺（龙）被打



倒，朱德、陈云“靠边站”，李富春、刘伯承病休，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正受批判，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林、周、陈伯达、康生五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剩下谢富治。中央文革实际上代替了中央政治局，作为砸烂旧国家机器的过渡代用品，完成了毛泽东以其秘书班子取代规范化国家权力体制的过程。

同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权威至高的领导机构：“中央文革碰头会”。该碰头会成员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周恩来参加。

中央文革的作为引起了联动等组织和社会力量公开或私下的批评、反对、抵制。为了给天下大乱的造反夺权活动提供安全保证，《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

“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被概括为“恶攻罪”）。但这条规定的精神后实际上发展到对适用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全体成员（包括中央文革）——“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奉命追查鲁迅手稿到中央文革驻地查勘，被定性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成为他名列“杨、余、傅”集团被打倒的罪责之一。

寄往中央文革的信可免邮资。有一封1967年8月22日到达北京的从山东省寄“北京文革小组”再改寄“中央文革小组”的实寄封没贴邮票——因为革命组织和红卫兵邮寄文革信件的各项邮资规定中有一条为：如寄件人有实际困难要求免费邮寄的，按部党组电党字第07号密电办理，即可免费，但不必对外宣传。

1969年中共九大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文革最后五位成员全体进入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复正常活动，权力运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自动消亡。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这个《通知》（五一六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认定：“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而此前，在九大上进入政治局的中央文革的成员都被判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或受到不公开的批判（陈伯达、康生）。

（参考资料：郑德荣等编《新中国纪事1949—198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王毅《“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文化基因》，“小雅思想网”<http://www.mlcool.com/info/if001154.htm>；金春明等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 谈心

名词，由动词名物化转变而来。通常与“活动”相连组词。

原义是有亲密关系的个人之间私人性质的交流、恳谈。1960年代以后演化为中共政治思想工作“一帮一，一对红”的形式。从“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资料看，该词1940年代的分布率1.53%（91条），1950年代7.96%（474条），1960年代32.40%（1928条），1970年代29.82%（1775条），1980

年代 20.45% (1205 条), 1990 年代 8.01% (477 条)。1960、1970 年代占了一半多 (1966 年、1967 年造反、派性冲突的高潮期除外)。那时, 先进帮助后进, 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向介绍人汇报思想, 领导向下属了解、解释情况, 做沟通工作, 运动组织者找运动对象吹风、谈话, 等等, 都称之为“谈心”。属于政治思想工作的常规内容。1968 年时毛泽东说, “开展谈心活动, 这个方法很好”。使它便不但具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而且成为权利的运作方式。开展得最广泛、规范的是在部队。

谈心双方的关系不是平等互动的, 而是单向传递: 一方说服、说教、训斥、命令, 一方接受。通过谈心的双方就建立起了规训与服从的权力关系, 成了权力渗透、控制的非正式渠道。因为被谈心的人知道, 对方不是个人行为、心血来潮, 代表的不是个人意志, 而是组织。这种交往看上去是一对一的形式, 却不是一对一的私人关系, 不就是真的推心置腹、以心换心, 在它平静、温情、融洽的表象背后, 是政治性权力支配关系。使得即使悖离常理、脱离实际的安排也能够在一对一的情况下被迫接受, 各个击破, 得以推行。

官民公私边界模糊的谈心, 在操作上为权力的灵活运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空间。民间交往的谈心和工作谈心并存, 为后者营造了某种具有欺骗性的轻松氛围。开展谈心活动不但是官方标准的工作程序, 还被列入工作计划, 写进阶段、年终总结, 成为先进的经验。当时就有一些对异性抱有好感的青年, 也借谈心的名义“假公济私”地为自己感情走私行方便。

在运动高潮时某人被找去谈心了, 就意味着他有麻烦了。当事人忐忑不安, 小心翼翼地应对, 生怕出差池; 旁观者好奇、打听, 幸灾乐祸。被找谈心者既不能抗拒, 态度不好带来的麻烦有时比具体问题更大, 也不能说啥听啥, 把所有内心话都向组织讲出来, 因为那很容易被人引申出歧见并附会到阶级斗争新动向上去, 给人抖落出来, 制造攻击、批判的炮弹。聪明的办法是随声附和, 虚与委蛇。而某人找谁谁谈心, 就意味着他政治上正处于被信任的时期, 是安全的, 拥有谈话的主导权。

谈心的基本功能是了解情况, 收集材料: 劝说被谈话者端正态度, 配合运动的进展, 接受组织的批评、批判, 为大场面、大规模的批评、批判进行准备, 扫清障碍。谈心阶段, 被谈心者只是处在可能的麻烦边沿, 还不是麻烦的直接现实。此时被谈心者所能做的, 只有顺从, 不能有丝毫反抗的表示。一但出现不满、反抗, 谈心就会迅速演变为实际压迫的前奏、序幕。

(参考资料: 郭俊丰《开展谈心活动好》, 《人民日报》1969 年 6 月 1 日; 新华社《领导班子成员首先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 《人民日报》1969 年 10 月 12 日)

## “宁左勿右”

表选择关系的联合词组, 一种价值取向的倾向性。中共体制内反思习惯使用的术语。据“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提供的资料, 1978 年—1979 年三年的出现频次占 39.53%, 而其余 43 年占 60%; 文革时期 (10 年) 仅 2 条 (4.61%)。

意指由泛政治化思维定势蜕变定型的顽固社会文化心态: 从政治领导人到基层干部、普通百姓, 在策略、行动上, 偏向、主张左比右好的思维定式、经验判断。如, 土改时多划地主富农 (把中农拔高)、多分浮财、吊打虐待, 反右时宁

可多打右派，定罪量刑时宁枉勿纵（如给刑事罪也冠以“反革命”的衔头），统战工作中统左不统右、统大不统小，大跃进炼钢铁粮食增产时放卫星，以左的政治斗争推动左的经济纲领，等等。

由于中国现代化处于后发展的追赶状态，中共领导建立民族国家的解放运动和现代化进程，面临知识、文化、社会组织资源的严重短缺，它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粹主义的风格色彩和宣传手段的生动鲜明；因为它对鼓动、吸引、组织、掌握群众的社会动员，效率极高。认识论上的超前性、极端化是达到宣传效果的好办法。这一套形成传统的方法被沿袭了下来，判断基本政治形势时用阶级分析方法看问题，宁可估计得严重些，不能说无事；确定、处理运动对象，宁可多些、重些，不可偏少、偏轻。为达到预定目标，可以不惜采取包括蛮干、残酷斗争在内的一切手段。

从中共党史看来，“左”的发生率和危害都远远超过了“右”；“左”倾领导人卸任后的党内地位、待遇比“右”倾的好，形成了同为错误，“左”比“右”光彩的局面。有“左是方法问题，右是路线问题”的概括——因为过高的目标、过火的措施，也只是掌握政策的水平、分寸，工作方法得当与否（脑袋）的枝节问题，最多是一种片面性，他们的立场是忠诚的、坚定的、革命的，紧跟党的决策、部署的；消极旁观乃至取消却是立场、态度、感情、路线、组织原则（屁股）的是非问题，冷静独立的理性思考往往隐含着对组织意志的疏离倾向。而基层当权者只需要向上级负责，迎合上级的政治意愿，这实际上是明哲保身的机会主义策略。进一步说，在革命组织的庞大机器系统里，参与者必须作为齿轮和螺丝钉顺势运转，不能容忍齿轮和螺丝钉变成操纵手，不能容忍独立意志的存在。

进入权力体制、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干部，最习惯采取显示革命的宁左勿右立场，哪怕他们的理智很清楚正确的方法是中和、稳健一些的策略定位。对处于竞争状态中的参与者来说，“表现”出革命，比真实对革命有利更重要（有比喻说锦标胜过健康）。因为政治领导人常常看得到的是对权力的服从、立竿见影的外表，而不是需要时间检验的效果。其理论基础是革命作为改变旧秩序的社会变革，就是要矫枉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以上表现在中共历史上源远流长。但在文革这一切被推向了极端化，使它的内在荒谬性完全暴露出来：认定党内走资派形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有完整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以个人集权摧毁、代替原有制衡体制，连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都达不到法定员额（半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砸烂党政系统公检法，社会管理、生产供应几乎瘫痪；大批判无限上纲造成大革文化命，到处都是黑线专政，文化上寸草不生；阶级斗争观念四处滥用，黑牌大帽乱飞，阶级敌人满地走，草菅人命比比皆是；经济上的高积累、穷过渡，先治坡后治窝，把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对外经援脱离实际，在自己的事情都没办好的情况下，打肿脸充胖子，大把大把人民币换来离心离德（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的反目）。

如果这种政策反思、纠偏仅仅被当作危机以后社会修复的必要阶段，却不涉及制度本身及其内在机制的探究、矫正，往往容易成为新一轮循环的起点。

（参考资料：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王若水《左倾心理病——范元甄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书屋》2001 年第六期）

## 大批判

“批判”一词来源于德语词 Kritik (英语 criticism)。在康德那里，批判是扬弃和理解、超越（否定）和熔铸（保留），“彻底的检讨、反省”，“独立于所有经验去追求一切知识的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它主张一切事物都必须接受理性的审查。其本意包含有分析、探讨、评价、判断等多方面内容，可以偏于肯定性的，也可以偏于否定性的，或两者兼有；否定性的也可引申为批评、谴责的意思。词性为中性的。王国维译为“批评”，胡适译为“评判”，北京大学胡仁源译为“批判”，贺麟译作“论衡”。后来“批判”成为公认共用的定名译法。

1957年反右运动中成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的核心“大批判”，即以权力为背景、倚仗而非以事实、逻辑为归依的政治审判、裁断。“批判”被冠以“大”的词头（政治运动要“大搞”，阶级斗争要“大抓”，生产速度要“大上”，人民公社要“大办”，钢铁要“大炼”——已经成为一种修辞、思维定式），使它超出说理、论理范畴，成了用阶级斗争眼光看待一切，情绪化、非理性的政治斗争、群众运动。其表现形式是批判斗争（简称批斗）。在基层单位对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进行批斗，除了乱扣大帽子（对领导有意见就是反党）的政治审判，还伴之以辱骂、体罚，挨批者只能唯唯诺诺、丑化自己。在报刊广播媒体上万人同声的口诛笔伐，没有一点杂音。

作为政治化的话语方式，1966年以前就已经成型、普及，计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4）、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1955）、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1957）、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批判（1965）等5次大批判（见周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1965年11月29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6年1月1日）。有人把它的特征概括为：群众运动，一哄而上，乱拳锤打，践踏说理的基本规则；不顾批判对象的实际，断章取义，深文周纳，无限上纲，甚至随意虚构对象文本，怎么耸人听闻怎么编造；以政治正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敌我界限为判断标准，不用事实和逻辑讲道理，以人划线，权势压人（1949年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将胡适、傅斯年、钱穆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1955年定胡风为反革命集团的也是毛泽东）；不容申辩，哪怕顺着批判势头的自我贬损也被认定“假检讨真反扑”，越批判调子越高，必欲打倒为止。

文革时期十六条把大批判规定为文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斗批改的主要阶段，两报一刊甚至专门发了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1969年8月25日）。并把它确定为文科大学的教改方向和内容。大批判被加上“革命”的定语后，更加恶性发展到打倒一切、以言杀人的地步。虽然语气、措辞、逻辑、分析方法、视角与文革前一样，但大批判的战场由报刊、学术转向社会生活，对象指向从官员到历次运动挨整者、普通百姓，战线散乱，到处开花，除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本身无人可以幸免。今天批判人，明天被批判。阶级斗争的敌情观念成为左右大批判方向的神经质主宰。“大批判开路”非常形象地描写了它在当时所起的荒唐作用：为政治上的前面整肃清算提供民意—舆论合法性支撑。《炮打司令部》（毛泽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戚本禹）和姚文元文章（批《海瑞罢官》、三家村、周扬、陶铸），可入选大批判经典。

群众性大批判的战场由报刊、学术转向社会生活，被暴力化的大批判直接成

为政治运动本身，大字报、大辩论、声讨通电、传单标语口号漫天飞，高帽子、黑牌、批斗砸烂了党和国家行政机器。天下大乱。甚至形成各说各话的群众性派别组织（大字报、大批判的文斗成为日后武斗的前期准备），看似这一切出于自发，其实仍然是使用着统一的官方意识形态（指责对方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仍然听命于中央集权——中央文革指示、两报一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联名通令指挥、控制着一切。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时人人过关的斗私随时可以迅速发展到批修，再没有人民内部与敌我矛盾的明确界限。

1970年代大批判出现正规化趋势，各级党政机构都设有专业的大批判组。其中最著名大批判组的有梁效（清华、北大两校）、罗思鼎（上海市委）、池恒（《红旗》杂志）、唐晓文（中央党校）、初澜（文化部）、洪广思（北京市委）等。他们不但通过“评法批儒”、“全面专政”等意识形态美容术，为造成文革社会震荡的政策修补合法化，而且给邓小平收拾残局的整顿制造麻烦，使震动进一步制度化。

后文革时期，人们清算这一话语方式时，认为它是“文艺以至整个思想战线上的‘打砸抢’”；把不讲道理、权势（政治权力、话语权力）唬人、唯我正确（革命）、泛道德化的话语/论证方式，称之为“大批判”。其中有愤怒、轻蔑、无奈和残留的恐惧。坚持一元化真理观的排他性论证（以人划线，唯我独革，党同伐异，以论带史），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大批判基因。而明火执仗地以大批判相标榜的多半是用戏拟方式开玩笑，以加强修辞效果，吸引受众眼球。

（参考资料：陈兆福《一词之译 七旬 半世纪（之一）》，载《博览群书》<http://www.gmw.cn/02blqs/2001-05/07/03-229EC4364616340548256ABF002C6354.htm>；李评《彻底否定“大批判”》，《人民日报》1984年9月21日；申涛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清算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反革命罪行》，《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7日）

## 公安六条

名词、文献名。即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内容分为六条，所以简称“公安六条”。这是为了保证文革全面夺权的顺利实现而制定的。

第一、第三至六条规定，依法惩办“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群众组织，保护左派……依法惩办“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的操纵者”；地富反坏右“不准串连，不得混入革命群众组织，更不准自己建立组织”；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党、政、军机关和公安人员，如果歪曲以上规定，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

其中第二条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甚至扩展到适用于各级当权者。不仅适用对象一扩再扩，适用情节也一扩再扩，成为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无所不包的，能够有效镇压抗拒现实、

持异见者的东西。该条是为公安六条的核心。

第四条首次提出了一个 21 种人的名单[注 1]，红卫兵、造反派早已开始大规模地把这类人被赶出城市，送农村监督改造，得到了来自政府“法律”的肯定。1969 年 10 月根据“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在极短的时间内又实施了遣返。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 33695 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 85,196 人被驱赶出城。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都市蔓延，多达 40 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日文版，1997 年，1068 页）不少被遣返的人在遣返途中便被折磨致死，无法进行统计（王友琴）。

这一政策支持了此前红卫兵的任意扑杀行为[注 2]。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并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才有后来湖南、广西惨剧的发生。1968 年湖南道县（邵阳）发生的一连串集体屠杀，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群众组织将这“21 种人”及其家属定名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屠杀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

这一法规性文件，没有通过规范的立法程序，仅仅用一个临时性规定就把“以言治罪”、思想犯罪制度化、法律化，成为打击异己势力的方便法门。“合法”扩大了法律打击对象的范围，并规定“革命群众协助和监督公安机关执行职务”，为执法权的流失、滥用（群众专政）提供了根据。是政治权力非程序更迭时维系脆弱的政治合法性的极端手段。文革中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依据的就是这一文件规定。其条例的有效性一直延伸到了它被取消的时候。有人判定，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把‘因言获罪’明确写进法律”的一例。[注 3]

1979 年 2 月 17 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公安六条》。

[注 1] 21 种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注 2] 据不完整统计，仅在北京，从 1966 年的 8 月 26 日到 9 月 1 日，每天有数百人被打死：8 月 26 日，126 人；8 月 27 日，228 人；8 月 28 日，184 人；8 月 29 日，200 人；8 月 30 日，224 人；8 月 31 日，145 人；9 月 1 日，228 人。

[注 3] 而在《新闻出版法》制定以前，很难从制度上根绝“以言定罪”。

（参考资料：李谷城《中国大陆政治术语》，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蒙泰尼里神父《“文革”绞肉机与“公安六条”》）

## 康生

（1899—1975）山东省胶南县人。曾用名张宗可、张耘、赵容等。社会活动家。中共党内的理论权威（圈内人称“文胆”）、国际关系专家。中共中央悼词称他为“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1924 年进入上海大学读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五卅”运动罢

工委员会工作，是1926—1927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在上海工作期间，担任过上海总工会干事，上海大学特支委员会书记，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等区的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秘书长。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后任中央组织部长并负责中央特科工作。1933年起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工作（更名康生）。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37年回国后背叛王明，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长，中央组织委员会副书记。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1943年7月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把大批中共干部打成“特务”、“叛徒”、“敌探”，协助把延安整风变成一场重新站队的政治迫害，以清扫王明残余影响，确立毛泽东权威。在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45年）。

解放战争时期和1949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三届、第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谴责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参加领导中共九评起草工作，发起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的批判，最先发明《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

1966年初揭发“二月提纲”是“阴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等职务。把聂元梓大字报底稿交给在杭州的毛泽东，促成了它的公开发表。参与、领导了对高干的诬陷、清洗，捏造贺龙“二月兵变”，授意红卫兵追查薄一波“61人叛徒集团”，他领衔的“内人党”专案有34600人被诬陷、16222人被迫害致死，提交72%中共八届中央委、候补委员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有历史问题”者的名单；在刘少奇专案中起主导作用。中共八大、九大和十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届一中全会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届、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70年身患癌症，1975年病重时委托人（王海蓉、唐闻生）向毛泽东揭发江青、张春桥变节问题。同年12月终于不治。

1980年10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公布其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

能书（尤擅草书），善画（笔名“鲁赤水”）、治印，藏有大量善本图书、古代绘画、瓷器、青铜器、砚台等文物（有人指控他从文革抄家物品中搜刮了不少），精通俄语、德语，曾兼任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1915年经父母做主娶陈宜，育有一子张子石（曾任杭州市长）、一女张玉瑛；1927年与曹轶欧结婚，无出。

（参考资料：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康生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 万寿无疆

崇拜语言。原本是中国古代用于祝寿的话，后被专用于皇帝。文革中被专用于对毛泽东的祝颂词，广泛应用在各种公众场合。相当于“万岁”，又比“万岁”正式、文雅、狂热。把“万岁”与毛泽东连在一起约在1940年代的延安，把当

时认为略含封建色彩的“万寿无疆”与毛泽东连在一起却始自 1966 年。1990 年代后此语亦可略带调侃地用于平民。

源出《诗经·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毛诗正义》对此疏注说：“予尔万年之寿，无有疆畔境界，言民神相悦能以多福也。”这是用来祈祷封建统治阶级中上层人物永远长寿，生命永无穷尽，政绩昭著，权力永固，生产阜盛，享有人间所有尊荣福祉的高级颂词。两汉以后它逐渐发展成为只适用于歌颂皇帝一人，顶多偶尔可用于皇后或嫡亲亲戚（太上皇、太皇后）。否则就是僭越大罪。至 1911 年推翻清王朝后此语已被废弃不用。

它的再度流行是在 1966—1970 年左右。是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上的规范语言：“首先（或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共同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大概人们感到继续用“万岁”已经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敬仰之情了。最早示范性地使用这一祝颂词的，是《人民日报》1966 年 7 月 26 日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亿万人民怀着最亲切最激动的心情，为毛主席的健康同声欢呼，衷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社论是以顺应消息里群众性欢呼的民意方式提出此一祝颂词的。由于《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辐射能力，这一久违了的语词再次被激活在现实生活的政治语境中。

当崇拜激情达到高潮，如红卫兵得到毛泽东接见时，就会忘情地反复呼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其节奏为：××××|××××|××××  
×××××|××××  
— — — — == == == == — —||。仿佛一切语言都失去了意义，只剩下这符咒般的山呼海啸。没有人觉得滑稽可笑，更不会和封建时代的朝觐祝祷联系起来。有人回忆说“喊‘万寿无疆’的同时必须挥舞‘毛主席语录’本”。

1967 年 1、2 月全国到处张贴的《特大喜讯》，宣称“最近通过各科医生的认真体检，毛主席可以活到 150 岁”。其时，闻者无不为之热泪盈眶，奔走相告：觉得无产阶级革命江山终于有保障了。中央首长每接见红卫兵讲话亦必报告说：“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

当时的公众场合，如会议仪式，早请示晚汇报、讲话、写文章，私人场合如写家信，都要使用这种仪式性的祝颂词。表情庄严肃穆，不厌其烦。学校的英语课也教“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据说表达不及中文的文采斐然）。“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还经常被套红印在报刊的通栏大幅标题上，每页信笺的天头；更用油漆涂写在红底黄字的粉墙上，融入红海洋。

（参考资料：陈国弘《成语语源典故词典》，岳麓书社 1988 年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后记》）

## 永远健康

动词性偏正词组，一般是外交场合对对方国家元首表示敬意的礼仪性祝词（祝酒）。在中国国内与“万寿无疆”并用，却又次一级的祝颂词，是文革时专用于林彪的。因为当时林彪已经取代刘少奇、占据了中共第二把手的地位，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文革的坚定支持者、可能的接班人。《毛主席语录》前有林彪



的《序言》、手书题词，有为林彪语录谱曲的语录歌（如《老三篇》），红海洋也到处有林彪“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手书题词。

那时在公开场合的讲话或早请示、晚汇报仪式或文艺演出闭幕式上都常有这样的陈词：“首先让我们大家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有一种对称、绵延的修辞效果。最早见于1967年3月4日的《人民日报》报道，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在庆祝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里使用的。官方引导在前，民间响应在后。

1967年6月16日，林彪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与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帮助注意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周恩来表示林彪此信无必要。中央文革小组专门讨论这封信，决定尊重林彪本人的意愿，其后官方报刊上基本没有这样的宣传了。

此举虽然一定程度表现出林彪的机警、惶恐、谨慎、谦恭，但在群众场合和民间的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上，仍然是两个口号并提、并列。并被引以为对林彪的崇敬和尊重。随着1968年全国革命委员会成立、1969年九大召开，新的政治合法性确立，个人崇拜的效用递减、退潮，渐趋消失。直至1971年林彪遽然在中共权力舞台失踪才正式被废止。因此仅从媒体上搜寻该词存活的时间只有几十天，而实际上可能长达2年甚至更长。后来“永远健康”成了林彪带有讽刺、诅咒意味的代称：“9.13”以后就有人幸灾乐祸地说“‘永远健康’摔死了”。

（参考资料：新华社《人民解放军坚决遵循毛主席的教导 坚定地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 杨得志同志在庆祝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7年3月4日；“千龙新闻网”“文萃”2004-12-05《历史揭秘：林彪为什么不让祝他身体永远健康》）

## 四大件

名词。俗称“三转一响”的合称。1950—1970年代中国人习惯地将耐用消费品消费的社会热点归纳成这“四大件”：自行车（最普及的百姓交通工具，名牌有“永久”、“飞鸽”、“凤凰”等）、缝纫机（“标准”、“蝴蝶”、“蜜蜂”等）、手表（“上海”、“申花”等）、收音机（“红灯”等）。曾经风行了30年不变。是否拥有“四大件”也就成为评价个人财富、社会地位的重要尺度。因为在低工资高就业、只能满足温饱的物质条件下，这些东西已经算是超出生活必需范畴的高档奢侈品了；成为部分重视世俗生活的人们生活理想。

从描写生活形态的概念体系看，当时也只有“生活水平”这样的词汇，被用来衡量地区间的收入、物价、消费状况方面的差别。像2000年代前后普遍使用的“生活质量”概念，那时还是一个遥远而奢侈的梦想。

一些姑娘出嫁前就以是否男方拥有这几样作为衡量其是否有经济实力、个人能力、家庭前景如何的指标（聘礼）[注 1]。仅仅买这些商品的 400—500 元人民币（不包括其他结婚购置），就大约要花掉一个处于婚龄（23—25 岁）的中低收入者（每月工资 26.5—32 元）2—3 年或更长时间的积蓄（恩格尔系数在 60—70%之间）。能够提出这样条件的姑娘，其自然条件（模样）、操持家务的能力、娘家的经济条件都会超过平均水平。除了农村没有这样基础，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也不是所有姑娘都能这样要求的。经济富裕、子女少的家庭，这笔嫁妆由父母资助，或以不收生活费的方式帮助子女攒钱成家。一直到 1970 年代末期“四大件”的普及程度才开始有了明显改观。

而且人们的价值观中，对物质的要求既不高、也是很次要的。个人对社会的无偿贡献被赋予更高的评价。社会舆论的主流不但不支持提出并以是否拥有为取舍标准的婚嫁观，还多少有些微词甚至严厉的批评（尤其在思想比较左的人们那里）。典型的婚礼公告仪式是散糖（多则一小包：2 支烟、10 颗糖，少则 2、4 颗糖不装包），没有婚宴。在当时的婚姻市场上，对家庭出身的要求，就超过了对“三转一响”的要求。配偶是否红五类、政治历史是否没有污点，将涉及到夫妻乃至子女的安全和发展等更为长远的利益。

即使在那样否定物质利益、贬斥人性欲求、思想高度禁锢的年代，人们的本能还是会在私生活领域里的人生转折点有所希冀。就是类似“三转一响”“四大件”这样对生活质量的渴求，成为最终推动僵化社会秩序瓦解、告别短缺经济时代的人性杠杆。

由于市场广阔、需求持续旺盛，四大件货源的组织就成了商业部门节日供应格外挠头的重角戏。一直到 1980 年代都还是城乡市场追捧的抢手货。

到 1980—1990 年代中期“四大件”已经升级为电视机、收录机、冰箱、洗衣机，而且许多进口品牌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2000 年代则更升级到了空调、电脑、手机、汽车[注 2]。与此同时，量度社会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据世界银行测算 1998 年上升到 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也接近国际警戒线的 0.5（《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调控措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载“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活动回顾”）。“四大件”倒不象以前那样普及，加上物质消费（家电、家具、婚纱照、婚宴、旅游）的攀比，结婚费用对多数人都膨胀到可怕的一个预算了。

[注 1]与传统聘礼不同的是，这笔聘礼不是送给新娘父母作为抚养女儿的补偿，而是作为新婚夫妇小家庭的共同财产。

[注 2] 1950—1970 年代四大件消费水平基本是“百元级”，1990 年代中期消费水平升级到“千元级”，1990 年代后期升级到“万元级”。

（参考资料：李玉强《“四大件”今非昔比》，《解放军报》2002 年 9 月 23 日；《中国百姓蓝皮书之四——生活质量》，《北京青年报》2002 年 7 月 22 日）

## 孙玉国

（1941— ）辽宁沈阳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1961 年参军。

1969 年 3 月 2 日中国军队巡逻队在珍宝岛（0.74 平方公里）与苏军旷日持久的摩擦升级为正式冲突，双方均有人员伤亡。战场指挥官分别是苏方的上尉斯

特列利尼科夫和中方边防站副站长（连职）孙玉国。3月15日冲突规模扩大，中国军队共打死打伤苏军60余人（击毙38人），击毁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一辆。苏军上校列昂诺夫、中校杨辛被击毙。战场击毁的一辆T62坦克如今仍被放置在中国军事博物馆的陈列室内。

1969年因中苏边界珍宝岛战争中的出色表现成为“九大”代表，并代表军队登台发言。与毛泽东等主席团成员握手。随着新闻报道和九大彩色文献纪录片的放映，名满全国。1969年9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他和10位同志“战斗英雄”称号，从连级干部直接被任命为边防团副团长。随英雄事迹报告团在全国巡回演讲珍宝岛战斗英雄事迹。1973年选为中共十大主席团成员、候补中央委员，被破格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74年又被提拔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此时年仅33岁。1974年在中央第三期读书班学习（人称“虎班”）期间，经王洪文批准带领第九组学员来到总参谋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可能调任副总参谋长的传言激励下积极“放火烧荒”，煽动揭盖子。1975年当选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1976年列名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委员，并在丧礼上吊唁守灵。被“四人帮”组阁名单被安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四人帮倒台后经过三年停职审查，在被揭发批判中检查检讨，被认为态度是好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免去其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职务。1982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纪委批复其审查结果：经中央军委批准，同意你们对孙玉国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按正团职作转业处理。

转业后分配到沈阳军区后勤部门所辖7446兵工厂（地方名称“松辽特种汽车修配厂”）担任副厂长。1985年7月参加锦州全国厂长统考合格。1988年1月3日调到3301厂（全厂4000多人）任第二厂长。1991年调到沈阳金城电子大厦任副总经理，而后又担任过沈阳军区后勤部经贸局政治部副主任、工会主席、军区后勤部经贸局副局长（副师级）。

与其妻孙国珍育有一子一女。2001年退休。2002年重返珍宝岛凭吊时表示希望死后埋骨珍宝岛。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动荡岁月秘闻》，内蒙古百花出版社2003年版）

## 刘春华

（1944— ）黑龙江泰来县人。1959年就读于鲁迅美术学院附中，1963年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1967年6月创作油画《毛主席去安源》，10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经江青签阅，迅速被制作成各种印刷品发行（随《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发送），印量达9亿多张，被认为“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并被赋予“开创了无产阶级美术创作的新纪元”的意义。发表创作谈《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人民日报》）。文革后曾受到国画名家石鲁、叶浅予、《美术》杂志等批评。

1968年分配到北京市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在三结合中成为副总编辑、北京市委委员，1971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外事活动常以“文化界代表”、“中国美术工作者”、“有关方面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各界人士”名义出席、见报。曾建言解脱了古元等老一辈画家，保护了一批古代绘画，批“黑画”时对李苦禅、

黄永玉等作品进行了批判。据称因发表与江青意见不合言论失势。1977年创作油画《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由多家出版社出版。

曾任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画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擅长人物，兼及山水、花鸟。

在北京出版社从事编辑设计工作时，所设计的书籍曾参加“莱比锡国际书展”。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被收藏。多次出访、举办展览及讲学等。其国画创作广采博收，作品深沉含蓄，笔墨洗炼。中国画作品《春必将至》获北京市优秀美术作品奖。1990年出版《刘春华画集》。获“97’中国画坛百杰”称号。

1995年10月，他将《毛主席去安源》油画拍卖605万元。由此陷入一系列诉讼：被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教师郝国欣时任展览总美术设计、李绍洲诉侵犯著作权（共有）；国有资产管理局认定该画为国有资产，作出将其收归国库的行政裁定；中国历史博物馆亦将刘春华告上法庭，要求将此油画归为馆藏。成为轰动中国美术界、司法界的公共事件，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

（参考资料：《新中国美术图史》陈履生、王明贤、严善錞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员冬鸣《的作者刘春华》，原载《女友》，收入温乐群等《动荡岁月秘闻》；“《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油画所有权属于国家》，“东方新闻”2002年4月2日）

### 《毛主席去安源》

油画作品名。以毛泽东到安源组织工人运动（1921年）并举行安源罢工（1922年）[注1]为表现题材的油画。该画被称为“开创了无产阶级美术创作的新纪元”，文革期间在中国美术界具有和样板戏一样的地位。

它是江西省安源煤矿筹办“毛泽东思想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中的一幅画。交由偶然介入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生刘春华参与执笔创作。1967年10月该画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首度展出。次年5月《人民画报》以“毛主席去安源”为名、用彩色夹页首次发表了该画。1968年7月1日经当时江青批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再次以彩色单页形式隆重、热烈、公开发表。署名为“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刘春华等执笔”。该画的单张彩色印刷数量累计达9亿多张（不含转载），被认为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当这幅画的印刷品送到各个基层单位的时候，到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组织“敬迎宝像”，比“喜迎芒果”闹腾得还凶。

该画采用左右对称的图式构成，青年毛泽东占据了画面中心位置，身后是翻滚的乌云，沉降的地平线使群山显得低矮。他身穿长衫，手拿油纸雨伞，徒步走向安源。虽然山风吹拂着长衫，但身体结构的轮廓一点也没有得到体现；地上的草丛就像笨拙的工匠式描画，只好用阴影遮盖幼稚的技法。该画1969年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馆藏登记号GB19960。

画作的批判矛头，直指否定刘少奇曾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历史事实，以证实他以前就是一个“叛徒和工贼”，达到彻底打倒刘的目的（文革前侯一民画过一幅《刘少奇与安源工人》[1961]的油画）。[注2]并旗帜鲜明地向世人宣告：毛不仅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对该画的政治意图，1968年第9期《人民画报》曾报道：“在江青同志关怀和支持下，革命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诞生了！这幅油画成功地表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光辉形

象和革命实践，是一幅热情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艺术珍品。”刘春华撰文也反复提到江青对这幅画的关怀。

其后该画被收入全国统一的中小学课本作插图，并被仿制成上百种毛主席纪念像章、石膏工艺品等，广为传播。1960年代杭州东方红丝织厂曾以此画为蓝本出品了巨幅织锦（2.2 x 1.5m），气势雄伟（1992年10月13日在北京21世纪饭店拍卖，以6.3万美元成交）。1968年中国人民邮政还发行了《毛主席去安源》（尺寸：40 x 60mm，编号：文12）8分币值邮票（设计者为孙传哲、万维生、李大玮）。发行总量5000万枚（1997年参考市价110元）。

执笔者刘春华因此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荣誉，曾官至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经常参与外事接待等国务活动。

1980年代曾受到石鲁、叶浅予等名家和《美术》杂志的批评，谨严持重的美术史家也指出“其艺术性远远赶不上‘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些重要的美术作品”。

1980年经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行政负责人同意并履行报批手续，该画被作者取走。1995年10月他将其交中国嘉德公司举行的“95’秋季拍卖会”拍卖605万元（拍得者为建行广州市分行）。再次唤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记忆，并由此陷入一系列诉讼：被郝国欣（时任展览总美术设计的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教师）、李绍洲（文字组工作人员）诉侵犯著作权（共有）；国有资产管理局认定该画为国有资产，作出将其收归国库的行政裁定；中国历史博物馆亦将刘春华告上法庭，要求将此油画归为馆藏。[注3]成为轰动中国美术界、司法界的公共事件，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

200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江西省萍乡市有关部门决定依照该画原作中毛的形象，塑造一尊毛泽东青铜雕塑像，安放在萍乡市安源煤矿新建的广场上。铜像采用芯块树脂砂技术，以锡青铜为材料，重3.7吨，高5.2米，基座高2.8米，整座雕像8米高。2004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央视十套播出的系列节目《记忆·毛主席去安源》，也回顾了该画引起的历史场景。意味深长地透露出转型期社会冲突激起的情绪波澜和官方意识形态诱导的指向性。

[注1]先后参与组织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安源罢工的，还有李立三、刘少奇等人。

[注2]为了赎罪补过，侯一民后来完成了油画《毛主席与安源工人在一起》（1979）。

[注3]法院判定，油画目前存放在建行，其国有状态没有改变，国家财产并未实际受损。因此对中国革命博物馆请求刘春华和建行返还油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指出，刘春华不是油画所有人，不应该将其作为个人所有财产委托拍卖，也不应得到拍卖价款。但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目前已超出通过诉讼追索时效。因此，刘春华不自愿交返拍卖所获收入，法院亦不能强制他返还。

（参考资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易英《从英雄颂歌到平凡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詹建俊《中国油画行情看涨 投资要有技巧》，“艺术之旅”；《毛主席去安源铜像落成》，“商都信息港”

杨荣国

(1907—1978) 湖南长沙人。教授，中国古代思想史家。

七岁丧父，靠亲朋资助读完上海群治大学，在长沙市中学任教。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编辑进步刊物。1939年到广西桂林任桂林文化供应社编导、从事学术研究，并先后在东北大学（暂居三台，与赵纪彬等学术名家同事）、桂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任教授。因《孔墨的思想》成为反孔权威。1953年院系调整后曾历任中山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中山大学党委会委员。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提过杨是反孔的。对他1973年发表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人民日报》8月7日），毛再次评价“杨文颇好”。同年毛泽东又说：“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点哲学可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立刻安排了再版，成为当时罕见的学术书籍。即任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委理论工作组副组长。1974年被安排当选四届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其时受邀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湖南、湖北、云南、广西、山东、陕西）巡回演讲评法批儒，一举成为中国学界最耀眼的政治“新星”。曾动员容庚向“老朋友”冯友兰学习，加入批孔行列，遭到严辞峻拒。

其学术主张本为两汉以后儒法难分，但在学术服务政治的固有观念驱使下，为紧跟当时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形势需要，参加1974年中央科教组法家著作注释会时，提出隋唐世家豪族源于战国时代六国贵族，儒家与世家豪族不分。替汉至唐的儒法斗争是世家豪族和庶族地主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提供了逻辑支撑，成为以儒法斗争贯穿中国历史并延伸到现代的阐释模式的主要设计者之一。1976年提出邓小平是孔老二（搞复辟）、儒家厚今薄古的观点，配合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文革后拨乱反正时期遭到普遍的激烈批评。他连续写出检讨。对于这段历史的官方结论为“为迎合‘四人帮’……需要，不惜歪曲事实，散布了不少错误观点，但未发现……与‘四人帮’有组织上的联系……同意不给处分”。

1974年患膀胱癌，得名医吴阶平主治；1978年终因癌细胞扩散不治逝世。医疗条件随政治待遇恶化而不如当初，从高干病房移入普通病房，识者有寿多则辱的婉语叹息。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唯物论研究》（1940）、《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1945）、《孔墨的思想》（1946）、《中国古代思想史》（1954）、《谭嗣同哲学思想》（1957）、《简明中国思想史》（主编，1962）、《简明中国哲学史》（1973）、《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1973）。

（参考资料：《知名学者杨荣国教授的学术生涯》，中山大校报（新）第75期，2004年7月；温乐群等《动荡岁月秘闻》，内蒙古百花出版社）

## 《我爱北京天安门》

作品名。文革儿歌。歌中唱道：“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红日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因为歌曲旋律清新、节奏活泼，只有9度音域，演唱的适应面广，富于儿童特点，不同于当时占据乐坛的“语录歌”、“忠字歌”千篇一律的进行曲、战歌那样的高亢、声嘶力竭，在当时脱颖而出。因欢快的情

绪渲染契合了儿童的感知、接受特征，而受到他们喜爱。但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制作下，还是被加工成了点缀“镀金的天空”的流苏、金边，服务于爱党、爱国教育的需要。不少人回忆起当年生活，都说是唱着、听着这首歌长大的。

1970年9月这首歌发表在上海出版的《红小兵歌曲》上，1971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1972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北京“五一”游园会专题文艺节目把《我爱北京天安门》搬上银幕，随后录制了唱片，同年被编入国务院文艺组主编的《战地新歌》第一辑。歌曲越唱越红，成为儿童集体演唱中入选最多的曲目，并被编成各种版本的儿童舞蹈。1981年被辑入广东花城出版社《抒情歌曲集》。

这首儿歌经反复使用、加工而成为歌诵性抒情歌曲中的标志性作品，进入了代表那个时代精神的经典作品的行列。被翻译为英文、日文的不同版本。1984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前，美国艺术团在北京演出的第一个合唱节目，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而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美国孩子也用生涩的汉语演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来欢迎他。

后来被多次改编成各种样式、体裁的乐曲（如手风琴、木琴独奏曲、二胡齐奏等）。1973年无锡惠山泥人厂泥塑创作的同题泥人彩塑获得极大成功。还有一些摄影、绘画等艺术样式的作品也借用它来替自己命名，以获得语义双关的修辞效果。

歌词作者是1970年小学5年级12岁学生金果临，曲作者是上海第六玻璃厂年仅19岁的徒工金月苓。金月苓文革后（1977年）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与谭盾、陈佐湟等日后成为著名作曲家、指挥家的学生同学，毕业后任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公司音乐编辑。据1999年的报道，金月苓已创作有各类抒情歌曲二、三百首，其中一些作品获得全国音乐比赛的各种奖项。

美国钢琴家克莱德曼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中国十年回顾音乐会”（2002），就在钢琴、电声管弦乐队合奏中与中国女孩共同演绎了这首乐曲。2005年中影集团与君士传媒计划合作投拍，由梁家辉主演的电影也以《我爱北京天安门》为名。

（参考资料：赵晶《〈我爱北京天安门〉诞生前后》，《南方都市报》1999年6月3日）

## 最最最

副词。与形容词组成最高级形容词组。文革初期广为流行、大量使用的修辞手法。军人出身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较早习惯使用这种修辞手法。因此很快流行到了全国、各阶层。其手法单调而效果强烈（以不变应万变）；反复使用却也令人容易疲倦。其流行期的起讫，集中出现在狂热个人崇拜、急风暴雨式的文革高潮（1966—1968年）。此后这一反语言修辞手法的流行迅速降温。

以“人民日报’47—97数据库”提供的数据看，“最最最”1966、1967年两年（1965年以前不见）出现的频次21%，其余年份的频次2%；相差10倍。而“最最”出现的频次1966年16%，1967年86.81%，1968年11.54%，1969年5.04%，其余年份0.3%。

与单音节形容词结合的构词形式为：最×最×。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林彪）。与双音节、多音节形容词结合的

构词形式为：最最最××××。如，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最最最强烈的抗议。在极端的时候，“最”字的重复选用可多达4个、5个以上甚至更多。

最高级形容词组不加限制的堆砌，离开了汉语传统的表达规范、习惯，成了那个否定理知、准宗教狂热的年代的文风标志。否定知识，否定理性，无需坐标系、参照物来描写，“最”就是简捷而方便的标签，倍数相乘即程度翻番的量度。连用、叠用“最”字的比赛，似乎成了考验革命性强弱的攀比、打擂台。无“最”不成篇，无“最”不成句。这种现象被语言学者称为“同义词重复形式”，成了病态强迫症，让人怀疑说话者是否患有结巴的语言障碍。在这里，“修辞”与“立其诚”的关系，要么是疏离的（有意作假、撒谎），要么是盲目的。吊诡的是，滥用形容词的结果不但无助于表达的加强，反而导致形容词效用和使用者的贬值。

这种修辞手法，集中地侧射出当时那种非此即彼、事事走极端，简单化、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过敏型、神经质的非理性（反智型）情绪化的心理反应模式。带着分析、辨异能力发展不充分，倾向于简单认同的儿童期认知水平的特征。它与阶级斗争的认知模式有关。在这种模式里，敌我双方一经认定，价值取向便被确定：好就一切皆好、最好，坏就一切皆坏、最坏；没有过渡形态、中间状态。在这些词语表象后面蕴涵的思维特征是，用感情好恶代替实践理性，以实用利害代替科学认知，让需要代替事实。

2000年代在语言夸饰成风的情况下，这种修辞语体再度出现，“最最最”与“暴强”、“便宜”、“幽默”、“亲爱”、“简单”、“优秀”词语等组合搭配，已经带有鲜明调侃玩笑色彩，有的竟成了滥情者打情骂俏的习惯用语。

（参考资料：谢云《修饰语的贬值》，《杂文报》1985年8月；刁晏斌《新时期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的融合及其原因》；“人民日报”47—97数据库”；aicaihen《烦金庸不是一天两天了》，“新浪网”“读书沙龙”2004-11-19）

## 毛应星

（1921—1970）毕业于西南农学院林果和蔬菜专业，1957年在兰州农业学校被划右派。贬到甘肃省静宁县农牧站任教师。

在文革时，她公开主张自己的观点，质疑当时被揪出的“叛徒”、“特务”不是因为行为而是口供，指出“顶峰论”是“采取资产阶级哗众取宠、奴颜卑膝地宣传捧场，欺骗人民。……捧场者投革命之机，受损失的还是革命事业和革命人民。包括毛主席自己。”大搞“忠字化”“分明是唯心论”。被宣布为“反革命”，揪出示众，遭到抄家、毒打。她的笔记、在海外的哥哥的信件和集邮册都被当作了罪证。她曾两次上访，表达自己的观点；均被半道抓回。被邻人看作智力有缺陷、不可接触者、不合时宜的人。

1969年1月23日静宁县保卫部根据农牧站上报的材料，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了她。批斗她的黑牌上写着“反革命”、“大右派”、“国际间谍”。同年7月1日被判刑5年，解到“省第四监狱”。在狱中继续书写笔记，重申“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走资派是“无产阶级的英雄”，“奉承的小人，把毛主席包围了”，对林彪的“无产阶级政治”和“无限忠于”提出批判。强烈担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和法制的不完善。并要求将意见向上递送。先后留下了30万字文字材料。

在把杀人权力下放到县级的“一打三反”运动中（1970年4月9日）被判



死刑，4月14日被执行枪决。年仅49岁。刑前被割断喉管。

其夫李如璋（右派）也被判处12年徒刑。

1980年11月29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召开大会为毛应星平反昭雪。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称号，中共甘肃省委追认她为中共党员。

（参考资料：金石开编《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P100；《1980年大事记》，“甘肃经济信息网”<http://www.gsei.com.cn/aboutgansu/gsgk/nianb80.asp>）

## 狗崽子

名词。原指“幼小的动物”（民间多用作骂人的俗语俚语）。文革中用作对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走资派”……一切敌对阶级的子女的蔑称。

在造反将起未起的初期（1966年夏），官方曾有不许狗崽子造反的规定，以抑制造反的势头（后来被当作“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行进行批判）。在揭批走资派的浪潮中，革干出身的红五类失去了天然的保护伞，而以此时是否属于被打倒、革命的对象重新划线。该词流行于文革前期，其实际影响却贯穿了整个文革。此语大量用于大字报、传单和人们的口语中，未见于当时报刊；可见中央文革、官方舆论是不主张的，因为不符合打倒走资派的战略目标。但却可以从此前官方实行的阶级路线中类推、分泌出来。

既然父母是“狗”（革命、专政的对象），子女在血缘延续上就是“狗”的孩子（生物性），因此也继承了同样的阶级本性、思想感情，就成为了“狗”（政治性）。阶级路线本身就包含了社会歧视，但赤裸裸到把人视为非人，确实是文革的伟大进步。喊的次数多了，被喊者竟也有了认同的错觉。

“狗崽子”们受到来自两个生活圈子的同龄社群的压力：学校和邻里。在学校，他们遭到和父母差不多的待遇，被歧视[注]，遭到批斗、毒打，关押进私设监狱，强迫做苦役，还让他们在父母挨斗时参加陪斗、对他们实行抄家；在邻里，他们被排斥在同龄孩子的游戏、交往之外，受到孤立、冷落，遭到无故辱骂，玩具被抢夺……普遍的敌意使他们丧失了少年儿童赖以成长的宽容环境，性格偏于内向，出现交往障碍，形成程度不同的心理畸型。他们中一部分处在黑七类边缘的人参加了稍晚的造反派红卫兵，主张攻击蜕化为特权阶层的官僚队伍（“新生资产阶级”），其激进的姿态更接近文革的本义，成为走资派的克星。对他们所受屈辱的猛烈报复。在农村插队落户期间，招工、参军、升学等返城大门对他们关闭的。婚恋时往往只能在身分相当的自己人圈子里选择，如果越出该圈子就会被视为“高攀”，甚至酿成悲剧。

红五类是阶级路线政策的受害者。他们被当成“狗崽子”，只是受误伤时的落难。是自己偶然落进了父辈构制的陷阱。

文革后随着阶级路线的政策渐次丧失合法性和效力，这些人或进入大学补课，或投亲靠友出国永别伤心地，或因家族渊源做起了生意，或占据社会上科研、管理的各个重要位置，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有的凭借父辈重新获得的权力尽情享受生活、钻营官场，发财显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再年轻的他们，竟戏剧性地成了被时髦女性追逐的“香饽饽”。

[注] 如，开斗争会的时候，“红卫兵”坐在椅子上，既非“红卫兵”又非“狗崽子”的学生坐在地上，“狗崽子”则站在教室前面挨斗；同学们唱《我是贫农好后代》，狗崽子不许唱；在食堂红五类先打饭，狗崽子最后打。

(参考资料：王友琴《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载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1996年版；钟瑜《狗崽子札记》，“铁血读书”)

## 背靠背

名词。名物化的主谓结构短语。一种揭发方法。与“面对面”相对，是制度规定的公开“告密”，在揭发人与被揭发人被分隔情况下进行。被斗者不出场的批斗，也叫“背靠背”(极少)。不同于美国职业篮球NBA赛制的“背靠背”(back to back: 连续两次)，指同样的对手(球队)两天之内在两座城市连打两场。

特指文革的运动中，组织参与者分别提供有关人(运动对象、候选者、嫌疑人)的情况(包括历史的、现实的；大事、小事，乃至因背景不清而能引发无穷联想的琐碎细节；公共事务、私生活)，发表针对他的意见、评论，而不与当事人直接见面的方法。这是运动的初级阶段，为后续的批斗做准备。具体做法，可以是小组会上的发言，口头的直接向组织者陈述，也可以是书面的材料。其时流行、倚重、常据以定案的外调，实际上也是一种广义的背靠背方法。

这种方法特许在单位范围内进行的有组织的揭发、批判，揭发、批判人无需负核实之责，主持人对揭发的基本态度是鼓励、支持、保护、相信。[注]揭发者的行为通常被看成对组织的相信、依靠，因为对组织应该无条件信任，无话不说，是一种亲社会行为。而不是背后打小报告，暗地使绊子、打黑枪的小人行径。而在现代刑事辩护学看来，不出庭的证人证言只能视为传闻证据(效用极低)，因为它无法揭示取证经过和具体背景，难以保证其可靠性、准确性。背靠背做法依据的深层观念是源于中世纪的有罪推定，只要不能你的证明无罪，就将其当做有罪对待(与现代保护被告的无罪推定——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主体有罪的情况下，只能将其当做无罪对待——背道而驰)；把举证责任归于处于不利地位的被告人。它认为程序公正是繁琐的资产阶级法学，只要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公正”，形式、手段是不重要的。

这种揭发方法的功能是，打消了人们在面对面时的不安、顾忌，使人无需为自己说的话负责；让他们为了表现积极，解脱自己，逃离挨斗、受惩罚的危险，陷于无穷的互相撕咬之中。即使有掌握政策认真的人要求严格质证，而未能证实，也只是“好心(相信组织、政治可靠)办坏事”。它纵容了人性恶的急剧膨胀。人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北岛)，这种揭发方法就是给卑鄙者发放并使人陷于卑鄙的通行证、方便之门。这一切更像是一场威慑力巨大的心理战：大家都怕被动，于是疯狂地咬人。表面看上去比当时流行的面对面批斗(常常伴有被认可的暴力场面)的形式易于控制，要文明一些。但是它往往是面对面批斗的前奏、准备和组成部分，并不能避免暴力使用的后果。

由于宁枉勿纵、左比右好的心理定势，相信并不放过所有揭发出来的问题，并采纳为证据进行批斗，或穷追猛打地追究，制造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新的兴奋点、丰富素材和紧张气氛。当事者对任何真实情况的说明、辩白，都被指斥为“不老实”、“狡辩”、“反扑”。尤其是这种揭发方法得来的材料被自动作为控

方证据，在被揭发人没有基本人身权利、没有沉默权保护，被取消自我辩护的条件下，它的杀伤力特别大。对这种方法的肯定、采信，成为文革大量冤假错案的一个证据学上的制度根源。

[注]相类比较：武则天当政期间，采取严刑峻法，大肆诛杀异己。为了挖出、扑灭潜在的威胁，她在朝堂上设置铜匭(类似于“检举箱”)，奖励告密。各地告密的人，不论贵贱，都可亲赴京城，沿途受到驿马和五品官的物质待遇。凡来告密者，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相互不得询问告密内容。

(参考资料：《危楼》第二章 19，转自“榕树下”网站；田文昌《刑辩律师在大要案中的作用》)

## 敌台

名词。与敌方“有特定传播对象、作为情报传递手段、收发电文的无线电台”不同。泛指国外的华语广播电台，主要指称国外美、英、苏等敌对国家和地区(台湾)的广播电台，如“美国之音”、“BBC”(英国)、“莫斯科之声”、“日本广播电台 NHK”、“澳洲广播电台”、“和平与进步广播站”、“自由中国之声”(台湾)等等。这些广播电台所取的政治观点都与当时的中共当局敌对，对中共政策持批评态度；而国外的其他广播电台，如基督教福音电台等，对中共政策基本持中立态度、但意识形态不同的，也被囊括了进来。也可以叫做“外台”(境外广播电台的简称；因为中国的友好国家都没有华语广播，只有敌对势力出于颠覆的用心，开办了华语广播)它们常受到官方机构强大的干扰对抗，如有重大敏感事件(珍宝岛事件、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尤其这样。

由于对宣传舆论和意识形态采取控制政策，普通人无法得到关于现实情况的真实报道。一些有独立思考倾向的知识分子就利用无线电台收听国外报道，以此满足求知欲。这种行为包含了以对现实、官方宣传的不信任，包含了越轨的可能性，因此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因中波的干扰大，只能通过短波收听。[注 1]收听活动多在有单人独住的住户，在夜里进行，由于夜深人静需要把音量调到最小。所以叫“偷听敌台”。一旦这种行为因在言谈中传播消息而被败露，就会被安上“收听敌台”、意图不轨的罪名。轻则得到没收收听工具(矿石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所在单位停止工作、隔离审查、批斗、勒令检讨，给戴上“坏分子”帽子的处理，重的还会被送交司法机关判刑。据学者王友琴报道，上海左树棠“收听敌台案”的自首者无名氏(名培民，姓氏不详)连累案主家被查抄、隔离审查、毒打致死，自己亦被隔离，释放流浪后，终以自杀结局。[注 2]

也有无线电爱好者把它当作检验自己收音机的灵敏度的手段，或因无意、好奇偶然收听，不慎被人发现而获罪的。公开的无线电爱好者就会被列入怀疑者名单，受到经常性的善意劝说、敌意警告和惩戒性盘查。而不被单位组织信任，跻身有瑕疵者行列、在晋升等当口受到额外的质疑、为难，更加是最轻微的后果了。连普通老百姓也认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屡屡告诫有无线电爱好的子女不要去触雷区、惹麻烦。

《韩非子·说疑》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文革意识形态控制的创造是禁其听——禁了听就无法想(心)，无法想就

无法说（言），无法说就无法串联行动（事）。真是极具创意的治本高招。

直到1980年代以后，获取信息的类似控制、禁忌渐趋松弛，尤其是互联网广开信息通道后，这种事情就无人理会，再不会受到以前那样的处理了。但人们还是心有余悸，有种吃禁果的兴奋、战栗。1989年曾有一段短暂而张扬的复苏（收音机销售为之断档），1990年代以来该词已经不见于日常口头语言。

[注1] 买不到短波收音机：出售时带有短波的收音机要拆掉短波部分，留下无害的中波部分。 [注2] 有估计说，“而一般民众偷听《美国之音》与《自由中国之声》广播者已逾亿。”（黎望树《李宗仁回忆录批判》，）编者按：怀疑数字有夸大——说是总人数无疑过大，说是人次数又嫌小了（而且时间的起讫也不易界定）。但无论如何，偷听者累计起来的绝对数应该是很可观的。

## 《少女之心》

著作名。1970年代以手抄本形式在青少年中流传的色情读物[注1]。

该书全长5000—6000字，近似一篇放大的日记。讲述一个少女与三个男人的性关系。她放暑假到乡下姥姥家玩，与外地读书的表哥经常在一起，偶然偷看表哥洗澡，并被其身体所吸引，两人因爱慕而偷尝禁果。后来暑假结束回到学校，又与体育老师发生了关系。后来结了婚仍无法忘怀旧日情事。其中有一些对男女身体器官和性行为的描写。据文革地下文学史家杨健介绍，该小说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时代背景，记叙了主人公（“我”）与表哥认识、热恋，被他所诱惑，肉体接触由远而近，通过两人的三次接触描叙了少女的性启蒙、性经历。作者用有限的艺术语汇讲述她的性恐怖、性经历之后的狂喜，笔调夸耀而张扬，是对“性”的赞歌。忽略其他情节的交代和情感铺陈，而集中笔力专写性事，对性事过程的描写极尽渲染。传抄过程也是该书加工、扩张、变形的过程。有人甚至称其为“性教育手册”。

当年许多初中学生的性启蒙都是通过此书。在文革禁锢、“洁净”、谈性色变的阅读环境中，读到这样的作品，一些学生竞相传抄，并引发早恋风，个别男女青年由此涉足爱河、初尝禁果。被公安部门、负责思想教育的学校、政工部门一致将它归结为青少年滑向性罪错的诱因。为了禁止该书流传，学校经常突击检查课桌，甚至不惜搜书包、搜身以收缴传抄本。对于传抄的首恶者轻则写检讨、处分（记过、留校查看、开除），重到批斗，直至以“流氓罪”被送去劳动教养。反而使此书具有更大的诱惑力。

1998年11月从广东图书批发市场曾流出一种标明“哈尔滨出版社”的，以“七十年代中期轰动中国的禁读手抄本首次面世”相标榜的同名书籍（书号ISBN7-80557-388-4/G·106）。有报道说该书是洁本，其“情节曲折，描写细致，在涉及性知识、性观念、性体验、性行为的地方，用词适当，并无过度渲染和色情的描绘”。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只是假借昔日《少女之心》的名义“谋求轰动效应”、追求商业利润的仿冒作品。

2004年由北京文华图书发展公司（白士弘）策划、摩罗作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少女之心》[注2]曾获准印行，一天销售4000册。但在国内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后，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发文通告“各有关出版社，均不得安排此书出版”。据称该书与1998年的同名书如出一辙。

[注 1] 杨健认为《少女之心》与《曼娜回忆录》(10000 字)是不同的作品(前者专写性事,后者注重情感的反映、变化),但也有人认定两书同物而异名。

[注 2] 有人评论说这本 260 页、10 多万字的书只是盗用《少女之心》的名义,与原作没有关系。小说梗概为:16 岁少女黄永红发现母亲与人“通奸”,写成大字报贴了出去。她与同学男生李国华交往,因误会被老师抓住。黄被送到农村母亲处,竟巧遇同被学校开除的李。俩人怀着好奇、冲动开始身体接触,数次探索均不得要领而终。他们的关系被家人发现强制将其分开。此时另一发配农村的姚大明俘获了青春躁动期的黄,使之迷失在爱欲中。后黄李邂逅,因旧情复燃走向越轨。黄李交往被姚大明发现,两人遂相约以决斗方式。李失手杀死了姚,继而自杀。黄因此被关进监狱,被威逼诱供写下一摞厚厚认罪书——即《少女之心》。

(参考资料: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 1993 年版;甄有财《冒名走江湖》,《中华读书报》1998 年 12 月 23 日;《文革被定为黄书的手抄本少女之心重现 真伪难辨》,《北京青年报》2004 年 2 月 13 日)

## 《收租院》

作品名。1965 年 6 月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率应届毕业生 5 人,和当地美工、民间艺人一道[注 1],以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盘剥史实为原型,历时数月集体创作的大型泥塑群雕。群雕共有人物 114 人,道具 108 件,有 7 个部分(“交租”、“验租”、“过斗”、“算帐”、“逼租”、“反抗”、“上山打游击”)、26 个情节组成,全长近 100 米。“上山打游击”一组的造型,是在文革中增加的,后来又被删除、收藏起来了。泥塑群像汲取了民间传统泥塑方法[注 2]。

由于泥塑群雕直观地阐释了阶级斗争理念,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主与农民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应和了当时夸大阶级斗争严重性、强化阶级斗争教育的政治需要,1965 年 11 月 25 日至 1966 年 3 月群雕在北京展出,引起轰动。中国美协编写的展览演示文稿说:“《收租院》……(2 个半月)共接待观众 47.35 万余人,需要看这个展览的总人数估计当时在 200 万左右。”这一事件被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负责人华君武等称为“中国美术界的原子弹”。规范一些的评价为“雕塑标兵”(王朝闻)、“革命雕塑的样板”、“无产阶级艺术的高峰”和“里程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更被《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许为“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的“创举”。

红卫兵们参观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接受阶级斗争教育,成为大串联的一个内容。历时 10 多年的总参观人数以千万计(高峰期每天近万人次)。泥塑群雕并先后到各地进行了巡回展览,各地还竞相模仿复制。四次复制对泥塑的规模、内容不断扩张、升级[注 3]:增加了高举党旗、武装抗租、活捉刘文彩以至解放军救囚在水牢的妇女、建立政权、继续革命……的内容;背景用政治口号、毛泽东语录宣谕和衬托。

复制泥塑、陶塑和图片资料展也曾出国到越南、阿尔巴尼亚、挪威、瑞典、芬兰、丹麦、法国、日本等国展出。1974 年四川省委拨款 32 万,集中四川美术学院 14 人和院外 5 人,重新复制了一套可以永久保留玻璃钢镀铜群雕。外文出

版社先后出版发行的《收租院泥塑雕像》画册有英、法、德、日、俄、西班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9个语种的版本。

有研究者指出，这组群雕给人的强烈情绪是“阶级仇恨”，是对中共动员、组织工农运动，调动因财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社会身份差异导致的怨恨，取得政治竞争优势和政权的历史的观念形态的反映。与“喜儿”（《白毛女》）、“周扒皮”（《高玉宝》“半夜鸡叫”）故事一起，成为阶级剥削、压迫的经典象征。在这组群雕配合、推动下的大规模政治教育运动，在气氛、心理、情感上，对文革的发动和文革中斗地主、斗黑帮、斗老师到派性斗争乃至武装械斗，提供了一种合理化的支援。煽情使人耽于崇高的道义冲动，而废弃思，自然也罔于思，因此作为阶级斗争的政治就显见得特别的残酷、残忍。

1972年接到世界著名的卡塞尔文献展（德国）的展出邀请，未能成行的遗憾终于得到补偿：1999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城举行的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蔡国强对《收租院》进行行为主义式复制并获奖。引发了一场保卫《收租院》的版权争议，和怎样阐释《收租院》的争论。1990年代以来由于刘文彩被改正为“民主人士”，泥塑群雕不再对外展出，就变得“门可罗雀车马稀”了。

[注1] 创作组由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应届毕业生李绍瑞、廖德虎、龙绪礼、张德熙；四川省广汉县文化馆美工唐顺安；四川省南充地区民间艺人姜全贵等组成。由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提出资料和布局构思，雕塑系师生和当地美工、民间艺人合作创作。当时新闻报道的署名为“四川美术工作者”，一则是其时集体创作的署名惯例，二则也反映了创作人员多方参与的实际。叶毓山因在后期复制、完善中的贡献而闻名。

[注2] 材料使用和制作过程与民间做“雕塑”的方法相似：按照塑像的动态，用木头、铁丝搭架子，再捆上草绳，用掺合了稻草的泥抹出大致形体；半干后用合沙子、棉花的细泥，刻划细致的部分；并且用烧制的黑色玻璃球当作眼珠，使人物的情态和神采更加逼真；而箩筐、肩担、鸡公车、谷风机、桌椅、屏风、算盘、扇子、草帽、监栅等为现成物。

[注3] 1966年故宫奉先殿版（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教师和红卫兵）、1967年3月紫禁城文华殿版（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组织；四川、北京、上海的雕塑家们应召实施）、1970年四川大邑陈列馆版、1972年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版。

（参考资料：笑蜀《“刘文彩神话”炮制始末》，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岛子《的复制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第三期2003年8月26日）

## 阶级感情

名词。在文革中，常与“深厚”、“朴素”、“强烈”、“无产阶级”、“激发”、“增强”、“密切”（先后依类别、频次排列）相搭配。意指对阶级认同、外界阶级斗争等刺激、事象的主观感知、内心体验、情绪心理反映。其含义和用法，都与“阶级立场”相近，但比较起来，阶级感情接近未经升华的本能，距离理性、理智更远一些，是更为基本的东西。

它强调人际关系中的同仇敌忾，把理论化的阶级斗争学说、阶级分析方法，政治性的利害抉择，融进感情的非理性阈值内给予强化，使其染上一层温情的、人际认同的色彩，但同时也是更加壁垒鲜明的阵营划分。

与阶级出身（阶级成分）、阶级烙印、阶级本质、阶级友爱（阶级兄弟）、阶级仇恨、阶级立场、阶级觉悟、阶级意识等组成了一个观念链条。在阶级感情概念中，工农兵是政治革命性、道德纯洁性的正宗，是像血缘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这种观点强调，仇恨阶级剥削、压迫的感情是一种自发倾向、引导革命的先天秉赋；它比理性认识更具有优先性，更可靠。而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阶层，就带有先天的缺陷乃至原罪，被判定与剥削阶级有直接或简间接的关系。他们除了理智上认同于中共的纲领、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外，还必须用永无休止的改造，通过忏悔、赎罪，把自己矮化、非人化来培养阶级感情，从而成为革命机器没有自主意志、主体意识的组成部分。

阶级感情，也是实行阶级路线，即在政治上划分优劣等级、组织上划分集团、受惠层次的充分理由之一。阶级感情没有问题，即使出了什么偏差，也可以得到原谅；阶级感情不对头，再怎么谨小慎微，也会动辄得咎。阶级感情比理智认知有更多优先权。当它被推到极端时，就成为文革暴力的正当性资源，甚至成为是非乃至法律判据——比如，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是民粹主义的显性表征。

综上可知，“阶级感情”概念在中共意识形态体系里，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从“《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材料[注1]看，它的出现频次在文革十年（1966—1976）比平常年景高出40—50倍的反常现象，足以说明它的语义、语用都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嬗变。它意味着认知方式的反智化——强调对革命（领袖意志、政治权威）的服从、忠诚是压倒一切的[注2]，可以跨越常轨，可以践踏文明的成规，因为革命本身就是前无古人、超越常规的。“三忠于、四无限”就是要解决阶级感情问题。用阶级感情取消、扫除理性认知、反省指导行动的障碍，让人们在阶级感情不对（不深）罪名（直接等于政治错误、反动，甚至还要可怕——背叛）的恐惧、驱使下，被迫用激烈的行动证明自己的忠诚。

[注1] “《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 “阶级感情” 频次分布

年代/年度	频次	年代百分比	年度百分比
1940年代	15	0.26	0.087
1950年代	84	1.70	0.17
1960年代	3258	55.95	5.595
1966—1969	2602		11.17
1970年代	2387	40.99	4.099
1970—1976	2077		5.096
1980年代	62	1.06	0.106
1990年代	17	0.29	0.048

[注2]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林彪也曾说“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样做”，均无人反驳、异议，可见代表了某种共识。其间起过渡性的逻辑支撑，就是阶级立场、阶级感情概念。

（参考资料：克雷奇等《心理学纲要》，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张占斌、宋一夫《中国：毛泽东热》，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 池恒

《红旗》杂志写作组的笔名、代称（寓“持之以恒”意）。另有程越、方刚、吕真、田春、严章、黎章等笔名轮换使用，像孙悟空用汗毛变出的替身，为自己壮壮声势。其中以“池恒”的身价最高，一般是发表重点文章时使用。活动于1974年1月至1976年10月间计有33个月。其驻地在北京沙滩北街2号。

写作组由该杂志总编姚文元组建并直接掌握。其中肖木、胡锡涛等是姚文元从上海市委写作组调来的。重点文章撰文前姚文元要布置选题、写作意图、论点、材料，写成后仍需送他多次审阅、亲笔修改，最后才能定稿。

该写作组的文章仅限于在《红旗》杂志上首次发表，写有50多篇文章。代表作有《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掌握一分为二的辩证法》（1974）、《学习理论 执行政策》、《党内斗争与党的发展》、《结合评论水浒，深入学习理论》（1975）、《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思想永远指引我们前进》（1976）等。该写作组的重头文章，从点题、内容、结构、手法、署名到反复修改，多由姚文元布置、授意、经手、过问。因《红旗》杂志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性质，“池恒”文章发表后，全国报刊多以第一时间、显著位置转载。

池恒文章多以正面立论，擅长政策性解说和思想、政治评论，很少涉及历史题材；风格更趋稳健，摆出一副思辨、理论化的架势，现实的尖锐性、文风的泼辣均不及梁效、罗思鼎。多受姚文元风格的影响、规范。

池恒既是写作班子又是编辑班子，它同时还担任着组织工作：与梁效、罗思鼎、唐晓文、初澜等御用写作班子密切联系，通报组稿意图，协商修改、润色，并为之提供发表园地，起着某种居间协调的枢纽作用。因此它的作品，就不仅是自己作为作者撰写的单篇文章，还有作为编辑成品之刊物整体的《红旗》杂志。

（参考资料：樊思《一个反革命的政治纲领——评池恒的反党文章》，《红旗》杂志1977年第8期；《红旗》杂志社大批判组《捣乱、失败、灭亡的纪录——揭批姚文元利用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人民日报》1977年3月25日）

## 向阳院

名词。文革中晚期（1973—1978年间）城市街道居民自治性的群众组织。由上到下，其隶属关系呈金字塔结构：街道革命委员会（现称街道办事处）——所属地段（相当于居委会，下辖数十个向阳院）——向阳院（100多户居民，相当于一个居民小组）。大致与街道门牌号码的一个编号相对应，是相对集中的居民点，在建筑特征上表现为一幢大宿舍或一个院子。又称“团结大院”、“革命大院”、“社会主义大院”。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篇小说《向阳院的故事》[注1]，“以表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少年儿童为主要内容，描写一个城镇居民区向阳院的孩子们，利用暑假开展学雷锋活动，支援国家公路建设的故事”。197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发行了同名电影（导演袁乃晨，演员浦克、章申、吴芸）。[注2]

在这样的示范推动下，这种社会管理、政治教育、治安调解、文化生活多种职能集于一身的群众性组织形式很快得到了大面积推广。



它除了负责办理居民的有关公共福利，组织动员居民响应政府号召、遵守法律，领导群众性治安保卫、公共卫生工作，调解邻里纠纷外，较多的管理事务是中小学生和失业的社会青年，尤其是其中的问题人群。他们表现不佳，或聚众斗殴，或小偷小摸，问题超出了一般的小纠纷，但严重程度又未达到劳教条件。向阳院通过组织天天读、政治学习、跑步锻炼、做环境卫生、文艺演出等活动，把这些失控人群联系、固定到一定社会组织中，减少他们自由活动时段犯下罪错的机率以利社会安定。组织者通常由户籍民警、地段代表、相邻的中小学校派出教师的三结合班子充任。寒暑假中向阳院的活动就格外多于开学期间。

先进典型是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西城区新街口街道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向阳院。由于它的组织形式具有较强渗透力，被称为“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重要阵地”。连一家一户的私生活隐秘都被纳入组织的视线（因为厨房、水管、厕所都是公用的），无处藏匿。有报道说，它在监视、清查、抓获天安门事件的暴徒和抗震、防震中，都起到了很大作用。[注 3]

由于组织活动的频繁、流于形式，吸引力下降，也由于就业环境、治安状况等条件的改善，工作重心已转移，1980年代向阳院自然趋于解散。

[注 1] 故事说，1964年暑假，退休老工人石爷爷带领向阳院孩子到筑路工地扒砂礅，学雷锋、练思想。受到同院坚持反动立场的胡守礼仇视，他利用个别家长的旧思想，采取各种手法腐蚀孩子。石爷爷在镇党委和多数家长支持下，同孩子一起粉碎了胡的破坏。胡不甘心失败，制造山洞塌方事件，妄图伤害儿童、嫁祸石爷爷，在千钧一发之际，石爷爷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孩子们。事后，胡守礼被揪出来，孩子们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注 2] 2004年“淘宝网”电影连环画叫价 48 元。

[注 3] 延伸思考。户籍：法律治理空间/身份的行政定位；粮油证（粮食关系）：口粮供应管道/生命物资的行政定位；单位（包括档案等）：就业福利的唯一供应者/谋生手段的行政定位；向阳院：社会组织管理/居住环境的行政定位。

这四者像一张无远弗届的网，把人们的社会流动卡得死死的，最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面落实。

（参考资料：林尽染《紧紧掌握时代的脉搏——评儿童文学作品和》，《人民日报》1973年12月30日；新华社记者《用社会主义占领城市街道思想文化阵地——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批林批孔运动给北京市北新桥街道居民大院带来深刻变化》，《人民日报》1975年1月27日）

## 庄则栋

（1940— ）北京人。乒乓球国手，政治活动家。

1960年参加国家乒乓球队，三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中国队主力队员之一，并在第26、27、28届（1961、1963、1965年）三次蝉联男子单打世界冠军（1973年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授予他复制的“圣·勃莱德”杯），成为中国第一个在世乒赛上荣获“三连冠”的人。并获一次世界双打冠军（1965年，与徐寅生合作）和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单“三连冠”。其典型的亚洲直拍近台两面快攻打法，正反手均能起板，速度快而稳。引领一时国际乒坛风气。成为当时年轻人心目中的青春偶像。

1966年作为“黑尖子”遭到批斗，被逼造反。1971年在日本名古屋31届世乒赛与美国运动员格伦·科恩的邂逅交往（搭车交谈、互赠礼物），成为实现中美乒乓球队互访、推动中美关系转暖的契机（被史家修饰为戏剧性的“乒乓外交”）。由周恩来提名担任中国访美代表团团长。

1972年参加中央读书班（培训各地造反派）。全面追随、贯彻当时主政者的政治、文化主张和人事亲疏，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猛攻国家体委主任王猛、李梦华，闹“体育革命”把全国体操锦标赛（1976年）搞成“体操运动员为工农兵汇报表演大会”，聘请工农兵评论员采用评议表扬排名方法，排斥徐寅生、李富荣等乒乓国手和郑凤荣、郑敏之等告过他状的体育功臣。历任中央委员、国家体委主任（1974—1976）。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被列入四人帮组阁名单，拟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76年10月起被撤消一切职务、隔离审查四年。1977年自杀被救未遂。后被免于起诉。

1980年被派往山西省乒乓球队担任教练工作，与钮深合作著有《闯与创（庄则栋自传）》（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由日本乒坛宿将、乒协主席狄村翻译1999年推出日文版）、《三十六计与乒乓》；1984年回北京少年宫工作。2000年退休。在济南开办“济南庄则栋学校”（1999年），在北京海淀区举办少年乒乓球学校（2001年），并创办庄则栋—邱钟惠国际乒乓球俱乐部（2002年）。

与钢琴家鲍惠荞的婚姻（1968—1985）育有一子一女，1987年与放弃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佐佐木敦子结婚。曾接受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采访做过人物专访，传记作家叶永烈著有《庄则栋和佐佐木敦子》。

（参考资料：关鸿、黄伟康《庄则栋沉浮记》，收入阳木编《“文革”闯将封神榜》，团结出版社1993；《庄则栋重返乒坛》，载《回家》卷二，三联书店2003年版）

##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主谓结构短语。处理量刑问题时以民意（对犯罪人的愤恨程度）、情感性的公众舆论为重要参照系的一种观念、理论、方法。文革时的死刑布告、公判大会，列举罪犯犯罪事实以后，宣告量刑的死刑之前，都有这么一句“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强调量刑的合理性。

这种观念、方法认定，民愤大小体现着犯罪（如动机恶劣、手段残忍、危害重大）对人们既存价值观念的破坏程度，反映了人们对犯罪的否定性评价的严厉程度，内涵着人们要求惩罚罪犯以求恢复价值的心理平衡的愿望的强度。是否能平息民愤，是社会公正实现程度的一个尺度。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民主的要求，是群众路线、群众专政、群众办案在量刑上的反映。应和了毛泽东式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基本预设。公然否定了司法独立原则，把法律外因素合法地引进司法体系。与中国古代“天理、人情、王法”合一的司法原则相契合。

这种观念、做法，实际上是要求，犯罪人不仅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本身和社会危害程度大小承担刑事责任，还要对自己行为以外的情况或事实——“民愤”的有无、大小承担刑事责任，作为加重犯罪人的刑罚的重要依据。[注]它在现代刑罚学的法理上缺乏根据，由于无法量化，而为以主办、主管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治”创造了条件，可能造成罪刑不相适应，刑罚倚轻倚重。尤其是民愤与法治的

外部环境——一定时期内人们的价值观相联系，而具有变易性（如文革“公安六条”规定的恶攻罪），可能被媒介放大、误导，且又不可能量化，授予量刑人较大的裁量权，无论由于观念偏差还是认识技术、手段的局限、失误，容易造成裁断者的主观臆断、误判。如果据此定罪就会造成量刑的畸轻畸重，甚至冤案、枉杀（如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等）。这种基于运动式、革命型的量刑标准，带有鲜明的人治随意性特征，是对刑法惩戒功能的滥用。

在政治权力肆行无忌的情势下，法律本来应该是维护社会、理性的最后堤坝。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把民意、人民主权作为司法的终极标准，给以绝对化，让民意做法官的法官，达到人民主权对司法的审判，实际上是授权给玩弄、操纵民意的政治权力，彻底取消程序合法性，也就取消了司法。文明失去了维系平衡、避免翻车的最后的刹车手掣。

由于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求“第二武装”（民兵）“要唱政法工作主角”，在辽宁竟推行什么群众侦查、群众审讯、群众审判、群众定案、群众执行的“五群”经验。“文革”前期三五个人凑到一起，代表什么群众组织，就可对公民抄家、游斗、通缉、劳改等，合法的公、检、法等司法机关被砸烂，代之以诸如“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

文革后的法制反思常以此为讨论议题。1990年代的中国刑法实践及其理论，贯彻慎杀少杀原则，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条件与范围，已基本废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量刑原则。

[注] 对于死刑问题，1951年毛泽东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送审的会议决议中专有批示：“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又批示道：“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

（参考资料：缺月《法律与民愤的关系》；李利《死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关于废除非暴力犯罪之死刑的断想》，“北大法律信息网”；付立庆《刑事审判中“民愤”须慎待》，《时代潮》2003年第7期）

## 《五一六通知》

文献名。是1966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简称、别称。是发动为期十年文革的纲领性文件。

《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详该条）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为开展文革准备的组织措施。

《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批驳。它严厉批驳了《二月提纲》中提出的有破有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观点，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它指责《二月提纲》及其作者“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

由此，《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它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从1949年到那时的17年间，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

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一派萧肃、杀伐之声。它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

《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的领衔人物是康生、陈伯达，参与者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人破例列席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批人中的一些后来成为取代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底。毛泽东本人虽未出席会议，但议程却是按他部署的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错误”，在刘少奇主持下进行的。而被揭发者已经失去行动自由。

《通知》原只有撤消《二月提纲》一句话的技术说明，毛泽东提出要对此做理论说明；中央书记处4月12日才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该通知先后八易其稿，其中最重要的话（至少有8处）全都是毛泽东自己加上去的（发表文本里黑体标明的文字）。虽未明确提及“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术语，但在“四清”纲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这份文件（1965年1月）早就事先预设，其基本含义已经包含在《通知》中了。该《通知》作为党内文件下发到县团一级，虽然一年以后（1967年5月17日）才以新华社通稿形式公开发表，但主要内容当时就在陆续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里就已经透露出来了。

《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这些论点被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9日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认定为“左”倾错误的纲领，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定型于九大）奠定了基础。它的通过和贯彻，被官方史学家认定标志着文革的全面发动，并为其赋予了合法性。

两天后邓拓在家中自杀身亡。

（参考资料：金春明等编《“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郑德荣等《新中国纪事1949—198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 张志新

（1930—1975）女，天津市人。“统一”[注]时代的异议者。1950年参加工作，1955年加入中共。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沈阳市委、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供职。

1966年文革以来，虽也过参加造反组织，但目睹老一辈革命家被打倒、受残害，武斗和无序夺权造成普遍混乱，忧心忡忡。1968年冬辽宁省直机关“五七干校”集中在盘锦，她因在支部生活上直抒胸臆的“现行”问题，被送入“学习班”。在多次批斗会上，她仍直言林彪“顶峰论”是错误的，“五一八”讲话是为“大换班、大清洗制造舆论”，“对林彪没有什么信任”。江青不是文艺旗手，“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下几个样板戏，唱语录歌，这样搞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和单调了吗？”认为彭德怀同志上书言事，是党的纪律允许的，不应定为“反党问题”，应该给彭德怀同志平反。并对不应定六

十一人叛徒集团、应为彭德怀平反、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阶级斗争扩大化、“天天搞宣誓”，坦陈自己的看法。

还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有错误。……大跃进……不能遵照客观规律……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在它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1969年8月在“交代”问题时，又一次重复阐述了对党和国家命运等重大问题的观点，并交出书面的《交代观点的补充材料》。同年9月24日以“现行反革命”被捕。

入狱后，她仍然坚持信念，写出上万字的“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在审讯中明言“离开了党，就没有个人的前途”；被同时加上脚镣手铐，揪到盘锦游街。1970年5月14日被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判处死刑（撤换了执行不力的审判员），并为沈阳市法院、省高院核准，因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留个活口”的意见作罢。同年8月2日被改判无期徒刑，并在公审处决大会上陪绑，10月26日被转到沈阳监狱，始终不屈服。抗议监狱对其肆意行凶殴打、无故辱骂、伙食是煤渣沙子的黄馍、不发女犯经期卫生纸、没收钢笔的不人道待遇。被关进单人牢房，精神出现异常。1975年4月3日以未经本人签字的提审记录为根据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不给上诉期。4日被秘密割断喉管，赴难。

因其母郝玉芝的申诉，1978年最高人民法院指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复审。1979年3月，中共辽宁省委为其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随即在《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被称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引起了悲剧为什么会发生的普遍反思。《诗刊》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应群众的要求，7月2日晚举办赞颂张志新的专题诗歌朗诵演唱会。10月在杭州，浙江越剧二团创作和演出了以张志新事迹为素材的大型越剧《强者之歌》。“张志新烈士事迹展览”于10月5日在沈阳辽宁美术馆展出。雕塑家王官乙为此创作有《玉碎》。黄宗江写了电影剧本，在没有人公开反对的情况下有好几位导演欲拍未遂。2005年中央媒体联合推出《永远的丰碑》栏目，因为没有列入张志新而引起议论。

其夫曾真也是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工作人员，曾被遣送建昌县农村插队落户。育有女儿曾林、儿子曾彤。1973年被逼离婚。1979年女儿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儿子就读于清华大学。后移居美国。

[注] “五统一”：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参考《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P80；《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P423；陈少京《张志新冤案揭秘》，《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

## 宋彬彬

(1947— )女，文革初时任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

1966年6月2日在其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6月3日，由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师大女附中，一进校就宣布对宋等人的热烈支持。工作组取代“靠边站”的原校领导掌管了学校。工作组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组长担任主任，作为学生党员的宋等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署名排列第一）成为副主任。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学校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对象。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校长卞仲耘被划成“四类”，连续批斗拷打，直至被打死。

1966年8月18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向伟大领袖敬献了红卫兵袖章。据当时权威的官方媒体报道，领袖问：你叫什么名字？答曰：宋彬彬。领袖再问：是哪几个字呀？答：是文质彬彬的“彬彬”。领袖教导说：不好，要武嘛。于是改名“宋要武”（本人解释说是报社的记者越俎代庖强加给她的）。以新名字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人民日报》1966年8月21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也更名为“要武中学”。“宋要武”这个名字变成红卫兵暴力的一个符号，刺激、引发全国都发生打人事件。[注]南下武汉也以宋要武名义发表声明。

后更名为宋岩（平）。曾在内蒙锡林郭勒插队，被推举为大队赤脚医生。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为福州大学第一批工农兵学员。1980年代后移居美国。

受卡玛邀请，与骆小海一起受访参与拍摄了片长约2小时的文革启示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资助，2003年放映）。辩解说当初写大字报的动机仅止于教育改革，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和承受能力。观众在纪录影片中只能听到她谈话的声音，见到遮黑了的身影。其缺乏自省的辩解态度，受到宋永毅、胡平、王友琴等人批评。

[注]有盛传说宋彬彬打人。千家驹《自撰年谱》载，“宋彬彬和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宋自辩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同时我也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地难过。我们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距离太远。”

但王友琴报道显示，卞仲耘被打死的8月5日当天，作为校革委副主任的宋就在学校，从下午两点一直打到五、六点，“其间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对此胡平评论说，没有材料证明宋参与了殴打，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她对这场残忍血腥的殴打表示过反对；虽然她当时正处在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出面反对和制止的位置上。所以不能说她反对打人。

（参考资料：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曾慧燕《太阳为何不落山——“八九点钟的太阳”记录文革世代心路历程》；胡平《谈宋彬彬的反对打人之谜——看有感》）

## 白智清

(1945— ) 四川成都市人。众声噤口时代的直言者。

1965年毕业于成都一机校，分配到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当技术员。文革开始后，他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被卷入了这场革命造反的运动之中。因在大批判中读到彭德怀1959年写的“万言书”，使他开始冷静思考文革。

1974年3月至6月，他以“心赤客”为笔名，先后向邓小平、周恩来、李德生、叶剑英上书，鞭挞文革和“四人帮”，被公安部列为“心赤客反革命案件”而受到处理追查。他在信中说：“当前斗争发展到此时此刻，锋芒所向之处已经是非常清楚的了”，“拯救民族和国家的重担，已经落在你们身上。当断不断，反遭其乱，该决不决，自寻其灭，是时候了……如果到了‘后党’形成，大权在握——最后到国破家亡便悔之晚矣!!!”在给邓小平的信里，希望能尽快搞出社会主义法典，拯救中国社会。

1976年2月8日，他把署名“祖国忠诚的儿子，重钢职工白智清”的大字报《我爱我的祖国》，工工整整地贴在解放碑前人来人往最多的地方——交电大楼（现重庆商厦）墙壁上。他说“邓小平为了国家舍得他的官，我白智清为了国家舍得我的命”。3月4日清晨，在盐市口（成都最热闹的地方）贴出长达12张的大字报《试问，到底是哪家的“主义”？——评张春桥的》。当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挤到盐市口仔细观看，以致在3月5日当有人用大标语覆盖这张大字报时，遭到怒不可遏的冲击，从而引发了震动全国的“成都三·五事件”。

在王洪文授意下，公安部的一张捉拿白智清的通缉令飞遍全国。1976年6月32日中午12点多钟，白智清就在广汉县的那个旅馆里被捕了，随后被关押在成都的一所监狱。在“天安门事件”后不久，白智清以“天安门事件”同伙的罪名，被押往成都、重庆等地批斗。他对批斗会上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之词，报以轻蔑的一笑。

王洪文办公室催着要把白智清处以死刑，但在四川省委抵制下未遂。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在1978年7月31日被释放。

1978年11月24日，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会议决议为白智清平反。通知留有尾巴“但其中也有错误，需要总结经验教训”。要他公开表态，一要感谢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二不否定文革，三不谈毛主席也有错误。

1990年代曾被借调到重庆市体制改革委员会。1998年在成都出版20万字的《冷眼看中国》。2005年退休，并完成40万字书稿《泪眼看中国》。

（参考资料：杨建立《简介》，载余习广《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隆准《“心赤客”白智清：我依旧爱我的祖国》，《重庆晚报》2005年5月8日）

## 抄家

动词。原意指由司法机关经过批准并负责、执行的，搜查、没收罪犯家产的行动。兼有侦查、搜集定案证据和没收财产的职能。受到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鼓舞（最具暗示性的著名戏剧场面是：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1966年8

月下旬，北京和各地红卫兵“杀向社会”，“走上街头”，横扫“四旧”，对他们认定的“阶级敌人”实行了大规模的揪斗、抄家。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也有发生的，组织程度较高，其总体规模似有缩小。

文革初期的抄家不经任何部门批准，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随时可行，突然而至。翻箱倒柜，连沙发、床板、地板、墙上护壁、壁炉烟囱也要拆开来看；阶级斗争的“敌情”观念显然激发了这些年轻的非职业查抄者的想象力和认真精神。由于抄家的无组织性，常常是甲走乙来，乙走丙来，重复查抄。抄不到“罪证”，就认定被抄者“不老实”，加重打骂。

抄家的对象有地富反坏右、资本家，文卫科教单位党政官员，教授、学者、科技人员等“反动学术权威”。个别的也有街坊、同事、同学辖私报复，把“红卫兵”引来抄家的。查抄的重点是被视为“剥削”证据的金银首饰、高档消费品（绸料中式衣裤、考究西装、进口唱机、相机等），被视为“封资修”的中外古典名著、文物字画，被视为“现反”罪证的信件、日记、文稿、报刊剪贴（最好能抄出委任状、变天帐、无线电台）。查抄物品常常成了被抄家者挨斗时的罪证。查抄物品的处理方式有焚毁“黑书”、字画，上交（各单位负责文革事务的机构或公安部门）查封，用作布置“罪行展览”；极个别的，也有装入私囊的。

为预防被抄出严重问题，有的被抄者自己事先对工作笔记、生活日记、来往信件以及旧照片进行了清理、抄检，烧毁可能的违禁物品。个别被反复抄家的人家干脆就不再收拾残局，以使抄家者一望而知是已经抄过了、大约不会再有斩获的可能而放弃抄检。

有材料证实，“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到1966年9月底，被抄家的达32600户。上海市仅从8月23日到9月8日半个月间被抄家的达84200户。天津被抄家的有12000户”。但1968年的清队也屡有抄家发生，只是一般认为规模不如1966年。而且由于是单位组织出面的，所以不出具收据手续；难以追索。

文革后曾组织过发还抄家物资的工作。但也只有一部分登记在册、有交接手续、保管尚属完好的物品归还了；有接受访谈者称，最高的归还率可达50%，一般的勉强可达20-30%。金银是不发还的，纯金折价为95元一两，大约三元一克。钻石折价与黄金相同，也就是五克拉的钻（一克）折价三元，现价大约为300万元。

#### 红卫兵“战果”统计表（1966.6-1966.10.3）

“对敌专政”挖出“隐藏敌人”（地富反坏右分子） 16623人

破获“现行反革命案” 1788宗

没收财产方面 黄金 118.8万两

白银 30.6万两

银元 978.9万两

外汇 729.7万元

现金、存款、公债券 482.8亿元

金银等物 171.9万件

古物 1000万件

从城区赶走“牛鬼蛇神” 397400人

\*上表据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公布。显然，这是一个不完整的统计。

（参考资料：马宇平等编《中国的昨天与今天》P754，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9年版；席宣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P116；

## 十次路线斗争

偏正词组。对中共党史的一种概括、叙述方式。这种方式，把中共党史说成是一部毛泽东与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一次次证明毛泽东政治领导和思想、路线的正确，并不断壮大发展、取得胜利，完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课题的历史。这一套概念体系是从苏共、尤其是从《联共（布）党史》[注 1]那里照搬过来的。

在中共历史上，六届七中全会作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延安时期为了全面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最终统一党内认识，总结经验，明确历史功过，加强党内团结，在新的基础上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做法；因而形成了用路线斗争构筑党史体系，为现实的党内斗争服务的先例。[注 2]这种做法，在文革中被急于修改中共党史、确立新的道统的文革意识形态沿用了。

最先提出“十次路线斗争”的，是毛泽东南巡时的谈话。而正式提出“十次路线斗争”概念的，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这十次路线斗争里，计有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次），李立三（2次）、瞿秋白（3次）左倾冒险机会主义，王明先左后右的机会主义（6次），罗章农（4次）、张国焘（5次）分裂主义，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7次），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8次），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9次），林彪反革命集团（10次）。把中共在某个时期的曲折、失误的账，算到个人头上，可以抹煞集体领导的责任，模糊挫折、错误产生的复杂原因，是一种充满传奇性、可以满足某种窥视欲的解释方式。既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性、严肃性，又容易被利用来进行党内不同意见、不同派系的权利斗争。

这种概括、叙述方式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向《联共（布）党史》借用话语系统，常常使用讲述党史的方法进行譬喻、暗示，清算历史旧账，成为他所擅长的党内斗争行之有效的特殊手段（意识形态化）；一方面源于趋附毛泽东的政客和党史工作者的踵事增华，形态化的完善工作，是制造当代偶像的造神运动的政治需要。是中国古代服务于君王的史官文化、从过去推知未来的传统思维模式的产物。用毛泽东曾经的成功论证以后的正确，用 1949 年以前论证 1949 年以后，以类推代替事实；在新的路线斗争尚未发生以前，就预先论定了毛泽东对立面的错误和性质。依赖戏剧化方法制造偶像，神话个人魅力，为权利运转提供合法性根据，是政治权威动摇、稀薄的典型症候。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文革时以此线索，编写了官方、民间各种版本的党内路线斗争大事记。其中有大量中共党史的专业工作者也以此皋圭，亦步亦趋地编制教科书。在党内组织生活学习时传播，并规定有检查、验收、总结的制度。各级党组织、机关单位的政治学习也反复使用这样的材料。

1976 年打倒“四人帮”后，中共十一大又沿例将其定名为第十一次路线斗

争。

1980年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废弃了这一概念体系。邓说，过去“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例如把个别时间较短、没有产生全党影响的错误，如瞿秋白（3个月）、李立三（半年）、罗章农（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也算作一次路线斗争，就有凑数的嫌疑。

[注1]该书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裁剪历史，把苏共党史描绘成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生死搏斗的历史。由此创造了一套以领袖为中心的革命战略、策略，加强党的思想和建设的具体途径，展开党内斗争的方针、方法的话语系统。

[注2]在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前曾编辑过《六大以来》的文集，限印500册，对原文多有改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毛泽东1941年《结论草案》为蓝本，起草过程长达一年。

（参考资料：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日）》；《党内十次路线斗争资料》中联部1972年编；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邓小平《对起草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四旧

名词。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合称、统称。含贬义。

源于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由《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第一次明确提出，为《十六条》所肯定，又是林彪“八·一八”讲话中提出的号召。

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前的漫长历史阶段里，所有先人创造、社会形态遗留下来的文化财富，在文革意识形态看来，都是旧的、腐朽的、反动的，必须与之彻底决裂，清除干净。它被表述为“两个决裂”（源于《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种观念早已深入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人人以之为耻，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极其广泛。

在这样一套思想观念的观照下，旧思想，是历史上从孔子、老庄等先秦诸子，经董仲舒、韩愈、朱熹，到王阳明、曾国藩、胡适、刘少奇等所有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既指他们的著作，也指在他们影响下的其他作品。旧文化，指旧时代的礼仪制度、文学艺术、教育思想和实践等精神现象，既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遗存。它包含的内容比旧思想的范围更广。旧风俗，指历史上人们日常生活中代代传承、相延成俗、层叠积累的时尚（包括衣食住行、年节、婚丧、娱乐）、礼节、习惯，即旧文化的世俗表现。属于一种亚文化。旧习惯，历史上、现实中长期生活形成的行为模式、倾向、风气，也包括从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派生出来的心理定式。与前三者相比，更加处在表象外层。

这些东西，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不少是应该属于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应该纳入汉族的文化遗产。由于中国近代危机促成的不断激进，它们被五四新文化批判以后，又被 1949 年以来中共舆论机器加以政治宣判、漫画化—妖魔化处理后，反复传播，已经形成了共识（无意识），是假、丑、恶的化身。没有人再去思考、探究所谓四旧是什么。因此当林彪号召“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异样的感觉。

文革对四旧的抨击、破除，看似有打死老虎的嫌疑，声势浩大，言不及义。其实是言在此而义在彼，有从摧毁观念形态的传统权威入手，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模糊法与非法的界限，达到摧毁现实政治权威（大小走资派）的功利目的、实用功能的。同时也让普通人陷入对四旧（传统是对它的中性称呼——人无往而不在传统里）的自我检讨、恐惧中，从而形成类似原罪、必须永无休止地忏悔赎罪的自我想象，在惶惶然的颤栗中听命、顺从于当下的政治权威。有人评论说“‘破四旧’的时候像个疯子；‘弘扬华夏文明’时，像捡破烂的”。有人则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思想活跃，接受力强，与破四旧很有关系”。

（参考资料：王年一《大动乱的时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红旗》杂志 1966 年 11 期；）

文革初期，主要是 1966 年夏到 1967 年初，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的，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运动。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

“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由首都红卫兵首倡，走上街头破四旧。把基于中共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置身事外的学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1966 年 8 月 23 日）：“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却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因此这股潮流汹涌速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

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神符魔咒。

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反弹，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中共中央 8 月 22 日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1967 年 10 月 16 日 佛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了“破四旧”办公室《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搜查财物的处理报告》。它规定：凡枪械、凶器“四旧”物资等一律没收，其他物品酌情予以清退。但是被抄抄的文物，多数被当时的外贸部门作为工艺品“收购”，用于出口换取外汇。以后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收藏家，其不少藏品都来自于当时的大陆外贸出口。还有不少珍贵的文物，或被毁坏，或在混乱中丢失。

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更可怕的是让红卫兵从学生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习惯里挣脱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禁忌，把虚妄的阶级斗争从理念转化为实行践履的狂热。行动赋予了他们青春的自信、权威，使他们崇尚非理性暴力，崇尚可以恣意妄为的权力，唤醒了他们心中的魔障。为红卫兵日后政治性的造反、夺权 and 大规模打砸抢、武斗，做了热身演习。而人们也被从日常生活秩序的规行矩步中拽了出来，受了催眠似的，在暴力残害面前变得懵懂麻木，束手就擒，逆来顺受。

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着，但已经没有 1966 年那样简单、激烈的行动了。

（参考资料：席宣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本报评论员《好得很》，《人民日报》社论 1966 年 8 月 23 日；顾双雪 孟竞文《把“四旧”打个落花流水》，《人民日报》1966 年 8 月 24 日）

## 谁战胜谁

主谓结构短语。另一个可以互换的等值短语是“谁胜谁负”。

早在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列宁就引用“谁战胜谁”这个著名短语来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遍问题。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也用它来指称自己需要全力以赴去解决的核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它描绘出一幅尖锐对立的社会图景，熔铸了一种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感知—思维模式和行为—情感模式。根据这样的基本假设，就像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提出的经典问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一样，成为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认识判断和政策制定中的首要问题。其紧迫性与中共打天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年代相同。

这一知行模式、基本假设系统否定了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线，即，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

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态之间的矛盾”，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随后的匈牙利事件(1956)、反右(1957)、庐山会议(1959)，使毛泽东认定阶级斗争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本来有沿着八大思路梳理、探索的迹象，但在它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这个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就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论述。解决所有制改造只是第一步，还必须进一步地、彻底地“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121-122页）

从此，这一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严重课题，而不是经济建设成为了中共的中心工作；并在文化、道德、教育、学术、科研……几乎所有领域打下了烙印。从路线到方针政策，从思想改造到不间断的政治运动，都纳入了谁战胜谁、“反修防修”的思想轨道之中。比较起对用数字管理的天性隔膜和屡战屡败的经济建设，毛泽东似乎更娴熟于政治斗争领域，在其间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创意迭出、心旷神怡。更能战而胜之。这一思维模式，是把敌情估计得格外严重的放大镜、哈哈镜。通过它的孔径，即使是与政治、阶级斗争、军事毫无关系的地方（学术界、文化界），也到处都充满了颠覆、复辟的种种危机，充满了“战略”、“战役”、“阵地”、“阵线”、“人民战争”、“决战”、“制高点”、“突破口”等两军对阵、立决生死的战争状态。“谁战胜谁”的焦虑，已经成为他利用意识形态的同构惯性，逼迫中共高层就范，以破解社会矛盾，并走上个人重返权力中心的终南捷径。派性引起的社会分裂，普遍到一家人也分成两派，辩论不已。

在现代博弈学看来，谁战胜谁的竞赛实际是一种零和博弈，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游戏。1990年代邓小平提出绕开姓“社”姓“资”死结、“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解题思路，认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私有成分和股份制经济等）的发展并行不悖，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对抗，两者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加强。更认定世界大势是从对抗到依存，从疏离到整合。但在反对自由化和防范境外敌对势力的颠覆等问题上，官方意识形态仍保留（也限制其适用范围）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概念范畴尾巴。

（参考资料：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龚育之、逢先知、吴正裕《“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特色和意义》，《人民日报》1986年9月9日；安启念《列宁的事业及其当代意义》，《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 陈里宁

（1933— ）1960年代担任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资料员，曾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1963年到1964年间三次进出精神病院，据说是因为“害怕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用毛泽东思想打击敌人（所在机关负责人）”，诊断为“精神狂想症状”。1964年出院后给《湖南日报》投寄两封信，不指名地批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用封建主义的一套道德标准来毒害党员”；并给毛泽东、林彪写信，说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即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并作为反革命要案从湖南移送公

安部继续审查，被转北京秦城监狱。在监狱的言行被记入档案，成为“监守日记”。1965年公安部怀疑他患有精神病，遂将其从监狱转到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病医院，文革初改名为红卫医院）鉴定、治疗。医院对他的鉴定有分歧。其间他写的日记，详细列举了刘少奇的反动观点；给中央文革小组多次写信，条理、通顺程度均有明显提高。

1966年底医院造反派医生金弘敏向清华大学串联的红卫兵提供陈情况，说他是被走资派迫害的持不同意见者；这一情况很快通过林杰送达中央文革。经调看有关40次审讯记录和档案材料，中央文革成员王力、戚本禹与医院红旗战斗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医院“8.18”等组织，亲到医院把陈从监护中解放了出来，安排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恢复了工资级别和党籍。1967年1月17日《首都红卫兵》报以《狂人日记》为题、用4版报道了陈的故事，和他的批刘言论。他于是被邀到处作批刘报告。天津市话剧团创作、演出了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同一题材的戏剧还在郑州、杭州、重庆等地上演。同年8月包围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的火线就多次演出了这幕戏剧。公安部为其出具了“无罪释放”和“平反”手续。

陈的批刘讲演总是表态支持邀请方，引起了不同观点派别的反对、争执，因陈在毛泽东著作上随意批改，被反对一方上纲上线，造成一些麻烦纠缠。于是被送到农村以记者身份做调查。后来王、关、戚倒台时，此事就成为了罪状之一。陈再次被逮捕、监治，结论是“假反刘少奇，真反毛主席”。[注]

1979年以后公安部对陈的问题进行了复查，最后确认：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丧失责任能力”，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改正原来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和原工资待遇。因病情很重，长期在湖南湘潭家中治疗、休养。

类似的情况，当年还有后来从北京安定医院又放出来的王景瑞（北京市职工），在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时竟当上了委员。

有人评论说，从陈走过了“反革命——精神病——反刘少奇英雄——反革命——精神病”的曲折、变幻历程，出于政治需要利用精神病人，可以看出“陈里宁事件”既是文革的一个缩影，同时文革更是一次大规模的“陈里宁事件”。

[注]典型地反映出当时对精神病的态度：一种是把精神病人打成反革命，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漏网，把疾病政治化，有点儿宁枉勿纵残忍；一种是把有不同意见的人当作精神病，这样做极端霸道、狡诈和玩世不恭。

（参考资料：林焱《“新时代的狂人”陈里宁》，《二十一世纪》1996年6月号；王广宇《“陈里宁事件”始末》，《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257]）

## 工宣队

名词。“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被称为工人阶级管理上层建筑的文革“新生事物”。

1968年夏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完成了“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各地两派的武斗，仍然影响着政治局面的稳定，妨碍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的恢复。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解散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上缴枪支弹药。同时毛泽东向武斗严重的高校及中学派驻工宣队，以从源头上制止武斗，统一、协调学校中两派红卫兵组织的关系和冲突。除了组成人员不同外，从形式到内容都与

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一样，而且它所拥有的权力还更大。

1968年7月26日北京市60多个工厂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接管学校的领导权。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来宾赠送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13日接见工宣队代表，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给工宣队以强大的政治支持。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派驻工宣队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仅9月5日后的一周内，上海市就选调了3.1万产业工人进驻全市10个区的513所中学、129所小学。

除了学校，他们还被派遣到文联、作协、新闻出版、剧院、体委、医院等上层建筑单位，科研院所、城市街道和这些单位的五七干校。远离城市、产业工人不多的地方，这一角色则由农宣队（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充任。

要求选派的工宣队员是产业工人（家庭出身好）、党员、有文化，老中青三结合，没有派性。在学校以政治领导为主，“不要陷于行政事务”。工资、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工宣队进校后，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领导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建立、调整革委会，整党等“斗批改”工作。参加学校党支部和革委会的工作，领导教育革命，参与备课、教学。由于有工宣队，方便了1969年开始的厂校挂钩、开门办学。

工宣队进校后，红卫兵组织迅速衰落，对解决派性冲突等一些老大难问题有所帮助。但他们执行的仍然是左倾政治方针和路线，加之对教育工作和进驻单位的业务工作不熟悉，自身文化程度低，无法融入、领导学校工作，成为游离于单位实际的一极权力，仍然染有派性观点，还有负面作用。工宣队员常常处于自身能力和担负职责不匹配的尴尬中：文化水平不高，却还要讲话、传达文件等等；尤其面对都是科技、教育、文艺界高学历的臭老九。一个经典的细节是，某校工宣队父亲（头头）在大会上露丑，经常气得他女儿（学生）直哭；因为同学们以此取笑她。

1970年代以来工宣队留在所驻单位的人越来越少，已近乎名存实亡。根据邓小平1977年9月“工宣队问题要解决，他们留在学校也不安心”的指示，同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报告，各地进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全部撤出学校。

文革后重新认识工宣队的政治批判中，指责其“把工人阶级领导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把工人阶级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把工厂同学校对立起来”，“成了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的‘特殊人物’，随意迫害知识分子，干扰教学及科研工作，毁坏实验设备，把高等学府变成残酷斗‘走资派’、整知识分子的‘大本营’”。

（参考资料：郑德荣《新中国纪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陶德坚回忆录·工宣队进学校》；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重新认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人民日报》1984年10月30日）

## 冯友兰

(1895 – 1990) 中国哲学史家。河南唐河县祈忆乡人。1923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历任河南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秘书长、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1949年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1934)，合称“贞元六书”的《新理学》(1939)、《新事论》(1940)、《新世训》(1940)、《新原人》(1943)、《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

1949年到北京芦沟桥附近农村参加土改，多次出国访问，1950年开始不断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倾向“理论与实际脱节、个人与群众脱节、理智与情感脱节”，参加对胡适、胡风、梁漱溟的批判，自己也多次受到各种批判（对1949年以前言行、对哲学史观、对“新理学”、对1957年提出的“抽象继承法”）。1959年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二分模式，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7册，1962–1992；其中1963、1964年出版的第1、2册被认为是冯著中的败笔)。

1966年起受到各式冲击：从大字报批判、批斗、抄家、封房、扣发工资（每月仅生活费12元），到关“牛棚”隔离审查。1968年北大工宣队落实毛泽东指示允许其回家居住。1973年10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成立时，与周一良、魏建功等同被委为顾问，“和群众一同批林批孔”，“走了一段极左路线”；写作《对孔子的批判和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北京大学学报》、《光明日报》发表后，全国各报相继转载。1975年参加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并为主席团成员，发表《参加批林批孔一年来的思想收获》、《谈谈批林批孔运动对我的教育》，并结集为《论孔丘》出版。在该书前言里说，“从尊孔到批孔，从觉得好象是灾难，到确实觉得是幸福，这是一种思想改造上的转变”。从1971年起多次填词（《蝶恋花》）赋诗（《韶山颂》、《长怀化雨恩》）赠毛泽东，并有《咏史二十五首并序》。[注1]1976年写作《孔老二的“拨”与走资派的“扭”》等文。

1977年至1979年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要求“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背靠背对其进行批判。其时多被人诟病，并指为“风派”典型。[注2]1979年获准异地参加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发表文章；1982年获准赴美夏威夷出席国际朱熹学术会议。

1984年在《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版)里对文革经历，以“修辞立其伪”一语做了清算，忏悔其“确有哗众取宠之心”，“自己犯了错误”。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谅解。[注3]

[注1] 其中间有“刘皇吕后继秦功”、“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等语。

[注2] 舒芜《四皓新咏》之一：“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冯曾赋诗向人解释主张变化的原因说“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道术变迁所依据的本该是自己(道)的内在逻辑，却成了兴亡(政治)的附庸。

[注3] 1985年冯90寿宴，曾邀梁漱溟赴席。梁具函称“北大旧人现唯我二



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冯复信并赠《三松堂自序》，“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梁于是愿见，冯赴梁寓成晤。梁题赠著作《人心与人生》一册。

（参考资料：程伟礼《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冯友兰先生年表》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遇罗克

（1942—1970）汉族，生于徐州。因公开质疑“血统论”而殉道的青年思想者。

1948—1954 年就读于北京东四区一中心小学，其间父（遇崇基，原水电部华北电业局工程师）母（王秋林，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曾任工商联委员）离异。1957 年父母均成为右派。1960 年毕业于北京灯市口男二十五中学。因出身资本家家庭，虽成绩优良，无缘升入大学。博览中外文史哲名著，自修天文、地质、地理、数学，准备报考地质学院。1961 年到北京郊区红星人民公社菜园小队当农业工人。1964 年返城看过传呼电话，先后在换房站、首都图书馆、中国情报研究所做过临时工，并曾在安外蒋宅口小学、朝阳区小牌坊胡同小学代课。

1966 年 2 月 13 日在《文汇报》发表《和机械唯物主义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批评姚文元，而遭学校辞退。同年进入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做学徒。因日记泄漏被追究、盘查、关在牛棚；日记并成为其后立案定罪的根据。

同年 10 月写作针对谭力夫名噪一时的血统论对联的《出身论》，署名“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油印张贴于广州、北京街头。1967 年 1 月经印数 3 万份的《中学文革报》的刊载广为传播，引起强烈反响；并被传抄、复印。曾出现换报纸黑市上用 25 份小报换 1 份《中学文革报》的情景。文章指出，血统论“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点名说，“《出身论》是大毒草，恶毒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随后遭到跟踪，通信被邮检。

他曾自述怀抱：血统论的横行“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的抗议、强烈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想，历史会把我的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战斗的甘与苦全部在这里。”

1968 年 1 月 5 日被捕。其间日记被发现，成为追究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根据。以“现行反革命罪”于 1970 年 3 月 5 日被处死刑，年仅 27 岁。1979 年 11 月 21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其反，正式宣告他“无罪”。1980 年 9 月 12 日《光明日报》发表《划破夜幕的陨星》报道了遇罗克其人、其文、其死。

研究文献：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光明日报》1980 年 9 月 12 日；遇罗锦（大妹）《一个冬天的童话》，《当代》1980 年第 3 期；徐晓、丁东、

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 年版；苏双碧《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炎黄春秋》1999 年第 6 期；遇罗文（二弟）《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动机不纯

主谓词组。对要求入党、入团，追求进步的人目的提出质疑、批评的理由、事项之一。在中共党团组织的观念里，追求进步的人应当排除个人性的动机（如赢得旁人的尊重、参与公平竞争和公众活动的更多机会等），与无条件献身革命事业，完全彻底为了党和人民利益的道德理想要求，有不一致、不协调的地方。到了文革，这种对道德理想（纯洁性）的追求，其不合情理、不可抵抗的意向，使人陷于极度的焦虑、恐惧，更加达到类似病态洁癖的强迫性神经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斗私批修”就是日常性的对“动机不纯”的追究、补救。

动机不纯，作为质疑、批评，可轻可重，可深可浅；作为批判、指控，却是相当严厉。它不要求提问者提供完整、可靠的证据（甚至默许、纵容提问的主观臆测）[注 1]，只需简单的提问，就可以把被质疑、被批评者搞得很难堪。提问者拥有绝对权力——因为道德纯洁性的绝对要求，与中共意识形态和道德修养的组织功能相一致。而执政党的地位，又使党团员身份的获得与获利可能性呈正相关关系。由于有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强大的后援，这一质疑、批评超出了道德范畴而具有政治性，它的心理杀伤力就特别的大。在泛政治化的推动下，无穷追究终极性动机的执拗成为病灶。这还是上纲上线中对抗性相对弱的一种，因为使用范围在体制内。一旦超出这一范围，它的政治杀伤力就会成倍地放大、增效（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由诛心而诛身）。

谁要是受到这样的批评、指控，连辩解都不行，因为那会表现得不能接受批评；这也是特别犯忌的。入党、入团的事儿就会泡汤，做了再多挣表现的好事儿也白搭。攻易守难，是与当时组织生活、政治生活中的左倾痼疾有联系的普遍现象。

为了秩序，法治社会制定了许多规则，这些规则只限于惩罚犯罪的人，就是做了成文法规定不允许做的事。动机不在惩罚之列，心灵的自由不可侵犯。[注 2]不能为了预防邪恶，就把植根于欲望的动机不分善恶连根砍去（泼洗澡水连孩子也泼掉）。惩罚动机是专制社会特有的现象。因为它的权力制衡机制缺位，只能求助于最不可靠的德性、内心约束。

文革的权力真空，为各色人等的垂涎、觊觎、盗窃、表演提供了舞台和机会。机会主义已经成为时代病。为了维护权力运转的可控性、有效性，动机追究成了一种不得已的补救手段。

[注 1]这种做法被称为“诛心之论”，即不问实际罪行、证据，只根据其用心以推测、认定罪状。“《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韩非子·说疑》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中国思想专制的鼻祖就要求从思想、动机的源头上，消灭越轨。

[注 2]关于动机拷问，我欣赏中国古代贤人哲士的精彩解说：从否定性方向探求，只能看痕迹（后果）不能看动机，如果从动机上追究也有效那就没有完人、圣人了（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其隐含的推论是，谁没有恶的一闪念呢？只要被理智压制住而未给人带来损害就行了。

(参考资料：王光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人民日报》1975年6月9日；《后汉书·霍[言+胥]传》)

## 稳、准、狠

联合词组构成的名词。

意谓稳健、准确、坚决。原指技艺分寸和火候上的掌握、拿捏，后引申为借指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方针，文革时已被推广为打击一切反革命、刑事犯罪分子、运动对象的指导方针。

1950年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制定了“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后来被类推为指导一切运动的打击、镇压工作的方针。比如，普遍用于反右、清理阶级队伍等。[注]

但在实际运用里，对打得狠的强调、落实，超过了对打得稳、打得准的强调、落实。如果说在建政之初的镇反中，出于治乱世、用重典，稳定新生政权的迫切需要，还有立足未稳、法制不修等不得已而为之的合理性，还有强调防止错、漏案件、不可扩大打击面的部分积极含义，后来历次运动也延续了这样的政策尺寸，就只剩下消极因素了。因为在清队运动等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看来，前者事关路线、感情、态度，后者只是方法、水平问题。方法、水平问题，可以学习、提高；路线、立场、态度问题，则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站在哪一边、必须旗帜鲜明的立场问题。雷厉风行，犯了后一类错误，是左倾，属于认识问题；谨小慎微，犯了前一类错误，是右倾，属于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宁左勿右”的指导思想更把这种倾向推到了极端。

所谓清队，就是采取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办法，对文革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来一次“层层审查、人人过关”的大清查；是否稳准狠的标准，也都是由群众来掌握的。如何打出气势，打出声威，除恶务尽，不让使坏分子逃脱制裁，总是习惯地被放在第一位来考虑的。

在这种思维惯性指导下，公安工作和政治运动对打击对象的处理，一般情况都偏于严厉，有扩大化的倾向。被规定为政策条文的“严打”（“严厉打击”的简称）、“从重从快”，就是这一倾向的制度化。举凡认罪态度、民愤、单位意见、领导意图，下达的控制数（百分比），等等，都可以成为从重从快的理由。而每个运动之后，都有大量纠偏、落实政策的善后工作，需要设立专门部门、配备专门人员办理，就是证明。而所有“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宣传，就完全成了做做应景样子的官样文章。

[注]从“人民日报’47—97数据库”提供的情况看，该词条1960年代出现的频次达到71.48%，1968年48.85%，1969年20.66%。高于常年40、50倍。而这两年正是批清运动如火如荼的时间。

(参考资料：新华社《济南汽车制造总厂革委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 用毛主席的政策武装革命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日报》1969年2月10日；徐来《最高法院部署今年后五个月“严打”整治斗争 依法从重从快 稳

准狠打击犯罪》，《法制日报》2001年7月31日）

## 风派

名词。文革后喻指没有自己立场、不坚持独立思考、谁的势力大就为谁卖命，甚至摇摆不定、忽“左”忽右、卖身背叛的投机者。他们跟随潮流而善变，翻云覆雨，今是而昨非，变幻莫测，风驰电掣，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左右逢源、善于讨好得势牟利。与“震派”、“闹派”相关、相对的，特指在文革出于投机投靠极左政治势力、上了贼船的人们。

文革时政局变化频繁（包括从中央高层领导、地方各级领导到中央精神），连毛泽东本人也只有一个总的方向，没有贯穿始终的计划、安排，只是在激进的中央文革秀才集团、以林彪为代表的军人集团、保障日常运转的国务院之间，进行平衡、仲裁。这一切，都是围绕保住统驭权而随机变化的实用主义游戏，没有政治逻辑的一贯性，让人们无法凭借理性去认识、预测、判断，只能竭力紧跟。“上面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以求政治上的安全。消极的紧跟成了人们自保的自然选择。

中共建政在民族独立方面赢得的成就，政治上持不同意见者的屡次受挫，毛泽东被塑造成为高瞻远瞩的“领袖”、“统帅”、“导师”、“舵手”，基于民族感情和当家作主的翻身感……所有这些，也都使习惯于信任、崇拜毛泽东的人们，对现实政治持自觉的认同态度。

到了文革，政治高压和合法性资源、法制秩序荡然无存，造成人的尊严的匮乏，只能违心地随大流。积极的紧跟，就成了功利心强的类型的人处世方式。[注]比消极的从众行为，更多一些追赶时髦的主动出击。他们也因此得到了权势名利，成为从文革获益的既得利益者。是以放弃做人底线为代价的一种生存（？苟活）技巧。

脑袋尖、骨头软、鼻子灵、脸皮厚，被概括为文革风派的行为特征。脑袋尖是风派利欲熏心的官瘾物欲，驱使着他们不甘寂寞，钻营奔走；鼻子灵是风派的才能，惟其如此才能知微见著，抢先下注，博得彩头（一旦失手，就成“聪明反被聪明误”）；骨头软虽是人所共有的畏惧，有保身保家的无奈，也有底线失守的节操阙失；脸皮厚是风派的胆，让他们行事时雷厉风行、弹不虚发。毛泽东亦曾讽刺风派说，他们是“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史书记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元老冯道的得势秘诀是：“观望形势，计算利害，谋而后动，丝毫不差”。

十年动乱造成巨大灾难的全局性错误，所以能延续那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风派。“震派”的得势，有“风派”的成全为虎作倀。因此文革后“风派”遭到了较多的讽刺。改变学术主张趋时逢迎的冯友兰（参加各式写作组的人为数还有不少）、畏祸认罪随侍谄媚的郭沫若等都被指为风派，火线亮相的老干部马天水、洒脱才俊乔冠华也是其中的典型。人们通常认为，如果说随风转舵（被动避祸）还情有可原，那么兴风作浪（主动作恶）就其罪可诛了。但也有人指出，只有当人们有选择自由时，批评风派才有意义；当人们丧失选择自由时，还批评风派就失之于苛求了。

[注]文革流行一句劝降的说辞：“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也给风派搭

了一个梯子。

(参考资料:袁淑娟《斥“风派”“理论家”》，《人民日报》1978年1月31日；道新《“风派”人物脸谱初析》，《解放军报》1978年1月4日)

## 洪广思

北京市委大批判组的笔名。亦署“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写作小组”，其他笔名不详。活动时间1971—1976年10月。署名看上去像是个人，实际是一个御用写作班子。成为左右中国舆论、政局重要力量的几大写作组之一：排名在梁效（清华、北大）、池恒（《红旗》杂志）之后，与同城的初澜（文化部）、唐晓文（中央党校）、辛文彤（北京市文化局）、钟佐文等齐名；彼此间常有默契、配合。活动时间比其他写作组都更长一点。文章经常在《人民日报》、《红旗》、《北京日报》、《历史研究》等报刊上发表。

代表作有《批判唯心论的锐利武器——学习的序言和跋》（《红旗》1971年4期）、《记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重读的序言和按语》（《红旗》1971年13期）、《〈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北京日报》1973年11月23日）、《抓好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红旗》1974年1期）、《革命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红旗》1974年7期）、《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冯其庸执笔）、《孔子的反动一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加强对教育革命大辩论的领导》（《红旗》1976年3期）、《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红旗》1976年5期）。

他们的文章不是单纯衡文说理的论文，而是口含天宪，成为政治学习的常备材料。触及的均为当时的敏感问题，口气很大，动辄锻炼人罪，言辞激烈，表达了四人帮等当道政治集团的意旨，与他们的活动有密切联系，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的组成部分。

后来官至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徐惟诚（时任《北京日报》总编，笔名余心言，著有《八十年寻路记》、《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50多部书）是写作组负责人，上面听命于吴德。成为红学专家的冯其庸（曾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等）诸人是写作组的参与者。徐以“首都新闻界负责人”名义多次出席外事活动。徐、冯这段经历曾受到人们诟病。

与其他写作组活动都止于1976年10月不同，该组直到同年11月还曾一度有文章发表。在揭批清查中因属于“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而被列为北京市委机关清查重点之一受到严厉的对待。但这并未影响他们日后展露才华，仍受重用。

(参考资料:《红旗》杂志1971—1976年；本报记者《北京在前进》，《人民日报》1978年11月9日)

## 徐惟诚

(1930— )安徽芜湖人。政治活动家，新闻出版界官员。杂文作家，笔名余心言。

大夏大学肄业。194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建国后，历任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上海《青年报》总编辑，《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北京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发行了几十万的儿童修养读物《给小红的信》(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2 年版)，在文革中一度被批为“少年版的黑修养”。曾参加吴德领导下的北京市委大批判写作班子“洪广思”写作组，为主要负责人。该写作组名气虽不及梁效、池恒、罗思鼎，与初澜、唐晓文等却是不分伯仲，各擅胜场，互有配合。是《孔子的反动一生》(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的主要执笔者。影响远远超出教育界的黄帅事件即出于他的策划。常以新闻出版界代表、首都新闻界负责人名义参加各式庆典和外事活动。头脑敏捷，处世圆滑，是少数在文革等各种困难险境中均能左右逢源、一帆风顺的官僚和杂文写作快手。

但由于当初“集体署名形式”的掩护和他所处的地位、得体的应对(随时都能颇有创意地积极顺应主流话语)，得到素来赏识他的胡乔木等(其时意识形态掌门人)的庇护，他在“说清楚”的清查中得以顺利过关，没有受到大的为难，巧妙地回避了舆论的追究。他在洪广思中的作用和活动文革后仍被人诟病，称之为“文革遗少”。意在指斥其禁书(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禁刊的一些职务行为，阻挠文革研究著作出版，与文革意识形态的思维、逻辑有内在一致性和延续性关联。

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主任。1964 年 6 月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候补书记。1984 年 7 月—1992 年 12 月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1989 年 10 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94 年 6 月当选为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会长。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学习委员会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有著作五十余部，如《余心言杂文选》、《共产主义人生观漫谈》、《说修养》、《人生探索》、《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等。作品中有众多少少年儿童读物，如《祝你学习好》、《外国人看中国》、《八十年寻路记》、《故事新讲》和《做有经济头脑的人》被选入《少年百科全书》。另外《八十年寻路记》曾被评为中学生最喜爱的读物，获全国少儿读物二等奖。1994 年 12 月荣获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首届“金作家金画家”奖。

(参考资料：王珺《从农村到城市：课外阅读令人忧——全国政协委员徐惟诚细说城乡学生读书》，《中国教育报》2002 年 3 月 7 日；何家栋《丁家班的□□部》)

## 秦城监狱

始建于 1958 年、1960 年启用，直属中国公安部 13 局、专门关押高层囚犯的特殊监狱(1967—1972 中的 6 年由北京市公安局管理)。是 1983 年监狱、劳改农场统一移交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后公安部保留的少数几个关押特务、间谍和其他要犯、知密犯的监狱之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北燕山脚下，东邻秦城村和象房村，西邻麻峪村和坟地村，前邻京密引水渠，后邻燕山山脉凤凰岭下。占地面积 368 亩，总建筑面积 57900 平方米。是 1950 苏联援建的 157 个项目之一；由苏联专家设计。

共盖有四幢带审讯室的楼房，排号却为甲、乙、丙、丁——采取纯中国方式。楼房一律三层，砖结构，坡顶。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供放风用的空地。监室面积有 20 平米左右，内有单独的洗手间。1967 年为适应“文革”中日益增多的犯人关押需要，又仿照以前设计加盖了二幢监舍，排号顺延为戊、己。仍然人满为患。新建牢房为钢筋水泥结构，监室 5—10 平米不等，盥洗台和便池同处一室；便池是蹲式。牢门为双层：外面的一层为铁门，里面的一层为木门。门上除安装了监视孔外，下方还有一四方活动小门用以送水送饭。室内所有永久性设施都被去掉了棱角，被打磨成圆形。铁丝、碎玻璃片、绳索、布条、易燃易爆物品——一切可能被用来行凶、自杀、越狱的工具在这里都没有。

监狱围墙高 5 米、架设电网，有三重大铁门。整个监狱院内被分为三个区域：即监狱区（其中分高级监狱区与低级监狱区）、管理工作区、监管人员及家属生活居住区。办案人员和监管人员按规定严格分开：办案人员（文革时称“专案组”）只处理案情。人员由中组部和其他有关部门派人组成，后来由中央政法委员会牵头，公安、检察、司法三家联合派人组成。监管人员则负责犯人的吃、住、健康。没有特殊情况，前者不允许进入牢房；后者不可以知道“案情”和被羁押者的名字。有名有姓的犯人，到了这里，都被用代号取代了。代号是一串数码组成的数码。数码分两个部分：前面的数字标志该人的入狱年份，以公元纪年表示；后面的数字表示该年份中入狱的序号。如“6901”，前两位数代表 1969 年，后两位数代表收监顺序是该年度第一人。管理人员则只剩下职责分工的称呼，如“管理员”、“看守”、“监狱长”等等。

最先被用于关押国共内战时被俘的国民党战犯，军衔至少在少将以上。随着逐批大赦，到 1975 年最后一批离开为止已不再有战犯留存。随后陆续关进了来自“革命阵营”内部、被视为有通敌、叛变或重大国际背景的异己分子，或某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如“胡风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彭真、刘仁叛徒集团”主要成员、“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及中共建政以来历次党内斗争的被整肃对象。其中党内职位最高的有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如王洪文、张春桥；行政职务最高者有政府副总理、部长、省长，如陆定一、彭真、薄一波等；军衔及军内职务最高的有大将、总参谋长，如罗瑞卿、黄永胜等。另外还有一批特殊人物，那就是位卑权重的中共中央领袖“秘书族”，如陈伯达、师哲、李锐、戚本禹和鲍彤。从最低职位来说，至少也在处级以上。1980 年代末首次容纳政治见解不同的普通学生和各式知识界文化界人物，2000 年代前后也监禁有经济犯罪、受贿罪中的重刑犯。

按不同级别，犯人享有“单独囚禁”与“集体囚禁”两种待遇。伙食定量为 32 斤。每月的伙食费（按 1990 年代物价水平）高级囚犯每人在 120 元左右；低级囚犯每人仅在 30 元左右。一日三餐（星期天与节假日只有两餐）由管理员统一送到各监室门前。在低级监区，犯人自己保管餐具，开饭时，通过一个离地面约一尺高的送饭窗口递送。正餐内容为“一菜一汤”。主食一般是米、面、杂粮搭配，菜是时兴最廉价的蔬菜，少有油水；汤则是名副其实的“涮锅水”。早饭是玉米面窝窝头与一块拇指大的咸菜疙瘩。在高级监区，则备有统一饭盒，不使用送饭窗口，而是开门配送。菜有两素一荤，有“真正的汤”（李敦白语）。每周一次配送牛奶、水果；特殊犯人或将出狱的高级犯人则有更好的待遇。监狱每天对犯人供开水三次，每次一杯。发放的大瓷缸就是给他们储水用的。一周或一月洗浴一次不等，每次半小时。不论男女，洗浴时不得开门，由同性管理人员在门外监视。由于这里关押“犯人”的级别、特殊地位，按照对“知密犯”实行隔

离管理的规定，对他们实行单独放风制度。

犯人每天早上七点听哨音起床，晚上九点听哨音睡觉。平时不能躺在床上。被褥是薄薄的士兵用褥。低级囚室则用稻草垫铺。晚上睡觉不能熄灯，手不准放在被子里面，不准背对监视孔侧卧。否则，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会被叫醒，并受到训斥。此外还有不准损坏公物，不准在墙上乱写乱划，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唱歌，不准背对监室的门之类的规定。他们除写检查外，还须接受“外调”。战犯曾参加过重体力劳动，犯人也安排轻微的劳动，如做火柴盒、用麦秆编织做帽圈的麦草辫。这类劳动一般在囚室内进行。

荒诞的是，文革的整肃者和他们的猎物都关到了这里：黄克诚、万里、刘仁、林枫、王光美、周扬、袁庚、贾若瑜、王任重、穆欣（6831）、矫玉山、王广宇、吴法宪、邱会作、陈励耘、江青、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徐静贤、王秀珍；文强、张东荪（1973年死于狱中）、严佑民、叶浅予、黄苗子、夏衍、丁玲夫妇、陈里宁、姜椿芳、绿原、孙冶方、刘立明、叶笃义、刘清扬、陈真仁、孙维世（100号监室）、金敬迈、爱泼斯坦、陈学诗、刘景范、刘诗昆、李敦白、严慰冰（99号监室，6707）、严昭、严梅青、严平、张宗炳等。

文革中折磨犯人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有罚站、不给犯人喝水、打骂，坐“喷气式飞机”。受惩罚的犯人还会被戴上镣铐，最严酷的是背铐。秦城监狱建设者、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就被戴上过这种镣铐。许多人在那段时间内致疯、致残、致死。1972年因毛泽东指示而基本制止。金敬迈撰有自传《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获2004年“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记叙秦城监狱的囚禁生活。

（参考资料：《秦城监狱是个什么样子》，“BT俱乐部”B.K 2004-06-10；《揭秘尘封岁月档案——讲述秦城监狱的故事》）

## 霸权主义

名词。1974年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霸权主义的概念。是他一以贯之的民族主义倾向、世界景观和反霸防修思想的体现。具有国内意识形态逻辑框架和外交政策支撑两种既有区别、又有关联的功能。

它是指在国际关系上，大国、强国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超越国际法、国际政治格局现状一味扩张自身势力范围，操纵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甚至进行武装侵略和占领，称霸世界、主宰世界的强权政治、强权政策。冷战时期，主要是指美国和前苏联这两个在核武器和军备竞赛中握有绝对优势的超级大国的对外政策。成了苏美的代名词。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概念并举，带有强烈道德谴责意味。比直指帝国主义在外交礼仪上显得相对委婉一些。与英文 Hegemony 或 Hegemonism 指非均衡的政治支配状态，特定政治布局中某一国因其政治和经济实力之优势而具有主导运作的局面不同。

文革中对美苏这一政策的广泛谴责，成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国际根据和背景，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基本逻辑预设之一。霸权主义就是国际上的阶级敌人，就是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它经常被用来营造强敌环伺的紧张气氛，教育党团员和一般群众保持高度警惕，激励他们同仇敌忾（“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接受官方意识形态，一致对外；从反面论证现政权的合法性。当国内社会矛盾尖锐时，它成了模糊视线，转移焦虑中心，平息民间底层敌意的替罪羊、屡试不爽的法宝。用霸权主义指称苏联超过指称美国的次数。霸权主义概念，在对外时就



成为中国以第三世界代言人自居，动员第三世界国家，争取与美苏抗衡的政治资源。具有从边缘挑战主流、中心的功能。

这丝毫不影响中国当时既利用前苏联的军事物资援助，在越南与美国扶持南方政权的战争对峙；需要时也与美国搞缓和，谋求重建外交关系，借以牵制前苏联在我国北方边境地区的庞大军事存在和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霸权主义也只是中国外交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借口、合理化手段而已。

越南曾被中国称为“地区霸权主义”。反过来，越南亦称中国为“霸权主义”（近代以前中国曾是越的宗主国）。

文革以后、1980年代前期，这一概念仍在继续使用；只是逐渐地频率越来越小。随着改革开放、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实用主义的泛滥冲击、取消了阶级斗争话语的统治地位，这一主要起源于冷战时代的概念日渐式微。到1990年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对俄罗斯已经不再使用该概念。当中美经济、政治、外交摩擦上升时，又被用来主要指称美国。

（参考资料：谭中《美国“霸权主义”的诠释与定位》，《联合早报》2000年2月28日；崔勇列《大国力量与大国之道》，《读书》2004年第7期）

### 三七开

名物化状谓偏正词组。作为评估事物的一种认识方法，喻指人或事的功大于过：“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他七分，错误算它三分。”（《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77）

它是毛式实用理性辩证法的直观应用。对政治现实、天下大势做判断时，首要的是，判明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还是七分错误、三分成绩？其余的，可以四舍五入，忽略不计。既能够用于对政治人物一生功过的评价，也能够用于对某一事物、对某一事态、某一局势的大的估量。数学上利用四舍五入法求近似数的估算方法，是在不需要精确计算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简便的、粗略的计算，它具有排除干扰（臃余）讯号、运算快捷的功能。把这种数学思想运用到认识实际中，成为国人数字化评价的经典公式，被到处套用：计其大，不计其小，简约而清晰，不搞繁琐哲学，便于认定，便于在此基础上迅速做出行动反应。

这是从政治正确立场出发的行动家的侧重实用的认识哲学、历史哲学——政治上正确与否（延安还是西安？与我是否一致？）是决定性的。不做客观、具体、精细的个案剖析，不做定量测定、描写，满足于总体的模糊把握，是这种认识方式的特点。它的另一个暗含前提是承认事物的缺损和不完备性，只是基于政治考量，肯定其主导性的方面，而忽略其次要的方面。否定科学认识的必要性和检验标准的客观性。它的从权顺变思想，埋伏了通往诡辩论的危险基因。

好得很/糟得很、延安/西安、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东风/西风、三七开，都是同一思路、方法。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是别的都好，只有说假话（桌上握手桌下踢脚），虐待俘虏做得不好。用对细节的具体否定，掩饰对总体全局的抽象肯定。“有些地方前一段时间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就是好、就是好”之类结论，就是这样推导出来、强加于人的。

它是强势集团垄断话语权的谋略。没有具体分析、量化测定，凭什么排除事关大局的政策评估里那些缺点错误的方面？只有政治权力可以做到这一点。它的

理由通常是为了大局，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轻装前进，就不要纠缠细节了。这是专制制度（包括社会主义）为了统一意志、对付持不同意见者，强制推行既定政策时的煞手锏，面对失败时惯用的强辩术，凭借权力来文过饰非，冠冕堂皇地粉饰天灾人祸；使人在罪行面前丧失恐惧感、道义感，变得脱离现实、为所欲为。姚文元曾说，“唱‘社会主义好’，总不能唱‘同时还有缺点’吧”。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数学室《九年义务教育五年制小学数学第五册教师教学用书·乘法估算》，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http://69.41.161.6/HuaShan/RECS/laotian/gbcurrent/104190.shtml>；郑德荣等《新中国纪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 病退

1970 年代初，国家政策允许严重病残（患有高度近视眼、高血压、肝炎、胃穿孔等）、久治不愈、丧失劳动力的中学毕业生，经医院病检开具证明，申请免下或缓下农村。已经下乡但因病丧失劳动力的知青允许返城。为防止影响下乡知青的整体稳定，该政策被规定“不下文字，口头通知，内部掌握”（1970 年 4 月 11 日河北省承德地区安置办《电话通知稿》）。1973 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因严重病残丧失劳动能力的下乡青年，经与所在县批准，与原动员城市协商，应允许转回城市。”这一政策原则上限制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范围，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它的负面影响。

小说家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 1983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就是陕北插队知青，因肢残病退返城。张曼菱（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被改编为电影《青春祭》）因严重关节炎从云南省中甸边境的盈江县一个傣族村寨病退回昆明。

病退范围的大小、宽严，各地掌握的具体尺度不一，但大致都包括了癫痫病、精神病、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猪囊虫、多次复发的慢性肝炎、肺结核、癌症、高血压、心脏病、肾盂肾炎、严重胃溃疡、胃穿孔肾炎等。总的趋势是，越往后期放得越宽。

1970 年代初，对病退的控制比较严格，到 1970 年代中、后期控制趋于宽松，审批权限由市一级下放到区、县、团一级（北京市、浙江省、内蒙古兵团等）。不少知青（尤以支边的云南、内蒙古、北大荒的知青为最）不堪农村生活条件的艰苦，参军、招工读书无望，通过为了办到病退返城，不惜托关系、送礼、走后门，甚至以戕害身体为代价作弊，但求通过病退休检。

比较典型的作弊方法有：香烟锡箔贴在背心上，或透视前连抽几支浸泡碘酒的纸烟，X 光机一照就是一个洞，成了“肺穿孔”（前者取巧后者自戕）。量血压时臀部微微离座，双腿呈马步半蹲。心中尽力使劲，量出来的血压准高（医院的对策是复查时要你睡一觉，躺着量）。头天吃点猪血，第二天的大便常规起码是三个+的胃溃疡。化验小便时加一滴血滴进去，就可验出加号，被认定肾炎。或者借他人的病历、X 光片，找有病者顶替检验。

在此情况下盖着行政机关和医院公章的病退证明信成了可交换的商品。这种

方法，被称之为返城的“黑道”。行贿的对象有社队、兵团、街道居委会干部和检验医生。贿赂品从初期的高级香烟、好酒，后来的高级缎面、上海牌手表、红灯牌收音机，直到人民币现金。

因为其时的大趋势已经是解决知青返城问题，具体怎么走只是手段、形式，所以管理部门、办事机构也就整只眼闭只眼（能做不能说）。文革结束时，全国通过病退返城的知青，约达 50.4 万人，占下乡知青总数的 4.2%。

有人千辛万苦办病残回了城，却因为病残就不了业。

（参考资料：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P49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邓贤《中国知青终结》，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初澜

笔名。另有“江天”、“洪途”、“小恋”等笔名。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下文化部“文艺评论”方面的御用写作班子，名次仅列于梁效、罗思鼎、池恒之后。其具体事务由于会泳任组长的文化部创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管；写作组长张伯凡。活动时间为 1973 年到 1976 年 10 月，共发表文章一百六、七十多篇。

其代表作有《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红旗》1974 年第 1 期）、《评晋剧》（1974 年 2 月 29 日《人民日报》）、《京剧革命十年》（《红旗》1974 年第 4 期）、《深入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从标题与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谈起》（1974 年第 4 期《红旗》）、《坚持文艺革命 反对复辟倒退——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的回潮》、《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1974 年 8 月 4 日《人民日报》）、《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1976 年，虽流产但观点已通过其他渠道在创作、评论中得到传播、落实）、《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 年《红旗》第 3 期）。

积极配合当时对建国 17 年（文革前）文艺的大批判，“破”的方面，鼓吹“文艺黑线专政”，批“黑画”、批无标题音乐（据称批“黑画”、无标题音乐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批《三上桃峰》、批《园丁之歌》，对艺术进行缺席的政治宣判，成为文艺方面的一只战斗力很强的棍子；“立”的方面，脱离现实主义贩卖创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根本任务”论，要求“高于生活”，按照“主题先行”、“三突出”的模式进行创作，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

其文章首先被《人民戏剧》、《人民电影》、《人民音乐》、《舞蹈》、《美术》等文化部所属全国性艺术刊物转载。其评论文章不是单纯的批评，而是文艺政策的风向标，权力运作、政治压迫的一种形式——一篇批判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就使多少干部挨了整、下了台，有的还被关起来隔离审查。

除此之外，该写作组还担当了文革文艺大批判的某种组织、协调工作，承担了收集文艺界不满于会泳及其主人（四人帮）情报的任务，协助对持不同意见者肆意打压。一位山西中学教师批评“根本任务”论，认为要“突破样板戏的框框”文艺才能发展。受到初澜口诛笔伐和当地批斗威逼，被迫害致死。

写作组参与人员在 1976 年代中后期的揭批查运动中，被要求说清“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参考资料：申涛声《阴谋文艺的一股狂澜——评“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

初澜》，《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5日；丁东《文革“写作组”初探》）

## 打倒

动词。（从政治上）攻击并使之垮台；推翻。在政治上判定某人属于敌我矛盾之后，一种激烈的、对抗性的政治行为。伴随着昂扬的情绪激荡、攻击行为。

这是文革中使用频率最高，最能表现文革特点、性质的动词。从时间上看横贯整个文革，从文革前的批判《海瑞罢官》、工作组，经红卫兵造反、批林批孔，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揭批四人帮。从打倒的对象上看，国外是帝修反，国内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林彪反党集团、“四人帮”和各级走资派、黑七类。“打倒”的普遍性达到“打倒一切”的程度。

用于打倒的手段，从口诛笔伐的张贴标语口号、写大字报、声讨批判，开批斗会，游街，心理摧残的人身侮辱有戴高帽子、挂黑牌、坐土飞机，到强制侵犯人身权利的抄家以查抄罪证，没收书籍、文件、照片、财物等个人物品；从政治上的审查、宣判，罢官，专案组栽赃构陷，无休无止地写检讨，接受审问、外调，到肉体摧残的武斗、私刑，关牛棚，不经审判的拘押、坐监牢；从行政上的靠边站（撤消一切职务）、贬斥、罚做苦役、遣返回乡，限制行动自由，到经济上被冻结存款、工资降级，只发最低生活费。其残酷程度，令人发指。更加被从党史、毛选、文件等一切文字记载中抹去名字（代之以XXX），像是这个人就从来不曾存在过。

由于被打倒对象的大小（从基层有历史和现实污点或莫须有罪名的普通人到单位领导，从小学者到大权威，从地方党政官员到中央领导乃至国家首脑……），打倒涉及的范围有大小、时间上也有长短。打倒的动机，从政治上不同的见解、利益集团，不同的组织宗派，学术上的不同主张、流派，到个人的嫌隙、私怨。

其动力，既有运动组织者的社会理想（反修防修）、政治需要（清除政敌），长期工作客观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干群、师生、城乡、），又有社会下层诉求无法上达，被忽视、受打压、被剥夺时对一线行政官僚的怨气敌意，青春期学生对革命的憧憬冲动，临时工、下乡知青为自己利益揭竿而起，甚至还有右派以受走资派迫害名义的造反，文化失重带来的虚脱感、现代化受阻的焦虑……他们都呼喊着“打倒”的口号。

而打倒的目标制定者，从上有毛泽东下到最普通的老百姓、群众组织，千头万绪、层出不穷，使政治斗争在总体上呈现出无序状态；总原则上仍然服从于中央，具体的又无需哪一级领导机关的批准。各级重要人物（主要是中央一级）有专案组经管，基层多由群众造反组织决定。没有法律程序，没有组织审批手续（组织本身就被取消了）。以打倒为目标的运动，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无止无休，弄得国无宁日。服从于毛泽东打垮摧毁一线党政系统的总目标。这也是文革被后来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国民判定为动乱的原因之一。

但也有两面性：有时是暴烈的实际行动，有时是温文尔雅、口不应心的表态。从时间上考察，使用频率高的比较集中在文革初期的1966—1968年间。其他时间段虽然也有出现，如批所谓“教育界黑线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但以广度和强度而论，均不及文革初期。

（参考资料：张化等编《回首“文革”》上、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 知青歌

名词。知识青年自编自唱，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歌曲。创作、流行于 1969 年至 1979 年之间。其代表作有《南京知青之歌》（任毅）、《年轻的朋友你来自何方》（重庆知青歌）、《广州知青之歌》。

这些歌曲多咏叹故乡的美丽、父母的亲情、朋友的离情别绪、青春的美好、人生的希望、生活的艰辛，表达了复杂的青春期感受——难以言说的思念之情、惆怅之情、哀怨之情，苦中作乐的自我调侃，和清纯凄婉的情歌。虽然他们仍只能局限在认同于那时的统治思想，无法从理性上认识上山下乡运动的荒谬性，却由亲身经历本能地感到生活失去了意义：靠劳动养不活自己，学到的知识全无用武之地；农民在贫困中求生存的觅食技巧表现出极端狭隘性，“再教育”之说只是画饼。加之，青春期憧憬所特有的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使他们的感伤更加凄迷，他们的自嘲懊丧绝望。

在那些故土难舍、慈亲难离、望风怀人、伤情失恋、人生无常、命运弄人的哀苦、颓废、悲观甚至消极的感喟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对人生、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执着、留恋。尽管瞬间心绪落寞难遣，仍有自慰释怀的飞扬轻盈，虽然夹缠“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夸张自恋，到底掩不住质疑专制不义的纯真告白。革命宏大叙事（“广阔天地炼红心”、“光荣神圣的天职”）和小资感伤（“泪水”、“悲伤”、“爹娘”、“白发”、“姑娘”、“情爱”、“异乡”、“噩梦”）的并置、吊诡形成了微妙的反讽，以其青春的证明，无意中剥落了文革意识形态的神圣油彩，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天问”。它显示了少年时代在初次人生展望中所感到的那种轻烟般的莫名惆怅和哀愁，以特殊形式蕴涵着特殊年代的人性苏醒。

这类歌词虽较少文采、浮浅，却苍凉真挚、哀婉动人。一般是套用现成的曲调，改填歌词，旧瓶装新酒，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也有少数知青自己作词谱曲的原创作品。作者多是老三届毕业的，因为他们受教育主要在文革前，较为正规、充分，表达、感受能力都比其他知青人群强。时间多集中在 1969—1970 年间。但他们中的好些人从 1971 年开始就陆续招工升学返城，唱得更多的倒是 1972 年开始下乡的新三届及后继知青。其传播途径基本为口头传唱，有赖于一对一的直接交往，故有较强的地域性；各地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知青歌。在公社知青会，在上下工路上，一个唱起，大家就跟着唱。边唱边流泪。

虽然知青歌基本上是哀而不怨，但它表达的思想情绪游离于时代主旋律之外，仅在民间传唱，不能也不允许在正式场合出现。但由于知识青年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病，即使半公开地唱也没有人干涉。它便具有了宣泄口、安全阀的类似功能。于是，非主流、反社会、具有离心倾向的亚文化——知青曲，竟意外地有了亲社会的功能。

一些契合知青心情的中外抒情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深深的海洋》、《红河谷》、《梅娘》等），也在知青中流行，被他们称作知青歌。

1992 年底左右，一些音像公司出于商业动机，利用怀旧题材热，录制、推出了一批以知青歌为题材的盒带；创造了可观的效益。[注]但流行的时间并不长、规模并不大。而用电声乐器配曲，走的是轻音乐、流行歌曲的路子，知青歌特有的悲凉感荡然无存，改变了知青歌的原汁原味。当年知青久别重会还会唱起这些凝聚了他们命运悲欢的歌。

[注] 出版的录音带有《被奉献的一代：文革知青珍藏歌曲集》（汕头音像出版社）、《知青之歌》（峨嵋电影制片厂音像出版社），VCD有《自己的年代：知青歌曲珍藏版》（1997年版），书籍有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知青歌集》（平装本）。

（参考资料：陈晓文《2000万苍凉青春的悲歌》，《创世纪》1993年第1期；老例《难忘的知青歌曲》，华夏知青网）

## 牛鬼蛇神

名词。文革中所有被打倒、“横扫”的无辜受害者的共名。口语里常简化为“牛鬼”，其贬义和不屑更甚。

“牛头阿傍”、“铁蛇”，本是佛教传说中阴间鬼卒、护法神人的形象。是零概念。[注1]唐代杜牧用它比喻李贺诗文风格的虚幻怪诞（杜牧：“鲸祛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还是一种描写性质的话语；后又被引喻为歪门邪道、阴暗丑恶的东西（《儿女英雄传》：至于外省那班作幕的，真真叫牛鬼蛇神，无般不有），就带有贬义了。是一种文学性的比喻形象。

毛泽东在文章、讲话中，曾习用此语：“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16）这是指传统戏曲中的鬼戏。后来借指右派，如“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1960年代则进一步泛指敌对势力：“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1963）“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1966）》）语义有对象和宽窄的变化，但都是作为负面社会形象出现的指称符号。

陈伯达1966年5月31日接管《人民日报》，口授、修订的第一篇社论（6月1日），就是阐明文革目标的《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文中该词被用于指称“盘据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社论指控这些“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做“资本主义复辟的梦，……制造复辟舆论……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这篇社论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全文刊载，该词便广为传播，流行于文革全过程。作为政治压迫的合理化，不是妖魔化，没有那么隐讳、曲折、麻烦，而直接是政治宣判本身。

由于该词本来词义宽泛，未经严格定义，被借作为政治概念，弹性很大，先后经历了许多演变：从最初的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很快发展到指称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后来主要指走资派、叛徒、特务等。凡是历次政治运动被打入另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都是。最后蔓延到只要是造反派、当权者不喜欢或认定应打击的对象，无论你的出身好不好，已否做过历史结论，还是说错了一句话，行为作派与众不同……都可以定为“牛鬼蛇神”。它成为了一张无所不包的天罗地网。对这些人的处理，也象他们罪名的确立一样，随意性较大。因为没有法定的政策界限。轻的被贴大字报、批斗、审查，剃阴阳头，限制人身自由，关进牛棚；重的被迫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遣送农村落户，注销城市户口，甚至家属亲友也受株连。因为牛鬼蛇神非人，所以可以不以人待之。

被投入牛鬼蛇神这张天罗地网里的生灵，据统计，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达

三百多万件，涉及人数逾千万。[注 2]进入统计的，都是立过案并有结论的，还有部分未立案、未记入档案的，因此实际人数应当还要多些。

[注 1] 逻辑学上把没有所指的实体对象的概念(有内涵无外延)，叫零概念。例如“龙”。见金岳霖《逻辑》。

[注 2] 参见“一小撮”里对文革整肃人数及其百分比的讨论，和出处的注。

(参考资料：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俗语佛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吴林泉、彭飞《拨乱反正立丰碑》，《人民日报》1989 年 6 月 1 日；转引自李谷城《中国大陆政治术语》，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P427)

## 牛棚

名词。文革期间各单位(机关、团体、学校、工厂、村镇、街道)自行设立的拘禁该单位“牛鬼蛇神”的地方。据说“牛棚”(四面透风，用芦苇席子搭顶，临时待人避暑气日头的席棚)一词可能源于南方，因为北方称“圈”不称“棚”。始于文革中后期五七干校时。空气紧张程度有所缓解，可以私下对不公待遇多少发发微词、吐吐怨气。真正的流行是在文革后。

大量产生于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贯穿整个文革(五七干校也是广义上的牛棚)。被拘禁者包括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有问题的人，或所有符合公安六条规定的打击、管制对象；文革后的甄别否定了当初对这些人的全部指控。“牛鬼”的认定(定义、判定、审批)，多少带有随意性。它是一种对被打入另册者监督、专政，进行思想和劳动双重“改造”的制度工具。

牛棚只是约定俗成的民间别称，不见于正式文件、报道；正式的称呼是“集训队”、“管教队”乃至“劳改队”等等，各单位不同。也称“黑帮大院”。其设立，在没有司法或公安机关的授权(公检法自己也被砸烂了)的意义上是非法的，但也不算上私设的，因为它非常公开、没有人敢于质疑它的合法性。它是非政府职能部门(如公、检、法)的企事业单位和学校、机关自主设置的、非正式的专门机构。虽无严格法制意义上的根据，在当时却又是合法的——是群众专政的具体形式之一，是疾风骤雨的革命(政治运动)时期的非常措施。

牛棚分两类：狭义的一种是临时性拘禁的短期设置(也叫“学习班”)，广义的一种是制度性强迫看押劳动的长期安排(主要指五七干校)。

为了便于管理，批斗时随叫随到，也为了让拘禁者学习、检讨，改造思想，把他们都集中起来圈到一个办公室、教室、仓库、寺庙，或废弃不用、狭小阴湿的暗房之类的公用建筑里，一天 24 小时不准回家，吃喝拉撒睡都在那里。剥夺了他们自由支配非工作时间、人身自由不得被非法干预的处置权。把人住的地方称“牛棚”，一则住的人是牛鬼，而牛鬼不是人民就不是人，与牛就有了可比性；二则住宿、伙食等物质条件差(这还不是重要的)，类比为牛圈也相似；三则住者的待遇也是非人的，没有自由(盯得紧的时候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强制检讨，经常性挨批斗，动辄被打骂，比牛还不如(为了保障耕作服役，牛还能得到饲养、休息等优待)。

从对被管辖者、羁押者有行政的、人身的强制限制权看，与监狱并无二致，带有准监狱性质。但它既不像监狱那样有成套的规章制度，有时也相对松散，却

又比监狱对人的处置更随意、更残忍、更血腥：可以随意连续“提审”，用尽体罚强令被羁押者按提审者的要求指证。尤其可怕的是，正式监狱的看管者不认识被监管者，也不负责审讯。这里的看管者认识被监管者，甚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经常性的审讯针对性极强。管制者不是经过职业培训、遵守严格规范的专门工作者，而与管制者之间有直接利害关系。

牛棚生活由劳动和侮辱、折磨（包括批斗、写检讨、接受带有既定结论的外调等）组成。上下午都要在工人安排、监督下从事体力劳动（搬砖、运沙、抬煤、大田农活、后勤等）。同时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运动，接连不断。检讨、思想汇报不是要让当事人过关，而是作为挑刺、寻找打击目标的突破口，稍有前后不一、措辞不当的表述都会成为撒谎、反攻倒算的口实，遭到严厉追究、拷打。在指定时间里向毛泽东像低头请罪，用别人罗织的罪名诅咒自己。强迫抄录、背毛泽东语录，错一个字就要挨训斥、打耳光。管制最严厉的时候通信要通过检查。

文革后关过牛棚成为一种身份见证，他们有学问、有资历，有道德、有勇气、有人品，是受过迫害的人，一定是好人。成为一种可以向人夸耀、炫示的资本。

剧作家陈白尘曾用“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缩写’”，详细记载过自己长达七年的“牛棚”生涯，即1966年9月11日被“‘解押’回京”至1973年“因心脏病发而被恩准回宁治疗”前“半幽禁”的经历。日记原有11册，经整理出版（仅为原文的十分之一），题为《牛棚日记》。该书记叙的“牛棚”，包括了上述广狭义两种形式。

研究文献：描写狭义牛棚的有：季羨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描写广义牛棚的有：杨绛《干校六记》，三联书店1981年版；陈白尘《牛棚日记》，三联书店1995年版；张光年《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赵丰编著《红色牛棚》，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典型

名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团体、事件或经验；与榜样、模范是同义词。“树典型”、“抓典型”，通常是指筛选、培植带有推广价值的先进样板，如工业的大庆、农业的大寨。这是中共常用的工作方法。对此，毛泽东论述说：“典型就是政治力量”，“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

抓住典型，带动一般，以点带面，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鼓动群众的重要方法。这一方法，符合中共典型和全局相结合、特殊和一般相结合的认识论。因为典型体现了中共的战略或策略构想，凝结了指导中心工作、能够带动全局的经验，有人格化的魅力，现实而直观，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号召力和感染力。有利于让受教育程度不高、习惯采取从众行动的基本群众理解、接受，便于他们学习、模仿。它暗含了一种把幅员辽阔的地区看成均质分布的同一类型，从而一个典型就可以普遍有效的尚待证明的假设。中共建政以来曾先后树立了孟泰、石传祥、赵梦桃、雷锋、王进喜等先进人物、集体，文革以来更树立了3211钻井队、刘英俊、顾阿桃、金训华、孙玉国、川藏线上十英雄、朱克家、柴春泽、黄帅、张铁生等典型，在各行各业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运动。几乎每一个运动都有与之相应的典型。



意识形态的功能之一就是制作对典型的解释。对雷锋精神的概括是“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对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精神的概括是“三老四严”：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对以陈永贵为代表的大寨精神的概括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对以张铁生为代表的反潮流精神的概括是：善于识别分数挂帅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敢于挺身而出在教育界大刮右倾翻案风时给以迎头痛击。等等。

典型的传播，一般需要通过党政组织系统的推广和报刊广播媒介宣传两个途径。产生典型的单位，是自然的先进典型，是政绩突出的表现，其负责人常常因此得到提拔。出经验和出干部，是抓典型的基本动力。典型出政绩就是文革的官场时髦。因此基层就有极大的积极性来推动典型的树立，物色人选，精心培养，总结经验，用尽各种办法向上呈报、推荐、争取。各级党组织的宣传干部、记者都会主动配合，参与对典型及其经验的加工、塑造，使之更加全面而具有说服力，以适应当前中心工作的需要。

成了典型就不能垮，才能说明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党和组织正确的一贯性，成为中共实用主义的政治逻辑。国家就要在物资上给予扶持、保障，政治上给予优待，政策上给予优惠。任何试图对典型提出质疑的行为，都是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试图挑战权威的离心倾向，从而给当事者带来麻烦的愚蠢行为。典型单位、个人有义务接待前来取经学习的来访者，或走出去传经送宝，成为总的政治格局中的一枚棋子。往往被树为典型前本色、实干的人，被树为典型后就在组织塑造的氛围里，慢慢地变得浮夸、虚荣起来。

（参考资料：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见《红旗》1969 年第 11 期甘为民《抓好典型》）

## 勤务员

名词。本义指部队、机关里担任杂务工作的辅助人员。“人民的勤务员”作为公仆的一种比喻性别称，是中共意识形态对于官员的道德要求。毛泽东在纪念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作为“老三篇”中知名度最高的篇章，影响到文革中官员称呼时尚的变化。

文革初期被用于红卫兵、造反组织负责人的通称，[注 1]比喻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由勤务员组成的领导集体被称作“勤务组”。革委会初期也被用于指称各级官员。以重新命名的方式，把勤务员作为各级官员划一的正式称呼，代替以前的科层制称谓（部、省、市、县、区；厅、局、处长），强化了反修防修、制止官僚主义是文革主题之一。显示其区别于文革前官僚体制的特征。取消职别后，区别的标识方法就是在“勤务员”前面冠以姓氏，成为“XXX 勤务员”，简称“X 勤务”。

根据“十六条”所倡导的巴黎公社组织原则，红卫兵、造反派等群众组织负责人应该是民主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撤换的公仆。故有此称。[注 2]选用这一称谓，有与文革前走资派等级森严的官僚主义划清界限的意思。他们初期在打倒走资派的巨大难题压力下，内部权力关系处于经常变动的不稳定状态，公仆

意识较明确，尚有民主协商和服务人群的观念；但随着在造反行动中使用权力，以夺权为中心，不同组织派别的争斗和大联合攫取权力日趋激烈的进程，出现了各种分化，运用权谋不择手段；他们中不少人也尝到权力的甜头，权力欲急剧膨胀，不少“公仆”变而为追求个人地位、福利的“主人”。

夺权后的组织形式处于摸索阶段时，曾出现各种试行称呼，“革命生产勤务组”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曾对勤务员一词换汤不换药的形式主义表示过异议。因此实际上“勤务员”称呼的流行时间并不长。革命委员会普遍成立后，仍有主任、副主任等职别的设置、区别。

这或许意味着毛泽东虽然有对科层制抱有浪漫主义恶感（中国人民解放军曾有取消军衔制的举措，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但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统治者，对它强化权力的实用功能还是认可的。又例如，他对“上海公社”将牵连国体改变的迅速制止，表明他对大局的掌控在一定程度上仍有强烈的现实感。

[注 1] 个别地区也称“服务员”。如 9、10、11 大中央候补委员胡良才“1967 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交联络部、乌鲁木齐地区工促会群众组织当服务员”（刘金田主编《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人名词典》，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版）；四川石油管理局石油会战战区“机械化筑路处四大队”威远“红村”在 1966 年 10 月左右曾短暂使用过这一称呼（据文革研究者何蜀回忆）。

[注 2] 季羨林先生就曾是北大井冈山（聂元梓的反对派）九纵（东语系）勤务员，事见《牛棚杂忆》。

（参考资料：北京光华木材厂红色造反者《夺权以后》，《人民日报》1967 年 2 月 4 日；本报讯《革命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人民日报》1967 年 3 月 15 日；段蟠池、王光启《狠斗“私”字，横扫派性》，《人民日报》1967 年 11 月 21 日）

## 红色恐怖

1966 年夏天红卫兵普遍盛行暴力武斗（批斗、抄家、打人）时为武斗合理性辩护、叫好的口号。北京市 6 中后院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简称“西纠”）私设“劳改所”的刑讯室曾书写过用人血涂抹的“红色恐怖万岁”标语。它虽然貌似个别存在，却典型地反映出红卫兵文化的特征，也呼应了把人划分为革命/反革命、人民/牛鬼蛇神的阶级斗争官方意识形态，使其获得极端化表达。

毛泽东与红卫兵宋彬彬“要武嘛”的著名对话（1966 年 8 月 18 日）强烈暗示了暴力的革命性、合法性。同时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的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被谱写成“毛主席语录歌”广为传唱。既从感性上怂恿人们崇尚暴力，更为暴力的施行提供了历史和理论的阐述。毛泽东对 6 月 18 日北大打人事件说：“打就打嘛，好人打坏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由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则直接而毫不含糊地明示了暴力的正当性。毛泽东 8 月 22 日批转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更让全国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容忍默许。

与此对应的现实是，打人从校园里的打老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并学术界推广到各行各业的权威）的戴高帽挂黑牌，到与破四旧偕行的抄家打人，批斗走资派……据旅美学者丁抒的估计，文革初期被打死的约在 10 万左右（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 1700 余人），因不能忍受屈辱、毒打而自杀的有 20 万。其时红袖章、红旗、红宝书、红海洋盛行，红色作为革命象征已经被泛化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连打人这样的野蛮行为也被冠以“红色恐怖”的名称，给予正义性、诗意化的豪迈修饰。在革命的名义下，生命的尊严、价值被肆意贬低、轻蔑，乃至彻底否定。

更加极端的例子是北京大兴县（1966 年）、湖南零陵地区道县（1967 年）对黑五类灭门的事件。其中北京大兴县从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县内 13 个公社（最突出的是大辛庄公社杀了近 100 人）、48 个大队（最突出的是黎明大队杀了 60 多人）先后杀害了 325 人，最大的 80 岁，最小的 38 天，有 22 户人家被杀绝（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湖南道县则动用了武装部和公安、基干民兵等组织力量，甚至成立了派性组织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注]杀死 4193 人（零陵地区全境杀死 7696 人），年纪最大的 78 岁，最小的 10 天。其手段有从刀枪、棒打、绳勒到沉水、火烧、活埋等 10 种。1968 年 7、8 月广西宾阳县由县革委到区、公社逐级动员安排，使全县的 23 种人（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三青团骨干、保长、镇长、警长、宪兵、反动会道门、劳改释放人员、劳动教养释放人员、劳改就业人员、劳教就业人员、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和外逃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有 3951 人被打死或被迫致死。

相对说来，发生于 1966 年的西纠和大兴县事件对贯穿文革全过程的暴力行为更具有普遍性（日常性），而发生于武斗高潮的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事件阶段性特征（派性冲突）较突出。

[注]参见词条“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参考资料：丁抒《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遇罗文《大兴屠杀调查》；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香港《开放》2001 年第 7、8、9、12 期；郑义《广西宾阳大屠杀纪实》。以上材料均见“乐趣园”“华夏知青论坛文革资料库” <http://hk.netsh.com/eden/bbs/8029/>）

## 乒乓外交

名词。1971 年毛泽东利用中美乒乓球运动员在日本的民间交往，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巧妙地打破中美之间关系的僵局，正式揭开两国改善关系的序幕，促使实现尼克松访华乃至中美建交。这一事件，和它所包含的灵巧微妙的外交技巧，被西方观察家戏剧性地称之为“乒乓外交”；中共官方媒体和后来的史学家接过这一说法把它夸饰为中国借此艺术地表达了改变自己的国际战略意图，誉为“小球转动了大球”。

1969 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感到结束越南战争、脱离泥潭必须借助中国的默契和配合；中苏因珍宝岛事件关系进一步趋于紧张，苏联在边界线陈兵百万，中方试图确立以遏制前苏联为目标的多极均势外交。中美两国同时产生了接近的要求，美国同年 7 月宣布放宽对中国人入境签证和贸易的限制，10 月通知中国

停止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并托巴基斯坦、罗马尼亚总统带话，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希望与中国对话。1970年1月20日中美恢复华沙大使级谈判。3月发生美军入侵柬埔寨的事件，中美联系中断到美军撤出后又才恢复。11月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请他转告尼克松，欢迎他访华。双方都在积极探索接近的渠道。

1971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恢复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日本名古屋）。在两国运动员、官员的私下接触中，美国方面频频表示访华意愿。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官员反复向国内请示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月4日，美国第三号乒乓球球员披发嬉皮士科恩幸运地与中国球员梁戈亮练了10多分钟球后，无意中搭上中国球员的交通车，庄则栋主动赠送一幅绣有黄山风景图的杭州织锦给科恩，并合影留念；科恩后来回送庄则栋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运动衫。这一戏剧性事件被敏感的新闻媒体广为报道，并赋予了种种猜测、暗示。毛泽东直到美国队即将离日的最后一天（4月7日）才决定同意邀请其访华，实现了中美两国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民间交往，“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15人、4名记者，4月10日至17日访问北京、上海、广州，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接见。美方新闻发言人随即发表声明，宣布了向中国发放访美签证、取消某些贸易禁令等五个改善中美关系的新步骤，并欢迎中方的对等访问。美国电视台通过人造卫星利用星期六晚上的“黄金广播时间”，播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实况，美国全国乒乓人口达二千万。由于这一事件传达了两国领导人之间战略决策的重要信息，经过当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准备，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并达成了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文件《上海公报》。〔注〕

此前此后还邀请了加拿大、哥伦比亚、澳大利亚、英格兰、尼日利亚乒乓球队访华，中国乒乓球队出访尼泊尔、锡兰、埃及、尼日利亚、南斯拉夫、苏联、意大利、法国、瑞典、加拿大、智利、美国，举办了几次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这些外交步骤，同时对中国打破文革形成的对外隔绝，树立正面的国际形象也有积极影响。

〔注〕有外国分析家认为，此举还间接包含着抑制已经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军人集团继续坐大的某种隐晦、曲折的动机。

（参考资料：高艳林等编《老新闻——共和国往事（1969—1972）》，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梁戈亮《我所亲历的中国乒乓外交》，《名人传记》2005年第6期）

## 半边天

名物化形容词。本义指天空的一部分。引申、喻指妇女的巨大力量能顶起半边天，是基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观念，对妇女社会角色的一种认定；也被用来借指新社会的妇女。成为女性的代称。据说起源于湖南农村。

中共意识形态历来把妇女解放当作社会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主张废除童养媳、纳妾、妓女、缠足等传统陋习，含有基于民众大联合式（统一战线）的边缘挑战主流的话语谋略；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更加动员妇女离开灶台、家庭，进

入社会化的职业生活，通过改善法律地位以确立家庭中的性别平等和政治、经济权力的平等，突破了包括“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种种对妇女的传统束缚，来促进全社会的动员，促进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

1958年雄心勃勃的大跃进，使劳动力供应不严重不足现象凸显，加速了妇女进入职业生活的节奏。几乎在所有男子胜任适应的岗位上，不管是工农兵、教师、官员，还是拖拉机手、飞行员、高空带电作业班……在从业大军里、社会生活中，到处都能见到她们的身影。毛泽东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更加从政治上助长了这种妇女职业化的社会进程。在文革中，对各式铁姑娘班队的宣传，党代会、革委会、积代会（积极分子代表会）都必须有一定比率的妇女，更成为制度和时髦；带有相当的强制性。这在当时，是社会进步、革命化的量度和象征。而同时在婚姻、性观念等方面，女性地位的改变乏善可陈。

与此同时，由于片面、错误地强调男女平等，而忽视妇女固有的生理特点，忽视妇女的经期保护，对妇女的身体健康造成了部分损害。而且除了教育，家务劳动没有社会化，妇女除了职业角色，还得承担传统的家庭主妇角色，实际上承担了双重的负担。在她们的劳动报酬、职业晋升，低于男子以外，还要承受额外的剥夺。在此过程中，妇女的男性化、中性化，和男子的女性化、中性化，就成了一个自然互补的伴生现象。缺乏对妇女解放的自觉意识，使妇女把意识形态鼓动的社会解放当作了自己的目标，她们从家庭解放出来，又成为社会的工具、奴隶。尽管如此，多数妇女仍然衷心感谢这种对她们未必有利的变化，因为其在家庭中的权利发生了实质性的革命。

虽然1990年代下岗现象突出，女性下岗率高于男性，一些妇女回到家庭、厨房，出现了一种“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但是1950年代以来就业模式的强大惯性仍然普遍有效，女性晚婚和自己创业做老板的百分比不断攀升，女人从家庭走向公共空间的仍在继续，中央电视台（cctv）1995年开办的妇女节目就取名为“半边天”。

2000年代的日常语言出现逆向性蜕变，也有把“半边天”当作“功劳高、作用大”的引申、借喻来使用的；并不专指妇女。如果体育报道称“中青队大连小将占据半边天 中超小将依靠经验领跑”，“火箭角色球员撑起半边天 苏拉5投4中功劳不小”。

（参考资料：陈正人《进一步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2日；《“半边天”自主意识高 八成女性家庭事业并重》，《今晚报》2005年3月30日）

## 阶级立场

名词。通常也简称“立场”。从马列主义、文革意识形态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出发，这是指，由于经济地位（拥有生产资料与否和在劳动组织、分配中所处位置）不同，社会人群被划分为阶级，这一事实影响、决定了人们认识、处理问题时的基本观点、政治立场和所抱的态度、阶级感情。用一句俗话来概括就是“屁股决定脑袋”。这种学说认定，人们对自己所属的阶级的社会性质和政治立场具有理性的自觉意识：经济地位——阶级——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社会行为，是一条必然的线性因果链。它类似于政治立场或党性概念，主张“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作为带根本性的认识方法，世界都要通过它的透镜进入人们的视界，而政治（敌对双方你死我活的对峙、决战）就像一副过滤镜，给所有镜像滤去了色彩：要么全白要么全黑，连灰色的过渡都没有。它的过滤同时具有变形、整理的功能。在这样功能的作用下，具体、立体的世界蜕变成了一个抽象、扁平的图像。连事实也可以纳入党性要求处理的范围，划分为符合立场（革命）和不符合的两种，失去了超然的独立性，而成为应该根据需要（革命）捏弄的橡皮泥。[注]

“立场坚定斗志强”是对雷锋精神之某一侧面的描写，“XX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是对站错队的自己人的诘问，“这是XX的阶级立场决定的”则是对运动对象的斥责、批判乃至终审判决。阶级立场，作为对人们行为从现象到本质（敌我阵营的对峙、对垒）的解释模式，是理论（观念）联系实际、并向实际转化的中介。它是一种标准、一种逻辑工具，是观察、解释人们行为动机的根据。

作为标准，它把人们的行为政治化，或者不管人们的行为是在什么范围（连技术专业、私人生活都不例外）、具体涉及什么，总是首先把它纳入政治的框架，作为严厉的指控，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借口、序曲；或者不问实际情况，不问是非曲直，总是固执一个出发点，“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简单采取与敌对面相反的做法。这是形而上学、泛政治化、并把政治道德化的认识模式，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过敏症、政治偏见。它的非理性特征，满足于非此即彼、简单化的二值判断，偏向情绪化的反应方式，容忍不讲事实根据和形式逻辑的臆断、武断，成为了文革中那么多以偏概全、无限上纲、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冤假错案的认识论根源。

因此人性论、人道主义、人的尊严这些流传千年的超越阶级的道德、价值，就统统失效了。甚至被当成瓦解阶级、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凶恶的敌人。于是，怜悯、同情心、爱，被宣判为伪善、虚假、居心险恶的观念形态，必须克服的资产阶级思想、没落意识形态的残余。

作为逻辑工具，它认定阶级立场具有先天性，可以通过生命的衍续来传递，并且无法改变，成分论的政策就包含了这样的假设，甚至还为违反人道的武斗提供了理由（先天的敌意无法改变，只有暴力用来惩戒、威慑）。它是滥用对抗性范畴的一种思想—行为模式，为文革中的社会歧视和普遍暴力，提供了合法性辩护。

[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运用唯物辩证法方法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运用，因此认识就被纳入主义政治的轨道。由于以主义视野为唯一正确的观察事物的视野，从而取消了视界的多元性，导致思想方法认识方法上的专制主义。同时以主义视野所“见到”的现实为唯一本质的现实，从而取消了现实呈现的丰富性，导致现实的遮蔽。将主观话语构造的现实说成“存在”的现实，从而将主观的东西说成了客观的东西——形成一个“立场=党性=主义=科学=客观=现实”的强制性逻辑链条。

（参考资料：王以忠《周恩来：外交干部任何时候都要站稳阶级立场》，“环球视野”第21期 <http://www.globalview.cn/oldindex.asp?num=21>；余虹《革命●审美●解构》，第四章《“现实”的神话：革命现实主义及其话语意蕴》，“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2003-4-9

<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asp?id=528>)

## 李劫夫

(1913—1976) 吉林省农安县人，本名李云龙。作品多署劫夫。现代音乐家。

1935 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开始作曲作画。1937 年到延安参加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次年加入中共。代表作《歌唱二小放牛郎》(1942)、《坚决打他不留情》(1947)、《革命人永远是年轻》(1950)、《我们走在大路上》(1963)、《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1949 年后历任东北音专校长、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兼中国音协辽宁分会主席等职。1964 年出版的《劫夫歌曲选》(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录了 205 首作品，善于融会北方说唱音乐、戏曲音乐艺术手法，故具有浓郁民族风格和通俗、质朴、自然、生动的艺术特色，风格热情洋溢、豪迈乐观，时代特点鲜明。与其妻张洛育有三女(李青、李国运、李丹丹)。

1966 年 9 月 30 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批经官方审定认可的“毛主席语录歌”，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三首歌在“文革”中使用频率极高，被称为“老三段”)等 10 首里就有 8 首是他的作品；并被广为传唱。成为“毛主席语录歌”的创始人。这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语录歌”，其特点为尽量将曲调规范化、对称化，在旋律上力求简单而有效果，节拍、调式上极度贫乏。所作歌曲还有《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等，为当时的个人崇拜助威造势。文革初期作为走资派受冲击时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保护。1968 年任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为林彪诗词《重上井冈山》作曲(1970)，并给林彪写了一封表示“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的感谢信。

1971 年 10 月 20 日从锦州押到沈阳关进“学习班”进行审查，重点追查只拟了一个标题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出于推测，为迎接林彪上台准备)。1976 年 12 月 17 日中午 12 时许因心脏病发作不幸猝逝于“学习班”。1979 年辽宁省纪委于 11 月 20 日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

1972 年初广播电台、电视停播劫夫所作歌曲，直到 1980 年代《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方始解禁。1997 年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演唱了《我们走在大路上》。1994 年 4 月 1 日辽宁在沈阳回龙岗公墓为劫夫举行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4 月 3 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记者文章《深深的怀念》。

(参考资料：陈益南《红色音乐家李劫夫在“文革”中》，《南方周末》2004 年 7 月 16 日；梁茂春《歌曲的“异化”：论李劫夫的“语录歌”创作》，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

## 大老粗

或简称“老粗”。原指文盲或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含有轻微贬义，常被用在自谦的意义上。有一种自卑的畏怯感。是工农兵在文化类型上形象化的无意识定位。但在 1949 年以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天地里，原有的语义色彩逐渐褪去。知识分子最初(1950 年代)与小资产阶级挂上了钩，到文革时(1960 年代)知识分子大走背字而沦为“臭老九”，该词倒变而为含自炫意味的褒词了。不仅

没有人敢于用鄙夷的口吻拿该词贬斥谁，也不用藏着掖着似的说起便低眉顺眼很羞怯的样子，绝对可以狠拍一下胸膛以此自称的。例：“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党支部书记，过去是个大老粗，斗大的字识不了几筐，一没文化，二没能耐。”（《人民日报》1960. 7. 1. 四版，转引自《汉语新词典》，闵家骥等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

因为当时文化、知识与封资修划了等号，拿文化当饭碗的“臭老九”，总和“白专道路”、“三名三高”这些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的烂污货分不开。他们是人群里的少数派，他们的成份、出身多数不好（不属于工农兵即有贱民之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不卑不亢的脾性、打扮讲究的洁癖也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讨厌，仿佛做黑社会、偏行生意的白相人、倒霉蛋。人们亲身经历：文革就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始的，大字报，高帽子，阴阳头……已永远地剥夺了“士”赖以千年相传的尊严。伟大领袖高屋建瓴、挥斥方遒的议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已楔入人们无意识的深处，化为全民共识，表现在社会生活、世故人情各方面。

那时的文化逻辑是，没有文化的人都是苦出身，他们是革命的基本力量、自己人，应该享受被剥夺的权利，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从英雄史观到奴隶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成为社会的主人。而实际上，三结合的机构——革委会都给了大老粗一席之地，作为阶级路线、红色江山的象征，工农兵取代红卫兵成为了文革的主体；工宣队、军宣队、农宣队昂然进驻科教文卫上层建筑，以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猎户李勇奇（《智取威虎山》）、退休工人高师傅（《海港》）、忆苦的贫农大娘（歌曲《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在黑暗中哀号绝望的佃农（泥塑《收租院》）……占据了文艺作品描写的中心；洗得发白的劳保服成了与军装等价的流行时装；连搞科研项目，也得象征性地安排一个、半个根红苗正大老粗，以证明“卑贱者最聪明”、阶级路线没问题，工人工程师成了又红又专的代名词；与工农兵结婚被非劳动人民出身的男男女女视为洗去耻辱、脱胎换骨、争取较好生存空间的捷径，等等。

“我是一个大老粗”，“我们工人大老粗！”作为一种普遍的标榜，蔚然成风，自傲到了以工人、农民、纯种苦大仇深无产阶级自居的地步，似乎单单这样的身份就是真金白银、帝王时代的黄亲贵胄，有相当政治地位，说明社会风气从附庸风雅发展到了附庸粗鄙。

这里也许还有更加广泛的背景：中央的各级领导（红军式、三八式、解放式）也主要是战争年代参军的农民、城市贫民和工人。[注]他们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兴趣爱好，随着成功地占据社会主流地位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趣味。1957年反右时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讳莫如深、神经过敏式的狂轰滥炸（批判）、峻急惩戒（戴帽、处理），大跃进那头脑发热的高指标、瞎指挥，即该趋势深刻影响中国当代史的典型例证。文革中大老粗的走红，只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带些黑色幽默的极端化、恶作剧。

[注]据称，中国上将司令员许世友、韩先楚等就是大老粗。

（参考资料：徐驿敏《听毛主席的话，走自力更生的路，“大老粗”制成了录音磁粉》，《人民日报》1966年10月1日；傅盛宁《知礼方能自尊》，《深圳商报》2005年1月7日；陈东林《冷眼看王朔》，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 走后门

最早的出处见明人王一鹗《总督四镇奏议十●举劾四镇将令疏》：“占公匠六十余名，各色营造私开后门，物议沸腾。”

喻指不依靠正常的途径，而是依靠正规法定规则以外的人情关系加以处理的办事方式。这是因为在官方意识形态文化下还有一种形式多样、渗透广泛的实用性私人关系亚文化，通过这种关系个人可以绕过正式的规章制度从各级干部那里得到包括升迁、住房和就业在内的各种有形无形好处。物资供应和机会的短缺以及干部手上拥有的权力实际上又为这种关系提供了制度性的条件。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苏维埃时代诗人）写过一篇《走后门》诗歌，诗中所描写的事件和人物，和中国当代社会中现象简直毫无二致。说明两者结构上的同构性。

如果说文革前平稳有序的状况，高级官员行政级别标志的全方位享受等级完全保障了他们的利益而不必违规，到文革该利益集团网络的崩溃，只能靠仍在高位的残存者奋起自救了。他们的子女大多进部队当兵，仅韩先楚任司令的福州军区就安排了200多个。一时间，参军、入学、招工、病退回城、插队到条件好的农村要走后门，连看电影，开病假条，买自行车、肥肉、配给的日用品等紧俏商品也要走后门。这样的风气已经弥漫、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73年“批林批孔”时的“批走后门”，江青指名批评叶剑英把女儿送到福建参军。“一时间退兵退学的风潮铺天盖地而来”。[注]毛泽东为了安抚老干部、稳定政局，出面批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并说：“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文革后“批走后门”被列入“三箭齐发”之一，却成了批判四人帮乱政的罪状。可以反证文革初期被冲击、摧毁的利益集团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文革后官复原职的人们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走后门更加严重。1990年代以后，更是从在价格双轨制情况下批钢材、水泥指标，减、免税，贷款，到办个结婚证、准生证，子女上大中小学，求职就业，医院看病，装部电话，减刑取保，都有走后门的。已经成为一个“后门社会”。这种利益集团的腐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底层人群民怨沸腾的根源。

[注]在此前后，王洪文《中共九大修改党章的报告》说：“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袭击，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特殊化，认真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两报一刊1974年社论《元旦献词》：也指出：“共产党员要执行党的纪律和党章的各项规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认真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参考资料：菲柳《“走后门”的由来》，“华夏经纬网”2003.8.21；单世联《关于杨菁的今读》；寒山《极权主义下的新传统主义》，IKY 考研博客-思想评论2005年4月8日）

## 样板戏

指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以戏剧为主的文艺作

品。

它们的酝酿、创作成型较早，最终修改定型并定于一尊则是在江青发表《谈京剧改革》后的1964年—1966年间。江青曾组织、参与、经手过这些作品的改编、排练等后期加工、定型的部分工作，于是被打上了“江记”标志。1967年5月23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那天，样板戏在北京各剧场同时上演。毛泽东先后多次率政治局成员出席观看，以此给予强劲的政治支持。江青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并由此活跃于中央政治舞台核心，均与此有关。

1970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陆续发表8个样板戏的最新演出本。1972年中央舞剧团、中国京剧团等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样板戏。

其后又陆续加上的京剧《龙江颂》、《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杜鹃山》，芭蕾舞剧《沂蒙颂》，钢琴伴唱《红灯记》等，也得以厕身样板戏之列。

由于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政治意义：被纳入了与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相对立的革命文艺路线，被当作批判刘少奇、周扬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论据和武器，被奉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文化革命的典范。它们在运用传统和外国艺术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方面确实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如，借鉴话剧舞台美术形式，用西洋绘画的写实布景、道具、服装，改变了传统京剧重写意、象征的假定性特征；如，有层次的成套唱腔，妥善处理声与情、流派与人物、韵味与形象三方面的关系；又如，以交响化乐队作为京剧的伴奏），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精雕细刻，有可取之处；但也有杂凑生硬、违反艺术样式固有特点（写实布景削弱了想象空间，表演上过分强调体验人物与贴近生活、交响化伴奏使程式化唱腔变成了“京歌”、用指挥替代鼓板以整合文武场）、概念化的阙失。而从它们的创作中，总结、归纳出的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人物的根本任务，三突出创作原则等，却被硬性确立为所有创作都必须遵循的经典规范。有学者指出，三突出塑造的高大全英雄呼唤的个人崇拜，蕴涵着文革的精神基因。

这种树立样板的做法，还被推广到其他艺术领域——绘画里有泥塑《收租院》、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语录歌，样板作家浩然、样板诗人张永枚、样板演奏家殷诚忠，等等。

1969—1972年间，为了“看戏难”问题，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等，由谢铁骊等执导，将它们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发行、放映；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还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并被录制成各类唱片发售。因为样板戏被神化，拍摄电影、录制唱片和移植成地方戏曲，都严格要求不能走样。[注1]1974年四届人大召开时，编创、演出、拍摄样板戏的有功人员受到特别优待，以致挤掉了部分其他艺术门类的代表名额。

文革期间小说、电影、戏剧创作枯竭，文化生活长时期极其枯燥（曾有“八亿人民八个戏”的说法），样板戏经电影、电视、广播反复强制性播放，连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注2]，成为文革时期贫乏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代名词。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插入样板戏旋律作背景音乐，略含反讽；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后文革的影视作品，也常有以样板戏为文革的隐喻，用作背景音乐来暗示的。以其曲调的高亢激越，造成冲突激烈，或主人公命运不安不祥的暗示。

2001年12月2日在南京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京剧节开幕式，就是文革中最流行的两部样板戏的片断：《智取威虎山》的《打虎上山》，《红灯记》的《痛说革

命家史》。

[注 1]王元化曾指控，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有说书艺人为了适应演唱需要而作了修改，被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判了死刑。

据考，谭元泉（原上海钢管厂司磅员）聚集业余演唱爱好者，有时亦参加一些沪剧清唱活动。经常演唱《芦荡火种》、《大雷雨》、《不准出生的人》、《甲午海战》、《孟丽君》、《妓女泪》等剧目。1970年4月25日，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宣判谭犯有：1. 为首组织黑剧团，破坏革命样板戏，先后流窜于本市10个区、3个县的工厂、企业、医院、学校和里弄等170多处，演唱活动280多场次，直接危害群众1.6万余人；2. 腐蚀毒害青年；3. 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罪行后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洪富江（原松江曲艺团说书艺人，1962年曲艺团解散回乡务农，农村故事员）依据公开发表的《智取威虎山》演出本为脚本，同时在展开故事情节、刻划人物时，增添一些“噱头”。1970年1月20日，《文汇报》社完成《关于上海县、金山县有人借讲革命故事为名，破坏革命样板戏的情况调查》。洪被作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大批判“活靶子”押到全县各社镇和上海市区有关单位轮番批斗，3个月内大小批斗会达200余次。上海沪书团施春年案情与之近似。

故，王或他的消息来源可能是把三个案子误植合并弄混了。

[注 2] 最常见的选段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浑身是胆雄赳赳》（《红灯记》）、《大吊车真厉害》（《海港》）、《智斗》（《沙家浜》）、《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智取威虎山》）、《红头绳》（《白毛女》）。

（参考资料：王元化《论样板戏及其他》，载《传统与反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傅谨《“样板戏现象”平议》；申客在“猫眼看人”2005-6-23的跟贴<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684713>）

## 马思聪

（1912—1987）广东海丰人。现代音乐家。

1929年从法国学习音乐回国探亲，在上海、广州、香港、台北举行小提琴演奏会，被誉为“神童”。1931年学成归国任私立音乐学院院长，1939年任中山大学教授。代表作有小提琴独奏曲《思乡曲》、歌曲《民主大合唱》等。1949年建政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曾作为新中国“音乐大使”访问过苏联、朝鲜、波兰、捷克等国。

1966年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和非人虐待，工资降为每月14.5元。6月中旬和文化部系统“黑线人物”500余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文革文件，写交代材料和揭发材料。8月初被揪回中央音乐学院批判，糨糊倒在头上，大字报贴在身上，“资产阶级音乐权威”、“吸血鬼”黑牌一前一后挂着，在学院内游斗。被关进昔日琴房改成的“牛棚”里，不准通信、电话、与外界接触，强迫劳动、挨打。大字报贴到家里，连夫人王慕理也被批斗，孩子担惊受怕。

夫人王慕理和孩子先期离开北京，避至广州远郊亲友家中。11月马肝病复发被准回家居住，其家四合院已搬进四五户人家。女儿马瑞雪潜回北京，得厨师贾俊山、私人医生倪景山帮助南下广州，1967年1月14日以5万元港币买得

偷渡蛇头，全家四人乘黄浦 002 号艇抵香港。后转到美国费城乡间定居。当年 4 月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声明，[注]公开抨击中国文革的残暴。贾俊山、倪景山迅即被捕，1968 年初马被康生、谢富治指导的公安部专案组定为“叛国投敌分子”。

多次在美国各地和东南亚、台湾演出，以其收入作为全家生活费，拒领美国政府的“救济”。创作了取材于《聊斋·晚霞》的舞剧、表现新疆民间爱情故事的《热碧亚》，和大量独唱曲、合唱曲、小提琴独奏曲（50 余首）、小提琴回旋曲、钢琴协奏曲。

1985 年 2 月文化部发出《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得到媒体多方报道。1986 年退赔其被查抄物资并补发工资。1987 年 3 月死于因肺炎引起的心脏病。

1995 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马思聪歌曲选》（简谱版），收入各时期 43 首。1997 年 9 月 25 日、26 日由中央音乐学院等 6 单位联合举办“纪念马思聪诞辰 85 周年音乐会”，演奏了他的 20 多部作品，其中《钢琴弦乐五重奏》、《第三小提琴奏鸣曲》、《阿美组曲》等，都是第一次在大陆上演。

[注] 声明中说：“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我和许多党内外多年以来虽然不是一直掌权但毕竟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人的遭遇是一样的。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像乞丐一样在各地流荡，成了漂流四方“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出走了……”

（参考资料：叶永烈《思乡曲——马思聪传》，《文汇月刊》1985 年第 5 期；张静蔚《马思聪年谱》，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年版）

## 个人问题

名词性偏正词组。广义地说应该包括了私人生活事务，是围绕个人利益的私人生活。当时观念里，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党、国家、社会）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处理私生活也必须奉行公共生活的原则（革命原则）。但在口语里它较多被用于指个人的婚姻、家庭，习惯上被当作间接提及的委婉语。在 2000 年代的人看来该词绕着圈子说话，语义模糊，而在文革中人那里却是指向明确没有歧义的。已婚者的“个人问题”就算解决了，如果大龄未婚，就会被看作存在“个人问题”，引来许多人的非议、关心、帮助。

当时没有私生活的概念。因为私生活概念强调个人权利，把私生活与公共生活划了一条界限，认为公共权力无权干涉私生活。私生活、私权利概念的出现，是 1990 年代告别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滋生以后的社会一精神现象。

这种语义、用法不限于文革，但 1990 年代以后也渐趋淡漠，以致于消失了。由于个人的权利缺位，他的性、性爱、婚姻，没有正当的位置，更多被视为一种基于习惯、社会安定、人生生命周期的义务和责任。领导、同事、朋友、党团组织都可以介入，把它作为当事人推不开、躲不掉的事务，不停地为你介绍他们以为适合的女朋友。因为这不不仅仅是你的私人问题，它关系到你是否按社会公认的

标准行事、生活，是否被认定为正常。

1949年以前、1950年代，对老干部的婚姻，组织可以直接干预，以“对革命有贡献”为名，替当事人包办从介绍认识到劝说速成结婚的一应事务。在保密部门（国防工厂、国防科研、公安或担任领导职务）工作的人，确定恋爱对象时，组织要进行政审、甄别，被认定不符合条件的要劝说当事人放弃。如果当事人不接受，就会给自己的正常工作或仕途带来莫大麻烦。因为在当时的人生计划、婚姻市场上，安全比发展、物质条件、情趣有更重要的地位。即使普通人，也不愿意找一个家庭成分或政治上有问题的配偶。

在文革的思想观念和风气中，个人生活里也有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就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死角。王申酉恋爱被学院工宣队发现后，工宣队就赶到女方单位介绍王的政治情况，以制止阶级敌人诬骗纯洁女青年。乒乓国手庄则栋1987年再婚的对象是日本公民，基于他身份的敏感性（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谁也不敢贸然同意，最后由邓小平同意才成事。此前他在给天津市长李瑞环的求助信中对自己婚事的称呼就是“个人问题”（“请您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我的个人问题”）。

文革后一度因蹉跎岁月而未成家的大龄青年较多，政府认为事关社会稳定，让妇联、团委出面组织联谊活动，做红娘、搭鹊桥。这一形式制度化的结果就是后来婚姻介绍所的出现。

（参考资料：庄则栋、佐佐木敦子《邓小平批准庄则栋结婚》，“光明网”2004年5月12日；wangtj《“误的”一代》，“黑龙江信息港”“北大荒”2000年8月8日）

## 刘文彩

（1887—1949），又名刘星廷，祖籍安徽。与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并列为新中国舆论塑造“地主恶霸”的四大典型。

先人明末为官，后辗转入川移居大邑县安仁镇。其父有30多亩土地，兼营烧酒作坊，有一处十来间房小四合院的房产。刘早年赶牲口贩运货物，做些小生意。

1921年在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中，刘氏家族登上四川军事、政治舞台。其弟刘文辉时任川军第八师团长，在驱逐滇、黔军时占领叙府（今宜宾地区）。在刘湘（其堂侄，时任川军第二军军长）支持下，刘文辉部脱离第八师，扩大为独立旅，成为一支自立门户军阀队伍。刘文辉需要得力助手为其筹措军饷以扩张其势力，1922年他即应召到叙府充任军政要职。

在1922—1931年九年间，先后担任过叙府捐局局长、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叙南护商事务处长、川南水陆护商总处长、川南水陆禁烟查缉总处长、川江航运管理局局长、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和清乡司令。在他任川南税捐总局总办期间，统管81个县的税收（当时四川共有146个县）。滥派苛捐杂税达150余种。强征名目繁多赋税，其中田赋一项，一年数征，有时竟一年预征12年田赋，到1932年时已预征到了1962年。据不完全计算，仅叙府一地每年即征收近1200万块银元税款。

每年从鸦片征收捐税约800万元。农民种鸦片，鸦片种子一入土即收“烟苗捐”，每百窝征收0.12元至0.2元。如次年不再种植，就按上一年度数目征收“懒

捐”。每年约 240 万元左右。向鸦片贩子运输过境征收“烟土税”，每年 4 万多元。向鸦片经纪人征收“经纪税”，“南土”每箱 2 元、“川土”每担 1 元。向鸦片消费征收“红灯捐”，营业烟馆每盏灯每月收捐 15 元，伪警察附加税 0.6 元；不营业的自用灯减半。每年征“红灯捐”约为 100 万元。还贩运“南土”和“川土”，每年获暴利 100 万元左右。1930 年在叙府开办吗啡厂牟取暴利。此外又开办赌场招揽烟客聚赌。

既掠夺税款，又用巨额税款经营官办垄断商业，以牟取暴利。为垄断川南药材市场，在叙府开办“长发元”银号，派人带大批款项到云南、川西等地，把药材中常用的、价平的品种如当归、天麻、半夏、川芎等货源买断；挤垮了其他药号。1930 年重庆鸦片市场疲软，他“义盛”银号囤积“川土”2000 多担。为抬高重庆市场烟价，下令在叙府阻关，禁止其他商号“川土”出关。重庆市场因货源少而价格上涨，“义盛”号乘机高价销完存货。

垄断食盐运销。在宜宾、五通桥、叙永、纳溪等地设立商号，培植盐船把头，安插亲信充当宜宾盐业会会长，操纵和垄断食盐运销。每年运往云南、湖北、叙永、新津、成都食盐约 1 万吨左右，获利 20% 至 30% 以上。因盐价奇高，一斤盐要卖掉四五斤大米；贫苦人户只能吃“沾沾盐”，即象征性地用盐巴往菜汤里沾一下。与当时成都军阀合伙开办造币厂，在银中掺加黑铅，铸造劣质银元。从云南以每斤 20 元低价买回大量黑铅，再以 60 至 70 元高价出售，仅 1928 年就获利 30 万元。

1931 年夏，刘湘与刘文辉二刘之战爆发，后者战败。他在川南失去军事后盾，退踞大邑老家。在川南期间，他数度派人回乡修公馆、置田产；田产猛增到 1.5 万多亩，遍及大邑和川西 11 个县。还在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开设“仁和”、“裕通”、“成益”、“惠通”等银行，控制金融，操纵市场以营利。

刘 1949 年病故不二月，其弟刘文辉、当时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率部起义，遂成为共和国功臣，日后更成为中国林业部部长。

1965 年初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1958 年筹备、1959 年开馆，带大跃进政治色彩），四川美术学院师生们用泥巴塑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收租院》，大小泥塑共 114 个。旋即部分复制泥塑在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展出，引起广泛关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以此为蓝本，赴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拍摄纪录片《收租院》，该片大获成功，解说词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此后，泥塑《收租院》漂洋过海，到日本、加拿大等多国展出。“恶霸地主刘文彩”从此被迫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成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家喻户晓的反派明星，代表着中国人民推倒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 5000 万人次，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人口。极大地推动、普及了文革中的阶级斗争教育，为普遍的仇恨和暴力充当了催化剂。

1999 年 11 月，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笑蜀《刘文彩真相》一书，认为无论是从当时标准，还是以现在尺度来看，刘都算不上什么“好人”；但也绝不是后来被妖魔化的那样坏。[注]指出当年报纸上连篇累牍“铁证如山”的刘文彩罪恶事实，电影一遍又一遍放映的刘家豪宅酷刑用具，如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是按着“阶级斗争”政治模式集体创作出的虚构作品。1988 年，四川有关部门下达过“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当年刘在大邑曾修建文彩中学，占地两千多亩，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据称此举几乎耗尽所有家产。

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老馆长仍固执地认为，“刘文彩是没落阶级的代表，

应该被打倒”。1999年12月17日《新闻出版报》刊登《为刘文彩翻案该不该》（作者贾利亚）。指出：近年来做“翻案”文章已成为一种风气。……挖掘历史人物的“另一面”，要有一个标准，要有一个度。这个标准和度就是放在历史的大视野中看它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刘文彩、南霸天、黄世仁等已是剥削者的代名词和象征，就像周佛海、陈公博是公认的汉奸。……如果对这些人一味地“挖掘”下去，肯定也会有不少修桥补路、救困济难的成分在内。但如果把这些“真相”表现出来，喜儿、琼花们不会同意，赵尚志、杨靖宇们不会同意，人民也不会同意。真不知道，出这类书的意义何在，其导向的目标在何方？该文受到中央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并明确指出：如果把面目狰狞的刘文彩可以翻案成“济困扶危”的正面人物，那么，新中国推翻封建主义制度的斗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希望能采取适当措施予以解决。

聚讼纷纭的争论反映了2000年代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格局，反映了人们复原历史的颠覆-解构冲动和怀恋过去之间的紧张。

[注]赵诚《褪去意识形态色彩后的刘文彩——读“刘文彩真相”札记》揭示了笑蜀著作内涵：“应该怎样看待刘文彩这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时代的历史人物呢？这主要是要看在中国的这场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刘文彩是站在向开放社会转型的正面还是站在其反面。……在20世纪即将结束时，人们可以依着一条更清晰的线索，即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中国现代史上活动的各个政治集团，哪一个政治集团的政治主张和作为更有利于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及各个集团在主观理念上和客观上是起了促进转型的作用还是阻止转型的作用，来纵观这百年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刘文彩隶属的四川军阀刘文辉政治军事集团，从本质上说不是一个有现代意识和救国理念的进步集团，而是一个为这个家族夺取天下或坐大一方的军事割据势力，它更贴近浓厚传统社会改朝换代时群雄并起中的纵横捭阖的军事政治集团。”

（参考资料：《刘文彩生平》，“梦之旅-四川游”  
[http://www.dreams-travel.com/sc/sc\\_cd/sc\\_dzzy/sz\\_news\\_lwesp.htm](http://www.dreams-travel.com/sc/sc_cd/sc_dzzy/sz_news_lwesp.htm)；笑蜀《刘文彩真相》，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lee4851714《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猫眼看人”2005-12-3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880687&page=1>；武兵《为刘文彩翻案的要害是翻中国革命的案》，“环球视野”  
<http://www.wyzxsx.com/2005/printpage.asp?ArticleID=12428>）

## 高帽子

名词。俗称“尖尖帽”。流行于1966年下半年文革批斗高潮时。是一种长约30厘米到50厘米、纸糊锥体（下大上尖）空心的帽子，在批斗会时给被批斗人戴上。帽子上常写有被批斗人的罪名（如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和名字。这种形式似乎源于1927年北伐战争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有别于古代俗语所称恭维人、说好话的送高帽。因峨冠（高帽）博带（阔衣带）是古代士大夫的装束、尊贵的象征。所以奉承阿谀人就叫给人戴高帽子。

与挂黑牌子一样，它是批斗会的一种道具，把被批斗人妖魔化为异类鬼蜮，

不当人看待，对被批斗人进行人格惩罚性羞辱的一种方式。另有画花脸、喷气式（土飞机）等。目的在于从心理上彻底打垮被批斗人的尊严，将其“斗垮、斗倒、斗臭”。虽然不是直接施之于肉身的肢体暴力（尚不足以造成身体伤害），却已成为一种摧残被害者身心的刑具；其毁灭性更加甚之。有人就因为不堪其辱而以自杀维护尊严（中国自古就有“士可杀不可辱”的格言信念）。

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革命不是绘画绣花等流行观念，赋予了这种暴行以合法性。文革意识形态中没有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现代法制概念。许世友曾说：“戴高帽子是对地富反坏的，为什么对自己人也戴？”似乎问题不在戴高帽子，而是给谁戴高帽子（选错了对象）。只要被认为罪大恶极、罪有应得，无论采取怎样极端的手段，就都是正当的、可以被允许的。

通常批斗会和批斗会后的游街示众，都要给被批斗者戴上高帽子，挂牌子，打锣。有的还让被批斗人自己保管高帽子，方便批斗时随唤随到、随时取用。最高的高帽子，有高到1米多的（据说最高达到1丈），戴时需要用手扶着；最重的高帽子，有被迫害致死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戴过的60斤重的铁帽子（用细铁丝绑在头上）。高帽子还是批斗者与被批斗者之间猫捉老鼠残忍游戏的一个由头：如果帽子掉了，揉烂了（极易发生），都是挨斗者的过错——态度不好——辱骂、踢打又有了正当理由！为了增加高帽子的稳定性，有的在高帽子下沿加上类似草帽的系带。传说，相声大师侯宝林自备的高帽子可以根据批斗者要求伸缩拉长，化解了批斗现场的乖戾气氛。

有论者建议，应该把高帽子作为文革刑具之一，纳入文革博物馆的收藏范围。

（参考资料：聂鑫森《高帽子》，《三湘都市报》2004年8月3日；王火《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秦晓鹰《历史的错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 万岁

意谓“千秋万代，永远存在”。这是从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专用于皇帝的颂圣谀辞。延安整风确立毛泽东思想概念后即有此呼。据毛曾被贬黜的秘书李锐说，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毛泽东自己加上去的。文革时，集会、游行的口号，机关、街道、工厂、学校、医院、餐厅、戏院等公共场所和家庭张贴的标语，都有“毛主席万岁”。使用的普遍，已至空前绝后。

除了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列主义等抽象的神圣事物、集体功业外，对于在世的个人，只有毛泽东才能当此一词。这既是官方意识形态、社会习俗规定的祝祷语，又是当时中国老百姓自发地将毛视为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领袖乃至神的普遍观念。在一个严于礼节等级、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不允许有任何的僭越。曾有外国来访者不谙中国规矩而呼喊“周万岁”，把周吓得赶紧制止。因为英语里的“long live”（永远活着）是一般性祝愿，不是专属最高统治者的。

1966年甚至曾有人编造说，经医疗权威认定，毛泽东可以活到100—150岁。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人人奔走相告，有的地方为此发了号外，红榜书写张贴，敲锣打鼓庆贺，成为万口传诵的喜讯。这是文革个人崇拜的顶点。“万岁”，既表达了人们对毛泽东的忠诚、美好祝愿，也不断强化着他们的崇拜、服从，认同毛泽东可以超越生命现象的自然规律，表达了他们坚定按照毛泽东指示办事的政治意愿。同时也是一种对人格和独立思维权利的让渡。



1966年10月1日一位进京观礼的山东烟台市青年女工不断地高呼“万岁”。她说，“全厂工人要我到北京见到毛主席时，为把全厂403个工人的心意带给毛主席，一定要喊403声毛主席万岁。”有人分析说，“古代人民是跪着喊万岁，文革时人民是站着喊万岁”；身子虽然站着，心理却是跪着的。除了政治原因以外，它与中国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生产方式发展水平与自然经济关系密切，是相关联的。

“万岁”也可以成为表面化、应付性的政治表态，如被形容为“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林彪，即是。就像是一种用来交换信任、安全或升迁等东西的贿赂。但牛鬼蛇神不准喊“万岁”，因为分不清与“万碎”的区别，怕他们心怀仇恨诅咒而不利于伟大领袖，又无法对其施之以惩罚。有人由于过度紧张或不小心把万岁的主语错换成其他人的（刘少奇或其他被打倒者），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轻则揪斗，重则判刑。

当毛泽东的健康成为中共政权稳定性、连续性保障的政治问题同时，也成了中共的核心机密。每当毛泽东接见外宾等需在电视、新闻照片上露面以前，都有卫生保健部门提出方案，要注射强心针或使用其他促使人精神处于兴奋状态手段，保证毛始终以神采奕奕的形象面对镜头、展现在公众眼中。以发出领袖健康无恙、政局稳定的暗示信号。越是政局变动的微妙关口，越需要这样的安排。

呼喊“万岁”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文化：列入了官方审定的口号清单，在规定的场所书写、规定的时刻呼喊，被官方媒体正面报道、褒扬、提倡，被看成衡量政治态度（忠不忠）的必要条件之一，有禁止呼喊的特殊限制（黑五类）。在意识形态里体系构成一个必要环节，其功能是塑模奴化心理并使之被放置到无意识中，铸造迷信狂热诱导社会集体越轨。

（参考资料：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后记》）

## 武汉7.20事件

1967年7月20日，武汉8201部队（湖北军区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几十车人闯进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抓走中央文革的王力、办事组张根成到军区大院4号楼批斗，并上街武装示威游行的事件。

1967年2月初武汉工总、二司、九一三等造反组织夺了“长江日报”的权，发表了“二八声明”。以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为首的武汉军区，2月28日公开反对“二八声明”，3月21日宣布工总为“反动组织”，勒令其解散。并逮捕了朱鸿霞为首的一大批工总大小头目。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意在警告武汉、成都等地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和造反派。4月6日颁布中央军委《十条命令》。武汉军区虽被迫释放了除朱鸿霞等人外的大多数工总头目；但不同意给工总平反。正在支左的8201部队（湖北军区独立师）参与了百万雄师专业武斗队的建立和指挥。

从5月初到“7·20”，以逐步清除造反派据点为目的，震惊全国的大规模武斗全面爆发。从1967年6月4日到30日，武斗双方共死108人，伤2774人。到“7·20”之前，百万雄师已完全占领汉阳，控制了除红旗大楼周围地段外的全部汉口，封锁了武昌交通要道。

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谢富治、王力等到达武汉（下榻东湖宾馆），解决武汉问题。15日—18日周恩来主持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30人），听取情况汇报。毛泽东确定了武汉问题的方针，并由周恩来宣布：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要为工总平反；“三钢”、“三新”〔注1〕是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独立师蔡炳臣政委违背周恩来“不要向下传达”指示立即将会议精神传达给师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并调军代表回营听传达，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19日深夜独立师作战部长召集会议，成立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联合的“专揪王力指挥部”。〔注2〕

20日凌晨5点10分，独立师军车数十辆从前、后门冲进东湖宾馆；紧接41辆“百万雄师”武装车辆和“武汉公安”3辆大型救火车跟进。王力、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被独立师军人和“百万雄师”带到了军区大院4号楼。并在军区大院公开批斗并殴打王力（被打伤脚踝），逼他对武汉形势和“百万雄师”性质重新表态。8199部队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带部队赶到保护王力，将“百万雄师”群众、独立师军人与王力隔开。下午并将王力转移到小洪山。

10点后，武装大游行开始。有各种车辆396部，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独立师、8216部队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一说“数千辆卡车排成四路纵队”）“百万雄师”亦出动200多辆汽车，数万人马。满街“揪出谢富治”“打倒王力”口号。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车至湖北大学前，一位独立师军官见大学造反派要抢车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

19日离汉的周恩来20日返回，安排原想要畅游长江的毛泽东21日凌晨2时匆忙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到了上海。

21日独立师、“百万雄师”近千辆车继续武装游行。当天，25军3个步兵师从九江、开封向武汉运动。15军空降部队占领了孝感机场，运动到黄陂。东海舰队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启程当晚可达汉口。

22日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回到北京。当晚，林彪主持中央文革会议，听取谢富治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武汉“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空军“红尖兵”《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称“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

7月23日凌晨，武汉军区收到中央电报，令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进京开会。

7月25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的大会。全国很多地方都在事后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声援武汉造反派。

7月26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的《公告》说：“7·2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为”，“陈再道罪责难逃”。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

欧打中央代表。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

7月28日独立师被调出整训，取消了番号（8201部队）。

中共元帅徐向前、大将徐海东、彭绍辉等被指控为“7·20事件”后台，遭到抄家。

据湖北省委统计，“7·20事件”之后，全省被打死的干部、军人和群众多达18.4万多人。仅武汉市，打伤打残者6.6万人，打死600多人。据称，幕后的戏中戏，其实是四方面军系统对林彪成为接班人不满，而林则想借此为自己扫除军内障碍。

1978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为“7·20事件”平反。有研究者（王年一）认为这是大规模群众性抗争。也有人认为，当时部队存在“中央的文革路线错了，依靠的是知识分子，而非工农兵”的思想情绪。独立师在明明知道前景不妙的心情下，爆发了对中央决策的反抗，是带退无可退、铤而走险性质的。蔡炳臣纵容部下“炮打”，也是经过思考的暴力性抗争。此后再未宣布大规模群众组织是保守组织。据认为，幕后的戏，其实是四方面军系统对林彪成为接班人不满，而林彪想借此为自己扫除障碍（不止于四方面军系统）。

[注1] 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

[注2] 一说是王力在水电学院偏向工总的讲话被“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大力宣传激起了“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的抗争。

（参考资料：余言《也说“七二零事件”中的“8201”》，“林彪·军队·文革”  
<http://www.linbiao.org/forum/viewforum.php?f=9&topicdays=0&start=50>；  
《腥风血雨的武汉“7.20事件”前后》，“西西河中文文化网”2005-03-31；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往事如斯·再谈王力》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5&replyid=4663568&id=688059&skin=0&page=1>；)

## 早请示、晚汇报

一种对毛泽东“表忠心”的祝颂礼仪、例行程序。在当时人们看来，要贯彻、体现毛泽东思想照耀、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就要有一定的形式来表达。因此发明了这样一套程序：每天早晨向毛泽东请示一天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事，晚上汇报一天做了什么、做得怎样、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崇拜礼仪虽然不是官方正式文件明文规定的，但全社会都如此流行，成为风俗、习惯化的软制度。大致流行于1966年—1971年间；比较明确的下限，以“九一三事件”和随后的批林运动为界。[注1]

早请示是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商店开门、生产队出工以前，全体参与者都站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个方阵，鞠躬行礼，手握红宝书举过头顶三呼：“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唱《东方红》，朗读毛主席语录。“晚汇报”则是机关下班、学校放学、商店关门后、生产队收工前，检讨自己一天

有无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忏悔。歌曲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

据李南央回忆,家庭里也有这样的礼仪制度,早饭、晚饭前都要这样做,类似基督教的饭前祷告。虽然机械无趣、一成不变的例行公事让人疲倦、厌烦,但也没有人敢于提出废弃的建议。连精神病院也不能例外。牛鬼蛇神一类“坏人”、犯罪分子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资格,就“早请罪,晚请罪”: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着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用别人给自己定的罪行、罪名大声诅咒自己。〔注 2〕

有学者认为,这一仪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殷商先人的祭日仪式。〔注 3〕

除简单的情感表达方式外,其功能,承担着建立统一的文化制度、语言模式、思维定势等等更根本、更广泛的社会功能。它以仪式的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更能消蚀人们的全部活动力、判断力和批判的识别力,并攫走人的情感和个人责任感。通过这样的仪式,崇拜和臣服不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政治组织形式,而且被内化为一种惰性生活方式、一种奴化精神类型。

2000 年代,喜欢标新立异的新一代修辞家把它作为家书情信的代称;也以此戏称事无巨细、雷打不动地汇报情况,比如员工对老板、丈夫对妻子、子女对父母(表示无可奈何、只能服从的厌恶)。

〔注 1〕有人认定,主要的流行的时间段仅在 1968 年的春天到秋天。

〔注 2〕林昭对这种宗教仪式非常厌恶。每次“请罪”她就去厕所。并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比那个地方(指请罪的礼堂)还干净一点。”被认定“恶毒诬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她的被“从重、从快”处决,与此有关。

〔注 3〕“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殷人于日,盖朝夕礼拜之”(郭沫若著:《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 1965 年年版,355 页)。比较一一还有日本式的“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即集体背诵“社是”(公司的宗旨、经营方针、经营理念),晚汇报即员工向老板打小报告。

(参考资料:王毅《“万物生长靠太阳”与原始崇拜》,《青年思想家》1999 年第 1 期;魏风晋骨《文革岁月·早请示和晚汇报》“五月风论坛” 2005-4-29 <http://www.shchch.com/bbs/printpage.asp?BoardID=15&ID=3460>;《想你的时候,早请示晚汇报》,“北大中文论坛”“散文原创” 2005-5-14 <http://www.pkucn.com/redirect.php?tid=134283&goto=lastpost>;张超英《东瀛留学记识》<http://www.wayabroad.com>;2001 年 9 月)

## 团、营、连、排、班

工矿企业、学校、机关五七干校等社会单位的建制,仿效军队编制,公司工厂车间班组、学校班级、系统单位,均按照团、营、连、排、班的编制组编。这一现象也可以称军事编制地方化。

最初,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即自发模仿军队编制进行编组;它明显受毛泽东《五七指示》设计的理想社会模式——“学生也是这样。即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和关于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等一贯思想的影响。开始时它还只是孤立的个别案例。后来这一套被制度化了:使用这种军事化编组方法时间起讫界限约在 1967—1973 年间,各地情况参差不齐。钢铁企业(局级)的编制呈现公司(师)、厂(团)、车间(营)、工段(连)、班组(排)的大致对应;

学校则年级编为连，班级编为排，小组编为班；干校里一个系统编为营（或大队），一个单位编为连〔注 1〕。但人员规模、组织形式与军事编制不尽相同。这种带有社会变迁色彩的阶段性变化显然需要组织系统的有效保证。

1966 年底出于打倒走资派的政治需要，现存党政领导系统必须彻底摧毁，又不能出现权利真空，毛泽东选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维系社会运转最低管理职能的承担者。三支两军、革委会的“三结合”则使军队全面介入地方政治的进程具体化、合法化，成为文革政治的显著特征。某些军队文化特征即跟随军人而融进地方单位，工宣队的工作、管理方法跟在军人后面亦步亦趋。直至 1971 年“9·13 事件”后方渐次淡出。

为了建立全民接受的军队形象，“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宣传被大张旗鼓地开动起来：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穿军装时起，穿军装，戴军帽，佩军用书包……一时成了时髦。从未间断过的对王杰、刘英俊、蔡永祥等军人英雄的报道、歌颂，在全社会形成持久的军人崇拜：竞相参军（它意味着退伍转业得到一份体面、实惠，令人羡慕的工作），找军人女婿，政工干部基本由转业军人充任，作风军事化……

社会单位编组模仿军队编制，既有 1949 年以来的思想、组织传统因素促成，〔注 2〕与文革前存在于社会各系统的全民性民兵组织有关，也是形势时尚使然，与军队在当时所扮演的角色有关；既有诱使人们认同、接受军人政治的现实功能，又满足了 1949 年以来中共把战争崇高化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审美期待。社会单位编组模仿军队编制，主要是形式上的，管理风格上亦融入了军事化令行禁止、绝对服从的作风（与文革观念史中衰落权力的报复性反弹强化相关），但也有一些军事化内容渗入：如，学生学军，五七干校搞拉练，等。

〔注 1〕湖北云梦泽的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出版口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按军事编制编为第十六连。

〔注 2〕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就曾将劳动力按军事编制，组成班、排、连、营等单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

（参考资料：《钢铁的中国和中国的钢铁》，“杭州行”2004-1-18<http://www.maowu.cn/wt10.htm>；傅振伦《蒲梢沧桑》，载“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编《六月雪》，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版）

## 金敬迈

（1930— ）江苏南京人。曾入主中央文革文艺口负责人的部队作家。

1949 年高中毕业参军，1955 年成为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话剧演员，1962 年因受伤改行任话剧团创作员。

1965 年发表 30 万字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收获》7 月号），描写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英雄的过程。同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封面图片用的是欧阳海奋力往铁轨外推受惊马的塑像〔注〕，郭沫若题写书名，总印数上千万册；得到刘少奇等中共高层领导首肯。读者排着长队争购，当红的畅销小说无出其右。在主人公形象中，基本驱除了革命快感里世俗化的感性成分，而代之以从继续革命理论出发的改造人性的乌托邦冲动。欧阳海的革命激情，总是自觉地与革命教义

相对照，进入了更纯粹、更自觉、也更抽象的叙述阶段。

因书中突出政治，遵循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顺应其时文艺作品要反映工农兵、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潮流，有大段引用毛主席语录的描写，迎合了宣传解放军思想革命化、“毛泽东思想培养造就共产主义新人”的时势，适逢其会而一炮走红。

先后奉命对小说进行了三次修改：第一次（出版前）删去指导员有品质问题，第二次（1967年）删去读刘少奇《修养》情节（改成扔《修养》）和临死前四秒钟的心理描写（遵江青嘱不“搞两个司令部”和苏修电影《雁南飞》那一套），第三次（1978年）删去林彪字样。

在跃居中共中央第三号人物陶铸的推荐下，1967年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文艺口负责人，5月23日接管文化部。成为得到火箭提升般的最耀眼的政治新星，契合了其时从工农兵中选拔英才而用之的时代风气。因陶铸失势，且职务关系经手过江青1930年代剧照的杂志，以“收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阴谋反对毛主席”、“趁主席南巡时，阴谋进行绑架”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罪，同年夏秋投入秦城监狱（单身囚室204-46号）。不幸成了文革政坛诸多阴谋的牺牲品、一瞬而逝的流星之一。单身监禁七年零四个月后，移送河南许昌某农场改造一年多，被挂起来二年多，共失去自由11年。

1978年9月正式平反，恢复名誉，调到广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1988年离职休养。描写秦城牢狱生活的自传《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发表于2001年第5期《中国作家》，2002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同年接受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采访制作访谈节目《看楚翘风流》。2004年获“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

[注]当时曾有一则传播很广的流言：说是书封照片的阴暗线条中，显现出一条绿色的毒蛇，正在冲向毛主席的头像，又有十分反动的标语等。很让人感觉到阶级斗争的尖锐和复杂。但是敌情观念不强的普通人怎么翻过来覆过去地看也看不出那恶毒的图象。

（参考资料：张骥良《作者金敬迈的沉浮》，《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金敬迈谈“欧阳海之歌”》《文汇报》2002年8月15日；《红卫兵日记》，“天一书楼藏书” <http://www.cnool.net/tianyige/collect/hwbrj.htm>）

## 黑店

名词。贬义。旧称“杀人劫货的客店”，近代指没有合法手续的商业机构、服务机构等。文革初期该词常与“三家村”连用组成“三家村黑店”，既实指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作做的事、搭建的组合，作为一个具有致命杀伤力的虚幻罪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又被滥用来指代那些与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有关无关、直接或间接的人和事，或其他被选定要批判、打倒的人和团体（周扬黑店、三十年代黑店、陶铸黑店、反华黑店、四人帮黑店），泛指彼此关系接近的文人、写过批评现实文章的人（或者仅仅是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人）、所有将被揪出来打倒的多人组合（非正式的）。

到后来，所有被指控有政治问题、服务方向问题的人或组合、组织，所有被加以各种莫须有罪名的人或组合、组织，都可以冠以这样的帽子。历史悠久、服务档次高的老字号（如“起士林”西餐厅），远离工农兵，是“黑店”；出学术书

的出版社（如“三联书店”），不为多数人和现实服务，是“黑店”；两口子在一个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或都是业务、学术骨干、权威，是夫妻店，当然也是“黑店”（如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书鸿，所长]李[承仙，党支部书记、副所长]夫妻黑店”）；纯学术组织（研究古典、西洋的思想文化艺术就是封、资、修）也可以叫“黑店”；哪怕仅仅由于是一所学校、医院、研究机关、一个政府部门、一个单位，只要想要打倒你（而那时全局的政治形势就是“打倒一切”），无论你黑不黑，都可以管你叫“黑店”。真是天网恢恢，无远弗届——有点像鲁迅所痛恨的“可恶罪”。你要想不“黑”都躲不开。因为毛泽东的运动意图指向本身就是“天下大乱”。

“黑”指反动、非法，政治性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黑”，抓住只言片语，掐头去尾地引申、捏造、构陷也可以上纲上线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黑”。没有黑，灰也可以指认作黑，反正不是白，就能够指认为黑；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就支持这样的推理。秘密的、违法的阴谋，是“黑”，但只要是人们不知道，或知之甚少的事务、会议，都可以称为秘密的，无论违不违法，都是“黑”的。甚至是人皆不能免的瑕疵，与公共事务无关（那些远离政治的私生活或纯业务都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的个性、同好、人际亲疏，都被可以提升到政治的高度——“黑”。既担任一定职务、管着一班人，又玷有灰渍，就是“黑店”。这样，便能无限制地从非政治范畴过渡到政治范畴，给人或组合、组织安上“黑店”的罪名。

1990年代以来，多指不讲诚信、以假冒伪劣商品坑害顾客，违法乱纪甚至涉嫌洗钱的商店。

（参考资料：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黑店老板的庇护所》，《人民日报》1966.05.10；陈原《驳所谓“三十年代黑店”论》，《人民日报》1978.02.03）

## 黑书

名词。意指宣传或从属于封（建主义、主要指中国古代）资（产阶级、主要指西洋）修（正主义、主要指前苏联）文化思想体系的书籍。“黑”指意识形态上违反、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纲领、原则，文化上崇洋（马、列老祖宗有肯定评价以外的外国作品）媚古（唯物主义思想家、法家以外的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反映对象不是社会主义时代工农兵生活、思想的大众化作品。

文革初期的大批判运动，把无产阶级文化以外的文化（旧俄和前苏联 20 大以后的作品因为苏联共产党变修了也除外）都判定为腐朽没落的旧文化，导致了一场空前的“革”文化“命”的文化扫荡——大规模的破坏文物古迹、禁书烧书。被批判、打倒的政治家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自然是“黑书”，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之类反动文人的杂文、史著、剧作自然是“黑书”，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教授陈寅恪、翦伯赞、梁思成、钱钟书，音乐家贺绿汀、画家张仃）的书也是“黑书”。几乎所有的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文化典籍都被划入会毒害青少年、工农兵灵魂的毒品、黑书之列。古的如《四书五经》、《左传》、《古文观止》、《录鬼簿》、《曾国藩家书》，洋的如《圣经》、《希腊神话》、《莎士比亚全集》、《红与黑》、《巴黎圣母院》、《丘吉尔回忆录》，甚至工具书如英语字典、科技书籍（如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亦被列入）……都无一不是黑书。连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作品（如《太阳照在桑干

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青春之歌》、《红日》、《红岩》等 17 年出现的红色经典) 也被打成“毒草”、“黑书”。

郭沫若主动宣告自己以前的作品都是“毒草”。与大批判同时盛行的抄家, 促使许多藏有书籍的人家事先清理, 把积攒多年的心爱之物烧掉、卖掉, 连许多有价值的善本书也被付之一炬或化为纸浆, 形成一场书籍的浩劫。人们再也不敢读书。有人认为, 祸害之烈, 或甚于秦皇焚书。

文革前夕, 毛泽东与侄孙女王海蓉谈描写鬼狐神怪的《聊斋志异》时, 王海蓉就紧张地问“要不要打预防针啊”, 被毛泽东笑话为“形而上学”。只有样板戏、鲁迅和一两个钦定的作家(写《李自成》的姚雪垠和写《艳阳天》的浩然)的作品可以读。以至于毛泽东自己也觉得不妙, 1975 年就讲“没有电影、戏剧, 没有文学作品”, 要求进行“调整”。

私下里却存在另一个地下读书世界: 对于那些具有反叛精神的青年, 黑书却有着极大诱惑力。那些趁乱从图书馆偷出来的、私藏下来的、漏网的书, 在爱书人之间串换、流通, 滋养着他们荒芜的心灵, 储存着最初的知识积累, 萌动着最初的思考。当然是在不动声色中悄悄进行的, 却让他们有偷吃禁果的兴奋, 乐此不疲……

而在宋慧敏(刘心武《班主任》主人公)看来, 只要国家书店不出售、图书馆不出借的书籍, 都是“黑书”、“黄书”、“坏书”。正由于小说塑造的思想僵化、眼界狭隘、没有任何判断能力的一代盲从者典型, 揭示出文革文化灭绝政策造就文化断裂、人才断层的灾难, 才成了文革后伤痕文学的奠基作品。

(参考资料: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戳穿再版的恶毒用心》,《人民日报》1967.04.07;河南省历史研究所大批判组《批判朱熹的《四书集注》》,《人民日报》1975.01.09;林炼金《父子泪》,《泉州晚报》2001年10月20日;流沙河《与我》,载《锯齿啮痕录》,三联书店1988年版)

## 历史问题

名词。指称 1949 年以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中国青年党、军统外围等反动党团或袍哥、青红帮、一贯道等秘密社群组织, 或虽曾参加了中共又因被捕等而脱党的, 参加过托派活动, 或有叛变嫌疑的, 或身份因无人证明而模糊不清的人, 他们在政治上所面临的麻烦。在当时人们看来, 不管具体情况怎样, 这些问题都是其个人政治历史上的污点。

又分为一般历史问题和重大历史问题。一般历史问题是指, 虽曾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党团但没有在其中任职, 或参加过袍哥、青红帮、一贯道等秘密社群组织却不是为首者; 重大历史问题是指, 担任过职务的国民党官员、参加了中共又因被捕、参加托派活动等原因而脱党的, 在中共内部犯有重大路线错误的, 或有叛变嫌疑的。在主张、实行阶级斗争观念者看来, 有这些经历的人, 就可能与中共离心离德, 在政治上是应该被认定不值得信任的。无论其是否主动交代还是被动承认, 得到的对待都不会有太大区别。有问题由于时间久远没有条件查证而未曾证实, 悬而未决; 悬而未决(没有结论)就让当事人等待调查处理, 在所有运动中接受批判, 据说对不但对革命事业的安全性有利, 而且对这些人的世界观改造本身也是有利的。——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要防患于未然, 一种有



罪推定的前提认定，是阶级斗争思潮盛行年代的现实逻辑。不需要把他们打入另册，因为本来就在另册、永远的另册上。

每有政治运动，他们是第一批被列入整肃者名单、遭到冲击的。因为对此没有争议，没有谁傻到肯为其说话，容易达成共识；所以搜索和谈判成本低廉、现成。方便最快地把运动推向高潮，并随时应付运动进度检查。

这不仅是出于提高保险系数的概率论考量，而且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学铁律。高度警惕的防患于未然，尚且不能完全保证不出事情，如果因为疑罪从无放过坏人而造成破坏、损失，就是右倾投降主义了。至于由此会给当事者的个人权利带来什么损害，在革命事业的大局容不得这样个人主义的锱铢必较。因为既然历史潮流（必然性）不可阻挡，不会因个人的参与与否而有任何改变，个人的委屈就应该被忽略不计。

有历史问题的人，无论业务技能、工作业绩怎样出色都只能补过而不能立功。因为谁也不能确定他们的真正动机是否伪装积极麻痹人民，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使他们被排除在利益分配的竞争者行列以外，让所有可能参与角逐者都乘机理直气壮地松了一口气。这些人往往有学历、有资历，其优厚的薪酬让人妒忌、生厌，对他们政治上的整肃，与经济上的剥夺相偕，也让旁人心理上平衡了许多。即使是讲政策，也是因为要用他们的一技之长，必须他们接受批评、教育、帮助，确有改悔之意，才给其立功自赎、重新做人的机会。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成了人民的一员、没有问题了。宽大为怀是随时可以根据阶级斗争形势需要回收的。

在当时流行的观念中，历史问题是可以传递的：上一辈的历史问题，在贯彻阶级路线的人事制度、政治原则那里，就变成了下一代的问题。于是履历表格的被动者（果）又成了使动者（因）。无辜无助的下一代对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就有了怨恨。

（参考资料：刘白羽《丁玲不止一次向党进攻》，《人民日报》1957.08.28；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而斗争》，《人民日报》1969.05.06）

## 赫鲁晓夫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辞海》的释义为：“（……1894—1971）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首脑。……1939年任政治局委员。1952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大林逝世后，篡夺党政大权，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3—1964）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8—1964）等领导职务。任内借口反对个人迷信，攻击和否定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提出并推行所谓‘和平过渡’等修正主义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分裂主义，破坏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其时虽然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1960年代和文革意识形态的影响还要很久以后才会逐渐消失。

作为国际政治人物，赫鲁晓夫被当作苏共的代名词，中苏意识形态、国家冲突所造成的全部问题，都被归结为他的责任。1956年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引发了东欧的政治风暴，相继发生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炮击金门遭到赫鲁晓夫的指责，苏联又提出成立中苏联合舰队、在中国设立由苏方管理的长波电台以控制中国海军；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苏共突然单方面攻击中共，不久又撤回专家1390人，带走所有图纸、计划、资料，

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257 个，造成重大损失，两国边境纠纷、事件不断；1962 年中印边境冲突，苏共公开指责中国，其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向美国让步……1963—1964 年间爆发中苏两党论战，中共发表了“九评”。赫鲁晓夫在苏共内部分裂中被迫“辞职”。

《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中，为他画出一幅总结性的肖像：“十一年来，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处处说明了他执行的政策是：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国反动派，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革命；联合铁托集团和形形色色的叛徒，反对一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一切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派。”（邓小平 1989 年对此曾评论说，当年“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作为普遍名词，赫鲁晓夫还是一个文学形象、漫画式人物。“赫秃头”就是指称他的口头禅。最著名的讽刺作品是赵朴初的《某公三哭》。在这些作品中，他被描写为做“秘密报告”的“阴谋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强横霸道的恶棍，忘恩负义的小人，品格萎琐、智力低下的小丑（流传最广的是“赫鲁晓夫和猪在一起”的笑话，照片说明：左起第几是……），滑稽的秃头，不走运的倒霉蛋……这一方面是传媒反复传播政治笑话和漫画的作用，一方面是大小报刊各种政论不断勾画的作用。所以把攻击焦点对准某个人，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把政治道德化的传统，效率高，一方面由于有中国革命以俄为师的历史，针对个人不针对人民的策略，也许可以避免与苏联党和国家长期交恶。

赫鲁晓夫成了“修正主义”的同义词。1960、1970 年代在中国名气最大国外反派人物。当时常用的短语，最富于暗示性的，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从现实政治层面上，借指毛泽东意欲打倒的刘少奇等一批国家党政领导人；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它成为一个在虚空中漂浮的恐怖声音，一个反复浮现的无名主恶梦，随时会给我们带来“党变修、国变色”的厄运。尤其是林彪著名的“五·一八”讲话说“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之后，更加如此。虽然人们并不知道修正主义是怎样的一个妖魔，仍然陷入莫名的恐惧之中。经戚本禹批电影《清宫秘史》的宏文首创，“中国的赫鲁晓夫”已经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刘少奇的正式代名词。

其深入人心的程度，到了普通人吵架，恼羞成怒了，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作为夸饰）去指控对方。当笔者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此，“赫鲁晓夫”已失去了作为能指的确定性，成为普遍的“恶”的共名。

后文革时期，赫鲁晓夫自传成为国际共运领袖最畅销的传记，印证了人心的倾向、时代风向的转变。

（参考资料：《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红旗》杂志 1967 年第五期）

## 阶级斗争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关键的术语。它把人群划分为阶级，认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紧张，是深藏于纷繁人类景观中的真实。因此主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阶级斗争的框架，去描写、解释，甚至改造、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它既是一种社会学说，又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政治主张、社会运动。它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必然引起

无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则是由此而通向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注〕

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苏联、1921年创始的中共和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这一理论的投影。

这一概念，自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介绍马克思生平、学说并节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新青年杂志社出版陈望道全译本后，深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化和社会实践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一部分。毛泽东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成为了毛泽东思想及其最富特色的政治实践、政治谋略（统一战线）的逻辑起点。1949年以后，在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等一系列重大转折关头，阶级斗争概念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说是望远镜、显微镜、照妖镜，功能强大，可以使一切妖魔鬼魅无所遁形，不但具有巨大的认识作用，而且具有伟大的实践意义，指引革命无往而不胜。

1966年毛泽东认定，农村有3分之1以上政权、工厂企业有相当多领导权不在中共手里，文艺界多数协会跌到修正主义边缘，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他们的代言人。因此“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关系“党变修”、“国变色”的紧迫任务。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为特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长时期（十年文革）、大规模（全面内战）“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运动。

特别是把劳动与剥削、集体与个人、公与私、善与恶、美与丑、精神激励与物质利益的对立，都纳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范围，把所有社会上的可疑动向、与领导人意志相违背的分歧都看成阶级斗争，这样可怕的偷换使阶级斗争概念离开了经典作家的定义，获得了特殊含义。在使用中，具有任意解释的随意性。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当时的工作方法中成为真理性的信条。在这些观念指导下的、被后来概括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实践，变得特别普遍而具有血腥味。因为在阶级斗争（就是战争状态）里没有中间路线，任何仁慈都是对人民的犯罪。连人性、人道等观念，都被判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他们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了。阶级斗争被运用到历史学，就有了儒法斗争史之类的影射史学出现；被运用到文艺创作中，就导致了假大空的概念化艺术；运用到家庭里，斗得一家人吵吵，夫妻、父子、兄弟姊妹分两派，“划清界限”……哪怕最小的社会单位（小到工厂的班组、街道的向阳院），也非得查出点敌情，搞阶级斗争不可，这出人间悲剧又转化为了闹剧、喜剧。

文革后，中共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劣后果进行了清算、纠正，以实现社会和解，收拾人心，扩大合法性基础。但并未彻底放弃阶级斗争概念，以此作为保留其政治领导地位和专政机器的逻辑预设。即使这样，在民间这一套观念也已经声名狼藉了。如果有人观念僵化、教条、死板而态度严厉、冷漠，就会被人叫做“阶级斗争脸儿”（俗语）。

2000年代新左派在当下社会群体关系的动态描写中亦引进了阶级斗争的参考系，它所传达的社会矛盾和民众情绪信息，都是意味深长的，值得引起注意。

〔注〕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有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指出，由于工业化的进程，生产力的发展，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平等的减轻，阶级间的流动，社会集团间界线的日益不明确，从而导致了工业社会中阶级界定上的困难，现代国家政权阶级属性日益模糊，使

得工业社会中的斗争转变为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但也有人认为，当代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理论的活跃，说明有关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实状况的研究，仍持续地构成今天西方思想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参考资料：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关于“阶级斗争”》，“学习园地”

## 顾准

（1915—1974）生于上海南市。字哲云，又名绛枫、吴绛枫、吴达人、立达、小方、怀璧等。会计学家、经济学家、中国现代思想家。

自幼从母姓；1920年在小姑母的私塾里开蒙，1926年进中华职校读初中。1927年到潘序伦主持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做练习生，1928年成为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学员，担任会计员、查账助理员，1929年成为助教，1934年编写出版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并应聘到沪江大学、上海法学院、圣约翰大学等校授课。

1935年加入中共，先后参与过进社、武卫会、蚂蚁社、职员运动委员会、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等工作。1940年调新四军，任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淮海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等职；1943年调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在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会计训练班任教；1945年先后任苏中区货管处处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49年任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局长。因主张依照税法规定税率“查帐征收”反对“民主评议”被撤职，1953年调建工部财务司工作。1955年进中央党校学习，1956年到中国科学院社会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

1957年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第3期）。同年参加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顶撞苏方专家被划右派。1958年到河北省赞皇县接受监督劳动，1959年到河南省信阳专区商城县劳动改造（著有《商城日记》）。1960年到中科院清河饲养场、宁河农场工作。1962年恢复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工作。翻译了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撰写内部报告《粮价问题初探》、《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几个理论问题》。1965年第二次被打成右派，下放京郊房山周口店劳动改造。

文革被揪回经济所批斗、游街、监督劳动、写检查交代、接受外调。读了自藏的历史书、马恩20多卷、《资本论》、资产阶级经济学，自修数学知识，翻译乔安·罗宾逊和约翰·密尔经济学著作。1968年其妻汪璧（已被迫离异）自杀。1969年在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劳动（著有《息县日记》）。常与吴敬琏砥砺切磋，开始思考“挪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以文革为背景探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规律。

1972年返京后常蹲北京图书馆，著有《希腊史笔记》和反思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现代化改革的一系列札记。他发现希腊城邦制度的性质与“东方专制主义”截然不同，也就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与希腊民主制度的截然区别。为了推翻反动阶级的暴力革命、破除旧世界，固然可以采取狂飙式的理想主义；但革命胜利以后，就必须实行多元主义、经验主义，强调法权主义、重商主义、科学精神，发扬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

1974年肺癌晚期不治病故。

遗著《希腊史笔记》以《希腊城邦制度》为名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出版，通信体思想笔记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题，1989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顾准文集》，增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并收入《希腊城邦制度》，成为国内传播顾准的滥觞。比较完整的版本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的四卷本《顾准文存》，包括《顾准文稿》、《顾准笔记》、《顾准日记》、《顾准自述》。1990年代中国思想界、读书界出现“顾准热”。

(参考资料：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罗胜银《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1999年版)

## 刘主席语录

名词。一种出版物。香港自联出版社编印（社址九龙弥敦道美丽都大厦商场二楼74号；社长司马璐）的刘少奇言论选辑汇编本。同时出版的还有《刘少奇选集》。但《语录》的畅销程度远胜于《选集》。

编选者自联出版社社长、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后定居美国）司马璐，1937年6月曾加入中共，到延安任抗大图书馆主任等职，1939年被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派到西安、重庆等地工作。1943年脱党。1949年底移居香港。转向学术研究，分专题撰写出多本中共党史，自办自联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自己撰写和选编的十二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以及《瞿秋白传》等专著。他为了让读者了解刘少奇的思想言论，在毛刘思想异同之间有一个比较，编选了《刘少奇选集》、《刘少奇语录》。

由于是编者独立而为，受到取材条件限制，当时无法收录刘少奇尚未公开发表的言论，因此所选也不全面、不充分。该《语录》筛选刘少奇各个时期的各式著作、讲话节录，仅110页、190段，共3.4万字。目录编为33类：一、党的建设；二、无原则的斗争；三、教条主义；四、宗派主义；五、官僚主义；六、个人主义；七、个人崇拜；八、党内民主；九、党员修养；十、个体与集体；十一、人民民主宪法；十二、从实际出发；十三、统一战线；十四、劳动创造历史；十五、土地改革；十六、中国工业化；十七、走群众路线；十八、向群众学习；十九、人民军队；二十、人民内部矛盾；二十一、知识分子；二十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二十三、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二十四、和平共处；二十五、和平改造；二十六、和平过渡；二十七、全民党；二十八、全民国家；二十九、全民经济；三十、自由化经济；三十一、物质刺激；三十二、真假马列主义；三十三、马恩列斯毛都有错误。侧重论述了有别于毛泽东的和平、反对斗争扩大化、崇尚个人思想修养、重视物质利益等思想。

该书64开小型本、红色塑料皮（所以也叫小红书），书名用烫金字，书前面有刘少奇正面半身照片，还有一张“刘主席、毛主席合影”和刘少奇的手迹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目录前有刘少奇简历（录自香港《大公报》1959年5月11日资料）；书后附有刘少奇生平事略。便于海外读者了解刘的概况。扉页上印的是“全中国的爱国者，团结起来！”的口号。定价港币一元五角。

香港评论家司马长风说：刘的“好些话非常通情达理”，用该书一些话“来分析批评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可收一针见血之效”。伦敦世界新闻社书评则说：该书“是一本刘少奇言论与思想的详实记录”，“多多少少总算揭开了”毛刘“双方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一点内幕”。

该书先后约印五万册，并且还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出版。日本有多家出版社争购版权。《毛主席语录》日文版销量曾高达 15 万册；为日共党内拥护刘少奇的“刘派”提供了理论根据。在东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界引起轰动，为关注中共政治和刘少奇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可贵的见证。1968 年 11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且决定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该书销路剧降，并被香港造反派冲进自联出版社门市部纵火烧毁；但仍有留存下来的。网友梦子 1975 年曾在自联社购得该书。（见“猫眼看人” 2006-1-11 梦子的跟贴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6&replyid=4248855&id=715465&skin=0&page=1>)

中国大陆当时在完全对外封闭的条件下，对此几乎毫无所知。即使在收藏颇富的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也没有该书。只有通过香港铜锣湾旧书店还能特约收购。

附：《刘主席语录》选

第 7 页：“不择手段地对付党内的同志，处理党内问题……有这种意识的人，在党内越是想抬高自己，并且用打击别人，损害别人的方法去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总而言之，他邪气十足，毫不正派。说这样的人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那不完全是笑话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 年版）

第 26 页：“党内的家长制。个别的领导者及领导机关，在这种党内斗争方式之下，压迫着许多党员不敢说话，不敢批评，在党内形成个人或少数人的独断。”（《论党内斗争》1941 年 7 月 2 日）

第 27 页：“片面地强调党内的集中制与党内斗争，强调一切不妥协，强调机械的纪律，而废弃党内民主、党内和睦与对于问题的认真讨论和批评以及党员的自觉性、自动性等。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造成党员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他们这样，虽然也可能造成党内某种一时的统一现象，但这种统一，是虚伪的、表面形式的、机械的统一……很明白，这种路线要毁灭我们党，要使我们党变成狭隘的无生气的宗派主义小团体。”（《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45 年 6 月）

第 110 页：“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就不定罪。”（《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 年，见《井冈山》报 1967 年 2 月 8 日）

“清华有一个学生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标语……现在看来，说这个学生是反革命的结论，材料不充分。”（《在人民大会堂报告》1966 年 7 月 29 日，见《井冈山》报 1967 年 2 月 1 日）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都犯过许多错误。”

（参考资料：高放《寻觅绝版稀世的“刘主席语录”》，《凤凰周刊》2004 年第 22 期）

## 黑戏

名词。文革时为批判主管文化一线官僚周扬（文化部部长、□□部副部长）等而设置的靶子——戏曲、戏剧、电影；是故称“黑戏”。主要指传统戏曲，如京剧《海瑞罢官》（吴晗编剧、马连良饰海瑞）、《谢瑶环》，昆曲《李慧娘》（孟超编剧）和评剧《刘巧儿》（新风霞主演）、话剧《洞箫横吹》（海默编剧；吴坚、杨勤导演）和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

毛泽东对文学艺术早有严厉批评，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1963年）。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是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果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当年即被陆续通知停映外国片192部、香港片17部、国产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革命家庭》、《逆风千里》、《南海潮》、《球迷》、《两家人》、《聂耳》等一大批影片。1966年2月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4月18日由《解放军报》社论公布了其中的主要观点和内容）更是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黑八论”。

这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为其后发动的文革选择了突破口，敲响了开场锣鼓，大造了舆论，确立了一个文革大批判贯穿始终（1975年被判复辟黑戏的有晋剧《三上桃峰》等）的基本主题。黑戏成为宣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事实根据。报刊杂志、电台广播传播对黑戏进行上纲上线大批判的文章，文艺单位和普通机关、学校都张贴以批判黑戏为内容的大字报，大轰大嗡，铺天盖地。编印了大量正式、非正式的以批判黑戏为内容的小册子，罗列了被打成黑戏作品的名单和五花八门的罪名。通常的罪名有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抹杀阶级斗争，宣传没落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腐朽文化，美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丑化解放军，描写中间人物，暴露黑暗，等等（“黑八论”就是这些罪名的集中概括）。这自然不是正当的文艺、文学批评，而是服务于更为重大的政治运动需要的政治审判，这里不用实事求是的举证、严密的逻辑推导，也不允许被告有任何质证、辩驳的机会。

所有参与黑戏的编剧（吴晗、夏衍、田汉等）、导演（章泯、焦菊隐、蔡楚生、郑君里、谢铁骊、谢晋等）、演员（马连良、周信芳、盖叫天、李少春、上官云珠、王莹、严凤英、新风霞、林兆明、袁世海等）都受到不同程冲击，不但思想上要接受批判，写自诬的检讨、忏悔认错，业务上还要停止正常工作、练功、演出，政治上被贴大字报、挨批斗，戴上“三名、三高”帽子（被称为文不对题的“学术权威”，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获得的社会声誉、报酬大于普通人而招嫉恨），经济上被降薪、冻结存款、限制现金支付，生活上则强令不得使用保姆、食用牛奶等，人身上被抄家、关牛棚（文革中期下放五七干校）、失去行动自由。他们中除了个别人被利用来为样板戏服务得以幸免外，绝大多数人都被打入另册，因此被剥夺了十年艺术生命。连子女也受到牵连。

但这并不妨碍毛泽东“他老人家”找一帮名角来专为自己配曲、演唱、录制、欣赏传统词曲、戏曲名段。中共高层核心也沾光分了一杯羹。

（参考资料：《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黄帅

（1961— ）出生于北京。因来信和日记摘抄揭载报端，而被塑造成为批“师道尊严”的反潮流革命小闯将。

1973年在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读五年级时，不满老师批评上课做小动作的同学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在日记中提出了批评。老师看过日记后，大发雷霆，还号召同学们和她“划清界限”。这种纠缠长达两个月，使她精神受到不当刺激。她写信给《北京日报》责问“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全国媒体都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注1]为题，报道了她的故事。此事与前不久张铁生升学考试反映出来的“教育回潮”挂起钩来，被认为“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国务院科教组还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由此在全国中小学引起了反对师道尊严的连锁反应，使本来就已经松弛的教学秩序更加受到广泛冲击。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3位青年署名“王亚卓”致信黄帅，提出了尖锐的不同意见。经人捉刀公开回信批判“王亚卓”“破坏教育革命”。

因为此事造成的重大影响，使她在文革后备受严厉批评（有骂“‘四人帮’的小爪牙”、“小爬虫”的）和巨大压力。在其从事科研工作的父母鼓励、疏导下，1979年以322.5分报考北京工业大学，亦曾一度遭阻碍，经时任□□部部长的胡耀邦出面说项方得录取为计算机专业学生。[注2]1984年获工学学士学位，并被分配到北京市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

1988年自费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大学大学院，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被三和综合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后来又担任了新世纪中文电视台节目审议会委员。

1999年回到国内在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任编辑，聘为社长助理。

[注1] 据认为，日记是经人重新编排加工的。而插手来信、日记发表的人是迟群、谢静宜。

[注2]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曾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

（参考资料：《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73.12.28；《黄帅：从“反潮流英雄”到东瀛女硕士》，2004年1月17日《华夏时报》）

## 《百丑图》

漫画作品。1966年底、1967年初出现的，以丑化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表现内容的红卫兵漫画。

画面中央是坐着“敞篷轿”（四川俗语称“滑竿”）的刘少奇，而周围抬轿的，鸣锣开道的，打旗摇扇的，舞枪弄棒的，跑腿跟班的，全是所谓“刘邓司令部”



从中央到地方的“黑”干将：邓小平、彭真、陶铸、刘澜涛、杨尚昆、陆定一……据说有 100 位，以应“百丑图”之名。每个人的模样都极像而又极丑，一看就知道谁是谁，足见这位画家[注 1]抓特征的能力。在当时情况下，它打破了中共政治运作的程序规则，提前公告了文革初期的目标所指和刘邓无可挽回的失势，具有政治宣判的传播功能。

这种人身攻击、人格侮辱的丑化，比历数刘邓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罪状”的说理批判，更能模糊普通群众的认识，煽动他们的盲目仇恨情绪，对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之中的百姓有释放焦虑、宣泄攻击性欲望的作用。该画引起了许多的模仿，得到大面积传播，成为大批判中风靡一时的流行漫画。对当时批判、打倒刘邓的政治运动，起了火上加油、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地红卫兵也依样葫芦画瓢，把本地的大小走资派串在一起，给予集体丑化。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上海、西安版《百丑图》。

从学术意义上说，虽可纳入政治漫画的分类，但政治漫画的本意是讽刺，而不是该画式的漫骂、人身攻击；它的讽刺是幽默的批评甚至挖苦，尖锐，但决不是该画式的下流。红卫兵漫画带有鲜明暴民政治色彩。

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老帅大闹怀仁堂时，谭震林就曾以此画[注 2]为靶子，抨击红卫兵丑化共产党，运动意图“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据称周恩来对此评论说：“这是一幅反动漫画，打击面太宽！”毛泽东也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说：“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据说造反组织还曾将这些漫画分解成局部（包含个别文革前被打倒的人），集纳编印成册，仍以《百丑图》为名[注 3]，广为散发。有的小孩发蒙学漫画，就以此为摹本。文艺界也被搞了一幅“百丑图”，把当时的演艺明星大腕如梅兰芳、孙道临、王晓棠、白杨、秦怡等悉数网罗其中。甚至一个单位、系统，也搞了本单位、系统针对被打倒、批斗者的《百丑图》，把教书的老师也画上去了。

[注 1] 据介绍，漫画作者翁 X X，是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生，父亲翁独健是大历史学家。所作《百丑图》被认为是“丑化中央领导人”，而被捕入狱。与反中央文革小组入狱坐牢的黎利两人同关一室。

[注 2] 似误。据介绍，清华井冈山小报上的长篇连环漫画，好像是《新编西游记》，把孙悟空改造成勇于造反的英雄（蒯大富化身），白骨精之类妖魔则是走资派（王光美化身），唐僧是压制造反的学校领导，而猪八戒则是保唐僧，保走资派的“保皇派”。

[注 3] 另一种《百丑图》：《革命大批判漫画参考资料》（78×54cm）[[http://msn.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3-2308-230803/item\\_detail-0db1-884bdf2911b8393af9e12f4e5b841b22.jhtml](http://msn.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3-2308-230803/item_detail-0db1-884bdf2911b8393af9e12f4e5b841b22.jhtml)]没有情节、主题和完整的构图，而是集中了全国 100 个最大走资派、黑帮人物的漫画头像，作为索引，任人选择、组合，以作大批判漫画通用的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wld18《凶眼睛、大拳头：文革美术趣谈·断驴腿》，中国文学网 <http://new.haoti.org/xiaoshuo/zw/200503/365.html>；琴箫伴夜《文革梦忆》，“凯迪网络”；《毛主席批判百丑图》“红色旅游”2004-8-11；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 1993 年版）

王力

(1921－1996) 江苏淮安县人。原名王光宾，曾用名王犁。政治活动家。

1939 年经谷牧介绍加入中共，长期在东北从事秘密兵运工作，抗战中写过小说《晴天》。1945 年任山东《大众日报》记者。不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党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1949 年后历任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任河北省副省长、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1953 年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红旗》杂志编委、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是彭真、邓拓网罗的秀才班子成员；曾参与九评、中央党政文件、中央领导人的文稿如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毛泽东“五二〇声明”等的起草。

1966 年初，参与《二月提纲》起草的他火线起义，揭发了彭真在《二月提纲》酝酿过程中的言行；又接着参加了《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与《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条）的起草。同年第 13 期《红旗》杂志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1967 年 1 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2 月 16 日大闹怀仁堂后参与向毛泽东告状，导致反“二月逆流”的发生。[注 1] 随同毛泽东参与解决武汉问题，遭遇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七二〇事件”。冲突中被打，受到北京组织的百万人欢迎大会。8 月 7 日煽动外交部的夺权，引起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涉外事件。是中央文革小组里唯一没有参与中央专案组的人。

1967 年 8 月 30 日中央文革小组以“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炮制者[注 2]、“国民党特务”、“五一六黑后台”名义，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被软禁在钓鱼台 12 号楼并免去党内外职务，后转至北京卫戍区西山别墅、秦城监狱。1980 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案犯。1982 年 1 月获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免于起诉书，1984 年 2 月他被开除党籍。

其处理结论是“开除党籍，保留原待遇”，未给刑事处罚。晚年和妻子王平权及子女住在原北京政法学院的三间一套的公寓里。通过非正式渠道为中央高层提出政策性建议。[注 3] 曾建议假释老病的陈伯达、为黎玉平反。1989 年初上海作家叶永烈采写、经王力改定的长篇专访《王力病中答客问》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曾引起强烈反弹。为贲门癌所困扰，辞世当年作过胰腺手术。

撰有 80 万字《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2 年版，获得香港地区图书最高奖），其中《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有二十多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披露了大量史实。他评论文革说：“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反文化、反科学、反民主、具有极大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这个历史是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应重演了。”但仍坚持认为“毛泽东这面旗帜不能倒”。

[注 1] 1967 年 3 月 26 日向毛泽东汇报“大闹怀仁堂”后曾写下：“大灭奴隶气，/莫当旧顺民，/长缨握在手，/当家做主人。/活着干，死了算，/搞好了蒯大富，/搞不好进公安部。”

[注 2] 在《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起草者是林杰。而且从职务上看，签发者应为陈伯达。此举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平息军人怒气，稳定军队。

[注 3]曾对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民问题致信中央，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甚至因建议对文物采取以流通促保护的政策，因此备受诟病。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文革“英雄”沉浮录》；《再说王力》，见北航红旗早期造反领袖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

## 资产阶级法权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用于描写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

马克思作于 1875 年的《哥达纲领批判》，针对拉萨尔“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分配”等模糊提法，指出，社会主义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按劳分配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劳动者工作能力、赡养人口等的不同，所以即使从等量劳动取得等量产品的平等原则出发，每个人事实上得到的消费品仍是不平等的。“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还仍然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列宁作于 1917 年的《国家与革命》预测“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时写道：“‘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但还没有也不应当人为地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 1958 年以后多次提到资产阶级法权。他对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颇为留恋，认为那时的革命意志坚定，没有进城后这么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毛泽东对体制化官僚主义的心理感受，是他早年新村主义实践的情感遗留，是他改造中国的乌托邦理想的表现。197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刊发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 1974 年 12 月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指示（这成为当时发布毛泽东指示的典型方式之一），其中说，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张春桥在他的论文里形容说，资产阶级法权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这一概念就成为限制、批判物质利益原则，认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会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须坚持继续革命，制订一系列革命化的城乡经济政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立论根据。“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参加劳动、农村“割资产阶级尾巴”一类反修防修措施、新生事物，恶性发展的“大锅饭”，等等，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1979 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经过研究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中的“法权”一词，德文是 Recht，俄文是 npaBo，可分别指“法”或“权利”；译为“法权”不能确切地表达其涵义，容易使人误解为“法定权利”、“合法权利”，不符

合马列的原意，从而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英译本和日译本都根据原著行文的含义，分别译为 law（法、法律）或 right（权利），法或权利。经恩格斯亲自校订过的英译本《资本论》第一卷，就将 Recht 一词分别译为“法”或“权利”。于是决定将其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这可能是中国翻译史上牵涉面最广、政治性最强、规格最高也最正式的译名更正了。

2000 年代有报告说，中国社会分化加剧，基尼系数成为人们热烈争论的话题（2005 年初，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 0.4 上下；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数据是 0.454；南开大学的研究成果是已经超过 0.5），两极化愈演愈烈并且通过教育产业化等途径出现了制度化、固定化的趋势，社会流动水平下降。当初资产阶级法权译法的修订更正，是否失去现实基础了呢？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批评者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

（参考资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资产阶级法权”应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人民日报》1977 年 12 月 12 日；梁美娜《基尼系数高压线各国不同 贫富鸿沟需理性对待》，《中国经营报》2005 年 01 月 16 日）

## 五七指示

文献名。《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的简称。这是 1966 年 5 月 7 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

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既能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信中以此为基础，做了广泛的类推，“工人也是这样”，“农民（包括林、牧、副、渔）以农为主，也要兼……”，并且谈到对教育革命的设想：“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被认为是教育黑线专政论的张本）

这封信的论述，远远超越了对部队农副业生产作批示的范围，而对军队的社会角色和功能（预示着军队统摄全局的社会稳定作用），甚至对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模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有构思宏大的设计。如果说《给江青的一封信》、《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之于文革“破”的纲领，《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思路超迈、飘逸，天才玄想和乌托邦激情集于一体。

同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五七指示》，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8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摘要公布了这封信的内容，并第一次对此进行了权威的解读，比较敏锐地触及到了毛泽东遐想的核心。社论说，“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社论还认为，按照

“五七指示”去做，那么，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文革前对理想国的一次展望。除了紧迫的现实政治目标和生存需要外，还有他心目中的美好新世界驱使他投下赌注。这个美好新世界，是以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封闭自足为特征的，政社一体化的农业文明的典范。这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社会分工，自给自足、限制并消灭商品生产，把低水平公平当成最高目标，不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模式。这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文革时的许多现象，诸如五七干校（建立之后又经历了它自己的演变）、战备学校，校办工厂，工厂、街道的农场，在校生的学工、学农、学军等等“新生事物”和社会实践，都是在这一指示精神指导下孕育、产生的。

有学者认为，这与毛泽东青年时代所受到的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有关。〔注〕

〔注〕1920年5月毛泽东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过为期一个多月的工读生活。这一举动显然受到新村主义的影响。同年7月他离沪返湘，在武汉同恽代英交换过具有新村性质的互助社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的经验（而在晚年毛泽东记忆中，林彪是恽代英、林育南、张浩等组织的互助社的成员）。回长沙毛泽东即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

新村主义是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烩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就能战胜资产阶级，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主义天国”。20世纪初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宫崎县高城石河内村曾经尝试着实践他的新村理想。

抗战时军队大生产运动的屯垦经验让毛泽东看到军农一体的希望。1958年办起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起因，部分与毛泽东的这段早期经历有关。文革发起在即，毛泽东再次回忆起了自己青年时代未竟的理想。

（参考资料：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本报评论员《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人民日报》1966.08.01 黄瑶《毛泽东为何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 五七干校

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被《“五七一”工程纪要》称为“变相劳改”的场所。

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有500名省直机关人员参加劳动锻炼的农场。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为题，用一整版篇

幅进行了报道，并在配发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竞相仿效。

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 18 个省区创办了 105 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 10 多万名下放干部、3 万家属和 5 千名知识青年（子女）。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改造的学员有数十万人。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72 年 4 月 24 日），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于是，“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但谁也不敢贸然撤销；仍有一批人滞留在此。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平时只有看守房舍和农具。直至 1979 年 2 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此类干校方陆续宣告正式撤销。

这类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还拖家带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给城里或家乡的亲友代管。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国作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单位，连老弱病残除外的政策也被置于不顾，统统撵进干校；年纪最长的有七十（俞平白）、六十（冰心、陈伯翰等）以上的人，丧失劳动力的、体弱的、深度近视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被不分年龄、性别，统统按照军队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的军人或工宣队师傅管理。

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参加野营拉练。他们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自食其力。有的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

在各单位群众中派性斗争严重的情况下，干校被当作迫害异己、惩治走资派和知识分子的场所。[注 1]这里也搞政治运动，如抓五一六等；同样的激烈、揪心，人人自危。但总的说，前紧后松。1976 年姚文元预感有不祥降临时说：亏我身体还好，挤挤公共汽车，到五七干校劳动都还行。

干校既是牛棚的延伸，但又比牛棚的火药味略淡一些。与文革初期的群众性批斗相比，到干校相对是一种解脱，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虽然仍有批斗等进行，但已下降到次要地位，多数不再是急风骤雨式的了。能成为“光荣的”五七战士，已经属于候补被解放者或准被解放者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注 2]对那些转到干校来的右派而言，这里的环境比他们过去的的生活甚至有所改善——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并不算太恶劣，甚至劳动强度也略小些。

[注 1] 一些“五·七干校”就是从“清队学习班”延续、改建而来（见上海金山县志 1968 年 7 月 16 日记载）。

[注 2] 1978 年臧克家出版诗集《忆向阳》。张光年在《向阳日记》里记有：“（1972 年 9 月 14 日）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 1956 年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干校生活留给他的终于成了“感恩”心态（“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和田园牧歌般的情调。诗集遭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有人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有人说这是一种虚假的献媚。臧本人后来也不愿提及他的这部作品。

(参考资料：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革命的熔炉 批修的战场——毛主席发出十周年前夕 访问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人民日报》1976.05.07；陈虹《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书屋》2002年第3期)

## 关锋

(1919—2005) 出生于山东庆云县。原名周玉峰，号秀山；笔名庆云、何明、东方明、撒仁兴、古棣等。政治活动家、学者。

1933年在庆云中学加入中共，1938年任中共乐陵县委书记，1944年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1947年任山东国民师范学校校长。1950年任山东分局理论教育处处长，1952年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任山东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对中国古代哲学素有研究。[注]

1956年调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1958年任《红旗》杂志哲学组组长、编委；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载1958年《光明日报》)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毛泽东对关文大加赞赏，还专门就此写了一段批语。

1966年初揭发田家英传达毛泽东杭州谈话关于《海瑞罢官》指示删除“要害”说；5月8日发表《擦亮眼睛，辨别真假》，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参与起草《五一通知》；加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中央首长”。发明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毛刘分歧是路线斗争、催生《炮打司令部》，提供了逻辑根据。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曾指控彭德怀“到三线后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公布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据认为与彭德怀的被揪回北京批斗、致死有关。1967年1月拟定的《解放军报》《宣传要点》，曾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七二零事件后演变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

1967年8月底因激怒军方而受到批判，10月被北京卫戍区关押于西山，1968年1月转秦城监狱。1980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同案犯。

1980年代恢复自由，回到《红旗》杂志做资料室工作，业余研究孔子。住在北京沙滩北街普通民居顶层。潜心于先秦老子思想和甲骨文字学、古音韵学的研究。著作《老子通》获吉林省首届优秀图书一等奖和长白山学术基金会一等奖。晚年爱好看古书、看电视、练气功。除埋头研究老子、庄子、孔子外，还对甲骨文、哲学史、电脑都感兴趣。无意撰写文革回忆录。

[注]文革前有《老子研究》、《庄子研究》、《关于周易问题的争论》、《春秋哲学史论集》(与林聿时合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庄子内篇的批判》、《王充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孙子兵法研究》、《求学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等。文革后有《法和法学发生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老子通》上、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参考资料：温乐群《“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霞飞《关锋沉浮录》，《党史博览》2005 年第 5 期；《关锋访谈录》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697713>)

## 走资派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缩略语。是文革作为主要假想敌、打倒目标的革命对象。

源于 1965 年 1 月中共中央公布、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该文件称，“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早些毛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7 年），随之把思想政治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1958 年），并把社会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1959 年），就为“走资派”概念的催生准备好了基础。

这是战略家、意识形态设计师毛泽东为自己的政敌预先挖好的陷阱（虚晃一枪）。真正派上大用场，是等到文革开展以后被用于指称违背他意志、思想的刘少奇、邓小平及其组织系统中人。这一概念不见于《五一六通知》的原因，是出于隐蔽战略意图、怕打草惊蛇，为了减少前期阻力的战术考虑。所谓资反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简称）概念，也是形似直接针对 50 天派工作组、实则留出了向走资派概念过渡的链接途径和逻辑空间。同时调动了下层社群对官僚阶层的积怨，使之凝聚为冲击力、破坏力极大的政治情绪。1966 年 8 月 12 日中共 8 届 11 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6 条）再次确认：“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可以看清它的所指了。

不懂经济、却对社会改造充满奇思妙想的毛泽东，感到中央一线之于他的宏大设计采取了敷衍态度，抽象肯定具体拖延，萌发了复返一线、重掌大宝的决心。

“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他为将被打倒的政敌定的性，这一命名的功能要求应该是一一非枝节而具有整体性的。叫别的名字也可以，只要满足定罪功能需要就行。

用“最大（或头号）走资派”指称刘少奇（1966 年），用“至今不肯改悔的（二号、另一个最大的、正在走的、还在走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976 年）指称邓小平。同时还有“资产阶级司令部”、“最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指称方法。毛泽东本人没有对走资派下过定义。只是说“这些人……反对资产阶级了，他就不那么赞成了……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就不那么赞成了……不走社会主义道路”（1967 年 5 月），“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压扣罚”（1969 年 4 月）。即使文革秀才们的论证，也只是用从老干部（人）=“民主派”（时间）=“走资派”（政治）的等式来硬充逻辑证明。为了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又不得不上挂刘邓，下联各地、各级官僚，都批斗走资派，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夺权，彻底断绝复辟隐患。但由于必须利用他们的管理经验（不是短期培训所能解决的），多数走资派直接、间接地回到了岗位上，或异地换位做官（确实都比以前低调）。[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在当时就失败了。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考察，“资本主义”道路大体上指“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之类比较切合当时生产力实际、符合价值（商品）规律的发展经济方法和政治策略。这一套在当时还没有形成体系的环境条件，只是有“猫论”的方法论背景和一些具体措施；到 1990 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才有条件逐步摸索、试



验，渐臻完善，真正初具规模。连毛泽东也深知仅靠主张不同的这些罪名不足以打倒刘邓，所以才让专案组搞出一个“叛徒、内奸、工贼”的材料来，从政治历史上定性。

2000年代以来有人对照今昔政经情态，提出当年对走资派的定性并没有错的异议。形成了历史事实、社会-理性共识与现实冲突、个人化情感体验之间的强烈落差、纠缠悖反。

[注]在胡克实下乡子女推荐读大学的政治情况证明上，进驻团中央的军代表写着：“走资派好人”。——既犯了走资派错误，也被团中央革委会“结合”了，“干”着“部”，好孬都兼着点儿。（事见叶永烈《胡克实自述：“文革”中的团中央》，《炎黄春秋》2005年第8期）意思是文革不能否定，给走资派戴的帽子不能说错，但既然人已经解放、结合，也不是坏人，所以就是“走资派好人”了。

（参考资料：金春明等《“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徐占火昆《斥“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论》，《人民日报》1978.03.26；《党的总书记变成了第二号“走资派”》，《金陵晚报》2004年7月29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4-07-29/14073861426.shtml>）

## 五十字建党方针

这是文革时整党建党的纲要。

1967年10月27日，毛泽东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文件上的批示。11月5日毛泽东又作了“吐故纳新”的指示。[注]1968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传达到了基层。

1967年10月27日这段“最新最高指示”当时被称作“五十字建党方针”，“建党大纲”，成为1967年以来的整党建党工作的指导方针。指示传达一两天之后，人人均能背诵，张口就来。这一方针的前提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把国内主要矛盾、主要工作限定在阶级斗争上，不提经济建设，不提毛泽东自己论述过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文革前乃至整个中共建党以来组织工作的路线、方针的联系，是割裂而非连续的。

根据这一方针，整顿党的组织的主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形式是群众运动、政治斗争。成了清除所谓政治上的走资派和思想上的修正主义分子，以致为九大做准备的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时，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占总数的71%。八届中央委员97人除去世10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达不到法定人数。只得从候补中央委员中递补10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者只有59人，占委员总数的29.9%，不足1/3。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等人员多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还多。这些人不仅同中央委员一样有表决权，而且有些被任命为组长、副组长（如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叶群、吴法宪等），出

现了非中央委员领导中央委员的怪现象。

同时突击吸收不少文革中的造反派入党，并提拔到各级党政机关，乃至中央委员会里。有的地方让非党学生代表担任公社整建党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让非党工人代表具体领导县直一些单位的整建党，让非党群众代表参加审批支部，形成了极其错误的造反派入党“三论”（优先论、当然入党论、造反派入党就是朝气蓬勃论）和“三不批”（整建党领导小组没有群众代表参加不批，新支部没有造反派纳新和更新支委达不到一定比例不批，纳新党员没有造反派不批）的所谓整党原则。

通过这一系列程序，巩固了 1966 年文革以来打倒走资派的激烈较量的政治战果，并使之组织化。被后来中共党史专家认定“受到派性的干扰”，“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

[注] 全文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参考资料：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刘志平《毛泽东、邓小平建党思想特色浅探》，《探索》2000 年 第五期）

## 生产建设兵团

名词。简称“建设兵团”、“兵团”。

创制于 1950 年代初。是带有军队编制特点的大型国营企业，内部保持着军队师团营连的建制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以平战结合、寓兵于农，“屯垦戍边”为宗旨，实行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在发展农垦事业的同时兼有巩固边防的作用。[注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建于 1954 年，1962 年扩展，1966 年创建西北农垦兵团、西北林业兵团、西藏生产建设兵团。文革中，中共中央为了应付中苏冲突，决定在沿边各省、区和一些内陆省，以国营农场为基础大批组建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兰州、江苏、福建、广东、山东、湖北等生产建设兵团）和农业建设师，划归各大军区和省军区领导。兵团的师团营连主管干部由各军区调入的现役军人担任，用带兵打仗的方法管理企业。

1967 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生产建设兵团就成了安置 250 万知青（约占总数的 18%）的去处。由于有固定工资收入，生活待遇有基本保障，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组织有人管理，属于军队“序列”，是“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面临下乡的知青都以为到建设兵团比插队落户好。但到建设兵团的政审比插队落户严，原则上要达到符合民兵条件。[注 2]兵团一般接受跨省区安置，多来源于京津沪和四川、浙江。北京的到黑龙江、内蒙，上海的到黑龙江、新疆、云南，天津的到黑龙江、内蒙，浙江的到黑龙江，四川的到云南。

兵团的半军事化生活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探亲的审批、报销制度，使兵团知青回家时间比插队知青的少；劳动强度大，纪律严格，边疆生活条件艰苦，政治活动（“天天读”、“讲用会”、“忆苦思甜”、“一帮一，一对红”等）频繁。而且由于兵团本身就是国家编制的就业性质，在知青陆续招工、顶替后仍然返城无望。驱使他们把满腹牢骚编成顺口溜：“部队当兵光荣花，工厂工人幸福花，

农村插队向阳花，兵团战士苦菜花。”

1979年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知青集会、游行、请愿、哄闹政府机关，要求返城的风潮，其中以黑龙江、云南、新疆建设兵团知青的行动组织程度最高，影响最大。尤以云南为首。因为那里生活之艰苦和政治之黑暗，超过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海南岛几大生产建设兵团。当年因迫害知青而被公开处理的恶性案件，大部分都发生在云南。1973年，周恩来亲自过问和查处的“河口事件”，就是奸污和捆绑吊打知青的大案件，最后枪毙了云南兵团河口农场的的一个团长，处分了几百名干部。1978年，又发生了“橄榄坝事件”，上千名知青抬着一个上海女知青的尸体游行示威，一百多部拖拉机包围了草菅人命的场部医院。示威的人群向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涌去，沿途农场知青都加入到抗议队伍中。由此引发了全国知青最后大返城的浪潮……梁晓声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写的就是知青大返城中发生的故事。

[注1] 对于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兵团人自己总结出“四不象”：是农民但还有工会，是企业但还有政府，是工人但还要纳税，是军人但还要种地。

[注2] 据《凤凰卫视》“北大荒青春记事”报道：去建设兵团的除了大多数红五类外，还有极个别出身不好的幸运儿。一个名叫张雪阳的黑帮出身北京女知青，靠了写血书的真诚，才争取到了去黑龙江兵团的资格。另一个叫肖柯的则全凭不屈不挠的哀求、旷日持久的泡蘑菇，打动了上帝——招募者。

(参考资料：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本报讯《天津西南楼中学革委会举办以毕业生分配为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民日报》1968.07.19；蓝关雪《知青血泪三十年》，“坐看云起”)

## 透过现象看本质

动宾结构短语。源于毛泽东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后来在《实践论》里又写道：“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达到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它是一种形象化的譬喻，被用来指称客观事物的存在样式，从个别到一般、从部分到全面、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规律和思想方法。被概括为“透过现象看本质”。

这种理论认定，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本质和现象两个方面：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它总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事物的本质；本质是现象的内部联系，总要表现为某种现象。当人们认识事物时，不能停留在对它表面现象的观察上，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认真分析决定事物形成的诸因素，从中找出起决定作用的、本质的原因来。这是与小生产、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经验主义线性思维方式，而非多元归因的实证归纳，较多跳跃，偏于诗性的浪漫奇想。但同时也为独断论和思想专制开了方便之门。

作为标识，该短语被作为对毛泽东认识论的经典概括，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流传于社论、报告、学习体会等各式文章和一般老百姓的口头。客观反映实际存在，把握住人民情绪脉络时，这样的思想方法是现实而有效的；当歪曲、脱

离实际存在，背离人民情绪脉络时，这样的思想方法是主观、虚妄而无益、独断的。

1949 年以来的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成为制度化的社会存在，运动不断，与这种独断的认识论是密不可分的。客观存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被当作现象看待，主观臆断（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被当作本质，以此为基础来制定工作目标和策略。

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里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文革的发动，就是建立在“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里”的判断上的。这些判断都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结果。不用说，大批判、批斗、审讯、敦促交待时，捕风捉影，深文周纳，逼迫诱供，锻炼人罪，穷追猛打，更把这一套思想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令人胆寒。在看似平静的学理表述背后，渗透着暴力和血腥。文革时更发展到信奉“家庭出身=阶级立场=政治表现=政治本质”之类形而上学线性推理的地步。

而现象学哲学家认为，离开现象没有本质，本质、真理等类问题是假问题；人们通过符号组织、表达的知识不过是人类根据自己的趣味和需要利益对关系世界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是相对的、猜测的和向理性开放的。批判本质主义，有利于将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理念与制度引入学术生活，解构知识霸权、蒙昧主义。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石中英《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教育学研究》）

## 保皇派

名词。意指支持、保护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或支持、保护当地的党政组织、本单位领导“走资派”、对文革有保留意见，与造反派持不同政见的人和组织。

源于 1966 年 6 月 5 日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该文给反击聂元梓大字报，支持、保护以陆平为首的原北大党委和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人，戴了一顶保皇派的帽子（“以陆平为首的资产阶级保皇派”）。漫画化地将其比喻为“以拥护帝制、反对共和为宗旨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集团”。“保皇派”矛头明着指向保皇者，暗地却是指向被保者。成了文革中一个广泛使用的名词。

同年 8 月 2 日北京建工学院 1100 多人成立了针对造反组织“八一战斗团”、拥护工作组的“革命团”。8 月 25 日北京 31 所中学红卫兵组成“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以抑制冲击党政军和揪斗各级领导人的社会混乱。各级、党政负责人闻知毛泽东支持态度后，马上让他们的子女、部属也组织了红卫兵、赤卫队等半官方的类似组织；多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名。它们得到官方默许、支持，或由官方在幕后策动。提供咨询意见，提供活动、办公场所和政策支持，提供经费和物资。组织成员多为红五类、党团员或积极靠拢组织，倾向于保守现状的群众。往往在代际传承的产业工人中，保皇派有较大的势力。他们对现存政治秩序的态度，是亲和的。除了支持、保护走资派外，也破四旧、抄家、贴大字报、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其行为的激烈，与造反派红卫兵别无二致甚至更狠；尤其是在他们失势的时候。最初处于多数派的地位，随着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随着造反派夺权得势而来的政治压力下的分化、组合，它们迅速失势

成为少数派。当他们失势的时候，他们对牛鬼蛇神的批斗，比造反派更狠。

文革初期的“革”“保”冲突一般结束于1966年底；但也有个别延续到较晚时期的，如武汉“百万雄师”等[注1]。于是就有形容他们意志不易改变的词语“铁杆保皇派”。或简称“老保”，骂为“臭老保”（含厌恶、不屑）。奉命“三支两军”的部队，由于曾与当地政府接触较多，多数都支持了“保皇派”一方。“二月逆流”中站错了队，被强令迅速改正。1967年春季以后又有围绕新成立的革委会的“保”与“革”、“反”的对立，反对派仍袭用“新保皇派”的称呼攻击对立面。[注2]这是一种煽动性极强、破坏性极大的命名方法、宣传手段。在越左越革命的思维模式中，“保皇派”的定名，差不多就相当于宣告对手政治上的死刑。因此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烈度更强的派性对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部部长陶铸，因为不同意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极端行为，而被指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人物”，被打倒、迫害致死。

[注1] 各地有代表性的保皇派组织有：北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二司）、上海“赤卫军”、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武汉“百万雄师”、河南“十大总部”、成都“产业军”。

[注2] 反对派则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

（参考资料：本报评论员《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人民日报》1966年6月5日；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诗刊》1978年12期）

## 王申酉

（1945— ）出生在上海一个工人家庭。被称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1962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攻读专业课程外，广泛阅读文学艺术书籍，对大量删削专业课时（减少了一半）、取消外语考试，增加政治、劳动时间的“教改”感到不满。1965年参加崇明岛工厂“四清”时申请加入共青团，被要求交出日记，遭到他的拒绝。但日记中对“教改”的不满已被同室班长偷看、摘抄，汇报给团组织、校党委了。

文革开始他阅读了挨批的《燕山夜话》，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与现实密切结合的……他们的骨气是硬的，中国很需要有这样的人物”。判定当时“三忠于四无限”的宣传是迷信，文革“这场‘革命’将使中国至少倒退十年”。1967年1月参加了上海学生炮打张春桥的活动。1968年他被抄家，1959年到当时近十年的日记被抄去当作“反革命罪证”，遭到毒打。1月底被关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狱中开始向同牢狱友学习德语。1969年4月释放回校、监督劳动。

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公宣队点名批判“白专道路”，他引用马恩列斯毛鲁的话，申辩学习知识的愿望。被认定攻击文革，破坏“一打三反”，上海市革委文教组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不予毕业分配。同年11月被送至苏北大丰干校劳动。借助图书馆研读《资本论》、其他马列经典著作和《哲学史讲演录》、《马克思传》等；写下100多万字笔记。1972年回华东师大绿化组劳动，1974年被发配到师大奉贤干校监督劳动。1976年调到师大防空办公室“深挖洞”。

“四五”天安门事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事件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史册”。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围剿“三株毒草”时写道“‘旧世界’的末日在最黑暗的挣扎中也就来到了”。

1976年与一位无线电厂女工恋爱，他在情书里抒发个人胸怀和政治见解，“这个社会专门压制人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窒息人的才能、智慧，抹杀人的主动性和个性”。学校保卫组出面干预，向女工说王“政治反动，道德败坏”。并收缴他的情书，以恶毒攻击罪将其关押到上海普陀区拘留所。他在狱中写下一份6万字“亲笔供述”，系统阐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看法，全面地反思了建国以来一系列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

1977年以攻击“伟大领袖”、“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9项罪名合成的“恶攻罪”，被普陀区法院、区公安局分党组联席会议和上海市高院党组、上海市委常委会判处死刑。普陀区区委书记“死缓”意见未被采纳。1977年4月27日公判执行后，上海市高院的书面批文才送达普陀区法院。

1981年平反，被称为“张志新式的人物”。《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出版。被认为“与遇罗克、李洪山、周泉缨、杨曦光等人属于同一代人”，但在“‘文革’时期民间思想谱系中的地位显然要高于前者。其思想的系统性和深刻程度仅次于顾准”。

（参考资料：金凤《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董国强《王申酉：一个以身殉道的先知》，《现代人文评论》2004年第8期；丁东《“王申酉文集”编后记》）

## 紧跟

动词。它指受如下政治态度支配的社会行为：对毛泽东的思想、号召，对党和国家提出的政策、路线、中心任务等，无论理解、认识、愿意与否，绝对无条件地遵循、拥护、照办。因为这首先是个立场、感情问题。阶级斗争、两军对垒的世界图式，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更强化了这一要求。

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就是方向，紧跟就是力量，紧跟就是胜利。

原意指时间上的承接关系（作副词），或行为人之空间关系（动词）。1964年开始出现“紧跟形势”、“紧跟任务”、“紧跟中心”、“紧跟共产党”、“紧跟中央”的政治性提法，紧跟的对象最后集中到毛泽东一人。最初的词形比较随意、不固定，有“紧紧跟着”、“紧紧跟随着”、“紧紧跟上”、“紧跟着”等多种用法，到1966年末基本定型为“紧跟”，1967年初完成定型。这当然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文革发展的进程相关的。

从组织原则上（无论你是否党团员，哪怕你是一般公职人员，或仅仅是个居民，只要有单位管束你，都要受它的约束）说，紧跟与否是个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是你这个生命个体是否具有存在合法性的界限。连口应心不应都不行，因为消极怠工也是反对。从社会环境、心理氛围上说，政治团体、平民百姓都这样做，识时务者为俊杰，随大流不会吃亏。从经验上说，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不紧跟就会招致批判（右派、右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多得很，随便定个什么都可以）、处罚，甚至身体上的伤害。只要行动上紧跟了，没有人来追究你的动机是什么。

毛泽东在 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上区别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中共中央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接着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有意以此培植个人否定中央集体领导、制造发动文革的气氛。1966 年林彪更是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具体做法则是“主席画圈我画圈”、“主席表态我表态”，“言不离主席”、“手不离语录”：连批报文件的“送”也要统一改为“呈”字。公开露面的安排，与毛泽东的时空距离也要求不能在毛前、不能落在毛后。中共的组织观念、组织制度，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也为紧跟提供了根据。

客观上说，毛泽东的文革使所有人大吃一惊（包括直系亲信）：运动的内容、形式、性质、方法，都是人们前所未见的。当时最典型的话就是“史无前例”。刘邓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既是指这种状况，也是指认识上、主张上跟不上、不能完全同意。但又把自己摆在被动位置上，首先承认“新问题”的合法性、正当性，只是自己不能正确对待。因为毛泽东已经成功地造成了他的意志能够被中共高层核心无条件服从的政治态势。毛泽东不循常规的思想、行为方式，和在中共党内至高无上的历史、现实地位，造成了紧跟的实际需要。

没有制度、程序的约束，只有领袖的个人意志，其他大脑的工作只对领袖意志起拾遗补缺、贯彻落实的作用。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就成了押宝、折腾，一切取决于领袖意志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注〕

1970 年代末，江苏作家高晓声创造了“漏斗户主”陈奂生形象，在谈创作感想时曾说，中国农民的跟跟派，是出皇帝的根源，也是文革现代迷信的根源。跟跟派不除，现代迷信还会有市场。

〔注〕当时从官场到民间不公开地盛行着“跟线不跟人”和“宁可犯路线错误，不能犯组织错误”两种对立的观念讨论。前者的借鉴是上级（刘邓）错就都跟错了；后者的理据是路线也是人制定的，人跟错了路线就错，人跟对了路线就对。况且路线对错的评判者最终还是人。这也是文革对官场游戏规则的一种冲击。另有“跟得紧，转得快”的自保—补救措施。

（参考资料：编者《编后》，《人民日报》1966 年 12 月 4 日；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炎黄春秋》1999 年第 10 期；）

## 态度

名词。一指人们对事情的看法和采取的行动，一指人的举止神情。前者明确而易于判断，后者暧昧不明而难于捉摸。人对事的看法在语气轻重、逻辑重音上的游移，在言行举止、神态眉宇间的表现，包括身体语言；是一定好恶爱憎等潜意识感情、情绪的自然流露。态度的模糊性，使对它的描述、解读，几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法用明晰的陈述、判断来表达。它虽然以理知认识为基础、根据，却又处于显意识的边缘，不完全受理智控制，在心理反应机制上与心境、情绪等因素相关，或多或少带有一定随机性。

这种人际互动时转瞬即逝、往往需要用直觉去捕捉的微妙感觉，在文革期间它却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被认定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情势下，要求从日常现

象的蛛丝马迹中发现敌情（“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患于未然；在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所有专政对象、改造对象，在任何时间、地点、事情上都要无条件接受对他们言行的规制、禁止，心悦诚服，不允许有丝毫不驯服的表示；在要求动机、道德绝对纯洁的“高标准”下，所有考虑个人情况、个人利益，哪怕有丝毫要求偏离统一时间表的私心杂念都会被视为对革命事业的不忠；在要求对中央精神、集体意志无条件服从的心理定势中，即使最轻微的抵触情绪或言行，都会被看作可能导致惩罚、灾难的政治行为。在缺乏法制文化，没有实证训练的认知传统里，态度与立场、言论与行动被当成了一码事。

态度作为人的长期修养不经意的流露，确实往往比长篇大论更能表达人的的本意。特别在政治不正常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的真实意见掩藏起来时，对态度的追究，就成了阶级斗争的有效手段。

因为思想无法捕捉，态度可以从外面直接观察得到；抓阶级斗争，抓思想政治工作从抓态度入手，已经成为普遍的工作方法。“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对毛泽东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林彪 1966 年 9 月 18 日接见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同志的讲话）凡事首先要求端正态度，端正认识，成为政治工作的日常课题。大量政治学习被用于此项内容的完成。因此把态度看得比行为、认识更重要：（对毛泽东著作）“学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学不学是态度问题”。

把态度与立场、言论与行为等同起来，以罚代法的习惯，和基层组织行政职能含有部分司法权利（单位有保卫干事，街道有治保委员）的现实，经常导致把态度当作惩罚对象，以态度论罪。态度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敌我矛盾转化为内部矛盾）；态度不好，可以无事化有事，小事化大事（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其时所谓“整态度”、“打态度”等等，皆源于此。其实质，是对权力是否认同。尤其当权力的合法性处于不稳定的虚弱状态时，对人们的是否归顺会表现出神经质的敏感、执拗。〔注〕

“整态度”可以是文斗，在班组生活、组织生活或政治学习时完全善意的帮助，推心置腹的谈心，或严厉的批评（检讨能否通过时反复追究的所谓端不端正、诚不诚恳、深不深刻，其实就是态度问题）；“打态度”也可以升级为斗争，政治化为敌对性的批判，用打骂和体罚来进行武斗。在泛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先天缺损的法制秩序更加让位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勿需任何制度化的程序认可。由捉摸不定的态度问题随时可以通向暴力。

在整肃学习班上为使受批判的对象交待问题，主办者最常用的一句是“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态度”，鼓励“竹筒倒豆子”式坦白交待。于是有人为了求得“好态度”的认可，不惜编造事实，诬陷他人，获得“坦白从宽”的机会，他人却因“抗拒”而被“从严”处理。严重的认罪态度甚至会影响到加重判案的定性和量刑，在文革中因“顽抗”判刑入狱的不在少数，而被判死刑的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几乎都有“态度恶劣”的情节。

〔注〕 1966 年 10 月 25 日，毛泽东在听取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汇报时说：邓耳聋，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他在毛、刘、周、朱、陈、林、邓 7 人中排位第 7。所以每次开会的时候，他不可能坐在毛泽东身边），对他是敬鬼神而远之，从来不找他。从 1959 年以来，6 年不汇报工作。计较的这是个态度。

（参考资料：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故垒萧萧芦荻秋《圈地上海》；



9 “猫眼看人” q194612 2005-7-19 的跟贴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708717>; 陈振家  
《邓小平的智源[6]》,《三晋都市报》2004年7月26日)

##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简称,亦称“二月纪要”。1966年1月21日,江青通过林彪安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长谢镗忠、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等人,2月2—20日在上海锦江小礼堂看了十多部电影和三台戏,座谈近20次,形成了一个以“文艺界……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为基调的纪要初稿。矛头直指彭真的《二月提纲》,要求参与者保密。两个打擂台的文件,把中央高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公开化了。

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与修改。把这条文艺黑线与“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路线”挂起钩来,把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写进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成就。毛泽东三次审阅时亲笔增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和“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等11处内容。全文从一稿3000字、二稿5500字,扩张到定稿的1万多字;并在原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名义。

3月1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意见。”林彪让贺龙和中央军委把《纪要》3月30日转报中共中央4月10日批发全党(并附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形式把《纪要》的主要内容发表出去。在1967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之际,于5月29日正式发表。

《纪要》和随后的《五一六通知》,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两个批示[注1]相呼应,反映了他对文化、政治等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发动文革的决心,被当时官方媒体吹捧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也是林、江合作的一次契机和实践。把17年文艺政策的左倾思潮推向了自我悖反的极端。[注2]以此为根据,展开了对以周扬(一贯领导批判别人的文化部长)为代表的文艺黑线的单方面批判,一大批文学艺术家蒙冤罹难,由此影响到文革10年的文艺批评(政治宣判)和创作(呆板萧条)。作为先导和重要侧翼,从政治上有力地策应了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攻击。

1979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纪要》,并公开对它进行揭露和批判。“所谓‘黑线专政论’,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邓小平语)

[注1]1963年12月12日批示:“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

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1964年6月批示：对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不满，认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堕落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有“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危险”。

[注2]“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丁、陈反党集团”的被清除、艾青、冯雪峰等人被打成右派，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写真实”“干预生活”“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论”等文艺主张的批判，都是在文革前的17年。

（参考资料：苏双碧《纪要：江青文革中的“碑石”》，《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洪子诚等《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学习班

原义是指称为达到一定目的，确定特定学习内容，如传播某种知识或经验，而把有关人员集中起来的培训方式、学习组织。时间有长有短。文革时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简称“学习班”。

1967年底到1968年，为了重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形式，各级、各系统、各部门都举办了学习班。领导者是三支两军的军宣队[注1]，由他们来居间调解矛盾，主持筹备工作。学习内容是“老五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通过对有针对性的段落逐字逐句地反复学习、讨论、领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方法是让老干部、新干部和各派群众自我批评，消除派性，使他们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实现大联合。在权力诱惑下，一些地方、单位的群众组织达成了均衡、妥协，另一些却仍然争吵不休，纠缠细节，劳而无功。

这种强力组织形式被称为文革的“新生事物”。毛泽东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矛盾激烈、影响重大的省市被集中到北京，由中央出面举办解决矛盾的学习班。一些地区不但把党校当作了举办学习班的地点，甚至撤销党校，把它改成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此训练各基层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和部分“当权派”。

这一方法以后被推广到各个方面，延续到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各次政治运动。一些学习班演变成为整肃被审查者的一种组织形式，已经带有牛棚（参见该条）的性质；虽然比牛棚的指称范围宽泛，但有时就是它文雅一点的别名。[注2]

被军管的内蒙古自治区和盟市机关干部7000多人集中到唐山市的部队营房，举办了为期17月（1969年底到1971年6月）的学习班。学员按原单位编成连队，排以上管理人员都是军人。实行“不准离开营房、不准与外界联络、不准会客”的“三不准”[注3]。让学员们读报纸，念文件，批判乌兰夫的“民族分裂”、“反党叛国”罪行，揭批他人，痛骂自己。遥遥无期的批斗、等待造成的精神压力，致使个别有精神病前史者复发，甚至有人自杀。

受这一时尚的影响，连家庭里的召开家庭会议调解矛盾，也被称为办学习班。以提拔、培训造反派干部为目的的读书班也被称为学习班。由于相信毛泽东思想教育病人在治疗精神病人时能起作用，学习班就办到了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湖南省郴州地区精神病院）。风闻还有“扫阻力学习班”（为

了打击某主要目标，而扫清外围以收集罪证材料、实施孤立等目标)、“出狱学习班”(为了让不得已放出去的人不散布不满、不利于当局的言论而办)。最可悲、可恶的是，张志新被判死刑，竟然被办了家属学习班，让被逼离婚的前夫曾真和未成年的女儿曾林、儿子曾彤表示拥护政府判决，与前妻、母亲划清界限。

[注 1]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

[注 2] xiabo4712 回忆，1970 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曾被关在“郑州纺织机械厂毛泽东思想再教育学习班”三个月。其实就是挖用于“三防”的地洞。晚上才是真正的“学习时间”，由“文攻武卫”造反派“修理”“学习班”的阶级敌人，把人打得鬼哭狼嚎。后来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

[注 3]禁止的内容各地有不同，叫法也不同。网友 q1946129 在湖北沔阳县（现仙桃市）参加的清查“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运动学习班，就有“不准对外通信，不准单独活动，不准离开学习班，不准互相串联，不准搞小动作”的“五不准”。

(参考资料：《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本报评论员《人民日报》1967 年 12 月 22 日；《上海掀起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群众运动》，《人民日报》1967 年 10 月 23 日；万炜明《我参加的“史无前例”的学习班》，《炎黄春秋》2005 年第 4 期；《上海地方志·青浦县志》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人民日报》1971 年 8 月 10 日；陈少京《张志新冤案揭密》，《南方周末》2000 年 6 月 16 日)

## 大方向

名词。意指运动的主流或政治方向。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政治在毛泽东眼里，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他深深着迷于“卑贱者最聪明”，“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这种民粹主义观念到了文革时，被他和中央文革小组置换为“群众运动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注 1]。

在当时，“大方向”有两个须臾不离的固定副词：“群众的”、“革命的”。群众是“人民”在时间之流中的现身，“革命”是历史前进方向和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它们充分保证了自己的无条件真理性、天然合法性。因为毛泽东需要利用它来对抗中央一线及其官僚体系。由于中央一线只能在意识形态上认同这样的逻辑，而束缚住了他们抵抗、还击的手脚。连干部队伍的政治排队情况，都是以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来对应画线的[注 2]。

在文革初期，这是一道预发的赦免符，以抽象的政治性的全称肯定，否定了所有法律秩序的具体规定。它被用作鼓动、放纵红卫兵行为上的随意性，从破四旧、砸文物到揪斗、体罚，从抄家到冲击国家机关、军事机关……即使有激烈、野蛮的举动，也被当作行为失检的枝末细节，是事出有因，不应追究。连“糟得很”的现象描述都被先验地纳入了指斥历史上湖南农民运动的国民党反动派、资产阶级“官老爷”的观念范畴里。由此树立起一种超越现行党政官僚体系并与之相对抗的合法性，服务于从政治上打倒中央一线的目标。没有权威和方向性的群众运动，只能尊奉赋予他们至上地位的授权者为权威，像被操控在领袖手中的玩偶，以横向的冲撞、扩展性突破、打断纵向的连接、系统性，在摧枯拉朽的冲突

砍杀中实现毛泽东的政治意愿、战略意图。

在此期间，“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成了附有魔法的咒语，足以使任何党政领导意志和法律效力失效。它既是矛，可以被用于攻击当政官僚，又是盾，被用于保护造反派红卫兵。有了这样的赦免符，行政管理部門的几乎所有意欲阻止、抵制造反的应对措施都无从施行。但这样的授权，又是根据需要，随时可以收回的；“大方向”始终在毛泽东的脑子里，在毛的掌握中。1968年他感到学生红卫兵将妨碍政权重建（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时就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并且果断地派出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把红卫兵赶出了文革的政治舞台，并变成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农村。因此，民间议论“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就不仅是牢骚，而包含了怀疑和叛逆的星火点点。

[注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6条）的第2条《主流和曲折》：“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注2]《十六条》的第3条与第8条之间就呈现出这样有趣的对应关系。（一）好的：“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二）比较好的：对群众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四）少量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参考资料：李建华、程龙《行动的群众——毛泽东的民主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人民日报》1967年8月19日）

## 傅雷

（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上海人。中国现代翻译家、学者，以翻译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小说而著称。著有《傅雷译文集》15卷、500万字。

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学习，1931年回国后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49年前曾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1949年后曾历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是少有的不领工资，全靠译著稿费生活者之一。1957年被打为右派，留学波兰的儿子傅聪出走英国。1961年9月30日报载摘去右派帽子。1960年代，以其研究与翻译巴尔扎克著作的卓越成就，被法国吸收为巴尔扎克研究协会会员。

1966年曾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说：“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同年8月3日因从上海音乐学院李翠贞教授家中抄出傅雷书信，怀疑被打为“特务”的李翠贞与傅雷有勾结，傅家于是2次遭到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和上海54中红卫兵长达4天3夜的轮番抄家。从阁楼上发现亲友寄存的箱子里，旧镜背后嵌有蒋介石像、旧画报上有宋美龄照片，被指认“窝藏反党罪证”。罚跪在地，戴高帽子受到批斗，被贴大字报。

人称“孤傲如云间鹤”的他（自喻“墙洞里的小老鼠”）不堪凌辱，9月3

日凌晨从容书写遗书，[注 1]一一嘱咐后事，将现款大部赠女佣周菊娣，其余支付当月房租水电，两块欧米茄手表留给小儿傅敏及其女友。并预留 53.30 元火葬费。傅服毒痉挛而亡，其妻朱梅馥投缳自尽。[注 2]小说家陈村著有《傅雷之死》志其事。

死后被火化，骨灰无人敢认领。一位素不相识的、热爱傅雷译文的文学女青年江小燕一一冒充傅家亲戚，并找到死者妻兄，从万国殡仪馆认领骨灰，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当时规定，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举办丧事、不准留尸骨）。1979 年 4 月傅雷夫妇骨灰盒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文革后，以著述《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译文《约翰·克利斯朵夫》、《艺术哲学》等传世。《傅雷家书》是傅雷 1950 年代中期至 1960 年代中期写给儿子傅聪的家信。三联书店 1982 年出版，先后再版 5 次，从初版的 125 封信增订到 186 封；重印 19 次，累计印数逾 100 万册。

[注 1] 工笔小楷誊写遗书装在一个写有“此包由××路×弄×号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 傅、朱”火漆封固包裹，另有钱、物。全文如次——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 55.29 元（附现款）
-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 室沈仲章托代修欧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 370 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 十，旧自用欧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 十一，现钞 53.30 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侯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注2] 9月2日下午，去意已决的朱梅馥对女佣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那就是要体面地死去。

（参考资料：金石开编《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P255；《傅雷之死》，《世纪中国》2002年5月31日）

## 日记罪

这是一个后文革词语。它指称的是因为书写日记而被指控、判定犯罪并量刑惩处。文革中被归入“反革命罪”。

作为公民人身权利隐私权的一部分，日记[注]是当事人对自己日常生活事务、个人际遇、见闻、感觉的逐日进行的私人记录，除个别作家拿它发表外，绝大多数是秘而不宣的。

从1953年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舒芜交信作为定罪证据开始，书信的个人隐私和思想、言论自由就被否定，并且扩大到了日记。日记罪的高发期是三年困难、文革等政治敏感、脆弱时期。

用于定罪日记的来源，或是组织要求交出审查，或是红卫兵抄家抄检强掠得来。私人记录一旦落到办案人手里就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社会—政治意义：日记所载事实、感触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稍有出入，流露不满、批评的文字，就被寻章摘句，掐头去尾，往往是从几十万字日记找出只言片语、几百字穿凿连缀成文，引申构陷，上纲上线，罗织成罪。典型的判词是：“书写大量反动日记，多次偷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以最恶毒的词句攻击、诬蔑、咒骂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上山下乡运动，极端吹捧苏修，为刘××鸣冤叫屈，反革命气焰嚣张，民愤极大。”

遇罗克、王申酉等案情里都有日记罪情节，并把日记纳入了定罪依据。对日记罪的处理，轻则批斗、挂牌、游街，留党察看，开除留用，工资降级；中则戴右派帽子，开除学籍，不予分配工作、遣送原籍监督劳动；重则开除党籍、工职，以现行反革命判刑5—20年（多为10年）。牵连波及的还有妻离子散，恋人劳燕分飞，无房、无家、无业，只能靠抗体力活儿活命，等等。

网友 iloveyy 的爷爷（民国国企总经理）文革烧日记造成马桶下水道堵塞（日记太多），被发现后给揪住不放，预谋自杀不忍连累子女而不果。Glzzx196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日记中有对“伟大领袖”“文革小组”“文化革命”“林副主席”的不敬词句，经“革命群众”举报被广州公安厅以反革命罪逮捕、关押一年。因“出身较好”交群众管制，“帽子拿在群众手里”；1970年被分配到广西某山区。

因此人们都把日记烧掉，不敢再记日记，害怕授人以柄，招来横祸。或把日记变成记事册，只写流水帐、抄语录，即使要记录一点真实的东西也用暗语、代号、删节号（……）来替代。甚至开天窗，留着空白日后补记。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平反冤假错案时，日记罪也被列入其中。通过申诉，法院撤消了原判决书、宣告被告人无罪，公开平反，恢复公职，恢复原工资级别，补发毕业证书，归还日记。

在此前后，《群众》杂志副总编乐秀良在《人民日报》、《新观察》杂志上陆续发表了《日记何罪》、《再谈日记何罪》、《三谈日记何罪》。他认为日记的私密性决定了它不公开、无影响、无流毒、无不良后果，即使有偏激、错误也不危害社会秩序，不构成犯罪和刑事责任。因日记被批斗、判刑都是冤假错案，必须平反、善后。今后法律必须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保障日记自由，保障日记不再成为抄家的目标、文字狱的罪证，保障日记主人不会成为思想犯。5年间接到21个省市自治区一百几十位读者600多封来信，倾诉因日记罪蒙受的冤屈，请求申诉。乐秀良一封封回信、处理，或代呈上级，或投书报刊揭载，或帮忙出主意，这些读者来信反映的问题基本得到了改正。乐秀良因此被称为“日记保护神”。

日记爱好者有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日”为“日记节”或叫“日记日”的民间创议。

[注] 日记源远流长：经学家俞樾认为日记起源于东汉（如马笃伯《封禅仪记》，就已逐日记叙登泰山之事），两宋成了日记的繁兴期（如南宋陆游和范成大的日记，日本、美国分别有译注本或研究论著出版），清代李慈铭日记逾百万字，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1890年）、梁启超访美《新大陆游记》（1903年）对近代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

（参考资料：乐秀良《日记悲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管炳圣《日记宣言》，载《日记情》）

## 《中国》

意大利著名左派导演安东尼奥尼[注 1]1972年拍摄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他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

由于摄制组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关于经过路线，曾经和中国官员讨论了整整三天，最终放弃原先从意大利带来的长达近半年的计划，在短短22天之内匆匆赶拍。影片难免带上了旅游者“猎奇”视角的特点。人们从中看到了主人希望世人看到的学校、工厂、幼儿园、和公园，人们整齐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纺织厂女工下班以后仍然不愿离去，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影片最完整的段落之一，是通过针灸麻醉、对一位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几乎像科教片那样详细周到，从如何将长长的银针插到产妇滚圆的肚皮开始，一直到拽出一个血肉模糊的小生命。在长达20分钟的杂技表演中结束了影片。因为有官方的全程“陪同”，使导演的意图无法完全实现，只能采取一些偷拍、追拍、突拍方法捕捉细节和人们的表情。

1973年10月底，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该片。影片作为1974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活动计划的一部分，被安排在该城的凤凰剧院上映。得知消息后，

中国的外交官抗议放映这部影片，意大利政府也尽一切可能制止这部影片放映，终于被移到另一所影院放映。

被激怒的中共官方称安氏为“反华小丑”，“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持续将近一年时间的批判。其中仅1974年2、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收录文章43篇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作者来自全国，很多人是安东尼奥尼拍摄过的地方的干部和群众。连那些没有看过影片的人也随大溜跟着批。

影片被指控全盘否定、抹杀中国建设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同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没有两样：放着许多现代化大型企业不拍，专拍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放着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远洋轮不拍，进入他镜头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进行了丑化：把他们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吃好喝，浑浑噩噩的人群。甚至还揭安氏老底说，他在二战时就投靠墨索里尼政权，在陆军中任职。曾奉法西斯宣传机关“政治片和战争片摄制处”命令，参与编写吹捧墨索里尼空军的影片《一个航空员的归来》，得到赏识。批判还被延伸到对美苏敌意宣传的批判和对审批拍摄的决策人周恩来的影射指摘。

他为自己辩护说：“电影的名字叫《中国》，其实这不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电影，而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在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则不够尊重和革命，或者，也许是，在协助我工作并赞扬了工作结果的那些宽宏大量的人的后面，有一群不会容忍和极其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权力结构内部争权夺利的借口。”[注2]

2004年11月25日，“安东尼奥尼回顾展映”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给92岁的老人捎去了迟到的慰藉。看过当年被狠批的影片后，50岁左右观众感到隔膜、无奈，年轻观众则表示了认可，专家的评论说“呈现出一个伟大的影像思想者对陌生领域的影像直觉，对陌生空间中的人的直觉”。

[注1] 安东尼奥尼（1912— ）出生于意大利费拉拉一个富足家庭，1935年毕业于波伦尼亚大学经贸专业。1940年去罗马在《电影》杂志做编辑。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

作品有故事片《爱情故事》（1950）、《喊叫》（1957）、《奇遇》（1960）、《夜》（1961）、《蚀》（1962）、《职业记者》（1974）、《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1982）、《云上的日子》（1994）；纪录片《波河的人们》（1943）、《中国》（1972）。1964年因《红色沙漠》获得金狮奖。1995年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

[注2] 意大利评论家艾柯曾试图概括影片的意图：安东尼奥尼作为“一个特别倾向于深度探究生存问题和强调表现人际关系，而非致力于抽象的辩证法问题和阶级斗争的西方艺术家”，向西方观众“讲述的是这场革命中作为次要矛盾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非展现作为主要矛盾的革命本身”。而意大利著名作家阿尔伯特·莫拉维亚则以惯常的深刻尖锐性直觉到该片的价值：“镜头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巨大国家的此时此刻”，“最终它只是一个供描写的纯粹的事物”，“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视野使导演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日常’和这种‘日常’赋予他印象的新鲜感和直观感。确实，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是一个‘日常的’中国”。



(参考资料:单万里《安东尼奥尼的荣誉与痛苦》,《书城》2002年第11期;卡尔洛·迪卡尔洛《安东尼奥尼的导演生涯》,《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45期(总第207期);舒可文《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对话》,《三联生活周刊》总314期)

## 表现

名词。意指一个人在政治运动、职务行为、人际关系中的行为和行为后面隐含的倾向。这一情况是什么样子,应给予怎样的评价,要由群众评议、领导认可。

所谓表现“进步”、“积极”,就是靠拢组织,放弃个人利益、思考、个性,以组织的是非为是非,以领导的意志为意志——政治、思想、行动全面保持一致。它强调的重点是,要让人看见,不管个人或组织,要让你的同事、四邻上下、上级领导看到、看出你是怎样的(而人内心怎么想的既无法探知、测量,也无人感兴趣,所以不重要)。

由于表现不易捉摸而多变,无法进行实质性考量,“有成分论,重在表现”阶级路线政策里的政治表现在文革中就成了虚设,能落到实处的就只有履历表上填写的成分(保险系数大)。

把政治表现绝对化、神圣化,就是不论当事人不管真心还是违心,从外表看上去都要严格遵循当时公认的标准行事做人,完全顺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提出政治标准、伦理标准,甚至比社会平均值还略有超出。而无论它是否超越人类理性、良知的底线。即,无条件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单位领导的大小安排,吃苦耐劳做事干活,没有怨言,没有个人见解,始终做与自己身份(规定角色)相符的事情。

具体做法有:或者表面化贯彻政治挂帅,反正报刊广播怎么说我就怎么应,计划书、决心书、挑战书、标语口号可劲儿书写、张贴,做足文章(所以红海洋、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搞起来轰轰烈烈,争先恐后),也许是大面儿上虚应故事(基层经验的总结是“认认真真走过场”)糊糊涂涂过日子,也许是阳奉阴违、实用主义地该怎么做(按实际需要)还怎么做(往往要承担政治风险)。或者把上级精神、安排部署行政化,处处听话事事紧跟,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式),不管做事效果只管政治上正确。

或者为了表现积极,人们可以不顾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亩产3万斤”就“亩产3万斤”[注1];昧着良心对同事朋友栽赃陷害,粗声恶言批判斗争,以表现“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甚至对亲生父母也要断绝关系、揭发批判,“划清界限”;哪怕体力不支,甚至正在生病,也要硬撑着坚持惩罚性劳动,仅仅为了表现“不怕苦不怕累”;记专给别人看的假日记,把自己打扮得十全十美,偶尔记点无关痛痒的小缺点,立即骂个狗血淋头,以表现“严于律己”……

人格矮化,精神分裂,良知泯灭,无视道德底线,自欺欺人,表里不一的伪君子成了那个时代必不可少的生存技巧、保护色。恭顺的态度讨好了底气不足、期待臣服、看重表面现象的官员的心理需要,表现就成了他们仕途或自保的百发百中的利器。

表现还可以成为一个自我否定的词:表现好仍然是表象,仍然可以是暂时的和不稳定的,所以组织上还要继续考验,才能确定是否能够解决发展问题。工作业绩再好,职业道德再无可挑剔,只要没表现出对领导的恭顺,都属不予明言的“表现不好”。考验表现,可以遥遥无期。

直到2000年代看重政治表现仍然是大陆官场的一种选拔人才、干部的通行

标准。[注 2]这是否说明体制存在一贯性联系，似乎需要更多材料和研究才能回答。

[注 1]从这里可以找到某科学家论证亩产万斤的生存论理性根据——不可能拒绝党的需要，你不说“是”总有人说。如此 你的处境就很不妙了。即使是科学也必须符合社会主义集体功业的逻辑。

[注 2]以下是 2000 年代政治态度及表现的考评表格——

#### 政治态度及表现 50 分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严以律己，积极努力，为人师表，主动做好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有公认的突出表现。 A50 分

能坚持“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行动上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较为积极努力，能配合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表现较好。 B40 分

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曾有一些糊涂认识，经学习、教育后提高了认识，表现尚好。 C30 分

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有严重错误言行。 D5 分

(参考资料：侯永《社会主义纪律和个人自由》，《人民日报》1957.11.19；新华社《学有榜样 赶有目标》，《人民日报》1969.02.20 中共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做好团结、教育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工作》，《人民日报》1972.06.13；横玉箫《该给“政治表现”减负了》，华商网——《华商报》2004-03-19)

#### 不破不立

偏正结构联合词组。意谓不破除旧的，就不能建立新的。在逻辑上，把破除作为建立的必要条件。1960 年代、1970 年代流行语。破，指突破、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立，指建设、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等。毛泽东“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话，成为造反年代被官方社论和红卫兵大字报引用率最高的语录。

不破不立，先破后立，是毛泽东思想、行为方式的关键词。他给“破”下的定义，即“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并且说“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进一步把破除当成了建设的充分条件，“破”直接等于了“立”。其实是从意识形态方面，为非程序、超组织的文革营造合法性根据。片面强调、肯定“破”、破除、破坏的重要、优先、间断性，而忽略、替代了“立”、建设的连续性、日常性。从观念上说，不破不立对传统、既有制度抱着本能的不信任（是否蕴有毛泽东诗人气质的浪漫天性？），而对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盲目性抱有本能的肯定态度。而且还要“大破大立”。它是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时期的行为逻辑。

在政治哲学上，就成了“兴无灭资”、“破旧立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还有“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玄学辩护；而在政治现实中，则是“大批判开路”，“打破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大轰大嗡、“破”而不“立”近乎无政府

主义的一套，竟然成为堂而皇之的国家政策，造成了毁孔庙、烧文物、禁图书、践人伦亲情、倡文攻武卫的惨祸闹剧。

这种逻辑阙失，在实践中造成的损失不止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领域的有形灾难，而且造成整整一代青年思想方法的结构性的桀骜。大“革”文化“命”，把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都列入“封资修”“四旧”予以革除，割断历史的血脉、脐带，在文艺、教育等领域断言“黑线专政”、“两个估计”，全面否定建国 17 年的建设。造成了一代人的价值认同、精神生活陷入虚无主义的全面混乱，更造成了知识、人才的深层断裂。

所谓“立”，诸如“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厂校挂钩”、“校办工厂”、“中西医结合”……完全是沙上建塔，没有现实根据、科学逻辑，虽然轰轰烈烈于一时，到头来却被悉数抛弃（是否确当尚容别论），成了笑柄。

2000 年代此语被新儒家（传统文化派）引为攻击五四“全盘西化”的论据，认为文革是五四文化、狂飙精神的必然发展。有学者指出，文革进程没有沿毛泽东设计道路展开和延伸的事实，证明了社会革命后果的不可预测性、无法制社会的危险性，以及象中国这样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民族实现变革的复杂性。而存旧出新，使新旧文化处于自由竞争状态，让自由竞争、自然淘汰决定取舍废存的建设因素或许更多。

也被职业股评家引用来为低迷的股市打气：“破”（跌破多少点）是“立”（股市上扬）的前奏。思想资源上完全移用了当年不破不立的逻辑，并带有广告式的蛊惑、矫情。

（参考资料：王任重《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人民日报》1966 年 4 月 7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 年 5 月 16 日）》，《红旗》1967 年第 7 期；bigox《试论中华新文化复兴》，“月光软件”“思想之剑”）

## 李敦白

（1921— ）曾被称为“国际反修战士”、“美国特务”。

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原名 Sidney Rittenberg。1939 年曾加入美国共产党。1940 年应征入伍并按规定脱党。被安排到斯坦福大学去学习中文。

1945 年夏天随美军到达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被分配在美军赔偿损失部处理民间事务。有机会接触社会不同阶层，渐渐看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经《新华日报》报童介绍认识一位中共党员。曾利用美军身份多次帮助上了“黑名单”的地下工作者脱离险境。同年宋庆龄介绍其到联合国救济总署任职，负责把粮食送往受灾地区。从此脱离美军。

1946 年春，在中原解放区首府宣化店秘告中共国民党军队将对其发动进攻。后在张家口、涉县协助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从事从事英语广播稿的编辑和播音工作；到延安担任新华社总社英语专家。曾协助斯特朗把文件、资料译成英文，两人合作撰写、著述。并经特批成为当时唯一的美裔共产党员。

1949 年 1 月被指控“接受美帝国主义指示，破坏中国革命”，囚禁至 1955 年 4 月方获释放。到中央广播事业局任职。1956 年 2 月在春节与同单位总编室的王玉琳结婚。曾参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翻译、定稿工作。

1966年文革初期，他贴出大字报，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表示要和“造反派”们并肩战斗。于是他成了广播局的风云人物。10月1日国庆节得到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得到毛泽东接见，并合影。毛泽东在他的“红宝书”上签了名。李敦白回到机关后，人们一个个地和他握手。许多学校、机关、广场的“造反派”集会，都请他去发表演说，排着队请他在“红宝书”上签名。成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这个外国专家造反组织在1967年夏天时已有70余名成员，倾向于支持当时北京“红三司”等最激烈的造反派系。但他亲眼目睹许多老朋友、老领导都被批判、斗争，甚至受到粗暴、野蛮的虐待，不得不陷入迷惑之中。同年2月广播局造反派夺权，公推他参加“革委会”（“三人小组”）领导工作。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上，他代表外国造反派发言。

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广播局，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建立新的领导机构。广播局实行军管以后，他和夫人的工作证都被收走，并且加以软禁。1968年2月21日以“美国特务”罪名被送到关押重要犯人的秦城监狱。1977年11月，经过9年8个月监禁被释放出狱。公安部为其平反，夫人和子女也解除了隔离。

1980年3月偕夫人回到美国。靠夫人织毛衣出售，教授中文和中国菜的烹调，他到学校教课，勉强维持生活。不久三女一子也先后移居美国。

曾应邀帮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到中国拍电影。回国以后他在该台的《星期天60分钟》节目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1990年代不少美国公司（如英特尔、戴尔等电脑公司和保诚人寿、拍立得等企业）纷纷找他咨询或者当顾问，开展中美贸易。定期为提供商业情报的《策略新闻周刊》(Strategic News Service)撰写有关中国的专栏。成立“李敦白有限公司”从事中美商务咨询业务，获得巨大成功。在华盛顿州郊外法克斯岛，购置了占地1.2万平方米的豪华别墅。

1993年出版描述其35年漫长中国之旅的自传《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女记者班奈特执笔)。[注]

[注] 回忆起文革时的孟浪，他说“在那些如醉如痴好似被催眠的日子里，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有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我们不知道民主更要小心翼翼的保护少数派说话的权利，没有对立面自己就要疯狂迟早要走向完蛋。”对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比较，他说，“与周在一起时，我觉得他是朋友，也是同志；与毛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似乎就坐在历史的旁边。”

(参考资料：杨兆麟《我和“洋特务”李敦白》，《炎黄春秋》2005年第6期；郑光路《老外也造反敢写大字报》，“新浪”“文化生活”2004年6月22日《传奇人物——最了解中国的老外》，《讲义杂志》2005年1月24日，“全球华文行销知识库” )

## 安亭事件

1966年11月10日北上告状的1000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安亭[注1]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

造成京沪线中断 20 小时（官方版本是 30 小时）的事件。

11 月 9 日上海国棉 17 厂（王洪文）、30 厂（王秀珍）、31 厂（黄金海）、上海良工阀门厂（陈阿大）、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等 17 家工厂造反组织组成的“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会前他们曾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其组织、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提供宣传工具，得到按中共中央文件规定做出的“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三不”答复。

为达到造反组织合法化的政治目的，10 日他们率队去北京告状。潘国平率 1000 人登上去赴京特快，王洪文率 1000 人登上驶往郑州的 69 次特快（运行中被改为 602 次慢车）。先后受阻于南京和安亭；饥渴难忍，且传有严厉整肃为首者的预案。当日中午 12 点他们将 14 次特快列车拦阻于安亭站，企图以扩大事态，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事件当即引起北京震动、外电报道。

中共华东局韩哲一书记、上海副市长李干成 11 日到安亭劝说前 14 次特快被放行。同时陈伯达发来电报：“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赴京队员的单位领导亦领命分别动员员工返沪。张春桥受命 11 日深夜乘专机抵沪，到安亭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密谈，允诺回上海解决他们提出的各项要求。12 日下午大部分造反队员回沪。另一部分则先后在谢鹏飞（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周宝林（上海市仪表局）、耿金章（上海井冈山造纸厂）、戴祖祥等率领下继续北上。

13 日上午张春桥与工总司会谈前的上海市委常委会再次重申“三不”决定。意欲借助工人力量打倒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张春桥，当天下午即在工总司“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其工作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并被印成《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传单全市散发。契合毛泽东除了文化教育、党政机关，工矿企业也要开展文革，而且红卫兵运动的消极面开始显露，需要工人主力军推动革命造反继续发展的想法。18 日尚在苏州、南京的所有告状团人员全部撤回。

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获悉消息后迅速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16 日[注 2]毛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工矿企业不能组织跨行业群众组织的禁令由此废除，学生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合流，释放更大灾难的潘多拉魔盒再次打开。

随后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相继发生。这一事件成了全面炮打上海市委，导致后来轰动全国的所谓夺权的“一月革命”的导火索。

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常溪萍等被打倒、迫害，常溪萍甚至自杀而亡。

上海工总司制作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套章（全套 3 枚），第 1 枚章围绕“安亭事件”把“一月革命”前的造反内容融入其中。

[注 1] 上海西北郊 30 公里嘉定县境内与昆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沪线上一个小站。1990 年代已建成汽车城。

[注 2] 多主 16 日说。唯《毛泽东传（1949—1976）》说是 14 日。应该有独立材料。

（参考资料：《陈丕显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 康平路事件

上海工总司和赤卫队 1966 年底在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注 1]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武斗。1966 年 12 月 28 日，上海工人“赤卫队”（号称有 80 万人之众）派了约 2 万多人涌进位于康平路、余庆路口的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大院“爱棠”大院，要求市长曹荻秋接见，并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等八项条件。大批“赤卫队”队员高呼“打倒曹老头”，涌向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所在地，到晚上仍聚集有 1 万多人，康平路被挤得水泄不通。

张春桥认定赤卫队接过“打倒曹荻秋”的口号是假，要把夺权的果实抢到手以达到保住旧市委的目的是真。急调在京的耿金章返沪。“工总司”、“机联站”等 20 多个造反组织在衡山饭店连夜开会，成立“联合指挥部”，并调集造反队员十几万人 29 日包围康平路。赤卫队无法撤离。“爱棠”大院周围和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喊“‘赤卫队’是老保，大方向错了”、“‘赤卫队’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不断广播“‘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家”的传言，制造紧张气氛。[注 2] 晚上 10 时许，荣昌路（今德昌路）和康平路大院门口不时发生小规模扭打。

30 日凌晨 2 时左右，手持木棍、皮带等器具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冲进“爱棠”大院内，见到佩戴“赤卫队”臂章的就拳打脚踢。到早晨 6 点钟，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幕后策划和耿金章现场指挥下，“赤卫队”被抓 300 多人，重伤当场送华东医院、华山医院、中山医院等医院有 100 人左右。2 万多人排成单行、分成六路被驱赶出康平路，收缴袖章有几大堆。

这是文革时期的上海也是全国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注 3]上海市委被彻底冲垮了。经此一役，赤卫队士气涣散，一蹶不振。数万赤卫队员北上赴京告状，“工总司”派去阻拦的人与他们 12 月 31 日下午在昆山县桥镇相遇。“工总司”强令赤卫队解散，后者不予理睬。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打伤赤卫队员多人，再次造成流血事件。并殃及沪宁铁路部分列车行驶中断。

以“破坏生产”、“破坏交通”为名，赤卫队的市、区负责人 240 多被抓，作为一个组织从此土崩瓦解。为张春桥的一月夺权造成了有利的力量对比和政治态势。

后来“赤卫队”负责人王玉玺、潘月法、金瑞章、李诗音四人因此被当时的法院判刑。1978 年 12 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复查，撤销原判决，给予平反。

[注 1] 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是上海市委机关所在地。这儿的 100 弄里住着上海党政首脑。

[注 2] 张春桥夫人李文静说：“有几个赤卫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后来看到是住家，家中有老小，很快就退出去了……”柯庆施夫人于文兰说：“有人敲门进屋，但进屋一看到柯老的遗像就退出去了，以后也没有再来。”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曾写《造谣派破产》的传单：“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陈丕显回忆录》P113）

[注 3] 文革研究者何蜀认为，重庆“12.4 事件”作为大规模武斗事件并导致重庆市委瘫痪早于康平路事件。但其影响的广泛性显然不如后者。

(参考资料:《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叶永烈《王洪文兴衰录》,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范卫平《解密:张春桥阴谋策划“康平路事件”震惊全国》,《新闻午报》2005 年 3 月 4 日 <http://cn.news.yahoo.com/050510/346/2bp32.html>)

## 师傅

原本指工、商、医、戏曲等行业中秉有技艺并传授技艺的人。师徒间恩义相授的准人身依附关系,带有轻微行帮色彩。文革中 1970 年代该词外延被泛化、扩大到适用于所有人的一般性尊称。

毛泽东有“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的论述,斗批改阶段有工宣队进入上层建筑、文化科教单位的措施,日常工作里从不与工人交往的知识份子,开始接受工人师傅的行政指令。甚至把工人请上讲台讲授一般性工业、工艺常识,将其称之为“工人阶级上讲台”“占领上层建筑”的新生事物。与中共历来看重工人阶级的阶级路线传统一脉相承,其时流行的阶级观,工人被视为最纯粹、最正宗的无产阶级,革命性最强、最彻底,因此,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成为最受人尊重的职业、社会人群;无论其工龄长短、出徒与否,都须称之为“师傅”。

所有宣传画造型群体中占据核心位置的第一主角都是工人(身着工装,英俊、豪迈、激情洋溢)。连他们因受教育程度低、长期从事简单劳动带来的固有行为特征,也被一味美化为认真、忠厚、真诚、豪爽、淳朴。在发展党员、提干、升学,贯彻阶级路线成为组织原则,出身工人或本人是工人,都会得到看重、优待。连类相及,择偶时工人身份都被人高看一眼。[注 1]以至于 2000 年代的随笔作者纵论美女的时代归宿,还酸溜溜地把文革美女派给了“工人师傅”。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形成了无论对方是何身份、职业、年龄、性别、亲疏,不管他是老教授、正格的军人(于是不伦不类的“解放军师傅”),还是妙龄少女,只要有求于人,或仅仅意欲表示对对方的敬意、好感,就以“师傅”相称的风气。那时和素不相识者打招呼,拿不准该怎样称呼为好,叫声“师傅”准没错(自居“徒弟”卑位)。所谓礼多人不怪嘛。久而久之,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尊贵”也会不自觉地带出一星半点的矜持、威严来。

传统习惯上出于对职业、技艺的尊重,在“师傅”前面要加一个“大”字;文革时单称“师傅”,其实更多是对人身份、权力的阿谀了。

风气相沿,到了 1990 年代,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低下,工人经济、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反差过大,造成了他们强烈的失落感。以致有民谣把这种情绪作了事出有因的过火宣泄:“老大(工人)靠了边,老二(农民)分了田,老九(知识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指个体户)找大钱。”毕竟,以多年高积累、低分配的工资收入,在 1990 年代以来破产、下岗的夹攻下,受到社会保障不足,医疗、养老、住房制度一系列改革冲击,他们收获的实惠少而付出的代价多。边缘化到了被称为“弱势群体”的地步,与执政党阶级主体的意识形态虚设地位形成吊诡。难免给人物是人非、风水轮流转的感慨。不明就里,再胡乱叫人“师傅”就可能遭人白眼。[注 2]

[注 1]1990 年代初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渴望》,讲的就是一个文革时期工人姑娘(师傅)嫁给知识分子小伙子(徒弟),中间穿插了一个弃婴(丈夫的

侄女)的悲欢离合故事。可以视为一部非常时期的两性关系(含性心理)史,还有一些尚未被人解读过的内容。

[注2]某人问路于一戴眼镜老叟,怕喊“同志”惹人烦就叫了“师傅”,老叟瞅瞅问者没有应声。问者以为对方耳背再次赔笑问道,不料他说:“你看我长得像师傅吗?”问者忙改口叫“教授”。那“教授”这才露出笑容。

(参考资料:李晓敏《今天,美女都嫁给了谁?》,《南方航空报》2004-11-30;吴永亮《“称呼”你叫啥?》,《东方烟草报社》204期:2005-8-26)

## 传经送宝

作为榜样的典型走出去传授经验。与作为学习者上门求艺、探宝的“取经”相对。有省市地区、系统行政领导组织、安排的和一对一邀请两种情况。

这与中共为了在幅员辽阔的国家实行高度集权的一元化统治,使中央的意志、政策,通过“抓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层层贯彻下去有关。

大凡要抓一项工作、展开一个什么运动,总要在当地寻找典型,派工作班子(由书记带队)“蹲点”,抓住不放,形成关于运动的目标、对象、发展阶段、措施、验收……等一整套比较规范的政策规定和实施细则。推广时也要先在当地找若干个(单位、地区)试点,把上级的政策规定、普遍经验具体化,以适应当地的实际。以便就近学习。这被“抓”出的典型、树起的样板,到需要指导的地方,介绍经验、示范工作,就叫“传经送宝”。

这一方面是为了落实中央精神不走样,在各方面条件悬殊很大的不同地区,要针对实际情况变通执行,试点抓典型,就是为了保证严格掌握一个统一的尺度。另一方面,由于中央的方针政策带有全局性,与普遍性相适应表达上必然有一定程度的概括抽象;而中共干部队伍文化水平不高,易于接受直观的样板,方便执行者参照实施,“依样葫芦画瓢”。

一般说来,“取经”多于“传经送宝”。原因在于,取经是一对多,传经送宝是一对一。对样板、典型而言,取经的效率要比传经送宝高。但传经送宝者只需安心传授经验,接受学习者的款待、欢呼,就不象接受取经那样,还得替上门取经者张罗吃、住等接待工作,赔本赚吆喝了(先进典型的已成规模的高额招待费也有财政拨款托底)。

在先进典型资源相对稀缺情况下,虽说官方意识形态要求受邀方(政治荣誉的享有者)有义务传授革命真经,受邀方应付、接待都应接不暇、左支右绌,能够答应邀请方上门是很给面子的(或者是双方有交情,或者是上级交办不得不应承,或者是得买居间的朋友的面子)——因为受邀方的名气已经足够大,不需要人抬轿子了。况且传经送宝是纯粹义务性质,分文不收讲课费。从习惯上说,比起传经送宝,坐等上门的主家面子更足、更大,机会成本也较小,所以传经送宝的话语本身就含有纡尊俯就、无私奉献的意思。

后来这个具有工作方法的特殊涵义的术语,演变、泛化成了一般的客套话,用于主人(单位)接待客人时委婉地恭维对方——说是受累的主人得到了客人给予的无法匹配、报答不了的恩惠。类似“蓬荜增辉”。说者和听者都心里有数,不一定真的就是传经送宝。

2000年代仍有人把它作为“传授经验”的代词,不过其固有的政治色彩已经稀薄到若有若无。只有过来人才知道它的出处,听着会心一笑。



(参考资料: 本报通讯员《三次取经》,《人民日报》1972.01.05; 龚修文《文革浩劫 指鹿为马》,“鹤岗视窗” <http://www.hg0468.com/dajiawenjiH17.htm>)

## 大办

与号召相联系的固定句式: 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教育(扫盲)、大办钢铁、大办交通、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办民兵师、大办猪场、大办小型水电站、大办粘胶纤维生产、大办劳改队、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办五七干校、大办农场、大办水利、大办“开放式”统计……大办就是搞全民动员的群众运动。

大办, 一则是中心工作的下达、贯彻, 典型经验的推广、普及, 不管具体条件如何, 只要是上级精神(从中央到省、市、县、区)、定下来的事, 就无条件落实照办, 要有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 在大办的普遍号召面前不能讲价钱, 没有例外, 比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不能强调莫违农时, 本地情况特殊论; 二则是领导(书记)挂帅, 组织保证, 所有工作都要为中心工作让路, 要人给人, 要物给物, 要钱给钱, 协调指挥, 释疑解难, 务求落实; 三则是大张旗鼓, 声势浩大, 雷厉风行, 从部署落实到检查验收, 从标语口号到誓师大会, 从全民动员到青年突击队, 大兵团会战十八般武艺轮番搬用, 不讲情面, 不留死角, 环环相扣, 高潮迭起。

大办的号召不是指导性的, 允许因地制宜、量体裁衣, 而是以行政命令为根据的。它的外部形式是运动, 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程序做保证, 有一套与之相配套的观念软件、文化帮助完成它的结构, 牵引它的运转。

比如, 考核官员时, 通常不看大办的效果(当时没有、也不讲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 没有、也不讲质量管理——算政治账, 不算经济账), 而看落实的坚决程度, 就滋长了照转照发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少数有良知的官员, 悄悄用走过场的官样文章应付上级, 虽然明知效果堪忧, 还是一丝不苟地虚张声势, 形成“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行为惯性。锣声大雨点小, 只损失机会成本(消极对抗); 更多官员不顾客观条件、坚决的大办(如大炼钢铁、围湖造田), 就会造成灾难性的损失(积极迎合)。不管造成多大损失, 只要能保住纱帽、升官晋爵就成。

在农村的各种“大办”中, 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 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这些无视经济规律的“平调”实际上都对农民的剥夺, 使农民惊恐和不满, 纷纷杀猪宰羊, 砍树伐木, 造成生产力和环境的很大破坏, 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

哪怕有丝毫怀疑, 也是右倾机会主义。如果不想轻则挨组织批判, 重则换将上马照样干; 就聪明点, 照方抓药。因为“大办”任务, 不光有安排, 还有经常性反复检查落实, 很难有侥幸逃脱的漏网之鱼。反正以组织为后盾的社会动员模式, 有无限的资源可以调度、透支, 无须考虑追究责任问题。因为组织从来不会否定自己。

文革带来的新变化是, “大办”的频率更高, [注]依赖“大办”的事项也更多; 对迟疑不决者的处罚、打击, 更迅速、更坚决, 定的调子更高——直接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党外斗争、国际帝修反代言人什么的挂上钩。从批判、批斗到罢官、牛棚监禁, 斩断罚决, 雷厉风行。不容申诉, 决不重复议。连接受投诉

的机构都没有。倾向于顺应自保的人更多。

[注]从“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数据看，1966—1976年该词出现的概率3.36%，是平均数1.75%的将近一倍。而真正高潮1966、67、68年的急风暴雨期党政机构近于瘫痪状况，该词出现率实际未达平均数，也即是说，文革中后期的该词出现率超出平均数不止一倍。

(参考资料：新华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社会主义工业 参加新疆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的各族工人和干部深入批判〈条例〉》，《人民日报》1976年9月10日；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 点水

动词。文革以前的社会史里也曾有使用，其释义为“指认着人告密”。多与黑帮、秘密社会的倾轧、复仇有关。含贬义。

文革中指向某派群众组织告密，指认对立一派群众组织的头目、骨干或一般成员。主要发生在武斗的高峰期。点水人与被点水人之间多有私人嫌隙；但也有个别被派性观点冲昏头脑的普通知情人无私揭发，或至亲者大义灭亲的。

与揭发的含义有近似处，但揭发的受理方一般指是单位行政领导，点水的受理方则特定是群众组织。前者的处理方式大致规范而可以预期，后者的处理方式则因不合常理、无法预期，具有更浓的恐怖色彩。点水还有一点与揭发不同：揭发的内容是被揭发者的言行，对被揭发者的处理往往要视受理者的判断、需要、安排而定。点水提供的仅仅是被点水人的行踪，点水者知道被点水者与受理者处于战时的敌对关系，因此他能够估计后续事件发生的大致方向，其预期是恶性故意的。揭发者的利益在于赢得政治积极的评语而占据有利地位，点水者不可能获得实际利益，其动机除了被派性蒙蔽的狂热外（提供情报真实），就是泄愤、借刀杀人（提供情报可能虚假）。

点水的直接后果，可能导致被点水人遭到抓捕、羁押、殴打，极少数人甚至就因此致残、致死。羁押地点为群众组织的武斗据点。是一种法外施法的非法行为。抓捕、羁押的目的有：对对立一派群众组织的对等报复措施，用作交换己方人员的人质；或，被点水人是对立一派群众组织的重要知情人员，通过羁押和非法审讯获取情报，并从心理上打击对方。因此，它带有某种军事谋略色彩，希望借此取得力量对比上有利于己方的变化，是武斗的准战争性质的一种反映、折射。而武斗的准战争性质本身，决定了对抗的极端性——非常规、非理性，甚至轻视生命、虐杀生命，成为战争铁血理性的组成部分。

所以，事情的结局往往又是点水人最初无法完全预见的。

据重庆红卫兵墓园101号墓鲍积贞之女1992年4月5日回忆，她父亲抗战内迁厂的八级技工，并未参加派性组织（是否有观点？回忆中未提及），却被点水抓走并毒打致死（是否不承认参加派性组织，被认作不老实而加倍拷打？）。家人当即投诉到派出所，点水主谋者被逮捕、判刑。[注]

[注]死者居住地为一派群众组织的占领区，公检法还能勉强维持运转，红卫兵也配合执法。所以点水者（可能涉及诬告情节）受到了惩罚。反映了非常时期司法状况的一个侧影。埋在红卫兵墓地，是否红卫兵组织的一种赔偿措施？不得

而知。[附：点水故事

1966年7月初，雍某（中学生）文革时曾在派性组织宣传队里吹笙，住在市中心闹市区一武斗据点里。事发前同宣传队已有人被对方抓去，旋即放归女生，留下男俘。当日雍等四人同行意欲探望未曾露面的同队成员是否被抓（到其家打听消息），同行两人系当地一武斗名头很响的组织成员。途径对方武斗据点附近地带，被人点水、指证（主要针对有武斗盛名组织成员），给对立派别钳形围捕抓了三人，关在武斗据点。落在后面一人逃脱、报信。

被扣上携带炸药，欲行爆炸机关重地（主管外贸的机关所在地）的罪名。用黑纱蒙面拘至大楼径深地下室，暴打。头、腰、膝均有伤痕，但止于浅表。虽落下创疤，未及要害。事毕，让相邻医院护士草草处理伤口。取下蒙面黑纱，不少人认出雍（擅吹笙，两派宣传队演出他都曾莅临帮忙、游戏，故识者众）。于是得到比较善意的对待。当得知同派战败逃亡避难者至，看守忙将他们妥善藏匿，以防逃亡者在情绪化冲动下迁怒于他们。同押三人均对表现出同情热心的女看守心生感激爱怜。

羁押方手下人枪毙俘虏的呼声很高。羁押方头目林德文兄弟被对立派打死，但他本人还算是有头脑的冷静者，没有同意手下人枪毙俘虏的过激要求。雍养父是本地港口与羁押方同派观点组织成员，得讯后即吁请组织出面向羁押方说项，交涉放人。但雍感于义气不愿独脱拘禁。

雍母（小学教员）得知情况后，天天跑到关押地点，探视儿子，并向据点执事陈情，辩称其子仅宣传娱乐不及武斗，哀诉求告央及释放，以至泣下。几次路遇对岸枪炮射击，机警躲避幸免。其弟亦常伴母随行。联络同被羁押者父母亲属探望、吁求。拘禁中三人被责令写声明反正自新的悔过书。历十余日乃释。

放行前向被羁押者索要饭钱。告以身无分文，回家取来再交。得脱后，三人随宣传队赴外地巡回演出，顺带旅游，享受异地山水风情去了。避开了当地闻名全国的八月血战。

文革后期，有关方面调查羁押方负责人的武斗罪行，找到雍等三人。三人都提供了对被审查者有利的证词。]

（参考资料：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老Y\_73947《写给天国里的父亲》，“原文化城”20=405-03-29）

## 成份

名词。1980年代以后也写作“成分”。家庭成分的省称。指由个人的早期经历、职业和家庭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社会身份、阶级类属。它在个人履历表里虽只占据普通一格，对人生命运的意义却举足轻重。[注1]

在阶级斗争学说指导下，处理升学、入伍、提干、入党、运动中的左中右排队等人事和运动的现实政治问题时，都要实行阶级路线政策。家庭成分作为阶级路线的直接反映，是划线排队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因素（虽非充分条件，却是无之必不可的必要条件）。

劳动人民（工农）、革干家庭出身的人因为血统纯正，被认定阶级一政治立场坚定、革命性强，所以能享受种种照顾、优惠，而非劳动人民甚至敌对阶级出身的人则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这样的安排规则，有党的干部政策、国家人事制度

作保证。[注 2]尤其是参军、选拔参与核工业等研究，或从事保密程度高的职业，对成分的政审要求（甚至波及到对象、配偶），就更严格。

此时红五类的父母和子女就会为自己的出身感到骄傲、优越。黑五类的父母和子女就会为自己的出身感到屈辱，无论其智商、努力怎样优于同龄人都得不到平等对待，不但名牌学校、连一般大学也上不了；分配工作也是往边远地区发配。仿佛他们天生便是贱民。就业单位的好坏（按福利厚薄、社会声望高低排序）也有意无意地与成分的等级层次相关。建国以来的组织人事部门都是遵循同样的原则。只是文革前还偶尔讲个“重在表现”，到文革就严格控制在很小的百分比范围内，更加趋于绝对化、一刀切，极少漏网之鱼了。连在农村代课、做文书这种利益小、临时性的工作也干不长。

那时，家庭成分好的，出了事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是人民内部就可以从宽；家庭成分不好的，哪怕只应列入仍属于人民范围的小资产阶级（如教师、职员、医生或小商人等），也会变得大大的不妙；家庭成分坏的（如地、富、反、坏、右、资），更加小事亦可放大、大事就成灭顶之灾，因为是事先就有一个敌我矛盾的分际在那里。在政治运动中上纲上线很容易——把父母的账都算到子女身上了。最可恶的是，连好事也往往会变成坏事，如成绩好、业务强，就成“白专”要挨批判了。家庭成分成了人间等级秩序的阴阳界关隘。

所以，填履历表的笔格外沉重。填家庭成分时，人们往往就下意识地往红色、纯正的职业、成分上靠。能挪一寸是一寸、能挪一分是一分。笔者家庭出身本来是职员，但一段时间里传说可以算是邮电工人，就什么表的成分栏都填“邮电工人”了。只是真正敢于蓄意、大跨度瞒报的并不多，因为一旦被发现（概率太大）后果就很严重。

连纯属私人生活的恋爱、婚姻也不例外，红五类子女配黑五类子女是下嫁、掉份，黑五类找到红五类就是高攀。会受到亲戚、朋友、同事的阻挠、反对、冷淡。严重的，单位会不给出介绍信，不少的被棒打了鸳鸯。侥幸得逞的，父母也有的因懊恼不参加孩子的婚礼，子女得不到父母的祝福，甚至断绝往来。即使冲破世俗偏见结了婚，在家里不自觉的仍是红五类子女的地位高（下意识觉得委屈），黑五类子女的地位低（下意识觉得对不起对方），说话、做事都得陪着小心。成为家庭冲突的事故多发区。多年以后有了第二代，才和爷爷奶奶、外公姥姥勉强来往，还得低声下气地事事察言观色。

这种因为成分悬殊而俯就的婚姻，文革后由于家庭成分的政治权重变轻、淡化，平衡被打破和改变颠倒了过来，有一部分家庭解了体。

[注 1]阶级成分、家庭出身的政治含义，1949 年以来多有变化，尺度有宽有严。成分的认定，原则上应按土改或土改复查和民主改革时期定的为准，实际操作一般是以当事者及家庭 1949 年前三年时的阶级—经济状况为准。

填写方法，以 1979 年 6 月 30 日为时间界限：以前是文革前比较严厉的认定办法，父亲的成分就是儿子的家庭出身。此一时间后，按新的宽松办法办——风吹，都是劳动人民（干部或工人、农民）；“采取写实的办法”，按经组织审查改变的情况填写。但直系亲属有无“杀关管”仍然工作的适应范围有限制作用。

[注 2]成分作祟由来已久：在晋绥党校，“竟召开‘搬石头’的会，会上指定一部分座位，挂着‘王八蛋席’的牌子，凡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让他们坐到‘王八蛋席’上去。”（《杨尚昆回忆录》页 250，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

(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政治部《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把部队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人民日报》1967年5月10日；张振录、胡志刚《把暗藏的敌人统统揪出来》，《人民日报》1968年8月4日)

## 喷气式

亦称“坐土飞机”。文革初期（1966年夏至1967年春）盛行的武斗方式之一。中后期虽未绝迹，但已不常见。[注]

在批斗会上，强制性地按扭住被批斗者的头、颈、背部，使其上肢和下肢呈90度，乃至更甚；把被批斗者的两只胳膊向后上方或向侧伸直，如同喷气式飞机翘起的两个翅膀似的。头部向地，臀部高撅；同时在胸前还给挂上黑牌。时间长了，颈脖勒出血痕，腰酸背痛，血脉不畅，四肢僵直。以红卫兵串联为媒介，从北京向外地流传，传播速度奇快。

被批斗者，最初是学术权威、老师、黑五类，后来是走资派、假党员、失势的保皇派、对立面的派头头，或犯了各种事儿并被冠以各种罪名的人（现行反革命、流氓分子等）。

这是一种羞辱人、剥夺人的基本尊严的体罚方式。从姿势上看有点象鞠躬，但这当然不是主动向人表示敬意的弯腰礼，而是将通常强迫犯人低头认罪以示惩戒（依中国传统看，犯人不是人，无所谓人格的，怎么羞辱都可以）的示威手段，施之于被批斗者。对被批斗的无罪者和看重面子的传统人格型（“士可杀不可辱”）中国人来说，是体罚（肉体酷刑）和精神摧残的双重折磨。精神摧残的摧毁力更甚于体罚。身心俱疲，常常容易让人在恍惚中把肉体的苦难与精神的罪恶联系起来，强使被批斗者将有罪感内化。

仅仅这一武斗形式的命名本身，就含有化罪恶为有趣的残忍心态，冷漠虚无的价值取向。它是批斗者的青春冲动、顽（劣）童心态，与否定、取消人道、人权的阶级斗争哲学、政治合谋的结果。据有的过来人事后说，“坐飞机”时心中默念、背诵点什么，或运用气功之类入定心法，会减轻所受的煎熬。这里既有转移的心理机制起作用，运用了自我防护的有效技术，又有以拒斥苦难来认同苦难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自我麻醉。更为可怕的是，在革命的名义下，施受双方都无人对这一武斗形式的正当性提出置疑，而是普遍认同。观看者的兴奋，加倍助长了施与者的暴虐。

廖沫沙曾有七绝《嘲吴晗并自嘲》（亦有题为《斗风骚》者）志其事：“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斯文扫地，苦中作乐，叹看客之懵然，悲人生之荒诞，哀莫大于心死，百味并作。

在描写文革的小说、回忆录中，对这一武斗形式记载最多，因此在人们的苦难记忆里它就成了暴力、酷刑和非人摧残的象征，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代名词。而实际上，暴力、非人待遇的表现形式还很多，如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游街、请罪等；其它表现形式造成的精神摧残，较之坐土飞机，也毫不逊色。

[注]网友老拖提供材料说，喷气式源于延安整风。其时并有点天灯、活埋、凌迟、炮烙、铡刀等酷刑，最残忍者是某参议员被用铁丝穿鼻子，令其儿子牵着在街上游街。不见出处，亦未查证，无法确认，谨以风闻记于此。

(参考资料：金鉴《喷气式批斗——那个荒唐年代的创造》，《南方都市报》2005年5月23日 <http://cul.sina.com.cn/y/2005-05-23/1109127948.html>；廖沫沙《瓮中杂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 斗批改

斗争、批判、改革的简称。毛泽东在文革早期对文革理想目标的初步设计，即对文革应解决的问题和步骤的整体概括。为了强调文革是一有目的、有计划的、理性的政治运动，而拼凑的草图式工程说明，带有想当然的机会主义色彩。1966年7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革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经典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所说的：“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其后，斗批改的内容又不断有变化。1967年曾一度想以斗批改作为促进两派联合的手段。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建立革委会后，又宣布进入了“斗批改”阶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9月7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六厂二校”经验作为“斗批改”的样板。后来被九大正式规定为工作任务、目标。

毛泽东的设想是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结束文革。但因为基本方针仍是阶级斗争，工、农、商、学基层单位都要建立政权性质的革委会，没有以社会和解整合合法性的建设性权力结构，助长了权力的倾轧、纠缠、滥用；清理阶级队伍延续派性纷争和动荡，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整党建党让部分造反派、打砸抢分子涌入党内；批判封资修不知所云，继续割裂文化的内在关联；改革，如革命样板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工农兵上讲台、“七二一大学”、赤脚医生……以“五七指示”为蓝本的民粹主义自发崇拜、浪漫空想成为制订政策的依据，政治秩序、社会生活仍然混乱不堪，新生事物成了闹剧。

林彪集团的倾覆造成新一轮权力更替，斗批改被中断、打乱，进入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斗批改就销声匿迹了。以后的整顿企图恢复秩序，初见成效，又不符合毛泽东发动文革初衷，主事者邓小平面临又一次被打倒。文革就像脱了缰的野马，漫无目的地狂奔。仍然是运动不断：以各式“斗”、“批”为动力的政治运动，有效冲决、破坏了既定秩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的），没有“改”的内在合理性，建设新世界；为了解决未了的旧矛盾展开的新运动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循环往复。没有以效率合理性为先导的整体目标设计，造成翻烧饼式的来回折腾和资源的盲目浪费。

斗批改曾被期许、美化为包医百病的救世良药，其实是“本来无一物”，何处见药效、显神迹？

(参考资料：金春明等《“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

大革命胜利万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人民日报》1967年10月1日)

## 读书无用论

1968年秋“复课闹革命”以后，由于“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白专道路”等受到猛烈批判，大中学生毕业纷纷上山下乡，学校教学秩序仍然混乱，且以政治（毛泽东思想课）为主课，基础知识被大大削弱，社会上出现在校生不愿上学认真读书的思潮。

比较典型的想法是，即使大学毕业也要三个面向[注1]，留不了大城市；既要插队落户，当农民捏锄把，能写写算算就行了。读书还有啥用场，反倒落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的骂名。而且无论来了什么样的运动，总要担着一分心——因为以往的“右派”、“反动学术权威”，都与被认定先天缺乏革命性的知识分子（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挂着钩。

这种思潮当时被概括为“读书无用论”，1969年到1972年间受到一定程度的批评。并上纲到是刘少奇“读书做官论”变种、封资修世界观毒害的高度，给予训斥。但由于社会大环境未发生根本变化，继续居于主导地位，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情绪和生活-志业选择。大学恢复招生（知青可以通过上大学回城），曾使得读书空气一度复苏。但后来的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批教育黑线回潮等运动，很快又搞得师生双方都人人自危。

“开门办学”、“厂校挂钩”的教改，任大量政治学习、大批判、军训、学工学农冲击规范知识学习；课程设置也加重政治课、削减专业课比例安排，[注2]忽视基础性教育而片面强调实用性，把物理、化学合并为“工业基础知识课”（简称“工基”）；用毛泽东著作、大批判文章代替政治、语文、历史教材，用简单化的实用知识代替细密、科学分类和体系，由教师、学生、工军宣队和领导组成的“三结合”班子编写教材；让大批判贯穿教学，实行师生互教、工农兵上讲台，用实际操作、开卷考试代替规范考试；大学学制减到二到三年，中小学合并为四四制（8年）……教育内容稀薄、残缺，令学生了无学习兴趣，也客观助长了读书无用论的盛行。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为“教育黑线”平反，恢复技术职称的评定……时代主题变化，社会时尚转向，这一思潮自然销声匿迹。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又使得年轻学生近视率持续上升、体质下降。

1990年代以来，在经济大潮冲击下，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这种思潮重又悄然泛起。2000年代前后在教育费用猛涨（10年涨了20倍）、就业低潮的双重压力下，大学毕业不包分配、自谋职业，使得贫困群体（尤其是农村）负债读书、还债无望，初中生流失、辍学现象严重，使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任务空前严峻。“知识改变命运”成为侈谈和对权力、财富的虚骄辩护。

有人评论说，1960、1970年代是政治权力扼杀教育，2000年代则是教育产业化和多数人群被边缘化造成的经济困境扼杀教育、社会公正和国家发展的未来。

[注1]当时教育革命和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指导方针：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到2000年代就变成了自主择业的面向城市、面向东部、面向高薪（公

务员、官办垄断行业、外企)。

[注 2]极端的达到：政治课由总学时的 17.14% (已经多得不正常了) 增加到 58.3%，专业课由 65.22% 削减到 24.1%。生产劳动课每年安排 8 周。(《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版)

(参考资料：王为民、李益群 《“读书无用”吗？——驳“读书做官论”的一种翻版》，《红旗》杂志 1969 年第 3 期第 4 期合刊；吴湘韩等 《“读书无用论”在贫困乡村抬头》，《中国青年报》2001 年 2 月 26 日；郑谦《被“革命”的教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

## 海外关系

居住在大陆的中国公民与大陆以外 (主要指在欧美、台湾、香港) 的人具有的亲戚、朋友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被认为社会历史背景复杂，普遍有通敌嫌疑，具有不被信任、不宜使用的政治条件。

这与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阶级分析世界图式有关——全球地缘政治的敌我阵营分为：敌——帝修反；我、友——亚非拉 (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格局中，国际上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时刻准备包括以武力对抗、和平演变及阴谋渗透在内的各种方式，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因此一切与西方 (欧美)、台港有关的事物 (如，“美国之音”、BBC) 都包藏着祸心、阴谋。有“海外关系”的人被指为“反动的社会基础”。陈伯达甚至说，“归侨多”的地区，是“特务联合国”。

虽然海外关系从未被正式、公开规定为一种罪行；但在经过阶级斗争观念多年熏陶的普通人心目中，它确实是通敌嫌疑的表征，应该在政治运动中首先受到关注、审查。在需要高度保密的工作岗位，如，国防高精尖科研、工厂、空军等单位，招聘人员时，首先就要剔除有海外关系的。人事、组织部门也不宜使用有海外关系者。

1969 年 10 月在侨眷众多的广东省制订了《处理有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规定》。规定提出“凡是有港澳、海外关系的干部，不管亲属从事什么职业，如果经过教育，仍然保持政治、经济联系，要从严处理”；“要视情况进行必要的批判斗争教育，并要进行审查 (严重的要清除出队，有的退职)”；今后“一律不吸收有海外、港澳关系的人当干部，对干部的婚姻要把好关”，等等。

并立即在广东省整党工作会议上全面推行。有的地方曾任意揪斗侨眷、归侨；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把有海外亲属关系的干部、职工开除、下放。侨眷、归侨同国外亲人的正常通信联系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国外亲人汇来的赡家侨汇，被说成是“特务经费”。大抓“叛徒”、“特务”，使不少归侨因“海外关系”问题受到冲击，制造了一些假案。

所以多数人填写履历表中的社会关系时，都隐瞒了在海外的亲戚、朋友 (已经公开的除外)；在日常交往中亦决不向外人提及，连子女也不知道有这门亲戚。

1950 年代放弃海外舒适的生活回国，投身祖国建设的一大批华侨青年，历次政治运动都因海外关系受到严厉的审查乃至批斗；尤以文革的面广、峻烈为甚。其中一些人因为实在不堪忍受非人折磨，和被当作异端的疏远、冷落，而含恨去国。没有人敢于或愿意对有这种罪名的人表示同情。

1970 年代末以后，落实侨务政策，废除过去的歧视性规定，为受到审查、



迫害的归侨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名誉；德才兼备的归侨、侨眷干部，被选拔到市区县一级的领导岗位上；归侨、侨眷的子女在参军、升学、入团、入党、提干等方面也一视同仁。

1980年代以后才恢复与海外亲人的交往，使得多年不知就里的子女大吃一惊。由于有外汇收入，有海外读书签证的方便，海外关系又成了让人们艳羡、眼红、追逐的资本。又演出了一系列闹剧。

（参考资料：粤侨《“海外关系黑六条”的反动实质》，《南方日报》1978年1月24日；林青云《有关侨务工作的几点建议》，《人民日报》1981年7月8日）

## 黄永胜

（1910—1983）湖北咸宁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政治活动家。

原名黄叙钱（后由毛泽东改名）。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一军团团长、师长、八路军115师343旅团长、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军区司令，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第13兵团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军政大学校长、军委办事组组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人称有“儒将”风度。

1968年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杨、余、傅”被打倒后任总参谋长。以军委办事组成员（组长），预闻中央文革碰头会。据称，曾先后诬陷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被俘、政变（直接负责“审查广东地下党问题”专案组，株连近万人），参与诬陷迫害彭德怀、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作为中央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审问过贺龙、王平等。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因留守北京未赴庐山直接参与“设国家主席”的活动。为林彪提供毛泽东南巡讲话情报（“庐山会议的事情没有完”）；“九一三”后销毁与林彪、叶群往来信件。被指控为“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1971年被捕撤职，关押在秦城监狱；1973年开除党籍。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以“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法庭的最终陈诉为自己辩护（发言稿28页），说是“一般成员”而非“主犯”，犯有罪行而非反革命罪。

有传言说他与叶群私通（叶的私人卡片盒里有黄的赠诗“缠绵五周月，亲手几折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提名总参谋长时，毛曾说“听说黄生活作风有问题”。[注]

1982年保外就医，安排于山东省青岛市居住。1983年病故，享年73岁。与其妻项辉芳（1981年离异）育有一子（黄春光）三女（黄春萍、黄伟平、刘细枝）。2003年项辉芳辞世时，追悼会参加者众；也借此补补黄死时因顾忌而鲜有人悼念的遗憾。不排除对他们及自己所受待遇不满，而同命相怜、同声相求的聚集。由子女作主2005年将父母骨灰合葬于咸宁高桥镇澄水洞宾馆旁。网上有“黄永胜纪念馆”（cn.netor.com/m/memorial.asp?BID=24221），供访问者祭拜。

[注]据认为，有可能这是毛泽东以此表示对林彪安插自己人、势力急剧膨胀，怀有疑虑、不满的一种旁敲侧击。

(参考资料: 温乐群等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 P17;)

## 吴法宪

(1915—2004) 原名吴文玉, 江西永丰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 政治活动家。

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加入工农红军。1932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一军团二师团政委、八路军 115 师 343 团政委、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 39 军政委、解放军空军政治部主任、政委、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

据称, 1966 年编造刘亚楼转告叶群的“四点意见”诬陷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 成为文革政治斗争序幕(清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后分别参与诬陷朱德、贺龙、邓小平、陆定一等党政军领导人, 受其直接诬陷迫害的空军干部 173 人(致死 2 人)。1968 年以军委办事组成员(副组长)预闻中央文革碰头会。1969 年安插林彪之子林立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2 年内完成从士兵到副级的火箭式提拔)。同年参加党的九大, 成为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庐山会议期间, 是“设国家主席”活动最积极的参与者。后被指认文革中积极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

1971 年被逮捕, 1973 年被开除党籍,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3 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 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 17 年, 剥夺政治权利 5 年。审讯期间在黄、吴、李、邱四人中供认表现最好。

1982 年被减刑并允许保外就医。1987 年获释, 定居山东省济南。1990 年代被给予副省级待遇, 住房调整为一栋四户住宅小楼。医务部门也为其患有的多种老年病提供良好保健医疗。与其妻陈绥圻(曾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育有一子(新潮)四女(金秋、采芹、巴璀)。子女升学就业均未受其父影响。

晚年爱看电视。嗜书法, 常应邀作书, 曾有人携其墨宝在日本以 50 万日元出售, “江山如画”轴网上标价 1500 元 [注]。以散步、甩手、游泳等运动锻炼身体。也陪其妻上街买菜。有过写自传的努力, 留下了录音带。2000 年病重住院, 历经 4 年, 终于不治。终年 89 岁。

[注]很明达地自嘲说: “我的字写得并不好, 主要是要我吴法宪这个名, 我是臭名远扬。”

(参考资料: 温乐群等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 P17; 《文革英雄沉浮录》; 于福存、王永昌《人民的审判》,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林彪集团骨干分子的夫人们》, 载太阳系列丛书网络版 [www.sunseries.com/ban/ban001/B001.htm](http://www.sunseries.com/ban/ban001/B001.htm))

## 大我

名词。原为梵语 Pormatman 或 Mahatman 的意译。意指远离“我执”、“我见”而达到自由自在境界的最高“我”；含有常一主宰的意思。因为凡俗所执着自我的身心，没有自在性、常一性；佛陀所澄得的涅[般/木]则为真实且常住不变，所以称大我，义同真我。后用以指群体或群体社会；集体和国家。与“小我”相对。原意反不彰显了。

不仅党员，所有革命者在处理个人与组织、集体的关系时，都要无条件把后者摆在第一位；因为这是组织原则。尤其是 1949 年前处于地下状态、战争条件下的组织原则。救亡的任务、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集体的力量，压倒了自由民主、个体尊严的启蒙要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即使是 1949 年建政后仍然延续了这样的价值观，以此作为另一套社会动员模式和现代化路径：在谁战胜谁的阶级斗争框架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被抽象为“公”与“私”的对立，政治变成了道德，突出政治成了突出大公无私的牺牲奋斗精神。这就成为对所有人无一例外的全民性的要求、国家意志了。

在这样的概念体系里，所有小我的一切，包括权益、思维、志趣、亲情，甚至生命……都统统让渡给了大我，小我被彻底融化在大我之中了。再也没有个人，只有集体和国家。大我以“我”的名义、革命的名义、历史必然性的名义，把小我剥夺得干干净净。但它是从内里来巧取的，而不是从外面来豪夺的。因此小我非常配合，自觉服从于集体功业、党的意志——不仅没有意志，连欲望也没有。相信大我会把所有事务都安排得尽善尽美：服从组织，任劳任怨，不计得失，向党交心，连党组织的惩罚（反右）也只能证明人民事业的伟大。

对付、整饬小我，战争时期和部队有军事法庭、军事纪律，从批评到关禁闭；和平时期、地方单位有组织生活、政治学习、斗私批修会，从大字报批判到大小会检讨，从惩罚劳动到群众帮助，软硬兼施……

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只有“people”（众人、公民、民族；Person 的复数形式），没有“individual”（个人，相对于团体而言）。个人被淹没在群体之中。也帮了这样一套奴民意识形态的忙——满足于“人民当家作主”，因为个人是人民一员，“人民当家作主”，“我”就在其中了。（只有民本主义，而无人本主义）“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便是尊重我们每个人的权利。无论谁打上了人民的口号，谁便站在了真理一边，便有了肆意打杀别人的“个人主义”的权利。

文革中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把不断消灭小我欲念，确立大我的绝对地位的工作制度化了。通过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没完没了的学习，联系实际，讲用，“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挖“私”根，检讨，暗示自我的可耻、渺小，达到取消自我的荒唐目标。金训华可以为抢救被洪水卷走的木材献出生命，这说明“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逼得人说假话、变成伪君子，都还是皮毛一层——说到底，这些其实都仅仅是利用集体意志剥夺个体的理性判断，进而消灭个人的感觉、欲望、身体，彻底摧毁威胁集权的最大障碍，破除“心中贼”是为了剿灭政治异端（“山中贼”），借“大我”之名行专制之实。

甚至干脆直接用“三忠于四无限”的忠心取代了“大我”。既是图穷匕首见的赤膊上阵没遮拦，又是黔驴计穷的夕阳西下无路可走。露出了愚民的底。成为后文革时期威权主义倒塌、集体主义被屏弃的滥觞。

(参考资料: 郑歌 《“我”, 是最后一个字母》, 《人民日报》1962年1月23日; 本社词典编辑室《现代英汉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0年版; 俞吾金《文化密码破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 造反派

名词。文革时期以“造反”自称、标榜的一种群众组织, 及其与他们的政治实践相关连的一整套思想方法、行为特征、价值取向。

1. 与“保皇派”相对。指文革初期在红卫兵之后走向社会, 以下犯上, 对当时的领导体制和具体负责人持对抗、批判态度, 并采取实际对抗行动的群众组织。最初受到歧视和压制, 如被视为调皮捣蛋、不安分守己的害群之马, 被宣布为非法或反动组织, 扣发参与者的工资, 整理参与者的材料, 等。该词当时仍按传统价值来阐释, 含贬义。1966年秋冬, 通过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学生为主体)造成的气候, 造反派组织获得迅速发展, 已占压倒优势; 而党政领导和基层单位失去了运转、整合功能, 陷入瘫痪状态。参加这类组织就成了时髦——进步、革命的标志。文革早期的“保皇派”纷纷转而加入造反派了。红卫兵是此一阶段造反派的主体。造反的本质就是否定大小权威, 鼓吹打乱、改变现有的秩序。但他们成事的真正秘密(公开的), 却因为是“奉旨造反”。对于最高权力来说, 表层的反社会行为下面是实际上的亲社会行为。“造反”一词遂变几千年贬斥色彩而含褒义: 由“乱臣贼子”、“无赖轻薄”摇身变成了“社会中坚”、“文化英雄”。该词感情色彩的改变, 是毛泽东发动、操纵的文革引致中国民间社会、社会心理、组织结构……一整套组织、秩序、价值颠覆性巨变的反映, 是传统文化断裂的最显著的表征。

2. 由此进而扩展为, 对除红卫兵以外的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统称。以产业工人为主, 农、商、文、卫等系统辅之。在大联合、夺权阶段, 红卫兵仍在舞台上, 但文革的主角已经由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来充任了。毛泽东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 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指的就是他们。在这类组织中, 组织成员的品类更加芜杂, 派性更为严重, 组织的松散程度更大, 造反动机的功利性更明确——就是要瓦解、摧毁科层制体制、势力, 占山为王, “掀翻金銮殿, 轮番来加冕”。要取代走资派, 成为新的掌权者。有相当一部分人顺应时代潮流, 进入官僚阶层、权力体制, 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3. 引申为借指参加这类群众组织的人、一般成员。“1966年抄家, ‘造反派’搬走几件, 王家姆妈又变卖几件。”(陆星儿《同一扇石库门》, 载《文汇》月刊1990年3月号)说话的那口气, 在当时是无奈、艳羡, 在事后是鄙夷不屑、诛心剿灭、丑化刻毒。

4. 文革后称文革中参加过这类群众组织的人。仍然用以文革当时的称谓指称他们, 可以看作该名词的过去时态。受到清查的“三种人”(参见该条), 主要是指其中因与林彪、四人帮集团有组织联系而造反起家的人, 帮派思想严重的人, 有打砸抢劣迹的人。但据说, 由于强调把工作重点转到改革和经济建设上来, 清洗匆匆结束, 并未进行“彻底”。

5. 比喻义。文革后, 比喻行为方式、价值观、性格等方面与造反派相似的人。含贬义。例: 小造反派; 造反派脾气。这是一种弹性比较大、却又偏于严重的指控, 因为文革在政治上被全面否定, 造反派受到严厉追究; 该词所包含的历史追

溯、政治判断内容，会引起个人经历、情感方面的联想，乃至政治正确的过分反应。——重归威权体制的旧轨道，再次强化官本位，肯定知识精英的主流地位，赋予阶级分化以合理性，这是后文革以来社会心理的最大变化。

(参考资料: 李行健等《新词新语词典》，语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lxpii《文革旧事》，“文学会馆” 2002 年 9 月 27 日)

## 花五类

名词。含贬义。“花”意谓灰色的；是一种政治性借喻（这也是文革语言的特征之一）。亦称“灰五类”、“麻五类”。

1. 本义。在阶级阵营的划分上，介乎于红五类（革命）与黑五类（反革命）之间的社会阶层（动摇即不革命）的成员。如：职员、店员、医生、教师、记者、小商小贩、小业主等自由职业、小资产者；经济、政治上大体上属于小资产阶级一类。1949 年以前这个阶层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尚属优裕（虽然也随总的经济情况和个人际遇而波动），其政治立场被中共政治战略分析家和政策设计者认定为经常处于摇摆不定之中，属于应该团结、争取的对象（权威论述参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可以做同路人，但同路不同心，不是依靠力量（内部掌握）。

2. 转义。借指出身于这些家庭的子弟。“花五类”一词主要指他们；其主要使用范围又在学校。这类人虽然不是直接处在专政对象的位置上，但也被工农兵、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主流社会、执政当局认作非无产阶级、非革命的，不应给予信任。因为他们的父辈不是苦大仇深，而是旧制度的顺民，也被认为是那个制度某种程度上的受益者，与黑五类有更多的天然联系，是容易滑向敌对阵营的异己分子。这一切必然影响到子女。甚至连他们与知识生产的密切联系，无意识流露出来的习惯、修养，也让红五类感到本能的不愉快、不自在。每当入党、入团、参军、提干，需要填写履历表中的家庭出身一栏时，他们的情绪就灰溜溜的，经常陷入类似“原罪”的自卑中。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算不上，不必对他们体现什么政策。比较起黑五类来，他们所受的歧视、排斥并不绝对，境遇的悲惨程度略微轻一些，但入党入团、参军就业、调资晋级的社会升迁概率仍然大大低于平均水平。

文革初期，花五类不被允许加入造反的红卫兵组织，因为这会影响红卫兵组织的纯洁性，成为被对立一方攻击的口实；而只能参加红卫兵的外围组织“红战友”。不允许串联；不得不表现得比别人更积极，才能得到基本同样的看待（劳动、军事训练时，病了哪怕来例假也不敢请假休息，怕人家从阶级出身上联系实际找思想根源）；政治学习讲用、运动过关时，被要求比别人更多地深挖、检讨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同龄人际交往中处于受支配的被动状态；婚恋时的家庭出身条件要低一档，选择范围相对小一些，成功概率也小一些。

这种被打入副册（还不是另册）、类似贱民的待遇，和由此产生的屈辱感，使他们对政治格外冷漠。加之家传与自由职业相关的次文化（散漫习气、对生活品质的讲究等）濡染，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就成了“逍遥派”。其中一部分人刻苦钻研，文革后成为业务上的骨干、政治上可靠的可用之材（邓小平语）。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P 5、P9；邓

小平语转引自《中共辞典》，台湾：中国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版，P130)

## 糖衣炮弹

名词。简称“糖弹”。意谓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比喻腐蚀、拉拢，拖人下水的手段，看似美妙、甜蜜而包藏祸心。

这是毛泽东创设的著名比喻。带着鲜明军事色彩和浓重忧患意识。1949年3月中共进城执政以前，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次会议上，就以这个比喻提醒、警告本党同志胜利以后，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这一比喻，1949年以后发展成了中共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的基本任务，意识形态的特征之一。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后被拍成电影）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拒腐蚀、永不沾的故事。被广为传颂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即这一理想境界的人格象征。对于曾生活在底层、由乡村渗透而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其中许多人过去是泥腿子、苦力，着附在高档物质生活、奢侈消费品上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主要是来自西方）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具有较大的诱惑力；因为它具有发达的物质生产所提供的舒适、细致的生活方式，优雅的风度。1950年代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军队领导干部大量离婚换老婆，三反五反揭露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文革的初始动机之一，反修防修，便与这一观念部分有关。[注1]尤其是被估计得很严重的阶级斗争，更让人疑心失去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总是试图利用物质上、文化上的优势，赢得思想上、政治上的胜利，比如从拉干部下水到全面复辟（著名的漫画化场面是电影《箭杆河边》里的“何书记，吃汤圆咯……”）。当基于阶级斗争的敌情观、物质观被夸大到极点时，就出现了抹煞正当的基本生活要求的现象：谁要是买一截时髦点的衣料（花型艳丽醒目），购置舒适点的家具（如沙发），备办一瓶用于打扮的化妆品（雪花膏、香水等），即使并非出于有资产阶级嫌疑的人之手，也会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现，一定要问问是否有糖衣炮弹的可能。连学术上重考证、成名成家，新闻办报的“知识性”、“趣味性”……都无不可以指鹿为马地与糖衣炮弹挂起钩来，刻意营造成为近乎蛊毒式的巫术恐惧气氛；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为的是四面出击。

只要能保证生活必需的最低水准，对所有超过一般水平的消费品，都应该弃之如敝屣，才能显出当事者革命意志的坚定，生活作风的朴素，得到人们的肯定、褒扬。这也可视为政治上可靠的旁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在这样的风气下流行起来了。它一方面促使一些人刻意做这样的表面文章，以博取政治进步的名声、资本（用2000年代的话说是“做秀”），一方面造成了更多人把在物资供应匮乏下的需求萎缩，进行合理化的心理定势。

围绕糖衣炮弹这一概念，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论证了精简机构、密切联系群众；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一切事业，反对铺张浪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斗私，批修”，认真改造世界观等制度设计。立论高妙却是无用。无奈是资源短缺、供应有限，天恩雨露不能尽洒，危险的糖衣炮弹已经不是什么敌人打过来的问题，官僚特权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而是自己巴巴地绕世界求来的。开后门成为文革的阿喀琉斯之踵。痛苦的毛泽东对反开后门直叫“停”。

2000年代的腐败、职务犯罪（窝犯屡见）已成燎原之势，糖衣炮弹从贪婪的官员索贿[注2]到作为制度的自我供给，从根本上危及到了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昔日避之犹恐不及的祸殃变作了人人如蝇逐臭的香饽饽。虽然恢复了人性的真实，却同时也放纵了人性的恶。单靠自我监督，不从异体制约上走出制度创新路子，难矣哉。

[注1]从“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搜索，文革十年该词的出现频率是每年6.32%，比其余年份的1.08%高出5.85倍。可见其作为“和平演变”、“反修防修”的关键词，对阶级斗争之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渗透、严防死守，被强调到何等地步。

[注2]还有一形象、机警、调侃的自辩说辞：“把糖衣舔（吃）了，炮弹打回去。”

（参考资料：本报评论员《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解放军报》1966年5月4日；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于是乎《文革与腐败》，《人民日报》“网友之声”）

### 三年自然灾害

特称名词。有时也简称“自然灾害”。

是中共对1959年至1961年农业生产连年歉收、大炼钢铁造成的国民经济危机，进行解释、定性的官方称谓。[注1]广泛用于中央文件、社论、新闻报道、领导人讲话。它是对内（各级领导层、老百姓）外（友党、友邦和资本主义国家、敌对势力等国际舆论）的交待，对中共错误决策、艰窘实践的文饰、推托。

吟哦“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毛泽东，不满经济建设的速度，工业生产年递增18%、农业不足%，1958年提出了15年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战略，人民公社强行推广密植，大炼钢铁。造成灾难性后果：粮食产量1959年3901亿斤、1960年2870亿4斤、1961年2950亿斤（1957年3901亿斤）。遭受挫折后的庐山会议批判主张调整的彭德怀，不但没有收缩，1960年反而持续跃进，大搞基本建设，全力保钢，下达了2040万吨钢的指标。

由于农业歉收和超量征收（浮夸、放卫星的行政产物），大饥荒导致水肿等疾病流行，死亡率（1956年、1957年的平均死亡率为1.11%）上升，据官方资料（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办公室公布数据），1959年1.46%，1960年2.54%，1961年1.46%，累计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1600万—2700万。尤以在河南、山西、山东、江苏、甘肃、四川等地最为严重。如果把出生率下降的因素考虑进去，人口减少的情况更加严重。为了减轻城市压力，被迫下放人口近3000万（同前，P432）。以大炼钢铁为标志的大跃进，不但无法完成计划，还生产出大量残次品钢。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工业企业管理混乱，大面积亏损，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失衡，通货膨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200多亿元。间接损失则难于定义、统计。

虽然经济上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措施，国民生产、生活情况渐渐好转，但七千人大会（详该条）上刘少奇在全党面前“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法[注2]给毛泽东造成的刺激、阴影难以抹去。坚持用“自然灾害”说，以应付、否认1959—1961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是拒绝检讨、调整大政方针的全

局性问题，拒绝问责追究，坚持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基本思想、政策和实践。把它看成向毛泽东个人权威挑战的政治禁区。同时把账算到苏联头上，强化了国际阶级斗争的紧张形势和反修的必要性。决心依靠群众运动实现现代化的毛泽东，主动从一线退下来（不担任国家主席，专理外交事务和党务、理论建设，1958年）后感到自己的思想、主张被冷落了，并有失控的危险，开始酝酿重返一线，为此谋划、布局、造势，便有了阶级斗争论调的再度高弹，四清运动的开展，文艺上的频繁批判……

曾有人提出为彭德怀平反，大饥荒的魔影仍然不肯轻易散去。使毛泽东感到前后受敌的威胁，必欲一锅烩之以解困的紧迫；坚定了发动文革的决心，加速了实际发动的进程。文革期间，甚至干脆禁止在报刊上出现“三年自然灾害”字样（说明不但文革自身遭受困难，而且连对它起因的拷问也摆脱不掉），害怕引起不利联想。[注 3]但仍挡不住它在口语中的流行，因为经验、时间和基于个人的生命体验、记忆是无法禁止的。

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的权威解释，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 1959 年到 1961 年发生严重困难”。“三年自然灾害”的用法在正式场合逐渐消失，而代之以“三年困难时期”，或“困难时期”。但由于长期使用已成惯性，仍有不少人一提当年脱口就是“三年自然灾害……”

[注 1] 1960 年《人民日报》称：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份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 年 1 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更称，“在 1959 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 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

[注 2] 但有关气象资料并不支持严重灾害由自然旱涝引起的说法。金辉利用气象统计编制的 1895 年至 1979 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证实，在 1959 年到 1961 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 1959 年至 1961 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说明：1959 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 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乾旱范围比 1959 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 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就连主张有灾害的孟昭荣、彭传荣也认为，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失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参见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 年第 1 期）

[注 3] “人民日报’ 49—97 数据库” 1966—1976 年该词的搜索结果为“零”。

（参考资料：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P405；楚汉《中国 1959—1961》，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P3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P335）

##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是毛泽东 1949 年以后著作的选集。该书的编辑、出版贯穿了整个文革——几乎 10 年时间；几度起落。原拟选编范围为 1949—1962 年间的毛泽东著作。1962 年曾有过一个该书的粗编稿；但毛认为建政以后著作不象 1949 年以前著作经过



检验，不愿立即就出版。[注 1]1964 年《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选进了 1949 年后的部分作品。

1967 年 7 月中共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其意向直指当时的政治现实。

担负这项任务事务工作的是中央文革理论组。其时办公地点在中南海甲楼；朱德委员长住乙楼，中央专案组在丙楼，信访局在丁楼。理论组由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当时简称“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和来自部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有干部也有战士）两部分人组成。

从中央档案馆接管的毛泽东 1949 年 10 月 1 日—1962 年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在中央警卫团押送下运入、放置在中南海甲楼。甲楼组织称“材料组”。主要任务是保管毛主席的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看管有关的图书资料；联系秘书局印刷厂和收发室，印制文稿，收发信件。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委员会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加上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他们在怀仁堂阅读事先准备的毛泽东手稿和讲话，决定哪些文章入选、哪些文章不入选。每次会议的情况，都反映在名为《天天读》的简报上。未几选编工作停止。

1969 年五、六月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再次启动。计划“十一”前夕出版、发行，为国庆 20 周年献礼。

工作程序为：甲楼将手稿（如果来得及，即誊写为抄件）或原始记录稿送印厂排印成草稿，送丙楼；丙楼工作人员，先按照个人分工予以修改，再集体讨论通过；修改时一律使用铅笔，这样的修改稿可以看出草稿原貌；然后将修改稿分抄一式数份，分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有关政治局委员；这些领导修改后退还丙楼；丙楼再综合他们的意见，形成一个初稿，再送印厂排印。如是反复直到满意为止。

选集中对历史事件的臧否和人物的褒贬，一定程度决定于选编者的取舍。毛泽东讲话有的篇幅较长，有时为了全面辩证地看问题，他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阐述。但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定的政治目的，选编人员往往根据某个领导的意见，有倾向性地予以取舍，剔除被认为某些观点不正确或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文稿。有时的取舍哪怕细微到一个副词，都会对读者起诱导作用。又如，毛泽东一些信件有时不是写给一个人的；对某件事情的批评或表扬，有时也提到好多参与者。在选集中，这些人的名字留谁不留谁，完全由选编者的主观需要而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笔下去，入了毛选的人，受褒者可以上天堂，受贬者一定下地狱。这些取舍需要在选编者之间达成平衡、妥协，实际上更是一个政治角力、折冲樽俎的复杂过程。更不用说，对毛泽东讲话原稿文句不完整、表达不准确、逻辑不严密、论述重复，引述的事实、历史、文句待查证等问题，对原文错、漏、衍字和明显有误的标点符号作技术性整理，订正错讹的史实，甚至还要进行必要增删、修饰，编写题解和注释，使之完善，方便阅读。[注 2]也有不小回旋余地。毛泽东有些观点在讲话后有发展、变化的，也要根据后来的发展、变化整理前面文稿。

但到 9 月末《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送审本出来时，突然接到指示：不出了。因为毛泽东不同意。1975 年李鑫、胡绳、吴冷西、熊复等曾参与毛选五卷材料组编辑工作。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定本出版延宕到了 1977 年 3 月，而早些时候的 1976 年 10 月解决了四人帮问题。[注 3]出版时间是“两个凡是”出台不久。这个版

本收集了毛泽东 1949 年 9 月到 1957 年的重要著作（选编时限较前缩短）。卷前《出版说明》并称“以后各卷也将陆续出版”。

这个版本，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还长期存在的科学论断，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是对文革的全面肯定。

同年 4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1977 年 10 月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第一届 77 级 570 万人的考卷急需用纸，中共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选》五卷的纸张。

1982 年因为该版本与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和当时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不符，被停止发行。后续各卷迄今未见出版。另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文集》（1921—1976 年）八卷出版（1993—1999 年）。[注 4]只是为了满足各式研究者的需要，没有公开要求各级组织学习的安排。

[注 1] 毛泽东不主张出他的全集，因为不是所有的文章都重要；只赞成出精粹的选集。

[注 2] 毛泽东著作原文、发表定本和《选集》的文字之间，时有细微差别。还需要有专门的校勘研究，才能真正论定修改的范围和性质。如，龚育之考订，《毛选》五卷开篇的标题原为“中国人站起来了”，被 1977 年本改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说见吴志菲《龚育之散记》，《人物》2005 年第 2 期）。

[注 3] 1976 年 10 月 6 日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史称“一举粉碎四人帮”。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于当日 20 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通知；就以“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等为诱饵，让姚文元列席参加。

[注 4] 所收 803 篇著作中 1962 年仅 2 篇，1965—1976 年仅 12 篇（1 篇/年）；大大低于 14.6 篇/年的平均数。反映出编选者对全部出版毛泽东著作会干扰政治现实的顾虑。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说明》，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梁尚之《第五卷编辑秘闻》，《周末》2004 年 12 月 2 日）

## 唐山地震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北京时间 3 时 42 分，中国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东经 118.2°、北纬 39.6°）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 11 公里，震中烈度 11 度，地震破坏范围超过 3 万平方公里，有感范围达天津市、北京市等 14 个省、市、自治区；造成 24.2 万余人死亡，16.4 万余人重伤。被列为 20 世纪全球 10 次破坏性最大的地震灾害之首。

据不完全统计，唐山地区震毁公产房屋 1479 万平方米，倒塌民房 530 万间（极震区地面建筑全部倒塌），唐山地区总的直接经济损失 54 亿元。造成截瘫患者 3817 人，失去父母的孤儿 4204 人，轻伤仍需治疗者达 36 万之多。被埋压的

人数高达 57 万，通过自救与互救，脱险人数 45 万左右。震区内工业建筑物有 70—80%倒塌或遭到严重破坏，多层砖混结构房屋有 90%倒塌或遭到严重破坏，通讯中断，大段铁轨发生蛇行弯曲或波浪起伏，公路路面普遍产生横向小鼓包和纵向张裂，桥梁普遍损坏或严重损坏，砖砌烟囱、水塔等全部倒塌，下水道遭到破坏。

灾区曾组织囚犯参与抢险、救灾。出现抢劫风潮；经唐山民兵查获被哄抢的物资共计有：粮食 670400 余斤，衣服 67695 件，布匹 145915 尺，手表 1149 块，干贝 5180 斤，现金 16600 元……据材料称，被民兵抓捕的抢劫“犯罪分子”共计 1800 余人。在高度警戒中，银行票据、战备粮库，毫发未损。为了预防余震波及受损，北京、天津居民在强烈震感威胁下露宿街头，并大范围搭建抗震棚。

唐山位于东西方向燕山断褶带和北东方向沧东断裂带交汇部位，属于地震活动频繁地区之一。城市建设过程中忽视地震设防或未按标准进行地震设防，建筑物不具备抗震性能，是大地震带来毁灭性破坏的主要原因。而缺乏灾害防范意识和防范措施、预报不力[注 1]，是未能有效减少地震毁灭性破坏的主观原因。

国务院迅速向灾区派出 10 多万军人、2 万多名医务工作者和数万名各方面的支援人员。抢救出大批受难人员（100623 名伤员被转送到运往吉林、辽宁、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浙江和上海等 11 个省市），运送救灾物资，安顿群众吃住，恢复生产、电力和运输；大规模喷洒药物、灭蚊蝇，埋尸防疫。到 1980 年止，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灾区拨款 30 多亿元。

为防止境外势力进入、插手，我国当时没有如实对外报道地震的强度、烈度和损失（3 年以后的 1979 年 11 月 23 日《人民日报》才有相对完整的报道）[注 2]；并谢绝了国际社会援助，决心自力更生，战胜灾难……

从中央地地方各级政府仍然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放在工作首位。8 月 1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1976 年 9 月 9 日零时 10 分，毛泽东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距唐山地震时间不足一个半月。被民间广泛传说两者存在某种神秘联系（龙年凶兆）。[注 3]

震后国家用于唐山恢复建设的总投资（1979—1986 年）为 43.57 亿元。“从地图上被抹掉”又得以重建的新唐山，城市功能分区明确，建筑物均达到八度设防，市政设施配套，环境清新优美，现代化水平较高。城市自来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污水集中处理率、供热普及率分别达到 100%、97%、65% 和 83%，均居全国同等城市领先水平。1990 年唐山荣获联合国“人居荣誉奖”，2004 年获得联合国“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

1986 建成抗震救灾纪念碑广场。地震遗址 2000 年代成为旅游景点之一。

[注 1] 唐山地震中期预报是成功的。震前半年左右国家地震局上报国务院《关于京、津、唐、渤、张地区 1976 年地震趋势的报告》，指出：“京津唐渤张地区今年内仍然存在发生五至六级地震的可能”。北京市地震队在与国家地震局 7 月 24 日召开的准备会上，华详文、张闵厚、耿庆国、李宣瑚四人认定七月底、八月初京津唐张地区将发生大地震。震发当晚还收到通县西集地震台廖官成来报：7 月 27 日前，北京附近 200 公里范围以内，将发生五级以上地震。但由于误判，害怕错报造成重大政治影响，临震预报决断时却失败了。二十余位受命亲赴现场观测、核实水氡异常现象以为预报根据的地震工作者以身殉职。

[注 2] 遵守新闻纪律。因 1950 年 4 月 2 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

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

[注 3]1975 年编者插队所在农村大旱歉收，有人竟吃观音土果腹。生产队一老妪曾对编者道：“今年还不算厉害。谚语说‘润七不润八，润八动刀杀’（农历 1975 年润七月，1976 年润八月）。要明年活过来，才算是人。”共和国缔造者周恩来（1 月 8 日）、朱德（7 月 8 日）均故于 1976 年。

（参考资料：廖盖隆《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唐山公众信息网”；钱钢《唐山大地震——30 周年纪念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 年版；沈正赋《唐山大地震具体死亡人数为何三年后才允许报道？》）

## 以工代干

名词，由偏正结构的谓语句性短语名物化而成。它指称的是人事工作中的一种现象：工人编制人员未办提干手续承担干部的工作或职务。

这是由于 1960 年代以来，缺乏正常的吸收、录用干部制度，厂矿企业选调了一批工人从事干部岗位的工作，未办提干手续，出现了“以工代干”人员；随后，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事业单位也相继使用“以工代干”人员。“文化大革命”中，干部管理混乱，“以工代干”人员越来越多（有的达到了现有干部总数的 10%以上）。

从深层次看，它是由中共官僚机构自我膨胀的冲动和编制计划管理体制之间相互撕咬、制约的结构性吊诡造成的。是编制合法和运转非法的纠缠、冲突。

在官本位的体制内，干部的政治—社会地位、收入、福利等，一般要明显高于工人。由于干部职位作为稀有资源，提拔干部就做得特别谨慎。以工代干是一种临时性安排，可以在实践中考察以工代干者是否符合干部条件，相当于见习生，等待成熟后再转正，以减少失误。但对于见习时间的长短、转正的考核，没有制度化的规范。人为因素多，随意性大。要揭掉以工代干的帽子，有如唐僧西天取经，得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谁转了正，就会被看成天大喜事，人人都闹着非请客散糖不可。

文革虽然打倒了走资派，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仍然通过各种形式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以维持体制的运转。官本位的体制并未根本改变，由于一元化的权力集中，反而变得更加突出了。文革时人事系统长期濒于瘫痪，主事者也怕提拔的人像造反派那样打翻天印，以怨报德，便有意地拖延，以培养他们的忠诚；成了人事走私、任人唯亲者方便操作的捷径；加之编制管理本来就先天具有保守性、滞后性特征，就积压了许多类似人员。以致以工代干者严重超过正式编制。

名导演张艺谋当工人时（1974 年）自己个儿学摄影，最大的人生梦想就是能到厂工会或宣传科当个“以工代干”的宣传干事。

文革结束后，各级、各地、各单位开始自发解决干部编制的遗留问题。如上海农场系统 1979 年对以工代干的职工实行定职定薪，建立了农场干部工资制度，提高了职工年限工资水平。

1983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劳动人事部发出了《关于整顿“以工代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了统一、妥善解决“以工代干”问题的具体政策。通知认为，因为“‘以工代干’人员大部分年富力强，有的已担任领导职务，有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成了生产管理和党政工作的骨干；但也有一部分人不符合干部条件，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给干部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少问题”。原则上“以工代干”

人员有的根据工作需要转为干部；有的回到工人岗位。这个通知还规定，今后一律不再使用“以工代干”人员，需要从工人中提拔干部，均需先办理吸收干部手续。但在实际办理过程中，“经有关部门考核审定”，就成了见人有利、皆大欢喜。权力平衡以编制管理向实际运转的投降、妥协告终。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001 年 8 月 14 日《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严肃干部人事工作纪律有关问题的通知》（与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联合发出），第三条再次重申：“严格执行不准‘以工代干’、‘转干’的规定”。强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所需工勤人员，必须在机构编制部门核准的编制内，一律采取社会招聘和合同管理办法”。因为“有的地方和单位机构编制管理混乱，擅自增加机构编制和突破编制增加人员；有的录用和选拔干部根本不按规定，甚至‘买官卖官’；有的通过制造‘假档案’、‘假学历’、‘假身份’，将一些不具备条件的人塞进干部队伍等等”，已成为干部体制腐败的普遍形式。

（参考资料：宋任穷《关于今后脱产干部来源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80 年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关于整顿“以工代干”问题的通知（1983 年 2 月 12 日）》，“法律图书馆”“新法规速递”<http://www.law-lib.com/lawhtm/1983/45388.htm>；《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严肃干部人事工作纪律有关问题的通知》，《检察日报》2001 年 8 月 21 日）

## 钱浩梁

（1924— ）浙江绍兴人，艺名浩亮（经江青改名，即以此名世）。京剧表演艺术家、政治活动家。

出身梨园世家，1949 年考入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京剧实验学校，先后得到尚和玉、李少春、盖叫天、刘砚芳等武生名家传授。1958 年毕业留校实验京剧团工作，195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 年调入中国京剧院。1963 年以李玉和 B 角参加京剧《红灯记》创作排演，因 A 角李少春生病顶替出演 1964 年全国京剧汇演。从此暴得大名。

由于得到江青关心、支持，文革后成立“红灯记战斗团”起而造反，对昔日师友和剧院、文化部领导反戈一击，不久担任中国京剧院党委副书记（实际的一把手）。发表《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8 期）。1968 年参与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创作演出；后来京剧、钢琴伴唱《红灯记》都拍成了彩色电影，在全国公映。

1972 年任文化部副部长。投桃报李，每谈样板戏都把功劳归于江青；同时抹杀原创人员的功劳、突出自己。积极、全面贯彻当时主政者的政治文化主张，迎合他们的人事亲疏，被指认参加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活动。经常参加文化、外事方面的国务活动。

因曾被纳入四人帮组阁名单，拟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被称作“上了‘四人帮’贼船的人”；1976 年 10 月后被撤消职务、逮捕审查。国家邮电部邮政总局 1976 年发出停止出售、使用“钢琴伴唱《红灯记》”等邮票（共 5 枚）的通知。

由于被认定罪责较轻 1981 年免于起诉；恢复行动自由。其结论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

1982 年到河北省戏曲学校任教。编写了《戏曲基本造型五十功》的教材，

还为学校排演盖派名剧《一箭仇》、《雁荡山》等。1988年7月号《中国戏剧》刊登吴钢《浩亮近况》报道。同年评上副教授职称，与妻子曲素英共同参加中国戏曲院校校友募集教育基金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三天义演，出演《艳阳楼》。从此恢复了登台演出，曾多次赴美国、台湾和大陆各省市等地巡回演出。

1996年在济南演出中突发脑中风，失音并瘫在床上。后治愈坚持练功至恢复登台，参加了原班人马整齐阵容（高玉倩饰李奶奶，刘长瑜饰李铁梅，袁世海饰鸠山）的《红灯记》演出。平常演出多为传统剧目《野猪林》、《连环套》、《战宛城》、《龙凤呈祥》等，结尾仍以《红灯记》选段压轴。2000年代网上影音制品仍有他录制的京剧《红灯记》全本、钢琴伴唱《红灯记》（三碟装）和传统戏曲（《艳阳楼》等）VCD在销售。

（参考资料：胡金兆《“文革宠儿”——浩亮复出记》，阳木编《“文革闯将”封神榜》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和璐璐《共同回忆“红灯记” 钱浩梁：老伴助我重登台》，《北京晨报》2001年05月24日）

## 斗争哲学

毛泽东思想所特有的哲学范畴。忽视同一性（统一性）的相对性、暂时性，强调、夸大斗争性的普遍性、绝对性的矛盾观。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针对国民党人邓宝珊所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指出“他说对了”；从现实政治角度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的阶级属性，与青年毛泽东“万类霜天竞自由”、“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尼克松的《首脑们》中写过，他曾敏锐地感到，毛泽东诗词的魅力可能与对战斗的神往、兴奋有关）的强调运动、对立、冲突、斗争等思想基调相一致。

以阶级斗争作为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动员工农进行武装割据，在哲学风貌上表现出强调对抗的特征，呼应近、现代以来一路激进、革命不断的历史进程（1911年革命、1927年革命、1949年革命、1966年文革），斗争哲学自有其必然性，但它同时也阻断了从革命到建设、由政治-社会-军事而经济-文化-法律等主题变换的理路。

1949年建政后，毛泽东多次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没有解决，“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还要斗半个世纪”；并且以此制订党的政治路线、任务和政策。这种理论和实践发展至文革，被提升到哲学范围进行阐释，就出现了“对立统一规律应改为对立统一与斗争规律”的命题，提出差异就是矛盾，矛盾的冲突、转化是通过斗争即一方压倒另一方来实现的，甚至综合就是“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供了哲学根据。并据此把文革定义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毛泽东反复说，“中国有八亿人，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过七八年，又来一次。”……1949年以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贬斥中庸之道，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历次思想批判、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造反夺权、批清、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文革中“对着干”、“反潮流”的新时髦，路线斗争贯穿中共党史的框架预设，等等，都根源于此。

从理论框架说，这与主张哲学的阶级性、党性，把所有哲学问题都归结为唯

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两个对子的线形思维有关。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否定渐进和改良，积累和量变，梦想着“毕其功于一役”……都是从这里推导出来的。因此革命是斗争，运动是斗争，万事万物的存在都是斗争。社会生活被简单地等同于政治生活，政治又等同于阶级斗争，中国古代历史成了儒法斗争史，文学艺术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武器，连自然科学也有阶级斗争的反映。

在深层心理上，它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乃至后来的湖南农民运动一脉相承。其最具鼓动性和组织力量的，仍然是“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这样一些亘古不变的口号；寄寓着社会底层反主流、求翻身的渴望。由于忽略并无视在日常社会生活和长期历史进程中，阶级合作和协调是更为显著的方面，忽略并无视工具、科技、生产力是人类生活和历史过程的基础，这样的哲学思想，适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不适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宜于政治社会革命而不宜于经济文化管理。

连在精神质素上，虚化、拔高、渲染“痛打落水狗”、“绝不宽容”的鲁迅精神，永不妥协的批判者、否定者形象，突出其铮铮不折的“硬骨头”品格，都从侧面有意无意地强化着斗争哲学的正当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政党伦理，从学术上的一家之说变而为政治上的统治地位、道德上的绝对律令，任何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方法的言说，都被视为大逆不道，都被当作异端、当作阶级异己，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政治、人事制度上无限类推、演绎阶级斗争观念，实际上造成了社会的分裂和准战争状态，运动把这种内耗无休止地循环延续下去，耗尽社会-物质-精神资源和活力。

而人道主义、人性论、怜悯、爱和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也被从根本上抛弃。不断突破文明底线，把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变成了赤裸裸的压迫、杀伐、暴虐。

（参考资料：初澜《坚持正确方向 坚持斗争哲学——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4.05.23；李泽厚《课虚无以责有》，见《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版；古洪能《闲话毛泽东的斗争哲学》） 史无前例

副词，意谓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指前所未有的。该词在文革前，多与“成就”、“发展”、“建设”、“两万五千里长征”、“奇迹”、“巨大步伐”等词组合。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组成一个固定词组，始于1966年6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8日《红旗》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1966年第八期）。

结合当时虚张声势、夸饰的修辞风格看，这样的副词使用并不显得特别突兀；但它却决非可有可无。当中共机关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手相继为它签发生证明时，就有些意味深长了。一夜之间，它立即成为了修辞学的最新时尚，被人们狂热地追捧、习用。

这个副词的爆发式流行是与文革同时来到人们面前的。[注]所以它既是对文革将给人们带来东西的承诺、期许、宣言，又是从政治学、法理学出发对它的性质、地位的事先裁断、界定。虽然没有明言，但它给人以丰富的暗示和联想，从现在起，一切都与以前不一样了，就像上帝创世纪的横空出世那样，在观念上，人们被要求摆脱所有束缚，重新评估一切价值、重新建立一切关系。在那砸碎旧

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瞬间，人们只有惊愕。他们被要求，要放纵自己的认识、思想、想象，要敢于打破一切框框，去面对一个全新的世界。即使是共和国建政以来的现实，也容纳不了这个充满新事物、新秩序的新世界。

人们甚至对这个新世界的样式、规则一无所知，清楚它的只有全能的伟大领袖。因此党把所有的判断权都交给了它的最高领袖——只要是他认定的事情，可以不受任何既定成规、法律的限制。可以随心所欲。赋予了他无法无天的特权，因为他就是法、他就是天。他就是这个新世界的上帝。所有事物、人、时间都是这创世纪神迹的一部分。

这种奇异的颠覆，对于已经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党和政府是极其可怪的事情。它只能说明，它的最高领袖与自己的工作班子的脱节、分离，所以需要超越现存运转机器，摔掉它，来一次秩序的重建、合法性的再造。

从权力的施授关系上看，是党和国家把合法性、权力赋予领袖（一人），而领袖（一人）则利用它来打倒党和国家。其基础是领袖、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和这个秘密社群在组织上的历史纠葛、联系。从政治运作层面上，毛选择了国防部长林彪作为政治盟友，弹压拂逆者（整肃彭罗陆杨既是战术上开展文革的障碍扫除，也是战略上对可能反抗者的惩戒示范）。

按常理、常识，对政治事件的定性、定位，本来是事后由历史学家来做的。

“史无前例”加诸于文化大革命这一事先匆忙进行的加冕仪式，就是要为它可疑的来历、动机、性质、去向、前途正名，是为了掩人耳目。就像是变魔术艺人使用的障眼法，利用心理技术控制病人巫医使用的催眠术。为它的虚弱瞒天过海，壮胆张目。招数并不复杂、玄妙，却制住国人要害，颇见奇效。

1966—1976年的10年间，国家灾难、社会分裂、家庭悲剧、个人惨祸参差交错：政治上时而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被打倒，时而党军副主席、法定接班人外逃坠机身亡，党委—政府领导系统彻底瘫痪，法制体系的公检法被砸烂；红卫兵免费乘车串联，社会分裂成两派进行夺权战争，由军队三支两军接管维持运转；学校停课，学生被赶出城市上山下乡，没有正常的高等院校升学考试；工厂停产，工农业在“学大庆”、“学大寨”的盲目模式里来回折腾，基本的生产管理、讲究投入产出效率都要被当成“唯生产力论”来批判，供应短缺到了不凭票证就买不到东西的地步；文化精英被关在集中营（五七干校）里，文学只能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国家首都广场发生大规模群众抗议……

因此对“史无前例”一语，事前事后几乎并无太大异议：只是在前是肯定、褒扬和噤若寒蝉（有正常思维能力者）并存，在后是否定、揶揄和缅怀追思（如新左派、人数众多的利益受损群体等）共鸣。为了防止集体失忆症发作、帮助学术研究，各地档案馆（广州、杭州等）从2005年起先后陆续推出公开相关“文革”档案举措，供“研究人员、普通民众甚至外国人与外国组织均可以方便查阅和利用”。

2000年代的词语统计（通过google等搜索引擎）表明，虽然被历史挫折倒了胃口，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修辞爱好者仍然钟情于在戏仿、夸张等意义上使用该词。也是词语生态的自我调适、恢复。

[注]根据“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史无前例”在文革前的年平均浮现率是2.38，1966—1968年为11.97，1969—1976年为0.56，文革后为0.79。这一现象说明：文革前期是该词浮现率的峰值，文革中、后期比后文革时期还少，文革前浮现率水平也不低。全社会的乌托邦躁热与该词的沉浮，似有一种神秘的



相关性。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张化、苏采青等《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

## 一万年

数量词。喻指时间长久，经过很长的历史阶段后。毛泽东习用的形容词；一种长时段的、宏观时间的单位量度。《论十大关系》：“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著名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后者是文革时引用率颇高的毛泽东诗句。当时常见的说法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万年不变。是一种对信念坚定不移、对真理性绝对肯定的比喻修辞。“一万年”成了时髦词语。

一万年的提法，一方面是夸张的修辞，模糊，不讲量度的精确性，为了达到表面化的表达效果而不顾及其他，与中国文化的认知特点、毛泽东的诗人气质有关；一方面与小农经济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时间观念有关，老资格、老字号、日久见人心、大器晚成……已经内化、凝固为一种价值尺度和历史观了。它蕴涵着重视传统的价值、传承，轻视内在超越，醉心外部（时空）占领，服务于权能政治的“史官文化”，把人仅仅当作实现价值的一种工具、手段的观念。

毛泽东对“一万年”的用法，在前一个例句里，表明了他对自己认识权威、政治权威之绝对性的强调、自信，君师合一的自我定位，是一种固定化观念，却富于暗示性和感染力、强制性；而后一个例句里，在豪迈下面掩盖着他时不我待的焦灼，对他所创立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再受挫，距离理想目标越来越远的现实，感到沮丧。[注 1]1958 年大跃进的发动，除了好大喜功、急于自创新路以外，1966 年文革的发动，除了渴望战斗、重掌乾坤、反修防修以外，还有时间焦虑症的内驱力在起作用。他要求必须振奋精神，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所作为。也是毛泽东晚年每每临机决断，逸思飞越、趋于激进、不断左倾的根源之一。

在时间的瞬间（革命）与日常（建设）之间，诗人毛泽东醉心于瞬间的流动不居、形态多变、创造快感，而厌烦日常的按部就班、老生常谈、因循渐进。这固然是他的个性特点所致，但对时间的焦虑，不独毛泽东为然。近代以来的革命者多有这样“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感喟、“毕其功于一役”的迫不及待。[注 2]他渴望，以独己意志，创造瞬间永恒，超绝时空约束。这难道是后发、追赶型社会必然存在的问题吗？也许悲剧在他为自己制定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征服时间——时，就已经被注定。

这个浪漫诗人奋斗一生，终于发现越走越离目标越远。征服时间的难题不止是艰巨，而且已被证明不可能，昔日的凌云壮志都已风流云散。他留给接班人的，竟然是一句平实得有些令人伤感的开导——“不要着急，慢慢来”。

2000 年代以来多被用于强调爱情永恒、价值绝对的语义，在关于爱、关于永恒的流行歌曲里，得到反复吟唱、咏叹。似乎是一种语义、人性的复归。同样是浪漫，一指向个人情感流连、诗意沉醉，一指向历史—社会功业、雄心超越。

[注 1]厚今薄古、执着于当下，是毛泽东时间意识的特点：“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但仍然对时间的流逝敏锐而怅然，所以难怪他会感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注2]戊戌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康答：“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孙文与严复在伦敦晤谈革命事，严复说：“……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问：“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938)：“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

(参考资料：张育仁《鲲鹏之梦——毛泽东诗化哲学评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毛主席与文革》，MSN中国“我是一只音乐虫子”[http://spaces.msn.com/members/bookeater911/PersonalSpace.aspx?\\_c=](http://spaces.msn.com/members/bookeater911/PersonalSpace.aspx?_c=)；余世存《非常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 八大员

名词。文革中对从事因有实惠而被人看好的服务行业的一种统称。源于音乐家刘炽1960年代的创作歌曲《歌唱光荣的八大员》(代表作)。指称的是售票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理发员、服务员、售货员、炊事员。以“员”为后缀构词的风气，被认为是学习苏联制度时尚的遗留物。当时的社会风气是鼓励人们从事以前被看不起的服务行业，刘炽写歌的命意也在于此。但在大肆张扬的官方文化肯定的，被实际生活惯性推搡着的人群却仍然并不看重。

这一称呼从此成了一种弹性很大的模式，在当时和以后各个时期、各个行业都引来了各式各样的模仿、借用。如，工人参与民主管理(“两参一改”)的八大员——计划员、统计员、核算员、定额员、劳动工资员、文化学习员、技术安全员、生活福利员；农村有《夸夸俺村的八大员》，公社广播员、农机管理员、畜牧管理员、水利管理员、农技推广员、报刊投递员等(都可以吃商品粮)；基层文化普及有学习辅导员、读报员、创作员、图书员、幻灯放映员、文艺演出员、板报员、故事员；科研院所有设计员、描图员、材料员、工艺员、检验员、试验员、试飞员、外协员；驻外机构的译电员、翻译员、交通员、采购员、炊事员……

文革由于生产不足，生活物资供应紧张，只能用各种票证保证最低需要，抑制需求增长，短缺经济使人们的满足处于低水平状态。通过种种非正规渠道攫取各种物资，成为人们消费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因此与物资供应相关的职业，或能够拥有紧俏资源用于交换的职业就成了人们追捧的了，如“听诊器(医生)、方向盘(司机)、秤杆子(指卖东西的售货员)”、招待员、采购员、电工、水暖工等等。典型的，例如肉店的操刀师傅，他可以直接决定给你的定量肉是肥是瘦(因定量少，肥肉有更多的油脂而被人们喜欢)，区区小事却要关系到每家每日锅里碗里的油水多少，这时熟人与生人的区别立即就显出来了。电影院职员可以搞到内部电影的票子，让处于文化饥渴状态的人们打打“精神牙祭”，时时能享受人们的殷勤、恭维和各式贿赂。不少返城知青被安排从事八大员工作。这些行业的从业者更容易积累起丰厚的人情资源，使他们在频繁交换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对于长期处于政治紧张、焦灼状态的人们，无疑是一种温暖、贴心得多的抚慰。当学术、事业上的条条出路被堵死以后，物质生活的舒适、世俗的柴米油盐就成了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什么都可以的虚无主义就这样流行起来。在其时时尚的人生设计里，多少背离了沿袭无数世代职业

观，物欲取代了精神，当下满足取代了恒久价值。比较起热昏的虚幻乌托邦来，狭隘世俗化、功利主义是否走向人性解放的一条可能道路呢？其间得失难以尽数、顾全。只有少数头脑清醒者知道这样的局面不会长久，而坚持让子女学习数理化。

2000 年代第三产业不断发展，社会分工日趋细密化，部队后勤保障日臻完善，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服务项目，有表演唱歌颂这样的新现象（电脑操作员、影院放映员、电话值班员、电热水炉司炉员、畜禽饲养员、暖棚蔬菜种植员、图书管理员、电器维修员）。还有一些行业如医生、教师、经纪人、导演、记者、导游、软件工程师、科研人员等，被认为可以利用其稀缺性、隐蔽性为自己黑箱攫取一些法规所不认可的实际利益、超额好处。引起人们的普遍敌意和不满。

（参考资料：温故知新《谈谈老夫亲历的文革》，“龙坛”<http://www.ltbbbs.org/bc/printpage.asp?BoardID=6&ID=1154>；宋举甫、李春来、李鸿民《新八大员（男女声表演唱）》，《解放军报》2002 年 9 月 6 日；李亮《新“八大员”黄金职业里的黑色勾当》，《法制早报》，）

## 最高指示

文革中用以指称毛泽东的论述、意见、指示。从“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提供的材料看，1965 年出现 4 条、1966 年 256 条、1967 年 91 条、1968 年 58 条、1969 年 19 条、1970 年 3 条，以后即已消失[注 1]。发明人是林彪，见于他对“中国人民解放军 1966 年工作指示”的第一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1965 年底）。一经提出，在报刊、广播上传播、孳生、普及的速度极快。

“指示”而冠以“最高”的名义，报刊引用时以黑体字标出，一则强调指示发出者权力地位的至高无上，毛泽东当时虽然不是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却是党和国家的中央军委主席（军权控制者），仍然实际握有最高、最后的决策权；一则是将毛泽东思想地位的绝对化，反复神化毛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崭新阶段”是“顶峰”的换词)”，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后被罗瑞卿删掉)”（《“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人类认识的最高成就——真理本身，通过“最高指示”的称谓形式把国家意识形态至尊的荣誉授予毛泽东。这样，以意识形态（真理）名义为政治权力（法令）授勋，同时又倚仗政治权力强化意识形态权威，完成了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最高指示”把毛泽东心仪的君（法令）、师（真理）两种身份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细辨“最高指示”，似是“圣旨”的变种。中国封建王朝对帝王（天子）的命令称“圣旨”，是皇权的象征、展示，[注 2]是当时最大的权威、最高的法律；不听从圣旨（“抗旨不遵”便是“欺君之罪”）的最高刑是死罪。把毛泽东著作、指示称作“最高指示”就是拿它比拟圣旨，以领袖意见否定了法律、制度、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罗瑞卿反对提“最高指示”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不合我国政体（共和国）。

它的使用在 1966 年达到高潮，是与当时政治上打倒刘邓等中共中央一线领导体制的历史进程相对应的。其功能就是把行政形式上不在位（毛泽东）的意识

形态影响力直接转变为政治权力（支配力），邓小平说过“实际上难于反对”指的就是这个。一旦它的核心功能已经实现，它就处于逐步退潮、淡出的过程中。因为从现代民主意识（无论其何等稚弱）看来，它的荒谬性、非法性是太刺眼了，名声太臭了。

在当时对最高指示不能有丝毫非议，不管这种非议是多么微不足道，甚至本来就是着意维护，都不允许。罗瑞卿的非议[注 3]理所当然是被打倒的罪行之一。沈有鼎（逻辑史专家）在一次学习中，指出“最高指示”中有一个标点符号用得不恰当，“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马上给揪去开了一晚上批判会，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灭亡”。

说话作报告，做文章写检讨，甚至写家信、情书，都要来几段最高指示。报眼、黑板报、信封、粮票、购货券、商标、茶盅脸盆、包装纸、公交车票、介绍信、结婚证书、红宝书封面……都有“最高指示”踪影，被当成了一种法令象征、装饰图案。作为法律证明文件的结婚证书，印制、引证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的地方就是原来印制、引证《婚姻法》的位置。

滑稽的是，林彪吹嘘毛泽东的权威地位，毛泽东以此扳倒中央一线，都借助于最高指示的杠杆作用。批判林彪时给他加上歪曲、践踏毛泽东思想的罪名，而被吹嘘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指示”的意识形态地位却丝毫无损。仍然是不倒翁。

2000 年代偶有对“最高指示”的戏仿用法，如母亲对儿子（姚明）、最高行政当局（最高人民法院）对部属、国家元首（江泽民）的话，被称作“最高指示”。意含调侃。

[注 1]只是“最高指示”极端提法的消失，而以毛泽东论述、思想为真理，给以引证的地位、做法都没成为过去时。

[注 2] 为了与圣旨的尊贵相配，以玉石、黑犀牛角、贴金、黑牛角做卷轴，上好蚕丝绉锦织品做轴心，图案为祥云瑞鹤，以圣旨两端翻飞的银色巨龙绢布图饰、圣旨起头第一个字写在右上角第一朵祥云上作为防伪标志。

[注 3] 除了“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以外，他还曾说：“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难道不能再高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啊！”“你们对谁的话都可以怀疑，对毛主席的话也可以怀疑。”

（参考资料：新华社《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指示全军继续突出政治》，《人民日报》1965 年 11 月 27 日；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文革串连”、话剧团“革联”、军乐队“革联”、体工队“七一兵团”、卫校“革纵”编《罗瑞卿反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见《彩色小吉普的部分文革藏品》，Hi!PDA 论坛 <http://www.hi-pda.com/forum/viewthread.php?tid=151558>；邱云、张乐《明清圣旨精品亮相杭城》，“新华网”2004-01-29）

## 语录仗

名词。文革中，主要是 1967 年至 1969 年初，红卫兵造反组织之间围绕夺权陷入派性斗争乃至武斗的那段时间内，不同观点、派别的人们进行辩论所习惯运用的论辩方式。

其时由于党政领导系统的实际瘫痪，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混乱、真空状态，没有权威的裁决者，三忠于、四无限思维定势的惯性作用，毛泽东言论被当成了真理本身。因此彼此对立两派大字报的你来我往、面对面的唇枪舌剑、对峙广播站的互相辩驳，双方都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小红书里引证对自己有利的毛泽东语录，相互攻击和诘难，形成了此毛泽东语录和彼毛泽东语录互相攻讦的滑稽现象。既然毛泽东语录已经从他的具体语境和论述体系中剥离出来，失去了所指的规定性，就抽象成了教条。成为某种可以被用来随意组合的构件，被搬用者任意宰割、各取所需的唐僧肉了。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地对待毛泽东思想、论说是当时的潮流。共同思想背景、教义基础和不同利益的冲突、纠葛，使论辩双方都试图借助毛泽东的权威压倒对方，证明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理解并按照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路线、指示办事的；而对方则背离了这一切，甚或是反对毛泽东的。形成了从各自狭隘理性出发整体却富有荒诞色彩的图景。只有毛泽东远远超越于这一切之上，稳握最终裁判权。

毛泽东在 1949 年以前指导中共夺取政权的成功，使他牢牢掌握了中共的领导权，在翻身感激励下的普通百姓的崇敬，也使毛泽东的魅力被无限放大。而且在精心宣传灌输的引导下，把那一切当成了他个人的成功。把 1949 年前乃至 1956 年的胜利，作为其后制订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的保证，是一种错误而危险的类推。这也与中共“九评”所确立的、以引证马列开路的论战传统、文风有关（中国古代立论也有宗经、征圣的传统）。在当时体制下，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互借共生关系已经被空前简化了。[注 1]这种风尚已经容不得逻辑学的常识——事实，只有事实，才是验证主张、意见是否正确的根据。

毛泽东本人就挖苦过“打语录仗”现象：不同观点的人，都引用《毛主席语录》批判对方反对“毛泽东思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以语录仗方式进行的“文斗”，后来无一例外地都发展成了“武斗”——两派间无休止的血淋淋厮杀。而毛泽东逝世后中共权力的交接，居然就是以语录仗的方式进行的。[注 2]一方说毛的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一方说是“按过去方针办”。都从毛泽东的话里寻找政治合法性的依据。而现实的逻辑是，政统、道统合法性的取得，最终仍只能取决于政治实力的较量。毛泽东思想的嫡系传人——“四人帮”终被权力联盟“一举粉碎”。

不但政治性的派别组织论战、争论，要打语录仗，就连日常口角如售货员与顾客吵架的鸡零狗碎，也要各引毛泽东语录。一方说“为人民服务”，一方说“要斗私批修”。

广义地看，那个时代的所有论争都带有语录仗的色彩，都要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去寻找根据。连学术研究（主要是说人文科学，但自然科学也有穿靴戴帽的）也像解经一样，不是依据独立材料和论证，而仅仅是为经典作家作注释。成为一种八股调。只是不像派性论辩这样，具有准战争性质。

[注 1]中国汉代就有经义决狱的传统。董仲舒根据《春秋》经义决狱断案，以儒家思想为最高司法原则直接应用于司法，判决有罪无罪、罪轻罪重。它违反了罪法定原则，开了人治大于法治的恶劣先例。这种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互借共生关系在毛泽东时代成为普遍现象。最典型的是，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力），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

[注 2]对此民间早有预言。编者一个理工出身的忘年交朋友 1975 年就曾忧

心忡忡地说，毛主席不在了，中央领导一个引一段毛主席语录，那该怎么是好？

（参考资料：吴江《林彪、“四人帮”实用主义哲学批判》，《人民日报》1978年4月3日；瞿同祖《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法律史学术网” <http://www.legal-history.net/02/scholar3.asp?id=178>）

## 赤脚医生

名词。意指中国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中不脱产的初级卫生人员。文革中被许为标志着“医疗革命”方向的“新生事物”之一，得到极大普及，作为批判此前（17年）医疗卫生工作方向性错误“城市老爷卫生部”（放任农村基层缺医少药状况）的一块石头。

他们是受过一定时期培训，具有简单医疗卫生常识和技能、仍持农村户口的基层卫生工作者。一般是就地取材，从行医世家子弟和回乡知识青年略懂病理医术者中挑选，集中到县卫生学校、乡村卫生所等机构短期培训（一年半载）。强调边干边学。一面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防病治病、实行计划生育，半农半医的职业身份使农民负担的人员费用也较低。是农村低水平合作医疗制度的执行者、承担者。对方便农民就医，改善农村医疗条件、开展防疫工作、提高农民健康，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由于他们生活在农民中、本身也是农民，被亲切地称呼为“赤脚医生”。

1950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社组织过“保健站”，公社化后尝试建立合作医疗，有卫生员的设置。毛泽东1965年曾发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既有这位乡村之子希望医疗资源、服务惠及广大农民的匡世改革热望，也含有意识形态运作高手在政治上预伏攻击棋子的潜在权谋动机。在这一指示推动下，县区设立人民医院，公社设立卫生院，城市医生被下放到这两级医疗卫生单位；城市部分医学专业被迁往县城，或在那里兴办半工半读的卫生学校。文革中加强了对他们的培训工作，提高了误工补贴（发达地区也有部分脱产的）。基本是每个生产大队都有1个赤脚医生，个别的可以达到2人。到1974年形成了一支百万人以上的赤脚医生队伍。

同时，历史形成的城乡医疗布局、农村医疗条件被当成政治路线和方向错误来批判（高潮是《红旗》杂志1968年第3期调查报告《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为打倒党内走资派的政治需要开辟了战场，提供了炮弹。对赤脚医生的作用有夸大成分。实践中曾有让城市医生到农村，农村赤脚医生调换到城市医院的“对流换岗”措施。据说，一些地方出现了城市医生无法施展医术（条件不具备），干繁重农活，赤脚医生守着现代化医疗器械干瞪眼的错位情况。不少上山下乡知青有过赤脚医生经历。

电影《春苗》（上海电影制片厂1975年出品，谢晋等导演、李秀明主演）讲述了一个农村妇女（妇女队长田春苗）怎样目睹农民女儿救治被耽误身亡，努力学医，热心为贫下中农治病，成长为赤脚医生的故事。但影片也穿插了两条路线斗争、春苗造反夺权的内容（后被称为“阴谋文艺”典型）。在宣传画上，他们的典型形象是20多岁健壮姑娘，扎两个小扫把辫子，绾着裤腿，斜挎印着红十字的药箱，昂首走在广阔的田野上。洋溢着青春活力、诗意想象。

他们中医术较高者在资金匮乏条件下，因陋就简，利用针灸、中草药等治疗手段，开辟了花钱少、见效快的乡村医疗路子。据称1980年代因发明和推广101

生发产品成名的赵章光，年轻时就是一名家学出身的赤脚医生。但赤脚医生没有经过系统学习（有的只培训过几个月），缺乏执业的资格认证，无法处理，收入偏低，遭遇医疗事故时人身安全、人格尊严难以保证。1985年农村公社解体，合作医疗亦随之解散（村办合作医疗覆盖率仅5%），赤脚医生流失现象严重。

据介绍，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类似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倡的“适宜技术”（即ARI、DRT）。这些宝贵经验，已被WHO吸收、总结进了著名的“阿拉木图宣言”。1994年9月10日至25日美国基督医学协会的90位志愿医护人员从在四川宜宾地区乡村诊所进行义诊。这次行动被称为“赤脚医生”计划，目的是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为农村诊所培训医护助理（赤脚医生）。2000年代开始实施《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要求他们经注册取得执业资格证书后，方可在村级医疗卫生机构从事预防、保健和一般医疗服务。准入条件是必须达到中等医学专业学历（学力）。有20年从业经历可以免考。而上海等发达地区的执业资格认证更早一些（1980年代）。

毕业于黎平卫校的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大塘村“赤脚医生”李春燕，因坚持乡村行医5年，担负2500名村民医治任务，虽入不敷出、身负债务仍然矢志不改，被《南风窗》杂志社评为2004年“年度人物”。有“最后的赤脚医生”之称。得到“凤凰卫视”“冷暖人生”和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报道。先后有大量民间捐赠用于修建卫生室和医药补贴。在对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官方结论激发的广泛不满声，和对2003年沙斯防疫动员体制的反思中，引起社会对赤脚医生的再次关注。

（参考资料：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艾笑《中国的经验可望又可及 我国妇幼保健成就令国际瞩目》，《人民日报》1995年9月8日；钱信忠《重振农村合作医疗》，《人民日报》1991年7月24日；张沼婢等《七千“赤脚医生”面临“转正”考验》，《泉州晚报》2003年8月20日；谢念《春燕衔泥唤春归》，2005年8月18日）

## 张铁生

（1950— ）辽宁兴城人。知识青年中的反潮流典型。

中学毕业后1969年下乡插队，曾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1973年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时，在试卷上写了一封为考试失利（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辩解（忙于生产无暇复习）、希望被录取的信。该信后来被《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发表了，并在《人民日报》转载。陈情哀恳的信被解读为拂鳞造反的信，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被树为“反潮流英雄”；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江青语）。成为媒体追捧的当红新闻人物。

同年入辽宁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读书，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任中共铁岭农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院党委副书记。同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政治上的暴发、得志，使他无条件盲从提携者意志、政见。到处作报告。据称，1976年9月反复倡言反对中央“有人搞复辟”，如果这样要带人“去天安门游行示威”，“上山打游击”（没有经验、实力，却要拙劣地模仿毛泽东的凌云壮志）。同年被撤消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并开除党籍，并被羁押。

1983年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

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审判前拒绝法院为其指定辩护人。在自辩时说，自己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小将”，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该宽容和谅解的“错误”。提起对判决的上述，被驳回。在揭批四人帮和随从的声讨中，以“白卷英雄”、“小丑”恶名传世。

服刑期间在辽宁省凌源监狱卫生所担任医生兼护士，被服务者达 2000 余人。

1991 年 10 月刑满出狱后，同年 12 月 22 日，他和沈阳农业大学讲师董礼平女士（铁岭农学院同学）在兴城县结婚（1992 年生养一女）。后受聘于辽河（集团）饲料公司，任沈阳办事处主任。1993 年出任沈阳金鹏农牧实业公司经理，后加盟禾丰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曾被湖北知音出版集团所属《打工》杂志（武汉）炒作、盛传“已成千万富翁”，引发新闻失实、侵权诉讼（起诉于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并表示索赔所得将捐助希望小学。引起雪崩式报道，再次成为媒体名人。有论者为其辩称，起诉人依法享有隐私权，有权不被社会关注。被告回应说恪守新闻真实，历史并不会因当事人意志而改写。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卓君 吴强《千万富翁报道失实 张铁生起诉“打工”杂志》，《华商报》2003 年 12 月 31 日）

## 解放鞋

文革时流行于内地的时尚鞋型。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鞋品装备的主力鞋。

但在档案资料里记载的正式名称是布面胶鞋。产生于 1948 年左右，后来经过不断改进一直使用了 50 多年（此前军鞋多为农村妇女手工生产的粗布鞋）。称呼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因为在解放战争中诞生；二，因为是解放军战士穿用的制式军鞋。20 世纪 50 年代初，随着中国橡胶工业的发展，解放军各部队全部换成了解放鞋。从外观上看，为胶底帆布，黑底、黄帮、绿面儿。

朝鲜战争中脚蹬解放鞋、走路悄无声息的志愿军士兵搞渗透、奔袭，像丛林中的美洲豹一样迅疾可怕。除了作为军队主力鞋以外，在很长时间内体育运动员参加大型比赛、单位开运动会，轻便的解放鞋都曾是唯一选择。普及到了成为球鞋的同义词。普通百姓日常穿用也晴雨皆宜，方便实用。当年的市场调查说，83.58%的搬运工人、46%以上的农民穿解放鞋（1965 年上海百货采购供应站数据）。

由于军品解放鞋坚实、耐用、防滑，比民品的好。你得有地位、有身份、有关系、有路子，才能穿上军品解放鞋。因而穿上解放鞋与穿上当时一般的球鞋，感觉自然不同。军品解放鞋与普通球鞋（不管其质量、品牌多好，价格多昂贵）之间，有一种等级、一种特权的差别存在。文革中解放军三支两军对地方事务大量介入，政治局里的军队将领构成激增，本来已经很高的军队地位就更加显赫。以国防绿为标志的军队装备（包括军帽、军装、武装带、军挎包、军用水壶、解放鞋等）作为服装、饰物的流行趋势，拥有了更高的号召力。当时的军品解放鞋就相当于 2000 年代时尚流行的“名牌”。

普通人家的孩子能穿上新解放鞋（民品普及率高），就已经是奢侈品了，像是过盛大的节日，蹦跳、撒欢，透着神气、炫耀。城市学校学生军训要求统一穿解放鞋。如果穿上一双真正军品解放鞋走在大街上，绝对能吸引同龄伙伴羡慕的目光。军人子女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990年代左右生产解放鞋的军工企业转为地方企业后，仍继续还为乡镇、农村居民生产解放鞋，因为一双8元低廉的解放鞋对不少“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山（区）、穷（贫困）”农村居民还是很便宜和耐用。但销售量已经一年比一年少，因为中高档旅游鞋、休闲鞋已经逐渐占领市场的绝对优势。球鞋称呼也改为英文音译名的“波（ball）鞋”。国产解放鞋大量销往越南、缅甸和老挝和美、日、德等国家。

解放军总后勤部统一规定，2004年5月起解放鞋退役正式，而以一种获得五项国家专利和一项军队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的新型作训鞋[注]取代之。军方发言人在解释换装的原因时说，鞋面是采用纯棉材料制成，透气性和透湿性都比较差，常常散发出难闻气味。有的战士甚至因脚气感染，影响训练和执行任务。因为材料本身特点，耐磨性差，一些战士一年能穿破五六双解放鞋。且样式陈旧、功能欠缺。供应军品的最后一条解放鞋生产线正式拉闸停产。

[注]新装备的99作训鞋由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研制，采用了新材料、新款式和新工艺，鞋型设计吸收了旅游鞋、运动鞋的特点，增强了对脚踝和脚背的保护功能。特别轻便，加厚的鞋底比老式解放鞋好很多，抓地力极强。

（参考资料：赵殿忠、姚鹏飞《胶鞋调查札记》，《人民日报》1965年7月16日；王旭《我军士兵将再换新军装“解放鞋”已退役》，《北京青年报》2004年09月23日；穆紫《漫话中国军鞋》，《经济参考报》2004年11月12日；程文超《“波鞋”与球鞋》，《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19日）

## 黄色歌曲

本义指风格轻佻、柔弱、靡丽，刺激感官，内容空虚、挑逗，乃至意涉色情的歌曲。该词的指称范围在文革中被极大地泛化了：所有表现个人情感生活，抒发个人情绪、情愫的歌曲，连民歌[注]、小调、爱情歌曲，和除《国际歌》以外的几乎全部外国歌曲都包括在内，被视为不健康、封资修文化的表现，称为名声不佳的“黄色歌曲”。抒情歌曲、尤其爱情歌曲成了黄色歌曲的首要打击目标。是不成文的禁区。其实这些歌曲多半没有色情的内容，这样的指控疑似一种因无意识性压抑而逆向发作的矫枉过正的神经质。

那是一个群众歌曲，尤其是雄壮、坚定的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压倒一切的时代。它符合道德纯洁、思想革命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高扬着反映时代生活（被规定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内容和工农兵的感情（即“大我”）的主旋律。与此相反，《康定情歌》、《梅娘曲》、《宝贝》、《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拉兹之歌》等，这些与民歌有血肉联系，抒发个人情怀、感受的歌曲，据说远离工农兵，远离时代生活，是消磨人们革命意志，腐蚀、俘虏工农兵的“毒药”。黄色歌曲的认定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标准，往往凭认定者的文化程度、个人偏好一言而决（思想越左划界范围越大、越泛）。有时甚至就以指控者的个人爱好和处罚当事者的决心大小而定。

谁唱这些歌，哪怕是轻声哼唱，哪怕是无意识的，谁就会受到批判。重则看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最低限度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思想不健康。这类罪名弹性很大，得视当事人的人际关系和事发当时的政治敏感度如何而定；往往成为爱打小报告的人，报复素有嫌隙者的口实。罪名可以上纲上线到与亡党亡国联系起来

的高度。

但由于缺少吸引人的抒情歌曲，文革后期禁制相对松弛的时候，在工厂工余青工们的郊游远足，农村、建设兵团的知青乡间小路等控制边缘环境，人们仍可以在暗地里哼唱，寂静无人的夜里扯着沙哑嗓子大声歌唱，甚至还被偷吃禁果的越轨感刺激得兴奋起来。为了合法化，也有人把涉及情爱的字眼略微变通改动一下，如“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改为“跟着我的战友上战场”。在青年情侣间，能否唱两句俄罗斯民歌还会被看作对方是否有情调、修养的表征。

1980年代前后轻音乐（以港台邓丽君悠然自在的《何日君再来》等歌曲为代表）刚刚在大陆露头时，就曾被当做黄色歌曲看待、反对、禁止。连李谷一的气声演唱方法（并捎带上了伴奏的电子音乐），也被冠以“大陆上的邓丽君”甚至是“资产阶级音乐潮流和靡靡之音的典型代表”名义，遭到严厉批评。只是由于听众的自发喜欢、追捧和高层官员的开明，使得这样的反对才没有酿成严重后果。很快成为流行时尚。见证了一段从禁锢到开放的历史。

[注]2004年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歌之乡”的陕南紫阳民歌甚至被扣上了一顶“黄色歌曲”的帽子，一度被封禁。

（参考资料：葛兆光《香炉山“文革”的世外桃源》，“三苗网”<http://www.3miao.com/literature/easy/xianglushan.htm>；yungong《岁月如歌》，“网易文化自助餐”）

## 张春桥

（1917—2005）山东巨野人。笔名有狄克、水晶、吴松、常轨等。文人，政治活动家，文革理论家。

1931年至1934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春参与发起成立华蒂社，成为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据称曾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受到鲁迅《三月的租界》、《出关的“关”》反击。其间曾同国民党中统特务有过联系。1937年9月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到达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隐瞒个人加入反动组织的历史。此后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1949年随军南下。

1949年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抨击“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宣传“左”倾思想。得到毛泽东赏识。

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协助江青督促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白毛女》的编创。参与酝酿、谋划、运作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揭开文革序幕。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因受到红卫兵炮打，授意严加追查，致使牵连甚广。[注1]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1975年1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

部主任。被选为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办事以冷静、缜密、低调、阴鸷闻名，人言有宰相之才。据称，他伙同江青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疯狂地进行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活动，煽动打倒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挑动武斗，残酷迫害老干部，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郭沫若称为“狗头军师张”），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杂志 1975 年第四期）。

1976 年 10 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77 年 7 月经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 年 1 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受审全程只有他一言不发。1983 年 1 月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997 年 12 月减为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10 年。1998 年 1 月保外就医。

与文静育有三女一男。1973 年申请离婚，虽经中央批准但未公开；晚年出狱，仍与文静共同生活。2005 年因胃癌不治去世[注 2]，新华社发布一句话消息。享年 88 岁。没有留下回忆录。

主要著作有《在巩固和扩大的陕北公学》（1938 年，延安）、《访苏见闻杂记》（1954，华东人民出版社）、《今朝集》（1958，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龙华集》（1960，上海文艺出版社）等。

[注 1] “游雪涛小组”提供的情报起了重要作用。该组织被指控是张直接操纵、指挥的，从事跟踪盯梢、绑架、抄家、拘禁、刑讯和捏造情报等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诬陷华东局党政领导。

[注 2] 1994 年间曾有误报，说他已经去世云云。

（参考资料：叶永烈《张春桥传》，作家出版社 1993 年版；《曾是中央重要的笔杆子 张春桥不写回忆录可惜》，“湖南在线” 2005-08-01 <http://news.163.com/05/0801/14/1Q2U071H00011246.html>）

## 《出身论》

著作名。遇罗克 1966 年 10 月写作并油印发表的文章。其时“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鬼见愁）对联风行一时，大兴县斗死、打死“四类分子” 300 余人（其中 22 户被斩尽杀绝）。在这篇文章里，作者针对当时流行的“血统论”——一种认为人的意识、政治观念是可以遗传，因此要实行以出身、成分为依据的政治路线的观点——进行了系统而犀利的反驳。

作者指出，“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阶级成分与家庭出身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要计较成分，只能对地主、资本家本人，而不是他们的子女。当时的青年，要么是劳动者，要么即将成为劳动者，他们不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没有理由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如果说针对社会群体的阶级路线在实际操作的革命战略尚有正当性，那么用它针对个人就已经有左倾嫌疑，用它祸及子女的家庭出身就根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而带有随意株连的封建色彩了。

文章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出自封建时代的山大王窦尔敦。血统论者的“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等，是“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用出身压人的做法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没有什么区别。指斥它已经成为制造社会隔离一分裂的根源和压迫的“正当”理由。并呼喊“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遇罗克的批判高于同时代人的地方，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娴熟了解和自如驾驭，没有陷入被动、屈辱的辩诬状态，又引证、运用了西方人权思想的资源。对文革意识形态具有摧毁性。被研究者称为“最具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文本”。

1967年1月18日该文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名义，在北京四中学生主办的《中学文革报》铅印发行（前后共印9万份）。被辗转传抄翻印流传全国。据网友蒙泰里尼提供的图片，还有该文的油印单行本传世（见“猫眼看人”2005-10-2跟贴）。[注]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来自全国各省市表示共鸣的来信，最多时达一天几邮袋。一份《中学文革报》可交换好几种别的紧俏的权威红卫兵小报。

此后，遇罗克还陆续写出同一论题的《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谈鸿沟》、《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等10余篇系列文章。

本文作者是挑战文革意识形态第一人。他也因此而获罪（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大毒草”），被捕，被判处死刑（详见“遇罗克”）。

遇罗克的思想成就，被集中收录在徐晓、丁东、徐友渔编辑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里，约有8.5万字。

[注]广州第十八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曾翻印该文，时间是1967年3月16日，油印单行本书封注明“供分析参考”。书封装帧配有毛泽东木刻像和语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内页有编者按——

《出身论》是一篇反革命的宣言书。它借批判反动血统论为名，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咒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发泄了他们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专政、对党的阶级路线的刻骨仇恨。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它明目张胆地煽动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造无产阶级的反。企图把许多有意革命的出身不好的青年引入歧途，把他们推向火坑，毁掉他们的一生。

《出身论》的出现，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是偶然产生的吗？是孤立的吗？不是，都不是！《出身论》的出现，正说明了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上的反应，说明了阶级敌人并不甘心它们的失败，向无产阶级的又一次新反扑。‘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出身论》的出现，代表了社会上的一股新的反动的思潮，它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有市场。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凡是错误的东西，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必须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去批判它，肃清其流毒。广州18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编者按”基调似与书封“供分析参考”的定位有距离、矛盾。

(参考资料：徐友渔《异端思潮和红卫兵的转向》，载《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 年版)

### 三线建设

名词。1960 年代以来根据战备需要，把全国按地理位置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指东北及沿海各省，“三线”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内陆地区，“二线”指介于一、二线之间的广大地区。其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1964 年到 1978 年，在中国中西部的 13 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

1962 年后，美国在台湾海峡多次举行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制造北部湾事件在越南战争升级，1964 年，美国制定了绝密报告——《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试图出动空军袭击中国即将进行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核基地。中共中央中止原来“抓吃穿用”的“三五”计划设想，1964 年毛泽东提出存在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在原子战争时代要有后方；据此制定了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和建设大三线的方针；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相关的交通（成昆、川黔、滇黔铁路）、煤、电建设起来，把东部沿海的重工业基地向内地转移，实行“分散、靠山、隐蔽”的布局、选址方针。

当国家计委汇报说缺乏资金，筹措三线建设的投资计划需要开会研究。毛泽东当即说：没有钱用我的工资。其中也隐含、夹带了“大跃进”失败后对中央一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经济形势、调整步骤的认识分歧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不满。[注 1]

1969 年，中苏边境陈兵 54 个师、近百万人，在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要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消灭中国核基地的计划，并打算联合美国进行。因此三线建设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从 1965 年中国开始进行了长达 15 年、横跨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投入资金 2052 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 400 多万，安排了 1100 个建设项目。大批沿海企业和技术管理人员迁移到了山沟里，[注 2]其中进川的就有 40 万人。通过新建扩建、迁建、改建，先后建成 2000 个大中型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形成了 45 个大型生产科研基地和 30 多个新兴工业城市，修筑了 10 条总长 8000 公里铁路干线。建成了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交通、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工业为基础，机械、电子、化工为先导，门类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

其中包括：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 10 条铁路干线，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

三线建设也培养了一批干部：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曾在甘肃刘家峡工地工作 13 年，温家宝曾在甘肃酒泉工作 14 年，李岚清、王兆国也曾在湖北十堰中国第

二汽车厂工作。

1983年，针对三线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决策，对三线建设中企业布局、产品结构、技术水平等方面进行重点改造；共规划安排三线建设调整项目201项，到2003年年底，完成190项调整改造，剩余11个项目将于2005年全部完成。

近年来，当代史学家对此评论说，三线建设客观上初步改变了国家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给西部以后的建设提供了条件。但是，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进程过快、过急，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甚至边勘探、边施工、边投产），造成了严重后果。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忽视经济规律的政治推动决策模式也是论证缺乏科学性、造成盲目和浪费的原因。人民和国民经济为此也付出了不能提高生活水平的牺牲。

[注1]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的信中检查自己文革前“错误”时，不得不说：“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

[注2]还有他们的子女。后来有人发牢骚就说他们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

(参考资料：宋镜《西部开发三步曲》，载《新华文摘》2000年第7期，P175；王宇、张毅《国防科工委：我国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进入收尾阶段》，新华网2003年12月4日；陈东林《1964年三线建设决策前后的中央分歧》，《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2002年3月15日)

## 群众基础

偏正词组。指称个人与他人、组织与社群相处的状态的好坏，相互联系、协调周边关系的能力的大小。

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政治哲学，又是带有权宜性质的权力运作谋略。统一战线思想最初的核心，就是为了在不利环境条件下的政治角力中寻找有利于自己一方的力量组合。

靠群众运动、武装割据起家的中共，特别重视舆论宣传，通过支部把社会动员、社会控制的组织工作落实到基层。[注1]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根据地通常被选择、建立在经济极端落后、国家权力无法渗透的省际交界边缘地区(2000年代前后的表述为“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山[区]穷[贫困]”)，穷则思变的人们在行为方式上容易铤而走险，揭竿而起，那些地区就被中共兵运战略家称之为“群众基础好”。这一评语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于贫穷，人民有推翻现存秩序、现存制度的要求，二是中共作为政治组织的影响大，土改政策得到人民拥戴。在这些地方，容易建立政权，募集兵源。农村包围城市的夺取政权道路其实就是群众基础的军事战略学表达。

建政以后的中共，建立了庞大的党政工团系统，作为自己的把社会一体化的政权基础。而差序结构的人际关系，使中国人尤其注意做人，维系横向联系，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对集体的归属感，领导和个人都要团结大多数人，才能保证机

构运转的效能。它的组织发展把考察发展对象的群众基础作为自己的重要依据之一。规定基层支部至少应安排 2 名党员对每位发展对象进行群众调查。但是对调查人数、调查对象的选择上没有具体规定，给走过场和操纵民意留下了活动空间。

毛泽东对人民群众至上地位的肯定（“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有重视民意基础的成分（来自农村并曾致力于乡民调查的毛泽东具有对基层民意的某种亲和力），但到了赋予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程度，是以他具有天然代表人民群众资格为交换条件的；实际上是利用这一概念对民意的操纵、利用。人民的神性成为毛泽东政治合法性的天道基础。

在宏观层面，文革只要不是处于急剧动荡时期，主导的政治理念仍然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集权模式。但这一指标，在当时基层政治生活的微观现实中具有极端重要性。[注 2]在那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非效率取向的价值秩序里，群众基础几乎成了评价人的唯一标准。它要求人从里（思想感情）到外（言行举止），都必须和大家打成一片，想大家所想，说大家所说，不表现出丝毫个性、个人见解，不提个人要求，跟所有人友好相处，让大家都把你当成自己人。在政治运动中是否能平安过关，晋级调薪、分房评优时能否榜上有名，全系于众口评鹭的好坏，全靠群众基础了。群众基础既是磨平个人意志和性格的磨床，又是能淘汰所有略有独立性、棱角的人的一把筛子。以致一位诗人写下“生活：网”这样的诗句。

该词具有极大的辐射力：群众专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极富文革特征的组织机构和观念，都是以它为基础，或有着复杂的衍生-逻辑关系。

但是，对何为“群众基础”历来充满了分歧、抗辩的声音：为文革辩护者认为它有群众基础，批斗走资派是草根阶层被压抑民意的表达方式；否定者认为它没有群众基础，尤其是把 1976 年四五运动作为“粉碎”四人帮的民意表达、合法性基础。曾有学者观察到毛泽东时代存在政治集权和地方分权并行不悖的现象，并指出这是邓小平时代以来改革成功的连续性基础（甘阳）。2000 年代，围绕群众基础出现了操纵选票暗箱操作、求助黑社会、封官贿民等现象、做法。

与之相邻、相关的词，还有“群众路线”、“群众关系”、“阶级基础”等。

[注 1]中国古代的类似表达，是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具体论证为：“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注 2]在实证上似乎没有得到直接印证：人民日报’ 49—97 数据库显示，该词的分布状况为年平均 1940 年代 1.36, 1950 年代 2.613, 1960 年代 1.958, 1970 年代 1.499, 1980 年代 2.059, 1990 年代 2.435。其分布虽有起伏，但并无明显差异；1950 年代和 1990 年代偏高一点。是否说明在这一点上，意识形态和政治现实之间有言行悖反的特征？如要肯定这样的认知，似乎需要更多材料、观察和论证做支撑。

（参考资料：沙林云《“谁说了算？”》，《红旗》杂志 1969 年第 2 期；《发展党员材料整理十大注意事项》，“党团建设”<http://www2.gliet.edu.cn/dept3/02/read.asp?id=241>；李仲春《“群众基础”析》，《人民日报》1999 年 12 月 24 日）

## 《毛泽东思想万岁》

著作名。毛泽东著作的一种出版类型。1966年到1969年间（高潮在1967年），一些红卫兵组织将他们搜集到的曾在过去报刊发表过的毛泽东论著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文稿、批示、批语等，编印成《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论著集。有的专收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革初期的指示、书信及谈话记录。被研究者称为“万岁本”。

其中多数篇目是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1—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毛泽东著作选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里所没有的。辑入文稿对普通读者来说，闻所未闻。故这类版本一问世便风靡一时，争相翻印。许多人为能读到大量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文稿（秘籍）感到欣喜，并以拥有为荣。

1966年5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以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来自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上的讲话）语录为依据，撰写了三论“造反有理”大字报。学校工作组以公开出版著作中没有这段毛主席语录相质疑，发生激烈对抗。毛泽东复信支持了红卫兵。8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段语录，成为风靡一时的口号（谱写成红极一时的语录歌），也实际上认可了使用非正式毛泽东论著的做法。于是，以未曾发表的毛泽东指示作为政治斗争中的支持依据，被各种群众组织广泛运用。成为一种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此后，中宣部等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瘫痪，中央文革小组“中央领导人”又在讲话中频频披露毛泽东“最新指示”，造成了毛泽东论著发布空前繁荣（相对读者）和出版的无政府主义（相对管理者）状态并存局面。

这些著作或来源于通过查抄或其他手段取得的中央内部文献；或来源于公开出版但未收入毛泽东著作集者。建国前在早期文化刊物和各解放区出版的报刊书籍（如《新青年》、《湘江评论》、延安《解放日报》）中曾发表的一批毛泽东论著，和1949年后在《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中公开发表但未收入毛泽东著作集的言论、文章、指示等；或来源于毛泽东的战友、亲友、故旧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的谈话及保存的有关书信（如与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等）；或来源于“文革”中报刊、文件上新公布的及有关领导人传达、披露的毛泽东谈话和“最新最高”指示、批示等。

它们可分五种类型：综合性选集（如《毛主席文选》、《毛主席言论集》、《毛主席著作编外》、《重要文献》）；专题性选集（如《毛主席教育文选》）；书信选集（如《毛主席书信选集》）；手迹选集（影响较大的是1967年2月郑州出版的《毛主席手书选集》）；合著集（如《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首长讲话》）。

编者以各地大专院校、中学红卫兵居多，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外交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军事学院、成都地质学院、河北纺织工学院、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南昌市第十八中学等，均编印过这类版本。还有一些机关、企业、科研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如国家科委、外文局、北京电影制片厂、贵州省第一轻工业厅等。军队系统除军事院校外，极少编印这类书籍。

由于编者多非专业人员，缺乏专门编辑训练和必要常识，造成一些问题。如编选体例比较杂乱，多数版本按时间顺序编排，没有归类排列，随意性较大；个别版本收录的少数文稿，没弄清准确的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只有篇名，未标出著述日期；有的版本由于多次辗转传抄，个别文字已不准确。由于编辑出版时文



稿中提到的一些领导人已被打倒，姓名在编印时便被“×××”代替，或在姓后面加上“××”。

各种版本所收篇目差异颇大，有的版本收入的篇目多达六百余篇（分为多卷），有的仅收十余篇，很少有两种版本收入的篇目完全相同的情况（翻印除外）。河南一位毛泽东著作收藏者马清学收集到的版本，大约有 300 多种。

1967 年 5 月至 11 月，中央就连续下发五个文件，严令禁止各地非法编印毛泽东著作，对已经编印出版的，要求各地回收上缴。理由是这类出版物违反“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都一律不许擅自刊登和印发”的规定；“不仅泄露了党的机密，而又差错很多”，极不严肃。1970 年 1 月至 4 月，西安在全市范围广泛开展了以清理文件、收缴非法印刷品为重点的群众性保密大检查，共收缴这类擅自印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和中央首长讲话的非法印刷品三十多万册和大量传单。

因此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没有收藏“万岁本”。

境外学者认为“万岁本”资料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撰写初衷，是对《毛泽东选集》（1—4 卷）的补遗，因而倍受他们青睐与重视。他们在搜集、编译和利用这批资料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收集最丰者为美国弗吉尼亚州奥克顿的中国资料研究中心于 80 年代初影印出版了《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全套 23 卷，共计 5500 页，这是英文版本中收入毛泽东著作最多的一种资料）。在研究著述方面，境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建国后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均把“万岁本”作为重要的依据加以引用。比较权威的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二卷）[注]引证达 187 处，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引证达 62 处（两书国内皆有译本）。

当年有的异端思想者（如杨小凯和他的朋友）就曾从这类出版物中汲取营养。“程德明专门注意毛泽东左的经济文化政策方面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而我却注意那些能用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会下令共产党停止组织活动和支持被共产党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

近年国内学者刘跃进撰著的《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一书，用二十多个页码篇幅，详细介绍了十多种“万岁本”。有关毛泽东研究和“文革”研究的专著中，亦有学者开始谨慎地引用“万岁本”的材料。在文物市场上已成为一个备受青睐、有利可图的收藏品种。2000 年代有人以调侃视角，编选毛泽东语录（真实版），就取材于这类出版物（因为是非正式出版物，就葆有毛泽东比较另类的一些个性和闻之解颐的粗口）。

[注]全书共三卷，国内未出齐。

（参考资料：李晓航《“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考略》，《党史研究资料》2002 年 04 月；杨小凯《联动分子》，浴火凤凰新闻网）

## 形势

名词。原意指事物发展的状况、趋势等，文革时特指对现实总体评价方面的政治判断。它悖离人们亲身的经历、认识，往往表现为政治权力的铁腕意志。在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判断面前，不能死心眼地简单运用实事求是的直观认识，

而必须紧跟上级精神，从政治角度（大局观、全局观等是关键词）来把握、理解的认知方式。对于在位从政者，昧着良心紧跟形势才是明哲保身之道。

源出毛泽东 1967 年 7 月到 9 月年巡视大江南北（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讲话，“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其时，造反夺权造成的秩序混乱、党政机关瘫痪，武斗和破坏，生产衰退，供应锐减，让人民生活不胜其扰。毛泽东此语承接为湖南农民运动辩护（“好得很”）的传统，凭借他的权威和魅力，乾纲独断，截断众流，笼统而武断地论证文革的合法性。从此“大好形势”、“形势大好”、“新形势”、“革命形势”，就成了文件里、报刊上、人们口头常用的口头禅、习用语。从而催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的荒诞歌曲。

1957 年反右以后，一时的肝胆相照换来贬斥、批斗、入狱、流放，人人噤若寒蝉，再也不能、不敢据实直言；通过 1958 年大跃进的放卫星打擂台闹剧，已经使人们学会形势的厉害，和如何顺应形势，全身自保。形势实际上就是三人成虎、众口铍金的指鹿为马。一种政治高压下口不应心的官场大话、空话、套话、假话，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认识上的制假贩假运动。既骗人（自保）也骗自己（内化）。人人心照不宣又人人都玩世不恭地言之凿凿。积淀成寡廉鲜耻的卑微人性和掩耳盗铃、蝇营狗苟的生存智慧。

上行下效，当时作文、发言，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本地形势、单位形势接连一片大好下来，已经成为一种穿靴戴帽的八股惯例。作文必写，每会必谈，是政治现实谎言重复千遍即真理的需要。说者姑妄言之，听者姑妄听之，彼此口、耳、心不应，并不以尴尬视之。只把它当作必须接受的一种指定仪式来看。——当然还有不少人，形势教育使他们对现实的肯定，已经内化为本能。

所以需要分析形势、认清形势，说明形势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地摆在那里的，有许多假象妨碍人们正确认识形势，不能从直观看到的那样简单认定，所以需要正确的观点指导人们去认识。分析、认清形势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关系到人们的立场、态度问题，关系到对政治任务的确立（究竟执行什么路线、遵循什么方针政策）和对我们工作的认识和信心（站到谁一边）。对具有科学理性和良知的人来说，认清形势是一种折磨、痛苦、背叛，对机会主义者来说则是投机钻营、投其所好的天赐良机。为了不干扰人们对形势的正确认识，对灾难等负面报道通常采取善意的屏蔽措施。形势还需要去跟上，不得落后形势，说明当时执行的年一些方针政策（如公安六条）常常打破既定的规矩（从内容安排到制定程序上），即使其合法性和有效性都没有得到证明，仍然需要坚定不移地去贯彻落实。否则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跟不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如果有人说你认不清、跟不上形势，千万别以为是小事，而可能是严厉的指控，你就要大祸临头了。

因此认清形势就成了普遍要求，那年头的形势报告也特别多。形势教育，端正认识，是当时政治学习的重要内容。而作为个人行为，对形势的肯定、阿谀，是政治态度是否端正的必要指标。哪怕再空洞、抽象，也必须坚持这样说。一旦翻过这个认知障碍的坎儿，“新形势”，“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一天等于二十年”，“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一片大好”、“空前大好”，美词谀语喷薄而出，什么样的肉麻话都敢腆着脸说，而且花样翻新，妙笔生花得出神入化。笔者当年亦曾循例做过多次这样的荒唐事。王小波把这样的言语行为戏称为“上话语捐”。透着“沉默的大多数”的悲悯、宽厚、冷静和绝望。

(参考资料：任立新《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 坚决照办》，《人民日报》1967.06.07；宣革群《谎言与现实》，《人民日报》1969.02.19；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世纪沙龙”)

## 梅花党

文革流传广泛的民间传说故事。亦称“三朵梅花”、“一张梅花图”。具体情节有多个版本，有的接近鬼故事，有的则呈现色情下流色彩，多数是反特故事的框架。往往随说故事人即兴发挥，随意增删、穿插一些人物、情节，有时这个故事可以连续讲好几个晚上；但基本框架都相差不大。

故事说，侦察员张强 1949 年前在重庆通过敌高级将领之女打进敌特内部，在其豪宅密室发现刻有三朵梅花的电台（或说墙上挂有梅花图）。线索当即被打断。这个梅花党是国民党的党中之党，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1965 年国民党元老、代总统李宗仁回归大陆，其妻郭德洁是梅花党（或说军统）核心人物，受派遣凭梅花戒指与潜伏在中共党内的特务联络。在机场王光美与郭拥抱，在宴会又主动与郭碰杯，郭明确知道暗号接上了，联络人是王光美。但郭目睹祖国伟大成就萌生背叛敌特、归顺人民政权念头，被王看破，并先下手为强用毒酒害死。[注]郭临终前将内情报告总理周恩来。侦察员张强在文革中继续追查梅花党案件，经历了医院停尸房惊险曲折后，与原敌军将领小姐不期而遇，艰难侦破敌情内幕。把王光美骗至公园擒获，敌特终被一网打尽。

这个故事嵌入了李宗仁回归大陆的历史事件，和王光美被诬陷的时代谣传，把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的革命激情、想象与虚幻的阶级斗争恐怖、高层政治内幕交织在一起，迎合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政治理念。这个荒诞的传说故事，在文革口头文学里属于革命与惊悚相结合的另类，填充了民众生活娱乐、文化需求的空白，印证并助长了民间以讹传讹的政治迷信。曾以手抄本形式传播。

张宝瑞据以编写过梅花党的系列故事，包括《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火葬场的秘密》、《一幅梅花图》、《金三角之谜》等。据张自述，初创时间约在 1971 年。2000 年代以文革手抄本名义，出现于图书市场。这个故事在一些网站（读书吧）上有连载。并与写《一双绣花鞋》（电影剧本《在茫茫的夜色背后》写于 1960 年代）的重庆作者况浩文出现过著作权之争。

被改编成 22 集反特公安剧《梅花档案》（北京茂志广告有限公司、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出品），由执导过《誓言无声》的毛卫宁导演，周杰（饰龙飞）、董勇（饰肖克）、苏瑾（饰南云）、海青（饰梅香）等影视明星加盟，2005 年初播出。

[注]历史事实中的郭死于乳腺癌。

(参考资料：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 1953 年版，P345-346；林炎《“梅花党”传说及其流毒》，载《南方周末》1999 年年 6 月 11 日第 10 版；张宝瑞《‘梅花档案’、‘一只绣花鞋’是如何诞生的？》，中华读书报 2004 年 11 月 3 日)

## 政治学习

名词。指称的不是作为学校教育的课程（文革中叫“政治”，以后有时叫“思想品德”，有时叫现代感强点的“公民教育”），而是企事业单位、学校、军队、农村、机构等政治工作的一种形式。即，集中一定时间，完成配合中心工作、政治形势的学习任务，使参与者的思想认识统一在官方宣传的口径上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中共进行社会动员、政治运动的组织形式。起源于19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私下俗称“洗澡”，西方的中国学、政治学者称“洗脑”）。[注]

一般安排在星期二、星期五（或星期三）的下午（这时就不办公），有时候也延续到晚上。不少于工作时间的10—25%。政治运动的高潮期间，也安排一些连续成片的时间，停下日常工作，脱产学习。适用于机关、文化单位、学校、工厂、军队、街道、农村一切单位。进入1960年代“突出政治”、文革时期，后一种情况就经常化了。政治学习被列入单位工作清单时，即使是经营企业在算政治账的指导思想下，成本也是可以任意透支的。

学习的文件，有报刊社论、时事报道或上级文件等指定的内容，也有自己单位针对实际选定的文章、毛泽东和马列的著作。先由指定的人读报、读文件，接着主持者启发性发言，再由群众围绕中心、联系实际讨论，自由发言，最后有主持者做总结。有时还要求写书面的新的体会，将这些内容集中刊出在学习专栏壁报上。一般都有统一的时间表、内容、应当达到的目标的安排，有对学习进展情况的汇报制度。年终总结，政治学习的次数、讨论的深入程度、书面心得体会的多寡、效果、经验，也是重要内容之一。

积极分子的“积极”，常常表现在发言踊跃，提交文字材料及时认真，勇于联系单位、自己的问题，敢于刺刀见红，上纲上线不露怯上。落后分子或四类分子（惑于参与者都是熟人，发言某种程度的松散、随意性，会议的非正式气氛等等因素）的发言，则有可能被列入思想动态（文革时称“阶级斗争新动向”）里，作为问题、材料积累起来，到运动中算总帐。有时的联系实际从提高思想认识演变为刺刀见红的批斗，就成了“引蛇出洞”式的自投罗网。这也是人们政治表现的舞台，组织考察的重要方面、依据。

政治学习的功能，主要是配合上级规定的运动，是意识形态灌输、思想工作的重要手段；有时也用于实现基层单位的特定目标。在政治运动的间歇期或低潮，安排了政治学习比学什么、效果怎样更重要。由于制度的经常性和学习内容的阶段性，当安排相对松弛时，千篇一律、乏善可陈的内容使人厌烦，有的领导也把它看成休息时间，放任职工自由活动，或移为用于做单位大扫除等事务性安排。或者自由发言离题万里，随便闲聊；或者成为传播小道消息、发牢骚的一个场所。政治学习形式大于内容，或干脆就是可有可无的形式。但谁也不敢懈怠。一旦这种情况被政敌抓住，就会成为挨批的钢鞭材料，陷于灭顶之灾。

直到2000年代政治学习仍是非常重要的议程，单位高管层（党组、党委）有中心学习组的设置，规定一个学习阶段不少于10周时间等。一些单位仍有周四下午政治学习不办公的习惯，受到批评。

[注]从“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情况看，“政治学习”1950年代分布最稠密，达到年平均5.20，文革的1960年代仅1.36、1970年代1.29。也许是因为1950年代是政治学习制度的草创期，强调是推行的需要；到文革时则已经过于日常化、制度化以致它已经成为空气和氧那样的存在，反倒不必时时事事强调了。就像吃喝拉撒睡不必天天讲一样。

(参考资料: 赵克然《从轻政治到重政治》,《人民日报》1966年4月14日; 文志传《“政治学习”必须改革》, 人民网 2002年7月22日)

## 语录歌

以毛泽东语录为歌词内容谱写的歌曲。1966年9月30日、10月12日、10月25日《人民日报》连续以整版篇幅登载这样的作品后, 同类歌曲大量涌现。

代表作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争取胜利》、《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也称《我们共产党人》)、《造反有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也称《世界是你们的》)等。最初是“《解放军报》编辑部和《解放军歌曲》编辑部, 组织部队的音乐工作者为《老三篇》的重要语录谱写了歌曲”。作曲家李劫夫是语录歌作者中产量最高的一位。他曾发过宏愿, 有生之年要把所有毛泽东语录谱成歌曲。据估计, 略有1000余段毛泽东语录被谱成了语录歌。

这类歌曲的特点是: 大众化。旋律简单, 节奏容易上口, 音域较窄, 宜于多数未受专门训练的群众演唱; 格调高昂, 鼓舞人心。[注1]但由于语录的论述语式不适合歌曲的节奏音律特点, 却又不容许删削, 而只能迁就, 造成语录歌象念经一样, 兴味索然。纵使作曲家再有才华也徒呼奈何。部队作曲家唐诃曾给《为人民服务》全文谱了弹唱曲(其中只有两句话用“念白”表现)。比较有特点的语录歌引用民间音乐素材取得一定效果(如《我们共产党人》)。最长的语录歌是“老三篇”全篇大联唱, 能凑成整整一台演唱晚会, 最短的只有“要斗私批修”五个字, 仍然在同一速度、调性、曲式中, 唱足三分钟。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是由阿尔巴尼亚作曲家从毛泽东于1966年10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节选出来的一段话谱成。[注2]连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创作、演出的歌颂义和团运动大型歌历史舞剧《红灯照》也异想天开地配上了一首语录歌: “中国人民, 百年以来, 不屈不挠, 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 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 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一时间, 会议前后, 早请示晚汇报仪式上, 游行行列中, 广播电台和高音喇叭里, 车站码头, 工矿商店, 军营机关, 农村田野……到处都是语录歌的歌声。中央音乐学院的负责接待串联红卫兵工作的师生还主动有计划地教外地同学唱毛主席语录歌。1966年底安徽省合肥市工人举行了一次“毛主席语录歌曲演唱大会”。阿尔巴尼亚、越南等盟国和尼泊尔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来访者也加入了学唱《语录歌》的行列。成为枯燥呆板的天天读中略显活泼的调节剂。据说, 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最爱唱毛主席语录歌。唱起毛主席语录歌, 就想起毛主席。唱起毛主席语录歌, 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唱起毛主席语录歌, 就更觉得毛主席在我们身边。越唱毛主席语录歌, 就越是心红眼亮, 斗志昂扬。”那时男女老少几乎每人都能唱几首语录歌。1971年“9·13事件”林彪集团在政治舞台败落出局以后, 语录歌亦逐渐消失。

语录歌、红卫兵绘画、样板戏, 被并称为文革艺术的三大代表性样式。语录歌当时被灌制成大量唱片, 主要是密纹慢转的聚乙烯软片。据桑晔90年代初报道, 他本人收藏有近200张, 日本一家研究机构收藏有约400张语录歌唱片; 即使这个数字, 也低于当年中国唱片公司的发行目录(桑晔《残阳如血·文物也是书》, 出处参见“毛主席像章”的注)。

2003年中国唱片总公司制作《毛泽东和我们》选取并重新翻唱了22首语录歌，个别歌曲加进了说唱方式。2000年代有一些网站能找到语录歌的收听、下载（如“墨闲居”文革专题 <http://go.6to23.com/moxianju/his/wenge/yulu/>、“战地新歌” <http://www.zdxg.com/yuluge.shtml>、“难忘的老歌” <http://zbhcjx.com/wg/laoge/2003/shiciyulu.htm>等）。

[注1]研究者评论说，语录歌在作曲上的特点是“尽量将曲调规范化、对称化，在旋律上力求简单而有效果，节拍、调式上极度贫乏”。

[注2]：歌词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牢固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参考资料：编者按《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5日；本报讯《纵情高唱语录歌 心中升起红太阳》，《人民日报》1966年12月19日；桑晔《残阳如血·文物也是书》，载《读书》1991年11期；何蜀《“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

## 上挂下联

动宾结构的联合词组。展开政治运动、抓阶级斗争、进行大批判的一种方法、认识模式：中央、北京有什么动向、典型，在外省和各级基层就要找到与之对应的人和事，挂起钩来，给予推广、落实上级精神、对照批判。例如北京揪出了“三家村”，各地也要揪出自己当地的“三家村”，马识途、李亚群、沙汀就是四川的“三家村”；“二月逆流”揪出了谭震林，在武汉就要把陈再道等驻军负责人打成“武老谭”（武汉的谭震林）。

这是哲学上普遍联系的观点，政治上的路线斗争观点在阶级斗争、大批判问题上的具体应用。这种观点认定：国内的阶级斗争是国际上的阶级斗争的反应，党内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应，现实的阶级斗争是历史的阶级斗争的反应，中央与各部、省市县基层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组织人事、思想乃至世界观上的关联。因此要纠正、批判一种政策倾向、做法、思想，就要寻找它的内外上下联系和历史根源，不能就事论事；就事论事只能解决局部问题、眼前问题，无法除恶务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论搞什么斗争，批什么倾向，都要自上而下拿着框框去照套，处处找靶子，层层抓典型，刮一种风，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这种牵强附会、主观臆断、以势压人的观点、做法，已经成了不容质疑的运动教条。谁要不这样看、这样做，就是右倾。

这种人为的上挂下联，有的是简单的比附，带有攀比的色彩，有的还要求在上下之间，捕风捉影地寻找莫须有的组织、人事联系。以这种观点看来，有“黑店”必有“分店”，有“总后台”必有“代理人”，层层查、层层批、层层揪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以“上有坏者，下必甚焉”的逻辑，层层加温，越搞到下面越凶。同过事的，就是“黑帮”；有熟人、朋友、师生、同乡联系的，就是“集团”；是上下级关系的，就是“黑后台”、“黑爪牙”；没有直接联系的，也可以定个“代言人”、“应声虫”、“孝子贤孙”。寻找历史根源，就是查三代，看家庭出身、历次运动有无问题，稍有差池就要联系起来加以联想，听见风吹就是草动，看到杯弓就是蛇影，捕风捉影，无限夸大。像从枣树上打枣子一样，有理无理三竿子，

总有簌簌掉下来的。从时间上看，这种方法不始于文革，却在文革中达至登峰造极，到了随心所欲、指鹿为马的地步。使貌似庄严、实则狰狞残忍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彻底变成了荒唐可笑的闹剧。中南局的特嫌案就是从抄家的照片着眼，由此及彼，上挂下联，上至叶剑英，下至沈容父亲（曾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后方勤务部特别党部书记、上海市政府的人事处长，后弃政从商），从北京到广州、到香港。把这个子虚乌有“特务网”越编越像真的，越编越大。〔注〕成为文革大量冤假错案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因。

即使降格以求，次一等的也要有的放矢开展批判，要求矛盾揭露得具体，把新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的种种有代表性的表现揭露出来，抓住活思想不放松，肃清自己头脑中的一股流毒，让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看得见，摸得着，常批常新，才能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干部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

11届3中全会以后检讨过去历次运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之一，否定了路线斗争、上挂下联的方法。在纠正华国锋的错误影响时，中共中央曾要求各级组织一概不要“上挂下联”，追究责任。

〔注〕有则笑话说，批判“二月逆流”时，上挂下联一直联到农村生产队。有位老队长被戴上“二月逆流小爬虫”帽子，批来斗去。他怎么也想不通，回家对老伴说：他们说我“二月犁牛”，二月间我明明在修水库，没有去犁牛嘛。

（参考资料：河南省濮阳县革委会、人武部通讯组《怎样把革命大批判引向步步深入？》，《人民日报》1969年8月21日；张黎洲《从“联”、“套”法中解放出来》，《人民日报》1979年8月7日；凤凰网“口述历史”《中南局文革第一大案始末》，2005年1月19日）

## 大串连

名词。口语里也简称“串连”。特指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初，以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或个人为主体，在全国范围内免费乘车（或步行）、接待（食宿），互相串连、交流和宣传造反的活动。是毛泽东战略安排中发动文革的社会动员措施。

聂元梓大字报向全国播出后，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率先响应，向工作组造反。受到压抑的外地造反者奔赴北京大学取经，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状、求援，7月29日到8月12日就有3.6万个单位的71万人次到北大。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8届11届全会制定并公布的“十六条”，先后造成的强大政治冲击波，仍未打破各地党政机关领导人对文革抵触、控制的态度、做法。“8·18”、“8·31”毛泽东两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和外地来京师生，更加公开了他对红卫兵的肯定、支持，也以个人的权威、魅力吸引着各地青年学生源源不断涌向北京——渴望得到毛泽东接见，渴望带回不同于地方当权派压制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声音。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员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组织外地大中学生学生代表和职工代表来京参观、学习运动经验，交通、生活补贴由国家财政开支。坐车、乘船不要票，吃饭（北京伙食补贴每天5毛钱）、住宿不花钱；各大中小学校的教室宿舍、机关单位、工厂房屋、部队营房、体育场

馆都腾出来开设接待站。各地政府设有专门的文化革命接待室和外地师生接待站，统筹负责这一工作的安排、供应、协调。与此同时，北京红卫兵南下北上去各地煽风点火，各地红卫兵间互相声援，“造反是一家”，到处设立联络站，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从“破四旧”开始，发展为强烈的政治行为，达到了毛泽东预期的“天下大乱”。

串连从单一的以北京为目的地，到开始向南京、上海、成都、武汉、广州、长沙其他地方辐射分流。出现部分工人、干部离开岗位参加大串连，不少人乘此机会探亲访友、游山玩水。引发了全国范围持续不衰的客运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火车超载均达极限，限载 100 多人的火车车厢装载到 200—300 人，茶几上、行李架上、座椅下、椅背上、过道里挤满了乘客，连厕所里、车顶上都有人。铁道部增发了红卫兵专列，仍然无济于事。步行串连、徒步长征就是在这样的窘况下提出来的一种变通、应急办法。

参观革命圣地的目的地多为延安、井冈山、韶山等。无规则流动的红卫兵有极大的盲目性、偶发性，他们往往突然蜂拥而至，使接待地井冈山高峰时达到 10 万人。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闭馆时间推迟到 23 点 30 分，其所辖 17 个接待站仅炊事员就有近千名，先后接待红卫兵 100 多万人，耗资 250 万余元。由于人力物力等接待措施跟不上，红卫兵在冰天雪地里冻饿甚至紧急动用军用直升飞机空投救援，仍出现过各种人身伤亡事故。

串连使学生红卫兵脱离日常生活角色和行为规范，进入自己确定行动目标的无政府状态，虚假的自由、崇高感，刺激了革命造反、打破修正主义党政体系的想象。与毛泽东 1966 年 6 月 10 日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的原初设想相一致。这一举措，造成了原有运转秩序的全国性瘫痪。

1966 年 11 月中央文革认为借串连发动文革的预定目的已经达到，回原地、原校搞运动是当务之急。11 月 10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倡议书》。同月 29 日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967 年 2 月 3 日、3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两次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各地接待站陆续撤销，合法串连到此截止。其余波亦逐渐减少以至结束；最晚的一直延续到了 1968 年。

部分越界到越南参加中国援越部队、到缅甸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被称为“国际大串连”。有秦晓鹰《偷越国境的红卫兵》、黄尧《最后的音符》志其事。

（参考资料：江沛《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燕帆《大串连——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旅游》，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 男女关系

名词。含贬义。常与“乱搞”相连、搭配使用；有时也直接用“乱搞”代之。一般指婚姻外（包括未婚和已婚者）男女间含有性色彩的接触。但由于词义的模糊，外延时而宽时而窄，弹性较大。与“作风问题”、“生活作风”等词语义相近；只是它比较口语化，不如“作风问题”、“生活作风”来得正式。在口语组成形式上虽然省略了“不正当”的修饰定语，实际上还是把它当成“不正当男女关系”来使用。用后文革时期的语言，可以把它叫做“婚外情”、“婚外恋”。在当时，几乎就是“道德败坏”的同义语。



已婚者的暧昧关系、偷情叫“男女关系”（较少），未婚男女同学、同事、街坊、朋友间的接触，以婚姻为预设目标的谈恋爱（有亲昵关系的）叫“男女关系”（概率较大），一般交往（无亲昵关系的）也叫“男女关系”的（概率较小）。文革文化的禁欲色彩，要求人们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思想革命化、行动军事化，抹煞、取消私人生活。往往是把后两种正常或基本正常的交往，无事生非、捕风捉影地说成非正常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男女关系。与鲁迅先生所说看见男女交往就联想到性交的国民性心态，如出一辙。把纯粹属于隐私的私人生活置于公共生活范围，许诺无关第三者和社会组织都可以干涉的正当性。因为对性的控制，已经被纳入了整个社会控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实当年有相当一部分婚外情是还没有涉及到性的，也即是说还不是非婚性关系，仅仅是一种互相倾慕，心心相印、倾心相爱的，不是说发展到性关系就怎么样了，而是往往没有来得及，或在强大恐惧的心理压力下渴望而害怕、逃避男欢女爱，就被当作了非婚性关系对待。张洁成名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所写的就是那样一个年代的柏拉图式悲凉爱情故事（而在小说发表的当时却被理解为崇高）。

在道德化规范、评价标准被滥用的时代，男女关系是一种使当事者受到蔑视和经常性批评、批判的相当严重的指摘，多半会身败名裂、终结当事人的政治生命，甚至是可能直接导致行政、刑事处罚的罪名。男女关系还是整倒对手的最好题材，往往造成“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果，但被审查者就给废了。[注 1]

在人们的想象中，即使以婚姻为目标的男女接触，也应该在公众视野循序渐进公开进行，虽然单调寡味但很正确。男女关系作为一种被渲染、强化的禁忌，就是要防范性接触（走私）在公众视野之外发生。[注 2]秩序才安全。

为平淡寂寞的庸常生活抹上一道奇异绚丽色彩的，正是那些沉湎于男女关系的痴男怨女们。他们敢于蔑视世俗法度，忠于自己的直觉、感情、身体，在无性的人间张扬地、挥霍地宣泄情欲，使周围处于萎缩状态的人们感到了自卑、被侵犯，于是他们愤怒，妒忌，不能让得到性的馈赠的当事人再收获安宁，于是他们扑上去，用脏水溅泼异己的犯禁者，让犯禁者被兽性化，蒙上不道德的恶名。他们被戴高帽游街，被挂上破鞋挨批判。至于那些冒犯军婚（无论是否两情相悦）或利用权力祸害女知青的，更要遭到法律的惩办。在此过程中人们得到的补偿是，既变态娱乐地释放了利比多，又在犯禁者的蒙辱里多少弥补回他们在性压抑的黑暗里受到的损失。

王小波《黄金时代》描写的王二和陈清扬“搞破鞋”故事，就告诉人们，对身体和性的禁锢（扭曲）如何成为对人的禁锢（扭曲）的一部分，以及主人公怎样从这禁锢中挣脱出来成为他们自己。

后文革时代仍然经过漫长的转变，人们才学会把两性关系当作私人事务，而与他人无关。婚外情再终于被放置在组织惩罚和法律惩罚之外。

[注 1] 1979 年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一四四团医院护士蒋爱珍被人（出于派性）诬陷与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张国政乱搞男女关系，受到组织审查，大字报揭批，8 月 29 日枪杀 3 人。

[注 2] 最极端的表现是，林彪曾在政治局会议给所有在场者出示过一份书面证明：“叶群结婚时是处女。”

（参考资料：本报讯《蒋爱珍为什么杀人？》，《人民日报》1979 年 10 月 20

日；lulu2004www《知青生活与性》，“考研论坛”；《悲哀的“破鞋”——王小波“黄金时代”人物形象分析》）

## 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中国卫星工程于 1965 年启动 5 年后，1970 年 4 月 24 日 21 时 35 分 44.7 秒长征 1 号运载火箭携带东方红 1 号卫星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

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 439 公里、最远点 2384 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 68.5 度，绕地球一周 114 分钟。卫星重 173 公斤，用 20009 兆周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卫星运行情况良好，各种仪器工作正常，遥测仪器不断发回各种数据。

报道说，这次发射是“一次成功”，它是“我国广大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响应毛泽东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我国发展空间技术的一个良好开端”。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 5 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国航天活动的序幕从此拉开。又一次激起了类似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举国狂欢，发号外，游行，庆祝。这次发射深层暗含的意义还有，中国已成为拥有远程火箭发射能力的核大国，扩大了自己在国际政治舞台和核裁军问题上的发言权。取得了军事战略和政治上的双重收获。直接的积极影响是，在分裂的社会生活里，注入了有利于人们认同现实政治的凝聚力、润滑剂，一定程度缓解、延迟了认同危机。

负责这一工作的有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发射基地司令李福泽。当年负责运载火箭发射点火操纵员的胡世祥 1990 年代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

1975 年 11 月 26 日，首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3 天后顺利返回，我国成为世界上第 3 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到 2005 年，我国成功研制并发射了 60 多颗人造地球卫星和 5 艘“神舟”号飞船，初步形成了 4 个卫星系列（返回式遥感卫星系列、“东方红”通信广播卫星系列、“风云”气象卫星系列和“实践”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系列），完成由试验卫星向应用型卫星的转化。2003 年 10 月 16 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宣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了新阶段。

（参考资料：《新中国纪事 1949—198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P477；孙来燕《坚持科学发展观 铸造航天新辉煌——纪念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 35 周年》，“国家航天局” 2005-04-29）

## 查三代

文革强调、贯彻阶级路线时，考察人的家庭出身的一种极左做法。即家庭出身（成份）的认定、填写，要往上追到祖父那代上去。这不但是红卫兵的自发主张，也得到中共高层的提示、许可、支持。[注 1]这已经超出了土改划成份的政策界线：以本人和家庭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为准。越代追究家庭出身，作为论定人的政治态度、阶级立场的依据，已经带有封建色彩的血统论倾向。但在官方舆论机器上，仍然把“动不动就查三代”看成“随意扩大范围”的“左”的偏向。

中国古代讲究出身门第由来已久。如下级初次见上司，学生初次拜见老师，就要自报三代。1932年毛泽东领导的江西瑞金云集地区查田，把混进中共基层支部和政权的地主分子清查了出来，他们利用职权包庇的地主富农分子也经群众揭发而重新划定了阶级成分。当时就有查三代、甚至查四代的做法。[注2]中共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三查三整”，就把“查阶级”摆在其他两查“查思想”、“查作风”前头。保密工作（公安、国防科研、军事工业）的从业者，政治审查的查三代始于1950年代。

文革极大地普及了查三代的做法。其指导思想，是务求严格，穷本尽源，一追到底。查的具体操作方法，是自报与组织调查相结合。自报出身分口头报和填表两种，组织调查就是内查外调相结合。自报出身就要报到祖父那一代（一些人连祖父的面也没有见过）。外调就要派专人到你所在的街道、居民小组、派出所、曾经工作过的单位甚至原籍去查，翻阅档案、查问知情人。在具体掌握上，不同环境还是有不同的尺度。如果在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成堆的地方，尺度就宽一点，只要与工农沾边就行；如果在工农出身主导的地方，就严格一些，查得一丝不苟，祖上但凡有人“阔”过就揪住不放，不容一个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滑过。如果有人硬要与人过不去，就会直系里查不出问题，查旁系——专看“九族”、“三代”里有没有“地、富、反、坏、右”，有没有“海外关系”。

查出是黑五类的，轻则收进学习班，挂黑牌、缝白条（在衣服上）注明成份，免得混淆了阶级阵线。后果严重的有给批斗、推打，活活打死的。两派辩论前的必要程序是双方主辩自报成份，如果不是红五类的，或出身血统纯度差一点的，还没有开讲就已经低下去一头，往往被揪住软肋穷追猛打，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哪怕父母是革命干部，但爷爷、姥爷的成分不好，也不能参加红卫兵。

党员、干部和从事保密工作者的婚恋对象，必须报告组织审查。结婚更得查三代，最后要有党组织批准，叫“对同志负责任”。为了改变不利处境，也有人隐瞒历史以争取较好的宽松对待。那时出身职员（伸缩性较大）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

直到文革后这种查三代的做法，方得到根本改变。1978年招生制度改革，不用“查三代”，而是择优录取了。让许多文革被拒于大学校门以外的黑五类子女才有了求学机会。黑五类、剥削阶级的成份也在陆续摘帽、改正当中。入伍、入党、提干的出身限制被大致打破。

在日本政府工作，事关官员升迁也要查三代，看家世血统、配偶是否纯正。如果与外夷通婚，就要受影响。韩国调查亲日历史，把与日本合作的“韩奸”、“创氏改名”发起人、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人、当过少尉以上日本军警的人，都列入被调查和追究的对象。并编纂《亲日人名录》、《亲日辞典》，收录亲日的人与事。对这项工作的正当性，韩国朝野和各界围绕着调查形式、内容、对象等诸多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

[注1]周恩来父亲是小职员，祖父是封建官僚，所以他填的“成份”是“封建官僚”。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说，看父亲你可以填“职员”，周恩来答：“我才不呢，应当查三代”。

[注2]用查三代的办法查阶级，以致将贫、雇农、红军家属祖上曾经是被当做现实的地主、富农看待。模糊了阶级界限、特别是富农与中农、富裕中农的界限，使打击面过宽。缺乏“科学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缺乏农村社会调查，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

(参考资料: 张敏《遇罗克和他的人民》; 北京部队生产建设部队某部党委《认真贯彻落实党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人民日报》1972年10月8日; 张凯峰《土地改革与中国农村政权》,《二十一世纪》2004年九月号; 高王凌《土地改革——“改天换地”的社会变动》,“香港中文大学”“文章选刊”[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740](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740);《月是故乡明》,“白鹿书院”<http://www.oklink.net/00/0213/moon/015.htm>)

## 《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著作名。1967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红旗》杂志1967年第16期据新华社通稿转载)。据考证,此语出自林彪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也简称为“大树特树”。

1967年7、8月,总参谋部政治部接受军委四人小组写作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的任务,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文章送给在外地作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期间联络员的杨成武读后,转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陈伯达通看、修改该文后,认为应由杨成武署名发表。[注1]虽经杨成武提出异议,叶群又以电话通知他,林彪坚持应用杨的名义发表。杨成武这才出于服从、接受成命,以他的名义发表。

在时尚[注2]使然的情势下,该文起了锦上添花(也有说画蛇添足)的作用。

该文在《人民日报》揭载后,给当时盛行的造神运动火上浇油,推动极大。毛泽东却对此进行了多次严厉批评:“标题就是错的,是形而上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写人的绝对权威”,是“要执行奴隶主义”。“全党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1967年12月17日毛泽东又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是权威都是相对的”;“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

细品这些批示言在此而意在彼,不象单对杨文而发,与其说是就事论事的战术性反弹,不如说是论理性的一般辩驳。其中可能包含了毛泽东更为广泛的某种战略性命意——以貌似宕开闲笔预作将来为造神降温的伏笔。1971年8月30日毛泽东南巡(九一三前夜)在长沙的谈话就再次提到该文,说“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锋芒是指向林彪的(着眼于政治而非理论)。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陈伯达、林彪等都把该文列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作为对打倒杨成武的合理化解释。“大树特树”文章虽然被批判了,但批判并未公开进行。“大树特树”思潮实际上仍然盛行了很多年。

文革后的清算,除了延续毛泽东的政治批判思路外,还指控大树特树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宗教化。

[注1]杨当时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文章由他署名,对外有暗喻声音是来自军队的用意。

[注2]《人民日报》1967年10月1日刊载两报一刊国庆社论(两报一刊社论的首次亮相)《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成立十八周年》指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我们取得一切胜利最根本的保证。我们必须大树特树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坚决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

（参考资料：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

## 揪斗

动词。流行于文革初期。对在群众性集会上向被批判者施虐的一整套做法的称呼。它与批斗相似，都是批判加斗争，但揪斗的暴力色彩更突出、更直接、更血腥。

被揪斗者，从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等牛鬼蛇神，到走资派、对立派的战败者，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军警宪特等）、现行反革命（呼错、写错口号，说错话，亵渎领袖画像、红宝书类圣物等偶发事件引起）。揪斗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

揪的务虚的方面是“文斗”，揪住不放，蛮不讲理，不是你也是你。抓住只言片语、远近社会关系、一个动作眼神，鸡毛蒜皮（即俗称揪小辫子），都要索隐出微言大义，不要逻辑、因果关系，上纲上线，从不满足现实，一直要上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才肯罢手；甚至可以捕风捉影，自由联想，牵强附会，无中生有，一口咬定，不容分辩。一阵阵强令坦白，稍有迟疑，则会场之上“打倒”口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证据的搜罗上，通过背靠背揭发、当事人写材料，宁枉勿纵，风闻也当铁证；通过抄家，举凡日记信件、旧时代照片、金银首饰、文物、古旧字画、中外文学名著、西装、旗袍……都可以拿来作为“四旧”，渴望“复辟”的罪证。其核心任务是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挖出阶级斗争新动向。既是攻心、诛心的批斗，令被揪斗者处于大行细节、过去现在无所遁形的恐惧，又为升级为“武”的阶段做准备。

揪的务实的方面是“武斗”，施与者没有法律和良知的任何禁忌。具体做法，包括强迫给被批斗者戴高帽子，挂牌子，脸上涂墨汁，剃阴阳头，站高凳，罚跪，揪头发，喷气式，用铜头皮带殴打，身上贴大字报，游街……人格凌辱和肉体摧残并举。揪斗王光美还强迫其穿上出访印尼的服装、帽子、戴上项链。批斗的场所，有本单位的大小会，有本系统的大会或省、市一级的广场万人大会。揪斗者的理由，是通过触及皮肉来触及灵魂。处于边缘、不够揪斗标准的，或者已经被作过主要斗争对象、轮到下一个时的，也要陪斗。

级别最高的揪斗是1967年4月10日在中南海揪斗刘少奇。省市一级的走资派，还被当作稀有资源，轮流揪斗，在群众组织之间借来借去；约定批斗时间，按时归还。连关押在监狱里也不能幸免（斗完归监）。关系好的先借，疏远的后借或不借。掌握了走资派的出借权，就掌握了革命、正统的王牌，掌握了话语权，说话就粗声大气。因此也有为抢夺走资派而引起武斗的。高层民主人士因关乎统战政策、对外形象，得到特别保护，采取派军人在住宅站岗等措施。高层官员也被藏到军队所在地、医院等处保护。但这种保护多数只能持续一段时间。

有病的被揪斗者即使因高血压发作、腰肌劳损无法站立，只要没有倒下都必须带病坚持，才是态度端正。被批斗者中不少人因看不到希望，无法忍受凌辱而

自杀，如老舍、傅雷等。也有自杀未遂者，日子更难过（对抗党和人民）。

揪斗者不但不负法律责任，随意呵斥打骂，打骂越狠越革命，像对旧社会的地主恶霸一样。而且毫无愧疚之意，其逻辑是敌人不是人，他们的死“自绝于党和人民”，“死有余辜”。革命的正义感，使批斗者拥有致死人命的豁免权，超越于超阶级的腐朽的人性、人道之上。

据说揪斗也有指标的。如果批斗表现不积极，该批不批者（造反派、群众说了算）肯定会祸及自身，被当成右倾来批评，乃至揪斗。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曾规定，不搞政治运动，更不允许搞“大民主”，严禁揪斗、严禁人身侮辱和人身迫害。

（参考资料：孔庆东《口号万岁·跟父亲蹲牛棚》，华龄出版社 2004 年版；楚风《平凡的家史·战斗中的繁荣》，“八斗文学”<http://www.8dou.net/html/library/13707/>）

## 反动标语

名词。口语里简称“反标”。指称与现行政治观点、政策相异、相对抗的标语。如：打倒中央、地方的政治领导人（“恶毒攻击”）；表达对土地的要求，呼吁单干、包产到户，拥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等等。但也有相当多是污损有关领袖人物的文字和图像，或在上面对叉，而被划归反动标语案件的。

1967 年 1 月 13 日颁布的“公安六条”把书写反动标语列入“应当依法惩办”的“现行反革命行为”。反对中央文革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后来被扩大列入反革命范围。即使因意见不同书写打倒中央文革等口号的，也是反动标语。

发现反标（多为“打倒毛主席”），就要作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敌情），层层上报，组织保卫、治安人员（单位）和公安民警，进行日夜连轴转的大规模清查；被限期破案。常有涂鸦留痕的厕所是“反标”的高发地点。[注 1]从笔迹、纸张等线索入手辨认、查找疑犯，按成分、政治表现、作案时间等条件排队逐一甄别。让嫌疑范围的人留下笔迹，以供比对、排查。如果“反标”是剪贴而成，就要寻找废弃报纸或其他印制品残留物。群众办案和职能部门相结合。追查时确定了嫌疑对象以后，限制行动自由、长时间连续提审、讹诈诱供、批斗、假枪毙等逼供信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注 2]有人因为复述“反标”内容而被当成呼喊书写罪论处。有人被仇家搜集手迹剪贴成“反标”。有人受不了批斗、毒打就承认书写“反标”。有人在对追查、批斗的恐惧中自杀。

虽然有些“反标”仅仅是出于精神紧张、疲劳而误写，但无论由于主观故意（恶作剧）或客观过失的原因，都要被视为预谋作案，课以严厉的处分：批斗、戴帽子、监督劳动直至判处徒刑（5 年到 20 年）。

据长春市南关区侦破“反标”案件的办案人员 1970 年 5 月 26 日的记录，从 1967 年 4 月 18 日算起，到 1970 年 5 月，共发生“反标”案 704 起。其中 1967 年 130 起，1968 年 252 起，1969 年 257 起，1970 年 1 至 5 月 65 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在“一打三反”的 1970 年，由于加大了打击的力度，趋势有所减弱。共破获 266 起，成年人书写反标者 19 起；青少年 232 起，[注 3]对象不清 15 起。破案率不足 38%。

每当出现反标，就会引起所有相关人的紧张，害怕如果查无线索，说不定会有灾难降临自己头上，被揪出来顶缸。清查过去便成了人们闲谈议论的话题，幸

灾乐祸着又躲过了一劫——又给贫乏无趣的生活增加了一点谈资、“佐料”。更有神经过敏，能从人民币或“黄金叶”牌香烟商标的叶子脉络中看出反动标语，从描绘丰收油画的麦浪里看出“蒋介石万岁”的阶级斗争积极分子。在当时哄传为新闻。人人处于莫名的兴奋和期待中：“我能抓到‘反标’吗？”

[注 1] 从此一现象看，一些反标其实是恶作剧、随机宣泄性质的顽童作品，并无政治上的故意。

[注 2]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中《八岁的死刑陪绑者》，写的就是追查反动标语的故事。

[注 3] 青少年处于青春期的情绪不稳定状态下，容易用极端反社会行为发泄心理郁结，并不带有明确、自觉的政治诉求。

( 参 考 资 料 : 李 梧 桐 《 不 堪 回 首 》 ,  
[http://www.89890.com/Article/art/wt/A/200410/32453\\_11.html](http://www.89890.com/Article/art/wt/A/200410/32453_11.html); 姜东平《文革时期的特殊教育》，《文史精华》2005 年第 4 期)

## 防空洞

1960—1970 年代以备战、防空为目的，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挖掘的地下防空体系。

防空洞挖掘，在中国现代始于抗日战争。但大规模普及是从 1960 年代中期开始，基于对国际形势的严重估计，毛泽东强调突出备战问题，要准备粮食、布匹，挖防空洞、修工事。1969 年 8 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担任该组组长；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成立各级人防领导小组，在全国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于是人防工程规模在已有的基础上迅速扩大，人防工程的规格不断提高。1972 年 1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国家决定每年用 6 亿元来搞人防工程建设，其中，4 亿元由国家财政经费中支出，另外 2 亿元分别由地方自筹和集体企业自筹。

挖掘防空洞的指导思想是：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和“三防”（防原子武器、防化学武器、防生物武器）。除了青壮基干民兵被组织参加挖洞，一些黑五类、牛鬼蛇神也被强制参加惩罚性劳动改造，每天十几小时高强度的打炮眼、爆破、除渣。机关干部参加劳动，也有安排挖防空洞的。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把挖洞作为中小学生学习前教育和劳动课的内容：上午军训，下午挖防空洞，过了四周才上课。不少市民下班之后拿着自家工具，自发地挖防空洞，每天挖到晚上 11 点多才休息。各地还组织了防空知识的群众性普及教育，并举行大规模防空演习。

10 年努力收获与苦涩并存。北京防空洞连绵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城：距地面八米，最深处可达 10 多米，宽 2 米，全长 30 多公里，可容纳 30 多万人；空间布局上有沟通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直到西山的秘密通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防空工事。从毛家湾入口进入的“769”毛泽东遗体保护室（遗体处理的临时存放地）原来是某医院的地下手术室，设施完善。就是这个地下城的组成部分。复杂的防空洞路网，能使初涉者迷路。但亦有不少防空洞因地理位置不佳、工程质量较差、设计不合理等原因，被废弃成为负效建设。

迷阵般的防空洞路网，作为大规模群众运动成果的庞大物质存在也反向强化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让人们切身感到帝国主义侵略、国际阶级斗争巨大威胁的栩栩如生、迫在眉睫。激发了当时人们的战争想象和同仇敌忾的亲政府情绪。个别被当作牛鬼蛇神的关押场所。偶尔成为年轻恋人约会时避人耳目的“老地方”。民间故事讲述者常把阴暗、潮湿的防空洞作为包括鬼故事在内的惊悚故事的背景舞台，在娱乐中微弱地回应着阶级斗争的时代主调。

1978年10月，第三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制定了“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一”的防空洞建设方针（1991年改为“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到2000年代前后我国各地利用人防工程开设旅馆14700多家，商场、商店、饮食店11200多个，文体活动场所6600多个，生产车间9500多个，仓库13300多个，停车场7300多个。据称，“九五”期间全国人防平战结合安置从业人员100多万，累计创产值600多亿元，年度上交国家财税近30亿元，超过了国家对人防建设的投资。1990年代以来北京在原有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以地铁为骨干，以地下商场、库房、停车场等为主体的平战结合人防工程体系。一些防空洞由于年久失修，发生坍塌、渗水等事故。近年杭州、重庆等地夏季开放防空洞作为市民纳暑乘凉的去处。

1997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正式实施，以法律的形式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进行了规范。为严格实施这部法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大都市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性配套法规，规定全国人防重点城市新建民用建筑必须修建防空地下室，用于居民战时防空隐蔽。房地产开发等建设工程损毁人防设施的，损坏多少面积就要易地赔偿多少面积。

经历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轰炸先行的战例后，我国军事理论界部分人士倾向于重新肯定防空洞建设。与此同时人们注意到，据国外有关机构公布的资料，将全体国民隐蔽到地下的能力：以色列是100%，瑞士是90%，瑞典是85%，美国是57%。

[附：上海市黄浦区人防工程简述

1969年上海市重组黄浦区人防领导机构，充实区人防办干部力量，抽调军地干部31人、工作人员16人，设组建制，实行军政共管。1970年3月区人防办下设区人防工程指挥部。全区兴起“房子底下挖洞热潮”。发动群众献砖献料，建窑烧砖，整修大楼地下室，修建大楼隔水层，组织民兵开挖主要马路连通干道。群众自发利用空旷地带挖掘临时性简易掩体1774个，计2.6万平方米；防空洞6337个，计6.7万平方米；防空壕137条，计4000平方米。这些临时简易工事后均毁弃无存。

1970年2月，长沙路街道新桥居委7户居民将住屋地下挖掘连通。截止1978年构筑人防工程653只，70%工程是在房子底下构筑；组织民兵开挖南京路等四条主要马路连通干道，跨越26条马路，穿越28幢大楼，连通116家商店、45个单位，形成连通布局。1992年底统计，境内已建成人防工事855处，其中符合战术技术要求等级工事占29.3%。

1969年12月31日上午，区人防办在广东路街道平望居委会进行居民就地疏散和检验防空专业队伍动作为主体的防空战备演习。有中小学生、在职职工、商店营业员、集体事业生产人员及里弄居民2836人参加。]

（参考资料：王建云、贝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透析》解放军报 2000年10



月 11 日；罗丹《记者探访北京防空洞景点：可容纳 30 余万人》，《竞报》2005 年 04 月 06 日；《黄浦区志·第二十五编军事》第六章“人民防空”）

## 干打垒

“干打垒”是北方农村特有的、用土作原料建筑的房子。曾在东北被普遍采用。除了门窗、房檩需要少量木材外，就地取土，把土装入活动木板内，用木夯铁杆分层夯实筑成墙壁，房顶用当地的羊草络成草把子作垫层，上覆泥巴抹光而成；取暖则用火墙或火炕。因厚墙厚顶，结构严实，冬暖夏凉，适合居住；且施工简单，操作容易。就地取材，随处可建，便于短期突击，大面积地进行建筑。

1930 年代抗战时，孙越崎领导开发建设玉门油田时就曾建筑、居住。1950 年代解放军部队营房建设就采用了干打垒建筑结构。取大孔隙粘性高土壤垒墙，建筑材料不用花钱，建房速度快。砖混结构的平房、楼房并不多，只有大城市或者部队团以上机关才能见到。

1960 年代困难时期大庆石油会战为了解决几万职工住房和上万台设备、车辆入库以及储存蔬菜过冬的问题，大规模建筑干打垒房屋。杏树岗青年突击队在当地老把式的指导下，建成 512 平方米干打垒房屋和 2500 平方米干打垒房屋主体，总结了一套干打垒施工操作规程和质量标准，改进了打筑板、规格夹板工艺，试制出了电动打垒机，使建筑工效从每人每天不足 1 立方米提高到 2.4 立方米。

1960 年 6 月到 9 月底的 120 天左右，全油田完成了近 100 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住房，萨尔图草原上出现了“七一村”、“八一村”、“新市村”等新的居住点，真正实现了会战指挥部“人进屋、机进房、车进库、菜进窖”的目标。房屋每平方米平均造价最多不超过 30 元，一次投资比建筑楼房省钱六分之五。

这种建筑被意识形态宣传赋予了更为广泛的意义，凝结了大庆人在困难灾害时期艰苦创业、因陋就简、勤劳节俭、乐于奉献、为国分忧的精神。随着对大庆典型的宣传，干打垒名声大噪。在形式主义学大庆的年代，造不造、住不住“干打垒”已经超出了简单的建筑类型选择问题，成了是否革命的标志。

1960 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借用了大庆油田的建筑经验。除生产设施采用高标准之外，住宅全部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用鹅卵石、黏土、水泥等建造的干打垒房屋，成为三线标志性建筑。到 1990 年代末仍有部分地区在使用。

文革开始开展全国学大庆运动，干打垒被应用于民居建设，各地建起一批建筑标准很低的的简易住宅楼。特点是居住面积小，空间局促，屋顶矮，墙壁薄，外墙裸露，内墙也只粉水、不涂抹。建筑类型和整体风格（窄、小、矮、薄、陋）接近于干打垒。甚至许多民宅就是直接用“干打垒”的方式建造的。此一时期时期，完成住宅建设面积少，质量低劣。建筑不配套，厕所、厨房都是共用的。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 3.6 平方米。不但父母子女住在一间屋子里，三代人、四代人也同居一室。

1970 年到 1976 年建设第二汽车厂，国家投资 20 亿。除宿舍搞了 100 多万平方米的“干打垒”建筑外，极左领导者强行要求在厂房外墙、隔墙，甚至工位器具、钳工台上推行“干打垒”。厂房设计得过于简陋，薄壁型钢屋架、轻型檩条（由钢筋焊成）、单槽瓦。由于轻型檩条发生因结构破坏而高空坠落事故，人们就对屋架和檩条进行了一次全厂范围的加固，屋面加上矿棉保温层和瓦楞铁防水层。而且是在载重情况下高空焊接的。这种建筑墙体收缩非常厉害，居然做到四层楼，而楼梯间却是砖砌的，结果变形不协调，墙体裂缝大到二、三厘米。实

际上是“节而不省”、“欲速不达”。

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下山、出沟、靠城”指导思想下，军队营房建设规划向着稳定型、永久性现代化营区迈进。民居建筑更是领先一步，在1980年代危旧房改造和1990年代房地产开发的相继推动下，久已告别干打垒时代。2000年代前后有不少境外建筑师在中国大展拳脚，留下许多传世经典作品。

（参考资料：宋连生《工业学大庆》，湖北人民出版社；谷昊、王文斌、刘璇《营房建筑：一首凝固的诗——透过我军营房建筑艺术的发展看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解放军报 2000年12月8日；张登善《我亲见亲历的荒唐工程》，《炎黄春秋》2002年10月号）

## 运动

名词，政治运动的省称。该词的构词能力极强：作为根词在前加修饰成份可组成“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运动”、“批清运动”、“批林批孔运动”、“反回潮运动”等；以该词为修饰语可组成“运动对象”、“运动后期”、“运动员”等。

作为现当代中国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它意指由中共领导核心制订目标、方针、政策，一元化党政运转系统组织保障，统一指挥，动员全社会为实现政治、文化革命而进行的规模浩大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和政治行动。其目标、方针、政策，形式上由中共领导核心（政治局）集体制订，以内部文件形式逐层下达，程序是从中央到地方（由中央而部委局，总政、总参、总后而各军兵种、各军区野战军，省市党委而工农商学基层支部、行政），从党内到党外；同时辅之传播媒介公开的新闻报道、社论，协调运动的发展。新闻报道树立示范样板，提供操作经验，制订时间表，发布信号，对表，社论则从理论认识上进行指导，讲解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和怎样做，并对运动中的问题提出纠偏措施。

运动一般分为传达、动员、展开、过关、总结、纠偏六阶段。

传达阶段：在基层先向党员、干部传达，再向党外传达；先向积极分子（自觉参与政治活动，交了入党申请书，常向组织汇报思想和其他情况的人）传达，再向一般群众传达。

动员阶段：在宣传方面学习文件，弄清运动的性质、任务，提高认识，表决心，张贴标语；在组织方面，建立领导班子，其班底多为党政一把手和政工、保卫干事；把单位现有人员按左中右排队，摸清情况，确定基本队伍和运动对象。

展开阶段：一方面把已确定的对象抛出来，上挂下联，大字报铺天盖地，揭发批判敲开场锣鼓，造气氛，示范；一方面动员群众揭发，让运动对象、有问题的人自己交待，边揭发，边交待，边组织新一轮的“批判——揭发，揭发——再批判——再揭发”……一直循环到组织者认为充分为止。由于运动对象的确定依据是历史情况和现实表现两项，左中右的排队并非一成不变，偶然的情绪波动、出言不慎、口误或曾经有过的言行失常，随时可能被素有嫌隙者、左得真诚执著的老实人抓住，上纲上线，夸张为大是大非问题。此时局势波谲云诡，高潮层出不穷，情绪跌荡起伏，戏剧性强烈；牛鬼蛇神纷纷落马，揭露出来的阶级斗争越来越触目惊心，让人觉得“幸亏把敌人挖出来了要不然真危险啦”；人人自危，心情紧张，害怕灾难骤然降临到自己头上。这与组织者的再三强调有关：擦亮眼睛，大胆怀疑，不放过一个可能为害党和国家红色江山的隐患。

过关阶段：对被揪出来的运动对象，进行以彻底交待为目的的批斗（常伴随着轻重程度不同的武斗），施以剥夺行动自由的隔离反省，摧毁其意志；并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攻心，动员家属、子女劝说运动对象积极配合，不要采取抵触态度。一些顶不住压力的人，被迫按组织者的要求随意给自己罗织罪责，以求暂时的放松、喘息。属于人民内部的绝大多数人则要表现出对运动对象的认识、批判和同仇敌忾的敌意，同时联系自己的实际，找出与革命化境界的差距，深刻挖掘思想中的旧影响，发誓要成为新人。这时既不能把自己说得太干净，没事儿人一样，那会显得你没有自我批评精神，缺乏真诚，态度不端正；又不能把自己的过错说得太多，那会把自己划到运动对象的圈子里去了。经个人检讨、群众评议、组织者认可，你才算终于脱了干系。

总结阶段：对运动对象、对群众在运动中的表现作结论，存入档案，决定奖惩，选出积极分子给予表彰。通过内查外调，对运动对象落实定性、处理，调离原岗位，工资降级，交群众管制，给行政处分，甚至劳动教养、判刑，开除公职流放农村；将全面情况、经验教训梳理成条款款形成报告上交；上级点头认可，运动即告结束。

纠偏阶段：要求运动应在统一框架、预定时间表内完成相应部署、步骤，必须搞得有声有色，不能当群众的尾巴，泼冷水，往往情况不明就仓促从事，支应任务，情绪化、不准确的批斗、处理，顾此失彼，亦不可免。纠偏就是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处理，在不否定运动整体成绩前提下，做局部调整、补救、修复。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避免不利影响和隐患。落实政策就是这一阶段的重要内容。持续不断的运动造成广泛的破坏还能维持下去，于此关系非浅。

运动六阶段是一般规律，也有特殊情况：或缺少这阶段那阶段（如传达、纠偏），或两阶段被合到一阶段（如传达、动员）里。

运动的工作方法有：派工作队（组），书记蹲点，引蛇出洞（反右），扎根串连（四清），抓典型（开现场会）以点带面，抓两头带中间，打击一小撮、教育一大片……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即，完全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上级部署来安排落实，不能走样，须与上级领导的意图、时间表相吻合，不允许本单位的人事矛盾、个人恩怨、领导班子的意见分歧，和外单位影响、人情关系来干扰。

运动作为中共社会动员的传统方法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时它具有社会整合乏力时从边缘挑战主流的瓦解力；战争状态下的党内斗争也使用运动的方法，是维护内部高度一致以对敌、不得已而为之的强制手段；1949年执政后，运动成为全民化的组织、教育手段，更加完善、规范和制度化，用高水平的社会动员来弥补资源匮乏和社会生产力低下的不足，以致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运动文化和价值观。

如，“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运动一来即如进入准战争状态，所有工作都必须替它让路，包括生产、科研、培训等关乎国计民生且需按部就班、常规运转的业务，都要在不耽误运动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就是“以生产压革命”。

运动的核心、政治哲学是“阶级斗争”：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它排斥经济建设、日常工作的清明理性，把意识形态的终极解决当作了救世良药。它的压倒一切的优先性、尖锐性（或称残酷性，如体罚、武斗等），运动的手段（划分阶级阵营、专政）等等，盖源于此。

“宁左勿右”的运动认识论：中共领导建立民族国家的解放运动和现代化进程，面临知识、文化、社会组织资源的严重短缺，它的力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

粹主义的风格色彩和宣传手段的生动鲜明；因为它对鼓动、吸引、组织、掌握群众，效率极高。认识论上的超前性、极端化是达到宣传效果的好办法。这一套形成传统的方法被沿袭了下来，估计基本政治形势时宁可看得严重些，不能说无事，确定、处理运动对象，宁可多些、重些，不可偏少、偏轻。从中共党史看，“左”的发生率和危害都远远超过了“右”；“左”倾责任人的党内地位、待遇比“右”倾的好，形成了同为错误，“左”比“右”光彩的局面。因为过火只是掌握政策的水平、分寸问题，消极旁观却是立场、态度、感情、路线、组织原则问题；而基层当权者只需要向上级负责，迎合上级的政治意愿。

“打擂台”的竞争机制：作为中心工作，运动搞得好坏影响、决定着官员的考绩、升降。因为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处于实际竞争状态，得看谁表现出更多的坚定性和创造性，所以互相攀比，不断加码，争放卫星，不顾实际情况。造成损失是公家的，允许交学费，升迁贬谪、官场沉浮的后果却是自己的。向上的社会流动，在政治挂帅的时代课题面前，只有运动提供了唯一的捷径。这也是“左”风不断的原因之一。

“运动万能”的方法论：抓任何工作都用运动形式来搞，从爱国卫生除四害到全民写诗，从土改到大炼钢铁，从公私合营到人民公社，从清匪反霸到文革。因为它有形式感，轰轰烈烈，振奋人心，看得见摸得着，模式是现成的，又能因事制宜，也好总结经验，上级授奖。况且不管效果怎样，搞过运动了就是抓过工作了。不以运动形式搞看不见，出了成绩也白搭。

文革的运动形式是既往（反右、四清）的延伸，又有许多不同，尤其是1966年夏至1968年夏。最根本的不同是一反过去“自上而下”的发动—控制模式，而改用“自下而上”的发动模式。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为了冲击驻守一线的中央领导集体，全面重返权力核心，便打破组织程序，以写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公开最高层矛盾，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戴袖章，八次公开接见，给自发的红卫兵以强劲支持，赋予了它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央文革小组鼓动“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要“踢开党委闹革命”，催生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时尚。这与文革的行政目标——打倒走资派，瓦解当时体制化的官僚系统——是相一致的。这种“自下而上”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控制的。虽然最终还得统一在毛泽东的意志之上；但红卫兵及其造反组织一旦被从潘多拉盒子中放出来，就不那么听话了，也会自作主张地乱打一气。以致于后来原有行政体系瘫痪，局面失控，不得不祭起“三支两军”的法宝，实行准军事管制，达到保障中央政令畅通的最低目标。

（参考资料：社论《彻底肃清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北京日报》1966年6月20日；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张化等《回首“文革”》上、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 知青

名词。“知识青年”的简称。

在这个名词后面，大体包括了1947年—1959年出生于城镇，并于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的一代人。[注]这批人大约有1647万。在上山下乡的12年间，他们略占同龄约2700多万城镇学生人口的61%。1967年末至1972年的第一次上山下乡高潮，他们中的715.68万去了农村，以年龄较小的初中生为

主体，包括大部分老三届初、高中学生（从经历、文化形态上都最具代表性）和1969—1972届初中生。在1973年至1977年的第二次高潮中，有858.66万人去了农村，以文革中的高中生为主体。1970年代最后两年，高中毕业的小部分人去了农村。他们的安置条件优于此前的知青。

他们接受中共的革命传统教育，为红军、刘胡兰、董存瑞、雷锋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所激动。1960年代开始的阶级斗争教育、文革的“停课闹革命”，使他们没有得到完整、正规的文化教育，却由敢闯敢干，上演了批斗老师、走资派，串连、抄家、夺权、武斗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大戏”的“天兵天将”，到被下放去农村插队落户成为文革弃儿；以瓦解作为政治组织的学生红卫兵，稳定当时动荡不安的政局，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这一端人生经历成为他们当时和日后反思的起点。直到1970年代中期的中国教育都处于残缺不全的停滞状态，不仅中学只有毛泽东思想课、工业基础课、农业基础课、革命文学和艺术、军训、劳动六门，连工农兵大学生的大学教育也是象征性的。把他们称作知识青年，实际有些名不副实；只是为了从政治上论证上山下乡合理性的需要。

知青上山下乡的方式有两种：到地方国营农场、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约占总数的18%），或农村落户。前者相当于农业工人，后者则由国家拨付安置费，被分散安置（又分跨省、跨地区、跨县三种），直接下放到农村生产队。在农村和公社社员一起上工劳动，凭工分分配口粮。还有一种允许知青到有亲戚、朋友的农村插队的做法，叫“投亲靠友”。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后恢复了“知青点”的集中安置方法。这种上山下乡运动，被说成是对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纠正，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反修防修的重大战略部署”，“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措施”。但知青生活上长期无法自理，需要依赖家庭的接济，在口粮、医疗、住房、婚姻等方面存在困难，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被返城中走后门、贿赂等不正之风弄得灰头土脑、无所适从。

毛泽东曾试图借助回复李庆霖的信解决一些知青的局部实际困难以缓解普遍的紧张。1970年代知青陆续通过招工、招兵、招生、办病残、顶替等途径回到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逆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业人口城镇化的客观规律而动，终于导致失败。被后文革邓小平主导的中共政策纠偏叫停，成为一场代价高昂的社会试验。

1977年恢复高考、1980年代通过电大、职大、函授，知青中接受了相当于高等教育的人大约有115万，还有50万接受过中专、中技教育。而另外1500万人的知青就业大军只有初高中文化水平。其中经过高等教育门槛和从基层工作崛起的一部分人，由于在上山下乡的经历、积淀中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善于协调人际矛盾，成为1980、1990年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社会栋梁。

但他们里的大多数人只能占据较低的工作职位，并在1990年代及其以后重文凭的干部提拔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他们恋爱、结婚、生子，都超过了正常年龄。对铁饭碗的依赖，缺乏市场经济观念，使他们不适应经济转型、产业转轨的1990年代，受到大量进城民工（1990年就达到8000万）和有更高学历、适应力更强的年轻一代的夹击，在国有企业“关、停、并、转”的下岗潮里成了下岗工人，平均每月只能领到250元最低生活费（时有调整）。很难应付养老、医疗的巨大风险。

[附：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统计 单位：万人]

时 间	合 计	插 队	国营农场	知青集体农场
1962—1966	129.28	87.06	42.22	
1967—1968	199.68	165.96	33.72	—
1969	267.38	220.44	46.94	—
1970	106.40	74.99	31.41	—
1971	74.83	50.21	24.62	—
1972	67.39	50.26	17.13	—
1973	89.61	80.64	8.97	—
1974	119.19	18.66	34.63	172.48
1975	163.45	23.73	49.68	236.86
1976	122.86	23.66	41.51	188.03
1977	113.79	15.99	41.90	171.68
1978	26.04	3.13	18.92	48.09
1979	7.32	1.01	16.44	24.77
总计(人)	17 764 800	12 822 100	2 030 800	2 911 900

#### 编制说明

1. 单位：除总计为“人”外，均为“万人”。
2. 插队知青：在农业、牧业、渔业生产队落户的城镇知青；在工分制定点军马场、工分制土方工程队、工分制滩涂作业区等纳入农业人口管理的单位落户的城镇知青；通过投亲转插方式回老家生产队或亲友所在地生产队落户的城镇知青（不含农业户口回乡知青）。
3. 国营农场知青：在农垦系统、侨委系统安置农场、林业系统营林场（采伐场除外）落户的城镇知青以及在各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落户的城镇知青等。这些知青的身份可以是工资制农工，也可以是工分制农工、供给制军垦战士或半供给制军垦战士（生产建设兵团的现役军人除外）。
4. 集体农场知青：自1974年起，在部分地区开始组建除管理人员外均为城镇知青的，相当于公社或生产大队的独立核算制“集体农场”。在这种农场落户的城镇知青即“集体农场知青”。]

[注]1956年、1957年间，中共中央曾有让未能就业的中小学毕业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作为城市闲散劳动力安排的一种补充办法（1962—1966年年均30多万），以推动农村合作化运动发展和农业科技的发展。但这一政策带有辅助性、阶段性的色彩，不及文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样具有全局性（1967—1977年年均100万）、长期性、制度性；其发端还具有政治性、强制性。可视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前身。

（参考资料：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意新《从下放到下岗 1968—1998》，《二十一世纪》1999年12月号；转引自“猫眼看人”2005-10-9的云山雾罩跟贴）

### 《六·二六指示》

著作名。毛泽东对医疗卫生工作的论述。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和身边

医务人员[注 1]谈话时指出，当时卫生部的工作只为全国人口的 15%服务，而这 15%主要还是“城市老爷”。广大农民却得不到医疗，他们一无医二无药。再这样下去，卫生部可改名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医疗卫生工作应该把主要人力、物力放在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的预防和医疗上。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注 2]此次谈话反映了毛对医疗卫生工作批评性的整体评价，标志出他的医疗卫生思想，故后来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根据毛泽东意见，卫生部党委提出《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中共中央同年 9 月 21 日批转）。报告计划今后要做到经常保持 1/3 的城市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到农村去，大力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中共中央的批示说：面向工农兵是社会主义卫生工作的根本方针。我国 8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如果不认真解决广大农民的医药卫生问题社会主义卫生工作的方针就会落空。必须认真组织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培养农村卫生人员，建立健全基层卫生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农村医药卫生问题；同时，大力改革城市医疗卫生工作，把城市卫生工作的革命化和建设农村卫生工作结合起来，使这两方面的工作相互促进。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逐步改革我国农村卫生工作的落后面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

各地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立即积极组织、实施这一指示精神，把它作为医疗改革的方向，加大资金投入，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医疗工作者下乡协助地方病的普查、预防、医治，培训基层医生，建立医院、病床。

尽管如此，文革中《六●二六指示》仍然被当成对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的系统指控，成为医疗界大批判的长期主题和至上武器。对方针政策的批评被置换为针对组织和人的审判、毁灭，带有乌托邦色彩的道德诉求被置换为政治批判，医疗卫生系统的官员、医疗专家都因此遭到揪斗，大字报、戴高帽、挂黑牌、辱骂揪打，关牛棚、下放……批判的武器成了武器的批判。破坏取代建设成为卫生工作的主调音。

“赤脚医生”和“红色工人医务人员”等新生事物得到推广、普及；上海等核心城市的医疗单位被成建制地迁移到大三线建设所在地[注 3]和农村；10 年间北京中央直属医院有 300 多批、15000 多人次医务人员到云南、西藏、甘肃、陕西、江西等省、区为贫下中农（牧）防病治病。到 1975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有病床 159.82 万张，其中市级床位数占 63.74 万张（占 39.9%），县级占 96.08 万张（占 60.1%）。（《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1997》）

1979 年《卫生部关于全国卫生局长会议的报告》“关于若干政策问题”部分，对文革贯彻“六●二六指示”的做法进行了纠偏：认为毛泽东讲“城市老爷卫生部”是对卫生工作的“提醒”而不是“全面评价”，凡被戴上帽子的医药卫生机构和人员均予“平反”“摘帽”；“谈话”不是“正式文件”，不宜再提“六●二六指示”；下放医生中年老有病、归国华侨、夫妻分居两地的可回城，京、津、沪跨省下放到西北、西南等地区的参照办理。

1980 年代以后，中国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从文革的 68.8%逐年下降到 5—10%之间（据 1992 年资料）；一些调查发现，农民的家庭两周患病率在 48.65%，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率为 81.25%，其中未就诊原因中属于经济原因的占了一半以上。贫困户中的 40%是因为疾病所致。2000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全球 191 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量化评估，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位

居尼泊尔、越南之后，排名 188 位，倒数第四。2005 年有报道称，官方承认医改失败。

[注 1] 其中就有写下《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李志绥。

[注 2] 毛的原话是：“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脱离群众。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难深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注 3] 1971 年 5 月上海市第二结核病分院全迁贵州参加“061 工程”建设。1972 年，全迁支内的尚有杨浦区儿童医院、南市区产院、闸北区产院、虹口区第二妇婴保健院等单位。

（参考资料：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卫生部关于全国卫生局长会议的报告》，“雷州市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国务院行政法规；读毛泽东关于“城市老爷卫生部”的谈话，看农村卫生医疗事业的严峻现状》，原载“三农中国”）

## 鲁瑛

（1927— ）山东省龙口市王格庄人。文革执政时期最长的《人民日报》总编。

在山东龙口市中学读中学；1943 年在黄县抗日革命根据地黄县龙化村小学、曲家村小学任教，在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临沂县办的山东大学读新闻系。1946 年任山东抗日革命根据地渤海区《渤海日报》记者，1949 任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记者、编辑、农村组长。

1953 年起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任记者、消息组副组长、文教组组长、总编办公室副主任、华东新闻部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解放日报》编委、党委委员。

因对《解放日报》前任社长张春桥、后来的姚文元惟命是从，张特别将他推荐给了陈伯达。后者带去《人民日报》夺权的工作组成员里便有鲁瑛。这是他第一次坐在中央党报的权力位置上，并当上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的勤务员，社论、重要文章多由陈伯达、王力、关锋等人口述或执笔。侥幸躲过了年底的上海“《解放日报》事件”之灾。

此后他一直在人民日报社稳坐钓鱼台，眼看着新总编唐平铸（1967 年 1 月）；王力、关锋（8 月）；戚本禹（1968 年）；陈伯达（1970 年）一个个倒台。从 1972 年开始姚文元直接控制《人民日报》，报社宣传领导小组集党务、编务于一身的负责人便是鲁瑛。在批极左和极右的争论中紧跟张、姚，抵制批左。毛泽东批评了主张批左的王若水（被送到“五七干校”、北京郊区劳动）。发动“批邪”运动，胡绩伟、王若水成了“《人民日报》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从 1973 年起，便作



为《人民日报》负责人随同姚文元会见外宾、正式在报上露面，以《人民日报》代表团长的身份到朝鲜出访。虽不断有人告状，还是在 1975 年被扶正，成为人民日报社党的核心组长兼总编辑。

1976 年初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受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指示从报社派出记者专门收集被邓小平重新起用的老干部的材料，以说明“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先后四批、约 100 余记者，到福建、江苏、云南、湖北、四川、陕西、广西、黑龙江共 11 个省市和铁道部、国防科委等，搜集了胡乔木、万里、张爱萍、周荣鑫、赵紫阳等多人的材料。刊登在《情况汇编特刊》上共 130 多期。在当地掀起新的动乱。4 月全国各地爆发了悼念周恩来的运动。4 月 8 日经鲁瑛组织，姚文元亲自修改，以人民日报记者身份的长篇文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发表。

9 月 9 日毛泽东去世后的 10 月 6 日四人帮被捕，7 日耿飏受中央政治局重任接管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广播电台。他被隔离。1977 年被宣布开除党籍，接受审查，交代问题。1980 年 12 月 10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姚文元时出庭作证。

后恢复工作到人民日报出版社图书馆任资料员，行政降三级，从事抄写卡片。姜昆相声曾对他的白字进行了尖刻的讽刺（绰号“白字总编”），迎合、煽动了当时人们对四人帮的痛恨。1986 年起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到退休。据传晚年曾获北京市钓鱼冠军。

（参考资料：司任《鲁瑛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收入温乐群等《动荡岁月秘闻》，内蒙古百花出版社 2003 年版）

## 帽子

名词。本义指“戴在头上保暖、防雨、遮日光或做装饰用的物品”，引申比喻固定在人身上或某种做法、政策上的罪名或坏名义。从 1949 年以来到文革，政治运动频繁，每个运动都有一批打击对象，帽子就是给这些人制做的标志，便于区别、识记。像古代囚犯脸上的金印，纳粹给犹太人缝制的徽记。

帽子种类繁多，有的是长期户口，如黑五类（地富反坏右），有的是临时户口，一拨一拨的，随时都在换花样儿，如反动学术权威、黑帮、走资派、黑线、黑手、保皇派、五一六、打砸抢分子、小爬虫、叛徒、特务、军内一小撮、恶（毒）攻（击）、投降派、还乡团、三种人……有些的政治性相对弱一些的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稀泥”、“生活作风”，看似温和，消受起来同样够戥。有自上而下、红头文件规定的到处通用的帽子（全国粮票），还有小范围、本单位发明、适用的帽子（地方粮票），甚至可以专门量身定做。

给做法、政策定的罪名，有单纯军事观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独立王国、阎王殿、成名成家、白专道路、分数挂帅、小资产阶级思想、崇洋媚外、厚古薄今……虽然不直接针对人，但也与具体人头上的帽子，有对应和连带关系。

戴上帽子，就意味着这人的社会身份被另类化，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后面紧跟着的是一连串迫害：批斗，强制劳动，被投入牛棚、发配干校，开除党、团籍，撤职降薪（冻结工资），判刑，普遍的疏远，妻离（组织动员）子散……丧失自由和人身权利，受尽人格凌辱和肉身折磨。帽子是为社会歧视、隔离、迫害

签发的许可证。这是一整套制度化、自动化、高效率的程序运转。不由得人不见帽色变，闻帽心惊。本来就已经缺乏个性、独立性的人们，愈发被小小一顶帽子和它后面跟随着的无所不在的社会歧视压弯了腰。以心为形役，画地为牢，以求免祸；谨小慎微，闻风丧胆。

帽子的效力是终身性的，甚至还可以遗传（四类分子的儿女叫“四类子女”）。即使摘掉帽子（如右派），那帽子还在头上（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仍然不能恢复工职），像是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长在头上生根了似的。无论当事人如何竭尽毕生努力，说话（检讨）、做事（苦役）处处以创造性的自虐来表现自己的臣服、卑微，企图摘掉帽子改变自己 and 子女的处境，都无济于事。绝望使屈服成为一种病态的偏执：彻底认同施虐者的立场，为了“洗雪”本来就没有过的罪过，不惜把自己的同类、亲人朋友甚至是父母，都诋毁为妖魔。

文革前，土改、三五反、反右等等运动，中共组织健全，戴帽子尚需经过相应组织审批手续。虽然还是人治，重口供轻证据，帽子的合法性、尺寸的大小、取戴的扩大化本身，就存在根本性问题，但多少有一定程序约束。在戴帽子上还有些最低限度的政策性规定和审批核准程序。文革中，党政组织体系陷于瘫痪，群众组织、革委会办案，权力完全失去制约，加上以言治罪，人治更加达到极端，帽子的发放、处理愈益随意，几无控制。随意到有的口头一说就算数，到了落实政策时怎么也找不到档案记载，白白戴了一回帽子，受了罪还不得不着补偿。

由于帽子制作和发放的随意性，使得今天给人扣帽子的，明天就可能被人扣帽子。人人都生活在帽子的阴影中。帽子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恐惧的意象，其心理威慑力更大于它的实际杀伤力，具有强化社会控制的功能。

有时帽子即使不给你戴上，也不意味着你没事。对材料不足，或认错（罪）态度不好的，一时无法定案、戴帽子，或不得不先摘掉帽子的，也有个说辞叫“帽子拎在群众手里”。意思是说别看没给戴上，引而不发，随时可以再戴上的：别横，别大意。弄得比戴上帽子还不塌实（那将戴上的帽子到底是啥尺寸？）。

据说毛泽东曾讽刺江青：“不要开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文革后姜昆曾创作、表演相声《帽子工厂》，引起人们仇恨文革压迫的共鸣，暴得大名。成为同类作品中的经典。对打棍子、抓辫子、扣帽子等政治迫害现象的批判，成为思想上清算文革的主题之一。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中共主导下政治上形成了一个摘帽运动的潮流，以化解人际矛盾、社会板结，达成全民族和解，一心一意搞建设。

（参考资料：许子东《文革小说中的罪与罚》，李三来也《文革中，那惨绝人寰的“帽子”》）

### 三忠于四无限

缩略语。崇拜用语。文革初期关于人们对待领袖毛泽东及其思想、政治主张、工作安排（其时称之为“战略部署”）等所应持的态度、行为规范的规定。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毛泽东（人）及其相关的一切（思想、路线）的合称、简称。因为要求太长，在口语表述中，就有使用这种缩略形式指代的。

据“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材料，“三忠于”流行的时间为1967

年3月至1971年4月。其最初形式是“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四忠于”，1966年7月），直到1967年3月方演化为“三忠于”的定型格式。“四无限”与“三忠于”的起源时间相同，结束时间稍早，为1969年4月中共九大。

这实际上是用对个人的态度来衡量、代替对整个革命的政治态度，把毛泽东及其思想、政治选择作为中国党、政府和社会主义事业合法性的根据。

这种极端化的做法，有个发展过程：柯庆施曾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1958）[注1]。康生曾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1959）。林彪曾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1962），（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1966）。作为毛泽东“学生”、“接班人”的林彪，就曾被树立为（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跟得最紧”、（把毛泽东思想旗帜）“举得最高”、（把毛泽东著作）“学得最好”、（把毛泽东思想）“用得最活”的典范。

有学者认为，这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和各方面日益加强的一元化领导，使行政权力通过共产党组织支配一切、干预一切，从社会生产、分配、消费到私人生活和私人事务（如工作、迁徙、婚姻、恋爱等等）”（李泽厚）……的经济、组织、生活制度发展到极端时，在政治和思想信念方面的表现和要求。同时领袖本人也有“搞点个人崇拜”（毛泽东语）的政治需要，以此冲破中央一线，凭借个人权威发动文革。[注2]

为了赋予这种观念以物化形式，就大搞表忠心的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红海洋，像章热，忠字舞，忠字台，搞“万岁馆”（展览馆）（吉林长春、江西南昌、四川成都）……都曾经是“三忠于、四无限”的表现形式。

后文革时期遭到严厉批判，并把制造、使用这样的提法归咎于林彪、四人帮，是封建化的个人崇拜，奴化、取消人民的思想，斥之为阴谋。

[注1]讲话是3月10日的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上，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政治局委员。

[注2]毛泽东在需要降温时就说：“‘紧跟’、‘三忠于’、‘四无限’，讨嫌。‘跟’应当跟党走，我历来是路线对了，我支持；错了，我反对，敢于反潮流。‘跟’不要跟个人，个人是会变的……”那也是准备清算林彪的发动期。

（参考资料：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大联合把伟大的红卫兵运动推向新高潮——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告全国红卫兵书》，《人民日报》1967.03.03；新华社《沈阳部队某部指战员牢记毛主席教导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作风 紧紧地和革命群众在一起 在文化大革命中创立新功》，《人民日报》1967.04.0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P190）

## 外调

外出调查的省称，与“内查”相对。指向被审查者的外单位、外省市人员作调查。外调分函调和派人外调两种形式，但以派人外调为多。文革时以阶级斗争观点看待一切，把家庭出身和成份作为阶级分析的根据，特别强调、依赖对历史情况的掌握；外调在当时被制度化为常规工作方法。它适用于对运动对象的甄别，

也适用于提干、发展党团员前的政审。调查的内容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表现、阶级成份（职业、经济状况、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私生活等。这类调查充斥、贯穿于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一打三反等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但高潮期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阶段。用去了大量的外调经费。

外调者带着介绍信和倾向性的问题，通过组织让接受调查者配合工作，收集、整理被调查者的材料。往往要求接受调查者提供顺应调查清单提问的回答，以索取有利于给被审查者戴帽子、定性的材料。采用割裂复杂多样的具体历史条件，捕风捉影，形而上学的从过去推断现在的手法，使外调成了罗织人罪的戏法。如果得不到满意答复就恼怒，威胁（较多）、强迫甚至动手打接受调查者（较少），利用他们的弱势地位（往往也是运动对象）达到目的。个别外调者采取诱供方法，谎称被调查者已经承认了罪行，要接受调查证实。偶尔一个单位的对立两派，对同一个人持不同观点，都想通过外调来达到打倒或保护被调查者的目的，找到同一个接受调查者。

当时仍然盛行中国不保护被告的法制传统的基本观念“有罪推定”——先定案后取证（说是就是，不是也是）——为这种外调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因此这类外调材料的“水分”通常较重。即使外调中未发现不利于审查对象的材料，也仍会作为有问题的悬案、疑案，不得解脱。

接受调查者实话实说的多，有时就无法满足来料加工的定单。多次接待外调使他们学会应付技巧。他们常常还为了保护被调查者，模糊其词，提供一些不致对被调查者构成伤害的情况。一些曾与被调查者有隔阂的（如胡风、冯雪峰与周扬），他们仍然坚守住了人格底线，没有向对手落井下石。笔者也曾接待过一次外调，让来访者刹羽而归。如果接受调查者在本单位不属于被整肃对象，接待单位就比较超脱，与来访者又无隶属关系，不会强迫他顺应外调人员。但也有为了争取一个正确对待的名义，而顺应外调者的人，使得外调主观随意性很大。〔注〕

例：“谭凌霄亲自出马，带人外调。登了泰山，上了黄山，吃过西湖醋鱼、南京板鸭、苏州的三虾面，乘兴而来，兴尽而归，材料虽有，价值不大。（全国用于外调的钱，一共有多少？）”（汪曾祺《皮凤三搵房子》）这类材料文革后多数都被废除。

〔注〕巴金曾写过严文井（作家）外事工作的交代材料，虽然言词并不激烈，没“无限上纲”，没恶意诬陷与诽谤，但免不了用“政治标准”、“主席思想”来衡量严的“错误”。即使这样的交代不会给严增加多少罪责，后来还是对巴金心灵构成了巨大折磨，他说：“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作严肃、正确。”

（参考资料：李辉《文革博物馆的前因后果》，《凤凰周刊》总第130期；汪曾祺《晚饭花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年版，P113）

### 三突出

名词。文革时定于一尊的文艺创作原则、模式：即，在文艺作品塑造的所有人物中必须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这是于会泳根据江青抓样板戏时，反复强调创作“要在我们戏曲舞台上塑造出革命英雄形象来”，要突出第一号英雄人物的概念，归纳、推演、拼凑出来的（《文汇报》1968年5月23日《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而后又经过姚文元的修订。一旦它被推许为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就成了所有文艺创作都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是“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实践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一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的有力保证”。

根据这一原则，“所有人物的安排和情节的处理，都要服从于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一前提”，以此“组织和展开冲突”。它是认识、表现生活的总原则。运用到舞台的编剧、音响、灯光、调度上，都要为英雄人物服务；运用在样板戏的电影摄制里（并被推广到其他类型的叙事性影片里），规定镜头必须“我远敌近，我正敌侧，我仰敌俯，我明敌暗”；英雄人物要“远、大、亮”，敌人形象只能“远、小、黑”。运用在舞台调度里，“一号人物”必须占据舞台中心，“始终坐第一把交椅”，连灯光也得跟着他转。在表现手法上，还要“多侧面”、“多波澜”、“多浪头”、“多回合”、“多层次”。

在音乐（配曲）创造上要“三对头”：感情对头、性格对头、时代对头。对戏曲传统要“三打破”：打破旧行当、旧流派、旧格式。在整体风貌上要“三出新”：表现出新时代、新生活、新人物。

延安时代就已经流行“工农兵”“正面人物”概念，1950年代又提出“表现新英雄人物”（陈荒煤）、1960年代提出表现“最能体现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英雄人物”（周扬）。三突出正是这一概念轨迹达于极端的逻辑发展。三突出还被论证为阶级斗争的斗争哲学在文艺上的表现：“一定的人物关系，从根本上说，都是一定的阶级关系，是处于不同阶级地位中的各种各样人物之间矛盾斗争的关系”；“英雄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关系，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生死搏斗的关系”；“正面人物与英雄人物的关系，是阶级弟兄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代表和榜样”。

为了完成三突出，还需要“主题先行”。即从认识上事先确立好作品的思想主题、主要英雄人物，经讨论和上级领导定板，再投入创造，才能保证不迷失方向。《沙家浜》的戏份虽然集中在阿庆嫂身上，但因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毛泽东语），所以一号英雄人物必须是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

用这种模式创造出来的人物显得单调、刻板：一号英雄清一色共产党员，是做政治工作的模范干部，是无所不知、无往不胜的超人；一切俗世的人间拖累、“杂质”都要被过滤掉，没有配偶、恋人，没有情感生活（《白毛女》的喜儿、大春本有情感线索也被删去）。[注]

这种创作方法在当年被定义为“无产阶级文艺创造的根本原则”，有如“文艺宪法”。因此还被规定必须无一例外地贯彻到小说、散文、诗歌、绘画等艺术样式的创作中去。

[注]据说当时就有顺口溜讽刺三突出创作成果《龙江颂》英雄江水英：“一个女书记，站在高坡上。手捧红宝书，抬手指方向。敌人搞破坏，队长上了当。”

支书抓斗争，面貌就变样。群众齐拥护，队长泪汪汪，敌人揪出来，戏儿收了场。”

(参考资料：古远清《三突出》，载洪子诚、孟繁华《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农二哥

亦称“农老二”。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被称为“老大哥”，作为工农联盟主体之一的农民便被称为“农二哥”。多见于农民自己称呼；它蕴含着农民对自身形象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关于角色定位的感觉。更常见，也更带官方色彩的叫法是“农民兄弟”。

似源于四川方言（云贵川方言都接近），而后流传到其他方言区。这个民间色彩颇浓的俚俗称谓里，既透着亲切，自豪——无论怎样，“俺也是国家的主人”，毛泽东时代的小说等文艺作品正是这一官方意识形态的反映，安抚、诱导农民——又流露出无奈、解嘲和怨艾。是对抗和消解的混和体。老二是虚的，口头说说而已，老大才是实的；老二就是老么（工农商学兵哪个不排在农民前面？）。除了救灾以外，农村是被遗忘的角落。城乡差别造成隔阂和仇恨。这种不满的自发情绪，像山洪一样被危险地积储起来，未得到宣泄。

工农业剪刀差是中共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而牺牲农业，这既是模仿苏联的结果，也是根据中国教育、物资资源现实，为了冲破外部封锁，强大国防，把发展速度摆在第一位而招致的必然结论。毛泽东曾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规定“农轻重”，只是修正的愿望，而实际上仍是“重轻农”。农民的不满情绪，到文革“普及大寨县”（大批促大干，“穷过渡”等），割资本主义尾巴时达到高潮，形成社会危机，一触即发。

1960—1970 年代在工宣队进城市学校的同时，农宣队（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注]也进了农村学校。农民随带成了对下乡知识青年再教育的施与者（实际上教育主体只是教育客体的派生物）。也很是风光了一把。

1980 年代以来，以土地承包制为主的农村改革，使农民再次实际上拥有了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农业的可持续增长有了基础，农民生活有所改善。使农民最先成为改革的受益者。曾被人羡慕了一阵。社队企业、小城镇的发展，农民进城打工的社会流动、人口迁徙，使身分的终身制渐趋瓦解。后来又出现农业生产资料（化肥、农药等）的涨价，由国家在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和官僚系统滋生出来的“乱摊派”，因房地产开发等征地出现对土地的掠夺。又有“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之叹。逐步废除农业税已经被纳入政府工作日程表。

2000 年代三农问题日益为学者和政府重视。遂有论者认为，该词和“农民兄弟”都是对农民的贬称。但也有文学团体（陕西汉中《农二哥》诗社）、公司（深圳市农二哥实业有限公司）、产品商标（湖北有系列辣椒产品、贵州义兴有芭蕉芋粉丝）或网友以“农二哥”为名的。其实比起“乡巴佬”一类蔑称，“农二哥”起码应该算是中性的称呼。或许这里有自称和他称之别：自称寓善意，他称含贬义？

[注]通过 google 搜索引擎可查到不少官员都有农宣队经历。如甘肃省副省长李鹰的履历中就有“1965. 08 ——1972. 09, 西北师范大学化学系化学专业学习，

省农宣队清水县分队队员”的记载。

(参考资料：彭心安《社会阶层分化对党的执政基础的影响》，“厦门干部教育网”)

### 三家村

1. 被后来评论者称作发生在 1966 年的一场“文字狱”。由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的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而得名。“凭迹三家村”(陆游语)，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批判所指称的“三家”本来是担任该专栏撰稿人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业余写作本是文人唱和的私人事务。此时却被当作了“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其攻击矛头通过这三人和《前线》杂志、《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直指他们身后的北京市委，成为文革的直接突破口。

在江青直接策动下，继 1965 年 11 月批判《海瑞罢官》的前期预热、不断升级以后，通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1966 年 5 月 8 日《解放军报》)、《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关锋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报》)和《评“三家村”》(姚文元，1966 年 5 月 10 日《解放日报》)两文南北配合，火力集中，利用索隐、构陷方法，深挖“三家村札记”的“微言大义”，说这些文章“以古讽今”，为的是“恶毒地污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派机会主义份子、攻击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事业”。以此认定存在一个“三家村反党集团”；邓拓被认为是黑店的“掌柜和总管”(罪证是《燕山夜话》)，吴晗是“急先锋”。在全国范围动员掀起批判高潮；连工农兵代表王进喜、陈永贵、黄祖示都被驱谴上阵，击鼓叫骂；中小學生也跟着贴大字报吵吵。

选择三家村做目标，主要是为了虚构一个“反党集团”。由吴晗而邓拓而三家村，正式揭开了针对北京市委和当家人彭真的政治清算的序幕。而彭真的后面则是刘邓。对三家村的批判，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邓拓、吴晗在不断升级的批判、迫害中，含恨而死(邓 1966 年“五一六通知”2 天后的 5 月 18 日自杀，吴死 1969 年 10 月 11 日在关押中)。

1978 年 8 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吴、廖三人所作的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为邓拓、吴晗举行追悼会。

2. 邓拓等挨批以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上挂下连，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矛头转而指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并流行一时，成为无接触传染病毒，因此罹祸者甚众。形成恐怖气氛。连与文化无关的小单位，也要揪个“三家村”出来；否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 年 6 月 1 日)写道：“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更是以最高权威从政治上定调，一个思想治罪的网罗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

常常撰文发表赚额外稿费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欢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爱好者，在当时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1966年5月、6月；《红旗》杂志1966年第7、8期；任捷《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南方周末》2005年10月20日）

### 三家村札记

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的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邀请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三人皆北京政府各机构（市委、市政府、统战部）官员，时相唱和。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村”），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确实有所讽喻。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批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这一批判源于同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中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同年5月批判再次升级，被姚文元、关锋文章，用断章取义、曲意构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手法，把它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连《北京日报》的批判都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并号召“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文艺批评已然成了引申构陷、政治审判的同义语。

批判“三家村札记”，意在借以打倒它们的作者。调子定得越高，越方便以此为突破口，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成为扫清外围、中央突破的文革前哨战。

文革后为“三家村”、“三家村札记”平反时，三人已经故去二人，只留下廖沫沙一人。197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收集出版了《三家村札记》（5000册），2000年代“孔夫子旧书网”上“森林书店”有拍卖，8成品相，叫价6元。

一位研究者评论说：“三家村札记”的作者们“对‘大跃进’以来的严重形势有一定的清醒认识，同时又兼有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前者使他们站在党性的立场愿意对纠正党内及社会上各种不正风气作出自己的努力，后者使他们在言论中不自觉地体现出知识分子的良知传统……他们的杂文以渊博的知识说古道今，有些颇能抓住时代的弊端，如对当时以大批判开路的时代风气以及吹牛皮、说大话的浮夸风等都有所针砭。‘三家村’的风格各有特点，邓拓的文章有强烈的针对性与批判性，吴晗的文章带着学者气与书卷气，廖沫沙的文章则显得平和亲切。”“他们对现实的建设性的讽喻之所以不能见容，与当时的党内决策者没有能够及时完成从战时文化心态向和平时期的建设心态的顺利过渡有关。邓拓等人的批评性意见虽然在本质上没有企图否定当时的权威，但却被最高决策者以战时敌我‘二元对立’的文化心态来错误理解，将他们善意的劝谏当作‘敌人’有组织的进攻，所以必须给以毁灭性的打击。”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1966年5月、6月;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八章 对时代的多层面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触及灵魂

动宾词组。触及灵魂(文斗)最初是作为武斗(触及皮肉)的对应词提出的,说是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武斗(不易控制而且败坏“革命”声誉)只能触及皮肉。但很快在红卫兵词典里,触及皮肉成了触及灵魂的途径、方法。[注]制止武斗的灭火剂居然成为助长、推动武斗的催化剂,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后来触及灵魂又与斗私批修联系在一起,要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破私立公——因为私字(欲)已经成为大联合(毛泽东企图恢复政治秩序的一种努力)的障碍,膨胀起来的造反组织被自己手里的权力诱惑了,所以要消除派性才能一致对付走资派,被认为需要从触及灵魂的斗私批修做起。并且还被推广为一种普天大同的强制性全民道德规范:“要一心为公,一切为公,一生为公”;“让‘公’字统帅生命的每一秒钟”。

灵魂(animus)作为外来文化概念,是独立于肉体的自由意志、精神,可能脱出现实秩序的桎梏、束缚,是一种虽然微弱、却对于极权最可怕的难以控制的力量。而文革要求的是颠覆既定秩序基础上的四统一:统一思想,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所以它被当作剥削阶级的最后堡垒、藏污纳垢的渊薮。

天天读的学用结合、联系实际,斗私批修,没完没了的自我检讨,通过揭发、批判自己来表示对革命的顺应、归附,连私隐也要暴露出来(刺刀见红)以自虐讨好时俗,成为触及灵魂的忏悔形式。达到理性和情感的双重麻痹。不但外部行动要无条件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要内心自我也处于不停的悔罪之中(甚至讨厌自己);不但言行不能与革命唱反调、不相容,连头脑里的一闪念也不允许、不放过。此类外在、强制的活动在特殊情境中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生出某种貌似自觉的体验,在潜意识层起作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专政到连人的内心也都要一齐霸占了去。

这其实是以取消私字的名义,取消人的自由意志,以公的名义确立权力的绝对权威,让人无条件服从权力。取消人类有史以来积累起来的文明(法律、道德)、秩序个我良知,让肉体生存的畏和怕以“公”的名义苟且偷生。灵魂作为独立意志的大本营,被冠以“私”、“罪”的恶名。敢于触及灵魂,就是要人不怕上纲上线(给自己帽子戴得越大说明触及灵魂越深),臣服于权力,变成一个无脑人,让得势的政治权力成为你的脑子,代替你思想,权力喜欢给它的悖逆者派以什么样的罪名,你就接受什么样的罪名。承认灵魂是卑琐污秽处所,承认自己有先天的罪恶,通过对“私”(个人欲望、利益、权利)的否定、阉割,为权力加冕,把政治道德化的同时,也把道德政治化。为权力的暴虐、肆行,扫清自由、独立意志抵抗的障碍。运动过关阶段的检讨,更是在强大压力下的城下之盟。

这恰与中国古代传统若合符契:儒家圣贤们就要人通过诚意、正心、修身修炼工夫,存天理、灭人欲(朱熹语),矮化自我,取消自我,认同于政治现实,把个体纳入到君权至上的政治秩序中去。使人们从精神到肉体都被改造成听话的“工具”、“挖山不止”的愚公——具有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新人。

[注]北京六中学生打死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同学王光华。他们手持各种凶器，群殴王光华 30 分钟，边踢打王的头部、颈部，边恶狠狠地叫：“触及触及你的灵魂。”第一次被打半死，不久再次毒打致死。

(参考资料：《用文斗，不用武斗》，《人民日报》1966 年 9 月 5 日；《灵魂深处闹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谈破私立公》，《人民日报》1967 年 3 月 17 日；杨伯骏译《白话四书》，岳麓书社 1989 年版) 专案组

名词。对重要事件和人专项立案，进行单独调查、处理，以便核实定案。它是文革时，搞运动、搜集材料、处理运动对象的主要方法和组织形式。从早期、中期到后期，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单位，从党政军、工农商到科教文，层层都有各种名目繁多的专案组。其职责是，负责调查本单位的“牛鬼蛇神”、“走资派”等的材料，或某一事件的材料，据此给这些人定案。

专案的立案是针对某事某人的，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它不是刑事法制形式，却有刑事法制的权限（公检法被砸烂，专案组就有了公检法的职能）；它的人员组织从各机关单位保卫、政工部门，或情报部门抽调而来，人手不够时有的就是一般党员或政治积极分子（造反派）。抽调人员只问政治上是否可靠（成分是否红五类、是否完全忠于派定职守），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缺乏办案的专业知识、技能，是相对独立的临时性机构。可以对被审查对象进行人身限制（投入监狱羁押或本单位拘禁）、侦察（内查外调）。但它的权限往往却能够跨越部门权属的分割。

被立案的事和人，除了大小当权走资派（从刘少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到基层单位的党政头脑），还有文人（巴金、陈白尘）、艺术家（演员上官云珠）、造反派领袖（清查五一六、上海炮打张春桥的复旦大学红卫兵），历史问题如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饶漱石[注]。

这类专案组的认识逻辑，要求打破以往公安工作的条条框框，反对资产阶级刑事侦察那套完整严密逻辑链条的形式主义，不讲究唯证据论。它的工作程序，往往是先有结论，奉行“有罪推定”（被概括为“立足于有，着眼于是”），先把调查对象置于有罪地位，再找材料，对号入座；相信口供，而且带着框框硬要口供，不是以第一手的原始材料为依据，流行“逼供信”（这种“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的做法还在全国公安会议上作为经验加以推广）；工作方法是历史情况打开缺口，不惜捕风捉影，牵强附会——被捕过的就是叛徒，从国外回来、有海外关系的就是特务；把已经有过结论的问题冷饭重炒，把一般性工作失误、认识问题上升为路线问题，实际上就是“以人划线”、按需办案。从立案、办案到定案，都搞神秘主义，不受程序限制，没有监督，只听命于权力，服务于权力，滥用权力。在“宁左勿右”的工作方针指导下，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以定好的口径索要调查材料成为普遍做法。最极端的就是诱供、逼供、殴打、超时审讯，并由专案组编口供，起草好以后让接受调查者誊抄一遍。甚至有专案组人员用手枪顶着脑门，逼迫人签字证明被调查人是“美国战略特务”的。

专案组的实际作用仅仅是给已定之罪补办手续。单位、机关或省市各级地方的一把手往往是专案组的组长，或经常听取专案组工作汇报并指示办案方向、方针、步骤的。江青、康生就是负责刘少奇、林彪专案的指导者。其工作对象、内容、进程，都有严格的保密制度。省、市、中央的高层专案组往往成为权力斗争

的工具。

据统计：在当时的国家干部中，被立案审查的占干部总数的 17.5%；在当时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中，被立案审查的竟占 75%，也就是说，4 个高级干部中就有 3 个被立案审查；当时全国的冤假错案多到达 300 多万件，受冤假错案牵连影响的多达 800 多万。

文革后，中共 11 届 3 中全会决定，永远废止适用于运动的专案组办案形式。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就从撤消各种形式的专案组开始。

[注] 1968 年 2 月上海海关参与市革委会材料组领导的由上海、北京等 15 个单位联合组成的“伪海关专案组”，即审查解放前江海关税务司、帮办、分卡主任的专案组，又名 220 专案组。上海海关有 68 人遭非法审查，历时 7 年余。

（参考资料：吴励生《个案分析》，“飞天文学网”<http://www.ft77.com/xlyz/ArticleShow.asp?ArticleID=219>；《上海海关志·大事记》，<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466/node55438/>；李耐因《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人民日报》1980 年 12 月 6 日）

## 政审

名词，“政治审查”的简称。每当招生、升学、招工、征兵、提干、入团、入党、运动扫尾阶段的人员处理等决定人的社会等级（包括职业、身份、地位、薪金）的升降的关口，都要填写个人简历表。而对个人简历表内容（主要是成分、社会关系、个人经历）的核查（通过公函往来或亲临查访的外调），就是政审。个人简历表因此亦称“政审表”。

政审的具体内容包括：家庭出身（父母亲和爷爷、奶奶的成分，有无海外关系、是什么样的海外关系）和本人的政治思想表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有无受奖励或处分的情节、道德品质、缺点和不足、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旁系血亲的政治历史情况，等等。如果是保密单位（公安、国防科研等）或政治条件要求高的岗位（如政治人事工作），还要对旁系亲属、配偶、未婚对象（确立关系前应向组织汇报）进行延伸政审。

政审的方法为：查阅本人档案及有关资料；向政审对象本人及所在单位、学校的保卫部门、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的派出所、居（村）委会了解情况；向政审对象的主要直系亲属所在单位领导、同事、人事部门和村（居）委会、村（居）民代表、派出所了解情况。

理论上说，政审包含政治历史和现实表现两个方面。但现实表现的变数较多，显得不确定；政治历史状况则是已然事实，板上钉钉，不容质疑、较少扯皮。由管理档案、负责人事工作的政治处干部（或临时抽调协助的其他人员）担当此项工作。这套做法不始自文革，但在文革达到空前绝后烈度。

“出身 = 阶级归属 = 政治态度 = 立场 = 阶级本质”的阶级斗争阐释模式，和追求纯而又纯的思维定式，赋予了个人简历表反映出的历史状况的极端严重性，因此政审在决定人们的现实处境具有较大影响力。政审时，工作人员往往带有安排领导的倾向性意见。所以提拔前的政审使人既兴奋，又使人忧虑；定案前的政审，被运动对象、灰五类、黑五类出身者视为畏途（优先被列入另册）。解释个人简历表的政治含义，并给予相应安排、处置时，总的倾向是宁左勿右、决不宽

圈；但仍有可以通融的余地。当事人的工作表现、人事背景、人际关系仍能起到有限的弥补作用。

政审的结果一般不做出正式的书面结论，只做接受不接受（入伍、升学、招工、提干、入党团等）、晋级不晋级（薪金、职务）的决定。一旦决定就是终审判决；不接受申诉，经手人的审查只是受单位委托的职务行为，没有被追究的责任。无论正确与否，当事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正确对待——无条件接受决定，并视之为绝对合理或组织上的考验。

政审本来只是系列考察的一个内容、环节，但在阶级路线的指导思想下往往成为具有一票否决作用的一个方面。1978年高考才把政审要求改为降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的权重，“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但文件中仍然留有“同等条件下工农子女优先”的尾巴。

2000年代的征兵、入党、公派出国等的遴选工作仍保留了政审做法，要求对“本人有无历史问题、“文革”、“八九”政治风波及其他重大政治斗争的表现”作出考核鉴定，并作为重要参照。

（参考资料：《苦界》，“多来米中文网”  
<http://www.goldnets.com/yc/books/629/62873/1/9.4.html>；《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审工作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http://www.mps.gov.cn/webpage/showEachSpecial.asp?ID=1424&upID=359>）

## 死老虎

名词。意指这样一类人：他们作为敌人的政治身分早已确定，被剥夺了所有权利（政治、财产、人身），随时可以用来当作批判、斗争的靶子；以发动群众，煽起狂热，造成轰轰烈烈的运动气氛。释义可参见“老运动员”。

这些人，或者是在中共建政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虽然他们由于被剥夺了财产，丧失了政治基础，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亡，但仍有作为假设敌的义务，来帮助调动群众的政治狂热；或者是文革中被揪出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过去占有了政治、经济特权，现在是轮到他们倒霉的时候了。整治他们，能满足多数人的义愤，保证运动不落空、不冷场。

文革初期，前一类人被走资派抛出来当作活靶子、替罪羔羊，应付开展运动的需要，保自己过关。但他们的人头、对象是确定的，材料乃至细节都是公开的，已经被反复批斗过多次，没有变数、意外，缺乏新意，是被开采过度的废矿、嚼之无味的鸡肋。他们已经被多次运动训练得一切顺应领导、群众意志，无需费事什么罪名都可以应承下来（不应承又能怎样？只能自寻苦头）。成了一场不需要发现，对手无力抵抗、不构成威胁，一打就倒、不打也倒、驯服如死的战争，难免发生审美疲劳。寻找走资派和对立面中的软肋下手，成为文革政治的热点。

官方舆论机器不断提醒人们，被剥夺了权力的走资派（被“点了名或者罢了官”）不是死老虎，如果不能“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他们还是活老虎”。“一旦苏醒过来就会咬人”，“可能复辟，搞一个反革命联合，把劳动人民淹没在血泊中”。甚至提到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高度。把派性阻碍大联合的账算到走资派头上。

但对造反派中政治热情亢奋的激进者来说，这还不够，因为运动已变成这样一场嗜血的游戏：除了通过烽火连天的派性斗争攫取政治权力的争夺、追逐外，

阶级斗争警惕性激发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所以不喜欢静止的现成的猎物,更乐意通过寻找发现新的打击目标——有“现行”的活老虎——以未知悬念的延宕和刺激的强度,提高运动和斗争的乐趣。所以热中于到处搜集情况,希望从蛛丝马迹中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能够显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政绩。而这种“人为鱼肉,我为刀俎”的冒险,既安全可靠,又决不枯燥乏味。除非下一轮捕猎者成了别人的猎物;而捕猎者本身的“冒险”总是安全的。对他们来说,死老虎是开胃酒,是正戏演出前的铺垫、开场锣鼓,斗走资派和新发现的猎物时,让死老虎陪陪斗,造造气氛,也很好。也不排除——级别高的死老虎还可以给批斗打虎者立立威。

在特殊情况下,强调自己的死老虎身份,可以成为老运动员们转移视线、以图自保的生存技巧。斗争目标多的地方,死老虎或许会侥幸被忘记,有时也能少受一点折腾磨难、皮肉之苦;斗争目标少的地方,有时被对立的两派临时抓瞎来作为轮流斗争的政治资本,吃了加倍的苦。

而那些习惯吃现成饭、打死老虎的人和主张,会被看成是有意“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干扰运动;至少是右倾保守,怕麻烦、图省事,缺乏革命彻底性和斗志的表现。

(参考资料:傅崇兰、张德信《“死老虎”论可以休矣!》,《人民日报》1967.07.26;杨勋《心路—良知的厄运》“第34节 死老虎当会计”,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 政治任务

偏正词组。与“中心任务”(参见该条)涵义相近,有点让人捉摸不定。搞政治运动、文艺调演,抓卫生突击、计划生育,安排春运、节日供应,赶工程进度、拿体育金牌,刷标语、推广普通话……所有与政治运动直接或间接相关,上级交办的其他带有突击性质的事项,都可以算作政治任务。因为文革社会运转的原动力是政治性的,所以泛政治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服务、服从于上级意志是其最大特征。

任务带有上级向下级派遣的意思:指定担任的工作、指定承担的责任。没有商量只有服从。1949年以前、以后,中共大量干部队伍是从军队转业其他行业的,很容易把这种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带到党政机关、工农商学卫、社会地方的各个领域;中共善于运用全民动员、整体一致的组织方式,形成集中一切资源打歼灭战的社会整合方法。政治任务作为党组织的部署、意志,在中共意识形态里具有价值的绝对性、至上性、优先性,它容许对逻辑和常识的超越、突破,是一种特殊的游戏规则。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论证水稻亩产万斤就是政治任务,所以可以突破事实、科学、规范、良知的界限。把一项具体工作纳入政治任务范畴,意味着对它超常重要性的强调,赋予它可以特事特办的特权,其他环节、系统都会因此自动找到配合默契的角色位置、运转动作。所以,它既是价值观又是组织原则,既是运作程序又是操作保障等多种要素的统一体。

这一套东西起源很早,文革尤甚。文革邮票有毛泽东形象,所以盖邮戳得保证不污损毛泽东形象,这就成了政治任务,由邮政总局1967年4月30日发出专门通知;破四旧,批斗走资派,接待红卫兵大串联,到处塑、立毛泽东雕像,制造红海洋,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讲用会,大联合,突击发展造反派入党,上

山下乡，推广赤脚医生，改田改土，批林批孔，工农兵上讲台……都是政治任务，它成了包罗万象的宝葫芦、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1976年2月张春桥通过文化部下达“要创作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和党内走资派作尖锐、复杂、曲折斗争的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就是以“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一项根本政治任务’”的名义。

在政治挂帅年代的政治任务面前，其他常规性的业务工作，都得避席让路，无条件把时间、人财物等安排的优先权拱手交出，不能考虑经济效益的回报。可以创造出一切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人工环境和条件的极致。这是“突出政治”的党性原则、组织原则所要求的。但是，政治任务考核的标准，有较大灵活性，基层工作人员为了降低机会成本，也有应付了事的；把主要精力放在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上。为了检查过关，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在路口、路边容易看得见的地方，上级到场时做做样子，标语、大字报刷得重重叠叠，口号喊得山响，看上去轰轰烈烈，实际换汤不换药；像猫盖屎一样。抵制、不完成政治任务的后果通常是不换思想就换人（领导）。

政治任务可以是全国一盘棋的自上而下，也可以是各级领导层层加码的自行其是。有了政治任务这剂的万应灵药，官员们的意志随时都能方便地自我加冕为官僚组织的行政命令、尚方宝剑，不必顾忌法律法规的制约和正常审批程序，无需事事动脑筋调查研究、遵循客观规律的论证、决策、实施，一本黄历尽可以不变应万变，反正民意、民生统统都得服从政治需要，更加不在话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在执行中理解”——用政治意志、组织措施代替客观现实和科学规律，就是政治任务理念的内在逻辑。

后来该词在日常运用中也泛化为具有绝对优先权的各种事务的同义词了。带有更多修辞性和世俗意味。但是搞政绩工程、发行党报党刊、反腐倡廉、防“非典”、学习十六大文件、扶贫摊派……都是政治任务。臭名昭著的政治挂帅肩负着政治任务的旗号仍在偷偷借尸还魂。

（参考资料：金凤《怎样检查和修订爱国公约？》，《人民日报》1951年5月23日；夏玲《闲话“政治任务”》，“河南报业网”2005-08-17；缚来宾《好一个“政治任务”》）

## 蒯大富

（1945— ）江苏海滨人。1963年加入中共。1967级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1966年是班文革组长。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曾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毛泽东否定工作组后，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毛泽东点名、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他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得到周恩来接待，向其了解清华文革情况。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负责人（人称“蒯司令”）。曾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有《蒯大富人生权术36则》传世（载《天涯》1998年第一期）。

同年底在张春桥授意下率先提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4月导演了将王光美揪回清华批斗的闹剧。7月组织北京各校红卫兵包围中南海，成立“揪刘火线”；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喊出“打倒徐向前”，并主持召开各地红卫

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其间曾多次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接见。

1968年夏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并在工宣队进驻时发生开枪死人事件，受到毛泽东斥责。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三〇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后送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1978年4月19日以“反革命罪”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

1987年刑满开释回宁夏原单位工作。1992年偕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任工程师。1993年春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不敢以本名示人。曾婉拒凤凰卫视采访。表示承认自己文革中的过错，但不能接受判决书对其怀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动机”的指控。认为文革只有两年，不很同意说“上了毛泽东的当”的说法。

一些文革过来人对他的过去持批评态度，但又表示理解，因为那是一代人、几代人的共同迷误和迷失。而他为此已经承受了17年监禁，论惩罚也足够了，有权利开辟自己新的人生道路。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P17；《文革英雄沉浮录》；田炳信《文革学生领袖蒯大富：不同意说“上了毛泽东的当”》，《新快报》：“网易论坛”<http://bbs5.news.163.com/board/index.html?url=http%3A//bbs5.news.163.com/board/rep.jsp%3Fb%3Dhistory%26i%3D77293>）

## 罗思鼎

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谐音“螺丝钉”，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另有丁学雷、宫效闻、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谐音“放眼量”）、金风、方耘、常峰等80多个笔名（各个写作小组又有自己常用的固定笔名，如文艺组的丁学雷、方泽生、石一歌、任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笔名还是罗思鼎，所以成了上海市委写作组（大批判组）的代称。重头的文章也使用上海市委写作组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名义。因为开始办公地点在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私家欧式住宅的丁香花园（长宁区华山路），所以又叫“丁香花园写作班”，后迁至徐汇区康平路89号。

正式组建于1971年7月，迄于1976年10月（据朱永嘉回忆，该写作组最初萌芽时间在1960年代中期中苏论战时，是复旦大学七名年轻教师相约共用的笔名）。是一个编入政府系列、形似松散庞大而结构紧密的行政管理系统，利用“分层控制、多方插手”方法运作，直属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代管）。两人给写作组的批示、书信、电话多至360次以上。朱永嘉、王知常、肖木是该写作组的主要负责人；下分哲学组、历史组、文艺组、经济组、党史组、文艺摘编组、

自然辩证法组、哲学小辞典组、秘书组等，又下辖有若干外围小组（如“石一歌”和各种教材编写组）；外围小组人员编制仍在原单位，经费由所在单位担负、筹措、拨付，分合自如，高度集中。在北京设有联络处。由于当时无宣传部的设置，写作组被认为实际上兼有部分宣传部的管理职能。

其成员历史组以复旦大学教师为班底，别的小组另调有原宣传部、作家协会、华东师大、上海师院等单位的人。计有陈冀德（文学组组长）、陈孝全（石一歌组长）、胡锡涛、郭绍虞、徐辑熙、章培恒、王绍玺、谭其骧、陈旭麓、王守稼、吴乾兑、刘修明、吴欢章、孙光萱、余秋雨、丁志伟、戴厚英、刘景清、姚汉荣、高义龙、胡万春、段瑞夏等近 50 人（加上外围成员，清查时的人数有 300 人）。把持有《学习与批判》、《朝霞》、《自然辩证法》、《教育实践》等 8 个刊物和复旦大学、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撰有文章 1000 多篇。代表作有《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评的投降主义》、《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出笼的前前后后》、《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该写作组活动的历史最长，参与配合的运动最多；写作文体多样，有政论、史论、杂文、小说、教材等，产量最高；组织分工细致周密，作者队伍庞大，直接掌握的刊物最多，可以独立新形成协同作战、轮番冲击能力，声势上超过其他御用写作班子；形成“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的格局。

另外还担任了搜集、编印中央、地方党政负责人材料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情报的工作，仅密报张春桥、姚文元的就有 1000 多份。以至于其成员私下议论他们“所干的事，说出去是要杀头的”（代替了文革初期“游雪涛”的功能）。有人据此论定它除了写作班子外，还兼有“情报班子、参谋班子”职能。

1976 年 10 月后，该写作组成员除个别人被拘押（朱永嘉、王知常）、隔离（陈冀德）都受到三年审查，有些人长期受影响，著述出版不顺利，无法评上高级别教授职称（陈旭麓），不能参加学术会议，更遑论出访了；日后再不愿提及这一段伤心史。1977 年 9 月 7 日国家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清除中小学教材中“四人帮”及其余党控制的写作班子包括罗思鼎（另有梁效、池恒、初澜、江天、唐晓文等）的言论、文章、形象。

研究文献：申克鼎《一支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炮队”——评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红旗》杂志 1977 年第 11 期）；陈智超《不能忘记历史——评》（《北京农业工程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 年第 3—4 期合刊）；余开伟编《忏悔还是不忏悔》，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 年版

## 活思想

名词。活动、变化，游离于组织之外、游离于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规范要求（革命化）之外的念头、想法。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对象。一个“抓”字就把活思想推上了被告席，摆在了被整肃的地位上。流行于 1961—1971 年之间。

在“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林彪）观念[注 1]引导下，突出政治，思想革命化，统一思想，是 1960 年代所有单位的工作重点。并总结出一套工作方法。[注 2]这一套观念和方法，1960 年代中期从部队推广到了地方和全国党政工农商学各个领域。



最初活思想是作为强调思想工作的针对性、防止政治工作空对空提出来的，后来膨胀成为对一闪而过、私人（非组织）性质的思维活动（被概括为私心杂念）也要紧抓不放，用毛泽东思想统帅生命的每一分钟——这种强制性的道德律令，在把政治道德化的同时也把道德政治化。通过党团组织的“民主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常常演变为斗争），“帮助”人们“认识”、“转变”思想、立场。成为抓活思想的形式。抓活思想被列为抓阶级斗争（对敌）和思想建设（修养）的重要内容。与集体、革命事业、党的领导被视作天经地义相关，个人被视作封建修人生观、利己倾向、不洁思想随时会泛滥的载体。

《人民日报》1964年（37期）、1965年（22期）开办了“活跃在各地报纸上的活思想”的栏目，把各地媒体报道反映的实际工作、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归纳到“活思想”概念上去，在让人感到新颖、生动的同时，把突出政治、抓活思想的观念，做了潜移默化的推广（实际上用“政治正确”归纳一切，否定了社会生活内容、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性，窄化、歪曲了人们的视野，蕴涵着极大的危险）。是向文革过渡的滑行过程。

其极端发展到文革，就取消了私人生活空间，连个人的情绪波动、个人见解等，都被混同于与公众生活中的政治观念不一致甚或严重对立的离心倾向，连梦寐、口误、非语言表达也会被附会、拔高到政治范畴，进行是非判断，并把它作为批评、批判、惩罚的对象。日常生活被笼罩在政治化阶级斗争的恐怖气氛中。同时，在经常的“斗私批修”（个人或集体的忏悔活动）中，也把活思想作为需要不断警惕、检讨、自我批判的罪恶，陷入神经质的反省和无休止的自责之中，从而完成了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熔铸到个体生命形式之中的内化。结果是人们连记日记都不敢真实记录。

虽然随着林彪在政治上的倒台，作为概念工具的活思想退出了舆论宣传，但这种对非组织思想情绪的捕捉、管理、整肃的极端方式，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清算。党团积极分子随时向组织汇报思想（活思想）和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仍然是常规化的政治工作内容、方法。仍活在口语里。

2000年代有把非分之想（外遇）、不拘一格的思想或内心真实想法，戏称为“活思想”的用法。是一种基于修辞的反讽，对文革意识形态有解构作用。

从“旧书、收藏、古旧书、古籍、二手书、旧书店、图书、杂志、小儿书、报刊、孔父子旧书网”的目录里，可查到“兴舟书斋”（2005年4月20日）有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抓活思想的六十多个怎么办》（周口专区办事处1967年4月翻印，64开，267页，9成品相）出售。索价12元。

[注1] 1960年10月，林彪在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正确处理政治工作领域中的四个关系问题：在武器与人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事务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上，活的思想第一。归根到底，是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这“四个第一”被1963年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规定为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

[注2] 总政治部在1961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10—11月）上总结了抓活思想工作的十条经验。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回答和解决连队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提高觉悟，做好工作。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立竿见影。二、从阶级教育入手。三、从实际出发，抓好两头（“党

的政策和上级关于形势、任务的指示”和“连队思想动态和实际问题”两头)。

四、抓住苗头，把工作做在前面。五、坚持说服教育，以理服人。六、从多数人的水平出发，逐步提高。七、思想教育运动和经常性的教育相结合。八、人人做思想工作。九、思想领先和注意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十、运用活教材(战士自己的切身经验、自己接触到的现实生活中的大量事实)活方法，来进行教育。

(参考资料：新华社《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几个名词简释——“解放军报”编辑部答读者问》，《人民日报》1964年1月23日；方宏礼《被禁锢的“活思想”》“博客网”2005年8月4日<http://column.bokee.com/82657.html>)

## 阶级斗争新动向

意指阶级斗争的最新表现、可能危及现实政治及其权力的种种隐患，和揭示这种表现、隐患的努力；一种把握现实的感知-思维定势、认识-分析方法。它要求从日常细节的蛛丝马迹中寻找有悖于现行政治、政策并危害党国事业、利益的思想倾向、言行、政治意向。在官方舆论机器上流行于1968—1970年，而实际影响却远远超越了这一时限。

从宏观大局上看，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必然要求、支撑，如果没有了阶级斗争文革还有什么必要；从经历的运动阶段上看，恰值整党建党、实现革命大联合基础上成立革命委员会、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陈整风等时期，它强调的是对阻碍建立新政权形式的势力，被文革剥夺权力的政治势力，不能麻痹大意；从微观上看，它给了层层组织者以口实，使他们的整肃合理化。不同时期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具体名义，与不同运动对应着有不同“上挂下联”的内容(帽子)。

阶级斗争新动向理念的对立面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它凭借的武器是革命大批判。被推荐的典型建立了形势分析会制度，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上级革委会的有关指示和安排、报纸上的重要社论，去套下面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对号入座，不管它是否削足适履。

诸如，对工作安排或基层领导有意见、单纯的畏难情绪、政治性口误、与黑九类子女(不管其现实表现好得如何无可挑剔)联姻、欣赏沉醉于四旧(可能是无意用古董茶壶请人喝茶之类小事)、普通的人际矛盾(只因为一方成分不好)、钻研马列原典(不被所在基层组织负责人所认同)……都能被附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并且鼓励热中于打小报告、提供情报的人：入党积极分子，心怀仇隙、怨望者，急于摆脱窘境的运动对象，等等。基于阶级斗争理念的前理解，形成把握现实的感知能力、对认识对象归纳时的非现实特征的过度发展(类似生物学上的特化[注])，是复杂社会生活被高度单一化、政治化的结果，同时又成为它继续恶性膨胀的原因。对现象进行毫无节制的无限推衍，直至抽象到可怕的本质——政治罪名上去。既大胆假设(不问事实)，又大胆求证(不讲逻辑的因果)。并且有追逐离奇情节、耸人听闻的戏剧性趣味、偏好、冲动。

文革作为缺乏合法性基础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处于极其虚弱的地位，因此对异端有过敏性偏执。由于对安全系数的过高期许、定义(在安全感缺乏的恐惧推动下产生类似受迫害的妄想)，把先下手为强的主动进攻当作了最好的防御。同时营造社会处于危机(资本主义复辟：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中的恐怖气氛，成为诱使社会成员向统治者授权、并产生认同感和归宿感的手段。

阶级斗争新动向观念蕴涵着对事物、矛盾、认识多样性的否定，绝对不容忍，对统一、一律的过分强调，扼杀了社会的活力和发展的多样性可能，也最终削弱了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为了维护极权而损害了极权，走向自己的反面。

2000年代有善于修辞者，把政治性新趋势、影响重大的新情况，戏拟、夸张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以期陌生化效果引起受众的新奇感。

[注]引起大规模绝灭包括恐龙绝灭的内因是生物特化。凡不与自然平衡，而造成生物体某一方面非自然的过度发展，被称做特化。食物特化、环境特化、体能特化、生殖特化，都最终将导致演化失衡，所以特化往往是灭亡的先兆。

(参考资料：新华社《贵州黔西县洪水公社革委会建立形势分析会制度 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阶级斗争新动向》，《人民日报》1968年6月12日；周舵《自杀——一个案例研究》，“爱智论坛”；殷鸿福《生命演化再次引起关注》，原载《大众科技报》，转自“学生科技网”)

## 政工组

名词。政治工作组（或“处”、“部”）的简称，文革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里的部门设置。其时有批判官僚主义的标榜，所以时尚表现出一定程度“抑”官倾向。初期往往有弱化、淡化官阶做法，精简机构，把官阶往小处说，即其体现形式之一。中、后期“组”改为“处”、“部”（级别高、规模大的单位），曲折透露出官本位公开复辟（有“一夜回到文革前”之慨）的信息。

在相当于省市级政府的革委会里，一种情况是一个统管宣传、文化、教育、群工等职能部门（早期；多数），一种情况是职能部门里的一个分支机构（中、晚期；少数）。在一般单位，兼有宣传、人事、保卫、办公室等工作职能，而以人事工作为主（不同地区、系统、单位的具体设置上，略有差异）。在各职能部门里的地位特别显要，由一把手直管、负责。管理干部职工的档案，人事任免的报批、程序，组织政治学习，政治运动的组织、管理，治安保卫乃至计划生育、家庭纠纷调解、工青妇工作等。凡是够得上“中心工作”序列的都可以纳入政工组（处、部）的工作范围。其职能范围比文革前更为扩大，成为包罗万象的不管部；人员编制亦不断膨胀，一扩再扩。较多借用、以工代干者。

在接连不断的运动中，承担运动的组织，运动对象的遴选，材料的搜集（内查外调），批斗的安排实施，定性、结论、处理的议事、落实，运动后期的甄别、落实政策，工作总结等等。

由于政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工组（处、部）经手、管理、决定着一个单位的运动进展，能接触主宰运动中的人们的命运的部分，工作性质决定了它的透明度最低：人们只知道结果不知道过程（甚至结果也不全知）。因此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且令人生畏。它的工作人员都是出身红五类的党员干部，其中不少是复员转业军人。经历了文革军管、军训和“全国学人民解放军”风尚的熏染，更促使这一趋势定形化。这些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最高学历高中），成分好、政治历史清白，思想相对单纯，较少沾染市民经验、智慧，被认为政治上可靠，组织观念强（作为城市的异己者自然倾向靠拢组织，以求自救、发展）；比其他业务部门更多接触领导层，工作、忠诚易于被了解、重视，更多擢升机会，成了“干部后备处”。这一惯性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很久。形成单位政治的“政

工系”现象。

1980年代、1990年代以后，政工组（处、部）又被分解职能专门、细密的“人事”、“保卫”、“办公室”等部门，机构膨胀、冗员日增。政工组（处、部）的运动职能消亡，其重要性也随经济工作日趋占据中心地位增强，相对下降。部分连名义也做了更易（军队、院校里仍保留了这样的设置）。2000年代前后改称“人力资源部”。

（参考资料：人民解放军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武装部《把我军着重政治建军的光荣传统带进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1968年8月3日；《广州市志》“第二节 政权机关”）

## 组织起来

谓补结构短语。使安排分散的人群纳入到某种有序的统一组织和社会目标里，从而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整体性。这是中共社会动员和人事管理、社会整合-控制的方法。

1949年以前组织起来的针对性，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在中共早期战略家们看来，近代国家、社会的积弱是与人民处于一盘散沙，没有觉悟，没有目标，没有组织是相联系的。毛泽东写于1919年的《民众的大联合》（见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即主张，宗教、学术、政治、社会的改造，“都必有大联合”，才能“鸷旗换了红旗”，“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求到他们的利益”。具体办法就是通过吃大户、打土豪、分田地，把贫困农民组织起来闹革命；1927年后的10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战的减租减息、四年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植根于土改、减租等争取到的广大兵源，及其合法性。其极端的表现，是儿童团的发动、组织和解放战争中大规模的支前运动（陈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的两轮车推出来的）。

1949年后组织起来的针对性，是现代化和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因为中共已经处于执政党地位，组织手段的正规化、多样化、细密化，更加今非昔比了。从组织系统看，中共党的系统有中央、省市县区、单位党委、支部、小组，社群有各种群团组织（工[会]青[年团/红卫兵]妇[联]少[先队/红小兵]）[注1]、民主党派，有相应的各级行政管理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有全国、省市县区、乡、村和街道公安部、局、派出所、居委会（文革中的向阳院）……形成一个纵横交错、无所不至的网络系统，渗透到社会的神经末梢。从管理手段看，在政治上有人事档案管理（所在单位），通过记载当事者的历史、现实情况，使之就范于现存秩序；在法律、治安上有户籍管理（所在地段、乡村）[注2]，在物资供应上有粮油棉布票证的发放管理（所在街道、粮店）……而政治学习、组织生活、谈心、思想汇报等一整套制度，更是通过意识形态、人际关怀的劝说，把最高层的统治意志通过环环相扣的组织系统，渗透、贯彻的细胞式、单位化的基层组织，其功能强大达于无微不至、无远弗届、令人恐怖的地步。

社会生产则通过计划形式组织起来（以统购统销作保证），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工业化的一个发展路径。一大二公的单一经济成分，连续多个5年计划把全国经济纳入一盘棋来规划，以行政命令取代经济规律（党政不分的运行机制），以举国体制极大地调动了现有资源，速成式地搞起了一个工业基础，却是以牺牲

经济多样性和剥夺农业、农民利益为代价。经济活力越来越枯竭。

运动就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组织形式。据统计，文革 10 年每年平均有 3 次运动以上，大运动套小运动，一个没完又来一个：红卫兵、革委会、专案组、学习班、“五七干校”、群专（参见“群众专政指挥部”词条）、向阳院……没有制度约束、规范的阶段性组织，破坏了政策的连续性和法制的稳定性，在不间断的无效整合中虚耗、透支巨额社会成本。短时期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伴随着制度自我修复的强劲反弹，社会组织成本的无限膨胀吞噬了自身的活力。

所以，宣传鼓动是中共诸职能部门中最受重视的一个，走马换将最频繁的一个。标语口号、决心书、挑战书、活学活用（天天读、斗私批修、积代会）、大批判、批斗、思想总结……都是意识形态的组织化常规操作，组织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既通过组织运作向人们进行思想渗透，又为组织运作的合法性提供强大支援。

[注 1] 细微致密到了连残疾人都有残（疾人）联（合会）的地步。其前身是聋哑人协会、社会福利工厂（盲、聋、肢残人的生产组织）、残废者福利院等组织。

[注 2] 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社会自由流动水平最低的时期，犯罪率低也与此相关。

（参考资料：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人民日报》1970 年 2 月 3 日；大寨大队基干民兵 贾爱国、高玉良《人民群众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人民日报》1974 年 10 月 17 日；《中共革命探秘——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五》，“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2834>）

## 积极分子

名词。政治上要求进取，工作上敬业、精业，表现热心积极的人。与运动、政治相联系的有：土改积极分子、扫盲积极分子、反右积极分子、四清积极分子、学雷锋积极分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文革积极分子、斗批改积极分子、批林批孔积极分子、阶级斗争积极分子、运动积极分子、入党积极分子、扫黄积极分子、妇女积极分子、街道积极分子……不带政治色彩的有：劳动积极分子、文（娱）体（育）活动积极分子……

往往由组织（所在单位或驻地政府）授予荣誉称号，是被列入依靠对象，可以记入履历表“曾受何种奖励”一栏的。既是正面肯定、被大力奖掖倡导的社会范畴、行为模式，又是一种社会动员工具、社会控制手段。文革运动密度大于以往，积极分子（最多的是各式学毛著积极分子）群体也大于以往；积代会的规模、频率也空前绝后。

虽然人人都要参加集中强化学习文件、向党交心和坦白个人历史、自我解剖和批判、用体力劳动来触及思想，但是对这一套的接受程度（内化、践履）仍然很不一样。争取充当积极分子的过程充满了竞争，为了凸显自己的“积极”，竞争者们必须想方设法“表现”自己，把自己变成少数“表现”突出的人。在公众场合讲假话、大话、空话时，“积极分子”们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他们具有带头表态、把表态的调子拉高、形成对“不积极分子”们的压力的功能。往

更深层次看，积极分子们的“表现”、“示范”把这个“表演”（内隐的“假”）变成了表面上的“真”，从而实现了领导层进行社会动员，接受革命的教条、服从纪律和效忠的政治和组织要求，对个人的思想、心理甚至个性、行为实现社会控制，直至把自己完全等同于党的工具的目标。成为在日常生活中改变人类的价值和个人关系的一部分。

连知识分子中的一流人物如郭沫若都留下来了那些吹捧大跃进、“文革”、“江青同志”的打油诗，钱学森当年也发表过以著名科学家名誉担保大跃进时期粮食放“高产卫星”有科学依据的时文。更不用说等而下之的积极分子们每每以“表现”来换取领导层青睐，甚至以此为志、为业、为荣。由于长期扮演这种投机性的角色，久而久之，他们就从被迫到自觉，从自觉到主动，从主动到把外在的“灌输”内化成“自生的信念”，再回过头来“灌输”给别人。把人类性格中潜藏的阴暗面发挥到了极至，其主要社会作用是为极权体制培养“带头羊”和“打手”，形成强大的依附性奴化人格群。

积极分子构成权力体制外延的同时，还是进入权力体制的一条必要通道本身。入党是这个同质驯化过程的起步。怎样进入培养对象的名单，深入学习党章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反复递交申请，自觉肃清自己头脑里残存的非组织倾向，经常汇报思想，在组织的考验面前不气馁、没怨言，被人叹为精深学问。由于运动频仍，前后目标抵牾，积极分子的命运也充满变数：反右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在“文革”中又成了黑党委的爪牙；“文革”中反对造反、保皇的，很快被批判为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支持并参加造反的，工宣队一来又成了“五一六”……

1980年代以来，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得越来越少，随着非意识形态影响日盛、社会整合、统摄力日弛和人们独立思考能力的增强，对这个词的认同程度越来越低，在大多数老百姓的心目中，“积极分子”已从正面变成负面，成为取笑的话柄了。发展组织工作也日益被纳入制度化重要日程，有大量网页辅导人们了解、学习提请申请等一系列操作技巧。

（参考资料：程晓农《知识分子与“积极分子”》，“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390>；余岱宗《全景控制与积极分子文化——以1950—1970年代文艺作品为中心》，“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党组织如何培养和帮助积极分子入党》，“积极分子学习园地”<http://202.127.204.25/admin/suoban/gzzgl/d14.htm>）

## 梁效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梁效”即“两校”的谐音。另外还有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也是该写作组的笔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频率最高、名声最大。如遇有特别重要、需要正式身分的文章，仍署全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名义。

该写作班子最初以“批林批孔研究小组”名义组建于1973年10月，1974年人员调整后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其活动结束于1976年10月。由驻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另有8341部队一名军人任书记，清华、北大各一人任副书记（李家宽、宋柏年、王世敏）。分为写作组（组长范达人）、材料组（组长汤一介）、注释组。以北京大学朗润园湖畔一外国专家

招待所的灰楼为住地，环境幽雅，门禁森严，除老教授外都集中住宿，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作内容，连组与组之间也不能随意打听。物资供应享受外宾标准。每天伙食补助4角。组织成员最多时有三、四十人；清华大学10人、北京大学20多人，还有个别中国人民大学的。

该写作班子除了有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迟群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转达、贯彻外，主要也根据江青等钓鱼台楼主的授意，或揣测他们的意图进行写作。前后共发表了181篇为他们政治需要服务的文章（撰写219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其文章多数以显赫位置，首发于《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也在他们掌握之中。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先后转载；被视为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足见显赫。其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主导材料。而《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事件剖析》、《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文章，为梁效的代表作。

梁效不见于报端的活动，还有搜集、整理江青等订购的材料（30多种），供他们作为攻击政敌（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官员）的炮弹。在决定命运的1976年，梁效的写作、活动异常活跃，达到高潮。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等地多次与梁效班子工作人员接谈、合影、宴会，送文冠果、点心等。该写作班子有四人选为第四届人大代表，一人参加中共十大，两人列名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享受当时很高政治待遇。哲学史家冯友兰、历史学家周一良、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魏建功任顾问。

与“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组）、“初澜”（文化部写作组）相比，它权威更高，后台老板更硬，政治影响力更强，消息来源更广，名气更大，网罗的知名学者更多。目光敏锐，能够预流，敢为天下先，成为政治运动风向标；背靠权势，说话硬气，没有不敢上的纲，语势霸道不容辩驳；点化典籍引文，善于细节描写，行文生动、讲究气势，雄辩而感染力强。

参加写作组活动的，年轻一代有范达人（著有《比较当代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何业彰、余维明等，1980年代以后也成为国内声名卓著的历史学家、文艺学家。

1976年10月后，该写作班子因被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点名，其成员都受到范围不同、程度不一、长短各异的批判、审查，要求说清楚其与四人帮的关系；部分人员直到198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研究著述、出席各种会议、旅行出访。

研究文献：《“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动员令——评梁效》（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北京大学理论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梁效》（《红旗》杂志1978年第2期）、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香港：1999年

## 写作组

文革时期特殊的集体署名形式、组织形式。由权力机构（党政合一的革委会）组织，并直接听命于权力、服务于权力及其意识形态的御用写作群体。参与者没有自己的思想，而以忠诚地揣摩领袖意志、上级指示的耐心、细腻、透彻拼凑起来的思想。

其中最著名的是梁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组）、唐晓文（中央党校写作组）、初澜（文化部写作组）、洪广思（北京市委写作组）等（参详各条）。为了造声势，一个写作组常常使用多个笔名（多达二三十个）。写作组的领导者是当时负责意识形态的官员（迟群、徐景贤），有高级别的政治活动家（江青、张春桥）做主心骨，在背后指挥、操控，甚至直接下达任务、题旨，督促、检查、审核，直到选择、安排发表时机。许多文章在党报（《人民日报》）党刊（《红旗》杂志）最重要的位置发表，有的还由新华社发通稿，被指定为政治学习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以中共中央1974年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出），甚至就是当时政治斗争的本身（如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集体创作从延安时期的文革文艺开始就已经出现（《兄妹开荒》、《白毛女》），1950年代以后的厂史、村史和中苏论战的九评写作班子等继续有所发展，到文革中后期达到鼎盛期。从中央各部委到各省市，都效法上海市委和北大清华做法，成立了写作组。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的。

参与者是一群在没有个人出路（连署名、稿费这样的著作权也不存在）的年代，寻找个人出路的有不同才华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自己的致命伤：或者是家庭出身不好（黑五类、灰五类），或者是个人经历上有污点（右派、插过白旗），或者是前不久被打倒的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为了避祸自保，为了伸展抱负（“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不惜扭曲、抹杀自我，积极认同当时的主流、权力意识形态，并以加入权力话语的制作、传播为荣。这种致命伤刺激他们表现出忠诚的极大积极性、依附奴性的彻底。

成员是从各单位精选而来。其驻地、办公条件、资料查阅、个人待遇（从伙食补贴到随侍当红领导、参加党代会人代会等政治荣誉）都是当时最好的。有严格的保密制度，成员不得向外（包括亲属、朋友）透露写作组内情。据揭发材料称，他们还根据高层的特殊要求，整理授意者政敌的黑材料。

从对意识形态合理化的细密、精致加工的巨大贡献来看，他们是同谋、技术性工程师；从绝对尊崇权力话语、与官方亦步亦趋、没有独立意志来看，他们又都是寄生虫、应声虫。他们的入股资本是学术，做的工作却是拆散、糟蹋学术，按权力要求、定货，来料加工，做成打人的棍子、匕首，外面给裹上伪学术的包装。成员的动机虽然有迫不得已被点名应卯型（消极不自由）和主动请缨型（积极不自由），但实际情况是不易区别、互有错综。但这一区别的有限意义也多在入局之初。一些研究者的怨道（丁东）固然有其合理性，指出“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是以执政党的名义建立的”、“中国知识分子从50年代以来在整体上已经被改造得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但在敏感问题上却缺乏解释力。比如从大量影射史学、文学的出品和破坏性上看，加工制作者的创造性恐怕不仅仅是被动、被迫（追溯到德性就够了吗？）就可以说清的。

参与者在当时以能预闻机密而自傲、自矜，也引得一般人羡慕。文革后受到“说清楚”的三年清查，个别帮派分子被逮捕、判刑，多数人区别严重问题和一般问题结论。一些人后来成为学术界的建树卓著者。



小说、剧本之类文艺作品的集体创作，也署写作组名义。组织成员和角色是：领导（党）出思想，群众（工农兵业余作者）出生活，执笔者（专业作家、编辑）出技巧（结构、修辞）。典型作品有《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署名“南哨”）等。这种“三结合”创作模式，据说是文艺战线的“新生事物”，“有利于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利于抓好重点题材的创作”，“有利于破除‘创作私有’的陈腐观念，形成共产主义的协作之风”，“从工农兵中培养作者，形成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创作队伍”。主张把文科大学办成写作组。研究者认为，集体创作以阶级共性遮蔽人的个性，以物质生产的普遍性取消精神生产的特殊性，揭示出群众性政治文化、集体话语、权力话语对个人性的消解。

（参考资料：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人民日报》1970年1月15日；洪子诚等《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丁东《文革“写作组”初探》，“博客中国”<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70252.html>）

## 阶级路线

名词。原指中共在各个历史阶段组织队伍（依靠哪个阶级阶层、团结哪个阶级阶层、打击哪个阶级阶层）的方针政策。对外，它作为一种重要依据，具有确定统一战线工作对象，判断阶级力量对比的政治形势，制定相应策略的方法论功能；对内，它是组织工作的重要原则。

在1949年建政以前，中共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做法，因为它的第一代创始人多为富裕家庭出身的子弟，而且它的在野地位也不容许它采取关门主义的组织路线。但讲究阶级路线，仍然有它的传统。中共第三任总书记向忠发的当选，虽然部分与当时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汉（时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相关，但从能力上看不如当时的许多人，因为他是工人就被选为了总书记。[注1]

1949年后在中共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执政党，把自己的政权性质定义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党团组织发展，根据当事人家庭出身、成分来排队，以决定谁优先、谁靠后甚至排除的组织原则。这是中共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思想学说，政治挂帅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人事中的具体体现。

但是，由于党团组织在行政机关、企事业、学校等的普遍存在，和强大政治-行政影响力，本来是党团组织内部准则的阶级路线，就成为国家意志，外化为社会组织的一般原则、规范了。用于指导、处理诸如升学、入伍、提干、调资这类人事工作。亲不亲阶级分：只要是红五类成绩差点也可以晋升，有过错也可以豁免；只要是黑五类成绩再好也无法晋升，问题小也可以化大，无限上纲。

把这样的做法作为国家政策，就排斥了任人唯贤，以学历、能力、业绩为考核的客观标准，扼杀了一大批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的积极性，无论他们怎样努力学习、工作都不能得到升迁。也造就了一批懒汉，躺在成分上睡大觉，反正有阶级路线替他保险，怎么着也能吃香的、喝辣的。极大限制了社会的流动性，也就扼杀了社会的活力和生机。连男女情爱、婚姻家庭都因阶级路线形成的等级、壁垒而频生悲剧。

甚而至于，阶级路线还被推而广之，生搬硬套到哲学上的唯心论、唯物论；辩证法、形而上学，李森科和孟德尔的遗传学说等的划分上去，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人为的阶级斗争的风向标。最突出的是，历史学中的所有农民起义，都得

到极高评价，而无论其对当时社会经济全面影响的积极、消极。

文革中，划分阶级的标准，从经济地位（资本家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知识分子），发展到权力资产阶级（走资派）。随意性、覆盖面都有所增加。大学教育对“重在表现”微弱呼声[注 2]成了“反对党的阶级路线”，培养“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接班人”的走资派罪行。“有教无类”被当成修正主义的“全民教育”，被置于阶级路线的对立面，受到猛烈批判。阶级路线具体化、极端表现为成分论甚至血统论，成了抓阶级斗争的方便法门。在宁左勿右年代，在抓运动、甄别打击对象，发展党团队伍、选拔干部、升学、入伍等工作中，贯彻阶级路线、红五类优先，是最少争议、稳妥、保险的做法。

文革后官方政策认定，中国社会“阶级状况早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阶级已经消灭，资本家阶级也已不再存在。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四化建设的主力军”。2000 年代前后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三个代表之一）消解了传统的阶级路线。

[注 1]中共高层曾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工人领袖的领导作用发挥不足。因此“八七”会议上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邓培已在广州遇害）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 1927 年 11 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海），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进一步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一一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绝不能使党的指导工作保持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从支部、到区、县、市、省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1931 年 1 月 7 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新改选的政治局委员中，“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而继向忠发之后，共产国际再也不提找工人来做中国领袖的事了。但重视工农干部的组织惯性的正统仍然长期有效。

[注 2]当时的大批判文章提供的统计数字说，1958 年以前，北大每年招生总数中，工农子弟一般占 90%左右。1961 年以后，工农子弟的比例逐年下降，到 1963 年，工农子弟只占 52.8%。

（参考资料：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杨奎松个人网站”<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rwyj/000102.htm>；陈金星《北大黑帮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的罪行》，《人民日报》1966 年 6 月 23 日；山红《戳穿“有教无类”的骗局》，《人民日报》1967 年 12 月 6 日；宋任穷《关于今后脱产干部来源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80 年 7 月 19 日）

### 三支两军

意指文革期间军队执行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的群众组织）、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任务。

继 1967 年一月风暴开始全面夺权，迅速出现各地造反派分裂、抢权、武斗的混乱、破坏，党政机关和公检法系统濒于瘫痪的无政府主义局面。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引用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

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并说：“……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人民解放军……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中……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此作了5点具体规定。

3月19日，中央又发出新的指示，把解放军的任务由“支左”进一步扩大为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这些合起来，统称“三支两军”。部队设立“支左办公室”，派出“支左宣传队”，在地方建立军管会。12月7日中央军委授予解放军某部6连4排以“支左爱民模范排”光荣称号；授予4排排长李文忠以“支左爱民模范”的光荣称号[注1]。利用舆论为三支两军工作大力造势。

动用人民解放军支持所谓左派，进行夺权斗争，是毛泽东推进文革的带有战略性的重大决策。解放军先后派出280多万人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一大批军事干部担任了地方各级党政机构的领导职务，[注2]在制止1967年—1968年武斗、建立革委会的文革第一阶段产生重大影响。中共九大以后，随着各级党组织的重建，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逐渐收缩。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文件肯定“整个三支两军的成绩是巨大的，决不可以低估三支两军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同时“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破坏，使三支两军工作在某些方面受到了干扰”；“因为没有经验，三支两军工作中出现某些缺点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决定》说“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凡是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

此后，各地的“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指挥部、联络站等机构陆续撤销。“三支两军”人员除少数已确定留地方任职者外，大部分陆续撤回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对稳定当时局势、保证国家机器和工农业生产(支工、支农)在最低水平上的正常运转起了部分积极作用。但是在执行文革错误方针的大前提下，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部队支持派性组织、深陷于地方造反派的纠葛中，干扰地方政务，造成军地关系紧张、军队自身建设松弛等消极后果。

[注1] 1967年8月19日，李文忠率某部6连4排在江西某地执行任务。当行船遇险突然下沉时，全排战士奋勇抢救落水群众，使50多人脱险，李文忠连续救起5名落水群众后牺牲，另有两名战士牺牲。

[注2] 有统计数字称，4.9万人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委员，军队干部兼任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的占全国70%。

(参考资料：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赵国勤《试析“三支两军”的实践活动及其客观作用》，载张化编《回首“文革”》下，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 《大海航行靠舵手》

1. 歌曲作品名。初为《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注]，由哈尔滨文艺工作者李郁文作词、王双印谱曲，创作于1964年。当年6月，周总理在哈尔滨欢迎

朝鲜领导人崔庸健时，王双印曾上场演唱自创新歌。1965年初，《红旗》杂志发表了《大唱十首革命歌曲》的社论，这首歌名列榜首，歌名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很快唱红全国，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据称首唱者是歌唱家贾世骏。

1966年8、9月上海广播电台、电视台都改用本曲为开始曲。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总是被安排在《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响起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广播电台的规律是早晨以《东方红》报告一天的开始，傍晚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晚上七点三十分。群众集会（包括官方正式会议和民间婚礼等）散会和文艺演出结束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成为固定模式。是风行一时、热火朝天的忠字舞的主要伴舞曲目。列车到达终点站也要播放本曲欢送旅客离车、离站。在《义勇军进行曲》被废时有准国歌之称。数年如一日的重复，难免造成审美疲劳。

曲作者王双印因此既有先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当选中共黑龙江省省委委员，担任省革命样板戏剧团的负责人，被提升为省文化局副局长的荣耀，也有揭批四人帮、林彪反党集团以及清查其残渣余孽的运动中，被专案组加以“上了贼船”罪名而致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长达10年政治审查的厄运。

2000年代前后，湖北宜化长阳化工公司（简称长化公司）职工高唱“革命歌曲”颂扬领导，把本曲改成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宜化发展靠董事长”。受到媒体舆论多方抨击。本曲是南街村常播、常唱的保留曲目之一。《大海航行靠舵手》电影海报以5000元的不菲价格走俏收藏品市场。互联网上能找到不少本曲的下载网址。

2. 林彪题词。1967年文革发展到了“向走资派夺权”的阶段，“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使全国上下处于一片混乱状态，武斗、打砸抢成风；停产、停课搞阶级斗争；是非、敌我混淆。毛泽东决定派军队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成为军队介入地方政治的突破口。是年11月底，林彪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之机，接见与会代表，并亲笔为他们题写了当时最流行的两句歌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树立高举形象。随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报刊纷纷刊登了这一题词的手迹。

3. 文革邮票。邮电部于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纪念日，以林彪手书题词为题材，发行“文八”邮票（40X30mm，万维生设计，发行1000万枚）一套一枚，面值八分。该邮票将题词烫金，背衬大红底色。从林彪题词到邮票发行不足一个月时间，从选题审批到设计制版和印刷发行，种种环节皆能顺利运行，简直就是政治挂帅时代创造的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1997年版》报告参考价130元。

[注]两段歌词为：“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参考资料：《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不落的红太阳（歌曲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77年版；《“大海航行靠舵手”流行的前前后后》，转自《追忆瞬间》，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年1月版；刘发生《“文革”珍邮“林彪题词”如何问世》，香港《大公报》2005年10月14日）

## 老运动员

不同于过了当打之年，超龄、退役运动员的原义。用以比喻、特指历次政治运动都被殃及、整肃的倒霉蛋。语含悲悯、辛酸、无奈。可与“死老虎”参见。老，指他们被政治运动整肃的次数多、资历深、经见广博、受的罪大；老，指他们通过多次运动整肃积累起一套经验来，比较懂得如何去应对；老，也指他们心理承受力比初次遭遇者为好，世事看得通透，或者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身心俱疲麻木了，有老油条的意思。

他们可分为三类人：一类是党内斗争失败的牺牲品（如于光远、冯雪峰等知识分子），有从苏区肃反、延安整风就开始，次次被整肃，一次不落的。包括左联作家、志愿军战俘和文革中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等在内。一类是留美留欧回来有独立见解、学有专长、卓有建树的自由知识分子（如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等），从三五反、思想批判（改造）、反右、四清到文革的学术权威等历次运动，也一次没落下。包括画家、演员等艺术家和各类恃才傲物的技术性专家在内。一类是因阶级成分、政治面貌不好而被打入另册者（黑五类、黑九类），总是被当作政治运动的调料盐，什么菜品都往里撒点。包括因时运不济、性格缺陷而处于尴尬困苦窘境的人。

政治运动被当作常规化组织-工作形式，整肃被当作使人向心、归心的考验和恐吓手段，成为人们的一种生存常态，因此几乎所有人都无法逃脱它的魔掌。

文革中，他们被批斗、抄家，坐喷气式、戴高帽游街、被殴打、唱《嚎歌》、请罪，责令写各种外调材料，更关入牛棚、发配干校，宽大住房被安插进二三家革命群众，停止工作，冻结工资、发给基本生活费，被强制做扫大街、打杂工的体力活，在干校住‘干打垒’的房子，养猪、放牛、插秧、看菜地……这些活社会最下层的人们，谁都可以拿他们开刀，还没有人敢于为他们出头说话。所有新的运动花样都要与老运动员联系起来，上挂下联，把侮辱人当成革命，表现主事者的觉悟和工作成绩，当成开心乐趣。

不但他们本人受尽欺凌，还祸及无辜妻儿——被当作“XXX 臭老婆”、“狗崽子”，受到种种歧视，基本福利被剥夺，正当出路被堵塞。

亦指善于在文革政治运动的旋涡中投机取巧获利者。语含讽刺、贬损、不屑。  
[注]

这些人久经运动，从恶的方面吸取经验教训，识时务者为俊杰昧了良心反戈一击，顺应时事整人自保，亮相投靠过去为暴逆者支撑门面；权势者指向哪里打到哪里，一改昔日学术主张为现实服务，画眉深浅随呼唤，左右逢源，偏偏时时都能吃得开，任何时候都能立于不败之地。近于“风派”，典型人物有马天水、郭沫若、袁达观（王蒙小说《青狐》中人物）等。或者是靠造反起家者，凭借批斗、抄家、整人的积极表现而发迹，入党做官进入政坛。近于“震派”，典型人物有陈阿大等。成为运动的赢家（出于主动、被动的都有）。

文革后，老运动员成了自己清白的证明、辩词，可以炫耀的资本，提示着时尚风气的变化。

[注]老运动员同时喻有同情、鄙弃两种意指情态。同一喻体（能指）而喻义（所指）不同的矛盾歧异现象，是因为事物的性质是多方面的；不同的打比方的人只能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就为从其他方面打比方留下了可能空间。使得“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ficatum）异”。比喻的双方，都只有部分相同，而

不是全部相同。才有“比喻总是跛脚”（不周延）的说法。

（参考资料：肖复兴《风动石》，《人民日报》1988年10月31日；孙犁《罗汉松》，《人民日报》1988年8月7日；钱钟书《管锥篇》，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一册“周易正义二七则”一六归妹“比喻有两柄亦有多边”）

## 全国山河一片红

主谓结构短语。1. 对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颂词。出于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注]：“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全国军民实现了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同日北京举行了数十万人的庆祝大会。从1967年1月上海夺权、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至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同时成立，经历了20个月包括派性冲突、武斗在内的各种坎坷曲折、动乱反复，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完成了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使命。

在当时主政者看来，文革以前的各地党政领导机关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派篡夺了“党、政、文、财大权”，都是“黑”的。文革夺权后的革委会，是“反复辟”的胜利，此谓之“全国山河一片红”。

但据统计数字称，由于国民经济秩序混乱工农业持续衰退，社会生产总值1967年比上年下降9.9%，1968年比上年再降4.7%。

附表：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间及主要负责人次序 地区 成立时间 革委会主要负责人 1 黑龙江省 1967.1.31. 潘复生、汪家道 2 山东省 1967.2.3. 王效禹、杨得志、韩金海 3 上海市 1967.2.5.\*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4 贵州省 1967.2.14. 李再含、张明、李立 5 山西省 1967.3.8.\*\* 刘格平、张日清、陈永贵 6 北京市 1967.4.20. 谢富治、吴德、聂元梓 7 青海省 1967.8.12. 刘贤权、张江霖、达洛 8 内蒙古自治区 1967.11.1. 滕海清、吴涛、高锦明 9 天津市 1967.12.6. 解学恭、萧思明、郑三生 10 江西省 1968.1.5. 程世清、杨栋梁、万里浪 11 甘肃省 1968.1.2. 冼恒汉、张忠、胡继宗 12 河南省 1968.1.27. 刘建勋、王新、纪登奎、耿起昌 13 河北省 1968.2.3. 李雪峰、刘子厚、马辉、耿长锁 14 湖北省 1968.2.5. 曾思玉、刘丰、张体学 15 广东省 1968.2.21. 黄永胜、孔石泉、陈郁 16 吉林省 1968.3.6. 王淮湘、阮泊生、郑季翘 17 江苏省 1968.3.23. 许世友、吴大胜、杨广立 18 浙江省 1968.3.24. 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赖可可 19 湖南省 1968.4.8. 黎原、龙书金、华国锋、张伯森 2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968.4.10. 康健民、张怀礼、徐洪学 21 安徽省 1968.4.18. 李德生、廖成美、宋佩璋 22 陕西省 1968.5.1. 李瑞山、黄经耀、胡炜 23 辽宁省 1968.5.10. 陈锡联、李伯秋、王良、毛远新 24 四川省 1968.5.31. 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 25 云南省 1968.8.13. 谭甫仁、周兴、陈康、段思英 26 福建省 1968.8.14. 韩先楚、皮定钧、蓝荣玉 27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68.8.26. 韦国清、欧致富、安平生 28 西藏自治区 1968.9.5. 曾雍雅、任荣、巴桑 2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968.9.5. 龙书金、赛福鼎\*上海市于1967年1月11日夺权，2月

5 日成立革委会。

\*\*山西省于 1967 年 1 月 12 日夺权，3 月 19 日成立革委会。

2. 纪念邮票。中国人民邮政预定 1968 年 11 月 25 日发行的、以庆祝全国 29 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委会为主题的纪念邮票。P（齿孔）111/2×11，邮票规格 30×40mm，整张枚数 50（10×5），[G]（背面刷胶），单枚邮票顺序号（1），面值 8 分，图案说明：工农兵和地图，[D]（设计者）万维生。因发现“一片红”的中国版图未包括台湾、北部国境线描绘有误，而撤销发行。但在正式发行前已有部分邮票流出，因此成为罕见的文革错票。1980 年代开始就在邮市上受到买家追捧。1992 年 6 月 28 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的邮品拍卖会上以 22000 元的最高价成交。

[注]每个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最高舆论机关都要发表庆祝性社论，已经成为中央政府以示认可的一种惯例。而每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也要向毛泽东、党中央发致敬电。

（参考资料：郑谦、张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三，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3 年版；李晓建《首次国家组织的邮品拍卖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1992 年 6 月 30 日）

## 革命委员会

文革中对走资派夺权后，中国省以下各级政府和基层单位的基本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口语）。被许为文革的新生事物。从 1967 年到 1979 年存续了 12 年。

20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毛泽东就试图解决国家政权机关中的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为此有过一些设想和实践。[注]

毛泽东在文革发轫时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后，就曾设想仿照巴黎公社形式对国家政权机关进行改造。16 条规定曾把文化革命委员会定性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组织性质的权力机构。虽不同于后来的政权形式，但也暗示出某些雏形。

1967 年 1 月 31 日黑龙江省成立了全省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2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指出黑龙江的经验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第一次明确提出革命委员会和三结合的概念。《红旗》杂志第五期（3 月 31 日）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引述毛泽东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除了三结合外，精简机构和党政一体化，是革委会的主要特点。原来的司、处、科、股被取消，改称为“领导小组”，例如文教组、宣传组、工交组等；每个“组”的实际职能，就是原政府相应机构的职能。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只有 200 名工作人员左右，是原省委、省人委工作人员的 1/30；在工厂设革命、生产、生活三个办公室。所不同的是，党政不分了——革命委员会下设的“组”，既是党也是政，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即实行“一元化”领导。原则是建立省一级

的革命委员会，必须由中央批准，主要领导人必须是由中央派出的或被中央认可的。

革委会成员一般不是选举产生，是“反复的争论、酝酿、协商、审查，才推选出来的”。取决于群众造反组织所处态势和审查机关的主观意志。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 4000 多名委员有一半群众代表没有经过民主选举。懂业务的知识分子较少，无法承担科学领导和管理各项工作的需要。

1970 年 6 月 22 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 90 个精简为 27 个，各部委干部编制总数压掉 82%，27 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编制总数的 18%（实际上原干部留用少于 18%，因为后派来的军队干部占了编制数量）。各部委均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除一些仍保留的部委外，有一些部委进行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建立革命委员会，有：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含原国家计委、经委、国务院工交办、国家物委、物资部、地质部、劳动部、统计局、中央安置办公室）；国家基本建设革命委员会（含原国家建委、建工部、建材部、中央基建政治部）；一机部革命委员会（含原一机部、八机部）；燃料化工部革命委员会（含原石油部、化工部、煤炭部）；交通部革命委员会（含原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邮政部分）；轻工部革命委员会（含原纺织部、一轻部、二轻部）；财政部革命委员会（含原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部革命委员会（含原商业部、粮食部、供销合作总社、中国工商局）；外贸部革命委员会（含原外贸部、国际贸易促进会）；农林部革命委员会（含原农业部、林业部、农垦部、水产部、国务院农林办、中央农村政治部）。撤销最高人民检察院、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民委、侨委等。邮电部的电信部分、国家测绘总局、气象局、民航总局已经先期划入军队的总参、空军编制。保留了外交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文化组、国务院科教组。在中央部级单位，革命委员会和部、办、组两种名称序列并存。

1972 年 8 月 21 日，中共中央文件要求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此后，大部分军队代表陆续返回部队，但也还有一些军队代表留在地方的省市一级党委和“革命委员会”担任主要负责人。不久，1973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新年献词》，指出各级领导机构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逐步完善。

1975 年 1 月四届全国人大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而此前，革命委员会一直就是集人大、政府权力于一身而存在的。

197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取消革命委员会制度，恢复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制度。

[注]当时毛泽东只是想通过采取一些改革措施，精简机构，强化干部的为人民服务意识，并没有打算改变政权组织机构的形式和名称。一些努力都因短期效果后出现反弹而失败。

陈伯达在 1958 年发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红旗》杂志第 3 期）、《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同前，第 4 期）两篇文章。其中传达了毛泽东改革国家政权机关的构想：“把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这些设想由于大跃



进受挫无疾而终。

(参考资料：关海庭《“革命委员会”始末》，见张化编《回首“文革”》下，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文革时代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如何产生》，《党史博览》，转自“中华网”2005年5月26日)

## 揪出来

动补结构词组。本义为抓住并拉；喻指意在运动中把某人被隐蔽的罪恶公开出来，给予揭露、批判，把他抓出来，把他的政治命运交给运动和群众决定。被揪者所有的权力和权利都被剥夺了（参见“靠边站”）。带有政治宣判的性质，对于被揪者就是灭顶之灾。只需运动的主持者当众宣布，或在大字报、标语上点名说，某人是什么什么（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走资派），这个程序就完成了。简易而迅速。流行于文革初期。[注]

揪出来的主持者可以是工作组、单位领导，也可以是群众组织的召集人、激进分子、积极分子。无需任何上级、组织手续或专政机关合乎法律程序的批复核准，随意性极大。被揪出来的人或者是黑五类、走资派之类“死老虎”，或者是发表了不合时宜见解的现行反革命，做错了事情、有过失的人，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挡了运动的道、与运动主持者有个人恩怨的人。他们的任何只言片语、无心之失都可以被无限引申了来用于定罪，容不得任何辩解。

只要被揪出来的就一定是坏人。运动逻辑可以把平时的一般问题上升为大是大非和敌我矛盾。“揪”被无条件肯定为革命对反革命的正义行为。

而一旦完成揪出来的程序，就从此离开革命群众的范围，停止职务，停止正常工作、生活，纳入了被审查、批斗的行列，打入了另册。他的人身安全不再受到保障，因为他已经不再属于人民的范畴，不被当作“人”看待。后果严重。通常揪出来的人会被勒令停止正常工作，受到关押隔离，或集中起来（牛棚），失去行动自由；行动受监管小组号令、指派。随时可以被提去揪斗。如果他平时的群众关系不好，此时就会受到比别人更激烈的对待和暴力侵犯。安排惩罚性体力劳动。其工资被冻结、降级，只按最低生活标准发放。用牌子写明罪名挂（诸如右派、国民党特务、苏修特务、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等）在身上以示身份。甚至连他生病需要入院医治，也会遭到拒绝。

杨绛曾问钱钟书说：“我今天‘揪出来了’，你呢？”钟答：“还没有，快了吧？”这说明估计从将要被揪到实际被揪的过程，当事人往往处于不知道会面临什么命运的不安、焦虑状态（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被戴上什么帽子、受到什么对待），揪出来虽然开始了地狱般噩梦的煎熬，但毕竟结束了等待的忐忑，也是一种释然。是自嘲自慰的苦中作乐，也有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的旷达。

[注]据“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材料，该词1966年的浮现率17.05%、1967年35.04%、1968年10.39%、1969年7.75%，4年就占了48年的70.23%。是平均值的7—3多倍。

(参考资料：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文汇报》1967年1月6日；杨绛《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

## 炮轰

动词，与“打倒”的释义基本相同（参见该条）。本义是用炮火密集、反复打击敌方军事目标，使之被摧毁。喻指从政治上打击对手。如炮轰黑帮、炮轰向阳路工商所最大走资派赵东强、炮轰总站党委、炮轰中央文革，等等。

从语源上看，似脱胎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流行于文革初期。是一个充满动感和暴力的刺激性词语。把军事行动的词语泛化，运用于一般社会生活和政治性行为，成为一种强大的审美惯性，是文革乃至中共意识形态流行文化的标准时尚。

比“打倒”的适用面要宽一些。可以是特定的人（走资派如刘邓），可以是一级机构（黑党委如北京市委），可以是一个组织（保皇派如产业军）。炮轰是大规模的、群体性的、激烈的政治行为，比“打倒”的力度为大，更加猛烈，声势也更大，动作的持续时间长一些，适用对象的地位比较高，也可以抽象一些（比如对某些被批判的观念）。

炮轰的具体形式，有大标语、大字报、漫画、声讨大会、游行示威，占领机关，批斗领导人（走资派），通电全国，威逼旧部属反戈一击揭发，编印黑话言论集，举办罪行展览会，等等。

炮轰是政治对抗中占据强势一方的行为，挟持着泰山压顶的赫赫声威，因此被认为是正义的。炮轰是非理性的，不容分说、不讲道理，揭露被炮轰者的政治性过失乃至个人私事，不论大事小事都无限上纲，往违背毛泽东意图、反党反社会主义上扯。什么罪名能置被炮轰者于死地就编排什么罪名。拉大旗做虎皮是最典型的做法。调门不厌其高，罪名不厌其大，事实不厌其向隅捏造，逻辑不厌其牵强颠倒，情绪不厌其激扬暴烈，行动不厌其违规逾矩（还美其名曰“矫枉必须过正”）。凡是不赞同造反派主张、行为的，都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略部署，可以炮轰。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时候，炮轰成了政治正确的标志，一种传染病。甚至有的派别组织就称“炮轰派”（简称“炮派”）。

与此相似的，还有火烧、砸烂、油煎（炸）等。政治暴力与话语暴力相携而行。令人闻之胆寒。[注]到1967年以后一一夺权、大联合的争雄阶段，炮轰的对象就从走资派变成了对立派别。

2000年代也有借用来喻指对人们奉为权威或追捧的对象进行不合适宜的猛烈批评的。如“崔永元炮轰央视名嘴”，“炮轰超级女声”。在矫情的修辞中带着有保留的反讽色彩，是文革创伤记忆的痕迹、反射。

[注]叶剑英有《虞美人》“炮轰词”：“串连炮轰何时了，罢官知多少？沙场赫赫旧威风，顶住小将轮番几回冲！严冬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已朝东。”

（参考资料：《夺取新的胜利》，《红旗》杂志1966年第15期社论；铁竹伟《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昆仑》总第54期）

## 郭凤莲

（1947— ）生于昔阳县武家坪。3岁丧母，寄养在大寨姥姥家。1962年高小毕业，在大寨幼儿院做阿姨。1963年参加铁姑娘队，扎在改造狼窝掌的工

地上，救灾扶苗、抢救庄稼的劳动中表现突出。因泼辣、能干、组织能力强，被推选为铁姑娘队队长、团支部书记。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革初期在大寨组织“太行红卫兵”，被指定为队长。组织、参加在大寨、昔阳召开的批斗省、地、县领导的批斗大会。1967年“2·21”夺权后成为县核心小组成员。先后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1973）、大寨公社党委书记、副主任，县革委会常委、副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常委、副主任，山西省委常委，4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11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1977），5届人大代表、人大常委等职。

成为1960、1970年代大寨仅次于陈永贵的典型、“铁姑娘”的化身、陈永贵升迁离开后大寨接替他事业的“敢于斗争的接班人”、当家人。是当时的媒体明星：每逢运动的重要关口，都要安排她接受采访，表态紧跟党的战略步骤，以示运动的民意合法性。[注]其兄嫂、侄儿女都因她而参加工作、升职、上大学。

1980年“转为国家正式干部（23级）”，先后被免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等所有职务，留党查看。1982年调任位于榆次时北郊的晋中果树研究所副所长，1983年被列入清查“三种人”的审查对象，后经否定。1987年调任昔阳公路段党支部书记。育有二子。

1991年11月被再次任命为中共昔阳县委常委、大寨党支部书记。利用其知名度，寻求技术、资金和市场的合作者，1992年与江阴毛纺织总厂共同兴办大寨羊毛衫厂，由江阴毛纺织总厂无偿提供机器、原料、技术培训、服务。继而又先后办起了大寨中策水泥有限公司（1993）、大寨煤炭开发总公司、养鹿场（1994）、大寨希望农业公司（1995）等。全村工农业生产总值从260万元上升到1997年的4100万元，成为昔阳纳税第一村。还开发虎头山森林公园，投入近千万元资金耕种梯田退耕还林，大面积种树、种花、铺通旅游路，兴建展览馆、纪念馆，发展旅游业，与此相配套的餐饮业、服务业、小商业也应运而生。1996年到2000年底，大寨共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旅游业收入累计1000多万元，大寨村有40%的家庭从事旅游业，旅游业已成为大寨经济新亮点。

在媒体上失踪10多年后再次受到追捧，成为中共11大、14大、15大、16大代表，8届、10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昔阳县副县长、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下属10家企业）总经理，2003年收入上亿元，人均收入4100元。当她手戴小钻戒重新走进人民大会堂出现在镁光灯下时，让人们感慨万端地联想起大寨曾经的辉煌、兴衰、变迁。

2004年“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晋中市邮政局、昔阳县邮政局同时举办了《大寨铁姑娘——郭风莲》个性化邮票首发仪式。

[注]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革命当闯将，生产打先锋》，1967.3.11；《毛泽东思想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1967.12.31；《毛主席的书是最好的党员课本》，1968.1.20；《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光辉思想给我们无穷的力量》，1969.1.3；《大寨之路就是斗争之路》，1974.3.7；《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导民兵建设》，1975.1.3；《加强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无产阶级专政》，1975.2.26；《加强党的领导 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975.8.5；《听毛主席的话 加快实现机械化》，1977.12.29，等。

（参考资料：孙启勇《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今日名流》1999年第2期《“铁姑娘”郭风莲大寨续新篇》；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周锐鹏《十六大代表郭风莲——当年“大寨铁姑娘” 今日“集团

董事长”》，《联合早报》2002. 11. 12)

## 一把手

名词。“第一把手”（比较正式、书面语）的简略形式、省称、口语。意指（某一地区、单位、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通常指党委书记，或正职空缺时实际上说话算数、拍板拿主意的人。是对中共党委（支部）书记负责制的实际承担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排序第一领导人的称呼。准此，顺序还有二把手、三把手的分别、称呼。

文革前的官僚体制具有科层化倾向，技术化官僚地位在上升，讲究规范化，多少有一些互相制约的集体领导色彩。文革初期造反打倒走资派时，所有的一把手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走资派。那是一把手灰溜溜的时期。而打碎旧体制后的1967年左右突然流行起“一把手”（还有“老当”之类俗语：“‘老’+当权派”的简称）这样的词儿，尤其令人玩味。[注 1]

虽然造走资派反的大规模运动，形成了对“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恐惧，蔑视权力的民粹主义倾向，和权力危险的意识。但在加强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体制驱动下，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念秩序里，在生死存亡、祸福荣辱都系于掌权者一己好恶的现实面前，中央高层权力格局、运作的示范作用，使权力的集中、膨胀更甚于以前。毛泽东以一人意志发动文革，林彪集团的恶性扩张都是适例。在党委会上，一把手成了特殊委员，一票顶百票，一锤定音；其他成员形同虚设。权力的魅力日益不加掩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一把手”这个词儿背后掩藏着的，正是这样被压抑的无意识。而无意识的深层内容，是对权力暧昧的渴慕。只是文革前的技术化官僚让位给了此时的意识形态官僚。一把手只向上负责，而在其所统辖的领地里，他就是至高无上的土皇帝，党政经、工青妇，都听得他的，无论有多少意见（民主），最终都必须集中在他的意志之上。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一把手即党，任何不同声音都会被视为与党离心离德，哪怕对一把手个人的意见也会被视为不敬，乃至反党。只有党凌驾、覆盖全社会的纵向控制，没有横向制约。

在三结合的省市革委会里的一把手，多由军人担任。[注 2]每开展一个什么运动，每强调什么工作的重要性，就必须让一把手亲自挂帅。一把手兼职泛滥，以致不胜其扰，成了这个体制的通例、癌症。

由于派性的遗留，领导班子的凝聚力不如文革前了。而一把手在领导班子里的权威地位，较文革前反倒更为突出、不容质疑，以确保在权威衰落时期的运转需要。

但 2000 年代前后，该词浮现率却又一次高调复归，仅 1995 年一年即达 10.87%！当上一把手的秘书（甚至司机）就走上了终南捷径。似乎暗示着政治运作对权力集中现象的依赖和民意基础的脆弱。

[注 1]据“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提供的材料，文革 10 年该词的浮现率为年均 3.05%，高于平年的年均 1.8%。峰值的 1973 年为总数的 10.51%。

[注 2]29 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当中，有 21 人是军队干部，占总数的 72%。

（参考资料：石翠岩 《要善于当“班长” 实行“群言堂”》，《人民日报》

1973. 02. 17; 陈平《木里华记事》, “绿洲” )

## 工作组

为了特定目的, 由上级抽调、配备、部署, 派往某一地区、部门、单位进行工作的临时性组织。规模大一点的也称工作队。中共搞政治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便于把上级意图、政策规定、文件精神等一竿子插到底, 落实到基层; 通过座谈调查等形式, 了解情况, 发现、培养积极分子, 组织群众队伍, 诱导他们在学习中接受政策规定, 并使之转化为运动实际。工作组的职责就是把这一过程上升为经验, 以指导面上的工作。带有突击性质。工作组人员由各单位抽调、集中而来, 工作结束后仍回原单位。

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 6月1日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带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新华社6月3日公开报道, 此后北京和全国各地都陆续派出了工作组。北京60所高校中有47所派了工作组。各中学的工作队是由团中央系统抽调了1500多名干部组成的。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 其中清华大学就派出了500多人的庞大队伍。其时北京工作组人数约1万名。

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和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公开报道, 极大地刺激了群众性怀疑、批评上级党政组织的全国范围大字报风潮。在此背景下, 工作组进校后的做法不一: 有的原党委已经瘫痪, 工作组进校后取代原权力机构, 工作组和校党委站在一起, 与一部分师生群众发生矛盾冲突, 有的工作组对本来就存在矛盾的学校中的两派支持一边, 反对一边, 加剧了矛盾。但所有工作组行为高度一致是: 都按照“给群众分类排队”、“上下左右一起扫”、“打击一大片”的“桃园经验”, 主观上十分真诚地开展运动; 其次, 以57年反右为参照, 视反对工作组的群众为“右派”、“反革命”或者“假左派、真右派”, 实行打击。

北大发生乱打乱斗的“六一八”事件后, 刘少奇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加了按语, 从而使全国各地的乱批乱斗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有组织的“反干扰”(排除对工作组工作的障碍)也伴随着武力惩罚, 并引发更激烈的冲突。

6月在6月20日前后几天时间里, 北京市有39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工作组反过来打击群众的事件。工作组对发表反工作组言论的群众的定性也是高度一致的, 那就是透过“反右”、“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棱镜, 将反工作组的风潮定性为“向党猖狂进攻”。北京师大一附中中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和师大女附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工作组大字报, 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地典型的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南京“六·一三”事件、重庆大学“六·一八”事件、长春市的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红旗事件”(6月21日)、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北京来信”事件(6月24日), 等。

武汉大学“全校干部和教师(总数是1242人)被打成‘黑帮’、‘黑线’的232人, 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的108人, 有4个单位总支的一般干部被100%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大‘三家村’以后, 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 全校有大小‘三家村’10多家, 总务处一个单位就有4个‘三家村’, 修缮组、机械厂的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 听取了康生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

报。[注]他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有人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谈工作组问题，提出要撤掉工作组。25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28日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消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随即工作组在全国范围内撤消。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文把工作组描写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后来被官方结论概括为刘邓“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导致刘邓政治上倒台（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取代刘少奇上升到党内排名第二）的导火索、口实。但是工作组做法的惯性在各地仍然延续了一段时期。工作组领导和成员在文革中普遍受到严厉的批判、清算。

[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6月就开始提出撤出工作组的意见。7月13、19、22日中央会议又三次重申。

（参考资料：穆欣《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载张化等编《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萧喜东《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五柳村”<http://www.taosl.net/wc246.htm>；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年版）

## 炮打司令部

著作名。毛泽东写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名著。文革的主要文献之一。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对派工作组问题承担了责任。到会的一些地方和部门负责人纷纷检查自己“跟不上形势”，对“文化大革命”仍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等。在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问题进行了严厉的指责。5日，毛泽东写了这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这段文字是用碳素铅笔写在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报》上的。该天《北京日报》第一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段文字写在这篇社论的边角上，后面还注明了日期：1966年8月5日。秘书徐业夫用毛笔誉写在两张信纸上，毛泽东亲笔改动了几个字，并加上了标题，后面注明的时间是1966年8月7日晨3时。当天，这段内容就印发给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与会代表；8月17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不久，便传遍了全国。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指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编者）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大字报”是比喻性虚指的修辞手法。标题使用了军事术语“炮打”表明矛

盾的敌对性质，虽未直接点名，却挑明存在一个悖离毛泽东意志的领导核心“司令部”。文章开篇以肯定聂元梓大字报立论，对派工作组的做法提出强烈指控，叙议结合，斥之为“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笔锋峻厉、言辞尖刻、情绪激烈。文末宕开一笔，点出“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注]，使得问题和严重性都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作组“50多天”的范围。间以文言句式行文，似乎不合时宜的异端文体强化了毛泽东的道德强势和话语权威。超短的篇幅容纳、压缩了巨大的内容，只论断、宣示而不证明，溢于言表的愤怒，暗示出还有比说出的东西更多的理性内容，引人浮想联翩。

党国一号人物采取异乎寻常的方式突然贴出质疑、否定二号人物乃至中央一线的大字报，而且上纲如此之高，自然引起了巨大的震惊。从政治上宣告了刘邓的失败、死刑。拉开了以人划线的站队态势，逼迫全党扈从毛泽东以避免党的分裂。立即改变了大会的议题、日程。全会进行了中央领导机关的补选、选举，林彪名列第二，实际上改变了历史形成的刘少奇接班人地位。这份大字报当时虽然并未正式公布，但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和严重后果。连党中央核心都可以怀疑、打倒，极大地鼓舞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会思潮。

一年后的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认定“这张大字报，以集中的火力，炮打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进军的号角”。以此相对立，毛林、中央文革被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成为《公安六条》禁止的炮打对象。

文革中有红卫兵组织以“炮打司令部”作为自己的名称，出现过不止一种以“炮打司令部”名的油画作品和陶瓷、织绣工艺品。

[注]意指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和一系列政策制订中，刘少奇等执行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整、恢复、宽松”等右倾路线。1964年刘少奇制订的四清《后十条》提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整肃农村基层干部的形“左”实右的路线。

(参考资料：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二月镇反

名词。1967年二月逆流的组成部分。但在文革后的官方正史里被完全抹去了，[注1]只提中央高层的怀仁堂老师怒斥中央文革小组的抗争一节。

许多造反派群众组织在1967年的“二月镇反”中被奉命支左、主掌各级政权的军队干部当作“反革命”而遭到镇压。源于军队老师不能容忍党和国家的各级政权机关就这样被造反派推翻，在怀仁堂开会后，未经毛泽东同意，就动用专政手段在全国范围内（主要是外省各地）搞了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俗称“二月镇反”。直接目标当然是为了稳定夺权局面，但由于镇反对象是从造反派分裂出来的一部分，故客观上带有反击一月革命夺权运动的色彩。

人民解放军7834和7856部队奉成都军区命令进驻青白江区，接着开展“二月镇反”运动。“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八二六”派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以这些组织成员“出身成分不好”、“造反动机不纯”、“怀有个人野心”为名，勒令解散，主要头头被批斗、抓捕。重庆西师

八.三一、工人造反军一派的周荣、周德英、史焕凡、刘同记、黄子琼等七人被北碚公安局逮捕。下属组织纷纷瓦解。一些地方让被捕者带着脚镣手铐游街,有的被弄去给伟大领袖请罪。最典型的四川省抓了八万多到十万多人;仅遂宁一县就共抓捕有数百人。[注 2]

当时在群众运动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流行观念支配下,这一做法受到强烈质疑。被镇压一派组织纷纷前往北京告状、申诉。

毛泽东当然不能容忍任何对文革的抵制,很快发动了反击。中共中央批发“安徽文件”,被抓人员全部释放,即所谓“粉碎二月逆流”。接着三月整风,销毁“黑材料”。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4月17日,全川的监狱门大开,抓的那些造反派红卫兵都放出来了,成了革命英雄“红囚徒”。被取缔的反革命组织重新恢复,而且,因为有被走资派镇压的经历,更显出其革命性,也受到民间同情,队伍反而更加壮大。

对刘少奇处理、批判的升级,也与这次“复辟”悠关。因此被《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称之为“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老干部(如李井泉等)受到了更严厉的批判。

二月镇反激化了群众组织围绕夺权分歧已经出现的派性对立,以后的武斗升级与此关系极大。与原党政机关素有渊源的部队和公检法在镇反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后来“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和“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即是由此而来。因为周恩来被认定是幕后支持者,“五一六”炮打周恩来就由此而起。

但某些地区的“造反派”成员又在1967年底至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里受到整肃。

[注 1]《文革博物馆是如何诞生的》的跟贴里,有个 Kestin4 说:“有没有关于二月镇反的内容?好多勇敢的‘反思者’和‘真理先生’们反思来反思去都偏不提,这是个很奇怪的事。那么有勇气的反思者们一到了官方不许的地方就都纷纷自愿住口了——一个字:怪!”

[注 2]编者一位同事叙述:他因出身不好无法升学,文革前下乡到川北。文革中参加农村红卫兵造反,对公社领导有不敬举动,被公安特派员认定“冲击”,列入当时的镇反抓捕名单。由于山洪爆发受阻,未及抓捕;赆即上级精神变向,废除了抓捕令,这才躲过牢狱之灾。[附: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八条)]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



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说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稿共七条，经毛泽东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两次批语、修改，毛泽东特地指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以及“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204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

1967 年 1 月 28 日发布的《中央军委命令》，习称《八条命令》。基本思想是稳定军队，反对冲击军事机关，军队内部不允许任意抓人、抄家等。其中第二、三、五、六条成了二月镇反的根据，并被推衍为不得冲击党政机关。“青海赵永夫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1967 年 2 月 28 日，西安市群众组织借口《青海日报》社论有问题，冲进报社，大搞打砸抢，活活打死数人，抓走数人。最后发展到对驻报社支左部队开枪寻衅。部队被迫反击，结果造成重大伤亡。其中群众死 169 人，伤 178 人；部队士兵死 4 人，伤 46 人。电视连续剧《亮剑》里李云龙对冲击、占领军营的造反派开枪、反击的情节汲取了该事件的某些素材。（参见尚福林《毛泽东不同的讲话，被各派力量所利用》，“股天下”

[http://bbs.gutx.com/900025~15/22716413\\_22719387.htm](http://bbs.gutx.com/900025~15/22716413_22719387.htm)]

（参考资料：杨小凯 《中国向何处去？》，地球经济论坛 <http://dqjj.com/bbs/dispbbs.asp?boardID=21&ID=8959>；《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http://www.zxls.com/UploadFiles/200510505337260.doc>；流沙河《锯齿啮痕录》，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郭玉峰

(1919—2000) 河北省海兴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获得者。文革中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8 年参加八路军，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 3 军分区连副指导员、营副政委、组织股长、支队副政委、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野战军 4 纵 10 旅 28 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29 团政委、64 军炮兵团政委、191 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1951 年，郭入朝作战，任 64 军干部部副部长、191 师副政委。获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任 64 军 191 师政委、64 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政委。1962 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1964 年，45 岁的他晋升少将。

文革开始后不久，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小组主要负责人的康生把郭带到中央组织部，对全体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 1967 年 10 月—1975 年 6 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负责人。1975 年 6 月—1977 年 12 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其间曾任部核心小组组长；这是出于康生对郭玉峰的赏识与恩典。郭是开国将帅中第一位担任中组部部长的将军。在此职位上，九大当选候补中央委员，十大、十一大当选中央委员。

1968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查阅中央管理干部的档案的规定》，规定凡查阅原中央机关正、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正副省（市）长及相当职务的干部档案时，须由中央机关各部（委）、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军管会报经中央组织部郭玉峰同志审查，再呈恩来、伯达、康生、江青、永胜同志批准后方可查阅。1968 年 1 月，康生指使他列图表，写报告，诬陷 1937 年以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诬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22 人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里通外国分子”，诬陷中组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提出解散和撤消中组部。1968 年 8 月 23 日，康生、曹轶欧指使他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该报告中，60 名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里，有 37 名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968 年 8 月 27 日，康生、曹轶欧指使他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该报告中，115 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有 60 名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有严重问题”，包括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李井泉、林枫、刘宁一、张治中。同日他还编造《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159 名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有 74 名被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包括副主席彭真、刘澜涛、宋任穷、徐冰、高崇民。他先后到中组部干校传达九大、十大精神，攻击朱德一贯老右，一贯反对毛主席，从没打过胜仗，连一份检查都写不好。

1976 年 10 月后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纷纷到中组部上访，被拒之门外，甚至连中组部招待所也不让住。郭对中组部内文革中遭迫害的老干部也不宽容，继续用极“左”方式处理问题。中组部和中监委里受歧视、刁难、压制的老同志，围绕中组部推选“十一大”代表工作，1977 年春纷纷写大字报贴在西单商场北邻的组织部大院向他开展斗争：“郭玉峰不下台，老干部出不来！” 1977 年 10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郭玉峰从广播里听了文章摘要后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是右派言论！”当天《人民日报》来后，看都不看就把报纸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此时中组部反郭声势越来越大，《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副总编辑安岗嘱人以报社党委名义写了一篇《情况汇编》——《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送叶剑英元帅。不久，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把《情况汇编》递给郭说：“对老同志的住房、用车等等，你都得要安排好，不能再在生活方面为难老同志。”他连声答应。但对审干结案、安排工作等仍迟迟不见行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认定“还有一些跟着四人帮干了不少坏事、民愤很大的人，如中央机关的谢富治、吴德、吴忠、郭玉峰等”，也揭露了许多事实。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央委员的他没有被通知到会。

1977年12月被免去中组部部长，由胡耀邦取而代之。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才打开局面。胡耀邦后来说：华国锋“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胡以后任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上将说：粉碎“四人帮”之后，郭继续坚持错误路线，给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造成极大困难。1980年5月-1981年2月被隔离审查。1983年7月被开除党籍。1983年9月到河北省邢台市安置。

但郭也做过一些好事。64军一位营长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率部获得“道峰山营”称号，文革遭批斗，郭为他写了证明信，被解放了出来。为全国五七干校几十万干部分配曾做过努力，因受阻挠未果[注]。

[注] 甚至于汪东兴曾打电话责问过他：“郭玉峰，你叫把干校都撤销啦？！”

（参考资料：《开国少将 1054 郭玉峰少将》，“华岳论坛”<http://69.41.162.74/HuaShan/BBS/jiangshuai/gbcurrent/2534.shtml>；陆君云《中国人民解放军郭姓开国将帅生平简介》，“北国网”2005-8-28 <http://bbs.lnd.com.cn/dispbbs.asp?boardID=112&ID=70845&page=4>；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 二月兵变

一种建立在臆测、传说基础上的谣言。指控彭真、贺龙合谋在1966年2月政变。是为了达到打倒彭真、贺龙目的先后捏造出来的。

1966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了一个团，准备担负民兵训练任务。因一时找不到营房，而北京各大学部分师生在农村搞“四清”，有些空房。为应急卫戍区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去为该团联系借房。这一借房时间恰与“二月提纲”事件相近。北京大学团委一学生干部丁键在“怀疑一切”思潮冲击下，[注1]即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为题贴出大字报，提出借房是要搞兵变的“假说”。

7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说，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

级专政。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

1966年8、9月，林彪先后叫空军政委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写贺龙“插手空军”等材料送给他。[注2]9月5日和6日叶群指使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写材料揭发：“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一百二十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9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诬陷贺龙同志“搞颠覆活动”。目的在于通过这一事件，在中央军委排除异己，建立顺昌逆亡的环境；宏观上配合毛泽东的政治布局。康生趁风纵火，放大谣言，危言耸听地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贺龙去苏联与苏修的将军共谋推翻毛主席的领导；贺龙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还有无线电俱乐部，等等。

贺龙当时曾拜访几位老同志，但他们都参加了林彪的“小型打招呼会”，因此或者背过脸去，缄口不语，或者违心批评，附和形势。

1966年10月，贺龙在中央工作会议第四小组会上作了违心的检讨。他说：“北京体育学院的文革运动，体委派工作组，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包办代替，结果，把那里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体委本身的文革也搞得不深不透。体委一些领导，怕字不少，框框很多，对这场文革的领导，还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我是有责任的。根本问题是对主席思想学得不好，跟得不紧。”

1967年初春许多大中城市的街道上贴出了这样的大字报：“贺龙 彭真阴谋发动二月兵变！”“贺龙企图逃往苏联！”许光达被诬为二月兵变的二号人物（总参谋长），死于文革；杨勇、李井泉被诬为黑干将。中国人民大学郭秋影也受到知情不报的株连。虽然这一罪名始终未与贺龙本人见面，但他却是十大元帅中被迫害致死于文革的两人之一（另一个是彭德怀）。

1974年《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澄清：“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1980年中共中央结论：“1966年7月前后，在北京闹得满城风雨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纯系康生图谋打倒彭真、贺龙同志而捏造的谣言。”

[注1]林彪大念“政变经”的“5·18讲话”已在学生中广为传抄，渲染、造成了一种阶级斗争阴谋灾难在即的恐怖气氛。

[注2]对吴法宪说：“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手。”“你们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对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附：康生在北师大关于“二月兵变”的讲话（节录）

（1966年7月27日）

今年2月、3月初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阴谋策划政变，阴谋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计划之一就是往北大、人大每个学校派去一个营的军队，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并在北大、人大看过房子的。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这件事，北大团委组织部长×××亲自参加过他们的黑会，陆平黑帮给他们修房子，修食堂，人大校长郭秋影完全知道这件事，并且在人大也看过房子。这是一件明显的事，6月1日后，北大的同学用大字报揭发出来的，这消息也传到了你们师大，

师大的一位同学叫王运民的，回去在6月20日贴出一张大字报本来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个大字报，被工作组孙友渔歪曲了。孙友渔在6月20日的报告中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造谣，煽动同学说这张大字报是要使人民解放军去流血，胡说这是要孤立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他5000多字的报告中，4000多字要讲这个问题，为彭真辩护，有些同志不了解，被孙友渔蒙蔽，被孙友渔麻痹了，认为高淑奎、谭厚兰……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完全是孙友渔一手造成的。而且不仅如此，同志们你们看看这是北师大出的简报，就是这样诬蔑、恐吓群众，制造思想混乱，说：“现在有些同学说，彭真要搞政变，要夺权，这是造谣恐吓群众，并且用简报形式写出来压人”。本来是件真事，孙友渔说是假的，彭真要政变，要夺权，孙友渔说是造谣。你们说孙友渔到底站在什么立场？同志们想想，这样的工作组能不能领导你们进行文化大革命呢？你们再想想，这样的为彭真大黑帮辩护的人，要不要罢他的官？]

(参考资料：钱钢《“二月兵变”真相》，《解放军报》1980年12月7日；《中国元帅贺龙》，萍乡清流网；春明《“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 二月提纲

《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简称。1966年2月3日，由彭真主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注1]拟定的一个文件，对当时学术批判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进行了阐述、规定。

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在江青和张春桥直接授意、策划下成形，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后发表的。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揭载后，报刊上的讨论陆续展开。有的是“左”的政治批判，有的则从学术角度加以讨论。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作了努力，试图对恶性膨胀起来的极左思潮加以约束，但在江青、张春桥等封锁真相、设立陷阱的影响下，北京、上海这两个领导运动的中心之间的矛盾在发展。毛主席对北京的抵制感到极度不满，下令出姚文的单行本，并愠怒地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彭真虽然也已感到处境不妙，但仍坚持自己的立场。2月3日，他主持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研究下一步学术批判工作如何进行，处置出现的许多迫在眉睫问题。会上印发了中宣部报来反映、请示重要问题的材料7份。彭真发言指出，经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海》剧与庐山会议并无联系，否定了关锋关于邓拓“包庇右派”的诬陷，强调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会后，许立群、姚溱、王力等根据彭真的指示和会议精神起草了给中央的《汇报提纲》。经在京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后，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康生因其他事项也同机前往。

《提纲》分析了当时学术批判的形势和任务，讲了方针、队伍、“左”派要互相帮助、准备工作、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加强领导等问题。认为：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同时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只有这样，才能利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提纲》虽然在当时条件下仍有“左”的提法，但基本的思想是试图把已经开展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将其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特别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2月8日，毛泽东在听汇报的过程中，除了说“左派整风”3年以后再说外，没有对《提纲》表示不同意见。在询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还表示：吴晗经批判以后，仍然可以当副市长。在此情况下，彭真当即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电传北京，经在京常委同意后，将《提纲》发往全国。“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时成为流行语。

《二月提纲》是文革在即时中共一线避免把学术界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的一次失败的努力[注2]。也是毛泽东又一次引蛇出洞的谋略实践。

《提纲》发出后不久，就为毛泽东所否定和批判：“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2月底、3月初，江青得到林彪的支持，搞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说：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纪要》与《提纲》形成尖锐对立。

《提纲》成为彭真对抗毛泽东的主要罪状，《五一六通知》批判的靶子，北京市委倒台的契机。毛泽东更直斥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称中宣部为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注1]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1964年设立的。组长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副组长陆定一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成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注2]工作组是另一次失败的努力。

(参考资料：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余焕椿《“文革”前夕的〈人民日报〉》，《百年潮》2004年第5期)

## 刘格平

(1904—1992) 回族，出生于河北省孟村自治县大堤东村。社会活动家。

1919年在南京读书时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7月在天津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2月，在家乡大堤东村建立津南地区第一个团支部。1925年春受派遣到河南省新乡国民二军开展兵运工作。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在沧县直隶省立第二中学创建津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是年冬到武汉开展兵运活动，组织武装力量配合革命军北伐。1927年秋冬，主持津南特委在献县东部地区组织领导了“借粮吃大户”斗争。11月对鲁北阳信县一批土匪武装进行改造，创建“津南革命军”。1928年6月，在庆云县和盐山县一带组建津南革命军第一支队，攻占庆云县城，缴下县民团和警察局枪支。由于有人告密被国民党逮捕。1931年6月，被派往山西、陕西搞军运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在西安组织领导回民抗日救国会。1932年秋回沧州担任中共津南特委军事委员。1934年4月在庆云县领导马颊河民工暴动。在4月20日成立农民自卫军大会上受伤被捕，后转押到北平军人反省院。在关押期间，担任北监党支部书记，领导狱中党员开展绝食等多种形式的斗争。1936年，在草岗子监狱里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赵林、李楚离、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等61名中共干部经批准，在监狱主管者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办理了出狱手续。惟有刘格平没有办，直至1944年4月刑满出狱；多坐了八年牢。

1944年8月，被任命为天津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领导天津市工人、学生开展抗日爱国运动。1945年5月调任山东回民协会主任。1946年秋任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1948年2月任中共渤海区委第一副书记、组织部长兼渤海军区副政委（书记康生；同事有关锋、鲁瑛、王效禹等）。1949年2月任华东南下纵队渤海三支队第一书记兼政委率部南下。5月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1949年8月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是少数民族界首席代表，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任命为中央民委副主任。[注1]1952年，被任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民委党组书记。1953年至1958年，担任中国回民文化促进会主任。1954年、1959年，连续两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此期间，在发展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做好统战工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培养民族干部方面，做出新贡献。1958年初到宁夏筹建回族自治区，担任筹建领导小组组长。10月，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区政府主席。在任期间，贯彻民族政策，发展宁夏地区各项事业，受到各族人民拥戴。1960年，在宁夏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1964年担任山西省副省长。

迎合文革政治斗争需要，揭发所谓61人叛徒集团自新，出狱后更名情节；作为坚定的共产党人而暴得大名。得到中央文革授意，1967年1月9日刘格平等5人贴出“揭发省委（卫恒、王谦、王大任等）问题”的大字报，支持造反派。经党中央和毛主席[注2]批准，任山西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山西省革委会主任、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被民间称作“极左政客”。与同省的张日清不和，得到山西群众组织红总站一派的拥趸支持。1969年中央解决山西派性武斗问题，69军军长谢振华接管了他的权力；张日清与刘一同退出政坛。[注3]1976年底调回北京，1983年被提名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是第八届、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著有《刘格平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注1] 康生曾说，刘格平同志既然是老党员，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一提到可兰经——伊斯兰教的经，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见了。

[注2] 据传，毛泽东曾有“最新最高指示”：“给69军的同志们讲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支持刘格平同志。”

[注3] 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据作家赵瑜采访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曾经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除了有些头头被枪毙以外，更有相当一批人死于‘修理’或‘退火’之中。”（见丁抒《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http://web.cenet.org.cn/upfile/73600.doc>）

(参考资料:《新中国民族工作杰出的领导人——刘格平》,“齐鲁名人”  
<http://www.qlmr.com.cn/mrfc/zrsy/liugeping.htm>;《曾彦修:我为 61 人案平反》,“凤凰卫视”“口述历史” 2005 年 1 月 10 日)

## 自由市场

农贸市场、集市贸易的俗称。文革中的禁忌物,名列资本主义洪水猛兽的“三自一包”[注 1]之首。是口诛笔伐的批判对象。更多流行于老百姓口头,而鲜见于报端,被拒于官方意识形态门槛之外。[注 2]不是经济学里对经济类型及其性质的定义所指称的“自由市场”概念。

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注 3]等中共领袖,1961 年试图放宽对经济的禁制,以有限的农村自由市场,包括蔬菜自留地和按劳分配制度,扭转三年饥谨造成的严重困难。包括这些措施在内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的实行,使得农业生产得以恢复,供应紧张稍有缓解,基本保证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需要。

自由市场上盛行的买卖,有菜农自发地挑着新鲜蔬菜、水果、活鱼活虾、鲜花等自产农副产品来买。虽比国家供应的价格虽然贵一些,毕竟有限地调剂、补足了国家市场的缺损。另外还有淘换无线电器件、邮票、旧家具、瓷器、书画、旧书,换粮票、布票等票证的(其中不乏被称作投机倒把的职业掮客)黑市。它们的存在虽然从理论上是非法的,但还是被容忍;只是偶尔虚应故事地打击一下。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北京反国寺、老墙根、达智桥、下斜街、下斜街、达智桥、广安门内,上海华亭路、会稽路(旧货)、十六铺(农贸),南京通济门、成都市体育场东大门等地。

文革中主张自由市场的刘邓和经济学者孙冶方受到批判,指控它助长自由买卖、投机倒把的黑风,破坏统购统销和计划经济,影响国家建设,损害工农联盟,出现两极分化,是复辟资本主义,“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屠刀,是一支射向社会主义的毒箭”。连黄胄描写乡间集市贸易的国画《赶集图》,也被与邓拓的题词挂起钩来,说是“积极配合”“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刮起‘三自一包’的黑风”,污蔑“生活而今胜旧时”,“大肆攻击人民公社制度”。它也成为当时批判苏联经济政策和抨击西方经济危机的一个常见话题。

于是集市贸易被严厉禁止,传统字号被“砸烂”,工商业者被斗,乡镇居民被赶下农村,肩挑小贩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打击,使得大多数集镇经济进一步萧条。全国农村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个体商业网点从 1957 年的 84.6 万个减少到 1976 年的 12.3 万个,从业人员从 160 万人减少到 66 万,其中个体商业从业人员从 30 万减少到 4.7 万余人。农村集市贸易长期萎缩。1976 年农村集市只有 2.9 万个,成交额仅 102 亿元,按牌价计算,仅占当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 4.6%,所占比重比 1965 年下降近一半。

但是由于有供应短缺的巨大需要,仍在一些边缘地区间歇而零星地顽强存在,以非法的地位、代价,修补着、维系着当时千疮百孔的经济——一些从业者甚至付出了被判刑的代价。在执政当局的操盘手看来,这是一个麻烦:它像臭豆腐一样,吃起来香(解决居民生活实际问题),闻起来臭(会被政敌和极左派抓小辫子)。于是强调革命、批判资本主义厉害时,管得紧一些,注重建设、政策宽松时,放得宽一点。



编者早年曾到城市近郊集市买红薯等，以补家里孩子多，长身体时粮食不够吃的亏空。半夜就出发，走好几里路，达到并完成买卖时已接近天亮，人们匆匆散去，怕被市场管理的上班来抓住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市场其实是应该被半默许的——这么经常性的存在、交易，那么大的客流量，官方哪会不知道呢。

文革后经济改革的初步就是恢复过去被禁止的自由市场，以为农副产品的生产松绑，积极改善短缺的供应。1990年代后多称“农贸市场”。

[注1]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

[注2]据“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材料，该词10年平均年浮现率1.587%，比平年的2.214%低略三分之一。

[注3]陈云曾提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

(参考资料：《“三家村”的黑画家黄胄》，《解放军报》1966年9月12日；朱百正《“自由市场”是杀人不见血的屠刀》，《人民日报》1968年1月11日；《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考察》，“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5-12-29 <http://www.studa.net/guanliqita/051229/17274613-2.html>；马恒健《“文革”中的无线电自由市场》)

## 投机倒把

动宾结构联合词组。一种刑事罪名，指称没有法定手续，根据市场需求的波动变化投机，以低买高卖、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套购转卖等手段牟取暴利，扰乱国家市场（计划经济）的行为。[注]其行为主体，多指个体经营者。也可以说是泛指国家计划经济以外的经营活动。在人们心目中，是“拆社会主义墙脚”。而投机一词在英语（SPECULATION）里并无明显贬义。

1968年1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除了打击现行反革命（“一打”），就是反贪污、反盗窃、反投机倒把（“三反”）。

最典型的是倒卖票证：城市市民有多余的粮票，农村社员有多余的布票；所以有人就从城里廉价买粮票卖到乡下去，从乡下廉价买布票卖到城里去，以此赚取差价。长途贩运也是其中之一，为此上海曾经规定不准个人从本市携带肥皂、火柴、牙膏、毛巾、雨伞、卷烟等日用品到外地。当时有温州人的“养蜂部落”，巧妙利用铁路部门对属于农业养蜂运输有巨大的价格优惠，借着蜂箱的掩护，偷偷贩运紧俏物资，把云南的烟运往新疆，又把新疆的葡萄干贩到天津，大赚其钱。1974年石狮小商品市场兴盛，被作为“资本主义复辟典型”拍进了电视纪录片《铁证如山》（1977）。解说是“石狮的资本主义小摊小点有993个，日成交额60多万元”。经反复清查批斗，最后抓了万元以上的“投机倒把分子”11人，万元以下千元以上的100多人（比国内其他地区尺度为宽）。性质最恶劣的，是有人利用权力套购国家计划物资，非法抢购国家统购统销农副产品转手倒卖；呈现出团伙作案的特点。

代修代购各种农业机械品，用散装零件装配成柴油机、粉碎机、榨油机出售

牟利，或者利用商品的稀缺，来料加工后高价销售，亦将被认定投机倒把。在政策执行偏左的地方，甚至连农民到集市卖蔬菜、粮食、烟叶、鸡蛋，民间自发的以物易物，都要看成投机倒把。

市县各级都设立有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投机倒把的人一旦被逮住，轻则全部财物被没收，办学习班，被关押、拷打、审讯、批斗、游街等，重则还要判处管制、劳教、有期徒刑。负责看管和拷打那些投机倒把分子的人不是警察，是城里各工厂抽调出来的“群众专政指挥部”成员（相当于2000年代的协警）。铁路部门在列车上抓获的案值较小的投机倒把分子，常常胸前挂上“投机倒把分子”的牛粪纸牌子，被罚在火车站上扫地、倒垃圾。但是由于规定比较笼统，合法非法的界限模糊，造成执行的随意性。

对该罪的处罚，经历了一个由严到宽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其司法解释，从中共建政至文革结束前情节严重（1万元以上）的判20年至无期徒刑直至死刑，到1979年规定“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985年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1997年正式取消投机倒把罪。

2000年代，一些身家亿万富豪往往喜欢把发家的历史追溯到早年（文革）的投机倒把，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注] 据1987年9月17日出台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投机倒把是指：倒卖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自由买卖的物资、物品；从零售商店或者其他渠道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倒卖国家计划供应物资票证，倒卖发票、批件、许可证、执照、提货凭证、有价证券；倒卖文物、金银（包括金银制品）、外汇；倒卖经济合同，利用经济合同或者其他手段骗买骗卖；制造、推销冒牌商品、假商品、劣质商品，坑害消费者，或者掺杂使假、偷工减料情节严重的……共有11大类行为。

而“投机倒把”涉及的行为内容，1997年后已被新出台的多部相关法律取代。比如：对国家禁止或限制买卖的物资，现在有《矿产资源法》《森林法》《土地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规；对从零售商店或其他渠道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行为，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予以规范；关于倒卖发票、执照、证券等行为，有《税收征管法》《公司法》《证券法》进行打击；关于倒卖经济合同行为，有《合同法》约束；关于冒牌商品、劣质商品、坑害消费者行为的，有《产品质量法》《消法》《商标法》《专利法》等。

（参考资料：“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志”《大事记》；马长山《从“投机倒把”说起》；杨越 韦义华《广西来宾市法院出荒唐事“投机倒把”定罪被诉》，《光明日报》）

## 自留地

名词。中国农村的生产和社会组织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后，按政策规定[注1]留给农民个人经营、耕种的土地，其产品和在此基础上的家庭农副收入归个人所有。分给地块一般相当于全村每人平均土地的2%—5%[注2]。为了解决燃料问题，还划有自留山。

实行自留地政策的，除了中国还有前苏联和出现松动的朝鲜等。

自留地的栽种原则上是自主，多种菜蔬，也有果树、烟叶等经济作物：自足

有余的情况下，可以买卖。但有的地方却不让栽种粮食，严厉的到连自己私自栽种了的也给毁掉的地步。农民集体出工应付了事，在自留地上干活的积极性高——不但精耕细作，好肥都送到自留地上去了，只要看到哪块地的庄稼长得好，不用问就是自留地。产量明显高于集体地。因为产权清晰，经营者的收益可以预期，愿意投入劳力等资源。集体地的栽种，种什么（以粮为纲）、怎么种（是否密植或采取什么技术）、怎么分配，都要受上级计划、精神的左右；劳动者无从预期收益。所以产出率低下。

在自留地政策的执行上，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掌握的宽严、起伏有不同。人民公社化时有一风吹的现象。三年饥谨时期，解散公社食堂，恢复农民自留地，曾经是起过重要作用的调整手段。但陈云在其家乡上海青浦调查即发现，当地干部迟迟不愿执行中央给农民放宽自留地的政策。文革期间，在一些地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问题上有过激进的主张。认为集体代种比社员自种好。最典型的是昔阳县，1979年春天全县社员户自种自留地的只占总户数的10%。

主流意识形态虽然无法取消自留地，但把它看成大量滋生资产阶级小农意识的温床，经常进行批判和警告。视为一种迫不得已的让步，应当给予拟制、防范的存在。有点理不直气不壮的感觉。

自留地作为重要的优惠政策，给予与否也是一种待遇。知识青年插队生产队要分给自留地（但地块的质量、位置不佳）；入伍参军的不收回；而从城市因种种原因被发配回乡的一部分人无法分得自留地。为了鼓励计划生育，在调整自留地和安排宅基地时，其独生子女按两个人计算分配面积。

被比喻性引申为“小金库”，“把公共资源据为己有、独占支配”，“主业以外的个人爱好”，或“公共权力无法触及的死角”等。在2000年代的语言流通中仍有保留。

[注1]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6)、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1959)、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0)。

[注2] 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曾规定可以调整到7%。但能实际落实的少。根据各地情况不同，少的有七厘，多的一亩三分；一般是二分地。

(参考资料:《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960年11月3日)》；姜爱林《新中国土地政策的历史演变(1949—1978)》，《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0期，转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文库[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800](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800))

## 天安门

地理名词。位于北京市区中心，处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包括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两部分。明永乐18年（公元1420年），最原始的天安门广场就横亘在紫禁城正门中门承天门（清代改称天安门）与前门之间一个“T”字形宫廷广场。红柱黄瓦城楼为重檐歇山城楼，通高33.7米，开城门5洞，门前是金水河，5座汉白玉石桥（金水桥）横跨其上，城楼前有2对石狮和2尊高10多米（刻满云朵、蟠龙，端顶蹲兽名“望天吼”）的华表，象征帝王威仪。是历代皇帝举行颁

发诏令、祭天地五谷、御驾亲征等活动或新皇登基、大婚等重大庆典活动的场所。

1949年后陆续进行了大改建（苏联专家翻版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加红场的格局）：以天安门为中心，将广场扩建为南北长880、东西宽500米、总面积440000平方米，供公众（可容纳100万人）集会游行的场所，并在广场中心树立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政治合法性象征。西侧是人民大会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在地），东侧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20世纪，这里成为许多影响中国历史深远政治运动的发源地：1919年“5.4”的3000学生在此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成为后来中共党史认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党的起点；1935年“12.9”被亡国忧患激动的学生呼吁抗日，迎来一年后的全面抗战；1949年“10.1”在此举行的开国大典，使中国加入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一员，国庆检阅典礼成为常规（1971年为避免“9.13”林彪集团被清算事件泄露未行典礼，后遂改为不定期进行）。每天早晨在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国宾来访在这里举行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检阅式。天安门城楼作为国徽图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成为中国政治中心的象征。

官方意识形态从1950、1960年代起，就刻意把这里人格化为喻指中共政治权力的文化符号，塑造成人们向往的地方，有藏族民歌《金瓶似的小山》等歌颂性歌曲流传。

1966年8月毛泽东在这里接见红卫兵接受红卫兵袖章，并走进广场与群众握手，揭开了红卫兵运动序幕——成为文革的开端；1976年“4.5”因纪念周恩来广场上布满花圈、黑纱、挽联、白花（童怀周辑挽诗为《天安门诗抄》），而引发天安门事件——成为文革落幕（当年10月逮捕“四人帮”）的民意准备；广场南侧、紧邻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立毛泽东纪念堂——成为毛泽东思想和文革实践的最后辉煌、告别仪式，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修正的起点。

天安门、金水桥都成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拟人化政治符号、情感寄托对象。各地学生通过免费大串联到这里（第一目标）接受检阅，最直接地感受到了政治权威的魅力，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足以冲破既定秩序的顶点，从而迅速掀起了针对外省基层行政领导——走资派的运动，成为发动文革的巨大动力。此番个人经历固化为他们青春期高峰体验的偶像。天安门被称作“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当时大量歌曲、绘画都以此为形象，来咏叹、表现狂热忠诚的政治激情。其修辞手法类似古汉语中以“足下”代被提及的主体。“雄伟的”、“祖国的心脏”……是加诸天安门的修饰语。

由于它的这种特殊身份，1969年考虑到它年久失修，在邢台地震波及下建筑结构严重坏损并变形，过度采汲地下水和城楼自身重量，主体下沉，用时112天，严格按原规格、原建筑结构，完成了修复性重建。修复后的天安门长高了87厘米，恢复到了它初建时的高度。修复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搭了一座长66米、宽37米、高32米的苇席大棚，实行封闭式施工。连邻近单位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天安门城楼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天安门城楼正式向国内外游客开放（8：30—17：00，门票成人15元），往日的神秘色彩方逐渐消散。成立了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处理广场的管理事务，2004年制定并实施《北京市天安门地区管理规定》。

（参考资料：洪烛 李阳泉《北京A to Z》，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

俞珉文《揭秘：天安门城楼 35 年前秘密拆除重建》，《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 年 4 月 21 日)

## 一班人

偏正词组。通常与“党委”搭配构成固定词组。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这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它作为对党政领导的集体负责体制的指代性称谓，强调的重点是集体和一致两个侧面。前者试图导向对政治领导的合法性的确认，后者是政治领导的意志的合理性、正确性的担保。从制度设计上看，它具有避免一言堂、防止个人意志、长官意志说了算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往往形同虚设。

一班人，是个公众形象、公关形象。其隐含的认识论前提是多数真理，政治判据是多数合法。这是广大群众受教育程度低、政治行为能力弱的现实情况下，中共政治算术的基本逻辑。在政治清明、秩序稳定时，集体领导有名有实，它可能是保证决策效率、合规律性的因素；而在政治黑暗、动荡、失稳时，它可能有名无实，只是为长官意志盖上的一个虚应故事的橡皮图章。只要没有监督和制约，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设计悖论，很容易以“集中”的名义剥夺“民主”的内容。带好一班人的原则要求，更是公开把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名正言顺地置于班长（一把手）的统辖之下。所有党委决议，无论出于集体合意，还是个人专断，使用的都是集体名义；有功劳是书记挂帅的成绩，而失败、挫折都是集体责任、必要的代价、暂时的挫折。在各级领导 = 党的公式下，这些领导者都有事先免责的制度保障，所以贯彻起上级意图来，才会心无旁骛，无所顾忌。

因此，“一班人”观念在深通官场韬略的政治油子那里，既是保障政令合法的金牌、促其贯彻落实雷厉风行的催化剂，又是预防灾难缠身的隔火墙、安全阀。

文革权力运作在特别强调一元化领导的同时，也强调一班人的集体领导，以赋予其合法性。况且各级党委的主要职责是保证中央意志贯彻到基层，所以只能“一致地”延续总体上的讹误。不少地区由于权力结构中的派性残留长期暗中运作，影响到政治合力的正常形成，陷入扯皮之中，行政效率低下。况且多数执政者基于文革初期的沉痛教训，心有预悸，不敢承担领导责任，只能依赖集体一致的体制来减轻个人责任的分量。常常出现议而不决的情况。曾被授权主政的邓小平概括为各级领导班子的“软、懒、散”，而试图整顿之。

文革后的权力体制设计，废除了党中央主席的设置，恢复了文革前的总书记职务设置。[注]凸显出某种集体领导以防范重蹈覆辙的意向和努力，但仍未解决核心问题。

[注]在中共党史上，七大以前的最高领导职务一直是总书记。1949 年以后的八大设立书记处后，曾设立了总书记一职（由邓小平担任）。只有毛泽东、华国锋任过党中央主席职务。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韩笑《领导班子先和谐起来》，《厦门日报》2006-1-5，转自“厦门热线”<http://www.xmhappy.net/html/xwzs/20060105375.html>）

## 献礼工程

名词。桥梁、公路、水利等基础性公用设施，楼堂馆所的建设，工厂的成套设备的安装、调试、投产等，在施工进度的安排上，越快越好。这些工程的竣工工期，通常要安排在一些重大节日——如国庆、“七●一”、“八●一”、“五●一”、元旦、党的代表大会或别的重要会议召开时——以增加喜庆气氛，用建设成就向上级汇报，请上级参与剪彩、观礼。报纸、电视、广播大肆报道，给最好的版面位置、最佳的播出时段、最大的篇幅。因此被称为献礼工程。

这样的工程，在立项、设计、资金筹措等环节，都贯彻了行政首长的意图，得到特别关照，可以越过正常审批程序。多是“三边工程”，即边设计、边勘察、边施工的工程。不进行科学的可行性论证，不做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在工程组织、进度安排上，不是按科学规律、工程建设规范办事，而是根据政治、宣传的需要来安排时间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甚至为了抢工期，边设计边施工，搞大兵团作战的人海战术，动员民工、工人、机关干部、解放军投入施工，组织青年突击队挑灯夜战，三班倒连轴转。建筑工地上常见“抢时间、赶速度、献厚礼”的标语口号，大红纸书写的挑战书、决心书张贴满墙。

是各级党政机关年终总结、典型材料、政府工作报告里浓墨重彩、大事渲染的华彩章节。为了打擂台、出彩，常常与其他地区竞相攀比，不顾自身条件，不计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间的均衡、相称，把行政目标放在经济目标之上，求大、求多。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哗众取宠，节庆剪彩后再开膛剖肚返工。

始于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的北京十大建筑（1958—1959年）。这是“多快好省”的大跃进精神、盲目冒进做法的历史延伸，是政治挂帅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在工程组织和进度上的表现。单是围绕毛泽东诞辰（12月26日），就有1968年12月25日富春江大型水电站建成发电，1970年12月25日葛洲坝一期工程开工，1972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辆载重300吨的大平板车问世，1975年12月24日焦枝铁路通车，等等。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好大喜功、不讲成本核算的首长工程、政绩工程，虽不始自文革，亦未终于文革，却鼎盛于文革。被当作文革大好形势的证明、点缀，庆典上的漂亮蛋糕。是经济建设中的机会主义，也是政治上“宁左勿右”思维定势的一种折射。反正在行政首长升迁考核的资产负债表平衡上，只有收入没有负数。但往往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甚至遗留下不应有的质量、安全隐患和环境问题。

到2000年代前后发展到更加蝎虎，被时人称作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已经有舆论对其从科学、效益、安全等角度提出尖锐批评，说“违背科学规律”，“亏了政府，苦了百姓”，由于质量、安全无保障，“献礼”成了“献丑”，呼吁不要再搞“献礼工程”。

（参考资料：《文革时期（1966—1976年）我国经济大事记》，转自徐娘“西祠胡同”“文革祭坛”2004-6-20的帖子<http://www.xici.net/b156680/d20463279.htm>；钟怀《小议“献礼工程”》，《人民日报》1998年5月12日；林金芳《“献礼工程”是如何产生的》，《国际金融报》2005年07月28日）

一线

名词。本义是战争前沿或直接从事实际工作的岗位。但也在比喻的意义上，引申出下列二义：

1. 与“二线”相对。指称中共最高层的人事、政局部署。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 1953 年曾考虑是否采用部长会议的国家体制和是否增设党的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分一线、二线的主张。

1959 年毛泽东提出从亲力亲为的“一线”下来，退居“二线”，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同年 4 月的二届人大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设立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书记处。在 1966 年文革以前的 6 年内，刘邓实际处于中共最高层领导核心的一线。毛甚至长期不参加政治局的日常会议，专心于思想理论工作，“给予他的同事们更多威望”。据说是出于培养接班人的考虑，也可能是在大跃进的失误面前作战术退却，等待变被动为主动的时机，或年迈养病的需要。以利于保留超然于实际工作之上的最终裁判权。

后来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种种主张不易推行。于是开始了重返一线的努力，提出“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1962 年）的口号，从争取意识形态的主动权、组织一系列批判出发，以积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部署、预演，凭借其个人魅力超越了组织程序，终于发动了文革。

一二线的划分、进退，影响、牵动了当时中国政局权力重心的变迁，成为解释这种戏剧性变迁的深层线索。不少研究者持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谋略，操作难度大，有失控的危险。条件是施行者都必须具有建立在绝对威望基础上的绝对控制力。亦曾被后来政治家效仿。

2. 与“三线”相对。用地理分布指称中国经济、国防工业战略布局。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中共从备战角度出发，把全国按地理位置分为一、二、三线：东南沿海地区为一、二线，内地为二线，山区为三线。在中共战略、规划专家眼里，位于一线的、与国防关系密切的高精技术产业企业，一旦战争爆发容易受到攻击；[注]因此被大量迁往二、三线（以三线为主），远离大城市，进山、进洞。使一线地区地理、工业基础、融资、教育等资源的比较优势，长期被废置，得不到伸展。

这一内迁工作，在文革中达到高潮。东南沿海现代工业内迁带动了闭塞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但这样的工业布局构思，以战争、政治需要为考量理据，悖离了以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为优先目标的经济规律。由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配套，生产成本高昂，对市场反应迟缓，效益低下。1980 年代后这些企业又出山出洞，重新回到一、二线和中心城市。

[注]其基本假设是针对中国的战争甚至世界大战随时可能发生。

（参考资料：木生《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浅析》，“西祠胡同”“文革祭坛” 2004. 11. 14 <http://www.xici.net/b156680/d23796154.htm>；韩德强《“四小龙”、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博客网” 2005. 5. 24 <http://column.bokee.com/73824.html>）

## 中苏论战

名词。指称中苏两党基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冲突而展开的论战。起始于苏共 20 大，[注 1]延续到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下台才基本结束。

1960 年 2 月初，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首脑会议上攻击中国和毛泽东，批评中国不给苏共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同年 4 月 22 日的列宁诞辰 90 周年纪念日，中共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社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人的某些观点，由此拉开中苏论战序幕。这三篇文章编成小册子，以中、英、俄、法、日等文字公开发行。6 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突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责，将中苏分歧公开化。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抗争。

此前的 1958 年，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遭到毛泽东的严辞拒绝。同年，赫鲁晓夫对中国炮击金门进行干预，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也为中国所拒绝。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苏联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指责中国。此后，苏共领导人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步骤，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相继撤走全部在华的专家，撕毁协定和合同；并于 1962 年 4 月至 5 月间，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制造了伊犁暴乱事件。

1963 年 7 月，为改善两党两国关系，中苏两党代表团曾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未果。苏方 7 月 14 日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将中苏两党争论公开于世界。中国共产党详加答辩，以说明真相。这样，两党之间便进行了一场公开论战。随之，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后来又陆续发表了苏共中央的许多重要文章、讲话和决议。同时希望对方也能这样做，不要对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搞封锁。此后，从 1963 年 9 月 6 日至 1964 年 7 月 14 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陆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 9 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参见“九评”词条），反对了苏联的霸权主义，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因赫鲁晓夫政治斗争失败的下台而告终，被中共视为赢得论战的胜利。

至 1966 年 3 月中共决定不派代表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会，中苏两党关系中断。

中共在此过程中结束了建政初期实行的“一边倒”政策。被学者认为是中国开始探索不同于苏联国家建设独立道路的一种外交代价。1964 年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使中国国防地位在北临强邻的态势下得到加强。论战中的中方论点，在后来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成为毛泽东系统的反修、防修思想，成为发动文革的主要诱因之一。

中苏两国上千公里边境各驻有数十万以上重兵。1969 年 3 月 2 日到 3 月 15 日，在乌苏里江珍宝岛发生了苏中边防战士之间的武装冲突，双方投入了成团建制的兵员，造成大量生命伤亡。两国关系几近战争状态，一触即发；曾传苏方暗中向美国试探对中核力量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文革后两国关系方始出现松动。直到 1989 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才正式和解。

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曾说：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注 2]被官方表述为：“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这些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是不恰当的。”

[注 1] 1956 年 4 月和 12 月，《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已经对赫鲁晓夫 20 大报告“和平过渡”和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表示过不同意见。可以视为中苏论战萌芽。

[注 2] 同时还说“一个党和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

(参考资料：李明斌《中苏论战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研究综述》，《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 年第 3 期；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 珍宝岛

地理名词。俄罗斯称其为“达曼斯基岛”。位于黑龙江省鸡西市虎林市境内，七里沁岛上游，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南北长 2000m，东西宽 500m，距西岸 200m，距俄岸 300m，面积 0.74 平方公里。

冬季时气候严寒，最冷气温低至摄氏零下 38 度，平均气温则在零下 20 度左右。夏季的平均气温在 22 度左右。寒暑气温相差极大。冰期很长，达五个月之久。

该岛北端原与中国大陆相连；由于江水的长期冲刷，1915 年才与中国大陆分离，形成江中小岛。至今在枯水期间仍与中国江岸相连，人们可徒步上岛。当地中国居民祖祖辈辈都在珍宝岛生产和捕鱼。20 世纪初，中国渔民张盖和臧盖年等老人上岛建房、捕鱼和种菜，因此又称“张盖岛”和“翁岛”。1928 年起，中国居民陈远进与其儿子常住岛上。1945 年以前，日本占领期间曾将渔民赶走，日军撤退后岛屿才重新回到人民怀抱。珍宝岛归虎林县公司村管辖，后来归虎头区管辖。但距饶河县更近(距饶河镇 45km)。该地区长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

1969 年 3 月 2 日到 3 月 15 日，在这里发生了中苏数千边防战士之间的武装冲突，造成大量生命伤亡。两国关系几近战争状态，一触即发。如果苏军意欲从东线的兴凯湖以北，以虎林、七台河、方正、哈尔滨为轴心进攻中国，因地势开阔，便于苏军优势摩托化部队展开并进攻。通过乌苏里江时，这里就成了架设舟桥的关键跳板。所以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成为中苏边境争端的代名词，因而举世闻名。其后直至 2000 年代中国军队仍在岛上驻军。

根据 2004 年 10 月俄总统普京访华期间签署、2005 年中国人大常委会和俄国家杜马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该岛归属中国。

第五代珍宝岛哨所建于 2002 年 5 月，为三层楼，建筑面积 326.39 平方米，也就是迄今仍正在使用的营房。岛上立有三块石头：一块为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时立起的“回归石”；另一块为 2000 年立起的“安心石”；一块为 2002 年 6 月 5 日立起的“环保石”。

珍宝岛森林公园成为旅游地之一。饶河县珍宝岛酿造有限公司生产出酱香、浓香、清香、兼香型等各类高、中、低档“珍宝岛”品牌系列白酒，具有特色的“珍宝岛熊胆酒”、“珍宝岛古炮熊胆酒”、“珍宝岛蚁王神酒”、“珍宝岛力酒”等。

(参考资料：《珍宝岛》，黑龙江省饶河县人民政府网 <http://www.hlraohe.gov.cn/fgly/zbd.htm>；萧方《中俄 40 年划界尘埃落定》，

《 凤 凰 周 刊 》 2004 年 第 33 期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2921810177359872/20041124/459708.shtml>；《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2005年05月27日）

## 珍宝岛事件

1960年代以往中苏边界纠纷日趋增多，珍宝岛事件前后达到冲突的顶点。1968年在在中苏东段边防线双方就发生过40多次冲突，这些冲突由口头争辩发展到相互推搡和棍棒斗殴。1969年2月底，苏军进行过一次有两个师参加的军事演习。

1969年3月2日，苏联军队乘坐装甲车和汽车侵入中国珍宝岛地区：向正在执行巡逻任务并正向苏方进行口头交涉的中国边防人员开枪开炮。早有准备的中国边防部队径行还击，双方互有伤亡。15日，苏军先后出动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100多名步兵，运用直升飞机和纵深炮火掩护，并炮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再次发生更大规模流血冲突。[注1]中方采取了伏击战术，使用无后坐力炮、40火箭弹击毁苏军指挥车和装甲车。苏军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瘸子上尉”斯特列利尼科夫阵亡，一辆苏制T62坦克[注2]被缴获成为北京军事博物馆的陈列品。

中国外交部即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苏方立刻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惩办凶手，赔偿损失。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一方面又极力否认中苏之间存在边境问题。同时，苏军继续用大炮、机枪向珍宝岛等中国领土射击。

中国在首都北京和全国城乡组织了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强烈抗议苏联侵犯珍宝岛。在3月4日至12日不足十天时间里，参加示威游行军民达4亿人次以上。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战备高潮。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决不能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强调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打常规战，打核大战。4月28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号召。8月13日在中国西部边境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带有报复性质的严重流血事件。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举行了“机场会谈”，双方达成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

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一方面加重了中共党内存在的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左”的估计，三线建设速度加快，一方面成为调整国际战略的契机。中共四老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提出中美都各以苏联为敌，苏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还提出了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1969年初以来，美国开始向中国发出缓和关系信号，中国对此不失时机地做出了积极反应；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中美华沙会谈翻开了新的一页；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检阅游行队伍，事实上向美国传递了缓和信息。

1970年毛泽东打破了中美20年交恶的局面，1971年展开对美“乒乓外交攻势”，1972年2月毛泽东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握手”。中共从维护中国国

家安全利益出发，以战略目光和策略技巧促使国际政治力量重新组合，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

中共中央军委于1969年7月30日发布命令，授予孙玉国、杜永春、华玉杰、周登国、冷鹏飞、孙征民、杨林、陈绍光、王庆荣、于庆阳等10名官兵以“战斗英雄”称号。后5名官兵战死疆场。

[注1]此战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58人、伤94人。而在中国宝清县城东南部万金山南山头西北坡的珍宝岛烈士陵园安葬有68位战死军人。

[注2]因装备有当时先进的红外线夜视仪、射击双向稳定器、大功率柴油机，勃涅日列夫下令苏军必须抢回。

(参考资料：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转自“军事新闻网”<http://www.milnews.com/lib/zsbj/200509/7548.html>；王亚洲编译《俄罗斯人谈珍宝岛冲突》，《军事文摘》1999年第七期，转自“军事新闻网”<http://www.milnews.com/lib/zsbj/200509/7566.html>；“军事新闻网”“新中国之战——中苏边境之战”<http://www.milnews.com/lib/zsbj/Index.html>)

## 芒果

名词。因毛泽东1968年夏赠送清华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而声名显赫的水果。亦作“木亡果”、“檬果”。一种漆树科树木的果实。果实呈肾脏形，淡绿或淡黄色，核大，果实肉黄色，肉质细腻，果肉味甜、有香气，汁多。是富含蛋白质、维他命A、C及钙质的水果，多吃易饱。益眼、润泽皮肤，是其中含有胡萝卜素的功效。其核亦可作药用，能解毒消滞、降压。中医认为，它味甘、酸，性凉，有益胃止呕、生津解渴及止晕眩等功效，甚至可治胃热烦渴、呕吐不适及晕车、晕船等症。

芒果是世界主要的果树之一，被誉为热带水果之王。主要分布于亚洲、南美洲、北美洲、非洲、大洋洲的100多个国家，年产量超过1600万吨[资料来源199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生产年报]，产量居世界果树第五位。在世界水果生产与贸易上均有一定的地位。芒果树速生快长，要求栽培条件不高，结果早、产量高。中国是芒果主要生产国之一，产地分布于台湾、广东、广西、海南以及福建、云南、四川等省区。

刚果总统赠送给毛泽东的非洲芒果，被后者于1968年8月5日转赠给派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队员。消息经新华社报道，[注1]立即成为特大喜讯，轰动全国。那时芒果是产于热带的珍稀水果，商店里见不到供应。绝大多数国人压根就不知道还有芒果这样一种水果。毛泽东给工宣队送芒果，让“芒果”一时间家喻户晓。被人们视为“宝果”、“圣果”。

8月15日毛泽东即亲切接见工宣队代表，发表最新最高指示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为了使毛泽东恩泽永不变质、惠及全国人民，研制成功了塑料和蜡制仿真芒果，补充了国家在芒果种植和生产方面的空白。这些芒果按照真实芒果1:1的

比例制成，金灿灿，圆澄澄，放在木质的托盘上，再罩上玻璃罩子，配以红绸带，煞是好看。和真的没有丝毫差别。并投入批量生产。一时间，仿真芒果成为人们争迎的抢手货，全国各地又响起了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组织盛大庆典游行，芒果被置于披红挂绿彩车顶上，往人口稠密的主干道四处巡弋，敲锣打鼓举行载歌载舞迎芒果仪式。各级革委会领导们隆重地将两个仿真芒果送到工宣队中，摆放在毛泽东宝像下，每天早晚和宝像一起接受着工人阶级的早请示晚汇报。许多人家的桌子上，也摆放了两个仿真芒果，让毛泽东老人家对工人阶级的关怀照耀每个家庭。

这一主题被制作成多种工艺品，其中像章“芒果寄深情”，2000年代“弘化古玩收藏网”开出的参考价80元。同年河南新郑卷烟厂出品“芒果烟”，1980年代曾创造单品牌销量全国第二的佳绩。1994年又推出高档金芒果[绿硬]香烟。197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过根据《序曲》中的谷雨短篇小说《第一课》改编的彩色故事片《芒果之歌》（导演常彦、张普人，编剧郑荃执笔，主演俞平、任颐、刘文治、梅元奇等）。[注2]2000年代“俏佳人商务网”上该片VCD出售价19元。

2000年代，芒果已成为市场上多见、人们日常食用的水果。

[注1] 新华社8月7日的报道说，送芒果“这不仅是对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支持，也是对正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团结战斗的全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最大鼓舞，最大关怀，最大教育，最大鞭策！”“五日下午，当毛主席向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芒果的特大喜讯传到清华园的时候，人们立即聚集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赠送的礼物周围，热烈欢呼，纵情歌唱。他们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衷心地祝愿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他们纷纷向自己所在的单位打电话，传颂这一特大喜讯，并且连夜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冒雨到中南海报喜，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他们的赤胆忠心。”

[注2] 影片梗概为：1968年7月，以夏彩云为首的临溪市第六棉纺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东方纺织工业大学。操纵该校红造司组织拉山头、闹派性，妄图破坏文革的走资派聂家良表面欢迎，暗地里却与工宣队作对。在他挑拨下，学校各派群众组织又发生了冲突。夏带领工宣队深入调查研究，为消除各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主持召开各派头头会议。在聂操纵下红造司擅自撕毁会上签署的协议，挑起武斗。夏和工宣队长老唐等冒着危险去做说服工作，在一次武斗中，红造司成员刘小舟打伤了老唐。聂要红造司交出让工宣队从严处理，妄想挑起小将们与工宣队闹对立，借红卫兵之手撵走工宣队。夏牢记毛主席教导，严格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无产阶级宽广的胸怀对待犯错误小将，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不仅使聂的阴谋落空，还感动了小将们，并得到他们的信任。小将们受到启发、教育，在工宣队领导下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把矛头对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掀起了斗批改新高潮。

（参考资料：新华社《最大关怀 最大信任 最大支持 最大鼓舞 我们的伟大领袖永远和群众心连心 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 转送给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人民日报》1968年8月7日；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google等）

## 老三篇

文献名。《为人民服务》(1944)、《纪念白求恩》(1939)、《愚公移山》(1945)等三篇毛泽东著作的合称、简称。盛行于1966—1971年。

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最早在军队范围内部发行，被林彪规定为突出政治、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必读书目，视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捷径：“‘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1966年上半年文革开始时遂向全国范围内发行，学习热潮亦由部队推向地方。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1966年6月3日)说，不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初小各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习“老三篇”。由于被工农兵学商列为天天读的首选篇目，反复学习，能熟练背诵老三篇的人，亦不少见。

把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三篇著作组合成一个整体，显示了选编者的意图：勾画出具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生观)，又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集体主义、国际主义(世界观)，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人格魅力)这样一种完人、超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的形象。这一形象成为当时思想革命化的道德境界，规范人们行为、改造世界观的最高标准；实际上，它成为了剥夺个人欲求、权利，使之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和意志的绝对律令。

后来在老三篇基础上，加进《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两篇，称为“老五篇”。

1971年林彪覆亡后这一做法遭到全面批判。邓小平曾以“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以顺应文革时尚的语言表达了他全面整顿的思想。昔日庄严的宝典变而为臭名昭著的骗术载体。

民间也有取该词的字面意思，把落套的、一成不变、没有新意、招人烦的东西称作“老三篇”的。例：“又是老三篇——萝卜、咸菜、老豆腐——吃都吃腻烦了。”

2000年代，日渐式微的官方意识形态又从老三篇里找到了与“三个代表”脉络相通的思想资源。有论者指出：“曾经在过去的时代武装与教育了亿万人民与党员、党的各级干部的‘老三篇’，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今天，特别是即将在全党开展的保先教育中，愿我们广大的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在率先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认真地学习‘老三篇’，牢记党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树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在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大道上，重塑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的形象，抖擞精神，奋勇前进！”

(参考资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邓小平《各方面都要整顿》，载《邓小平文

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苏鲁边河《建议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认真学习“老三篇”》，)

## 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并列关系短语。它是新中国经济活动的计划安排和工作目标，更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在经济上的追求，实质上是试图消灭以回归为前提的价值单方面转移的信用活动。把它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自力更生的象征和政治稳定、经济健康的重要标志。

其实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胜利折实公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建设公债”，都是“内债”；1950 年代从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 400 项技术设备，兴建了 156 个重点项目，借款高达 26 亿美元，1972—1977 年，又从国外引进设备，利用延期付款方式借了 10 多亿美元，都是“外债”。这些在中国国民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内债外债的借用，无疑激活了相关国家机构和所涉人员的信用意识，至少也加深了人们对于借债以及信用关系的理解。但当时学界观点、舆论宣传都将其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偶然”所为，且对于“内债”的解释，更多地挂钩于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类的政治度量，“还本付息”的事实过程被政治的宣讲而淡化了其信用意识追加效用。

1960 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并且逼中国还债，毛泽东号召全国“勒紧裤腰带，也要还外债”。有为了配合意识形态领域反修斗争需要的成分。三年后，中国债务还清，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里向全世界宣布：“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署名“蔡正”的述评文章，说，从 1950 年到 1958 年，我国先后发行过六次、总额为 38 亿 4 千万元公债，加上应付利息 9 亿 8 千万元，还本付息总数共计 48 亿 2 千万元。已在 1968 年底全部还完。在建国初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苏联提供过本息总共 14 亿 6 百万新卢布的援助借款，中国一直坚持按期归还，并且已经在 1965 年初提前全部还清。这种经济状况被称为“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当时国人对此有种发自内心的自豪。

1974 年，国家外贸部甚至申明：“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同外国共同开发本国或其它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

这些只能说明中国还是一个十分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体，既不发达又与世界经济缺少联系。无知到把作为经济手段的负债经营看成耻辱，自己堵塞、取消自己的发展道路。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的开放、建设，使资金缺乏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瓶颈”。邓小平提出要积极利用外资的重大决策，成立了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开始考虑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1980 年，世界银行开始恢复中国成员国的地位和贷款权力。正如邓小平所讲，“有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都能干，但是有了你们的帮助，我们就能发展得更快一些”。

1980 年代以来中国利用国际金融组织（IFC）贷款的大量实践表明，它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的正面影响，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私人投资和国际直接投资（FDI）均产生了很强的引致效应，贷款投资的乘数效应十分明显；在中西部地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是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对缓解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起着均衡作用，在东部地区是通过改善投资环境直接促进私人投资和国际直接投资，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而且，2000年代前后实行的增发国债以拉动内需的财政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也的确发挥了公认的积极作用。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和财政学者们的肯定。

有评论者进而指出，劳动失业保障就是巨额的内债——国家以承担劳动工人退休生活水平为担保，要求劳动工人不保留个人的养老财产，从而加入固定资产投资。1980年代以前快速积累的国有资产很大部分就对应着劳动失业保障的应计债务。2000年代爆出几万亿社保资金空帐和挪用，就是当时欠的这笔“内债”到期并要求支付而产生的问题。

（参考资料：蔡正《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日报》1969年5月11日；胡鞍钢《国际金融组织对华贷款的宏观经济评估（1981—2001年）》，《开放导报》2005年第3期）

## 学习与批判

名词。杂志名。它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参见罗思鼎）以复旦大学名义主办的理论月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6开本，1973年9月创刊，1976年10月终刊，共出版38期。国内外发行，每月中旬（以14日为基准）出版。

每期96页、88页、80页、72页不等。总第一期定价0.33元，总第二至总第五期定价为0.29元，从总第六期开始一直到停刊，定价为0.25元。刊名字体先后换了三次，总第一至第四期，为一种；总第五期至总第七期，为一种；总第八期至停刊，为一种（疑似费新我左书）。

其中常见主笔撰文的罗思鼎、丁学雷、方岩梁、石仑、石一歌、任犊、方泽生、宫效闻、康立、翟海、景池、梁凌益、齐永红、翟青、金盛曦、裘室、方海、戚承楼、金风、靳戈、史尚辉、史锋、曹思峰等，都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不同笔名。署真名的仅有刘大杰、郭绍虞、徐缙熙、戴厚英和余秋雨等人。

该刊的自我定位是“一份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杂志”。刊内人自诩：《学习与批判》是“小《红旗》”，“《红旗》不便登的，我们这里登”，“别的省市都要看这份杂志，摸政治气候”，“我们传达的精神有时比《红旗》快”。当时，西方报刊称它为“中国激进派的刊物”。由于内容带有一定学术性，信息量较大，在批判中介绍了部分西方文学和“苏修小说”（附有译文或梗概），在当时出版萧条环境下曾得到一些渴求知识的年轻人喜爱。1976年10月后它被定性为“四人帮帮刊”。中共中央印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其中有数处涉及《学习与批判》。

卷首目录上方是毛泽东语录。常设的主要栏目有：“批林批孔，反修防修”（或“学会辨别各种思潮和学派”、“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研究”）、“经济问题研究”、“学哲学，用哲学”、“文艺评论”（或“文学评论”）、“教育革命经验总结”、“人物传记”、“杂文”等。紧跟时事的栏目有“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等。

曾有人统计，《学习与批判》共发表文章710篇，其中所谓批判修正主义的48篇，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124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61篇，评论《水浒》的40篇，配合形势时事评述性的237篇，其他属于学术研究和文艺作品的200篇。这些文章中，利用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影射史学”占70%以上，如《论尊儒反法》、《汉代的一场儒法斗争——读盐铁论札记》、《评“水浒”的投

降主义》、《孔子、儒家和礼》、《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从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 Q 小 D 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这个题目可能是“文革”期间最长的文章题目)等。

该刊的重头文章常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转载；还被分类汇编成集，名为“学习与批判”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如《论儒法斗争》、《“水浒”评论集》、《走出“彼得堡”》、《鲁迅传(上)》等。形成月刊杂志基础上的第二次传播。

该刊被认为“极具史料和收藏价值”。2005 年在上海文庙书市叫价视品相新旧一般在 10—30 元左右。

(参考资料：罗建华《由余秋雨说到“学习与批判”》，原载《中华读书报》，转自“人民书城”胡松涛《“帮刊”——〈学习与批判〉》，《书屋》2006 年第 1 期)

### “私”字一闪念

偏正关系词组。“一闪念”，言其心念产生、消失的时间短暂，所涉细微到了难以觉察的地步。倏忽而过，无迹无痕。用“一闪念”以修饰、限制“私”字，就是说，无论多短暂、多细小的私心杂念都必须慎重对待到如临大敌，群起批判、剿灭它，不能等闲视之；所以成为“狠斗”的宾语。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相携而行。流行的高峰期是 1968—1971 年的 4 年间。

一方面这是意识形态上突出政治和思想革命化的要求，在公私对立中让人们组织绝对忠诚，亦步亦趋。另一方面全面打倒走资派、大联合尚未达成出现的无政府主义真空，使群众组织群雄逐鹿的游戏变得带有极端危险性，这样的要求将使觊觎权力者处于被告不利地位。把“私”字斗掉后，就能树立“公”字、“党性”了，它的核心诉求是领袖、革命、集体应该忠心耿耿。以“公意”、“人民”的名义扼杀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将丰富多彩的个体变成一颗颗规格化的“螺丝钉”。[注 1]民间有人误以为这是出于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中国历代思想家们都奉行崇公灭私的经典之教。《尚书》：“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曹羲说：“夫至公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理之要也，人之用也。”东汉马融《忠经》：“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天无私，四时行；地无私，万物生；人无私，大亨贞。”西晋傅玄《傅子·问政篇》更说：“私不去则公道亡。公道亡则礼教无所立，礼教无所立则刑罚不用情。刑罚不用情而下从之者，未之有也。”朱熹更把这一套提到存天理（公）灭人欲（私）的骇人高度。

根据当时的观念，“公”字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私”字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人们谈“私”色变，把“私权”和“私心”视为洪水猛兽，看成是社会罪恶的根源。个人的肉体存在被看成私心杂念的温床，充满了这样丑陋、邪恶的欲望，如不及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斗私批修，将这些流毒及时清除干净，党和国家就会慢慢地被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占领，就会改变颜色，人们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就会白流。“千里江堤溃于蚁穴”，“人的头脑不是真空，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定会去占领”等防微杜渐的常识支撑，也都是斗私批修的理论根据。具体说，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自我检讨。做法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照“圣人式英雄”的英雄事迹，检查自己、找差距，去深挖自己哪怕最微不足道的私心杂念；并对其大张旗鼓地上纲上线一一与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等联系起来（参见“上挂下联”），把自己私心的产



生，说成是受了毒害，进行批判，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

经常过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定期写思想汇报，习惯了把骄傲自满作为个人自我评价的武器。狠斗“私”字一闪念口号，把人趋利避害求温饱的生存本能也列入检讨范围，在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与形而上的精神现象间搭建通道，启发了人们阻塞的思路，斗私批修讲用会就因此得丰富多样、生动起来。[注2]人们操作这一套仪式的圆熟自如、尖刻狠毒已经到了自虐生快感程度。但令人沮丧的是，无论斗私批修怎么制度化，天天讲，狠斗“私”字一闪念，私心杂念仍然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杂草般不停滋长蔓延。

2004年中国宪法修正案中，已经载入“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不但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体现了社会对个人生活的充分包容。关注自我、张扬个性不仅有了合理、合法的存在空间，更表现为一种主流时尚，甚至成为推动个性化服务业蓬勃发展的动力。

[注1] 1949年元旦前夕，沈从文即意识到自己前二三十年来的用笔方式“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废弃“思”、确立“信”的修炼-塑型过程。

[注2] 雷颐《层层剥笋法》对此有生动描述。军代表：“同学们，这个私字总是藏在灵魂最深处，不用层层剥笋的方法就斗不出来，我给你们斗个样子看看。同学们，昨天下午我晚来了几分钟，耽误了大家几分钟时间。为什么我会迟到这几分钟呢，这里面有私心。当时我正在洗衣裳，知道时间到了，还是想再有几分钟就能把军服洗完晾出去。为什么非要先把军服晾出去呢，这里面有私心，就是想一下午这件军服就晾干了，明天还可以穿。为什么非要尽着这一件衣服穿呢，这里面又有私心，就是想自己今年可能要复员回家，尽量尽一件军服穿，到时候上交，带回家的那件衣服就尽量新一点。为什么想到复员回家了呢，这里面又有私心，我已经超期服役两年了，提干看来是没希望，心想那就不如早点回家，再加上母亲也想要我早点回去结婚成家。同学们，革命战士要时刻听从组织指挥，自己是走是留这是组织考虑的事，组织要走就走，要留就留，自己根本就不应该想这个问题，我却想了那么多。你们看，迟到几分钟看起来是小事，里面的私心可不小……”

(参考资料：新华社通讯员《“天天读”是为了天天用——江苏滨海县正红公社贺君一队坚持“天天读”的经验》，《人民日报》1970年8月31日；邵建《“私”是一种权利》，；佟平《狠斗私字一闪念——“少年回眸”之十六》肖红 车玉明《中国立法者开始审议修宪保护私产》，)

## 票证

名词。中国在1950—1980年代物资匮乏和统购统销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解决供需关系紧张矛盾，由管理物资供应机构发放的购买日常生活物品的凭证。这些票证几乎覆盖了民生的方方面面。按户口簿核定人数定月（或季度、半年、一年）发放，有明确地域性（分省、市、自治区）。文革时期生产、运输秩序不正常，物资供应紧张达于极点，发放票证的种类也空前绝后。常见票证就有65种之多。按满足需求的种类和供应渠道归类，计有5类——

“吃喝”类：粮票（分粗粮票、细粮票、面粉票、黄豆票、绿豆票等）、植物油票、糕点票、糖果票、白糖票、豆腐票、粉条票、蛋票、鱼票、食盐票、碱粉票、芝麻酱票、酱油票、肉票（分羊肉票、猪肉票、牛肉票等）、蔬菜票（分白菜票、萝卜票、大葱票等）、水果票、茶叶票等。

“穿戴”类：布票、毛线票、棉花票、棉絮票、衬衫票、毛衣票、丝绸票、布鞋票、胶鞋票等。

“日用百货”类：工业券、暖水瓶票、脸盆票、洗衣粉票、肥皂票、香皂票、火柴票、卫生纸票、烟筒票、香烟票、煤票、钢精锅票、煤气票、桌子票、自行车票、手表票、缝纫机票、收录机票、电视机票等。

购货券和购货本：在特殊时期所有日用百货几乎都很紧缺，无法按人平均分配，于是就有了购货券和购货本，紧缺物资需几张或几十张购货券，这需要集中若干人的购货券集中使用，购货本的发放、使用以家庭为单位，一户一本，上面的物品分月供应或按季供应，并有过期作废字样。

“专用票证”类：1. 工种粮票，是根据劳动强度发给的粮食补贴，此票只能在粮店使用，不能在社会上流通。2. 特供票证，主要用于高干、老红军、婴儿、产妇和病人按规定之外的补助食品，如牛奶、奶粉、红糖、饼干和豆类，病人必须由医院开出诊断证明方能享受此待遇。3. 侨汇物品供应证，是国家为了吸引外汇，有“海外关系”的侨民寄来的外汇，根据汇额发放的侨汇购买券，有粮票、油票、副食品工业券等。4. 节日供应票，多在春节期间额外供应的物品购买证，如花生米票、猪头票、年糕票、酒票等。5. 结婚购物证，新人结婚凭结婚证领取结婚购物证，凭此证可买木床、棉胎、棉布、被面、暖水瓶、脸盆等。

装饰图案内容主要有高举红旗、手捧毛泽东选集或语录的工农兵群像造型；红日放光芒；革命胜地、政治口号、毛泽东诗词；或环绕以葵花团簇着的红心忠字图形等。当时不仅票证品种多，而且限制供应数量少，例如油每月 2 两或 4 两、肉每月半斤、布最少时一年 3.5 尺。虽然都是无价证券，但由于物资短缺，它们往往有不菲的附加值，甚至远远超出了购买这种物品的价值。以致有人专门从事倒卖票证的灰色职业，被称为“二道贩子”。有了票证的限制，农村人口很难流动，即使城镇人口较长时间外出也非易事。人们最怕的就是家中来客人和丢失票证，超出定量供应捉襟见肘。

2000 年代前后，收藏票证已经成为日益兴盛的收藏业中一个投资保值重要品种。其中尤以首发票（1954 年部分县市试发粮票）和收尾票（1993 年截止）、面额最大票（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军用粮定额支票”马料 5000 斤）和最小票（如新疆发行的一厘米布票和云南发行的一市钱绵线票）、错票、少见票（如沙发巾票、大衣柜家具票等）等收藏价值为高。全国第 14 届票证收藏文化展示交流大会 2005 年 9 月在重庆举行。河北科技大学的退休教师王进军酷爱收藏，在近 50 年的收藏过程中，他已收藏了 7000 多种票证。

网上建有“中国票证博物馆” <http://www.1-10-100.com/>、“中国票证信息网” <http://cnpz.my0807.com/liangpiao/index.asp> 等。

（参考资料：高全喜《为了忘却的记忆——关于常宗贤的随感》，“世纪中国”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4866>；孙晶、刘扬《特殊票证升值空间比邮票大》，《羊城晚报》2005-10-30，转自“搜财网” <http://www.myrich.cn/collect/1/92616.shtml>；王展《票证收藏有“五抓”》，“人民网” 2006-1-12 <http://art.people.com.cn/GB/41067/4019831.html>；）

## 三种人

名词。文革后，把文革期间“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统称为三种人。中共曾发动了一次清理清查运动，试图把这批人从干部队伍中清除出来（开除党籍、撤职、处分、法办），达到彻底否定文革，从政治上断绝文革死灰复燃的社会基础；强调对这三种人不能重用和提拔。曾列入 1983 年严打重点对象。绝大多数受害者（包括政治领袖）出于对文革的义愤，这样做法的动机虽然可以理解，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198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说：“在党内，‘三种人’……还没有完全清理。……必须坚决有效地加以整顿。……清理‘三种人’是纯洁组织的关键。”据《东阳市情》《1980—1989 年大事记》载，东阳市 1985 年 1 月 10 日始，清理文革中“三种人”，1987 年 12 月基本结束。

三种人中的第三种人打砸抢分子，文革刚结束就受到了清理，那第一波清查是在华国锋治下——高干子女和与当政者亲和的少数保皇派除外。所以第二波在邓陈体制下清理、清查的重点，还是第一、第二种人。

这次运动几乎又一次重蹈了扩大化的覆辙，结果是无疾而终。各地造反派领袖都已经被捕，或受到批判、行政和法律的处分；冯友兰、周一良、余秋雨、戴厚英等不少参加过当时写作组或类似班底的人（第一波摆在明处的清理对象），都曾被列入“说清楚”的范围。结果，许多被指控者由于已经跻身于体制内，或任着现职，或得到某种保护，逃脱了干系（一种说法是因为由主张两个凡是的人在主持清查，强调着力于经济建设）；只有个别造反派出身，与林彪、四人帮组织联系密切，被认为有前科而坐实了的人，被钉上了耻辱柱、十字架。其中一些人，被 1980 年那次审判四人帮时列入了地方爪牙（陈阿大、蒯大富、周家喻等）的行列。对他们的处理，在一些地方也累及了子女、配偶，使其无法正常高考、录用、升迁。

“三种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外延界定模糊的一顶帽子，拿来扣在参加过某派造反组织、担任过相当职务的失势者头上。成为派系斗争排斥异己的政治上正确的口实之一。他们中的多数人刑满释放后，虽然罪愆已经受过了惩罚，却由于被开除了工职，没有稳定经济收入、养老和医疗保险，只能靠配偶、子女、父兄、朋友供养，没有配偶、子女、父兄、朋友或配偶、子女、父兄、朋友不搭理，无力接济的，便走上下海经商或打工谋食的道路。一些地方对这些人给予了适当安排，一些地方则没有。他们的处境，鲜有同情者。其中部分生活无着的人们，2000 年代试图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得到安度晚年的保障。

通过运动给人作政治结论并进行处理，是文革及其以往历次运动的典型做法。它的失败说明：历史无法割断，个人的表现、际遇，往往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用简单的政治结论、框框去套活生生的人，进行政治宣判，对政治运动的进行是卓有成效的。但并不是观察、认识人的好方法，据此衡人多半会削足适履，得出漫画化的歪曲结论。

2000 年代，被“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语言游戏爱好者利用其弹性，戏谑地用于指称自己属意的批评对象。

（参考资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P393 注释 24；《东阳市情·1980—1989 年大事记》，“中国东阳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 的确良

名词，布料的一种。英文为 dacron。又写作“的确凉”、“涤确良”、“涤确凉”。发端于 1960 年代末，流行于整个 1970 年代，一直延续到 1980 年代中期。

它是一种涤纶的纺织物，生产原料为聚酯切片、涤纶短纤。有纯纺的，也有与棉、毛、麻混纺的（较晚）；初期以纯纺的为主。特点是轻盈、质地挺括、结实耐磨、色彩鲜亮、花色多样、不易起皱，容易洗和干得快。以前的纯棉布虽然质地柔软透气性好，但外表却不挺括，尤其是下水过后，特别容易起皱纹，不平整又缺乏弹性。

对过日子精细的主妇来说，的确良结实耐穿，虽然价格比棉布贵一点，却可以节省布票和衣着开支（因延长了使用周期，明贵暗便宜），节省洗涤、晾晒时间（缩短等待时间）[注 1]，都是它的好处。对爱漂亮的年轻人来说，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挺括”、“滑爽”和“光亮度高”。当它从国人多年灰暗的粗布粗衣中脱颖而出时，给人们以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在最初的流行中是以一种高贵的姿态“招摇”在普通人瞻仰的目光里。上市初期，由于广受青睐、生产量偏小而造成供应紧张。只有在商店橱窗里或是左邻右舍姑娘们订婚结婚的新娘装，才能看到。有门路的人就到上海、北京等地托人捎几件。[注]成为时尚的代名词。人们最大的奢求，就是夏季有一身的的确良穿穿。成了父母奖励孩子品学兼优的奖品、君子好逑时相亲的彩礼、人情往来的上佳赠品、单位年终发的福利（已经是 1980 年代初的现象了）。一个女孩子要是同时有几套的确良轮着穿，就是家境殷实的表现，审美趣味前卫的流露，思想贪图享受的征兆，既被人羡慕、惹人眼红，又有被批评、敲打的危险。

进入 1990 年代以后，衣料品种日增。的确良的显著缺点就暴露出来了：有静电，会起球起毛，尤其在天热时，穿不透气的涤纶衣物犹如钻进蒸笼里。而冬季穿的确良衬衣，容易与干燥的皮肤摩擦而产生静电，引起不适感。由于人造纺织面料的分类越来越细，名称越来越复杂，“的确良”一词使用的频率已明显减少。据报道，2005 年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常服材料的“的确良”、“涤卡”已经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当年夏季一级士官将换发与二级以上士官相同制式的夏常服，义务兵换发改进材料后的新式夏常服。

济南正昊化纤新材料公司 2003 年研制出涤纶新材料产品。其特点是具有吸湿、排汗、透气、抗菌、抗静电等多种功能，有的织物在穿着舒适性、染色鲜艳性等方面均可与天然织物媲美。

[注 1]因此有把它叫做“等干穿”的。

[注 2]有一则笑话说：在 50、60 年代，四川的的确良很缺，一位小伙子一天看见大街上卖的的确良布，就排了队去买，想给自己做件衬衣。可轮到他了，只剩下一尺布了，正为难，售货员就说：“你买不买？不买下面的谁要？”这小伙一急，就买了，回家只好做了条内裤。不过心想，这多冤呀，干脆在外裤上做了个牌子，上书“内有的的确良”。忽然，一日内急，就找到个厕所，将牌子挂在门上，出来看厕所外排成长龙，大家都在问“怎么等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卖呀？”（《内有的的确良》，“E 书中国” <http://www.myebook.cn/info/11494.htm>）

（参考资料：梁和峰《流行是怎样的“质地”》，《京江晚报》，转自《镇江日

报》网；我军军服告别“的确良”》，《人民日报》2005年2月25日

## 两霸

代名词。代指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最初是法国总统戴高乐提出反对美苏“两霸”支配世界，要求建立新的“力量均衡”（1965年）。中国使用这一概念最频繁在1970年代中、后期的文革后期。[注]止于1980年代末苏联解体、隶属于华沙条约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溃散。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由于推行以强权为后盾的国际政策、地缘政治，都被指控为企图瓜分、主宰世界的霸权主义。一凭借北大西洋条约结成的军事同盟（简称北约），一凭借华沙条约结成的军事同盟（简称华约），相互对峙，搞军事对抗、竞赛、扩张。合而简称“两霸”。

这是一种弱勢对抗强势时诉诸道义、义愤的斥责，意识形态的论战语言；常常出现在外交照会和领导人、社论的外交言论中。文革前期中国实行“反帝必反修和反对两霸”政策（1965-1972），受输出革命的世界革命观念干扰，趋于极左，向苏美两霸同时抗击，处于一定程度外交孤立。只能通过斥责发泄愤怒，表现所谓道德优越感，并描绘强敌环伺的恐怖图画，激发国内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的凝聚力。一方面，中国出钱、出人、出力，全力抗美援朝，并对美军1970年侵柬（埔寨）和1971年侵老（挝）作出强烈反应；另一方面，1965年中苏两党关系公开破裂后，谴责苏联侵犯捷克和指责苏联沦为社会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两国关系恶化，边境冲突升级，出现了“珍宝岛事件”。在南北两线保卫国家安全的同时，对抗美苏霸权。中国大力进行“三线建设”，提出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方针，国防和军队建设一直处于“盘马弯弓”的临战状态下。

1968年以后，中国逐步改变意识形态优先的外交，同一些国家修复和改善关系。在与苏联冲突紧张的压力下，中国领导人抓住美国尼克松总统上台后急欲改善与中国关系、撤出越战之机，安排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中国终于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迎来尼克松总统访华。

文革中后期实行“联美反苏”政策（1972-1979）。根据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区分对待各种类型的国家，道义上反对两霸，实际侧重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苏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并倡导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国确定新的国际战略，在美苏中三角关系下逐步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并在克服台湾问题的障碍后于1979年建立了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同日本建交并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广泛建交。

1980年代初以来邓小平反复指出，美苏两霸谁也不敢贸然发动战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1985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与经济上改革开放相适应，实行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从临战应急状态转向相对平时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中国裁军一百万。同时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国防科技水平，以为中国人民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提供保障。

1990年代两霸之一的苏联帝国退出霸权角逐后，世界出现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和多极世界（美欧[盟]中日俄）竞争、并存的复杂局面。

[注]据“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材料，该词出现的高峰是1974

—1978年间。1974年的浮现率13.70%，1975年18.88%，1976年11.48%，1977年25.31%，1978年12.84%。

(参考资料：新华社《戴高乐重申反对“两霸”主宰世界 法外长主张改组美国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人民日报》1965.05.23；《教材成果总结》，载于<http://www.cfau.edu.cn/extra/col3/chengguo.doc>；袁德金、马德宝《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一次伟大转变——论邓小平对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贡献》，《国防报》2004年8月19日，转自“解放军报网络版”<http://www.pladaily.com.cn/gb/defence/2004/08/19/20040819017044.html>)

## 哈尔套经验

名词。亦称“社会主义大集”。这是文革末期辽宁对农村集镇的一套管理方法。

哈尔套镇原名是蒙语“哈日陶勒盖”，意为“黑头山”，得名于镇东北部的小山。是蒙民以山的特点命名的，该山顶石头均为青黑色，人称“黑头山”。故被蒙语音译为“哈拉套力改”，后简化为“哈尔套街”。1949年以降更简称“哈尔套”。

这里年平均气温7.8摄氏度，无霜期150天左右，年日照时数2579小时，年平均降水量480毫米，土质肥沃，地上水资源充足。

该地作为一座古镇，迄有二百年历史。史料载，清初是盛京(今沈阳)所辖养息牧场，居民多是牧民。嘉庆年间，成为北通内蒙古、南去锦州、东去盛京的驿道。由于地处辽宁、吉林两省和阜新、彰武二县以及库伦旗交通要道，往来便利，汉、蒙、满、回族人民均来此地交易。形成农牧业和土特产品的传统集散中心。每到“逢五排十”集日，四邻八乡，甚至几十里外人都来赶集，多时4000—5000人，少时也有2000—3000人。

1975年当地发明社会主义大集的做法。当年的报道语言，说是为了“堵住小生产通向资本主义的渠道，有效地限制农村商品交换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具体做法是“发动群众把过去投入集市贸易的农副产品卖给国家，同时，组织供销部门打破常规”，“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社员之间的余缺调济，把集市贸易限制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有计划地占领农村商业阵地”。为了造声势，还组织“公社和各大队的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出各种文艺节目”，“还有城市工厂组织的各种支援农业的活动”。

被称为“哈尔套经验”。通过开现场会，在辽宁全境用运动方法强行推广哈尔套的“社会主义大集”：实行早集，超过8点钟，市管人员就到街上硬赶群众回家生产。有的地方还以发“赶集票”来限制群众赶集。据说，省、地、县三级干部谁要对这种做法表示不同看法，当场就被以“民主派”、“走资派”名义进行“批判”。叫做“给干部开刀”，而且要“刀刀见红”。

这样的做法，受到江青、王洪文等青睐，1976年不但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显赫位置刊登通讯，反复报道，还拍成了彩色纪录片《莺歌燕舞——辽宁新事(一)》。

但由于只允许以物易物的交换不准买卖，效率太低(范围小、交易时间长)，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有人就冒风险，外出跑买卖。不久辽中茨榆坨呢料大集、西柳服装市场、佟二卜皮甲克大集也相继出现。使“哈尔套大集”形同虚设。

据辽宁省供销合作社 1977 年揭发，“每次赶集以前，强行向生产队和社员摊派农副产品交售任务，规定‘个个要赶集，人人不空手’。有的社员家里没有养猪养鸡，他们逼着人家去买肉、买蛋来交售。交售的猪肉、鸡蛋，又不许直接送到收购站去，要车拉肩挑先在街上游行。哈尔套不产鱼，他们下令从外地调鱼来赶集。已经调进城市的猪肉、蔬菜，也要倒流运到集上来，为他们撑门面”。形式上还要扎牌楼，放鞭炮，用宣传车开路，群众排列方队，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进街。让公社领导干部带着家人、扛着猪肉游行，表示“带头交售农副产品”。以壮观瞻。这样高成本的大集组织了 11 次。其发明权人被指认为“‘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毛远新的代称）。

2000 年代的哈尔套镇，总面积 160 平方公里，辖 16 个行政村，2.7 万人口，耕地面积 7.6 万亩；距大郑铁路 40 公里，距沈阳桃仙机场 167 公里，距锦阜高速公路 75 公里，距锦州港 208 公里，京哈光缆从镇内通过，有 6.6 万千伏安变电站。是国家小城镇经济综合开发试点镇，有集农、牧、工为一体化的综合性大市场，是全国闻名的农副产品（包括粮油薯类、新鲜蔬菜、蛋品、烟麻类、木器家具、日用杂货等）集散地。该地绿色蔬菜基地已有蔬菜生产面积 5000 亩，双层日光温室育苗基地 3500 平方米，塑料暖棚 1000 栋，冷棚 2000 栋，年产绿色无公害蔬菜 5000 万公斤，各种新、细、特、反蔬菜远销东北各省。计划新增绿色无公害蔬菜生产面积 5000 亩，总面积达到 1 万亩，年产绿色无公害蔬菜超 1 亿公斤，供应全国市场。

（参考资料：新华社记者《社会主义大集好——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改造农村集市的调查》，《人民日报》1976 年 5 月 9 日；辽宁省供销合作社《肃清‘哈尔套经验’的流毒——揭批‘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炮制‘哈尔套大集’的滔天罪行》，《人民日报》1977. 10. 12；“哈尔套镇政务网”《历史沿革》）

## 工业学大庆

大庆[注 1]是毛泽东亲手树起的中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经他提倡，工业学大庆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其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对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影响至深、至广。

1960—1963 年，松辽盆地探明含油面积达 800 多平方公里、地质储量达 22.6 亿吨的大油田。到 1963 年底，大庆开发建设 146 平方公里油田，建成年产原油生产能力 600 多万吨，当年生产原油 450 万吨，对实现中国石油基本自给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大庆石油会战国家投资 7.1 亿多元，却生产原油 1155 万吨，相当于同一时期全国原油总产量的 58%，上缴国家利润和折旧费 11.6 亿元，投资回收率为 149%。全员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1960 年为人均 4886 元，到 1963 年提高到 16265 元。

随着大庆油田开发，中国原油产量和储量逐年增加。1962 年与 1957 年相比，原油产量增长 3 倍多，天然气产量增长 13 倍多；石油储量增长近 20 倍，天然气储量增长约 60 倍；原油加工量增长 2 倍多，主要油品产量和产品品种增加约 2 倍；基本建设投资省、速度快、质量好、效果大。在三年饥谨的国家经济最紧张时期，中国石油工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63 年 12 月 25 日，新华社发布大庆石油会战成功消息，第二天中国所有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同一通稿：《从国外进口“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返》。

1964年1月25日,《人民日报》以一版头条通栏刊出毛泽东号召:“工业学大庆”。毛泽东的号召,极大地振奋了中国士气,高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促进了各行各业比、学、赶、帮、超运动的深入开展。

大庆精神被概括为:一、把毛泽东思想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大庆人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靠“两论起家”,[注2]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技术干部搞不清油田情况,遇到科技难题,就深入实际,大搞调查研究,狠抓第一手材料,反复实践,勇于创造。生产管理千头万绪、问题繁多,他们通过分析矛盾去抓住主要矛盾,狠抓岗位责任制,把生产具体工作落实到人的身上,建立正常生产秩序。二、自始至终地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大庆油田任务重、时间紧,人力、物力、财力不足,集中领导、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成功的主要经验。大庆人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鬼、不信邪,住“干打垒”土房子,用人拉肩扛加滚杠搬运、安装大吨位钻机。同时他们在生产建设中创造的种种奇迹还靠了严格科学态度,进行技术攻关,创造了许多科学、简单、经济、安全的办法,比国外通常采用的技术方法节省很多物资和资金。做到了多快好省。三、认真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培养“三老”、“四严”、“四个一样”[注3]的良好作风。四、大搞技术练兵;大搞增产节约;充分发扬政治、生产技术和经济民主;领导干部亲临生产前线;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年轻干部,等等。

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报道了大庆人吃大苦、耐大劳,为让祖国抛掉贫油帽子而忘我拼搏的事迹。一大批文化艺术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陆续来到大庆,深入生活进行创作,讴歌中国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创造性劳动。电影《大庆战歌》、话剧《初升的太阳》、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以及后来创作的电影《创业》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作。随着中共中央文件的传达和新闻工具、文艺作品的广泛宣传,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广泛开展,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工人的精神。到处以大庆为榜样,开展比学赶帮、实行增产节约;像大庆人那样吃大苦、耐大劳,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学习大庆人、争当五好职工,掀起生产建设高潮……各地取得很大成绩,涌现出学大庆的先进单位和先进典型,产生了一些大庆式企业。如当时上海市学大庆见行动,全市三分之一企业和车间干部一半时间搞管理,一半时间参加生产劳动。

据称,文革中极左政策的激进推行者为了打倒党政、业务干部,把矛头对准大庆,诬蔑它是“唯生产力论”典型,把大庆基本经验统统攻击为“修正主义”,把“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生产工人岗位责任制》说成套在工人脖子上的精神枷锁,要“火烧一切制度、彻底解放工人”。他们甚至鼓吹“不搞科研照样出油”,造成油田生产管理上的混乱。1967年,周恩来在关于大庆军管的文件亲自加上“大庆油田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并说明这是按毛主席指示办的。1970年,周恩来在《关于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的报告》上指示:要保护好大庆油田,要加速解放大庆的干部。1971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业学大庆》。社论说,学大庆,就要像大庆那样,坚持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革新和勤俭建国的原则,全面体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多快好省的要求。油田基层干部白天挨批斗,晚上回去抓生产,老工人把



行李搬到油井上，一连几月黑夜白天连轴转，坚持采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大庆油田仍然大幅度提高原油产量，1976年原油产量达5030万吨，对国民经济在动乱中得以维持起到重要作用。

1980年代当人们回顾历史时，终于冷静认识到学大庆运动存在的问题。如，在组织生产建设时强调革命精神多，强调科学态度少，片面强调革命加拚命。在时间紧、任务重时，要求职工“死打硬拚”，搞突击，拚设备，拚体力，加班加点，搞连轴转；在制订计划、安排工作时，片面夸大主观能动作用，满打满算，超越客观可能性。在资金、运输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贪大求全，好大喜功，不量力而行；在油田开发和基本建设上，违背客观规律，不按正常程序办事，造成比例失调，市政建设、职工生活方面欠账很多。在油田开发上，搞边勘探、边开发、边生产，特别是基本建设搞边设计、边施工、边投产，造成地面工程不完善。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一些钻机超负荷打井，超越实际生产能力采油。有时讲生产指标多，考虑安全方面措施少，曾发生不少事故。在企业管理方面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科学、不正规、不严格的问题；在领导工作中，搞形式主义，走过场，不讲实效，动不动就搞“人海战术”、“零点起步”、“大会战套小会战”，满足于出工人数、会战次数，不讲工作效率。不愿作细致的科学分析，习惯于搞打擂比武，调门唱得很高，不管实际上做到做不到。

随着19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改变了依靠群众运动推动经济建设的做法，中共中央不再推广工业学大庆运动，学大庆的口号也不再继续宣传了。从1964年以来持续了十几年的工业学大庆运动至此落幕。

[注1]1959年9月6日，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李四光的地质理论指导下，于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发现工业性油流。时值国庆10周年，该油田因此命名为“大庆”。

[注2]有考证指出，此说源于余秋里1964年1月与毛泽东一次关于大庆的奏对，余临时拍脑袋抖机灵，想出了“两论起家”的妙对拍毛马屁。

[注3]“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夜和白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

(参考资料：《工业学大庆运动》，“龙虎网” 2001-06-22 <http://njdj.longhoo.net/dj80/ca17523.htm>；宋连生《工业学大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一天等于二十年

主谓结构短语。形容历史变革和政治、经济建设形势发展的迅疾、彻底、神奇(参见“一万年”、“只争朝夕”词条)。带着一种不容分说的豪迈感和喜悦感。1958年大跃进时使用最频繁。但这种时间观仍然作为积极的精神财富被后来的激进运动所继承。成为政治上正确的论据之一。

源于马克思对时间、对历史发展逻辑的辩证理解：“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根据列宁的经典阐释，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

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

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范围和幅度，被夸大了失真的程度。大跃进时有句话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脱离实际的放卫星，劳民伤财的政治秀，被当作革命的促进派，受到褒扬、提拔。杨秀珍企图用存在与思维没有同一性的哲学命题，来限制、矫正唯意志论的妄想、破坏性，也被钉上政治的耻辱柱。

在文革中，它被用来描绘美丽新世界的神奇、变革形势的紧迫，以煽情的修辞诱使人们在憧憬的晕眩中产生越轨冲动，在对速度的失重体验中产生欣快感，并为超出常识的反常规策略辩护——迅疾的速度自有迅疾变革的特殊秩序：大字报的冲撞扫荡、激烈无序，是彻底揭露政治阴暗面，开创一个新世界的需要；越过按部就班的程序，冲破旧有党政管理秩序，是为了通过大乱达到大治；时间效率必须建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基础上，才能大幅度提高人们的觉悟，塑造一代新人。为了这样的变化，所有的暂时代价都可以付出，伤痛可以忍受，所有循规蹈矩的稳妥都可以被打破。

当时这样的表述带有启示录式的神谕色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了反革命爬行主义的总破产。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跃进的时代已经展现在中国人民眼前。”“我们正处在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革的伟大时代，正处在国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前奋进，共产主义精神蓬勃发展的伟大时代。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形势变化之急速，是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所不能比拟的。”

由于党掌握了真理、规律，所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部署都是改变命运的时刻。对这样的部署，只能令行禁止，雷厉风行，步调一致，是人民利益和历史前进车轮的必然要求。所有试图阻挡、否认这样的计划、行动的人和主张，都只能遭到尖锐的批判、苛严的整肃。它的反面形象是小脚女人、爬行主义、穿新鞋走老路，等等。

（参考资料：列宁《卡尔·马克思》，改造世界观——再论向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战士蔡永祥同志学习》，《人民日报》1966年11月19日）

## 阿尔巴尼亚

名词，国名。阿尔巴尼亚(Albania)的中文译名。号称“山鹰之国”，鹰被认为是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象征。国旗旗地为深红色，中央绘有一只黑色的双头鹰。

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西岸。北接南斯拉夫，东北与马其顿相连，东南邻希腊，西濒亚得里亚海和伊奥尼亚海，隔奥特朗托海峡与意大利相望。面积2.87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472公里。山地和丘陵占全国面积的3/4，西部沿海为平原。属亚热带地中海型气候。首都地拉那(Tirana)。人口210万(1970年代)[注]。是多民族国家：主要民族有阿尔巴尼亚族(98%)、希腊族、马其顿族和黑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族等。通用阿尔巴尼亚语。信奉伊斯兰教(70%)、希腊东正教(20%)和罗马天主教(1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被意、德法西斯占领(1943年德国法西斯侵入)。

1944年11月29日，阿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夺取政权。1946年1月11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49年11月23日，阿中两国建交。

文革中，中国外交处于孤立，与其友好的，主要是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圈子里中国被习称为“老大哥”。

当时的中国地理教科书介绍，阿处在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包围之中。并宣传说，阿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铁托集团进行着不屈的斗争。人民大规模开垦耕地，兴修水利，耕地面积比解放前扩大一半以上。解放后，兴建了各种工厂，并修建了通往港口都拉斯的铁路。阿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任何单位、个人不能违背，拒绝给企业以任何自主权和活动余地。当许多国家开始反思、改革苏联高度集中经济体制时，阿仍将其作为真正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标本，坚持其纯正性。是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霍查说：“即使没有面包，我们阿尔巴尼亚人也不违背原则。”被毛泽东称为“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据说出于王力草拟）。

中阿两国往来频繁：中国阶级教育经典之一复制泥塑《收租院》被送往阿尔巴尼亚展出。阿国防部“游击队体育俱乐部”男子篮球队曾到访沪访问。最流行的阿尔巴尼亚歌曲是《地拉那一—北京》。中国给阿国的各种无偿援助，仅1972年这一年就达阿国民人均5000元人民币。

阿电影是文革期间屈指可数的能够引进国内的欧洲电影（另一个是罗马尼亚）。虽然它依照的是西方文化情境下的拍片传统，在中国当时获得了“阿尔巴尼亚电影没头没脑”的调侃评价。在引进的阿尔巴尼亚的影片中，又以反法西斯影片居多。如《地下游击队》、《第八个是铜像》、《宁死不屈》、《海岸风雷》、《山鹰之歌》、《战斗的早晨》、《广阔的地平线》，均以游击队的地下斗争为主，体现了欧洲沦陷地区反法西斯斗争的一种典型的方式，与同期中国抗战影片中游击队袭敌风格颇有相近之处。而这类影片在中国被解读的过程，多多少少地也折射出那个文化枯竭年代的人们误读。像《宁死不屈》中女主角米拉以不同于当时国内影坛上铁姑娘的柔中带刚的风格，受到近乎今日追星族般的追捧。而影片中的爱情故事，也成为慰藉那个年代人们心灵饥渴的潺潺泉水。

1971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来华，中美两国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霍查签署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对中国调整对美国政策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中国决定“突然”，指责没有同阿尔巴尼亚“预先磋商”。认为中国的作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中阿间出现了重大政治分歧。1974年进而指责当时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变种”，是“反马列主义的”。阿对中国发展同罗马尼亚的往来，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和邀请铁托访华，也表示极其不满。

1974年阿提出了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期间对中国的经援要求，共约值50亿人民币。中国认为过去对阿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援助的数量过大，不仅中国力不从心，也不利于阿自力更生地发展国民经济；并认为阿方已有一定经济基础和自力更生能力，决定减少援助。阿方代表团表示“无法理解”，说在美帝苏修对阿封锁和侵略、国内阶级敌人颠覆破坏时刻，中国减少援助，使阿处于极为严重局面。阿国内刷出了红色大标语：阿尔巴尼亚人民绝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阿尔巴尼亚绝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放下自己的旗帜。

中阿关系在各方面降温，阿当年就降低出席中国国庆及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规

格。在阿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霍查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国。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在外交领域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摆脱中阿关系畸形状态。并在内部传达中解释了这一步骤的正当性。两国关系更加疏远、隔膜。

1980年代随着霍查一代谢幕，阿开始了缓慢的改革。自1990年代初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提出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计划。1991年4月通过宪法修正案，改国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自1983年起两国逐渐恢复交往，2000年中国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发展正常。

[注] 1998年的数据为340万。

(参考资料：《世界地图册》，地图出版社1972年版；《阿尔巴尼亚概况》，“新华网” 韵珊主编《80年代的苏联东欧》，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dbz《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如何决裂的》)

## 陈少敏

(1902—1977) 原名孙肇修，字惠敏，曾化名劳方。寿光市孙家集镇范于村人。女。政治活动家。

1915年在青岛日商纱厂做工，后到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1923年加入了邓恩铭等人组织的秘密工会，因参加罢工被厂方开除。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派返回青岛领导工人运动；其间坐过监狱，忍受过丧夫亡女之痛。后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妇女部长、唐山市委宣传部长、冀鲁豫特委副书记、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洛阳特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鄂中区委书记兼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政委、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五师副政委、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长。

抗战初期护送徐特立返湘时曾假扮夫人。在边区人称“女将军”，中原地区传诵有“陈大姐，种白菜，又肥又大人人爱”的歌谣。鄂豫边区生产的“女将军”牌香烟，烟盒画面便是以她跃马举枪形象为主体。毛泽东曾称她“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

1949年后，历任任中国纺织工会主席、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发现和培养了郝建秀等女工典型。曾力促劳保条例的制订、公布，指责“浮夸风”是“卖狗皮膏药”。

1968年末参加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会上最后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议时，她伏在桌上用右手捂住左胸拒绝举手。虽然当时发表的全会公报虽宣布“一致通过”，历史事实却是缺了陈少敏一票。同乡康生会后质问她：“你为什么不能举手？”答复说：“这是我的权利！”对人曾有“不能犯软骨病”的诤言。据闻，对比她的拒绝举手，后来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深深自责。

此后她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文件停发，该参加的会议不给参加，就连“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园票也没有了。1969年竟致将她赶出北京送往河南罗山劳动。在那里她患病导致半身不遂，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才得以回北京治疗。1976年10月欣闻粉碎“四人帮”消息，曾希望能重新工作，却于1977年12月因病重逝世。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女革命家丛书”收有《陈少敏的故事》一册。

(参考资料:《陈少敏》,“维坊党史网”“人物辞典”;董保存《刘少奇被开除出党谁没举手赞成?》,载《北京青年报》,)

## 红旗渠

名词。它位于豫、晋、冀三省交汇处,是河北省林县[注 1]完成于 1960 年代的引漳入林水利工程。

它以浊漳河为源,在山西省境内的平顺县石城镇侯壁断下设坝截流,将漳河水引入林州。分为长达 140 华里的总干渠和 203 华里的干渠及 1896 华里的支渠配套工程,沿渠共建有“长藤结瓜”式一二类水库 48 座,塘堰 345 座,提灌站 45 个,共计兴利库容 6000 余万立方米。利用渠水自然落差,兴建小型水力发电站 45 座,已成为“引、蓄、提、灌、排、电”成龙配套的大型水利网络。

该工程的全部建成历时 10 年。凭借一锤、一钎和双手的原始施工条件,林县人民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奋战于太行山悬崖绝壁、险滩峡谷,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了 1250 座山头,架设 151 座渡槽,开凿 211 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 12408 座,挖砌土石达 2225 万立方米。建造了一条“人造天河”。

全县水浇地面由 1949 年前的不到 1 万亩扩大到 60 万亩,仅 1969 年的小麦产量就比 1968 年增加三成。改变了林县“水贵如油,十年九旱”的面貌。

剪彩的庆祝集会选在 1969 年中共九大召开以后的时机,被称为“在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坚持毛主席关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成果”。1970 年林县被批准为对外开放县,仅 1970 年代前来红旗渠参观的外国友人就达 11300 余人。一些访华的国家元首被安排去参观。在国际上曾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夸誉。

纪录影片《红旗渠》不但在国内广泛播映,还曾到朝鲜、锡兰、尼泊尔、刚果、索马里、芬兰、瑞典、坦桑尼亚、阿尔及尔、日本、瑞士等国播映。影片插曲《红旗渠水绕太行》被演奏家闵惠芬改编成二胡独奏曲。

1974 年在批判安东尼奥尼纪录片《中国》时举例说,他把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介绍给观众。但片中“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指责他说,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想发现一个农村‘天堂’,那就天真了”。

1976 年、1991 年、1992 年、1997、1998 年,河北省涉县合漳村与河南省林州市古城村多次发生争夺水源的大规模械斗。1992 年涉县白茆村民把红旗渠炸开 20 米长口子,林县盘阳村被淹没。1990 年代以来,渠岸长年经受风吹雨打,严重老化,渠岸渗漏普遍,塌方倒岸屡有发生,淤泥堵塞情况严重;水的利用系数下降。1999 年曾因漳河上游长期干旱,渠首引水在临省水电站以及沿渠村庄消耗殆尽,而出现断流。

在有关部门帮助规划、协调下,红旗渠得到维修并继续发挥效益;漳河上游管理局统一管理,拆除两岸沿河违章拦水工程,运用水权、水市场理论,通过山西省境内水库有偿调水,配给两地,大规模冲突趋于缓解。2004 年已开工兴建设计库容可达 3248 万立方米的马家岩水库,正常年份可向红旗渠补充水源 4540 万立方米,向城镇供水 900 万立方米,以有效缓解水资源不足的矛盾。

到 2004 年，红旗渠总引水量 85 亿立方米，灌溉面积 8000 万亩次，粮食增产 15.9 亿公斤，发电 4.7 亿千瓦时，共创效益 17 亿元，相当于总投入的 23 倍。[注 2]林州人民亲切地称红旗渠为“生命渠”、“幸福渠”。

1996 年红旗渠被定为中国 100 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2004 年“红旗渠精神展”在北京、天津、广州、西安等地巡回展出，激起强烈反响。一部运用交响乐、声乐、舞蹈、诗词吟诵、舞台影视背投等多种艺术手法，全景式反映红旗渠精神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红旗渠颂》，已被确定为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文化艺术项目，同年郑州和北京演出，随后在全国多个城市巡演。北京旅游网推出“红旗渠太行大峡谷古都安阳三日游”。

[注 1]1990 年代已改县为市，称林州市。

[注 2]计算增产是多因（比如良种等）还是单因？创效益是否排除了物价指数？这些因素都会最终影响到评估的准确性。

（参考资料：新华社《林县人民十年艰苦奋斗 红旗渠工程已全部建成》，《人民日报》1969 年 7 月 9 日；王明浩《经典中国——红旗渠壮歌撼山岳》，《人民日报》2004 年 9 月 10 日；施平、白红义《红旗渠：终结“水战”》，《小康》，转自“新浪”2004 年 7 月 22 日；《红旗渠首次断流》，《北京青年报》1999 年 8 月 25 日）

## 胡传魁

人名，戏剧人物。京剧《沙家浜》里土匪出身的汪伪汉奸武装忠义救国军司令。被日本兵击溃逃亡时曾得以茶馆老板为业的中共地下党员阿庆嫂掩护救助。胡部驻扎沙家浜时，因参谋长刁德一怀疑阿庆嫂身份，百般追查，胡慨然出面打保票、担保她的清白（与新四军无涉）；反而被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率领的伤病员和大部队配合，借胡的婚礼将其一举成擒。

这是一个轻信、愚蠢而颇具喜剧色彩的反面人物。其性格基调可从他的唱词中看出：“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钩挂三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遇皇军追得我晕头转向，多亏了阿庆嫂，她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我才躲过了大难一场。——似这样救命之恩终身不忘，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偿。”阿庆嫂才认定了“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智斗》一场由于有了他的存在，才表面上笑语寒暄，不动干戈，而内里高度紧张，刀光剑影，暗含杀机，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在文革舞台的反派人物中，胡是一个性格特别的另类。那时人们常以此做诨名戏谑地称身材超胖、头脑简单颞颥的人为胡传魁（因为舞台上的胡是一个大胖子）。被称者亦无特别的抵触，不以为忤。

2000 年代有评论者认为，如果跳出阶级斗争为纲的认识框架来看，虽然胡传魁有罪，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背叛祖国确罪大恶极。尽管他的丑恶远远大于他知恩必报的这丝美德。但即使是汉奸，对他的美德也是不应当嘲笑的。因为知恩必报毕竟是人性中好的东西，毕竟是这种品格帮助新四军摆脱不利处境，赢得了胜利。

何况他的原型胡肇汉[注]曾一度控制着战略要地阳澄湖。日军和汉奸部队多次侵犯阳澄湖地区，但始终没有得到便宜。也加入过陈毅的新四军队伍中，任“江

抗”支队司令。

被列入“抗战电影中的八大汉奸”（样板戏《沙家浜》拍过电影）的第三号。但若论知名度、性格的复杂程度和塑造的成功，可能排在第一位，更合适。

[注] 胡肇汉，湖南人。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他所属国民党部队在常熟白茆一带溃退。原系班长，与十余名散兵游勇逃到吴县阳澄湖中心区太平桥落脚。为开肉店的保长阙延卿收容，雇做保护地方武装。他收集溃兵拉起队伍，购置枪支，自封“司令”。

1939年春，他与抗日组织“民抗”合作，后接受新四军“江抗”总指部整编。同年10月初“江抗”西撤，在国民党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收编，加入军统。以后，时与国民党“忠救”挂钩，时与汪伪“和平军”调情，反复无常，变为一股政治土匪。

1945后，他一度担任青浦县保安司令，长期担任国民党吴县阳澄区区长，盘踞阳澄湖前后达12年之久。其间，残杀我新四军伤病员，活埋进步青年和群众；鱼肉乡民，强占民妇，横行霸道；特别曾在蚰山、官泾、何家沿等几次集体屠杀渔民。

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胡逃到香港。后来被国民党在香港的敌特机关（一说为潜伏舟山的前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委任为“江苏省反共抗国军第二纵队司令官”。胡于是窜到舟山一带，潜入上海，积极发展反革命特务武装。在上海浦东一个布店胡的姘头家，被中共公安人员抓获。1951年春，胡在苏州伏法。

（参考资料：戴庆华《想起胡传魁》，“世纪中国”；晖《追捕杀人魔王“胡传魁”》，《文史春秋》2003年第12期，）

## 别有用心

副词。指称言论或行动中另有不可告人的企图。是一种基于道德和政治的严重指控。在事无不可（而且必须）对组织说的时代环境下，不可告人，就可以被引申为不正当的、不敢或不能公开的打算、计谋甚至阴谋。[注]虽然不可告人的现象，也常常由于极个人化的原因，如人际关系、情感、生理上的种种原因，但在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习惯于把所有事物纳入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范畴去认识。

这一说辞的作用，是从行为动机、人品、道德等非理性因素指控对方，一下子就把对手推上被告席。迅速而不由分说。“别有用心”本来也只是对可能性的一种提问，而非论定，但革命者的认识论逻辑可以有从现象直接跳跃到本质去的特权。在理性缺位的审判席上，使用“别有用心”说辞的人都不负举证的豁免权，虽然指控并不因此增加认知内容，却让被指控者担负洗刷自己的责任（即使举证也不会被采信），置人被动不利地位。

即使历史屡屡证明，这种道德热情的自我放大，取代了客观的事实追问，无助于真相的澄清，有利于政治运动和整肃扩大化的推波助澜，经不起理性和时间的审判。人们还是热中于走认识的捷径，热中于立竿见影的战绩斩获。

这一罪名，适用于大小走资派，篡夺群众组织领导权、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子女，对立派别，学有所长者，偶有无意过失者，与指控者

有个人嫌隙的人……被指控的一切人。谈生产不谈革命，是别有用心；谈学术不谈阶级斗争、是非立场，是别有用心；谈提高生活质量不谈艰苦奋斗，是别有用心；提存在的缺点问题不提伟大成就，是别有用心；说反右也反左，是别有用心；鼓吹油画不提倡版画，是别有用心；探索格律体不唱民歌调，是别有用心；说太阳被乌云遮住了，是别有用心……

当人们用阶级斗争观念审视一切时，处于主导、革命、正义、指控地位的群体一方就成了道德的化身，就是真理在手，就可以口含“天宪”，无论说什么都预先就是对的，就能够“赢者通吃”。如果对他们意欲否定的群体一方，就可以上纲上线；反正对待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打棍子，戴帽子，否定一切，无所不用其极，都是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敌对一方即使是在什么具体问题上是对的（如没有打人骂人），也“对”得“别有用心”。而属于主导、革命、正义、指控的群体一方，因为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就自然要肯定一切，即使是错的，也“错”得很有理由很有原因。

紧跟“别有用心”认定的，是揭老底、揭盖子，“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的批斗，抄家，内查外调，无休止地勒令检讨、认罪，强迫劳动，生理、心理的双重折磨。是典型的语言暴力。

后文革论者，认为别有用心的话语-认知方式，是对汉语和健康思维的毒化、污染。不仅理智上否定，而且情感上排斥。

[注]据“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材料，该词在文革的浮现率年均3.198，是其他年份年均浮现率1.79%的178.66%。

(参考资料：经洪琪《“分配决定论”的反动本质》，《人民日报》1967年9月14日；吴味《艺术批评的规范——从王南溟与皮道坚、刘子建的水墨争论谈起》，“中国艺苑网”；陈文胜《中国三农学界的五种倾向》，“三农中国”；李贵仁《反思文革与“别有用心”》，)

## 赵纪彬

(1905—1982)，河南省内黄县六村乡千口村人，原名济焱，字象离。笔名向林冰、纪玄冰。中国哲学史学家、教授，中共早期活动家。

1922年旁听过北京大学哲学系课程（亦有称“肄业”于北大的）。1923年就读于大名七师。1925年在校刊《曙光》上发表《与人论孔学书》。1926年加入中共，1927年建立中共大名特别支部。从事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先后任中共濮阳县委宣传部长、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华北高教联组织部长、华北九省民众抗日代表大会秘书长。

1934年脱党[注1]后专心从事学术研究。1937年以通俗读物编刊社研究部主任身份为掩护作国统区文化工作，1938年出版《通俗读物论文集》。《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持激进大众化、民歌化观点，对维护新诗传统者进行了尖锐批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梳理、解说中国哲学史，成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上的异端思想家进行了深入独到的研究。1939年著有《模写论中的感觉与思维问题》，得到毛泽东首肯。先后任中国文化服务社青年文库主编和复旦大学、东北大学、东吴大学教授。

1949年后，曾担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平原省政府



委员、政协副主席、平原师范学院院长、开封师院院长河南省文委副主任、河南省历史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学部委员、中央高级党校哲学研究室教授等。

文革中曾因早年“入狱”、“脱党”问题，被中央高级党校造反派打成“叛徒”，停止组织生活三年。但因为《论语新探》却又被“控制使用”，1974年任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顾问和御用写作班子唐晓文顾问。多次晋见江青，并得到她一套《四书评》的馈赠。曾说：“儒法斗争这条线索的明朗化，使得中国思想史上学派、体系、范畴，都要重新加以研究”。“法家思想，不可能从地主阶级中来”，“只能来自人民，或反映人民的要求”。“法家的进步性与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社会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为当时儒法斗争史的框架设计，提供了重要基础。唐晓文最有代表性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柳下跖痛骂孔老二》都与他的著作、观点有关。[注2]

文革后被要求说清楚。在批判唐晓文的时文里，受矫枉过正思想方法影响，被称为“唐晓文背后的那个‘教授’”，指控他“向江青上书效忠”，是“历史和政治上都有严重问题的人”、“反动学术骗子”。

1978年《论语新探》被美国学者莫斯·罗伯茨（Moss Roberts）译为英文在美出版；1981年日译本在日出版。1979年以74岁高龄开始研究方法论史中的权学史问题。1980年据胡耀邦指示恢复二级教授待遇。受其拖累，《中国思想通史》在台湾刊出影印本后才得以重印。

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纲要》、《中国行知学说简史》、《中国思想通史》（与侯外庐、杜国庠等合著）、《古代儒家哲学批判》、《先秦逻辑史论稿》、《论语新探》、《困知录》、《中国权学史略》等16部。遗著由妻子李慎仪[注3]、儿子赵明因整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开始陆续出版《赵纪彬文集》三卷。《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等1949年后著作未收入《文集》。

[注1]1950年重新加入中共。

[注2]李希凡辩护说他“曾受上命骂过‘孔子杀少正卯’的文章，完全是学术性的论证文字”。作为郎舅至亲为亲、为尊者讳，可以理解。但过于轻描淡写了。

[注3]文艺评论家、红学家李希凡之姊。

（参考资料：《赵纪彬》，中原“河南文化网”2005-01-24 <http://www.hawh.cn/Template/article/display99.jsp?mid=20050124024152>；傅孙《评唐晓文的三篇代表作》，《人民日报》1978.01.20；《人民教育》编辑部、《历史研究》编辑部《“四人帮”尊法丑剧的幕前幕后》，《人民日报》1978.06.05；李希凡《迟到的悼念（下）——记我所知道的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及哲学家赵纪彬》）

##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文献名。1966年6月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夺权的第二天，就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注]。传达了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该文由陈伯达授意、口述、拟订标题并最终审定。版面处理上，在头版头条使用了通栏大标题和从未用过的大五号字，以期造成强劲的视觉冲击。

社论高调指出：“我国解放16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

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没有外敌入侵、政变发生的情况下惊世骇俗地论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解放 16 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地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社论号召：“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在突出政治形势敌我誓不两立严重性、制造恐怖气氛的基础上，并用煽动性语言说：“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的，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暗示可以冲破历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秩序和条条框框。

为了麻痹处在一线的党政系统执政者，安抚、缓解他们可能的抵制，社论有意使用了一个模糊概念“牛鬼蛇神”。把中国传统神怪形象政治化了：似乎特指专家、教授，对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广大老百姓来说，他们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存在，触动他们一下、刹刹他们的威风，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这是利用了庸众潜伏在缺乏参与和自卑里的仇恨、阴暗、残忍心理。这一口号进一步发展到“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

到后来，随着中央高层斗争的公开化才逐步明朗。周恩来企图避免全面震荡而对此作的限制性界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因为牛鬼蛇神的外延不确指，使得千百万无辜者惨遭荼毒，有的挨批斗，有的被非法关押，有的被扫地出门，甚至丧失生命。

社论标题是一个简洁、直接面向行动的祈使句。“横扫”既富于动感、气势，又意味着扫荡、扫除的干净、彻底，手段的强硬、暴烈。它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打倒所谓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使他们威风扫地。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口号之一，也是推动“文革”进一步开展的催化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的错误提出，对文革初期的混乱和破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以此为标志，正式揭开了文革序幕。并以极大的势能和加速度，不可逆转地呼啸向前。

1976 年后，成为文革批斗、抄家、凌辱人权、打倒一切的主张和行为的代名词，受到一致声讨。2000 年代有人以此调侃地形容、描写行动者的气势。

[注]据“人民日报’ 49—97 数据库”提供的材料，这一提法初见于 1963 年。应该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共有的思维-修辞方式。1966 年该词浮现率为 83.56%。

(参考资料：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报》1966 年 6 月 1 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红旗》杂志 1966 年第 8 期；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 1993 年版)

## 二部制

学校把学生分成两部（上、下午）轮流在校上课的教学组织形式。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在大城市中，由于校舍、教师和适龄学生人数之间的紧张关系，一些中小学校只能实行二部制。中共中央1963年关于中小学教育的一个指示，认为二部制学校所占比重太大，对整个教育事业不利，要求逐步减少这种学校所占比重。方法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调整城市机关、团体、企业和部队的房屋给学校使用，并增建新校舍。指示说，二部制学校和全日制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应有所区别。重视对学生课余活动的指导，要设置辅导员，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复习功课，开展有益身心的各种活动。

1969年秋“复课闹革命”时，中学连续三年没有招生，小学没有停招，因而形成1950年代生育高峰带来的大量滞留小学生（二三倍于文革前）涌入中学的局面。学校规模急剧膨胀，师资严重不足，校舍容量更成问题，教学用具缺乏，实验教学难以保证。原全日制中小学普遍采取二部制形式，以保证学生能上半天课，就成了应急的办法。此举对社会秩序失控情况下，防止学生失学游荡，起了积极作用。

学生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修缮教室、校舍，能在附近找到调剂房的学校还要办分校。从小学教师中选拔调用，招收下乡知青中的高中生，并抽调行政人员充实教学第一线，解决师资紧张难题。仍然无法安排的小学毕业生就只能在原校办戴帽班。教材是以《毛泽东选集》甲、乙种本和毛主席诗词为基本内容，并辅之以实际应用为宗旨、删除大量基础知识的暂编简易教材。安排大量的学工、学农劳动、军事训练，和参观阶级教育展览、吃忆苦饭等社会性活动。

学生在校时间短，空闲的半天就组织校外学习小组。这些小组按家庭居住远近编组，在学生家庭或宿舍大院里活动。高年级辅导低年级同学学习，并请老工人、职工家属当辅导员。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做作业以外，还不断地选学有针对性的毛泽东语录，开斗私批修讲用会，开展访贫问苦、拥军优属等活动。组织宣传队，自学、自唱、自舞，不但自娱，而且经常去工厂、农村、街头宣传演出。参加街道对敌批斗会，帮助监督坏人（被定性为黑五类等社会贱民）。提倡把学校、社会、家庭联系起来办学的方法。北京香厂路小学是二部制学校的典型，他们的经验得到肯定和反复报道。

1972年以后逐渐恢复正常，按全日制教学计划行课。只有少数城市和校舍、师资紧张的偏远农村县区仍沿用这种方式。

2000年代大学迅猛扩招时，有人提出二部制设想：一部1、3、5三个学期上课，学制四年；另一部2、4两个学期上课，学制六年。可以挖掘现有教学资源，提高办学效益。因被认为违背高教规律，受到强烈质疑，而未被采用。

（参考资料：《中共中央关于讨论试行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和对当前中小学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33831/33836/34143/34235/2550570.html>；新华社《北京香厂路小学发挥街道革命居民的作用 认真开展校外教育》，《人民日报》1969.01.20；《十年“文革”时期的内江二中》，“四川省内江市第二中学”<http://www.njez.com.cn/list.asp?unid=233>；《“大学二部制”构想》，《集美校报》2002-05-01，转自“集美大学网”）

## 三个世界

毛泽东关于世界力量划分的一个框架：称霸的美苏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注 1]是他 1974 年 2 月 22 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来的。同年 4 月 10 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第一次正式向世界阐明了毛泽东这一新的战略观点。被中共意识形态话语概括为“三个世界”的理论。

此前的 1950 年代已有“第三世界”的提法，其中就蕴涵着“三个世界”的划分。“第三世界”是从法国“第三等级”一词演绎而来的。《大英百科全书》第 9 卷说：它在 1950-1960 年代泛指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国家或非工业化国家。这一概念与二战后前殖民地国家的非殖民化运动紧密相联。

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欧文·路易斯·霍罗维茨的《三种发展阶段的世界》(1966)认为：“第一世界”指美国统治的世界，包括其西欧盟国以及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的“卫星国”。“第二世界”指苏联统治的世界，包括其东欧和亚洲部分盟国和“卫星国”。“第三世界”是指在亚、非、拉地区不结盟的非“卫星国”，通常包括经济上从阿尔及利亚到南斯拉夫，政体上从印度到中国等各式各样的国家。这个“第三世界”概念，与兴起于 1960 年代、国际上试图从美苏争雄的格局中独立出来的不结盟运动有关。

“三个世界”理论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国际斗争的应用。与他 1946 年 8 月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的“中间地带”观点有关。毛针对美国散布的反苏战争流言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毛的观点必然推出一一为了反对最主要的敌人美国，不仅要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且对包括英、法等国在内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

邓小平的联大发言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请毛泽东审阅定稿的。超越意识形态，把社会制度不同而同时谋求世界霸权的美苏划成第一世界，又加以区别对待；就是为了联合其他力量（第二、第三世界）反对之。类似先秦纵横战略家里的纵策，从边缘反轴心化。是要借力打力，利用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弱势中国的变化，以对付强烈威胁着自己的美苏两国，突破对华包围圈。以进攻谋防御。是“三个世界”理论的基本立意。

“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它将突破意识形态的桎梏，不受社会制度的限制，以务实、灵活的姿态开展多边外交。中国不但从利益和主张上天然接近第三世界，[注 2]而且把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是自己的国际义务。中东石油生产国以石油为武器，对抗石油垄断资本的剥削和控制，震撼西方世界的经济，引发了战后最严重的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显示了他们的力量。由于中国是第三世界中唯一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三个世界”反霸蓝图就有以这一阵营代言人自居的默示。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实力更加增强，对美国经常有大量顺差，美的补偿、反制要求使它们之间的矛盾在升温。中国力图在发达国家与美苏两国之间打进楔子，使之分化，鼓励第二世界更多主张、争取自己的利益，削弱、牵制美苏。对日放弃战争赔偿，与日建交就是这一战略构想下的产物。

据说，这一理论是“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了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而得出的结论”。其基本特点是，从当代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力量分野的实际出发，抓住了国际现象中的主要矛盾。它既是国际反霸策略，也为国内继续

革命理论提供了支持。

[注 1]是两个世界——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穷国/富国、资本主义国家/非资本主义国家、宗主国/殖民地——两分模式的一个变形亚种。

[注 2]在 1971 年第 26 届联大会议上，主要是得力于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和支持，以压倒多数票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

(参考资料：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04.11；《三个世界的划分》，“龙虎网”01-06-22<http://njdj.longhoo.net/dj80/ca17519.htm>；《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1995 年 7 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 《李白与杜甫》

文献名。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1 年出版，279 页。定价 2.30 元。1971 年初印，1972 年、1977 年重印。棕色封面，精装，塑料套封，大 32 开 890 × 1240mm（当时的书籍多正 32 开本 787 × 1092mm），字体也大。[注 1]文革文化凋敝时罕见的学术著作，至少是以学术为题材的著作。写作于 1968 年—1970 年，是他写作时间最长的书之一。为郭氏 1949 年以来唯一一部专著。

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文件——驳苏联政府 1969 年 6 月 13 日声明》的文件，采用了郭氏此书中关于李白出生于碎叶[注 2]的考证材料。

开卷是 3 条毛语录，要求以阶级斗争观念分析一切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清理古代文化”。

全书的基本观点是“以今天的标准”来扬李抑杜。涉及杜甫的 6 章标题都带贬义：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终身嗜酒。否定杜甫为“人民诗人”，一反作者自己 1953 年为杜甫草堂题词“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的评价。

在该书中，杜诗“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句，成了其大地主成分的证据，因为一般百姓屋上只有一重茅，而他则有三重茅。“贫穷的孩子”（贫下中农子弟）拾走吹落的茅草，他竟斥责为“盗贼”，可见其“站在地主阶级立场”。要荫庇的是天下“寒士”——封建士人（臭知识分子）。为了证明杜甫的地主生活，以诗为证列举的证据更多：如从杜诗“奉乞桃栽一百根”，分析出“桃树发育快，布局宽，一百棵桃树的栽种，估计要五亩地左右。草堂的园子可就够大了。”依照同样考证逻辑，把虚词概数坐实，“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有竹一顷舍，乔木上参天”，“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被一一断定为杜家账簿上财产。

同为写月，李诗：“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杜诗：“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郭就能分析出两者的动机目的大不相同。书中写道：“李白是要为‘寒者’（请注意，不是‘寒士’）添柴烧，想上天去扳折月中桂；杜甫是在思家流泪，……杜甫在这首诗里面，完全沉没在个人的感情里，和李白的‘动机目的’显然形成了为己为人的对立。”

连《三吏》、《三别》也是“廉价的同情”，“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其中描绘的人民形象，“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过滤器所筛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

统治阶级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总之，杜甫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都遵循着地主生活方式。”

此书出版后，因机械使用阶级分析法，主观随意扬李抑杜，迎合儒法斗争说需要，被普遍视为文人缺乏气节典型。文革后，文学史家萧涤非（1979年）最先对郭著提出质疑，以为他用颠倒源流、苛求古人、脱离历史背景、抹杀诗歌艺术特点、死扣字面、深文周纳等方法曲解杜诗，“不实事求是”，“抑扬随意，借比较之名，行打击之实”，“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王学泰（1980年）也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极左路线深入到各个角落，流风所及，贤如郭老也难于避免。”萧、王还从技术细节上指正郭解杜诗的种种误读、硬伤。甚至偏爱郭氏的传记传记作者也只得承认，“有意迎合毛主席的一些观点，书中过于扬李抑杜，有些认识明显地与他过去的看法是相左的”。成为一时公论。

2000年代以来，郭女郭平英等人之为之辩护说，是巧合而非迎合。周国平、邵燕祥等进而认为是郭的“觉醒和总结”。更有认为该书打破了因袭的见解，感叹李白与杜甫这两位伟大诗人，都没有突破中国文人以政绩事功确立人生价值的传统，对此表示了感同身受的同情。并蕴涵了郭氏以对昔人的所忆、所思、所憾来排遣今人心中无限哀恸与愤激的情愫。

[注1] 亦有平装本，江苏新华印刷厂1972年5月江苏第一次印刷。书号10019.1866，定价：0.56元。

[注2] 中亚细亚的碎叶，在今哈萨克境内的托克马克。另有“蜀中说”以为是绵州昌明县青莲乡或江油；条支说以为是在今阿富汗中都一带（昔之鹤悉那，今之加兹尼，在唐代时属安西大都护府管辖），焉耆碎叶说以为是即今新疆境内博思腾湖畔的焉耆自治县和库车一带；长安说。

（参考资料：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筱敏《旧书记：〈李白与杜甫〉》，《作家杂志》1999年，转自“人民书城”<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17/6/class001700004/hwz37759.htm>；萧涤非《关于〈李白与杜甫〉》，《文史哲》1979年第3期；王学泰《对〈李白与杜甫〉的一些异议》，《读书》1980年第3期；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李妍《“我将振笔作大书”——与郭沫若故居纪念馆馆长郭平英谈郭沫若》，《中国艺术报》403期2004-10-9[http://www.cflac.org.cn/chinaartnews/2004-10/09/content\\_2995202.htm](http://www.cflac.org.cn/chinaartnews/2004-10/09/content_2995202.htm)；邵燕祥《〈李白与杜甫〉传达了晚年郭沫若怎样的心灵信息》，转自<http://aaaa.bokee.com/3539911.html>）

### “晚、稀、少”

中国19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1971年，由周恩来布置，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规定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提出制定人口规划，改变了此前计划生育无计划的状态（尤其是1960年代基本处于放任态势）。1973年12月，中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提倡实行“晚、稀、少”政策。“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

是指只生两个孩子。1974年毛泽东提出“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指示，控制愈加严厉。

此后在各地的执行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随之发觉这样力度仍不够大，于是又调整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但一般是把两个孩子作为控制目标。并且规定，对于只生一胎、不生二胎的育龄夫妇，发放独生子女补贴，作为鼓励；对于生第二胎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给予罚款。还规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职工福利、劳动保险、城市住房分配、农村宅基地、自留地以及社员口粮分配等有关政策，都向计划生育倾斜。

与此同时，在宣传上强调“人口增长要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有利于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增进民族繁荣”。并把“男尊女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旧思想、旧观念，与刘少奇、林彪的罪恶联系起来批判，要求树立“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新思想。因单位控制开具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所需介绍信的年龄底线，有效推动了晚婚的实现。并大力提倡避孕、发展绝育技术，广泛实施人工流产术。

这一政策提法，后来又改进为“晚、晚、少、优”，即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增加了优生优育的内容。其中心都是降低妇女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

据报道，先进单位的计划生育达标率都在90%以上。由于这一政策的实行，1970年的总和生育率是5.8，到1980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24，接近世代更替水平；抑制了人口增长率，少生了7000万。人口老年比初步达到4.7%以上（1980年），尚属平稳。此一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为后来改革开放的经济崛起准备了助推器。

但由于已有巨大的人口基数，医疗卫生等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同期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死亡率（包括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急剧下降，寿命显著延长，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1980年的68岁，人口总数仍然从1970年的8.5亿发展到1980年的10亿。严峻的人口形势，为1980年代强制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伏下了隐患。

（参考资料：新华社《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速度 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讨论争取明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措施》，《人民日报》1979.01.27；何亚福《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对话——中国人口政策的回顾与展望》；中山水寒《中国人口问题的由来——中国人口问题是因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吗？》）

## 谭甫仁疑案

（1910-1970）广东省仁化县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十二军连政委、六八七团政委、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组织科长、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长、一一五师教导七旅政委、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野七纵副政委。1949年后历任十五兵团军政委、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昆明军区政治委员、云南省革委会主任。1955年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

员。

1964年把一军一师一团一营六连（原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八团六连），树立为国防部正式批准授予的“硬骨头六连”，成为全军榜样。

1970年12月18日凌晨4时50分左右，与夫人王里岩在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解放新村32号院同被昆明军区前保卫部副科长王自正（副团级）枪杀。身中六弹。当日中午12时许不治身亡。被立为“017案件”，周恩来、汪东兴曾先后预闻此案。197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他“于12月18日在昆明不幸逝世”。措辞含糊，引起普遍猜测。昆明全城戒严多日，捕人无数。

负责组织侦破此案的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在巨大压力下，用尼龙网兜悬挂床头栏杆自缢身亡。31日据目击者提供情况，追查到王自正。因为谭到云南搞的“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将两派群众组织之一派明确定义为错误路线而广为整肃。[注1]他说：“（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王自正在此风潮中因被举报涉嫌以反革命报复枪杀原籍内黄县武拐村武委会主任武某，也是被整肃者之一。

经谭预闻，被监视居住于距离解放新村仅一两千米的西坝、昆明军区原战俘管理所；已陷绝望。由于王熟悉谭及住宅情况（包括活动规律、房屋结构，甚至主房、副房的布置等），知道军区保卫部保存枪械的保密室没有明锁，只要掌握密码，就可以开柜取枪。而王兼过多年枪械保管员，密码稔熟于心。且王被隔离数月后防范已疏。遂走上报复杀人道路。败露后拒捕逃跑无望而举枪自戕。

1971年“9·13”以后传说，谭是林彪线上的人。林密命谭将飞经昆明上空的飞机击落——谭党事涉蹊跷，遂试将飞机迫降，不料飞机里走出的竟是将要访越、访缅的周恩来。[注2]林为了灭口，遂派人将谭秘杀。与李天佑、谢富治、李震、皮定均之死，被好事者并列为中共“将军遇刺”疑案。

2000年代在他家乡韶关市怀仁县，每逢清明节仍组织中小学生为其扫墓，每逢“五四”青年节组织新团员到其墓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内容。2001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陈德仁著《名将谭甫仁》。不见于1999年版《辞海》（有“皮定均”条）。

[注1]谭到昆明履新引起訾议的另二个举措是：“围海造田”，将滇池水域围填三万亩以大办农业“以粮为纲”；“修‘万岁馆’”，将刚落成不久的工人文化宫一夜之内夷为平地，以敬建“毛主席万岁展览馆”。

[注2]1980年代更流行于中国报端。考，周恩来1970年并未到越、缅两国访问。

（参考资料：《开国上将：谭甫仁》，“千龙网”2002年7月28日 [http://mil.fjii.com/2002-07-28/lajldsm\\_532.htm](http://mil.fjii.com/2002-07-28/lajldsm_532.htm)；周致仁《谭甫仁017凶案》，《炎黄春秋》2005年第2期；刘庆荣《解谜：中将谭甫仁被枪杀案》）

## 红学

以曹雪芹小说《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起自清朝道光年间[注1]，但作为全社会普及的显学却是在文化萧条、学术凋敝的文革时期（1970年代）。



1954年历来喜爱《红楼梦》的毛泽东[注2]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的《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由此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成了这场运动造就的学术新星。文革兴起时，红学家们几乎人人挨批，个个被斗，于是有人绝口不提《红楼》，销声匿迹，改旗易帜；也有人昧起良心，顺应潮流说假话。那时的红学只见政治不见人性，开口阶级闭口革命，开口批判闭口封建。《红楼梦》变成了阶级斗争的活教材。

1973年10月毛在一次会议上说：《红楼梦》是思想和艺术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说，提议干部要多读几遍，并批评了认为《红楼梦》主要是写爱情的肤浅看法，明确指出《红楼梦》是写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谈情是为了打掩护。建国以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还不多。以此为契机，引发了一场红学热。当年出版了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冯其庸以“洪广思”署名在《北京日报》发表《〈红楼梦〉，是一部写阶级斗争的书》，次年又以小册子《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评〈红楼梦〉》形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评红”成为1974年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主题之一。是年，文化部组织人重新校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继1972年出版竖排本后，又出版了横排本。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报刊就发表有关文章319篇。梁效、方岩梁（罗思鼎另一笔名）、江天（初澜另一笔名）等御用写作班子，借评红反复把玩“封建末世的孔老二”、“反革命两面派的暴露”、“批判资产阶级不停”等影射红学。《文物》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周汝昌《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吴恩裕《曹雪芹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后有陈毓罴、刘世德、胡文彬、周雷等人响应、参与讨论。一些考证虽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政治语境，多偏于作者有同情底层贫民的思想和社会性内容，但仍大量涉及官制、文字、物价、诗风、天气等具体问题，具有当时条件下有限的学术性。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1949年以降第二代红学家。据说群众性评红热中还出现了不少业余红学家、“工农兵红学家”。[注3]

但整体上看，由于毛泽东个人的阅读意见和国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政策、意识形态取代了学术，从《红楼梦》中只看到不同阶级、地位人物间的冲突和斗争，将它当做一部通俗历史教科书来读。借助强大舆论宣传工具的造势，政治理论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阐释成了唯一的真理。“几十条人命”，“四大家族的罪恶”，“父系母系的政权斗争”等种种曹雪芹所未写、高鹗所未补的故事，以最时髦、热门的态势占据了当年红学。红学热不仅没有促进它的良性发展，反而构成了对它的严重干扰，造成了它的畸形、变态，制造出知识生产的负价值。以致周汝昌曾沉痛地说选择红学是一个悲剧。

为了配合“工农兵评红”，重印或新版了一批原来只有少数学者才能看到的孤本秘籍。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但出了三辑收有红学史上主要论著的《红楼梦参考资料》，还单本翻印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和《红楼梦研究》“供研究工作者参考、批判之用”。书坊还流行署名“编写组”的《红楼梦》诗词注释（一种哈尔滨师院，一种南京师院）。

承其余绪，1980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了国际《红楼梦》研讨会。1980年代连续召开了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参与者都在130人以上；成立了中国红楼梦研究会，并在辽宁、江苏、上海、贵州、黑龙江等省市成立了分会；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红楼梦研究所，出版《红楼梦学刊》（季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红楼梦研究集刊》。红学已经成为一个专门职业，围绕着传统的研究和后来兴

起的影视、传媒、旅游等新行业，更形成一个活人无数、蔚为壮观的产业，为GDP增长作出了新贡献。

[注1]清代道光年间松江士人朱昌鼎只喜小说，对《红楼梦》特别着迷。有朋友问他：“你为什么不研究经学？”朱答：“我也研究经学，不过我研究的经学，比别人的少一画三折（繁体红字）。”语含讽刺。红学孕育于脂砚斋、王伯沆等人评点，发端于清末民初王国维、蔡元培著述，成立于胡适《红楼梦考证》，倡大于俞平伯、顾颉刚等的后继。

[注2]毛平生读过10次以上《红楼梦》。1949年后搜集有20种《红楼梦》不同版本。见于文字记载的，毛曾不少于13次对人谈论《红楼梦》，与谈者有亲属（妻子贺子珍、儿子毛岸英、女儿李敏）、领导干部（徐海东、谭启龙、许世友）、作家（茅盾、张恨水、柯仲平）等。并有《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的名言。以毛体草书留下不少《红楼梦》诗词手迹。

[注3]20世纪先后介入红学的学者有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吴宓、容庚、姜亮夫、唐长孺、郑振铎、阿英、李长之、郭绍虞、刘大杰、何其芳、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陈觉玄、李玄伯、韩国磐、傅衣凌、启功、程千帆、周绍良、邓云乡、徐恭时、邓允建、王朝闻、王利器、郑朝宗、舒芜、李希凡、冯其庸、刘梦溪等；海外周策纵、潘重规、徐复观、牟宗三、夏志清、李辰冬、赵冈、余英时、柳存仁、方豪、陈庆浩、李洁华等。作家有鲁迅、胡风、沈从文、林语堂、巴金、茅盾、冰心、张天翼、吴组缃、周立波、端木蕻良、张爱玲、杨绛、管桦、徐迟、白先勇、高阳、王蒙、刘心武等。政治及社会活动家有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季新、王昆仑、毛泽东、郭沫若等。其中对红学社会影响最大、推广最力的是毛泽东。

（参考资料：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单世联《红楼漫卷世纪风——胡适、毛泽东与‘红楼梦’，兼论红学何成为显学》，“中华读书网”；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红线

原意是比喻贯穿、统帅文章、著作、作品或运动、事业等始终的正确思想。不同于城市建筑工程图纸划分建筑用地、道路用地界线或比喻月老（中国民间传说中司婚姻的神灵和媒人的俗称）撮合男女姻缘缘分的红线。

1960年代以降被引申为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详该条）的夸饰性修辞代称。中共一切成就都要归功于这一红线的指引、指导。表面看是崇拜语言，隐蔽的内在功能却是对政治合法性的裁断。1966年10月开始被赋予与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黑线）相对的含义；重点是始乎推动、终于宣告刘邓中央一线政治上失败的政治宣判。既涵盖思想、政治路线，也含有组织路线的意味。两条路线斗争史的观念操作推演和“路线斗争大事记”之类工具，是对其进行梳理、表达的一种形式。

在当时阶级斗争的战斗意识形态概念范畴里，什么东西一旦与路线挂上钩，就是根本性、全局性问题，政治上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红线被认为是代表了人民根本利益的，是毛泽东思想和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组

织的系统主张，是中共合法性、亲和力、力量、胜利、成就的来源和保证。不但已经被证明，而且还将被证明——所以它的时效预期是永恒的。锋芒所指，望风披靡。“彻底批判和清算十七年来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面前的一个战斗任务。”所以该词的政治攻击性（里）远远超过了渲染崇拜的修辞夸饰性（表）。以后又被用来作为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帜、根据。这一含义是文革及其思想影响延续期特有的。〔注〕

1971年的周恩来不得不沿用这一说法对抗“教育黑线专政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而且有些时候还是有力的。”“对教师队伍和十七年教育出来的学生要有个正确的评价。”回避黑线有无或抹淡黑线问题，以躲闪腾挪维持日常基本运转。甚至文革后，正面否定毛泽东错误认识、做法以前，还只能借用他的名义纠偏：“17年是红线，是共产党领导嘛，怎么能说是黑线呢！”（邓小平语）肯定红线的前提下，用共产党模糊两条路线的分界，仍然回避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黑线）问题，来为推翻“两个估计”辩护。

2000年代引申出不可超越警戒底线的含义：“四川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文明确定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出书‘红线’和‘绿线’。”“开发商：越界和利润间别‘踩那条红线’”。

〔注〕据“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材料，该词1966—1977年的年均浮现率是2.61%，为平常年景的1.44倍。该词浮现率的背离度似不大，但词义尤其是它的修辞表达、政治功能和对社会的影响与常态词义却判然有别。

（参考资料：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人民日报》1966.07.01；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人民日报》1967.04.08；李刚《毛泽东和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转自“丫丫家庭网”<http://bbs.61.fm/t/2-1557742.htm>）

## 杨水才

（1925—1966）生于河南省许昌县桂村乡水道杨村，农民。被称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基层党员干部的杰出代表”。

1949年参军，立大功一次，小功两次，获得“人民功臣”称号。1951年退伍后回家乡，1956年加入中共，并先后任水道杨村党支部副书记、桂村农业中学（现为许昌县职业中专）校长（1963年）等职。他调查研究，制订“建设水道杨村计划”；带领群众挖塘治水，打井治岗，实现了水浇高岗地，使粮食增产；植树造林，发展经济林木；组织烧砖制瓦，增加经济收入；勤俭建校，办学育人。彻底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先后荣获许昌地区劳动模范、河南省林业模范等多项荣誉，被武汉军区誉为复员军人的旗帜。1966年12月5日终因患肺结核、胃溃疡、肾结石，积劳成疾，病情恶化，不治病故。

1969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南日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联合采写的长篇通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为人民鞠躬尽瘁》的评论员文章。通讯以“与阶级敌人斗争毫不留情 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英雄发誓画新图 挖塘治岗破难关”、“‘小车不倒只管推’战天斗地志如钢”、“捍卫毛主席的教育路线 为贫下中农培养可靠接班人”、“‘老三篇’铸造红心 为人

民鞠躬尽瘁”四部分，描写、概括了他的一生。淡化、过滤掉了发展副业生产的内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阐释说：“‘小车不倒只管推’，就是一心为公，一切为公，‘完全’、‘彻底’为人民。‘小车不倒只管推’，就是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小车不倒只管推’，就是为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此“小车不倒只管推”，作为共产党人精神的标榜、象征，成了杨水才品牌口号，深入人心。金训华日记生前写道：“我向杨水才同志学习，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立志农村，献身农村。”（1969年7月18日）

1969年水道杨村建起杨水才光辉事迹展览馆。河南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署名“创作组”、根据《杨水才光辉事迹展览》编绘连环画《共产主义战士杨水才》。48开（185×85），120页。为当时稀少的大开本连环画。从封面、内页、语言、绘图等各方面都有很浓文革味（正文前印有多条《毛主席语录》）。“卡通之窗”“寻宝堂”有该书的10品藏本上架，叫价260元。

由于当时的报道、推广有阶级斗争与“农业学大寨”的历史背景，文革后没人再提起他。据报道，2000年代水道杨村家家买了拖拉机靠跑运输实现致富；小四轮换成大卡车。此时从传统中挖掘稀有思想资源的需要促使人们重新打捞记忆。许昌市、县从党员教育经费中拨款5万元、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及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捐资81.27万元，全部工程投资约150万元，在原展览馆旧址上翻新修复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660平方米的杨水才纪念馆。命名为许昌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党员干部教育基地。组织到馆吊唁、参观、学习者不绝，以作为“三个代表”、“先进性”的活教材。许昌市委组织部通过许昌信息港主页开设“杨水才纪念馆”网页。

2005年，曾自编、自导、自演、自拍《鬼子进村》的许昌县兴源铺村农民赵兰卿等人，声称准备拍摄影片《杨水才》。

（参考资料：张德胜、刘宪《“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永远不能丢——河南许昌县人大常委会监督办理杨水才纪念馆议案纪实》，河南《人大建设》；《农民DV发烧友情定“杨水才”》，原载《东方今报》，转自2005年07月26日“星辰在线”[http://dv.csonline.com.cn/gz/t20050726\\_358130.htm](http://dv.csonline.com.cn/gz/t20050726_358130.htm)）

## 户县农民画

户县农民画是被中共官方意识形态利用并高度政治化的民间绘画。

户县[注1]民俗绘画源于民间，与当地戏剧、舞蹈、民间社火、竹马、旱船、龙灯等丰富的民间文化形式有深厚渊源，富于明显地域特色，民间风情强烈，乡土气息浓郁。所画内容多取材于人物、动物、花鸟等题材，勾画出户县美丽的自然田园风光；采用白描形式，构图简洁而饱满，想象大胆丰富；注重色彩对比，以大红大紫的色彩，夸张化的描述，追求强烈的直观效果，讲究装饰性；风格浪漫稚拙，怪诞抽象，浑厚质朴，气韵生动。粗犷里蕴涵细腻，浓艳而不失淡雅，古拙中流露天工。以剪纸、绘画、刺绣、编织等传统艺术和工艺技术传世，历史悠久。

把民间绘画定名为农民画，是借作者的阶级身份赋予其作品样式以政治属性。使绘画成为一种工具。它起步于1958年“壁画化”、“诗画墙”等配合“大跃进”的文化艺术活动，以诗配画、漫画形式表现满怀赶超激情的政治运动。1960

年代以写实、半写实、单线平涂的形式，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忆“三史”、讲“三史”、举办“三史”活动，忆苦思甜，编绘阶级教育的“三史”图画，出现了一些像《一件血衣》、《四代人的命运》那样较好的连环画；同时热情歌颂战天斗地、耕耘、丰收的社会主义生活。1970年代农民画靠近了专业绘画，其形式为年画、版画、国画，反映革命、斗争的时代精神，始终自觉做政治附庸，“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紧密联系三大革命斗争实际，围绕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开展活动”。

专业农民画辅导员的辅导能力、辅导水平以及自身的责任感、奉献精神，对农民画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因农民画作者艺术判断能力较弱，一幅作品的最终实现，有极大的盲目性，他们不知道好在哪里，差在哪里。辅导员则会告诉他们如何判断，如何达到尽善尽美。1958年，西安美院协助办农民美术训练班，使全县美术骨干发展到30余人。1960年代，一批回乡学生的加入农民画队伍，创作队伍扩大到50人，提高了文化素质。1972年冬到1973年夏天抽调全县60余名作者，集中在县城创作。丁济堂、刘群汉等一批辅导员成了幕后英雄。

代表作品是1974年4月10日中国邮政发行《户县农民画》邮票（志号：T3）选中的6幅：《老书记》（刘志德）、《高原打井》（李克民）、《春锄》（李凤兰）、《科学种田》（马振龙）、《林茂粮丰》（周文德）、《金山银海》（李顺孝）。《老书记》刻画了一位坚持学习、坚持参加生产劳动的好书记亲切自然的形象。《高原打井》的画面隐约露出一小片蓝天，绿色夸张描绘小潭刚刚冒出的水，占据图案大部的则为厚厚的沙土层，用于挖井的脚手架在画面中极为醒目，充分反映了中国西北用水之难和人们战胜困境的顽强精神。《春锄》则是一首男女社员在绿色的田野上锄去禾间杂草的抒情诗。

1973年7月由国务院文化组主办了“户县农民画展览”，组织50余名作者的170余幅作品，在西安、上海等国内八大城市展出后，10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后又陆续在哈尔滨、合肥、南宁、昆明、乌鲁木齐、太原等八大城市展出，观众达250余万人。中央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争相为户县农民画出版大型画集和单页年画。新华社报道点明了这一空前盛况的内涵：户县农民画“以鲜明的主题，纯朴的感情和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生动地反映了户县人民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斗争生活，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表达了他们决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的豪情壮志和革命理想。它们令人信服地说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劳动人民正在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直接创造者。”为文革的文化粉饰、圆场。

1974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斥巨资再次拍摄了专题片《户县农民绘新天》。1974年-1977年，国务院文化部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专题组织了户县农民画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瑞典、法国、挪威、丹麦等国展览，农民画家李凤兰[注2]等六人代表户县出国访问。1976年政府投资200多万元，建成了全国第一座县级农民画展览馆（面积7388平方米）。更加锦上添花。

1980年代，改革开放使农民画摆脱政治窠臼，回归本真，走上了现代民间艺术的发展道路，却又成为市场化的产业。1988年被国家文化部正式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乡”。为了迎合行情，向国画、油画甚至西方抽象派的画风上靠拢，大批量“作坊化”的“流水线”生产，民间绘画失去了农村的生存土壤及表现风格。应用丝网印刷技术大量复制较好作品，使画价猛跌，经济效益剧减，农民画创作队伍或弃画经商，或进城打工，农民画繁荣与变异、滑坡、萎缩并存。

令识者深以为忧。

到 2000 年代,户县农民画作者队伍已发展到 2100 多人,骨干作者 200 多人,农民画专业户 30 多家。共创作作品 3 万余件,其中 1200 余件在国内获奖,600 余件被国家和地方美术馆收藏,18700 余件被国外博物馆和外国收藏家珍藏。数千件在美、英、德、法、日等 68 个国家和地区展出。28 位农民画家先后 35 次出国访问、讲学、办展和表演。

[注 1] 位于陕西省会西安市西南 38 公里。总面积 1255 平方公里,总人口 56.3 万人。地处关中平原腹地,东接长安,西临周至,南依秦岭,北濒渭水;山川秀美,物产丰富。素有“西安后花园”、“银户县”、“文化县”美誉。

[注 2] 曾任四、五届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参考资料:新华社《坚持“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十月一日在京开幕》,《人民日报》1973.09.30;《农民画历程》,“中国轻工网”《革命的闯将 文艺的主人》,《美术资料》1974 年第 5 期,转自“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美术文献”杨小玲、李向红《户县农民画敢问路在何方》,《陕西日报》2005 年 4 月 15 日)

## 雷锋

(1940—1962) 生于湖南望城县贫农家庭。中国当代军人知名度最高的普通战士。

7 岁沦为孤儿。1949 年以后在当地政府的照顾下,他被送入学校读书。1956 年在乡人民政府当通讯员,随即调到望城县委当公务员,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956 年加入共青团。曾参加洧水工程、团山湖农场和鞍钢建设。1960 年,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编入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抚顺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成立时,他把自己积蓄的 100 元捐献给公社。当得知辽阳地区遭受特大水灾时,又将 100 元寄给辽阳市委。担任驻地附近小学少先队辅导员。两年多时间里,荣立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2 次,受嘉奖多次,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节约标兵”,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2 年 8 月 15 日,他执行运输任务时因意外事故殉职。

1963 年 1 月国防部批准授予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四班光荣称号“雷锋班”,2 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团中央分别发出通知,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

在学雷锋的通知里,雷锋精神被概括为阶级立场坚定,忠于党和毛主席的革命精神;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为人民服务精神;艰苦朴素,毫不利己,专门为人民的共产主义的高尚品德;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自己的好学上进的精神。

3 月先后发表了中共领袖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周恩来),“全军同志都应当学习雷锋同志的榜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

洪源作词、生茂作曲的《学习雷锋好榜样》[注]成为 1960 年代最流行、播

放率最高的群众歌曲之一。

在学毛著和全国学解放军的双重热潮中，学雷锋活动被推向颠峰。他成为一个巨大的象征符号，满足了1966年文革发动前强调毛泽东个人权威和解放军特殊地位的双重政治需要。成为文革的前期造势预热、必备精神元素之一。在强调革命造反的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雷锋的宣传力度曾一度有所减弱。“雷锋叔叔不在了”，曾被用作1975年邓小平进行整顿的论据之一。

但由于他身上凝聚了普世价值的某些内容，和中共意识形态数使年如一日的宣传灌输，他已经超出雷锋个体生命存在和一度戴在他头上“毛主席的好战士”帽子，而成为中国当代的道德偶像。

[注]四段歌词道出学雷锋运动的真谛：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学习雷锋好榜样，艰苦朴素永不忘，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全心全意为人民，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学习雷锋好榜样，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保卫祖国握紧枪，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参考资料：新华社《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团中央分别发出通知 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人民日报》1963.02.16；新华社《“中国青年”出版学习雷锋专辑 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题词和诗文同时发表》，《人民日报》1963.03.05)

##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简称“二简字”、“二简表”、“二简”。这是1949年以后第二批简化字[注1]。它的公布、试行虽在1976年10月以后，但指导思想、做法都是文革惯性使然。引发了广泛批评。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及各省、市、自治区一级报纸发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注2]《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第一表收简化字248个，第二表收简化字605个。

12月21日《人民日报》开始试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第一表的简化字。次年3月2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学校试用简化字的通知》。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解释》说，原则上，“广大群众对汉字进行的简化，充分显示了群众的创造精神和丰富的智慧。从事汉字简化工作，就是要总结群众创造简化字的规律，应用群众简化汉字的方法，在广泛搜集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的基础上，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注3]采用的主要是“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推荐的群众中流行的新简化字材料”、“群众来信中提供的新简化字材料”、“1972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向各省、市、自治区征集的新简化字材料”。简化的具体方法为：主要选用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简化汉字形体(590个原字平均笔画为13.1画，462个简化字平均笔画为6.9画，简化字比原字笔画减少近一半)的同时精简了汉字的数量；淘汰了一部分容易读错和写错的字；使一部分汉字的偏旁和笔画结构变成了常用字；减少了一部分汉字的偏旁。

如，“龄”简为“令”，“帮”简为“邦”，“副”、“傅”、“腐”简为“付”，“街”简为“于”，“停”简为“汀”，“舞”简为“午”，“部”简为“卩”；偏旁“豸”被“犴”合并，“彳”被“讠”合并。

1978年7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停止试用这批简化字。公开解释是《草案》是“试用”,“试用并不等于正式推行”,“现在,《草案》已进入修订阶段,大规模的试用可以告一段落,所以在报刊上就停止试用了。”1986年9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从现在起停止使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强调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

胡愈之、王力、周有光等23位批评者先后说,直观地看,这些简化字缺胳膊少腿难看至极。专家指出,“二简”方案放弃了原来取得成功的以“简化偏旁”和“可作简化偏旁的简化字”为简化的主要方式,而是缺乏规律地甚至是大量地简化字形;一些字只在个别行业或某个地区使用,普遍性不强。有的为简而简,是人为新造的,缺乏约定俗成基础,所以难以推行。一些稀奇古怪的字流行于大字报,文字简化受到了造反派的压力。而且方案拟订和公布过程十分仓促,事先既未召开文字改革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也未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不像“一简”方案那样慎重地事先广泛征求意见,专家反复讨论、征求意见并修订。被批评为“这种做法既缺乏群众基础,又很不成熟”,发表以后造成严重用字混乱现象。并上升到“破坏汉字结构”、“破坏中国文化”的高度。

这一过失,甚至还被与当时主政者华国锋错误联系起来。

1985年12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通知》。似乎含蓄透露出工作重心由激进改革向日常规范、继承传统方向转化的信息。

1986年10月10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新发表1964年编印、后经调整的《简化字总表》,全表共收2235字。1988年1月26日国家文工委、教委联合发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在3500个常用字中有简化字1116个,占31.9%。

日本(1946)、新加坡(1969)、马来西亚(1981)、韩国(1983)、泰国(1983)先后对汉字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简化。日(131个)韩(90个)简化比较审慎,新、马、泰与中国方案一致。

[注1]现代史上的汉字简化工作,始于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1935年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但不久就遭到反对;1936年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正式下达“简体字应暂缓推行”训令。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以及《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开始正式推行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文改委编印了《简化字总表》。

这次改革虽仍有不少问题,但人们多持肯定意见:1.它把2235个汉字从平均16.03个笔画减省到10.3个笔画,学习和书写都方便了许多;2.消除了一批异体字;3.构造更为合理,比如“償”容易读成“shǎng”,简化为“偿”就不会误读了;4.结构上更为美观,字形之间差异更为突出。在扫盲试验中,简化字扫盲的效率比繁体字扫盲的效率高出20%左右。[注2]1966年,《文字改革》杂志、上海《汉语拼音小报》停刊,《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专刊停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被迫停止工作,至1972年才开始恢复工作。据称,郭沫若主持了这次简化工作。

[注3]试与与郭沫若《怎样看待群众中新流行的简化字?》(《红旗》杂志1972年第4期)比较,似为一脉相承:



以上的一些工作(汉字简化)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的,其所以收到一些成效,主要是由于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采取了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民间对汉字纷纷简化,这正表明汉字必须简化,也正表明文字必须改革。这是时代潮流,不应禁止,也不能禁止。从事文改工作的人,应该经常注意民间的简化汉字,吸取其可取者而随时加以推广。国务院所颁布的简化汉字,是应该随时增加的。

……要之,简化汉字也只是过渡时期的产物。中国如果毅然决然“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创造条件,努力走拼音化方向!

(参考资料: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解释》,《人民日报》1978.01.31;新华社《国务院发出通知 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使用简化字以“简化字总表”为准,“总表”将重行发表》,《人民日报》1986.09.28;小茵辑《中国语言文字大事记(2005-1-6)》,“四川社会科学在线”<http://www.sss.net.cn/ReadNews.asp?NewsID=1020&BigClassID=22&SmallClassID=66&SpecialID=0&belong=ts>)

## 周扒皮

军队作家高玉宝[注1]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中“半夜鸡叫”章节里的恶霸地主。

他为了延长雇工的工作时间,半夜三更起来钻进鸡窝学鸡叫引得窝里的公鸡也跟着叫,让长工超时劳动(雇佣契约上明文规定:鸡叫就得起床干活劳动)。长工们忍无可忍,设计以抓偷鸡贼为名教训了他一顿,把他腿打折了。故事以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为主旨,入选小学语文课本,还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成动画片《半夜鸡叫》(1964年出品,导演尤磊,美术设计谢洪宾,1980年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二等奖)。在反复炒作后被抬进“经典”殿堂。于是周扒皮成为1949年以后中共阶级教育运动里有名的反派男主角。

文革时期,在反复进行的全民性忆苦思甜、阶级教育中,与南霸天(《红色娘子军》)、穆仁智(《白毛女》)齐名而三,成为恶霸地主、万恶旧社会的代名词,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和无产阶级专政合法性的铁证。由于原始素材来自自传,被认定有更高可信性。动画片里周扒皮恶狠狠的呵斥:“鸡都叫了,还不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成了儿童模仿、嬉戏的台词。姓周的同学却不幸沦为受挤兑、挨打骂、出气的对象。

近年有人提出质疑:1. 头遍鸡叫大约三更[注2]刚过(二遍约四更;三遍后天就亮了),如果此时叫醒长工,实在没有必要学鸡叫。2. 长工也要休息好才能干好活。周天天晚上那么折腾,白天还监工不?如果不监工就不担心长工们到庄稼地里怠工或睡大觉吗?3. 黑灯瞎火,把长工们轰到地里什么也干不了。4. 半夜把长工轰到地里锄草却又无法锄,只能白白浪费生产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源。把长工身体拖垮了,到抢种抢收时咋办?违背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5. 地主与长工之间是劳动力与货币交换关系,而非人身依附关系,长工有人身自由,不是奴隶,对雇主有选择权。雇主待人苛刻,长工们可走人(经济学上叫“用脚

投票”)，故此法不能长久维持。

结论是“‘半夜鸡叫’违背生活常识”。即使用阶级斗争观点看问题，作品也“曲解了地主与长工的关系”，“混淆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并因此称高玉宝为“骗子”（在军中有故事大王称号）。

据称，关东地主与长工的劳动报酬合同，多半是由合同约定若干垧的土地庄稼作为长工工钱。因雇工期间三餐吃地主，外地的则免费住在地主家，故此报酬是净工钱；一人当长工能够养一家子。地主与长工、与邻里关系都很好，斗地主的会议都难于开展。是否确实，待考。

2000年代，有人以调侃手法呼吁为周扒皮平反，甚至评为“年度最佳雇主”，借以抨击大陆血汗工厂老板普遍安排超时加班、虐待员工、恶意欠薪、扣薪等行为。其论证为：周虽半夜鸡叫，但手法上还比较“文明”，奉行“非暴力”路线，没有拿着鞭子和棍子联合XX部门对付长工。说明他还是比较“文明”的剥削者、一位非暴力人士；同时半夜鸡叫也非常性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位长工由于“超负荷”疲劳工作而猝死田间地头工作岗位记录；最可贵的是他不欠工钱。短工按天算，长工按月结，概不拖欠。证明他还是诚实守信的东家，不会恶意欠薪。

[注 1] (1927— )军队作家。祖籍山东黄县，出生在辽宁省大连瓦房店市孙家屯。8岁时上过一个月学，9岁当童工，15岁当劳工，17岁学木匠。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文盲而通讯员，并成长为作家。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在军队诉苦以提高士兵觉悟运动中，他凭着顽强地拼搏精神和写作毅力，在大军南下行军作战的间隙，用画图画来代替文字记录、写作。1955年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其中《半夜鸡叫》、《我要读书》等章节编入小学课本。在国内有7种民族文字出版，仅国内就发行500多万册，此后又被译为二十多种语文。另有长篇小说《春艳》、《我是一个兵》、《高玉宝续集》等，并发表100多篇短篇小说。

[注 2]旧时以打更计时的方法：一个更次二个时辰。三更为夜里23点—1点，四更1点—3点，五更3点—5点。

(参考资料：李景田《听鸡叫想到》，《书屋》2000年第7期；《论周扒皮》，转自“天涯社区”；启翊《周扒皮也是年度最佳雇主》，原载《管理@人》，吕柏林《高玉宝，诈骗世界半个世纪的巨骗》)

## 学雷锋

围绕3月5日毛泽东学雷锋题词，[注 1]每年此时都要集中掀起一阵宣传热潮，各种纪念、集会、先进人物的表彰纷纷登场。“学雷锋活动”成为持续40年多之久的官方倡导的政治运动。“学雷锋”、“活雷锋”，在日常语言中成了好人好事的同义语。3月就成了每年一度的雷锋月。

雷锋专门记载学习毛著心得和所做好人好事的日记，被编辑[注 2]为《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先后曾印刷发行过数千万本。2000年代新版的《雷锋日记》增补了当年保存下来的雷锋诗文，也已经突破160万册的订数。2003年2月，人民武警出版社、华文出版社出版《雷锋全集》，全书共20余万字，由325篇雷锋日记、书眉笔记、诗歌、小说、散文、文章、讲话、书信、赠言组成，其中1/3文稿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比早已出版的《雷锋日记》多16万字。已经

成为学雷锋的经典教材。被选入小学生语文教科书，要求学生写读后感。并当成学写日记的模仿样板。并被选作钢笔字帖的内容。

以雷锋为题材的电影，先后有黑白故事片《雷锋》（描写雷锋的一天，八一电影制片厂1964年摄，编剧丁洪、陆柱国等，导演董兆琪，主演董金堂、杨贵发、党同义等）、彩色宽银幕故事片《雷锋之歌》（描写雷锋从平凡到伟大的一生，八一电影制片厂1978年摄，编剧王德英等，导演王少岩，主演李世玺、张卫、杜志军、王玉孝等）、故事片《离开雷锋的日子》（描写雷锋战友乔安山数十年如一日学雷锋的事迹，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1996年摄，编剧王兴东，导演雷献禾，主演刘佩琦、宋春丽等）、故事片《少年雷锋》（上海电影制片厂1997年摄，王琛、陈广生编剧，浩然、凤和导演）等。雷锋故事还被改编成民间艺术的各式评书和曲艺段子，反复演出。

发行量最大、最常见的雷锋照片招贴画，就是他坐在卡车驾驶室里学习《毛选》。因为照片里雷锋总是戴着军棉帽，所以这种样式帽子就被称作雷锋帽了。

1963年3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就组织编绘出版了连环画《雷锋》。这部连环画册除“文革”中一度停印，“文革”后又以60开再版，累计印数达到200万册以上。还有少数民族文字版本在少数民族地区出版发行。

40年来，中国各地建有4座雷锋纪念馆：位于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和平路东段61号的抚顺市雷锋纪念馆（1964年建）、位于雷锋故乡长沙市望城县的湖南雷锋纪念馆（1968年建）、位于北京丰台区的雷锋资料展览馆（1977年建）、位于雷锋生前所在团营区内的沈阳军区雷锋纪念馆（1991年建）。

从“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材料看，学雷锋的高潮先后分别出现在1963—1966年、1973年、1975—1983年、1990—1994年。雷锋成了一个标准，被用来衡量、定义具有他同样精神品质的人物，称作“雷锋式的××（战士、青年）”、“××年代的活雷锋”。学雷锋成了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还被与不同时期的运动联系在一起，以适应各种政治需要，如“斗私批修”（1967年）、“批修整风”（1973年）、“五讲四美三热爱”（1983年）。

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学雷锋，已经发展为一套组织缜密、功能完备的形式：从组织各种形式学雷锋小组，到制定学雷锋计划，重读雷锋日记、雷锋故事，写读书有感，“万朵鲜花送雷锋”；从参观学雷锋展览，安排扫大街、慰问老人等做好事的学雷锋活动，评选学雷锋先进个人、集体，到进行学雷锋总结。中国各地涌现出许多以雷锋的名字命名的雷锋班、雷锋小学、雷锋列车、雷锋储蓄所等各式集体、单位。各类、各级组织都把它当成一种经常性工作来抓，缺少从实际出发的真实动力，以致流于虚应故事，既缺少实效、不计成本，又频招物议。[注3]出现了学雷锋也要与时俱进的议论，并把它和志愿者活动合并以恢复活力的努力。

而作为一种补偿的反拨，2000年代前后，雷锋的苦难家史和先进事迹受到了来自多方的质疑。有人详尽排比雷锋日记、报道和他演讲的各种版本，进行细致校勘，发现他屡屡演绎、编造自己的“先进事迹”，使之不断完善，更加合理、深化、崇高，最终在合于时代的规范、想象方面达到尽善尽美。

从1960年代就开始流传美国西点军校学雷锋的消息，后来《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青网、《长江日报》、《北京晨报》、《中国民兵》都先后卷入其中。于是许多中国人去西点军校“寻找雷锋精神”。实际是介绍各国军事是该院校研究和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在对中国军事进行研究时提到雷锋。最后逼得西点军校不得不出面辟谣：“在本军事学院，没有雷锋的塑像或画像。雷锋语

录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虽然历史课和中文课也许会讨论雷锋，但军事学院并不赞赏他或其哲学。”（西点军校公共关系办公室克里斯蒂娜·安克拉姆的信）

2000年代商家甚至从学雷锋里开发出商机：17173.com 全球网络游戏门户第一站盛大网络策划并研发了《学雷锋》小游戏。网络上的雷锋材料，仍是人们关注热点之一。以“学雷锋”为关键词，2006年3月，百度一下，可找到相关网页约489,000篇；而google的简体中文网页中，约有95,700项符合学雷锋的查询结果。

[注1]有人从雷锋纪念日的确定质疑：纪念日既事主的诞辰，也非忌日（逝世周年），而是领袖题词发表的日子。可见其重点不在事主的人或精神本身，而在确立提倡者的权威。

[注2]编辑工作包括：核对雷锋日记引用最多的毛泽东语录和有关事实过程、人名、职务、单位、番号、地名、时间、数字。对日记摘抄的一些富有深刻寓意的精辟议论、名言警句等，进行删除。将日记中的部队番号，一律改成××部队；将不便透露姓名的人名，改成×××。还对部分语义重复、过时的话语、用词等，做了删节。

[注3]最有力的质疑来自一首广泛传播的民谣：“雷锋叔叔没门户，三月里来四月走”。

（参考资料：《雷锋是怎么被发现的》，载陶克、王跃生《雷锋现象》，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真伪难辨的雷锋苦难家史及先进事迹》，原载“燕南社区”<http://bbs.yannan.cn>，转自“猫眼看人”；长城《详细调查：美国西点军校究竟有没有学雷锋？》，转自“中华网”“军事论坛”；《雷锋主题电影：从〈少年雷锋〉到〈离开雷锋的日子〉》，“人民网”）

## 古巴糖

1960年代市面销售的、从古巴进口的白糖。时在1962—1969年间。是当时中国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环境中罕见的外国商品。据称，源自为了应付三年困难时期的供应紧张，苏联愿意提供的100万吨小麦、50万吨转口古巴糖，1964—1967年偿还，不计利息。毛表示只接受古巴糖，不要苏联小麦。亦称中国政府为了支持刚刚革命成功的古巴，[注1]以货易货换来的。

这种白糖外观上与常见白糖不同：颗粒粗大，似杂有黑色微粒，呈深黄色或茶蕉色，甜味中还约略夹杂着一些苦涩味。偶有潮乎乎的。也称黄砂糖。为了保险起见，人们食用前常把它蒸煮一遍。事实上，这种白糖在外观上的瑕疵，是因为少了漂白、清洁等多道工序，只能算半成品的原料糖（专用术语称“粗糖”即raw sugar）。必须经过再加工、精炼的精糖(refined sugar)才是成品糖。

当时市民们仍习惯用红糖，嫌古巴砂糖有异味；它勉强算供应匮乏时的一种替代品。是普遍食用白砂糖之前的一种过渡。开始时还限制供应，但实际并不十分好卖，后来索性就敞开供应，仍然不见畅销，连背街小巷的杂货店都有不少库存。有些单位又规定干部职工必须购买若干以示对政府的支持、爱国，但还是滞销。劣质水果糖被叫做古巴糖——不知是因原糖滞销后加工而成，以寻找销售出

路，还是本来与古巴糖无关，只因为看上去黄黑黄黑的就被误以为有关的。连旧日富豪也只能屈尊俯就，用它虚应故事，哄哄嘴巴。在长身体孩子懵懂眼里，它们更加是可爱的礼物；值得一点点细细品尝，以尽量延长品味时间。

吃古巴白糖被传染肝炎，成为一种流布极广的传言；因为据说在此以前中国没有乙肝。有说这是卡斯特罗人为把乙肝病菌加进白糖里的，也有说是美国人对古巴使用生化武器的结果。[注 2]这些说法均未得到权威消息来源证实。尽管是以讹传讹，但类似流言使古巴糖的销售更加雪上加霜。

2000 年代前后，中国每年进口白糖超过 100 万吨，其中就包括 40 万吨从古巴进口的政府间协议糖。只是此时的古巴糖不再偏黄黑色，也是白晶晶的，没有刺眼的外观标记了，所以人们感受不到。有人献疑说，肝炎的流行，似与 1950 年代末、1960 年代初的大饥饿有关。

[注 1]一说为了争取古巴在中苏论战中偏袒中方而向其示好结欢。以贸易谋外交，似更可信。

[注 2]质疑者提问说，病菌散播在白糖里，还能存活多久？是故疑为无据臆测。

(参考资料：啦啦啦《古巴白糖与伊拉克椰枣》，“风之旅”《说说“三年自然灾害”》，“华夏知青论坛”；《美国使用生化武器罪行累累》，原载《谁是无赖国家》，转自“铁血论坛”“军事回眸”《郑州白糖期货的还会大涨么》，通吃岛证券网 2006-01-20,)

## 大团结

对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第三套人民币[注 1]10 元面值纸币的俗称。是民间市井细民的口头语言，不见于正式场所、官方文件。查“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没有搜索结果。

因为纸币正面图案是工农兵、各族人民代表[注 2]走出人民大会堂（背面以红色牡丹和彩带，衬托天安门的雄伟场面），象征人民参政共议国是，当家作主，故称。图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这套人民币在市场上整流通了 38 年，是我国目前发行、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以人民币图案主体（部分）指代本体（人民币本身），为语言运用中一种委婉用法，是为了增加幽默感、表现力，或避免直接提到钱的不便、尴尬。

当时 10 元已经是人民币最大面值。被赋予了货币、财富的最高级别的附加含义。捏在手里、出手的感觉，都是劲劲的，格外地飒，气势高人一头。但社会生产停滞，物资供应匮乏，用钱的地方不多，总体生活水平低下。人们的物欲也基本处于准沉睡状态。兴奋点在别处——一波谰云诡、高潮迭起的政治冒险方面。

由于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采取“低工资高就业”、“低物价高补贴”、“低收入高福利”、“低消费高积累”分配政策，物价水平长期在低水平稳定。除了地区差异、饥谨时期以外，人们几乎就没有物价概念。[注 3]整个 1960、1970 年代，工资都没调整过。一个学徒工每月工资还拿不到两张大团结（18.50 元）。养家活口的二级工工资也就 36.50 元——所以常言（干活）“对得起那三张大团结就行了！”大学生的转正工资是 58 元。

全国物价最高的上海，1966 年 8 月大米均价为每斤 0.159 元。[注 4]小学生

开学报到交学杂费、书费，有二张 2 元的人民币足矣。因夫妇离异发生的子女抚养费，法院判决一般通行每月 5 元的标准，还不到一张大团结。[注 5]为了知青招工这样头等大事的行贿，送香烟、送手表都是低档次的，使用大团结开路，就是较高形式的了（流通性强、隐蔽性高）。送者底气足，受者满意度高，放行走人的概率大大增加。

1987 年 4 月 27 日开始陆续发行第四套人民币（1980 年版），出现 50 元和 100 元面值。其中 100 元券采用了中国老一辈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的侧面浮雕像。其后，物价改革频率明显加快，物价波动整体幅度增大，恩格尔系数下降，基尼系数达到或超过警戒线。金钱成为人们生活、焦虑的中心。

[注 1] 1962 年 4 月 20 日至 2000 年 7 月 1 日，共印刷发行了 7 种面额、13 种版别。这套已经退出使用的人民币集齐全套，市场价约 800 元左右。

[注 2] 少数民族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汉族统一穿着中山装。

[注 3] 中国大陆物价调整、通货膨胀是 19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现象。

[注 4] 当时中国的物价体系是以大米为基准定价。

[注 5] 当时一对夫妇基本是二个子女。5 元是月均生活费 10 元的一半。由供职单位直接从工资里扣除，支付给原配；以免迁延、扯皮。由于城乡差别，在外工作的子女供养老人，每月寄 5 元，就是特别孝顺的了。

（参考资料：《退出流通的人民币收藏价值高》2004 年 10 月 26 日《南方日报》，转自“新华网”；尘《风从何处来》，收入《对人世的告别·听楼梯笔记》，三联书店 1997 年版；李立元《“大团结”年前退役》，《北京青年报》1999 年 1 月 4 日）

## × × 派

指称因立场、观点或行为方式相同而接近，并结成组织、统一行动、互相呼应的一些人。文革初期从四清承袭而来的术语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它蕴涵着一种审视的假设、判断：社会阶级斗争形势已经极其尖锐，政权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需要一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动员基层群众的力量，冲破既有格局，以改变现存秩序。无视社会或族群的根本利益，把它的分裂作为统治手段、统治基础，引导力量对比向有利于自己方向转化、组合，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小概率事件。[注 1]是政治动荡、倒退、黑暗的象征。

“× × 派”除了描述功能外，主要的作用是定位和政治定性。并通过政治定性来进行社会动员、宣判和致命打击。如果说最初“革命派”、“左派”的对象是“牛鬼蛇神”时，还是比较温和的夸饰性修辞，把攻击性动机隐蔽了起来；着力于一般鼓动，造成一种群众性精神亢奋，以蓄势待发。到“造反派”一类词语出现，对“我们”的认定与“走资派”（他们）相对立，非红即黑、非革即保、非此即彼的划线站队就成为直接的政治现实。“× × 派”的确认、宣判成了关乎各派政治势力、群众组织生死存亡的大事。1966 年底各地保皇派一夜间土崩瓦解。话语权威流通过渡、显形为政治权威运作。

1966 年下半年最多使用的是“走资派”、“造反派”、“保皇派”、“无产阶级革命派”等政治性称呼。围绕“炮打司令部”的阵营分化，对各级党政一线的全面否定，“× × 派”认定的话语操作成为两个司令部的标记，话语杀伤力达到极

点。

1967年春末夏初之后，随着夺权的开展，造反派围绕权力分配的纷争，全社会普遍分裂为支持夺权后掌权的一派和反对的一派。[注2]反对一派的命名，常常也具有否定色彩；如“反到底派”（开始称“砸派”，四川重庆）、“屁派”（江苏南京）。“××派”取得群众组织政治斗争的常态形式，双方都以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标榜，除了高层权力如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外，政治权威分散化的现状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意识形态惯性，使派别认定的杀伤力大为下降。“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降温为象征性政治嘉许，不再具备对反对派一方的政治宣判功能了。

当1970年代中期走资派再次显身为“民主派”时，“××派”的攻击性功能也随之隐约浮现出来。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风向的标志。

这种二值线性思维模式，即使在文革后、社会生活主旋律转化为经济的2000年代，仍以强势基因延续在国人思想行为中。

[注1]类似的例子，还有陈水扁和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前南非社会等。戈尔巴乔夫与叶利欣共同促成用独联体取代苏联并使之解体，解开集权体制死结。形式上也是从分裂起步的。无论对俄罗斯是幸运还是不幸，都是20世纪最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注2]各地最有代表性的组织：北京的“天派”与“地派”、新北大公社与井冈山兵团（北大）、团派与四派（清华），上海的工总司与上柴联司，长春的“红二”派与“公社”派，广西的“联指派”与“四二二派”。其中清华大学团派主张“文革阶级关系大翻个儿论”、“文革前十七年黑线主导论”；四派主张“文革阶级关系不变论”、“文革前十七年红线主导论”。

（参考资料：迟音《派——文革杂忆之四》，张光璘《难熬的1968年春天》，见《季羨林先生》，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转自“新浪”“读书”）

### 三八

始于1950年代后期的妇女组织或荣誉称号的冠名方式。区别于三八式（抗战）干部、三八作风[注1]、港台地区贬损女人的俗话[注2]。

每年三月八日作为国际妇女斗争纪念日，三八节就成了妇女节的中国化世俗代称。在此语境下，“三八”便被赋予了妇女解放的涵义。用它冠名组成各式“三八红旗手”、各式“三八作业班”、各式“三八突击队”，在1958年大跃进前后成为一种普遍风气和修辞时尚。三八百货商店、三八饭店、“三八炼钢厂”、“三八炉”（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三八”钻井队……层出不穷。挖掘人力资源，以补自然资源、制度资源的种种不足，把妇女社会化作为现代化、工业化的重要推动力，成为中共妇女运动的基调。“三八”式命名方式，就是以献祭式姿态，为这个运动镶上的诗意化光环。

评选市、省、全国各级“三八红旗手”，在五一劳动节或三八妇女节给予表彰，以示范、激励，已经成为中国数十年如一日的社会动员制度。

文革初期宣传上妇女工作的呼声被造反狂噪压倒。[注3]到1970年代又渐渐回到老路，甚至刻意用妇女劳动大军的成绩赋予文革新气象：“三八”女子超高压带电作业班（上海）、“三八女子乘务组”（郑州客运段）、“三八”抄纸机台（广州造纸厂）、“三八”检修班（河北省迁安矿区）、“三八”农科组（广西）、

“三八”号渔船（辽宁省长海县）、“三八”潜水队（海南岛琼海县）、三八义务消防队（安徽省怀宁县城关上镇）“三八”林业队（河北省沙河县高村公社辛寨大队）、“三八运输队”（湖南永顺县王村）……连篇累牍地报道出来。

意识形态运作上，在强调“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为新中国妇女争光，争挑革命重担方面，与文革前并无二致。但把妇女能顶半边天与批判孔子轻视妇女思想、《三字经》、《女儿经》等传统道德规范联系起来，是这一时期的特色。虽然有抹杀男女性别差异，将女性男性化、无性化，主要把妇女当成工具等弊端，[注 4] 忽视推动女性争取平等学习掌握核心技术、平等分享资源，更没有鼓励女性提出争取平等管理权、参政权诉求，贬抑其女性家庭角色，但毕竟促成了中国妇女空前规模进入产业大军，强劲、迅速而有缺陷地实现了妇女的社会化和价值提升。

直到 2000 年代妇女解放的性别平等，才回归到“实现某些由于文化、体制、行为和态度方面的歧视而被剥夺的权利”道路上来。个人主体凸显，无私献祭淡出。“三八”命名方式仍在，诗意化光环却已经褪色，风采不再。

[注 1] 林彪对“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三句话八个字）的概括。

[注 2] 专用于女人行为方式的，带有傻气、做事莽撞不得体的形容词；近乎骂男人的“傻逼”。与吴语中“十三点”类似。

[注 3] 几乎每年三八节《人民日报》都要发表社论。而 1967—1973、1975—1979 年就出现空缺。

[注 4] 样板戏《海港》中方海珍、《龙江颂》中江水英和《杜鹃山》中柯湘，她们是党支部书记、党代表。

（参考资料：邱质朴《大陆与台湾词语差别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金一虹《文革时期中国妇女的劳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文章选刊”[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113](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113)）

## 表态

指称把对事物的看法和采取的行动显示出来。在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是表态人的自主行为、自由意志的真实表示。1949 年以降，政治学习作为普遍适用于学校学生、机关干部、工矿职工、部队战士、公社农民、街道居民的举国一致制度，以改造思想、改造世界观、统一思想为目标。表态就是这一制度中学习讨论和运动的日常课程。1951 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4 年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1955 批胡风，1957 年反右运动的示范，1960 年代的社教，让人彻底明白扫荡百家的两家不存在争鸣那回事，有的只是顺昌逆亡。

所以表态不是人们对于世界认知的敞开，不是海阔天空、随心所欲的瞎侃，而是组织起来的政治学习的一个必要程序、一项被强加的责任；有一个统一的底本，或者是中央精神（文件）、报纸社论，或者是领导报告。意见的真假优劣不重要，说话技巧也是小事，反正政治上必须站在党和人民一边，不能自由主义，不能摸棱两可，必须旗帜鲜明。哪怕你并不懂得、不相信自己说的话都不要紧，关键是拥戴的态度要坚决、声调要高、中气要足，让人听上去恳切。[注 1] 实际上人人说的都是公开场所按要求应该说的话。文革后期有民谣：“大会说假话，



小会说废话，回家说真话。”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由于人人都如是作为，多数人也并没有口心不应的负担。连后来人们也辩护说，道德是可以选择时的责任，没有选择的情势本身就豁免了人当时的道德责任。王小波调侃地把它称作“上话语捐”。[注2] 苦涩中含着悲悯的宽宥，无奈中含着警醒的反省。

因为听你表态的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抽象的组织。组织要听的不是你的见解，这个东西没有人关心、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你站在什么立场上。那个迫使人们按统一口径发言的至高无上者，既可能是掌握会场的责任人，也可能是你身边要求进步的群众，既可能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的本单位领导，也可能是派驻的工宣队、工作组。甚至更多的就是你自己的顺从、怯懦。它在场又不在场——它无所不在。

最好的表态策略是没策略。无所用心的人云亦云，最现成，也保险。越是无主见、随大溜的人，态表得越好。挖空心思地想要表态出彩，往好处说是徒劳无益，更可能是弄巧成拙。

也不是想说就说，不想说就拉倒。表态本身就是两军对垒的阵势、态势下的行为方式：不是我们就是他们，不是自己人就是敌人，不允许中立、超脱。没有沉默的自由。骑墙、第三条道路，被认为比敌人更坏。因为敌人是公开的，沉默者却想把自己隐蔽起来，让人看不清，保留随时反水、倒戈一击的可能。人人过关，成了政治学习时必须遵守的心照不宣的纪律。保持沉默者，往往被认定暧昧、滑头，甚至心怀不满、负隅顽抗。将受到不被信任、使用，反复劝说、帮助，甚至批判、威胁、惩罚。

表态的类型有学习心得体会、决心书、挑战书、大批判等，物化形式有讨论发言、大字报、小字报、游行等。典型的表态词语有“热烈拥护”、“坚决支持”、“愤怒声讨”、“打倒”、“炮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李文忠）等；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语言。

表态运动的目的，在于借助一种个人不可控制的权力集团意志操纵，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硬的或软的、压迫的或诱惑的等各种手段，造成一个众口一词、人多势众的局面，剥夺人们思想、表达、沉默的自由，造成官方意志合乎民意的态势、表面现象。是一种在真理名义下对人的挟持、绑票、奴役、强奸、阉割。

[注1] 影响最大、最惊世骇俗的表态是郭沫若在1966年4月14日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发言：“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我今天的话好象是表态，确实是表我的心态，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

[注2] “表态”就是上着一种话语的捐税。那是一种“违心的话”。因为捐税是被迫的，所以这一认定将导致犬儒主义的谅解——有征话语捐的事，不管我们讲过什么，都可以不必自责：话是上面让说的嘛。何况征收话语捐的事是古已有之。说话的人往往有种输捐纳税的意识，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口头上。《红楼梦》两个姑娘半夜三更躲在大观园后花园里联句，联着联着就冒出了颂圣的词句。要归咎在写书人的身上有这种毛病：在使用话语时总想交税的强迫症。而话语捐的身份却暧昧难明：既是捐献，又是税金。那些说话的人心里都有一个税吏。

（参考资料：张柠《表态运动和自由的累赘》，《随笔》2006年第1期；郭沫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 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人民日报》1966.05.05；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收入《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7 年版)

## 逍遥派

名词。亦称“看穿派”。指由于客观上不能、主观上不愿而未参加造反派组织，置身运动之外，不参加（如写大字报、跳忠字舞等）或不积极参加（如天天读等）文革各种活动的人。

“不能”是指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地富反坏右），本人身份有问题（有不满现实、白专、偷扒、作风劣迹）等客观原因，造反派组织不予接纳。当事者未必情愿接受，但也只能接受；是消极、被动的逍遥派。“不愿”则指对文革权力斗争、反人性、践踏科学文明等倒行逆施本能反感，有所不忍、觉悟，或在策略上的意见分歧退出漩涡，或天性文弱，惧怕身体接触的激烈对抗，厌倦组织的约束，社会关怀程度不高，不热心政治，不参加任何派性组织，置身运动之外，拒绝随大流，自愿被边缘化。

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热心政治运动，但看到太多非理性的血腥或个人野心的丑恶，心灰意冷而退出。其中多为主体意识较强的知识分子：他们沉醉于恋爱婚育、油盐柴米等个人生活小圈子，沉浸于技术、专业、外语的研习或下棋、玩桥牌、钓鱼、遛鸟、养花等游戏里，学学太极拳、治印，从“男焊（组装半导体收音机）女织（打毛衣）”里讨乐趣。甚至自己动手做家具。他们主观上有疏离造反派和种种流行政治时髦的故意。虽然他们不能超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主张，但即使参加组织或单位安排的政治活动，也是躲得远远的，点卯画押，应付差事。

“逍遥派”主要指的是后者，即，可以选择、也选择了不合作态度的人群——虽未自觉反对文革，却也主动远离文革。他们不整人，也不惹事生非，对闹哄哄的时代感到迷惑，对政治有一种疏离感。李泽厚、严家其、刘再复、方励之、许良英和金观涛……等人即是他们中的典型。

这些人被当时的主流舆论看作滑头、自私的落后分子，小写的人，缺乏责任心、道德感的自由主义者。其实他们只是些趋于静观、理性而富于超越感的人，总是与现实和人人艳羡的实利仍然保持着一段距离。他们被当时的官方舆论批评为“中间派”、“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想躲开矛盾，避开斗争，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中处身“局外”，“对资产阶级向党进攻麻木不仁”。在文革前期是极少数，到后期就成了多数。

文革后，被看成众醉独醒、有先见之明的人。组织曾一度特别关注他们，认为不乏可用之材，意图在他们中物色官僚人选。在 1990 年代的经商潮中他们仍然是冷眼旁观者。2000 年一些私家车主结成的俱乐部多把自己叫做“逍遥派车友会”。

（参考资料：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文汇报》1967 年 6 月 21 日；陈奎德《毛的晚年悖论及其遗产——文革三十年祭》，“墨闲居”）

## 以阶级斗争为纲

以××为纲，是中共意识形态运作一种典型的构词方式：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等等。是被一度中共奉为经典的抓主要矛盾思维方式的词语映射。这种思维

方式认定，世间诸多矛盾中必有一种矛盾居于支配、主导地位，左右其他矛盾的存在、发展，抓住了它就可以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阶级斗争被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共认定是带动、解决社会主义时期一切问题的主要矛盾、枢纽，所以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注]

1957年10月，利用反右斗争扩大化造成的态势，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八大认定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矛盾的方针。

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毛把彭德怀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进一步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8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重点是研究农村工作。会上集中批判了“单干风”，并要求当年冬春在全国农村“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

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在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与之配合，社教（亦称“四清”）运动和文艺上的批判运动纷至沓来，调子越来越高。

自1957年之后，中国、中共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在文革中发展成为体系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实际展现为遍及党、政、军、经、文、卫各个领域、声势浩大、迁延十年的全面政治运动。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里得到正式肯定，十大上继续发展，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10次、20次、30次”。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地、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后来更进一步认定这一口号，把复杂的社会治理简单化、绝对化，“脱离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从实践情况看，它背离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向，混淆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影响了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和策略的制定和贯彻执行，破坏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正常的社会秩序，严重打击和挫伤了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造成了文革“十年浩劫”——大量生命非正常死亡，人民陷于恐惧，政治颓败法纪废弛，文化断裂科技萧条，经济濒临崩溃。

2000年代受社会转型期矛盾冲突尖锐化冲击，有人怀念文革，以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打倒走资派是反腐良药。疑有南辕北辙、缘木求鱼、饮鸩止渴之讥。

[注]据考证，该提法最早见于1964年9月中央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

条” )中。由刘少奇主持制定。草案对当时形势估计十分严重，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指出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为此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口号。

直到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毛才说“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1975年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时，毛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但这似都不足以构成充分理由否定毛“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发明人身份。最多说，刘曾投过这个口号的机，或曾想为我所用。

(参考资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上)》，“人民网” 2003年10月10日；廖盖隆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1949—1999》，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bai1975《分析刘少奇》，“猫眼看人”)

## 中山装

由“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设计、裁制、首穿，因而流行，成为官方服装的服装。[注1]它是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和学生装，本着“适于卫生，便于动作，易于经济，壮于观瞻”原则设计缝制成的。

上衣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一件上衣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注2]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裤子穿着方便，也很适用携带随身必需品。

服装做工比较讲究，领角要做成窝势，后过肩不应涌起，袖子同西装袖一样要求前圆后登，前胸处要有胖势，四个口袋要做得平服，丝缕要直。主要是造型均衡对称，外形美观大方，穿着高雅稳重，活动方便，行动自如，既可作礼服，又可作便装。色彩除常见的蓝色、灰色外，还有驼色、黑色、白色、灰绿色、米黄色等。为了纪念这一服饰的首倡者，称作“中山装”。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党政官员的礼服，并在宪法中规定：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要穿中山装。

1949年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都穿着中山装，一则强调其事业与孙中山民主革命相衔接的延续性、合法性，具有民族主义、革命和反封建的政治象征含义，一则与此前人民解放军军干服的款式也基本接近。服色则由灰色变换为藏青色。从此，藏青色中山装制服就成为社会各方一致认同的官方服装了；甚至被称为“国服”。上班、度假、作客、结婚、典礼，都穿中山装。到文革时，服饰的单一化更加突出，绿军装成为革命的象征，一时间大为流行；除中山装以外的服装都被看作奇装异服，剪小裤管、旗袍，甚至被红卫兵看作“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在外国人眼里，因毛泽东常穿中山装（除1966年曾短暂地穿过军装以暗示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外）而被称为“毛式制服”。工农兵学商都穿，成了中国人服装笨拙呆滞、单调乏味的同义词。有一种侮辱性的说辞，称中国人是一群“蓝色的蚂蚁”，就因为他们穿着单调、千篇一律的蓝色中山装。

1979年改革开放，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曾率先垂范，穿上西装。舒适而随意。

一时成为国内外媒体爆炒的新闻。上行下效，中共官员和社会人士都以穿西装为时尚。由于电视剧人物塑造类型化的刻板印象，久而久之，穿中山装的似乎都是正统保守者了。但中山装仍未从服装市场和电视新闻中消失，2000年代前后还出现复兴趋势。

中山装在1990年代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题材，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展望（《诱惑》，1994）、隋建国（《衣钵》，1998）的雕塑作品。在这里中山装已经失去了庄严气息，就像在1990年代初人格趋于萎缩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作品塑造了中山装被从心理上和身体上脱去并被遗弃在人群已散尽的废墟之中，反映的是中山装社会象征权力的丧失，即它不再对许多中国人构成心理和意志上的象征联想层次的控制。评论家说“这是政治社会向后政治社会文化转变的一个标志”。

[注1] 有授意、委托黄隆生（越南广东华侨，兴中会会员，曾先后任广州大元帅府会计司司长、中央银行副行长）、王才运（宁波籍红帮裁缝）创制两说。

[注2] 据说，前襟4只口袋标志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门襟5粒纽扣代表国家行使的五权：“行政、司法、立法、考试、监察”；衣袋4粒纽扣含有人民拥有的四权：“选举、创制、罢免、复决”；袖口3粒纽扣则寓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原则。

（参考资料：邢声远《中山装的由来》，“北京科普之窗”；人斩天诛《中山装怎么来的？》，；朱其《穿和脱：中山装是如何成为艺术的》，“艺术论坛”）

## 一大二公

1950年代后期，中共除了对城市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外，还对农村经济进行了大规模变动。“一大二公”[注1]就是最高领袖对人民公社特点、性质的描写、规定（毛泽东语）。

一大，是指人民公社规模庞大，管辖地域包括好几个习惯性的集市贸易区，拥有数万人口；二公，是指土地、耕牛等重要生产资料（产权）属于集体所有，体制上则党政、社群合一，工农兵学商一体，生产计划、劳动力调配、收入分配高度集中。“适合办大农业（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是加快农业生产发展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推而广之，这也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般特点的概括。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思维定式：不管经济组织的自身特点，不管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都是越大越好，越公越好。

1961年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缩小农业集体组织规模，把公社缩小到以前乡或大乡的水平，建立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一整套制度。但是，在规模上的控制，没有根本改变人民公社产权和体制上的性质特征。一大二公作为一种正面价值、思维定式，更加在一般人乃至中共官员头脑中深深扎下了根。

在这样指导思想驱动下，文革中狠斗私字一闪念，取消集市贸易，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养殖业和副业，不但造成人民基本生活资料供应短缺，票证泛滥，货架空空，而且经济完全丧失活力。大寨和昔阳还大力搞农村核算单位向大队的过渡，虽然没有在全国推广，但仍然典型地代表了那个时期的经济思

想和管理趋势。

在生产资料上搞一平二调，无视土地的商品经济关系，人为地消除了土地有偿政策；在发展阶段上急于“穷过渡”，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极端表现是公社食堂）；配置资源上实行不允许竞争的计划经济模式，违背通过市场供求信息刺激-反馈调配资源合理、高效配置的价值规律，陷于主观主义的想当然、瞎指挥，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片面发展的道上瞎撞；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注 2]由于生产者与自身利益的分离，失去生产动力和主动性，导致普遍的生产效率低下。

2000 年代有学者分析说：这些局面的出现，是因为领导者感情用事，一心迅速改变面貌，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用动机代替效果，不能冷静地客观地分析我国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情，急于求成心切；希图在国内乘胜跃进，一步登天，在国际上跃居前列，抢先进入共产主义，争当国际共运的领导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误解和曲解，把按劳分配误当做资产阶级法权，把平均主义错当做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注 1]有的后续概括，加上了“三高四纯”：高是发展阶段要高，可以调动更大范围的资源在更大规模上做大事；纯是经济成分和人的思想要纯，彻底无产阶级化，不允许有一点杂质。

[注 2]在现代经济学看来，每个人、每个企业都会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对消费者而言，理性行为就是用自己有限的收入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欲望。对企业而言，理性行为就是在给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选择最佳的投入产出组合以取得最大的利润或经济效益。“一大二公”从根本上取消了经济人理性驱动的前提，必然导致失败。

（参考资料：逢先知、金冲及等《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8月30日）》，转自《毛泽东传 1949—1976（上）》，“人民网”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新浪”“经济学人”；高放《一九五八年“三面红旗”运动错误的思想根源》，《粤海风》2002 年第 2 期）

##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原为 1950、1960 年代解放军部队中流行的口号，它反映军队将士为了建设、战斗的胜利，所具有的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在“文革”中被再次提出来赋予新意。

1952 年进藏 18 军某部投入修筑长达 2400 多公里川藏线的艰苦工程。仅用 2 年多时间，就完成了西线（拉萨至林芝）的施工任务。在修筑皮康崖险段时，当地一个小贵族曾预言说：“那是牦牛也爬不上去的皮康崖，除非神才能在那里修出公路来。”负责该段的某部二连官兵回答：“我们的战士都不是神仙，而是凡人。但我们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经过两个月艰苦奋斗，终于在这段悬崖上修出了公路。

1962 年 10 月，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打响后，该部二连 6 班在班长阳延安带领下，连续夺下了敌军七座地堡。前仆后继共牺牲了 7 名战士。激励他们冲锋向前的口号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该军军长张国华汇报战事时提到这个

口号，毛泽东当即给予肯定：“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965年7月14日，为保卫别人安全而壮烈牺牲时年仅23岁的英雄王杰就被誉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好战士。《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阐发他的精神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的表现，是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的表现，是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的表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强大的精神原子弹。革命战士掌握了这个精神原子弹，在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就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并以“怕不怕苦，怕不怕死，是区别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界线，是检验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试金石”为由，为这种精神赋予了反修防修的意识形态意义。

同年11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以背枪、手握毛泽东著作的王杰形象为主体的宣传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哈琼文绘）。

1969年4月，刚刚发生过珍宝岛之战，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指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后这一口号成为政治运动、鼓舞士气的流行话语。它又通常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起连用。

一方面，它对鼓舞军民斗志和士气，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克服困难，起到了一定历史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一种片面性，有意无意地鼓励简单蛮干，无限夸大牺牲的精神价值和超越性，忽略了以科学精神、最小代价争取胜利，“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另一面。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当地却隐瞒震级，拒绝援助，甚至还说出“灾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迎击地震灾害”，助长了地方官僚主义倾向和盲目自大心理，就对最大限度减小损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消极影响。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2005年，胡锦涛重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口号说：“我们这支军队历来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压倒一切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凭着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凭着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创造了许多以劣势装备打败拥有先进装备的国内外敌人的奇迹，在人类战争史上导演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精神财富。”要求人民解放军继承这种精神，完成捍卫祖国现代化安全、捍卫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任务。

（参考资料：《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学习王杰同志一心为革命的崇高精神》，《人民日报》1965.11.08；陈德杰 王犁田《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口号是怎样叫响的》，原载《解放军报》，转自“中国教育在线论坛”<http://bbs.eol.cn/archive/index.php/t-169555.html>；周祯煜、江伯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王杰班与红色尖刀连命名40年》，《解放日报》2005年10月24日）

###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一种对农村进城的学生、军人、干部思想感情变化过程的模式化概括。被当成忘恩负义、丢了人伦根本的道德叛徒。以孝行作为立论基准，是一种可怕的罪名。最初流行于1950、1960年代的顺口溜。是当时思想教育为了反修防修目的，从生活实际里抽象出来给以漫画化的否定性道德形象。功能在于警示作用。

它被用于描写一些进了城的人：从着装看，第一年从乡下穿进城的衣服还习

惯，第二年就不好意思了，旧衣、新衣轮换穿，第三年就只穿新衣不穿旧衣了；从语音说，第一年还是乡音为主，第二年开始使用夹生的普通话，第三年语音就比较纯正，觉不太出话里带方言、乡音了；从感情说，第一年书信往来频繁，父母、朋友常有音讯，第二年书信大为减少，第三年与父母家人一起撞见同学、同事，就谎称是同乡了。[注]这里既有生活环境变化时，人的感觉、认识的自然变化，对城市文明、新生活方式的认同，也有伴之而来的感情上的疏远。

《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年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编剧沈西蒙，导演王苹、葛鑫，主演徐林格、宫子丕、陶玉玲等)中的军官陈喜(排长)，就是这样一个在进步学生赵霞追求下意图抛弃糟糠之妻春妮(劳动模范)的危险苗子。其时已经高度重视思想控制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抓住这些“风起于青萍之末”的细微现象，上升到思想斗争、阶级斗争高度，深揭狠批了。只是还多限于一般性的思想认识层面上进行帮助。

文革中，这一现象被进一步利用来作为否定17年教育制度和实践的论据。以响应毛泽东“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论断(出于五七指示)。1975年出品的电影《春苗》，就曾借用了这样的台词，以表示主人公的决绝和革命性。

当时很出名的例子是，一个学生愤怒控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使他“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说，为了表示自己不寒酸土气，虽然吃不饱，每顿饭都要当着同学的面儿扔半个馒头。因为在他的家乡馒头就是美味佳肴。他狭隘头脑里能想出来的表现身份的最好办法，就是扔馒头。其实这与教育路线没有关系，而是这位同学采取了错位、滑稽的策略，来企图融入校园主流社会(扔馒头的比较常见)。所以该指控文不对题。

1950年代经历了反右，通过整体掌控所有人的所有生产、生活资料，经过制度化的残酷斗争，从精神、思想、政治和舆论上消灭了作为群体存在的“知识分子”，并在社会上形成了对他们高度警惕的风气。到文革更加达于极端化：“学历”曾被看成远离工农和生产、社会实际，清高傲慢，拒绝“改造”的危险标志。虽然中专、大专、本科生分配后的身份一律是“国家干部”，工资依文凭高低有一级的差额，大学毕业抵得上一一般人10年甚至20年工龄。但他们也没有歧视他人的资本，反倒是被欺凌被监视的“弱势群体”。需要夹着尾巴做人。因为他们是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当权派和体制培养出来的，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为此，需要给他们经常性的敲打、批判，乃至安排歧视性、强制性的体力劳动。

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后期纠正“两个估计”时。

2000年代前后，部分养成自我中心习惯的独生子女大学生，淡漠亲情，疏于与父母交流，受高昂学杂费、社交费用的压力，凡有家信就是向父母催钱。使人不无辛酸地再度联想起过去的这段顺口溜，是恍如隔世的锥心疼痛。

[注]毛泽东曾从人情之常的角度给以宽宥，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参考资料：李刚《毛泽东和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年第13期[4月号]；黎明《“学历歧视”与“歧视学历”》，“世纪农村信息网”<http://www.chinacountry.com/>；王伯庆《回忆陈世美同志》，



《华声月报》2000年6月)

## 吉林陨石雨

1976年3月8日下午中国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罕见的陨石雨。[注]

当天15时1分59秒，陨星在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上空发生爆炸，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陨石雨散落范围约有500多平方公里，其间包括吉林市郊区、永吉县、蛟河县的7个公社，区域人口10多万，没有造成任何伤亡或损失。碎块3000余块，收集到的陨石有138块。其中最小的重量在0.5公斤以下，有三块每块重量超过了100公斤。陨星总重约4吨；最大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石陨石的重量（1078公斤）。这次陨石雨的数量、重量和散落范围，都是世界罕见。对于天文学、天体物理、高能物理、宇宙化学、天体史、地球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科学院迅速组成联合调查组赶赴现场，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考察工作。他们研究了吉林陨石的球粒和结构、构造，从中初步鉴定出了橄榄石、斜方辉石、铁纹石、镍纹石、陨硫铁等主要矿物和透辉石、金云母、钛铁矿、铬铁矿、白磷钙矿等次要矿物近四十种，以及某些氨基酸、卟啉、色素、异戊二稀烃、正构烷烃等多种有机化合物。将这些情况，同地球、月球等行星的情况作对比，有利于了解行星的形成和演化，以及探索生命前期化学演化进程。

据推测，这次陨石雨是距今46亿年前形成的陨石星母体，大约在800万年前的—次碰撞中破碎后，于今与地球公转轨道相交闯入大气层坠落的结果。

4月22日下午毛泽东闻讯，刚刚经历过四五天安门事件的他不止—次地站到窗前望着渐渐昏暗下来的天空，陷于思虑、不安、激动。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起史书上的陨石雨记载和人间变化应在自然天象的天人感应学说。

这次陨石雨后来被与唐山地震联系起来，在民间引起了老百姓不少传说、议论：陨星、地震等自然灾异现象都应在当年中国逝世的三个开国领袖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身上了。1700多公斤最大的陨石象征毛泽东，小陨石象征指唐山大地震死的人。

对陨石雨的科学考察，前后被赋予了不同意义：1976年4月的报道说“这次陨石雨的考察工作，是在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罪行、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1977年9月的报道说“广大科研人员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的关怀下，以揭批“四人帮”为动力，在短时期内就取得研究成果，使我国陨石研究水平有了新的提高。”

吉林市陨石博物馆成立于1990年6月26日，1999年被吉林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全省科学普及教育基地”。吉林市陨石博物馆新馆2005年7月开工。其占地面积1公顷（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总投资4700万元人民币；接待游客量设计能力为每年25万人次。

中国邮政2003年6月21日发行《吉林陨石雨》特种邮票（2003-10[T]）1套3枚：（3-1）T《降落》，面值80分；（3-2）T《分布》，面值80分；（3-3）T《—号陨石》，面值2元。于卫华设计；规格：40×30mm。

[注]流星体经过地球大气层高速下降时与空气摩擦冲击没有完全烧毁而散落在地面上的陨石群。三千多年前，中国就有关于流星和陨石的记载；《史记·天官书》中说：“星坠至地，则石也。”1949年以后中国发现和收集到了三次陨石

雨：1958年广西南丹县发现了明朝时期陨落的铁陨石雨；1971年吉林省双阳县境内的石陨石雨；1976年吉林市郊石陨石雨。

(参考资料：新华社《吉林地区降落一次世界罕见的陨石雨》，《人民日报》1976.04.22；新华社《陨石的来龙去脉初步弄清楚了》，《人民日报》1977.09.04；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大地》1992年第8期；《吉林市陨石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简介》，“新浪吉林网”《〈吉林陨石雨〉特种邮票[6月21日发行]》，新华网)

## 一打三反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认为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是：“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据此，要求全党“用战备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使群众把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联系起来认识。同时要突出重点，以打击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为重点；按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报中央备案。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包括中共17年执政的一贯做法：判处死刑报请朝廷、中央政府批准，将杀人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故判处死刑已无须最高法院核准，仅备案存档而已。后来更进一步把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了县、市一级。形成对死刑的制度性放纵，并提高了执行率。

1968—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以打击“历史反革命”为主，此次侧重打击“现行反革命”，具有能清除异己、恫吓反对派功能。文革中各地对立派虽已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大致解决，但最后的镇压，特别是对持异见者、政治犯的镇压却是在此次完成的。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一些同人性质的民间读书会也遭到残酷打击。[注1]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里侵吞国家财物，有的贩卖票证，倒卖国家物资，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有的行贿、受贿、走后门、私分商品。《指示》要求开展一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同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指出有些单位大兴土木，讲排场，请客送礼，挥霍浪费国家资财。中央要求：“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场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

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各地据此纷纷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成为深入进行“斗、批、改”的一个重要措施。到11月底，全国共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批准逮捕各种分子28.48万多人，其中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注2]这次运动，虽然对当时稳定秩序不无补益，但在对形势过分严重的估量和极“左”思想指导下，打击了不少无辜群众，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例如1970年8月20日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还有大批虽未判死刑却被逼得走上自杀之路的人。如，青海贵德县中14人自杀；上海市南汇县“造成非正常死亡62人”；宝山县“有250多人作为敌我矛

盾处理，41人被迫自杀”；广西钦州地区“发生自杀事件238起，其中死亡188人”；“河池地区自杀169人”。

量刑时组织“革命群众”学习文件，讨论反革命分子该不该枪毙，算是执行“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政策。但通知上“最高指示”已说明“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列入名单者是“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要讨论的并非他们是否反革命，而是表态该不该枪毙。对反革命分子不表示革命义愤，“革命群众”也可以转化成“反革命”，所以谁都只有异口同声赞成“枪毙”。这些被量刑者的罪名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攻击江青同志”、“攻击”省市首长、要求宗教活动、牵强附会乃至捏造的莫须有，等等。

“现行反革命”在被枪决前，被分成小组，天天拖着脚镣、手铐，分别被带到各处的万人大会上斗争、示众。各单位欲把“一打三反”推向高潮，都要借用这批活靶子，以“教育群众”。

1970年3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100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同年夏天，南京市分两批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每批24人（其中有两三名刑事犯）。为了避免政治犯乱呼口号造成恶劣政治影响，采取了麻绳勒喉管、竹筒塞嘴、“压舌板”、割喉管等“消声法”。密集公告的死刑判决上打红勾的名单，给人印象恐怖。云南罗平县运动中打死85人，还把圭山乡2分钟打死7人作为经验介绍。[注3]

[注1]最知名的是南京的“金查华马列主义小组”、宁夏自治区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小集团”等。

[注2]编者根据上海“宝山县志”、“松江县志”、云南“罗平历史资料库”提供的统计数字，做过计算，经济性质的案件略占80%弱。由于这一样本太小，地区之间情况不平衡等因素，都要影响到该数字的说服力。但至少可以起一个参照系的作用。只是经济性质案件判处死刑者极少，判处死刑的大半为政治案件和恶性刑事案件。

[注3]这些死者未进入死刑统计。据《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载：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有20万人是入党后杀人，有9000人是杀人后入党。

（参考资料：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丁抒《风雨如磐的日子：一九七〇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文革”“一打三反”》，转自“文革时代”；《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转自“右派网”[www.youpai.org/read.php?id=423](http://www.youpai.org/read.php?id=423) -)

## 九大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简称。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512人，代表党员约2200万人。此次大会是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尚未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情况下召开的。各地在产生九大代表时，大多是由革命委员会同各地造反派组织进行所谓“民主协商”、“听取群众意见”和上级指定相结合“推选”出来的。

1969年3月9日至27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九大预备会议，毛泽东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4月1日大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并致开幕词。会议选举了176人大会主席团，毛泽东、林彪为主席团主席、副主席，

周恩来为秘书长。

大会主要议程共三项：(1)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2)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3)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分为两个阶段：4月4日至14日，讨论和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4月15日至24日，酝酿并选举中央委员会。

九大政治报告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第一次完整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并以此回顾、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它的“丰功伟绩”。用歪曲事实的叙述，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个政治报告第一次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成为九大政治路线。

大会通过的党章，不但对中共的理论基础作了与政治报告一致的歪曲解释，还删掉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

中共九大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279人，其中原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53人，不到九届中委总数的1/5。增加了不脱离生产的工人、农民的比例，军队代表由19%上升到了45%。由于酝酿候选人暗中争夺的激烈，原定21日选举、闭幕被推迟到了24日。林彪军人集团和中央文革小组文官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不少亲信和追随者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从而掌握了更多的权力。两个权力集团的矛盾和争夺已经悄悄展开。

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此后，已进入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作为独立机构即不复存在。

九大的新闻报道开创了1949年以来新闻史上的一个先例：报道与中共党代会召开同步。大会以前就有迎九大的报道；正式会议4月1日召开，4月2日报道就公开了。人民日报和各地方媒体（照转新华社通稿）在会议期间都成了大会专刊，消息密集、角度各别、形式多样。全国性庆祝游行在大会开幕当日连夜进行，通宵达旦，忠字舞也在此时达到高潮。

文革后的官方党史认定，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而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选举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自始至终被个人崇拜和极左狂热气氛所笼罩。中共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

（参考资料：新华社《朝气蓬勃的大会 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 全国人

民热烈庆祝党的“九大”开幕》，《人民日报》1969.04.03；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

## 望远镜和显微镜

望远镜本义是指称“观察远距离物体的光学仪器”，有折射望远镜、电子天文望远镜（可观测几百万光年以外的星球）；显微镜本义是指称“观察微小物体的仪器”，有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可放大80万倍以上）。

作为借喻的意识形态语言，首创者是毛泽东。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一文中对红军指战员们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时，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当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以此夸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认识威力，形象而富于感染力。

1960年代开始，这一固定词组稳定地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联系在一起；并特别密集地运用于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把思想方法和认识能力与阶级立场、政治立场、政治上正确捆绑起来，强调阶级立场、政治立场、政治上正确的重要性乃至决定作用，“掌握了这个法宝，就能避免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并从否定意义上指出“至于死抱住资产阶级的立场不放的人，他们是始终不能真正地掌握它的”。不是从具体的事物、环境、过程出发，认识其发生、发展，而是首先从政治出发，判断先于认识。举一反三，一通百通，包打天下。并把这种真理性效力，从政治、社会，无限推及文艺、经济、自然科学等领域。要求用毛泽东思想去指导一切认识活动。无视、取消检验认识的客观性标准，是当时政治环境、意识形态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主导的重要特点。

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写于1966年9月的《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疾呼：“敢不敢‘怀疑一切’，敢不敢‘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敢不敢造旧世界的反，标志着一个人对你死我活、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有无认识，是否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高指示，作为观察分析一切事物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是否用毛泽东主义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统帅一切。”已经带有诡辩论色彩。

这一话语现象的流行与当时毛泽东崇拜升温、高潮同步。1970年代末开始退潮，逐渐恢复正常。[注]意识形态色彩淡出，却未完全绝迹。

2000年代这一话语方式偶尔还有出现。官方（如被一再转载的著名论文《发挥理论优势 推进斗争发展》的用法）、民间都有运用。有论者认定“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在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条件反射地想起的就是“毛泽东的眼光好像超级显微镜和望远镜一样”。疑似一种间歇性自动发作的思维偏执症表征。

[注]“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材料，该词1960、1970年代的年均浮现率为4.12%，是其他年份平均0.47%的近9倍。

（参考资料：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曾希圣《学习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人民日报》1960.07.06；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原

载《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1966年10月7日；罗四夕《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在晚年》，“思考机器”）

### 三和一少

1962年上半年，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等人提出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建议，后来被概括为“对帝修反要和（三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一少）”。

经历三年困难局面后，中共中央决定为了渡过难关，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该年年初召开中央扩大的“七千人会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2月27日，正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征得伍修权等部党委的同意，联名递交了给中央的建议信，信的抬头是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三人。

信中明确主张，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不能笼统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同苏联的关系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应“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同时提出在困难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在当年7月莫斯科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赏定的“低调”发言，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

康生感到中联部批评的，正是他一直热衷和鼓吹着的一套，即中央正实行着的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针。提出了反对主张。毛泽东认同康生意见。

客观上处于被批评地位的毛泽东，敏感地把要求调整的种种主张串连起来，认定是要否定他的路线。如，把将经济困难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是非常时期的判断（刘少奇），归纳为“黑暗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主张（邓子恢），归纳为“单干风”；把所谓小说《刘志丹》要为高岗翻案，主张用一风吹办法纠正“反右倾”运动中对干部的错误处理（邓小平等），归纳为“翻案风”；把王稼祥建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调整与民主党派关系、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意见（李维汉），归纳为“投降风”。

并且还把手王稼祥建议，与国际上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过渡）联系、等同了起来。摆在反修防修战略的对立面。

1964年2月9日、29日，毛泽东先后两次会见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批评中共党内有人不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并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谈话，反映出他认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的完全不切实际的严重估计，明白无误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中央一线多数领导人。为准备文革，开始作大量的内部舆论、造势工作。

文革开始以后，康生到中联部看大字报，认为“没有抓住大方向”，“中联部过去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部，而是打着王稼祥白旗的部。中联部的要害问题是搞了‘三和一少’”。虽然此时王稼祥已调出中联部，却仍授意“造反派”将王稼祥揪回来，逼他交代“罪行”、接受批斗。更把“三和一少”拔高到“三降

一灭”的程度——即投降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以印度为代表的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还和批判中央党校杨献珍“合二而一”哲学命题挂上了钩。并写入中共“九大”政治报告。

在这样极左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对外政策被引向了更左的歧途，公开宣扬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北京，四面出击，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极为孤立。

1979年3月9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强加于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倒。

2000年代有研究者把王稼祥主张认定为“探索社会主义实现形式”的努力，“已被事实证明是具有前瞻性的改革创新”。

（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李丹慧《毛泽东的安全战略思路及其转变1964-65》，《二十一世纪》总第59期；《伍修权搭救王稼祥》，“中国青年新世纪读书网”）

## ×亿人民

一种指称中国人口总数的构词方式：6亿人民、7亿人民……文革时期的中国人口总数在7亿—9亿之间：1964年7亿，1969年8亿，1974年9亿。[注1]

“七亿人民”的提法在《人民日报》上，使用的起止年限为1962年—1970年。同期人口统计的实际情况是，7亿人口的年份为1964—1969年。1964年以前，国外人士取其成数，把近7亿称作7亿，是一种取整数的语言习惯，有强调中国人口众多的心理范式在起作用；1969年后，由于惯性使然，冒头出了7亿也称7亿，是一种语言滞后性。“八亿人民”的使用起止年限为1970年—1975年。似乎由于人口压力在增长，此时媒体对人口统计的敏感度远远超过了指称“七亿人民”的年份。

强调人口多，一是人多力量大，可支配、调动的人力资源多，如俗谚“人少好过年，人多好种田”，才有“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七亿人民意气风发，社会主义祖国蒸蒸日上”、“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毛泽东）的众志成城；二是人多势众，手中掌握的真理多、占据的道德制高点高，才有“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七亿人民团结战斗，红色江山牢又牢”的自信豪迈。[注2]

毛泽东人口思想从治国角度也看到应该有计划的一面，但更多肯定人口的正面价值：“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注3]

不知是否出于对人口压力的感应，中国人口总数达到八亿以后，它的感情色彩也骤然变得芜杂起来。既有“八亿人民，不斗行吗”（毛泽东）[注4]那千古一问的强悍、吊诡，“八亿中国人民的重托”的夸饰、官样文章，也有对联：“批邓一千个拥护”（上联）“反右一万个赞成”（下联）“八亿人民”（横批）的怪异，

“五洲峰峦暗，八亿泪眼红”（天安门诗抄）的哀惋，“八亿人民八台戏”“八亿人民一个头脑”的调侃、讽刺……对人口价值的评估出现了负面描述，与中国传统迥然有别，现代性因素在冒头。

但也许是其时已向文革后期过渡，思想禁制尽管强大，却已经趋于松弛，缝隙开始出现，杂音不时奔逸而出，不再那么整齐划一了。精神现象的新陈代谢潜滋暗长、生生不已，与文革后接上了轨。

[注 1]1966 年中国人口 7.45 亿，1976 年实际已经达到 9.37 亿。10 年内年均增长人口近 2000 万。

[注 2]两者的变形、通用形式是“亿万人民”，使用频率很高，已成为格式化套语。

[注 3]因此不但疏忽、延缓了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还鼓励了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围攻、批判，并亲自下达“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的贬黜圣意。1960 年 1 月 3 日，马寅初被迫向教育部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务，随即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职务；还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访问，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

[注 4]有考证说，此语出自毛泽东曾对英国人蒙哥马利的谈话，说“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参考资料：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人民日报》1966 年 10 月 1 日；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1949-2001 年全国主要人口数据》，“中国人口信息网”[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304](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304)；史海《马寅初与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的论争》，《中国档案报》2005.4.27，转自“新浪”“文化生活”<http://cul.sina.com.cn/y/2005-04-27/1409124041.html>）

## 黑画

1974 年时以批判传统题材绘画为由进行政治投机的大批判运动的牺牲品。“黑画”[注]的“黑”，指控这批绘画政治上反动、题材远离时代生活、心理上阴暗、艺术语言腐朽。

1971 年底，周恩来指示，集中一些著名中国画画家创作一些非政治的山水花鸟传统题材作品，用以装饰国内陆续建成的各大涉外宾馆（故亦称“宾馆画”），也可以作为外贸出口换取外汇。

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四人帮”为攻击和诬陷他，组织了针对“黑画”（中国画）的一场批判运动，并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先后举办了“黑画”展览，挑选 200 件作品，展期 50 天。1 月 2 日，姚文元在上海市委会议上，指责一本外贸部门编印的出口画样本《中国画》，是“黑山黑水”，“翻案”“回潮”，“迎合西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是“一本地地道道‘克己复礼’的画册”；下令“要查一查，进行批判”。

“宾馆画”被批成“黑画”，丰子恺等一批名画家均在打倒之列，吴冠中和黄永玉等人也难逃噩运，吴冠中的油画《向日葵》、黄永玉的水墨画《猫头鹰》、李苦禅的《荷花图》、南京艺术学院陈大羽的《迎春》，都被批成“黑画”。随后，山西、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湖北、广东、陕西等地也纷纷仿效。

中国艺文传统讲寄托、美刺，史学传统讲“微言大义”、“春秋笔法”，绘画



也讲究意境。而这附着于形象和叙事的意境、寄托、美刺、微言大义，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即所谓“诗无达诂”，为创造、阐释都留下广阔空间。被极左文艺思潮及其统治者利用来栽赃开了方便之门。轮番上阵的打手有初澜（文化部大批判组）、小恋、任犊（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石一歌别名）等人。

黄永玉的一幅猫头鹰，只因为是一只眼睁一只眼闭，就被诬为对社会主义不满。许麟庐的一幅国画，画面上有一棵白菜、三个柿子，竟被指责为用谐音“三世清白”来为自己的“反动家庭”翻案。一幅国画，画着“一只怒气冲冲的公鸡”，被附会、拔高为“寄托了……一小撮‘复辟狂’的阴暗心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随时随地准备同无产阶级决一死战”。还有一张不知谁画的风景画，画上一座五孔桥，桥上有七八个行人，这就是“攻击五七干校”。

初澜在用“小恋”为笔名的文章《时代的画卷 战斗的艺术——“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观后》里概括说：“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美术界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绘画兴风作浪，歪曲丑化社会主义现实，发泄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和仇恨。不久前被揭露和批判的一些黑画就是这样的货色。在他们笔下，光明变成了黑暗，幸福变成了灾难。”

批判“黑画”时，参观者络绎不绝，其中一些人是抱着欣赏态度去的，甚至有的“黑画”居然一眨眼就不见了。苦无资料、学习机会的观众还对着“黑画”临摹，组织者来了就停手，一离开就又忙着勾勒。有的临摹者还根据展览提供线索找到画家，成了他们的学生、追随者。这又为组织者所始料不及。

此前的1972年全国工艺美术展览，展出上万件展品，也被批判为“复古倒退”。江青规定文学艺术的题材内容不能推陈出新，唯恐冲破他们划定的禁区。不但《白蛇传》是“宣传蛇精”，敦煌壁画《飞天》是“宣传宗教”，而且下了三条禁令：“古画一律不准画，古装人物一律不准雕，古代题材一律不准做。”把出口传统题材的工艺品说成是“只要外汇，不要社会主义”；把根据国际需要，增加适销产品说成是“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

[注]据叶浅予回忆，中央美院还批过2次“黑画”：1964年社教运动那次规模不大，黑画作者不点名，展览也没公开，只限内部参观。1966年的第二次规模极大，U字楼的教室占满了。罗工柳（油画《独立寒秋》）、黄永玉、叶浅予（《沈家门渔民》、《秦川麦收》），8月23日在黑画展览会场挨了打。罪名是“丑化革命领袖”、“丑化劳动人民”、“毒害青年”，等等。

（参考资料：文化部批判组《一个精心策划的反党阴谋——揭露“四人帮”批“黑画”的真相》，《人民日报》1977.05.22；轻工业部理论组《战胜冰雪严寒 迎来山花烂漫——批判“四人帮”破坏工艺美术事业的罪行》，《人民日报》1978.04.14；《“文革”后期的“批黑画”运动》，“青岛新闻网”2004-09-01[http://www.qingdaonews.com/content/2004-09/01/content\\_3592965.htm](http://www.qingdaonews.com/content/2004-09/01/content_3592965.htm)；小恋《时代的画卷 战斗的艺术——“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观后》，《人民日报》1974.11.26；《叶浅予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 合二而一

被当作对立统一规律（一分为二）对立面，取消阶级斗争、主张矛盾调和论的修正主义而遭致批判哲学观点。

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 1963 年 2 月在给学员讲《唯物主义引言》时，曾引用明朝方以智《东西均》“合二而一”思想，把它作为哲学上对立统一概念的一种表述，“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1964 年 5 月 29 日，《光明日报》发表中央党校哲学教师艾恒武、林青山阐述相同观点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6 月 8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务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给不符合当时“斗争哲学”需要的学术观点，扣上了政治帽子。

康生据此定下“‘合二而一’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合二而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二而一’，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二而一’”基调，密谋部署了一场“引蛇出洞”的“学术讨论”。要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凡持“合二而一”论者，其姓名、地址和单位，一律登记入册，要报送康生和“反修哲学写作小组”，以便“通过各省市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在这场导演的“学术讨论”和批判中，有人发表文章和在讨论会上发言批驳“合二而一”论，也有人支持“合二而一”。到 8 月底止，各地报刊发表文章 90 余篇。关锋化用“撒仁兴”笔名，发表了《“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哲学基础》。参与批判讨伐的，还有艾思奇、王若水、张恩慈、何祚庥、苏绍智、汝信等人。

1964 年第 16 期《红旗》发表了题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的文章，开展政治批判。文章指出，“合二而一”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是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说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论，“是有意识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 年 9 月 24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向中央作的《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给杨献珍强加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等 10 条罪名，并撤销了他的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受这一冤案牵连，有两人被迫害致死，党校受批判者达 150 余人，社会上受牵连者难以统计。

文革揭幕之初，《红旗》1966 年第 8 期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列举“思想文化战线上”“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把杨献珍作为“一撮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党反社会主义狗肉的阴谋家”在哲学界的代表，清算他“反对大跃进”和抛出“‘合二而一’论，为‘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极端反动政治路线，提供哲学‘根据’”的老账。

1967—1975 年，因“61 人叛徒集团案”杨献珍在京郊北京军区军法处看守所被关押了 7 年零 8 个月。

1980 年 8 月 4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中央党校委员会《关于杨献珍同志的复查报告》，为杨献珍和受“合二而一”案牵连者平反，恢复名誉。杨献珍 1981 年出版的《我的哲学罪案》（人民出版社）一书记录了此案。

（参考资料：本报记者《对‘合二而一’的批判是一场政治冤案》，《人民日报》1979.08.21；王若水《毛泽东时代的两桩哲学公案》，《炎黄春秋》2004 年第 9 期；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鸠山

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反面人物典型，身份是日本宪兵队长，战前是铁路医院医生。性格特征是阴险毒辣，文明其表、虎狼其里，伪善的巧言令色、高度技术化的理性和深层兽性的残忍暴戾兼而有之。

他主持侦破北方隆滩八路军松岭根据地交通员向柏山游击队转送密电码一案。

先是以缜密的弹道学、外科学知识，发现受伤的王连举是自戕，由此推断出他是接应中共交通员的地下党；继而萝卜和大棒并举[注]，撬开王的牙关，抓捕铁路扳道工、中共联络人李玉和。他用一纸请柬强令李玉和就范，以叙友情、说佛理、道利害的方式，暗示李要识时务；不成就推出叛徒对质、毒刑拷打，显示出他审讯的智谋和心计。以老朋友身份到李家骗取密电码失败后，把李家三代都抓了起来。以亲子之情和死刑威逼李奶奶劝说李玉和，并在刑场安放窃听器希图在临终遗言的交代中套出藏密电码的地点。杀害李玉和、李奶奶，放走李铁梅作诱饵，想通过跟踪、当其与地下党交接时一举擒获。无奈有群众的掩护帮助，地下党、游击队的接应，终于完成了密电码转送的使命。鸠山也被游击队刀劈而死。

李玉和称“贼鸠山”，不但因为他精通刑侦技术，从王连举一枪的疏漏中获取侦察先机，而且由于他善于利用人性侥幸、畏惧弱点，运造安详假象，突然摊牌，突破心理防线；安排计策欺骗李奶奶，利用亲子之情软化、威逼李奶奶，欲擒故纵放走李铁梅。心思细密，诡计多端。滥杀敌手亲尊的平民李奶奶，也是违反战争法的懦弱行径。

戏剧表现的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狡诈、残忍面前，处于逆境的中共党人仍然机智英勇地坚持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剧本在侵略者和反抗者的对立之外，还引进了中国“穷工人”和日本“阔大夫”的阶级斗争维度。鸠山这一艺术形象反衬出了革命者的智勇无畏，应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俗谚。

饰演鸠山的京剧艺术家袁世海是江青点名的。为了塑造鸠山，他克服了现实生活中找不到日本人物原型的困难，从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发现了日本人的“踪迹”。结合深入钻研剧本，借鉴话剧表演艺术，着力挖掘、表现鸠山这个人物作为大夫和军阀的两面性，把身着和服儒士和日本军装武士的双重角色熔于一炉，成功地塑造了这一京剧舞台上从未有过的形象。

使观众把他当成生活在自己身边的魔鬼和邪恶的化身，憎恨某人的阴鸷、狡诈、强横、凶残时就说“喏，他就是鸠山”。

[注]（给王连举戴上一枚三级勋章勋章）“只要你忠心地为帝国卖力气，飞黄腾达有时机。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就看你知趣（冷笑）不知趣！”

（参考资料：《红灯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7 年版；张广天《从“红灯记”看样板戏与文革意识形态》，“中华戏曲网”<http://www.dongdongqiang.com/zhuanti/ht2-ybx-5.html>）

## 飞鸽牌

天津自行车厂 1950 年试制出中共建政以后第一辆自行车，取名“飞鸽牌”。该车 1954 年飞鸽自行车在首次全国质量鉴定中被评为第一；在以后历届自行车

质量评比中，获国家银质奖、轻工国际博览会系列产品金奖、最畅销国产商品、全国最佳售后服务奖等。与上海“永久”、“凤凰”牌自行车并称为中国三大名牌自行车。

以其坚固耐用、骑行轻快，成为 1960、1970 年代中国工薪族普遍接受、使用的代步工具。可以降低交通费用。上班前大街上自行车流如涌，蔚为壮观。购买需要工业券，在因紧俏而采取配额供应时要通过抓阄方法决定由谁获得优先权。在低工资时代多少带有奢侈色彩。一般人都以能拥有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为梦想、为荣耀。在同期农村殷实人家的男女青年订亲时，成为通行的彩礼选项。

美国老布什总统 1989 年访华时，李鹏总理特意送给他一辆“飞鸽牌”自行车作为纪念。因为 1974 年他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在北京常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入境问俗，寻求友谊。

2000 年代该厂已经改制为天津飞鸽自行车有限公司，日产自行车达 1.1 万辆，年产值达 7 亿元。是全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厂家，产品销往 76 个国家和地区。现有八大系列（28'、27'、26'、24'、22'、20'、18'、16'）200 余种款式，加重车、轻便车、运动车、山地车、公主车、儿童车等，可给予农村、城市不同区域、不同消费群体以满意的选择。

也被用于借指那种不会在某处某岗位上呆很久、迟早要走的人。通常是指在基层、边远地区（市县）、西部、农村工作、插队的干部、知青。他们不安于在条件艰苦的地方长久工作、生活下去。与自行车里的“永久牌”形成修辞上的对峙。

被指“飞鸽牌”的这些人，要承担动机不纯、意志薄弱、品质卑劣、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谴责。他们到艰苦地方去，是一种投机行为，为了给自己镀金、积累个人资本，或被逼无奈的。因为那是一个兴无灭私、高扬集体主义旗帜、让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意志的时代，自外于时代、自外于集体、自外于组织的愿望、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连貌合神离也要受到批评、斥责、惩罚。

尽管“永久牌”始终吸引着媒体的关注，被赋予各式光环，“飞鸽牌”在官方意识形态处于弱势，谁也不肯公然宣言自己是“飞鸽牌”，但在世俗社会“飞鸽牌”的名声并不臭。实际生活中的多数人最后都选择了做“飞鸽牌”，利用能够寻觅到的所有机会，离开西部、离开农村、离开基层，各择环境、物质待遇优厚的良枝而栖。高尚的“永久牌”成为孤独、无奈的少数。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也不是因为理想，而是由于种种因缘际会的限制、阻挠、蹇滞所致。

这是由资源配置的城乡二元格局决定的。肯定个人欲求的个人主义和趋利避害的功利主义战胜了无根的集体主义和虚矫的伦理主义。

这样的紧张，在 2000 年代城市化进程加速，西部、基层、农村人离开本土时，仍然以各种变化形式延续着。只有能够从这些地方获得利益的人，在向那里逆向行走。

（参考资料：伊增朴口述、李莉整理《从飞鸽到捷达》，“京西网” 2002-12-23；风暴《老布什夫妇当年在北京骑自行车》，“春秋中文网” <http://www.cqzg.cn/html/200511/360566.html>；谢新华《“飞鸽”为何飞不到美利坚？》，“中国管理传播网” 2003-12-22 <http://manage.org.cn>）

八三四一部队

中央警卫团在 1964 年到 2000 年的编制番号。

1949 年，新成立的公安二师第四团担任警卫中共中央的任务。1951 年，公安二师更名为警卫师，原第四团改称一团，任务不变。1953 年，负责中南海的一团从警卫师里划分出来，成立中央警卫团。正式使用总参统一编号的番号，称为“总字 001”。1950 年代末，曾更换为“3747”部队。1964 年中央警卫团正式使用“8341”番号[注 1]。

1960 年代中期开始该部首脑即为汪东兴。汪同时还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并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警卫范围有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北戴河等中共中央首脑驻地。毛泽东出巡或中共中央在庐山等地开会等行动，亦由其随侍[注 2]。其行动直接听命于毛泽东、政治局，无需通过总参谋部。

1968 年 6 月 26 日该部领命分别进入北京针织总厂及其所属两个分厂和北京市化工三厂执行军管支左任务。

毛泽东曾有《对八三四一部队支工工作的指示和支工情况报告等的批语》（1967 年 6 月、11 月），指示该部“下去后要切实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

1967 年 11 月 17 日，中共中央将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的来信和八三四一部队报告和毛泽东批语一起印发全国各地、各企业、各机关、各学校，要求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该部从此闻名天下。

8 月毛泽东派该部部队的军人为主体的“军宣队”，与工宣队并行开进清华大学，制止武斗，接管学校。起初 8341 部队政委杨德中为清华革委会主任和党委书记，后由 8341 部队副指挥张荣温接任。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的还有两个年轻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安排的 8341 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迟群和谢敬宜。他们后来留下执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有传说称，“早请示，晚汇报”仪式的首倡者就是该部。庐山会议上汪东兴表态拥护设立国家主席时就使用了 8341 部队名义。毛泽东逝世后 1 月的 1976 年 10 月 6 日中共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时，调动的部队就是该部。

直到 2000 年 10 月“8341”这个番号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而被“61889”取代。

[注 1]关于这个番号有种种荒诞无稽传说：其一，毛泽东年轻时曾参加湘军，被编入湖南新军混成旅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下士。发给他一支汉阳造旧步枪，编号就是“8341”。毛泽东 1949 年后以此作为中央警卫团的番号，暗喻“党指挥枪”的意思。

其二，毛泽东曾到一个寺院参观，寺院方丈送给毛泽东四个大字：八三四一。毛问这四字作何解释，方丈说玄机日后自会揭晓。传说虽已无从考证，但后来北京卫戍区部队的番号确实叫八三四一。这个玄机一直在毛泽东去世后才被揭晓：八三是指毛的寿数（1893 年—1976 年），四一是指毛掌管了中国四十一年（1935 年—1976 年）江山（从遵义会议算起）。

[注 2]其兵力配置有说相当于一个师（8000 人），有说相当于一个集团军（5 万人）。

（参考资料：解玉泉《中央警卫团番号的由来》，“老友报”；钱浩川《天

机还是胡侃，也来解读 8 3 4 1 》；；项宇编《神秘的八三四一》，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 年版)

## 孔老二

文革时期对先秦思想家孔子的代称。因在孔父叔梁纥家的男孩里，孔子排行老二[注 1]。始自 1967 年以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为打击目标的批孔，流行于 1974 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结束于 1978 年夏季以后对把四人帮与孔子联系起来（《评“四人帮”的假批孔》论定“四人帮”是“按着孔丘的钟鼓，跳着林彪的舞步”）的反思。

用前缀“老”加于数词“一、二、三……”前作排行次序来称呼人，在家族内部长辈对晚辈或同辈之间使用这样简化指称方法，有亲切感。但用于一般性称呼，含有轻慢意味。尤其与历来称“夫子”、“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礼数惟恐不周相比，直呼其名、字“孔丘”、“孔仲尼”，已经是不敬；称“孔老二”当然更加是带有强烈贬低、讥讽和否定色彩的侮辱性称谓了。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后，孔子地位虽不复至高无上，但在民间影响变化不大。林彪被清除后一度批极左，毛泽东极为忌讳、不满；认定林是极右。从毛家湾找到“克己复礼”条幅为把林彪与孔子联系起来批判，提供了勉强的根据。毛泽东曾有《七律·读呈郭老》（1973 年 8 月），诗中颔联说：“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用秕糠称孔子思想，评价之贬抑、尖刻，古来罕有其匹。写于 1974 年 5 月的一首五言更称：“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以其地位至尊，这横扫一切的气派风尚，对当时影响自大。

通过妖魔化塑造，迂腐、愚昧、反动、呆板、专制、下流成为孔子的同义词，所以孔老二被当作当时对孔子的普遍称呼。如果谁要仍称孔子，就是无视时代进步、组织定论，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仅此一端，就足以致祸获咎。

时有歌谣：“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红小兵齐上阵，口诛笔伐狠狠批。嗨！”[注 2]曲调简单，易学易唱，流传极广。对于儿童来说，漫画和辱骂，当然比说理更容易使人留下深刻印象，从而起到记忆作用。在有能力真正了解、认识孔子以前，无意识就被这样的儿歌定型，会形成不易纠正的刻板印象。中央党校唐晓文著有《柳下跖痛骂孔老二》。还有评法批儒的对口词、快板、评书故事等创作，被编为《工农兵狠批孔老二（曲艺集）》（32 开，36 页），由辽宁人民出版社 1974 年出版。

以此为题材，当时出版了多种普及性连环画（据称有数百种）：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5 年出版有任梅编、鲁展美绘《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故事》（64 开），2006 年“夫人城旧书超市”以 8 成品相叫价 40 元。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出版顾炳鑫和贺友直绘制的连环画《孔老二罪恶的一生》（60 开，84 页），在“连趣网”（<http://www.my1hh.com/shop.jsp?id=8688>）上有 9.2 品旧书叫价 155 元。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有署名“本社通讯员编绘”的连环画《林彪与孔老二》（1974 年 3 月），初印 10 万，在“红色收藏”网上叫价 145 元。

1980 年代后，此一称呼迅速消亡。自现代新儒家盛行，孔子风光借伟大复兴再现矣。曲阜、浙江衢州、上海、广东德庆、台北、香港、旧金山等地祭孔香烟缭绕，读经（蒋庆）呼声不绝，并有专门网页（中华少儿读经网

<http://www.zhse.com/>) 推出,“全国各地代理现正火热招商”。

[注 1] 老大名伯尼, 又称孟皮; 是残障儿 (有脚疾)。为乃父所不喜。

[注 2] 何蜀版本末句为“大家都来狠狠批”。

(参考资料: 蔡志忠《孔子说·仁者的叮咛》, 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庞朴《评三年来的孔子评价》, 《人民日报》1980. 01. 29; 刘汉民等编《毛泽东诗词对联书法集观》,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冯东航《至爱公仔书系列——30 年前“孔老二”》, 《中山商报》2005 年 11 月 1 日)

## 小将

古代指带兵打仗的年轻将领, 现代喻指有上进心、敢干敢闯而又能干的年轻人。较多用于描写体育运动员, 尤其是 1960 年代获得多项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带有爱称意味。

1966 年文革发动初期, 被用来指称“敢想, 敢说, 敢干, 敢于向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们猛烈地开火”的青年教师、学生。小将前还冠以“革命”修饰语, 组成词组“革命小将”。他们多为自发的分散个人, 是思想激进的勇敢份子。十六条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对这些人 (始自该年 6 月的红卫兵组织尚未公开) 冲决现存秩序的作用充满期待。

在对 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报道中, 小将就与红卫兵联系在一起, 组成固定词组, 从此小将就成为了红卫兵的代称。他们的人群规模达到 1000 万—2000 万。

该词频频见于中央首长讲话、报刊报道、社会日常运用。报刊使用大量褒义词语如“生龙活虎”、“敢闯敢干”、“祖国的希望”、文革的“闯将”“急先锋”、“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旧世界的叛逆者、批判者”……对他们进行积极描写, 称赞他们“最听党的话, 最听毛主席的话, 最热爱毛泽东思想”, 组织工 (国营江南机器厂全体革命职工) 农 (陈永贵) 兵 (黄祖示) 商 (李素文) 先进典型的文章歌颂红卫兵小将。大字报被当作他们的合法武器 (发言方式), “要革命, 要造反”, “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进攻”被概括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把“代表新生力量的小人物”战胜“代表旧势力的大人物”, 蛊惑人心地肯定为历史辩证法, 直至事先许给小将以“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免死金牌”、“尚方宝剑”。有利于调动他们按照毛泽东意图方向进行、推动运动发展。

民间俚语甚至用“毛主席派来的”“天兵天将”形容他们。抄家, 破四旧, 批斗走资派、学术权威, 大串联把炮打司令部的火种散播全国范围……左右了当时的历史方向。

1967 年的夺权使造反派陷于分裂, “派性掩护敌人, 敌人利用派性”这样的负面评价开始出现。红卫兵思想家所主张的造反精神意味着通过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实现社会结构变革, 以反对官僚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响应了继续革命理论, 在现实层面却成了干扰政治整合的离心力量。毛泽东甚至发出“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公开警告。“清查五一六”也是针对小将主体及其干扰势力的。直到 1968 年底、1969 年初,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红卫兵作为文革中政治组织的社会力量宣告正式退出、消亡, 小将用于指称他们的用法也成为如烟往事了。

其后偶尔也被用于指称学校里青年学生的群众组织成员——但此红卫兵(学生组织)已经不是彼红卫兵(造反团体)了。重又恢复到以前多用于描写体育运动员的用法。

文革后,在人们心目和传媒上,他们成了“激情澎湃但又狗屁不通文革小将”,与身着绿军装、臂套红袖章、双手叉着腰,毁灭古迹、文物,打砸抢暴行,虐杀,剪小裤管,剃人阴阳头,挥舞武装带,对人大声恶语呵斥,狂呼口号,残忍暴戾,狂妄无知,怀疑一切,胡搅蛮缠,弓藏狗烹,受蒙蔽,可怜可悲……形象联系在一起。被妖魔化、虚化为恶的化身、符号。于是昧于历史的新生代才会说,下乡、下岗就是他们的报应。

(参考资料:新华社《毛泽东思想哺育的青年勇于大破修正主义思想 革命小将慕振奎前年著文尖锐批判教师的资产阶级观点》,《人民日报》1966.06.20;本报记者《毛主席同红卫兵在天安门上》,《人民日报》1966.08.19;王盛辉《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3期,转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文章选刊” )

## 土围子

用粘土打夯筑成的土围子,10多米厚的墙有10多米高,每个约100—200多米见方不等。取材用料和制作工艺都类似于干打垒,只是规模、格局更大,结构复杂一些。除了城门,四周城墙上没有一块砖。多设藏身洞、枪眼,个别的还有有门卡关防,兼具炮楼碉堡的功能;作为防范兵乱、匪患和宗族械斗的凭借。易守难攻。是地域性准军事防御设施。广泛分布在珠江三角洲、江西、陕甘、东北等地边缘地带。其中既有明清留下的戍守边塞的古堡,也有客家的围龙屋。

中央红军在打土围子时,采用过梯子队、突击队、火力队等战斗编组。八路军在攻打较坚固碉堡土围子时,采用了送炸药爆破的方法,其突击队主要是由爆破组、火力组编成的。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谈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条件,必然孳生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的出现时,使用了取自毛泽东论著的一段关于土围子的著名比喻。“1936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注]并进一步引申说,经济基础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复辟仍然可能发生。因此要在一切领域、一切阶段实行专政,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

土围子作为制度化对抗之外的敌对力量,却对中央红军、中共中央曾造成极大威胁,是一个内涵、外延都很模糊的概念,是一个比喻性的用法。具有极大弹性。但是它一则被置于政治上能造成巨大危害的敌对地位,取得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二则其边缘性又给使用它的人带来自说自话、随意定义的方便,通过这样魔术般变化,它就成了——一根可以呼之即来、运用自如的棍子,供张春桥们自由驱使。实际上是把包括科技领域、民族地方工作、统战工作……把中央和地方一切不听话于他们意志、跟他们指挥棒转的党的领导机关和部门,或零散的各式异见者,都比做“被资产阶级把持着”的土围子,都要一概扫除。

这也反映出当时中国政局的状态:随着毛泽东年事已高,激进文官集团的焦



虑集中于，政治上掌握到他们手中的权力有限，如何有效地向后毛泽东时代过渡，并完整保持毛泽东路线，成为他们迫切的现实问题。尤其是他们作为权力分配的迟到者，对原有权力系统的惯性传统和类似建立在恩主—被庇护人私人效忠基础上某种关系纽带网络的不可渗透性，对这样一种建立在反法制的互利性基础上、封闭性的连环关系结构所具有极强的抗外部干预性，感到挫败。土围子之说，将作为他们的攻坚利器，取得政治扫荡的命名权、控制权，取得攻守的自由空间和时机。一段时期里，这种努力在焦虑、时间的双重驱使下达到频繁、疯狂的程度。

在文革后的清算中，被指控为“‘四人帮’反经验主义和打土围子的阴谋诡计……大喊打土围子……恰恰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革命土围子”。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式的政治表态，没有具体分析、深入探绎，进而触及体制本身的问题、病症。

[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注释：指保安县西南旦八寨。该寨有二百余户人家，地形险要。地主豪绅兼民团团总曹俊章率武装百余人，长期盘踞该寨；红军多次围攻不下。1936年8月红军一面武装围困，一面争取寨内群众，瓦解敌军，12月解放该寨。

(参考资料：辛工《从反经验主义到打土围子》，《人民日报》1976.12.15；萧功秦《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地方庇护网政治》，原载《经济管理文摘》，转自“网上读书园地” <http://www.readfree.net/html/200512/116195.html>)

## 精神原子弹

夸大精神力量，尤其是政治思想工作、毛泽东论述的指导作用的一种夸饰性修辞。1966—1969年是流行高潮，戛然止于1971年。

1962年开始有把军人的勇敢、觉悟和牺牲精神，比喻为“精神的原子弹”。1963年把雷锋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比喻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并把政治思想工作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战士的头脑，比喻为精神原子弹。1964年中国原子弹的试验成功，为这一时代性的传神夸喻注入了新的兴奋剂。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更加把这一比喻发挥到极致：“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出现一个工农兵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

在大跃进夭折、惨败以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浪漫激情并没有受到应有批评，反而由于受挫更加高昂了起来。一方面来自毛武装革命时期每每依靠不屈意志、奇思妙想克服艰险的经历体验，一方面来自他政治窘迫中只能放手一搏的现实需要。借助无法验证的夸喻，获得一种自欺欺人的幻想性自我满足。同时也是为毛泽东迅速膨胀的个人迷信累积论据、不断升温。在政治正确的敦促下，各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创造奇迹的神迹验证被捏造了出来，通过宣传机器反复传播、轰炸：

对毛泽东思想，解放军轮机兵说是最大的“动力”，航海兵说是最准的“罗经”，雷达兵说是“万能雷达”，信号兵说是最好的“望远镜”，枪炮兵说是最精确的“瞄准具”。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特大旱灾也能被战而胜之；文盲大娘（顾阿桃）也能讲出活学活用的大道理；技术不一定比人强的乒乓球运动员也可以战胜对手；“八·六”海战中，头负重伤的麦贤得仍坚持战斗三小时到取得胜利；

只飞了几十个小时的解放军飞行员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消灭了曾飞过几千小时的美国空中双料“王牌”……所有荣誉、花环都被贡献给毛泽东。

负责实际工作的中央一线慑于毛泽东专擅独断（曾被认为是促进了中共成功的体制）传统，慑于纠正毛的做法可能给他带来不快的压力，在林彪鼓吹迷信狂热时，多少采取了放任态度。以换取其对实际工作的放手、支持。其作用是客观上造成一种弥漫于全军、全民、全党的氛围，以信取代思，从而根本上取消思，不许提问、不许质疑，确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使意识形态威权转化为政治威权，以此挟持中央一线跟着毛泽东的拍子亦步亦趋。用惯性取代理性。眼睁睁看着毛泽东把中国政局带向“天下大乱”歧途。就是邓小平曾说过的“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

由此，从认识上说打开了精神（主观）可以不受制于物质（客观）的闸门，从体制上说取消了中央一线制约党主席的权能，精神原子弹在这出惨痛悲剧中充当了绑架、胁迫者的润滑剂、催化剂角色。

文革后，这一套观念运作被概括为主观主义、唯意志论，被认定为林彪、四人帮为达到反党乱军邪恶目的刻意制造的现代迷信，嘲笑着说“精神原子弹炸不死敌人”，“反而误伤自己”，战争实际还是要靠军事理论、战法研究，政治思想工作成了“客里空”。人们理所当然以笑话视之，而轻忽、放过了从中探绎其发生的机制和必然性。

（参考资料：本报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摘要》，《人民日报》1966.01.25；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曾彦修《政治、经济、思想领域都不能再“折腾”了》，《人民日报》1980.06.03）

## 单名风

姓氏后跟一个字的取名风气。

文革的破四旧使人们对旧风俗（传统习俗的恶谥）避之惟恐不及，记录“一家一姓历史”的谱牒被大量焚毁，按照族谱字辈[注]取名的习俗被认定封建，基本消失。以前双名中大量姓氏+字辈+单字的命名方式其实也是单名。这套方式失效、简化后，再加上疏远温文繁缛、儒雅精致，崇尚简易、简单、粗陋的时代风尚，单名的出现概率大增。倒是与其时去个性的雷同化大趋势相一致。

单名干脆利落，感觉就响亮，一个铿锵直扣进别人的印象。可以弹簧卡扣似地一下子嵌进人心。现代以来不少文学大家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丁玲、萧红、艾青、金庸……都以单名传世。叫起来顺口、脆亮，记起来易记。锐化了单名的时尚感，使它成为一种现代意识和文化水准的标志。

有一个统计数字说，从1970到1980年代，京、沪、辽、陕、川、粤、闽等七个省市地区的单名人口约莫有30%以上。而据天津市公安局调查，1970年代以前取单名者不足5%。

有人作过计算，每个姓中被用来取名的常用字共有3000字左右，一些姓氏总数7000万人有3000个名字，这样，平均23300多人共有一个名字。如果考虑到实际情况，这3000字中有的字使用频率极高，所以有些名字将不仅是2万多人共有，而可能是3万、5万乃至10万、20万人共有。单字名的重名率要大大

高于双字名的重名率。国家语委会汉字处在 1984 年的抽查中，双字名的重名率为 22.9%，而单字名的重名率为 54.2%；1989 年的抽查中，双字名的重名率为 32.4%，而单字名的重名率则为 67.7%。

据报道，沈阳市有“刘淑珍”4800 多人，有“王玉兰”4300 多人，有“王伟、李杰、李伟”各 3000 多人。武汉有“王红”1000 多人，天津市有“张力、张英、张健”各 2000 多人、广州市有“梁妹、陈妹”各 2400 多人，沈阳市有“李杰”更达到 3000 多人……重名者多，以致于有一个班、一个单位都会出现同名的人。

因同名同姓给身份识别带来很多麻烦，引起不少误会，造成不便，降低了身份识别的功能、效率。由此引起的是非官司更是不断。最典型、极端的是有报道说南昌的出租车司机和刘祖强因与网上逃犯同名同姓，仅在三个月内，就被两次错捕。

文革十年中，人名用字频率较高时有：红、东、卫、军、兵等象征革命、进步，紧跟时代的字眼，象王红、张军、这类名字，至今仍处处可见。

[注]从北宋兴起的，为了明世次、分经纬，永保同血脉的长存贯通的一种取名方法：凡同宗同辈，都用一个固定的字代表一代辈分，一代选一个字，秩序井然，世次整肃。所选的取名辈字，大都是文武富贵昭德庆祥之类的吉字或“龙凤呈祥”等吉语。辈字命名在民间广为流行，自明清至 1900 年代，随处可见。清王室从康熙开始就按辈分取名：皇子雍正的兄弟们取“胤”字，皇孙乾隆的兄弟们取“弘”字。

（参考资料：王泉根《华夏姓氏面面观》，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桃花《名字这回事》“花雨长巷”；《提倡四字名之我见》，

## 照妖镜

古典文学里神怪小说（如《西游记》）所描写的一种宝镜，能照出妖魔的原形。现代用于比喻能识别坏人的依据和方法。它照的对象是具有魔法的妖魔，经过伪装后仅凭肉眼无法辨别，但在照妖镜的魔力下一照，就只能原形毕露。

文革时指称阶级分析学说、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用革命真理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的认识能力。流行高潮在 1966 年—1968 年，1976 年和 1977 年[注 1]。相似的喻指还有试金石等。

使用这一喻指的前提是，社会上存在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而敌对势力一方阴险狡猾，隐身在革命队伍中，或者是批着学术化外衣，或者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所以从表面现象观察，使用常规认识方法，不能获得关于它真相的知识。只有使用具有特殊功能的认识工具，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认识论，凡事提高到阶级斗争观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高度，才能促使他们暴露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本来面目。

这一喻指的主体，是阶级分析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革命人民、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大批判文章和漫画等，还被冠以“明察秋毫”、“锐利武器”等定语，大力肯定它的强大功能；客体是牛鬼蛇神一类阶级敌人，邓拓、吴晗、孙冶方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刘邓陶等走资派，封资修等旧思想、旧观念、旧文化，还被冠以“定时炸弹”、“妖怪原形”、“阶级本质”等

定语，极力凸现其丑恶、凶狠、卑下、猥琐。政治审判与道德宣判同行。

其实是对随心所欲歪曲、审判对象的欲加之罪的一种文过饰非。196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的社论。那是一套特殊的认识、论理逻辑：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对现实一分为二就是心怀不满，有过国外经历的人就是里通外国，话说历史就是厚古薄今、借古讽今，写人情人性的美好、丰富就是否定阶级性的人性论，曾经被捕就是叛徒，在国民党内、军内或政府干过就是反动派、党棍、特务，强调不违农时抓紧耕作、重视产品质量就是唯生产力论……如此离奇而富于想象力的推导、武断，在当时的大批判、辩论、政治审查中，屡见不鲜、无所不在。夸大对象的某些细节，硬给它派上它本来没有的属性，甚至向隅虚构，完全成了离开事实的自说自话。不需要事实验证，望文生义地瞎联想，主观武断地罗织人罪，无中生有地以人划线、党同伐异、打倒一切，成了当时最时髦的事业。滥用权力，一切为权力的意志、运转扫除障碍，就是文革大批判、认识活动的主要功能。

这样地运用阶级斗争、马列主义，与其说是照妖镜，不如说是哈哈镜[注2]。象哈哈镜一样，能把胖的变瘦，瘦的变胖，高的变矮，矮的变高，俊的变丑。成为望文生义、以偏概全、牵强附会、无中生有、欲加之罪……的同义词。

一位词典编撰者在回忆时说，当时的《新英汉词典》编写要以“大批判”开路（其他词典编写也多类似），把远自牛津、韦氏，近到文革前的各种词典都用“照妖镜”检视一番，深掘出其中的“封资修毒素”。“把帝王将相赶出词典”、“只收毛选英译本中出现的词汇”。在根本不需要设例的名词性词目下，引用革命导师语录；有些词本来只需一个搭配就能说明它的用法，但为了“突出政治”，硬加上“解放前”、“在资本主义社会”等修饰成分。凡是好事，必是“工农兵”做的；如果是消极的东西，为了避免“影射”之嫌，必得加上“约翰”或“汤姆”。所以该书在外电赢得了“一篇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声明”的评语。

2000年代仍有这样的喻指用法：“Google就是一把照妖镜”，“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只要用拥战与反战这面照妖镜一照就黑白立现”，甚至“文革大革命确实是一面照妖镜”。

[注1]据“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资料，1966年该词浮现率占总数的21.28%，1967年16.31%，1968年8.16%，3年和占45.75%；1976年7.45%，1977年5.67。似乎提示着这一喻指对尖锐政治对立、激烈政治变动时期的适应性。

[注2]哈哈镜是由特殊镜面成像造成的。它的镜面凹凸不平，有的部分是凸镜，有的部分是凹镜。凹镜所成的像总是放大的、正立的虚像，离镜越近，像也越大；凸镜所成的像总是缩小的正立的虚像，离镜越远，像也越小。整体的物象被投射到不规则凹凸镜面组合，就给分割组合为歪七扭八的镜面成像。人的脸可能被照得扁圆，上身可能被照得细长，腿可能被照得粗短……活像个“丑八怪”。让人捧腹大笑。

（参考资料：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人民日报》1966.06.20；王敏《词典传奇——新英汉词典的诞生》，“武汉宽带沙龙”<http://adsl.027game.com/dispbbs.asp?boardid=42&id=98125>）

## 阿尔巴尼亚香烟

1960、1970年代流行于中国的两种外国香烟之一（另一种是朝鲜香烟）。有人曾将它与其时流行的古巴糖、伊拉克蜜枣等最令人追怀的舶来品，并称“三宝”。

有“钻石”、“勇士”、“骆驼”、“游击队”、“运动”(Sport)，“斯库台”(SHKODRA)，“列克”(Leka)等牌子。价格多在8分到2角之间。属于工薪族享用的低档烟。  
[注]

外形不同于国产香烟，细长，呈扁圆形，有的还带着过滤嘴。而当时国产香烟都没有过滤嘴。硬壳掀盖包装，状如非一次性的金属烟盒。普通消费者感觉，它的烟盒装潢讲究，外观漂亮，在当时看来甚至有些贵族化；与装帧简单土气的中国烟摆在一起显得十分洋气。但也有行家认为，其实这些烟标的纸质及印刷都比较差，只是由于带些异国情调、视觉上花里胡哨，让经见不多的顾客觉得新奇罢了。

多数人不习惯它干辣的怪味。但由于它的供应不凭票，对烟瘾大的烟民来说，即使价廉物不美，在断档的威胁下也聊胜于无。受到他们偏爱、追捧。因销路不畅，个别地区出现过强行配额搭售现象，烟钱直接从工资里抵扣。在这对劣质香烟的无奈忍受中，也顺带体验到“中国老大哥”某种自我满足的优越感。并且在这样的陪衬下，提高了对供应短缺的现实经济状况的承受力。只有少数有过海外经历或资深烟民对这类雪茄型香烟情有独钟，称它是“正宗的欧洲烤制烟”，“有似登喜路里的Latakia的香味”。这些行家评论说，其实它的烟叶本身并不错的，就是因为卷烟工业水平落后，加工质量不好。

作家陈丹燕曾回忆说，一些上海人喜欢这种类型的香烟。习惯买细长的阿尔巴尼亚香烟来招待朋友，因为它与中国香烟不同的样子，有种时尚的感觉。甚至还被搭便车逃票的人用来向火车上司机乘人员行贿。

由于中国当时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无息贷款，两国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作为中国对阿援助的补偿贸易，当时还大量进口了阿尔巴尼亚的香烟（另外还有成衣）。

1963年，广州商检局在检验保加利亚进口烟叶时，发现有烟草霜霉病，部商检局发文要求上海、广州、湛江商检局（处）对阿尔巴尼亚等国的进口烟叶加强检验。据此，上海商检局先后对进口阿尔巴尼亚及古巴烟叶和卷烟进行隔离，经检验均未发现烟草霜霉病。1964年3月9日四部联合通知《关于对阿尔巴尼亚进口烟叶、香烟采取防病措施》，提出7条处理措施。

2000年代阿尔巴尼亚等巴尔干半岛国家香烟走私猖獗，挤垮了民族卷烟工业，使各国政府财政税收大幅度削减，影响到本国经济和公共服务部门投入。那里的新一代烟民也酷爱进口香烟。阿国烟草制造商协会抱怨说，政府对国产和进口的香烟统一征收相同定额消费税，是对本国烟草产业的“致命打击”，使他们无力进行产业升级。

[注] 根据收入情况，香烟消费被分成四角以上、三角、两角以下等几个档次。是身份、阶层的象征。北京有民谣：“高级干部抽牡丹（五角），中级干部抽香山（三角四）；工农兵，两毛三（指北海牌，两角三一盒），农村干部大炮卷得欢。”军营里有民谣：“团长抽中华，营长抽恒大，连排干部抽阿尔巴尼亚，战士吹喇叭。”

(参考资料: fangkc 《我的邻居韩伯伯》, 原载“故乡”, 转自“搜狐文化”; 《模仿外标的烟标》, “烟标博物馆”; 《中国和亲密战友阿尔巴尼亚是如何决裂的》, 原载“TOM文化”; 《联合国将协助巴尔干国家打击香烟走私》“南方网”《阿尔巴尼亚烟草产业趋于破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 韩爱晶

(1946— ) 江苏涟水人, 北京航空学院发动机系 1965 级学生。生父早年参加中共, 被日本飞机炸死, 母亲是新四军老战士, 继父也是老干部。

1966 年文革中任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总负责人(称“总勤务员”), 8 月 25 日组织去国防科委静坐 28 个昼夜, 要求交出工作组组长赵如璋。同年 12 月在戚本禹授意下赴四川成都挟持彭德怀到北京, 组织大规模批斗, 参与殴打、整黑材料等。在全国各地设有 35 处联络站, 传达中央文革的意向, 协助、指导地方造反派的行动, 上报他们所掌握的情况。1967 年 4 月, 北航“红旗”赴武汉调查组、搜集整理上百页的黑材料, 对后来的“720”事件产生极大影响。同年受指使煽动“打倒徐向前, 炮轰陈毅、叶剑英”。

作为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 先后担任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多次参加五一、国庆庆典, 并登上天安门观礼。体质孱弱、性格内向、性爱思索。北京红卫兵天派领袖之一, 曾被称作蒯大富军师。被指控策划指挥了 1967 年、1968 年的大学武斗; 在北航院内设立名为“隔离室”的监狱 18 处, 致使 170 人受到非法关押, 造成 20 余人非正常死亡。

1968 年被隔离审查。1969 年 11 月被分配到湖南省株洲 331 厂工作, 监督劳动。1970 年再次被隔离, 1978 年 4 月 19 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1983 年 3 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 剥夺政治权利 3 年。在青海共和县境内的塘格木农场服刑, 服刑时曾牧羊、代课教书。刑满后继续滞留了 2 年。

1987 年夏得到当时中共中央常委乔石指示, 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原单位工作, 政治上不要歧视, 生活上妥善安排。他回到株洲工厂技术情报室工作期间, 奉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时, 受邀到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做总经理。几年后, 在他的努力下, 公司债务基本还清。一些大股东们为他的敬业精神和廉洁奉公所感动, 又主动出资注册了一家独立法人的信息网络公司, 交他管理。2003 年, 韩办了内部退休, 继续出任顾问; 抽空研究文革历史, 写回忆录。

1986 年与四川一妹子结婚, 育有一子韩刚。

曾著有《给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敲起丧钟》(《人民日报》1967. 04. 03)、《理想正在变成现实》(《人民日报》1967. 05. 07)。

(参考资料: 《文革五大学生领袖身在何处》, 转自“太原新闻网” 2005-04-21[http://www.tynews.com.cn/whgc/2005-04/21/content\\_909059\\_2.htm](http://www.tynews.com.cn/whgc/2005-04/21/content_909059_2.htm); 《今日韩爱晶》, “人物 ABC”

## 兴无灭资

根据《汉语大词典》的解释, 是“兴无产阶级思想, 灭资产阶级思想”的简

称。出现于 1950 年代后期[注 1]，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大跃进”运动兴起之际。

如果说大跃进是经济建设领域里的冒进蛮干，兴无灭资就是思想政治领域里的大跃进，意欲以此犄角之势呼应、促进大跃进。从概念设计者的初衷看，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成分，兴无灭资与儒家的自觉修身、反省、克己、灭私欲、排斥法治等致思理路如出一辙，使之变形成为中共主流政治文化。此前的一举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与此也不无关系。

曾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的温济泽，1958 年被补充打成右派。其罪行之一就是反对“兴无灭资”。[注 2]当时有人出黑板报时无意间将“兴无灭资”误写为“兴资灭无”，马上给打成右派，送到青海劳动改造。

进入 1960 年代前期，随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被当成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兴无灭资”出现的频率高起来，逐渐成为挂在人们嘴边的口头禅。1960 年代明确地把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规定为：“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文革前夜的文艺批判、学术批判都是在兴无灭资名义下进行的。有些滑稽的是，连 1958 年写了《兴无灭资，发展历史科学》的翦伯赞，也被当作“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史学方向”的挂帅人物之一，视为“资产阶级思想”、“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受到戚本禹等人批判。

到“文化大革命”中，“兴无灭资”更是达到极致。1966 年夏秋之际，全国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制造“红色恐怖”，就是以“兴无灭资”的口号作开路先锋。《红旗》杂志 1966 年第 8 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在规定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后，紧接着说“这是在上层建筑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兴无灭资’的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可以看出，“兴无灭资”就是前面“三个横扫”的总概括。

文革中一些造反组织以“兴无灭资战斗队”为名。小孩取名也紧跟时事叫“兴无”；文革后为了抹去过去的时代痕迹又保持一贯性，易为“兴芜”。不准穿小裤脚，看见了就要用剪刀剪，烫花式发型，看见了就要剃阴阳头；喷香水抹珍珠粉也是资产阶级的，抓住了就要批判斗争。

有研究（金大陆）认为，这一意识形态口号甚至起到了抑制离婚率的作用。因为当时整个社会在道德层面上，对“离婚”持强烈的负面评价。所以舆论机器极力宣传“美帝”、“苏修”的离婚率高，说明他们的“生活腐朽”。个人的离婚理由（性格志趣、经济家务、习性情感等出现裂痕）一旦公开提出，立即就会被戴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标签。人们因此不敢轻言离婚。1966—1976 年的 10 年间，上海市总离婚登记数只有 6489 对。全市只比虹口一个区 1953—1959 年的年均离婚 366.9 对多 282 对（1.77 倍）。

1980 年 5 月在 XX 部举行的第六次理论座谈会上，绝大多数与会者指出“兴无灭资”是一个“左”的口号，危害甚大，应该废除。会议内容被整理为《“兴无灭资”口号最好不提》的文章，刊登在《理论工作简报》增刊第 3 期上。

文章指出，这个口号的概念含混，因为“无”可以理解成“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思想”；“资”可以理解成“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资本主义文化”、“剥削阶级思想”等等。“灭”就是“消灭”，谁战胜谁，“你死我活”。本来，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复存在，

资本主义也没有现实基础，再提“灭资”已无必要和现实紧迫性。

“兴无灭资”就是凡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定是“资”的东西，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加以消灭。因此，这一口号很容易被一些人利用去搞极左。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的理论基础就是兴无灭资。“灭资”的结果，是许多所谓的“走资派”、黑五类等生命个体从肉体上都被“消灭”了。当知识分子被认定是资产阶级的，那些年来“灭资”也就变成了“灭知”，对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文章指出，对资产阶级思想，马克思用“改变”，毛主席用“纠正”、“改造”之类的字眼，还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因为思想是人的大脑的思维功能，不能简单地“消灭”。而且它很难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张春桥的“全面专政”论划清界限。考虑到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现在这样的口号更加不合时宜。

但是，这一概念还是从清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个坚持、预防和平演变等口号和实践中，不断浮现出它的或隐或现的面影。

[注1]在“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里最早见于1958年。当年该词浮现率以71次，在总计613次中达到11.58%。该词浮现率1964年为19.25%，1965年18.11%，1966年25.53%。随后即显著失宠，但并没有退出意识形态话语框架。直到1979年出现以商榷为标志的“拐点”，开始被列为左的思想政策的标记特征，逐渐失去合法性。

[注2]温认为“兴无灭资”是对国内进行的教育，对外广播不宜照搬。因宣传对象中就包括资产阶级，我对人家说我要灭你，人家还愿意听你的节目吗？人家连节目都不听了，你又能宣传什么？宣传给谁听呢？

(参考资料：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红旗》杂志1966年第8期；石健《思想工作必须适应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关于“兴无灭资”讨论的一些看法》，《人民日报》1979.10.10；《兴无灭资●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网易”“评论频道”

## 割资本主义尾巴

从“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材料看，该词最早见于1957年。联系统购统销和合作化，否定“贩鱼秧、贩牛、贩木材”的私人经营，认定“商业投机”和个人致富思想是“资本主义尾巴”。后来把政策允许的农村自留地、家庭农副产业、集市贸易、个体私营手工业、因公私合营而拿定息的前业主，都归入了资本主义尾巴。

既然身子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头脑和经营活动的尾巴还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会给资本主义复辟留下一条路子。按照这样的概念设定、认识逻辑，所以要动刀子，把留在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去，全身毫无保留地进入社会主义。

文革中在全国范围农业学大寨的强力推动下，有“只要路线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等思想指导，不少地方强行收了社员的自留地，还规定了许多“土政策”，不准社员上山采集野生植物，不准私人编织制品出售，不准私养母猪，不准自留地种植生姜、药材等经济作物，不准在房前屋后种植果木。除规定一系列的禁种、禁养、禁采外，还采取见鸡杀鸡，见鸭杀



鸭,半夜摸鸡窝、撒药杀鸡等手段“割资本主义尾巴”。同时还定期检查和丈量农民的自留地,看看是否偷偷扩大了面积;检查农民私人喂养的猪、牛、羊是否超过了规定的头数(部分地方甚至干脆不许农民私自喂养牲畜);检查农民是否偷偷跑到“自由市场”作小买卖(部分地方甚至干脆取消集市贸易);检查农民是否偷偷从事补锅、修车、缝纫等个体劳动……让农民一直处在被割尾巴的恐惧中。

据《上海工商社团志》记载,全市公私合营企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律改为国营企业。各级工商联被视为“资本家的组织”,勒令停止办公和活动。工商联所有的房屋普遍被侵占。工商界人士的职务安排无形中被取消,定息停发,银行存款被冻结,工资被扣被减有的甚至停发,家庭财物被查抄,私有住房被占、被没收,还有些人下放改造,下车间劳动。

虽然从中央到地方一些负责实务的领导人及部分新闻报道,批评上述做法混淆了政策界限,把自留地、家庭农副产业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在实际执行中,不少人出于人情或保护经济活力等原因睁只眼闭只眼,开后门留小路,任一些从事裁剪、医药、书画装裱、自行车修理、家具制作的个体劳动者,也纷纷采取“单线联系”、“上门服务”等方式,悄悄在“地下”运行……但宁左勿右的政治正确惯性还是大行其道,仍然无法阻挡整体思想、政治、经济路线的左倾和它带来的巨大弊害。

1978年以后,割资本主义尾巴被指控为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动谬论,实行极左路线,搞穷过渡,破坏农村经济政策的罪行,遭到火力集中的批判。为从政治上搞臭四人帮,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做了舆论上的动员、准备工作。但在当时仍然附加了一系列保留条件:只要保证完成生产队和国家规定的各项任务;在集体劳动以外的时间依靠自己力量及家庭老幼辅助劳动力;不搞投机倒把,不破坏国家资源……在这样的前提下经营家庭副业,就是正当的,就不是发展资本主义。

这些“但书”后来也被发展的实践所否定,而代之以更宽松的市场调节。

(参考资料:江夏、林晰《富裕中农和社会主义——在湖北黄冈县刘介梅所在农业社所作的调查》,《人民日报》1957.11.28;新华社特约记者《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人民日报》1978.04.21;《上海工商社团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马立诚《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年版)

## 一碗水端平

比喻在是非评价、事务处分、利益分配等环节上,对相关各方一视同仁,不偏向、偏袒任何一方。这是1967年初以后,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介入地方文革的解放军干部的要求。以前被命令约束不得干预地方的军队,现在被赋予了取代地方政府职责,防止社会陷于瘫痪的权力。

一碗水端平,是一个搁置、取消是非判断的政治要求。而文革时期人们认识事物的特点是,必须在拥护和反对毛泽东革命路线之间分出一个阶级、道路、路线的对错来。尤其是围绕打倒走资派以后的权力分配,让政治权欲急剧膨胀的派性组织领袖们杀红了眼。这样必须达成的要求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目标。

这就要求军队在互相矛盾、冲突的群众组织之间,扮演一个调停、裁决者的角色:要调查研究,解放可以工作的干部,保证电信通讯、运输等要害部门正常

运转，恢复生产，严守中立，化解矛盾，制止武斗，促成地方不同派别组织之间的大联合，建立新的地方政权革命委员会，所以不能偏向其中一方——“支左不支派”。对双方群众组织的评价上，不分亲疏，不能有褒贬；组织革委会时，名额分配上不能有偏向，双方对等（但实际操作上，围绕两派队伍大小的估计，和与之相关的名额分配、职位分布，常常争吵不休）；制止武斗时，不能拉偏架，貌似不偏不倚，实则护着某一方——甚至在武器装备（机枪、冲锋枪、弹药、手榴弹）上明抢暗送，帮助一方出主意，或在支持一方有利时放纵，不利时雷厉风行地出面制止，收缴枪支武器。

而实际上，一，军队有自己的指挥系统和历史，不可能是超然、完全没有立场的第三者（通常与驻地原党政系统及其负责人有较好关系，并同情保守派），二，执行稳定地方秩序的过程中，总要与他们认为有利于稳定的力量合作，而对稳定持冲击态度、意欲改变现状的一方就会军方形成对峙、对抗。只有少数政策水平高、地方冲突相对缓和的部队，能跳出具体的是非、恩怨纠缠，大致做到不偏不倚，多数都带上了支一派打一派的色彩。有的还先后在“对保守组织实行瓦解”、“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等互相矛盾的主张之间摇摆。即使是主观上想要尽量客观公正，实际上还是免不了有意无意地带有倾向性。陈再道所辖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被毛和中央文革小组认定是支持保守派，七二〇事件后百万雄师一派又受到全面压制、残酷打击。

连同是解放军的野战军和地方军区由于直属军委和地方领导的分别，都常常有不同的倾向以至冲突，遑论他们与地方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直接受命中共中央的26军政委程世清改组江西军区，率76师和坦克团赴抚州收缴被抢枪支，受到被指责为支持保守派的当地军分负责人夏绍林指挥的部队和基干民兵武装伏击，死5人、伤57人。被毛周定为“军事叛乱”。

一碗水没端平就成了不满一方群众组织的指控，端平了一碗水就成为军方和得利群众组织一方的辩护词。当双方群众组织都不满意时，“和稀泥”就成了双方共同的指责。

（参考资料：傅怀锋《鄞县地方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年11月号；杨国宇《将军军管日记（1967—1969）》，《天涯》2000年第五期；《藏在角落里的历史：林彪死党程世清》，“搜狐新闻”

## 掺沙子

1980年代以前农村建简易住房打土坯垒墙的一种工艺程序：在泥土里要掺上一定的沙子和少量的麦秸和稻草，增加泥土的附着力，减少土坯裂缝现象。或者栽种农作物、花卉时，在较肥沃的腐殖质土中掺沙子，目的是为了增强土壤的透水性，避免积水，防止植物烂根。

这种民间建筑工艺和农业耕作土壤改良技巧，曾被毛泽东借用来喻指治理党内、军内“山头”割据的政治策略、管理技巧。

1969年从来没有在林彪领导下工作过的李德生调中央工作，被毛泽东派到林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注]工作。属于同样情况、先后派出的人，还有李先念、纪登奎、熊向晖、张才干等。这样的做法，表明了毛泽东对林彪有疑虑，不信任军委办事组，因为林彪嫡系（四野）的人太多，“土太板结了”，就如同当年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一样。害怕这样的情况会导致权力的失控状态。引

进不同派系（异质）的外来人，可以产生组织内互相猜忌、牵制的作用，虽然意见分歧降低了效率，却加强了控制。这样的谋略被称为“掺沙子”。

1971年毛泽东南巡时，对各地诸侯谈及庐山会议、林彪的严重情况，有意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特地讲起了他采取的政治谋略，以期打草惊蛇、敲山震虎。8月27日就提到其中就有“掺沙子”一招。用欲言又止、引而不发（“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称“第九次路线斗争”）的办法，为清算林彪进行铺垫，制造舆论和战机。

这样的方法以前也有过。毛泽东在井冈山时代，派给王佐、袁文才、李文林、董振堂等部的，是做政治工作的何长工和军事培训的陈伯钧。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二人还被派向了张国焘部做沙子。1939—1941年，毛泽东将陈伯达（由马列学院教师而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胡乔木（由政治局秘书而中央宣传部部长）、艾思奇（边区文化界协会主席）、何干之网罗在身边，将自己的影响力逐步渗入到由留苏派控制的中共理论宣传教育部门。将整风“学习运动”引向纵深地带——为开展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直接向王明等控制的意识形态主导权发起挑战，制造清算留苏派的炮弹。

引申开去，所有通过改变组织机构人员结构，注入不同于原有班子的新因素，达到改变某组织的力量对比、改变其性质、方向之目的的办法，都可以称之为“掺沙子”。核心是打破单一政治势力集聚，从不同派系的制衡中寻求控制权。文革中把派军宣队、工宣队、农宣队到学校、科研院所、文化部门进行领导，甚至上讲台，工农兵上大学的做法，称作“掺沙子”，以图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毛泽东语）等上层建筑的情况。被当时大张旗鼓地宣传为文革的新生事物。

文革后批判四人帮把他们的人派往中央各要害部门的做法，也叫“掺沙子”的阴谋。杨绛记叙与邻里林非（原名濮良沛）冲突的文章（《从“掺沙子”到“流亡”》）里说，“让‘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的家里去”的一项“革命措施”，“据我后来得知，这叫‘掺沙子’”。“‘沙子’其实只是需要住房的人，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因此加入革委会或学术组织的造反派，文革后有被称作掺入的沙子的用法，含贬义。

[注]1967年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的，是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1968年3月由黄永胜、吴法宪任正、副组长，成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当时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会。

（参考资料：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人民日报》1974.12.19）

## 葛洲坝

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简称。位于湖北宜昌市境内、长江三峡出口南津关下游2.3公里处，离上游后来建设的三峡大坝约38公里。工程为闸坝式径流发电与航运工程。

枢纽除具有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外，主要任务是担负三峡水电站的反调节，

以解决三峡电站不稳定水流对其下游航道及宜昌港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同时，抬高水位，使大坝上游水位提高 20 多米，向上游回水 100 多千米，淹没三峡大坝下游至南津关河段的险滩，降低这一河段的水流流速，改善水流流态，加大航道尺度，以改善这段峡谷河道的航行条件。

从规模和效益指标上看，葛洲坝工程基本可视为三峡工程的缩影。其坝顶高程 70 米、全长 2661 米、宽 30 米，正常蓄水位 66 米，水库总库容 15.8 亿立方米；开挖回填土石方 1.13 亿立方米，浇灌混凝土共达 1113 万立方米；有两座水电发电厂分设在二江和大江上，共装机 21 台，装机总量 271.5 万千瓦，年发电量 157 亿千瓦时（所发电能供应华中、华东电网）。而三峡工程坝顶高程 185 米，正常蓄水位 175 米，水库总库容 393 亿立方米；水电装机容量 1820 万千瓦，年发电量 847 亿千瓦时。

大坝由船闸、发电厂、泄水闸、冲沙闸及挡水大坝组成。有两座单级船闸和两条航道（渠化航道 110—180 千米），可通过万吨级的轮船，为当今世界最大船闸之一。

由于牵涉面大、问题多、反对意见大，三峡工程处于停顿情况下，其设计功能本属三峡工程的反调节水库，只能后于三峡工程修建的葛洲坝水库，在湖北省和水电部的坚持下，1970 年底 12 月 26 日毛泽东批示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原预计 3 年半发电、5 年第 1 期竣工的建筑工程，实际从 1971 年—1988 年历时 18 年（1972 年—1974 年中断 2 年）。1981 年实现截流。预计总投资 13.5 亿元，1988 年竣工时总投资 48.48 亿元，是原预算的 3.6 倍。

工程开工近 2 年后，1972 年由于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泥沙淤积碍航未解决等），周恩来主持葛洲坝工程会议，宣布大坝主体工程暂时停工，修改设计。因有毛泽东题词“赞成修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违规操作的水利部被免于追究责任。

由于该工程占用了大部分水电建设资金，许多急待开工的水电项目（如龙滩等）就只好靠边站了，许多在建工程也都因投资紧张而拖延工期。

这一工程被反对者批评为“违反基建程序仓促上马，花钱很多，发电效果又差，对航运也不利，遗祸无穷”。更严重的是作为规模庞大的实战演练，制造了一支 10 万人的施工大军的就业问题，人为地造成了一种三峡工程非上不可的客观态势。连一贯主张实用主义的邓小平也说要从政治上考虑，“轻率否定三峡不好”[注]。

[注]邓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披露时被删去“我赞成低坝方案”一句。该方案指的是 150 米坝高方案，因库容无法满足防洪要求被突破。论证三峡工程时这种大头在后的钓鱼谋略，在坝高、预算等方面一用再用。

（参考资料：《三峡工程与葛洲坝有什么关系？》，“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5/30/content\\_896769.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5/30/content_896769.htm)；李锐《对历史负责到底：回忆三峡工程上马过程的始末》，《当代中国研究》1999 年第 3 期；王维洛《邓小平理论和长江三峡工程》，转自“《中国报道周刊》”，<http://china-week.com/html/00307.htm>）

## “土豆烧牛肉”

匈牙利家常名菜“古拉希”的中文音译。做法是把牛肉和土豆加上红辣椒和其他调料用小陶罐子炖得烂烂的，汁水浓浓的；然后浇在米饭上，很好吃。除了牛肉外，还可以用猪肉、鸡肉、羊肉来做。匈牙利菜肴在欧洲很有名，欧洲人常用“古拉希”来称赞匈牙利饭菜，就像用“北京烤鸭”来称赞中国饭菜一样。

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时，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讲话说，到了共产主义，匈牙利就经常可以吃“古拉希”了。把共产主义与具体物质形态联系在一起，在国际共运史意识形态运作上是有传统的，例如列宁即曾有共产主义就是电气化加苏维埃的比喻。

曾预闻该词中文定名的王殊 2000 年代撰文回忆说，《参考消息》编辑当时担心如果直译为“古拉希”，中国读者不知是何物，而在后面加上括号注解又嫌太长。吃过这道菜的驻外记者说不过是土豆烧牛肉罢了。经商量决定译为“土豆烧牛肉”。推敲起来，这个译法不太确切，没有表达这道菜在匈牙利菜肴中的代表性和广泛性。[注 1]王殊认为，赫鲁晓夫的话只是取悦匈牙利人的玩笑之词，并非说共产主义的标准就是大家都能够吃上“土豆烧牛肉”。

美英领导人评论说注重物质生产和文明现象的出现，说明共产主义阵营里温和势力的抬头（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比战争共产主义好”（英国首相霍姆）。

九评概括说，赫鲁晓夫把共产主义说成“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预言社会主义将通过和平竞赛战胜资本主义。

“不是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看作是争取自身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斗争”，而“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有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庸人社会”。“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商标、招牌和广告”。

土豆烧牛肉于是成了反修防修运动中妖魔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以此歪曲苏联领导人重视物质生产、和平竞赛思想，讽刺他们目光短浅，抨击他们篡改、修正马克思主义，并把社会主义庸俗化。“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完全适应美帝国主义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需要。”

在文革语言中，更描绘“苏联大搞‘物质刺激’，钞票挂帅，大搞福利主义……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所侵占，贫富越来越悬殊”，嘲笑他们“本国各种商品奇缺，不得不用进口商品装潢门面，这已经成为苏联市场的特点之一”。断言“土豆烧牛肉”的“经济主义是工人运动的腐蚀剂”、“贩卖的是假共产主义的黑货”、“奴才的‘幸福’”。成为用否定形式论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合法性的方法之一。1976 年发表的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里有“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这一比喻再次风行[注 2]，成为嬉笑怒骂的修辞利器。

文革后，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小康定义发展目标，本质上与赫鲁晓夫当年思路一致，时间上晚了 20 年。

[注 1]就如把火锅翻译为“辣汤烫毛肚”不准确一样，虽然“辣汤烫毛肚”也是火锅的特色、主菜之一。但鳝片、鸭血、鸭肠、牛肉、猪脑花和金针菇、莲白等小菜都是火锅的好材料。况且火锅还有清汤的吃法。

[注 2]“人民日报”49—97 数据库”提供的材料，这年该词的浮现率为 39.19%。另一个峰值是在 1967 年，为 17.57%。

(参考资料：新华社《奥地利马列主义者刊物〈红旗〉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巴西反动政变惩罚了和平竞赛神话“土豆烧牛肉”不能代替社会主义革命》，《人民日报》1964.05.03；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07.14；王殊《“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的由来》，《党史纵横》2006年第4期；《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 七二一指示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注]，并加编者按。编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短短的一段话却涉及到了办学的学科类型、学制、主导思想、学生选拔、教育方法、使用等范围广泛的重大问题，绝非一时兴起、随意说说，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该指示是“五七指示”的具体化。但较之“五七指示”谈论社会模式的广泛性，更专注于教育问题本身。强烈暗示了毛泽东对17年大学文科教育的不满，因为它的教学内容和作用主要是传播剥削阶级文化而不是无产阶级文化的，那么在毛看来当然不能支持它发展，甚至应该暂停大学文科教育。

它贯彻了毛泽东1949年以来一以贯之的教育思想：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强调教育的政治和社会教化功能；在教育与党的领导问题上，强调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权；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上，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教育目的上，强调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在教育对象上，强调受教育权的平等（大中小学、全日半日制、国民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办学模式可以多样化，公办民办厂办等办学体制可以多样化）。成为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主要思想资源之一。

尽管毛泽东重视教育公平，关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普通工人、农民）的教育权利；但他想要打破、超越“文化资本”积累，用“革命”手段使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群体实现翻身式突变，这一努力却并不成功。他否定了相对而言最为公平的统一考试制度，又未能提供更为公平、有效的做法，文革取消高考制度之后，免试推荐制度演变为严重的权力交易，使公平竞争荡然无存，实际上损害了大多数人的教育权利。而对家庭出身、以及产业工人、贫下中农这种社会身份的痴迷，其局限性显而易见，同时导致了对非劳动人民子弟的教育权利普遍的剥夺，又制造了另一种不公正。

它鼓励学生参加实践，联系实际以矫正学校教育的弊端，作为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补充，有现实的针对性。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设计，没有将教育改革建立在符合教育规律的理性基础上，而是基于一种空泛的理想主义，企图培养一批“亦工亦农、亦军亦学”的新人，以实现“知识份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这固然是“乡土”的，却远离了“现代化”的目标。在实践中引起了一系列混乱、损失，造成了人才培养的断层。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确地去理解。……但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恐怕不能这样办，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来没有讲过大学不要保证质量，不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不要出人才。”技巧地绕过了对“七二一指示”的正面评价，而直接致力于与现代教育规律契合的制度建设。成为文革后系列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起点。

[注] 调查报告中说：文化大革命使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政治上臭了，技术上的纸老虎原形也暴露无遗。在谈到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时，调查报告说：实践证明，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比来源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要强。由此，调查报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强调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组织现有技术队伍参加革命大批判，批判“专家治厂”、“技术第一”、“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并组织他们分期分批去当工人。

(参考资料：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教育革命”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王红升《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人民网”<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1106198&typeid=17>；杨东平《教育公平的理论和在我国的实践》，《东方文化》2000年第6期)

## 七二一大学

被当作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新生事物的厂办工人大学，是“对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有力批判”。

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为贯彻“七二一指示”，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根据本厂需要设磨床专业、经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工人52人入学，学制2年（后延长了10个月）。学员平均年龄29岁，文化程度从小学到高中不等。“七二一大学”设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专业等课程。结合本厂典型产品或科研课题，重新组织课程，自编教材，自选教师，按生产程序分阶段进行教学。学员全脱产学习，但仍参加工厂政治运动，定期回车间劳动。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

1970年7月21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一所新型的厂办大学——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调查》。此后，七二一大学逐步向全市工厂企业推广。至1974年上海七二一大学发展到176所。1975年6月，教育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联合在上海召开“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称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要求“大力、迅速、扎实地发展和办好七二一工人大学”，“运用这些经验来改造普通大学”。当年，上海的七二一大学发展到1142所。1976年，七二一大学已达2111所，在校学生12.4万人，平均每校只有学生59人。

而在全国，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以至短训班等，统称“七二一大学”；此类学校规模学达到1.5万所、学生78万多人。七二一大学未能遵循教学规律办学，入学、毕业都不考试或开卷考试，整体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绝大部分七二一大学名不副实，学员实际只有中等文化程度或中等专业水平，有的更低。所以有的称“大学”，有的就模模糊糊称“学

校”。

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时说：“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是一种形式，不是唯一形式，不能代替大学。”“不懂数理化、外语，还攀什么高峰？”成为当时空谷足音的批评。

文革后，对七二一大学进行了全面整顿。有的改为职工业余中学、职工中专或技术培训班，有的局、公司将本系统的七二一大学撤并或停办。1978年3月20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办好七二一大学的几点意见》下达，对七二一大学进一步整顿，不少系统把厂办的七二一大学集中合并，由局、公司主办。经过两次整顿，七二一大学改善办学条件，健全教学制度，提高教学质量，逐步具备高等专科学校的要求。1980年，一些局、公司和大企业办的七二一大学按照国家关于高等学校的规定履行审批手续，正式成为高等专科学校性质的职工大学。如广州市城建职工大学的前身就是广州市建设局“七二一”工人大学。

学者认为，作为厂办职工学校，七二一大学是国内外历史上都有过的职业教育形式的别名或变形——1965年全国就已有职工业余中学502万人、业余中专351万人、业余高等学校41万人（学校964所）。为了满足打倒刘少奇的政治需要，才把“两种教育制度”批判、砸烂了。61626所、443万学生的各种职业技术学校一扫而光，大批中等专业学校裁、并、迁、散或改为普通中学。前门扫出去的和后门迎的东西是同样的，却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把一种刘少奇曾大力倡导的教育形式，当作批判刘少奇路线的产物……把一种早已有了科学分类和明确分工的学校体系，变成一种在生员、学制、教材、学习内容、学习方法、领导体制等方面混乱不堪但却阶级色彩鲜明的”工具。

但仍然应该看到，它还是在当时教育荒芜条件下为一些原有基础较好，肯学、善学的学员提供了有限学习机会，多少缓解了当时人才短缺的迫切问题。他们中的部分人通过日后各种形式的继续学习、曲折成长和坚持不懈的辛勤工作，成为了工厂生产、科研的骨干。画家丁方曾自述有上七二一大学经历。

（参考资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教育革命”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上海工运志》第二十篇职工教育 第四章高等教育 第二节职工教育）

## 武斗

与文斗相对，文革中使用暴力（制度性强制力、肢体武力和组织起来的军事力量）进行的斗争。

第一类武斗的对象是个人——派工作组时的揭批学术权威、右派学生、黑五类牛鬼蛇神[注1]，后来的走资派，再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时的五一六等，形式有体罚、人格羞辱的剃阴阳头，和赤裸裸的挂黑牌子、坐喷气式、游街、抄家等揪斗。第二类武斗的对象是群体行为，指“保皇派”垮台前后、大联合到革委会成立前后，群众组织之间围绕观念和权力分配展开的有组织的冲突、对抗，动用武器从徒手的推搡而棍棒、钢钎、砖石、高压水龙，到常规武器的枪炮直至坦克、兵舰。

十六条规定禁止的武斗，指的是第一类武斗。多表现为肉刑、私刑和牛棚等非法羁押。典型的有学生打老师，西城区、东城区纠察队以暴易暴的武斗、私刑，



北京大兴县、河南道县、广西对黑五类的滥杀“灭门”。是得到最高领导默许的暴力[注 2]，其功能是社会动员和冲击、摧毁既存党政体系的秩序。因为他认定这一体系、秩序的控制权已经不在他的手中。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原则，不但不能制止武斗，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它。其起止时间贯穿整个文革。既有自发的、群众组织的批斗，更多的是组织下的批斗，在单位党政组织下井然有序中进行的武斗。仅清理阶级队伍这一个运动就死了 50 万人[注 3]。

第二类武斗中典型的有 1966 年 12 月 28 日上海康平路事件、1967 年 1 月 26 日新疆“石河子事件”、山西长治地区武斗、四川武装支泸（跨地区武斗的典型）和重庆武斗。主要集中在 1967 年初到 1968 年中期。求同存异、团结——批评——团结的模式，没有提供权力整合的政治功能，所以造成武斗的迁延不止。覆盖标语、大字报，争夺、抢砸广播器材，是武斗初级阶段的诱因。大规模集会、游行行进中的冲突，是武斗升级阶段的诱因。到武斗的白热化阶段，就不需要任何理由了，一次冲突自然成为下一次冲突的契机。

虽然第二类武斗冲突的规模大、动用武力（武器）的级别高，但造成的死亡人数 30—50 万，不及第一类以个人为对象的武斗（死亡 150 万—170 万）[注 4]。尤其是基本没有或极少出于恐惧和维护尊严的自杀发生。

对此《人民日报》评论员说，武斗严重地干扰了斗争（亿万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大批判、大斗争）的大方向，妨碍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影响和破坏生产，破坏革命的秩序，破坏国家财产，危及人民的生命安全。1967 年 5 月 15 日发布了毛泽东批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制止武斗的《重要通告》。6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 7 项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9 月 5 日四机关发布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与此矛盾的是，8 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武装左派的决定”上作了肯定批示）。1968 年 7 月 3 日、24 日四机关再次连续发出制止武斗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

一般所说武斗，多指第二类武斗。按徐贲的研究、分类，第一类武斗可称为形式性个人暴力，第二类可称为非形式性集体暴力。作为第一类武斗的对象，一切成分不好者都成了当然的“坏人”，而一切坏人又都是“牛鬼蛇神”。“以革命的名义”的口号使它获得了合理的形式性：通过“我们”—“他们”关系定位的思维方式，把“坏人”贬抑为“非人”，“敌对性意识形态”直接为迫害性暴力提供合理依据。“上纲上线”使这类暴力成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

虽然红卫兵组织成员穿军装，戴军帽，佩红袖章，组织称“兵团”，首领称“司令”，行动称“战斗”，但这种军事话语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组织意义。所以它是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非形式性集体。当以打倒走资派为行动目标时，它的暴力获得了形式集体性。而当它以自己夺取权力为目标时，第二类武斗成了最典型的非形式集体暴力。毛泽东无法正视它与夺权的联系，和非程序政治斗争获取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只好避重就轻地批评桌上握手、桌下踢脚和虐待俘虏[注 5]。

[注 1] 解放军报的一篇文章把“燕飞”（又称“喷气式”）的发明权归到王光美名下，说文革武斗根源在桃园经验，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主张”。而对资反路线的指控之一，就是“他们搞武斗，镇压造反派”。

[注 2] 毛泽东对宋彬彬的名言“要武嘛”，并非直接鼓励使用武力；而是说不必彬彬有礼、墨守成规，要敢于冲破一切现存的神圣秩序。但是一——当然，如果需要使用武力才能达成这一目的，在毛那里它并不构成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

此前的 1966 年 7 月 29 日人民大会堂宣布撤消工作组，邓小平传达毛泽东指示：“好人打坏人，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也不要打人了。”

[注 3]据丁抒《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的估计。包括通过法律程序的“合法”滥杀。

[注 4]同注 3。

[注 5]极端表现是枪毙俘虏，参见注 3。

(参考资料：《制造武斗的祸首》，《解放军报》1967.09.13；丁抒《文革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徐贲《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和暴力》；《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武斗关系考》，“剑虹评论网”；郑德荣等编《新中国纪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 左、中、右

以政治立场为标准对社会人群的一种分类。指倾向革命和进步的、采取中间态度的以及倾向反动的和落后的不同人群、派别、集团。毛泽东习惯使用的概念。见《做革命的促进派》：“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它既指一种对人群进行分类的标准、方法，又指一个分类过程、分类结果。既是一种衍生-渗透力极强的政治观念，又是一种广泛、可怕的政策实践。

1957 年把这种人群分类、政治分野提高到一个非常高度，定义为“敌我矛盾”——“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他们的政治表现往往与“猖狂进攻”联系在一起，要求对其应该“打退”它。对右派，“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尤其是对右派的全面定位、禁制，成为 1957 年及其以后中国社会一次次激进转向、分裂的基础和推动力。

比较而言，先进（进步）、中间、落后的称谓更中性、温和一些，左（革命）、中、右（反革命）有更多、更浓的党派色彩，带有社会分裂以至于社会对抗的意向倾向。

这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凡有政治运动之来，总要根据工作表现、政治表现和历史状况，由组织、领导者先把单位人群按左、中、右排队[注]，以确定骨干、依靠力量和运动对象，做到心中有数、阵脚不乱。这种分类排队，就成了运动的施工方案、舞台脚本、案头预演。由于分类标准的模糊，有大量可左可右的模糊、边缘地带，而主要由现任领导、实际操作者掌握，在执行中带有较大随意性。

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 1960 年代和文革时期，左、中、右排队的性质就从运动中有关人事的政治状况的一般分类，变而为阶级斗争中革命、中间、反动的分界。这种分界的后果极其严重。因为这种分界，将关系到当事者的现实处境、人身安全，决定其是否会挨批斗、遭贬斥，被打入贱民行列。造反夺权时的无政府主义真空，没有权力中心控制，左中右分类排队频繁。文革的其他阶段，领导班子、成员也有经常性变更，因此引起排队的变更，造成运动格局和当事人命运的种种变化。

1966 年夏天就提出“要分清阶级界限，分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划分左、中、右，依靠左派，打击右派，争取、团结和教

育大多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秋天指控工作组的罪行，就主要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在群众和干部中大搞所谓“左、中、右”排队，把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打成“反革命”、“野心家”、“叛徒”、“牛鬼蛇神”。

在号召大联合的同时，却又强调左、中、右是客观存在，强调“是要阶级阵容分明，你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还是站在中国赫鲁晓夫那一边，必须搞清楚”。要警惕“混淆阶级阵线”，“出现大杂烩的危险”。不断在社论和《人民日报》报眼引证毛泽东“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的论断。造成大联合的障碍、难产。

而批判、纠正林彪、四人帮政治错误时，形左实右、假左真右的严厉指控和概念纠缠，往往又造成新的混乱，越批越左、越纠越左。直到1970年代末，才认识到这是“把路线问题和反革命问题完全混在一起”，已经成为“林彪、‘四人帮’的护身符，革命人民的麻醉剂”，要求“分析它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它的严重危害性，千万不能再把这种几乎毁灭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左’倾毒瘤掩盖起来，必须下决心彻底纠‘左’批‘左’”。

[注]毛泽东1957年写道：“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关于反右的系列著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红旗》1966年第8期社论；本报讯《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坚决反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 帮助大多数干部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人民日报》1967.04.18；李再含《坚决执行“斗私，批修”的伟大战斗号令》，《人民日报》1967.10.17；吴江《关于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和特点问题》，《人民日报》1979.02.16）

## 先治坡，后治窝

大寨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口头禅。用于处理救灾究竟是该先治坡（农田）还是先治窝（住房）问题的方针。“坡”是生产的概括，“窝”是生活的代词，推而广之，即是先生产、后生活。

1963年大寨村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暴雨、山洪。大雨从8月2日下到8日，这7天7夜的雨相当于1962年全年的降雨量。除了狼窝掌，大寨人十来年经营起来的100多条大坝全被冲垮，层层梯田冲成了大沟壑，好端端的土地冲成了红石板，庄稼毁的毁了。大寨的每块耕地都受到了损伤，百分之二十土地、石坝、地堰，甚至连地基也冲得净光。180亩土地被冲毁和淤没，540亩地被洪水冲刷过。全村140孔窑塌了113孔，125间房子塌了77间。

庄稼被冲毁严重，窑洞和房屋大多倒塌了，都要及时解救，但大寨的劳力只有那么多。处理救灾先从哪里入手先后顺序的问题，陈永贵提出六字方针：先治坡，后治窝。先集中力量把地里被冲倒、被埋起来的庄稼扶正、培直，保证当年的收成，然后再修整房屋和窑洞。将村里的劳力兵分三路：一路是拿出60%的劳力去扶苗修地，准备种麦；二路是拿出20%的劳力去割蒿沤肥，准备明年的生产；其余的人烧砖、烧石灰、修窑、盖房。

后来有个叫赵小和的大寨社员提出了改进意见：白天干地里的活，晚上点上

汽油灯给新房平地基、抬石头。于是，大家便在白天到地里去扶苗修地，晚上则集中在规划好了的宅基地上抬石垒砖，为重建住家窑洞、房屋而加班苦干。这个方法被大寨人概括为“白天治坡，晚上治窝”。[注 1]

在报道宣传中这个办法被抽象到“正确处理社员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的问题，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的高度。

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0 年代、1970 年代的推广，这个口号与源于 1950 年代的“先生产，后生活”一起，成为处理经济建设与人民消费关系的普遍原则。甚至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国家名义下的“只生产，不生活”。以至于形成“高积累、低消费”[注]资源配置教条，极端情况下一些地方非建设性投资只是建设性投资的五分之一。职工工资 10 多年不调整，住房几十年都在最低水平上停滞、徘徊——人均居住面积仅 2、3 平方米，老少三代同居一室，厨房、厕所都是公用的。

这个在中国工业化初期曾起过部分积极作用的口号，越来越表现出它的消极方面，既在教育、医疗卫生、住宅和个人福利等方面社会对人民长期、大量欠账，又抽掉了经济增长的巨大需求基础，阻碍并限制了经济本身的发展。造成中国城市第三产业长期得不到重视、城市功能单一、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不全、生活质量不高，治理污染、保持生态平衡长期提不到议事日程上，并以其惯性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19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均个人消费支出增长迅速，一直保持在 7%—8% 的同比增长率，对经济持续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2000 年代，努力推动城市面貌的升级改造，发展城市公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已经被当作投资环境软条件的城市经营策略。

[注 1] 白天晚上连轴转，而且都是超强度劳动。社员们都咬牙坚持着。长期超强度的劳动事实上已经伤害了大寨人的身体。有人后来做过调查采访，发现当年大寨许多人都留下了腿脚或者是腰痛。

[注 2] “五七一工厂纪要”攻击说国家经济实行的是“国富民穷”政策，曾引起私下里人们的共鸣。

(参考资料：范银怀《帮的认真，学的劲大——记虎头山下两个生产大队》，《人民日报》1963.12.04；宋连生《农业学大寨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高国彬《先治坡后治窝》，“夕阳晚晴”网)

## 邓拓

(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福建闽侯人，社会活动家，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

他从小酷爱文学艺术，18 岁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等职。1944 年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晋察冀日报社编印，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定价 300 元[边币])，全书共 800 多页，约 50 万字，分为 5 卷，选收了 1927 年—1944 年的 29 篇文章。

1949 后，历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并主编理论刊

物《前线》。1957年在刊载尖锐批评党政文章前加按语，违背毛泽东反右钓鱼意图，被骂为“死人办报”。1961年3月，开始以“马南屯”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共发稿153篇，受到读者喜欢。他的杂文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寓意，一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文苑小幅回暖增添了几许生气。他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

1965年11月曾制止《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刊登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材料，“三家村”被打成“反党集团”，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早牺牲品。5月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头版同时刊登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11日，全国各报刊奉命转载，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高潮。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

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注1]和《与妻诀别书》后，5月18日自缢身亡，成了1966年起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

1979年中共北京市委为其平反：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拓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为他举行追悼会。同年《燕山夜话》得以重印。1994年福州邓拓故居修复，建成“邓拓纪念馆”。

邓另有《中国救荒史》、《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等论著。

后世评价其杂文重史识、史论，抓住现实，旁征博引，含蓄委婉，可谓雅俗共赏。也有学者认为，作为高度政治化的知识分子，他的这些杂文其实也是“遵命文学”的产物，适应了中共1960年代初期在严重困难条件下采取收缩政策、检讨失误、弥补阙失的需要。“往往都能从毛泽东的讲话、指示和中共中央文件中找到理论和政策依据”。不少文章仍然是很“左”的。[注1]西方学者（如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P·特里尔《毛泽东传》）赋予他“持不同政见者”、“自由主义者”身份，是误读。

[注1]遗书中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等语。

[注2]《“一无所有”的艺术》、《“无声音乐”及其其他》，从对西方现代艺术试验的批判上升到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批判。

（参考资料：张帆《才子邓拓》，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新华社《经党中央批准 北京市委决定为“三家村”冤案彻底平反》，《人民日报》1979.08.03；王彬彬《邓拓的本来面目》，《粤海风》2004年第6期，收入《往事何堪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 新三届

与“老三届”相对、相衔接，指称1969年秋季进入初中的小学66、67、68级应届毕业生。他们出生于1950年代中期，1970年代进入青春期。不同于特指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79级大学生的新三届。[注]

因为文革“停课闹革命”中断了正常的教育、升学，“老三届”学生直到1968

年底、1969年初被上山下乡运动遣送到农村当知青，中学才同时接纳了已经积压三年的小学应届毕业生（有的留在小学的带帽班里）。他们中一部分人仅仅读了两年书，1971年支边到了云南、黑龙江等生产建设兵团，大部分人1972年毕业后插队落户到了农村，极少数人升入高中继续读书。

作为第三代（红卫兵的一代，60年代进入青春期）与第四代（60年代出生、80年代进入青春期的一代）之间的边缘人，他们与第三代有密切的精神上的血缘关系，较多认同、接受第三代的情感—行为方式，但对第三代执著迷狂的毛泽东信仰、冲动暴烈的政治参与、至死不悔的理想主义、所经历的大悲大喜式幻灭，对现实强烈的介入意识等，在体验和由此而来的反思方面，均不及他们深刻；意识形态和文革经历的历史重负也相对少些。插队落户的经历，使他们对中国社会、中国问题（性质、困难）的认识，对苦难的承受力，接近老三届。对文革后，接着就迅猛而至的消费文化、世俗文化的认同、接受，开放心态，虽不及第四代全面、彻底，却远胜于第三代。如许纪霖所说，新三届“感受过‘文革’的理想主义气氛，在自己的思想中留有那个时代的所有底色，但又不曾付诸于狂热的实践。当我们成年时，已经是‘文革’以后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交，开始接受思想解放和个性独立的时代洗礼，因而又具有第四代人的文化特征。……既有超越性的人文关怀，同时对世俗也保持着一份理解；对社会丧失了普遍的道德精神纽带深感忧虑，也分外警惕绝对的、独断的理想原教旨主义；在理性层面不易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而在感性层面更亲近非古典的、非先锋的大众流行音乐……”

由于他们受教育时处于精神荒芜期，使他们在知识结构、情感倾向上既未从“过去”彻底放逐出来，又未被“未来”全身心地吸引过去。既怀旧又趋新，既崇实又权变，是其心理—行为特征。他们是老三届的弟妹，又是第四代（80年代进入青春期）超龄的兄长。所以徘徊于第三代（改革参与者、专家学者、基层骨干）和第四代（技术化从业者、高消费钟情者）之间。既走不出第三代，却又时而逛到第四代的范围兜一圈。

不少地方（如上海等），文革期间的学制延续没有中断。但这不能改变他们新三届的文化身份——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文革高潮期的造反派红卫兵，而是文革时空距离最近的旁观者，下过乡，出生、青春期起迄的时限，恢复高考后回炉等等，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价值取向、趣味偏好、命运轨迹等，都与典型的新三届毫无二致。

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美学硕士、神学博士刘小枫，文艺学博士生导师王岳川、艾晓明，历史学家雷颐、杨际开，政治学家邓正来，经济学家秦纲、钟朋荣、刘伟、范恒山、何清涟，社会学家李培林，哲学家李小兵，语言民族学博士纳日碧力戈，戏曲史博士孙玫，小说家王安忆、莫言、方方、池莉、铁凝、陈村、刘震云、张欣，诗人顾城、王小妮、欧阳江河、汪国真，演员刘晓庆、卢奇，漫画家康笑宇等。

[注]77级、78级、79级大学生，只是以新、老三届为主体（还有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年龄跨度大到十多岁，有阶层意义，而无代际意义。本条则主要从代际意义探讨、界说新三届的内涵。

（参考资料：许纪霖《另一种启蒙》，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 老三届

指因“停课闹革命”，杀向社会造反而未能正常学习、如期毕业的1966、1967、1968年三届初中、高中毕业生的合称、简称。也称“老六届”。他们是文革早期的红卫兵，文革中期的知识青年，文革后期通过升学（工农兵大学生）、参军（退伍）、招工、顶替、病退返城的工人、教师、基层干部和待业青年，1990年代下岗工人的主体。

这些人是文革文化的生命载体。他们出生于1947年—1953年，成长在毛泽东时代，正是中共由于完成建国（民族独立）、抗美援朝、三大改造，而声誉日盛，社会上充满乐观情绪的时期。他们唱的歌曲是《东方红》、《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读的课文是《吃水不忘挖井人》，受到的是《卓娅和苏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读物的激励，看的戏剧是《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一代》。

《雷锋日记》勾画的人格化道德理想，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拯救“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的历史使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代课题，“世界是你们的”那一声殷殷期许所展示的建功立业的前景，激动着他们的心。

在他们身上，既有毛式浪漫主义的激进幻想（民族主义、英雄崇拜），又有权威主义的人格烙印（盲从轻信）；既有青春期渴望建功立业的冲动，又有阶级斗争的世界图式和革命正义支配下的毁灭道德约束，成为他们文革中行为的基调。

红卫兵就这样在他们的手里被创造出来。当“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正“睡在我们身边”的恐怖预言响起，他们揭竿而起：“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他们反工作组，“破四旧”，打老师，抄家，怀疑一切，揪斗走资派，大闹中国政坛，为夺权而四分五裂……其组织系统的残缺、失调，更加造成了内部的派性冲突、行为越轨。直到“小将要犯错误了”以后，他们被遣送到“广阔天地”。

这一放逐，使他们越过官方宣传的假象，开始直接认识到中国社会和农村的真实情况。林彪的“爆炸”，更使他们从幻灭中憬悟，思考，以致后来由他们发动了从政治上宣告文革破产、为十月变局奠基的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

老三届成为独生子女政策的第一批担待一拥趸者，1980、1990年代的社会主角，最早他们是“伤痕文学”的发起者，后来成为基层业务骨干，研究生，改革开放的积极支持者、参与者，个体户、商人，教授、学者。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学术界的陈平原、赵园、吴亮、朱学勤、郑也夫、李银河、俞金吾、申小龙；文学界的北岛、王小波、韩少功、张承志、张辛欣、残雪、方方、梁晓声；音乐界的瞿小松、谭盾、郭文景、关牧村；美术界的罗中立、何多苓、王公懿；“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吴子牛、田壮壮；演员葛优、陈道明、刘晓庆、潘虹；商界李晓华；围棋国手聂卫平；政界的薄熙来，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

因为他们中沉默的大多数受教育程度低[注]，不能适应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转产、转岗，1990年代中后期成为国企改革、下岗工人的主体，被边缘化改革代价（房改、医改、教改）的主要承担者。即使在再就业工程里也只能谋得服务性行业的饭碗。也是即将最早经受“421”供养结构和社会老年化之“白发潮”冲击的一代人。

2000年代的新生代苛求于他们的“文革原罪”，曾以“丑陋的老三届”对其诟病，要求其忏悔。网上有一批以“老三届”命名的网站。

[注]据估计，从1970年起的工农兵学员到1977-79级的大学生，再从1979

年—1990 年代的电、函、夜大和大专班，400—500 万里老三届约有 10%的人（40 多万）最终受过高等教育和其他继续教育，而另外的 400 多万只能永远拥有不完整的教育。

（参考资料：肖复兴《啊，老三届》，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陈意新《老三届：从下放到下岗 1968-1998》，《二十一世纪》1999 年 12 月号）

## 浩劫

指称文革的后文革词语。原为佛家语。佛经上说，世界经历一次从形成到毁灭（成、住、坏、空）称为“一大劫”。“一大劫”就是浩劫。俗语指历时长、灾难深。1978 年后用作对文革的代称、特称。通常与“十年”相连，组成固定词组“十年浩劫”。这一指称是一个否定性的政治判断、政治指控。

1978 年初浩劫说刚面世时，先是指具体领域如教育、古籍整理、文艺、思想理论、工会工作里遭受的破坏、损失，后来才扩大到全局性、整体性的指称：“给我国革命和生产造成空前浩劫”、“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制造的这一场浩劫”、“林彪、‘四人帮’制造的这场浩劫（国民经济、思想建设）”。使用者由个人而评论员、由民间而官员。1979 年底出现“十年浩劫”的用法，相对于此前“十年动乱”（比此前“混乱”的认定已经加重）指控的尖锐程度升级达于极点。〔注 1〕

这一指称认定，文革为害覆盖面大（从中央到地方，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事务各领域乃至家庭父子夫妻）、延续时间长（十年）、危害程度深（武斗自杀死亡人数累以万计〔注 2〕、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性道德沦丧）的“大灾难”。这是后文革中共领导核心基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彻底否定文革的一种概括、判断。它表达了文革受难者和一般老百姓的强烈情绪，是一种政治性批判激情的宣泄。它既是正当的，在历史事实和民意两方面都有充足理据；但作为道德化的评价，又显得过于简单化，以致于其内涵浅得几乎没有实质性内容。在拨乱反正的时候，它的作用是政治性的，即帮助执政强势集团营造合法性根据，划出一条与文革的界线，清理出重建的地基，以推动改革开放这一政治—经济战略的重大政策转型。

它把文革判定为非常状态的东西，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原则的政治阴谋集团的破坏行为，为浩劫与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判断提供根据，似乎与此前的、继任的政治领导核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无关，人们（上自党政领导、下至普通百姓）是被动的无辜蒙难者，完全是被恶势力强加的异己物。让人们“往前看”，尽快忘记这一不愉快的事件，可以起到一种类似心理补偿的自卫作用。却阻断了从制度缺陷利用既往思想资源的探绎、破解之道。

2000 年代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在现实弊害刺激下，开始淡忘了文革戕害并怀念起文革来，说，“中国 5000 年，只有那 10 年官怕民”；文革没有 10 年之长，而且是以“防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目的的，“不仅搞出了轻弹、人造卫星，年年经济增长，并且实现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国际威望也得到空前提高，取代了台湾进入了联合国……”

〔注 1〕据“人民日报’ 49—97 数据库”提供的材料，该词 1979、1980、1981 年 3 年综合浮现率为 45.46%。



[注 2]一个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 1 亿人以上。”而“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在 200 万以上”（丁抒）。

（参考资料：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编《俗语佛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本报特约评论员《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人民日报》1978.09.28；燕《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不对》，“中国韶山网” 2005-8-31 [http://www.china-shaoshan.com/bbs/showtopic.asp?TOPIC\\_ID=4369&Forum\\_ID=14](http://www.china-shaoshan.com/bbs/showtopic.asp?TOPIC_ID=4369&Forum_ID=14)）

## 知青办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的简称。负责组织、安置、领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办事机构。

1969 年前后该机构在各地名称不一：有叫“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云南）的，有叫“毕业生分配组”（四川）的，有叫“四个面向办公室”（湖南）的，有叫“‘五·七’办公室”（安徽）的；级别不一：有的相当于局级（上海、广东），有的相当于处、科级；归口亦不一：有归计委（云南）的，有归文教局（湖北）的，有归生产指挥组（浙江）的，有归政治部（山东）的，有归市革委会（江苏南京）的。这反映了当时政府机构的瘫痪状态和上山下乡运动的事出仓促和固有的归属模糊。

1973 年以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为契机，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召开后，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知青办公室[注 1]，由国家劳动局改属国务院农林部（回归文革前体制），陈永贵副总理出任组长。着重解决知青政策落实问题，以缓解知青生活困难造成的社会矛盾，维持政治、人心、局势的稳定。标志着知青工作的规范化、日常化。

随后各地在省、市、自治区以下，县级以上均成立了相应机构。各级领导小组组长都由党委书记担任，成员包括有关部门（教育、公安、财政、卫生、商业）负责人。各级知青办统一名称，扩大编制，加强职能的同时，行政级别也相应提高，市一级由原处级升为局级机构。其职权范围包括：毕业生动员、安置，下乡知青的招工、招生、招兵、困退、病退，抚恤救济，经费的管理和发放[注 2]，以及有关数据的汇集、整理、造表、上报。并负责维护下乡知青的权益。各地县级知青办组成成员以当地干部为主，也有知青动员城市派出的工作人员（称“带队干部”）。

各级召开知识青年会议必须主持工作的常委出席，常委下乡无论检查什么工作，必须看望知青点，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每年必须召开知青工作会和先进知青会。以加强领导。

在知青返城期间，组织他们中的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的代表一起座谈，交流心得、经验；许多单位敲锣打鼓到知识青年家里送慰问信，赠送革命书籍、小药箱、垫肩、背包等有意义物品，为知识青年放映电影；还安排文艺、体育表演，举办写作、会计、音乐、美术、电工、柴油机、拖拉机、水泵、有线广播、测量、微生物、针灸、推拿等方面内容的电视教育讲座和各种短训班。

但由于制度、政策设计的总体性左倾偏差，这些工作也只是拾遗补缺，在作为中心工作突击抓的时候能为知识青年部分排忧解难、充当“保护人”角色，却无法根本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问题。联席会议式的组织结构也使它更像一

个议事机构，许多事情落不了实，效率低下，越到后期具体工作越无人管，连人员也流失了。

1981 年底，随着城市就业和知识青年政策的改变，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 20 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注 1] 取代以前的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

[注 2] 安置费单身插队的南方每人 230 元，北方每人 250 元。在清理、检查中发现，辽宁有 3.7% 安置经费被侵占、挪用、贪污、私分。

(参考资料：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 (1966—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新华社《北京各级党组织和群众热情慰问回京探亲和在郊区插队的知识青年》，《人民日报》1974. 01. 23)

##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这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红卫兵运动的口号。

1966 年初夏，北京一些中学高干、军干子女自发形成的学生组织，他们根据曲折得到的中央高层精神[注 1]，表达了对教育改革的激进想法。他们的思想行动受到学校领导和工作组压制。其中一个组织——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为了公开宣示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断发表大字报——一论 (6 月 24 日)、二论 (7 月 4 日)、三论 (7 月 27 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文章反复引证了毛泽东 1939 年 12 月 21 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五七指示”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是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论述通过内部消息和官方社论各种管道陆续传播出来，在持续升温的文化批判的声浪和高度敏感的政治气氛中，被认定是对当时中国整体政治局势的判断。

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冲突被纳入这样的语境，获得了阶级斗争解释下想象性反弹，就提出了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造黑线黑帮的反的政治口号。“三论”宣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革命就是孙猴子”，应该抡起大棒“把旧社会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谁个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大造其反！”“一反到底”！虽然这些口号的具体指向性含混模糊，但对现存党政系统的否定态度却是旗帜鲜明的。[注 2]

“三论”在 1966 年 8 月 24 日《人民日报》上全文刊载，并异乎寻常地在 24、25、26、27 日连续 4 天把毛泽东“造反有理”这段话登在报眼位置上，以最高政治权威给出了强烈暗示。背景是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复信说，你们的大字报和信“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响应“三论”的学生红卫兵和工农兵的文章。时机恰在中宣部被解散，工作组被否定、驱逐，十六条[注 3]公开发表，“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它引起的冲击波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破四旧”运动。毛

泽东“造反有理”这段话迅速被谱写为语录歌，唱遍全国。[注 4]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看似没有信息增量的同义反复，却从政治-法理（无罪）和道德-民意（有理）不同角度肯定了同一社会行为，用更加大众化的激进语言解读出十六条“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以非正式形式，把群众运动的豁免权推到了极致。

在这一环境下，8月21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22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规定》。

10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概念的提出、辐射，为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冲击工作组、校党委、社会上“四旧”和大串连一系列大规模的活动，追加了更多的正面价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不仅使党政系统的运转造成了混乱、瘫痪，政令不行，法纪废弛，而且在1967年升级到了夺权阶段，给正常社会生活、国民经济运行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干扰。

2000年代一些被无由表达民意、整合冲突所困扰着的人们试图赋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以新的含义：这是“人民有话说，人民想说话的一种原始和朴素的民主形式和精神”，说明“当时的中共执政党彻底放开的态度可以让人民在想说话的时候能有地方说”，而现实的“全面开放社会舆论监督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之间没有根本冲突”。也遭到“文不对题”、“缘木求鱼”、“饮鸩止渴”的批评。

[注 1] “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

[注 2] 毛泽东本人后来把文革定义为揭露阴暗面、自下而上全面反对党内官僚垄断集团（走资派）的一种形式。

[注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的简称、别称。

[注 4] 与《革命造反歌》等歌曲共同成为人们对文革的音乐记忆，常常被用作文革影视带漫画色彩的背景音乐。

（参考资料：《革命大字报选》，《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廖盖隆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大智慧 PTh3《我来分析“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网易部落”）

## 以×××为首的党中央

以介词结构修饰的偏正词组，名词性词组。强调×××是党中央的领袖、中心，要求决策权、指挥权必须集中、统一。它确定：为首者不仅仅是召集人，他与中央领导集团的其他成员不是平等关系，而是上下级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服从与被服从关系。从投票上看，为首者持有的不是平等的一票，而是决定的一票。[注 1]表现形式上，他可以通过程序-议题设定、幕后活动等方式、特权，使一票决定权以合法面目转化为现实。1940年代中共曾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决定权，使这一权力体制得以确立。根据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组织原则，他的意见、主张和权限应居于主导、支配地位，而其他人应采取服从的态度。是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组织-人格化表现形式。

国际共运史上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领导体制上都有同样的制度设计、组

织特征。而且党内体制与国家体制合一。

这样的提法频频见于媒体，往往说明中共高层处于权力斗争的紧张时期或权力过渡时期，领袖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挑战，秩序不稳定，运转出现问题。因此才会要求“团结在以×××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誓死保卫以×××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并且反复论证从历史事实和理论逻辑上看，“以×××为首的党中央”是如何伟大、光荣、正确，其确立的方针、政策如何高瞻远瞩。如果偏离这一认识，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走弯路、蒙受损失。力求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对纪律的强调，成了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武器，攻击对立面分裂党的口实。以此为起点、为基础，缺乏宪法根据的权力过渡，都是以非程序更替的形式进行；社会、政治秩序的失稳，在这时就成了常态。

在文革中，毛泽东、华国锋都先后享受过这一荣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它的更一般的形式则是“以×××为首的党中央”。亦作“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等值。凡是中共的第一把手（无论主席或总书记），都有资格荣膺这一称号。主席职位是绝对的领导权，总书记的权威虽有所弱化，但仍然秉有同样的权限。甚至各级党组织都可以有类似的推行：“以×××为首的党委”，要求党委成员统一意见。文革后反思并要求改革文革体制弊害时曾有“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的呼声，设立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注 2]，便是对这一集权要求的抑制，试图从制度设计上有所突破。

凡是使用这一概念时，该词组都会频繁出现在中共领导人口头，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上，以反复的集约轰炸，形成强迫印象。沿着舆论强势——影响力强势——政治强势的轨迹递嬗、演进。

[注 1]领袖是否只有平等的一票，是现代民主形式与传统集权体制的组织区别、分水岭。

[注 2]强调指导机关是中央委员会，全局性重大事项、人事任免要集体讨论，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

（参考资料：《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北京党建”）

## 手抄本

名词。经由手工抄写而成的书本。俄语词中的 Pykonucb（手写的稿件）、c a M o u 3 g（地下或自我出版物）和捷克语 samizdat（民间出版物），在释义、应用上都与之相近。

文革把古今中外作家作品当作封资修来批判，既有普遍意识形态的声讨，也有个别的扫荡，发现有人阅读就会遭遇麻烦（粗暴的批斗、公事化的勒令检查、亲切而压抑的帮助）。文化出版陷于停顿，爱书人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读物。民间流传有不准公开发行的、涉及犯禁内容的抄本，以填补人们的求知欲和精神文化生活的真空。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被打倒的元帅陈毅的诗词，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陈明远被误认的《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因描写老一辈科学家生活而书被查抄、作者系狱的《第二次握手》，记录了 1976 年“四五运动”民众情绪的《天安门诗

抄》，含有不良倾向、色情内容的《少女之心》。笔者 1974 年下乡插队时亦曾手抄过整本《唐诗一百首》（删除注释）。此类事一旦被查出，就会被定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封资修毒害青少年”的严重事件，当事者要受到追查、批判乃至处分。《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就在姚文元亲自过问下于 1975 年 1 月 7 日被捕入狱，至 1979 年 1 月 18 日出狱。

研究者杨健认为，围绕手抄本，产生出一批具有“广泛群众的参与性、思想上的独立性、艺术上的创造性”的作品，形成了与文化专制的遵命文学相对抗的“地下文学”。评价肯定了手抄本的合理性却似有拔高嫌疑。

而周京力建议的定义说，手抄本是在文革中产生的一个新的集体创作的文学类别。它由初创者匿名写作，再由相信该故事真实性并喜好它的读者抄写传阅；抄写过程中传抄者不断根据自己的好恶加工或改变；写作语言接近口语化，叙述方式类似传统话本不受形式限制的自由性，同时具有文字粗糙、故事性强且紧贴时代的特征，属民间传说的现代版延续。多以满足当时人们心理需求、审美情趣和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为蓝本，是“文革”中后期过剩的激情与弥漫在整个社会的虚幻游离空气相悖逆的产物，其中不乏道德法庭、道德救赎、僭越禁锢的进步作品；但大批判、肃杀、颠覆、嗜血成性、拙劣的迎附政治语境、神经质的图解阶级斗争观、空洞浮夸等大标语式的信息符号仍是手抄本的主流。其原创作者和传抄者，以当时社会底层的“知识青年”和城市青年工人为主体。

并以内容和政治话语的能指与所指为标志，把手抄本分为四类：固守传统精英立场的民众代言类（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要求充当喉舌或者器官的自觉献媚类（《梅花党》）、浮浅媚俗的“精神拾垃圾者”类（《三下江南》）和打破底层清基督徒集体禁欲和性罪感类（《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和《农村赤脚医生手册·生理卫生篇》）。周京力定义描写细致却似有偏窄而不能周延之弊。

由于手抄本的体制外特点，无法对其监控的文化、治安当局认定它有害于文化的全面专政，它受到严厉追查、处罚、制裁。一些被认定破坏性大的手抄本原作者，遭到了正式的监禁。其中的色情读物，由于缺乏健康、正常教育，起到一定程度消极作用，但被严重高估，并施之以简单化堵塞处理方法。除当事者受到过当处罚外，效果有限。

文革后，手抄本中的少数幸运儿《一双绣花鞋》被拍成电影《雾都茫茫》，《归来》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第二次握手》正式出版，进入主流话语而终成“正果”。《第二次握手》因作者曾遭囚禁，还被赋予了讨伐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意义。

2000 年代前后出版界曾兴起一次手抄本出版热，多出于商业策划、炒作，较少学术性的认真整理。被官方叫停，且表现欠佳。亦与手抄本自身的文化品位有关。手抄本冲破禁锢的功能随着文化解禁而丧失以后，它的再出版，多是当年亲历者的回顾、反刍，难免在新一代读者的需求面前失效。

（参考资料：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 1993 年版；周京力《文革手抄本——对剪掉舌头年代纪念物的一次总结与表达》，“剑虹评论网”[http://www.comment-cn.net/data/2006/0314/article\\_3739.php](http://www.comment-cn.net/data/2006/0314/article_3739.php)）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这是宣扬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典型称谓。也被简称为“四个伟大”。

据考证，发明权属于陈伯达和林彪的联合创意。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开幕词中给毛泽东冠上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接着林彪讲话加上“毛主席是统帅”。形成“四个伟大”叠床架屋式的排比称谓。

始见于1966年8月26日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在那个给毛泽东美誉夸饰成为打擂台狂热的气氛下，很快，《体育日报》记者、《人民日报》编者按、《红旗》杂志第12期（9月17日出版）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郭沫若等文人雅士，以至普通工农兵群众和学生红卫兵都广泛使用了这个称谓。1966年8月31日，林彪在接见来京的红卫兵和群众的大会上，用此口号来称呼毛泽东，更加大幅度提高这一称谓的官方色彩和权威性。1967年5月1日，林彪为清华大学红卫兵建造毛泽东全身塑像题写的“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题词，在各大报刊上刊载。

自此，“四个伟大”风靡全国。在文章、报刊通栏大字标题，街道大幅标语、各式工艺品（像章、笔记本、宣传画）和介绍信、粮票、布票的图案里等场合反复书写、使用。great teacher……成为中学英语教材。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编写的《毛主席革命斗争生活片断》一书中对此做了详细注释——“伟大导师”：革命的导师总是给无产阶级革命指出大方向，引导整个社会向前发展。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比他们（指马、恩、列）要高。中国革命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革命大方向都是毛主席给指出的。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每一个大方向也都是毛主席给指出的。“伟大领袖”：领袖是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最能团结全党，最能组织工人阶级队伍，最有威信、最无私、最有天才，能总结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并经过革命实践证明可以领导人民革命才能成为人民的领袖。“伟大统帅”：统帅是伟大的军事家，了解历史、懂得古今中外的战法，有渊博的知识，有高明的战略战术，有高超的指挥艺术，有伟大的胆略。毛主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伟大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革命人民靠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就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舵手。每当革命遇到波折的时候都是毛主席及时的摆正船头，指引革命，沿着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

该称谓使用高峰，集中在1966、1967年2年间。到1968、1969年已经大大降温，到1970年就意兴阑珊。1968年元旦社论划掉了其余三个伟大，保留“伟大导师”提法。1970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斯诺时表示了“四个伟大”的不满，以敲山震虎方式表达对林彪及其军人集团的敲打、挤兑：过去“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讨厌！”媒体上迅速落实此一指示精神，扫清了这一称谓的使用。

后来，伴随着林彪集团的失势，这个口号遂正式停止使用。并被引为指控他们搞崇拜阴谋的证据之一。

据称，以“四个伟大”为题的像章有几十种。一种号称“全品相保真老件”的毛泽东像章，正面中央金像闪光放射状红底表现的毛泽东侧面头像，圆弧上半部写着“伟大导师 伟大领袖 伟大统帅 伟大舵手”、下半部写着“毛主席万岁”、背面中部写着“沪 134”，外观直径约2.5cm。2006年3月“淘宝网”上叫价5元。

(参考资料:新华社《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开幕》,《人民日报》1966.08.28;《“四个伟大”专题像章》,载“毛泽东像章收藏网”)

## 工分

1950年代—1980年代初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计算个人工作量和劳动报酬的单位。每个劳动工分的实际币值就是工分值。

在人民公社时代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共同拥有土地,共同劳动,集体分配。其时分配制度采用“按劳分配”,具体说就是工分制,以家户为单位进行分配。全年进行两次分配,夏收分配一次,年终再作一次总结算。生产队会计用全年生产队的总收入除以全年生产队的总工分,得出一个壮劳力工作日(10分)的价值。依据每家的总工分算出每一家户全年总收入,减去他们这一年的总支出(分粮折算),即得出该户在该年的净收入返还现金(或净负债欠款贴钱)。工分的多少就是收入的多少。

工分制的执行,有评工、记分、结算等阶段。是将每个劳动力按体力、技能、农活质量、性别等要素分等,每等定出一个标准分,譬如说一等劳力10分,二等8分,三等6分,四等4分,等等。男劳力每天可拿10分工,而女性每天只有7分或8分工。不同年龄段的社员拿到的工分也不同。刚到农村的男知青给7分工,女知青给6分工,2年后可评到9分、8分甚至更多;含有某种政策性照顾因素。“自报工分,大家合评”。或五天、十天一评,或一二月一评。共同劳动一天,记工员会按照标准分给每个劳动力记分。这种办法后来被人称为是“大概工”。特点是:“有差别,不悬殊”——差别不大。

这实际上是一种计时制。在这种制度下,农活的质量总体上要好于计件制(容易在数量上投机而轻视质量)。由于同等劳力的社员做同样的农活,拿同样的工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竞争,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留心农活的质量。不过一旦有个别社员带头开小差,其他人也会跟着“磨洋工”,如“放野鸭”一般,劳动效率大受影响。这种情况,在社员干重活、本该使用计件制、实际上却是使用计时制的时候,尤为突出。

由于无论你实际作多少活,你只能得到与你同级别劳动力一样的工分。劳动力的分等抹平了同等级劳动力之间的差异。因此,工分制使得人们在集体的土地上消极工作,从而将节省的体力用在家户内的劳动上。但此一大寨式工分平均主义的制度,影响集中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

有学者研究指出,工分制分配是扣除国家税收和集体提留,然后对剩余的部分按劳分配,使社员活劳动消耗得不到补偿。因为分配值在大多数核算单位都低于劳动日的必要生活费用。由于平均每个劳动日扣除额乘以某个社员所做劳动日数就是对该社员的扣除量,就等于多劳者多扣,少劳者少扣,不劳者不扣,按劳分配变成了按劳扣除。扣除的不是剩余劳动的一部分,而是必要劳动的一部分。参加集体劳动越多亏得就越多。

因为多劳不能多得,社员很少愿意卖力干活,结果出现“出工不出力”的现象。这就成为文革后农村改革从包产到户向家庭联产责任制发展、人民公社制度解体的根本原因。工分值依地区生产水平高低和年成丰歉而定,高的1元到八毛不定,低的几分到二三毛,中等的四五毛。主要看有无农业以外的副业收入。

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中国集体经济时期,农民劳动与消费的关系存在某种均衡关系,“农民劳动自我开发的程度靠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艰苦程度之间的某种

关系来确定”。农民的这一行为特征，既与当时国家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有关，又为传统中国文化价值与人观所限制、构成和调节。

(参考资料：毛婷《张师傅的“工分”记忆》，“陕西广播电视报”<http://www.sxgdb.com.cn/article.asp?articleid=1369>；张江华《工分制下农户的经济行为》，《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刘福垣《明租、正税、除费》，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 吴桂贤

(1935— )女，祖籍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胡坡人，1974—1977年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工人出身的社会活动家。

1951—1974年在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纺织女工，是著名的赵梦桃(1963年3月去世)小组的成员、党小组长，全国纺织系统劳动模范。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968年后曾先后担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代初任陕西省委副书记。中共九大(1969年)、十大(1973年)、十一大当选中央委员，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4年9月奉调中央，以代表工人阶级、补充新鲜血液名义，被安排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当时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畸形的一个特征。具体分管工、青、妇群团组织和卫生部、纺织部、一轻部、二轻部工作。

在京住处由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经请求换至花园村，再搬到交道口。虽努力学习各种文件、背景资料，仍感难以胜任。开会时只能以“没意见”或“前面老同志的意见都很好。主席指示我完全同意”等浮词来应付。由于本人请求，被同意每年用二月时间下基层作调查研究。据传，她接待外宾时，闹出过问“李时珍来没有来？”的政治笑话(吴本人说是谣传)。

著有《在实践斗争中增长才干——学习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一点体会》(《红旗》杂志1972年第12期)等。

1977年请辞副总理、退出政坛以后回到西北国棉一厂任厂党委副书记。赴深圳前拿下大专文凭。1988年任深圳鸿华印染厂负责生产的副总经理，1989年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组建并任深圳外贸集团、进出口公司工会主席。1994年退休，享受副市级待遇。任民间的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

1971年与在西安某部队研究所搞激光研究的王振涛结婚，育有一儿、一女。均就业于金融业。

2006年6月有报道说，吴桂贤通过律师向深圳当地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国内3家知名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发行部、《纵横》杂志社)和3名文史研究专家(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朱元石、中国文史研究所研究员叶匡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韵公)，指控6被告在书(《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文(《大往事》、《抓捕“四人帮”高层决策纪实》)中把吴桂贤归入四人帮反党集团一伙，侵犯了她的名誉权。

(参考资料：《中国妇女报》2000年5月26日；中国网2002年9月22日；



《中国原副总理吴桂贤起诉六被告侵犯名誉权》，广东新闻网 2006 年 06 月 13 日 <http://www.gd.chinanews.com.cn> ;)

## 停课闹革命

指称 1966 年停止正常教学、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安排。当年“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以后，5、6、7 月北京一些中学红卫兵从自发组织到扩散；学校里的数学、语文等课程分量已经在减轻，政治学习开始猛增，用上课时间全校听广播，听社论，听重要文章，还时不时地传达文件。配合对《海瑞罢官》和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路线的政治批判。

6 月以来频频出台了教育改革的一些措施：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废除现行现行高级中学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招生”，“推荐与选拔必须突出政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6 月 18 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1966 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 月 1 日中共中央通知，应届大学毕业生不搞毕业设计、不写毕业论文。随后，还暂停了研究生、留学生的招生、派遣。

工作组被派到一些大学、中学，那些地方就停课搞运动，贴大字报出专栏，开批判会。接省市主管部门通知，大、中学全停课，再没有期末考试，没有课堂纪律了。从课业和考试的恐惧里解放出来的学生沉浸到节日般的狂欢中肆意撒欢。老师只能跟学生赔笑脸，说欢迎提意见。不仅师道尊严斯文扫地，不少平日要求学生严格点的老师还挨了打。

学校领导（“黑帮”、“三反分子”）和教授、教师（“牛鬼蛇神”）受到了揪斗。南京大学匡亚明、西安交大彭康、浙江大学刘丹、重庆大学郑思群等高校党委书记和中等学校的支部书记先后以“镇压革命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罪名“靠边站”，被撤消党内外职务或停职反省。其间，工作组限制运动范围和方式的种种做法，与学生发生普遍冲突。

8 月中共 8 届 11 中全会公布了《十六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红卫兵杀向社会“破四旧”；教职员工不按以往常规放暑假，而是集中起来学习“十六条”，揭发、批判、斗争遍地开花。各校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风起云涌。他们占据学校教室、桌凳和文印用品，自立门户，成天写大写报，印发传单，发表鼓动性讲演。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串连通知，冲破学校管理秩序和运动的区域性限制，从 5 月开始的局部性停课成为普遍现象。停课成了开展文革的前提条件。学校党政领导全面瘫痪，校印和经济大权已被红卫兵接管。

停课为学生红卫兵提供了巨大的时间资源，串连则提供了空间舞台，媒体和党政系统对红卫兵的肯定歌赞为他们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政策支持。革命就打破一切禁锢，闹腾起来，泛滥开去，吞噬一切……

在 1967 年、1968 年的武斗中，红卫兵造反组织利用大中小学校作为争夺攻守据点，文物图书、文献资料遭受洗劫，实验室的器具被用作武斗工具的制造，学校的校舍门窗桌椅等有形财产受到严重破坏。这些损失还只是最容易恢复的部分，全国党政运转系统和社会秩序受到的破坏，人们价值观念受到的破坏，却持续了 10 年乃至更长时间。

（参考资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

学出版社 1983 年版；林生 《汉川一中一历史》，“中国校友会”  
[http://www.cuaa.net/myschool/information/information.jsp?school\\_id=21801&school\\_information\\_id=26122](http://www.cuaa.net/myschool/information/information.jsp?school_id=21801&school_information_id=26122)；陈向阳《停课闹革命 ——畸形年代系列之二》，“中华文化协会” <http://www.aucca.com/geming1.htm>)

## 复课闹革命

文革中为了由“乱”而“治”对学校学生、教学回归校园秩序的一种未能如愿的安排部署。[注]1966 年下半年各地学校先后“停课闹革命”，大批学生从学校杀向社会：开始破“四旧”，继而跨地区、跨系统、跨单位、跨组织串连，冲击、批斗各级党政官员，进行夺权斗争和派性斗争，全国范围内的党政运转系统瘫痪，形势急剧动荡。

为稳定形势，1967 年毛泽东提出三支两军思想和“三七指示”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下厂下乡和外地串联的革命师生，一律在 3 月 20 日前返回本校”，分期分批进行短期军训。同日，《人民日报》提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是摆在广大师生面前的“光荣任务”。“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上课，主要是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同时，应该以必要的时间，中学复习一些数学、物理、外语和必要的常识，小学学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

北京、上海和一些地方的中小学陆续复课，但进展缓慢、恢复教学内容稀薄、持续时间短。据山东省材料，中小学复课情况，一般是农村快于城市，小学快于中学，全日制中学快于半工半读中学，公办学校快于民办学校。

但全国各地整体性的派性斗争并未停止，围绕大联合权力分配的武斗不断升级，工业生产持续下降，局势依旧动荡不安。

1967 年 7 月和 10 月 14 日，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先后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人民日报》10 月 25 日、11 月 26 日连续就此发表社论。但只有京、津、沪、鲁、蒙、青等成立了革委会的地方组织中小学的招生、开学工作，部分学校开始复课，仍然有相当多大中学生积极介入派性争斗，散布在社会上。

一直到 1969 年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大学、中专学生分配工作；12 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次年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城镇高、初中毕业生被推向农村以后，红卫兵的人力资源由此瓦解，大面积、持久的复课才成为现实。

但“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小组”（简称贫管组）进驻大、中、小学，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进行斗、批、改工作，成为学校事实上的领导机构。1970 年又集中开展“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不少无辜教师受到伤害，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由于废除大、中专升学考试，实行推荐选拔制度，新生质量普遍下降。1971 年 7 月《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抛出“两个估计”：解放十七年“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原有教师队伍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严厉批判“师道尊严”、“智育第一”、“白专道路”，

提倡开门办学，工宣队、贫宣队在学校长期留下去，向学校“掺沙子”。1974年张铁生的白卷和黄帅日记冲击和其后多次反击教育领域里右倾翻案风，造成学校领导和教师不敢管学生，不敢抓文化课教学，不敢进行文化课考查，学生纪律松弛，学校秩序混乱，“读书无用”的思想泛滥。

虽然形式上复了课，教学内容和秩序却没有回归科学、正常轨道，“革命”代替了教学。以至后来的评论家说，造成了知识的断裂、人才的断层。1967、1968年该词指称的是迫切的政治治理措施，1970年代以至更晚一些时候则成了指示一个时期、特征显著的时间概念。

[注]据“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材料，该词几乎全部集中在1967、1968年2年间（88.6%）。

（参考资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人民日报》1967.03.07；《如皋教育发展简史》，“如皋教育电视台”<http://www.retv.com.cn/rgjy/js3.htm>）

## 接班人

喻指接替前辈或前任工作、事业的人。有泛指、特指两种用法。泛指用法常被冠以“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定语，如《共产儿童团歌》里唱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但1960年代、1970年代时的这个词[注1]，它又通常特指国家领导人的接班人，甚至可以说文革的动机之一就是挑选接班人。前者有较浓的意识形态色彩，后者则有强烈政治色彩。

因为1960年代中期以后，在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杜勒斯预言）、反修防修的意识形态话语运作和毛泽东不信任刘少奇的情况下，接班人问题日益成为紧迫的政治问题。1962年，毛泽东为此特地提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战略任务和接班人必须具备的五项条件。后来他在勾掉“四个伟大”副词时保留性独“导师”名义，暗示着毛泽东对自己教育家身份的自我想象。其中既寄托了他创造理想社会、文化形态和全面发展新人（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的乌托邦式愿望，又凝聚了特定集团及其统治的自我保存、自我优化（永葆红色江山）意志、欲求。

塑造一代新人被当作文革的公开目标，所以意识形态批判和教育改革也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意义；以为文革的合法性资源。“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被打倒后，毛泽东一度属意于林彪，再后来是王洪文、邓小平（1974年的复出是一时的权宜使用还是另有深意？）、华国锋。他们先后都曾是毛泽东“亲自挑选和培养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甚至在通过的党章中，破天荒地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文革初期军委四个副主席讲话，极力配合、论证选林彪当接班人的英明。

林彪折戟于1971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走资派还在走”）于1975年，王洪文被华国锋取代于1976年，华国锋下台于1981年。因民主政体有制度化的遴选领袖程序、传统，民意基础与合法性自在其中，其政治更替处于一种有序、良性状态，不会给社会-政治带来震荡、戏剧性变化。而集权化国家特有的依赖于党和国家内部政治安排的非制度化权力更替，民意基础与合法性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一系列通过高层斗争、领袖考察并确定党和国家领导

人（主席）继任者为代表的方法[注 2]，屡战屡败。

1974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以冠冕堂皇的语言表述了培养接班人话语背后的政治内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就了一大批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精神的革命新生力量，涌现出大批路线斗争觉悟高、密切联系群众、富有革命朝气的优秀分子。一切有政治远见的革命者，都会满腔热情地对待革命的新生力量，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接班人成了政治角逐的代词，所以才有林彪以后对“上了贼船”者的清洗，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对还乡团的清洗，四人帮以后对三种人的清洗。

毛泽东去世前曾伤感地对叶剑英说，看来只有在血雨腥风中交班了，多少间接承认了他在接班人挑选、过渡问题上努力的失败。除了个人认识能力的局限、毛晚年恋栈权力的病态多疑等因素外，主要咎于个人专断的制度。

[注 1]据“人民日报 49—97 数据库”提供的材料看，1963 年—1979 年的 16 年间该词浮现率为 75.41%（年均 4.71%），而其余的 31 年则仅为 24.59（年均 0.79%）。两者相差近 6 倍。年均 4.89%以上的年份出现在 1962 年、1966 年、1967 年、1968 年、1969 年、1973 年、1974 年、1976 年等时段。

[注 2]典型形式是“你办事我放心”式的政治遗嘱。从国际共运史看，斯大林挑选接班人的结果也是以失败而告终。

（参考资料：谭闻《相信“儿童团” 扶植青年干部》，《人民日报》1974.02.02；拉木舍拉《毛主席放心，我们更放心》，《人民日报》1976.11.24；《邓小平：加强干部队伍的管理和监督》，“党建工作”；《毛泽东与“接班人”问题》，《北京青年报》2005 年 02 月 16 日；董标《毛泽东研究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崇拜的发生与个别意志的循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3 年 12 月号总第 21 期）

## 抓革命，促生产

文革中处理革命与生产关系的经典口号。源于 1965 年初。经毛泽东肯定就成了最高指示。表面看，它提出两个平行的重点、是二元论，但在当时的意识形态语境里，革命、政治的第一性是谁也无法质疑的——强调革命是动力，生产是伴生物。实际上，对两者之间逻辑关系的定义，在不同阶段、不同主张者那里有不同解读和相应的一套政策主张。

1966 年前，在原有政治经济秩序正常运转情况下，它强调革命是原动力，生产不能忘了革命、阶级斗争，接近进攻性的意识形态主张。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让主抓业务的人为政治批判腾出时间和空间。1966 年后，它强调的侧重点又有了悄悄的挪移——革命不能影响生产，不能对国民经济起破坏作用，要维护生产，以使革命的合法性不至于受到损害。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让鼓动革命的人不要触动国计民生的根本，影响到穿衣吃饭等生活问题。

该口号的高调喊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大多数工矿交通企业、农村的生产受到很大干扰，有的企业与农村生产甚至陷于停顿状态时。生产线大面积停止转动，车站码头货物堆积，连必不可少的粮煤日常供应都陡然紧张。1966 年 9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号召全国在抓紧革命的同时，更要促进生产建设的发展。同时认为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生产建设才能大发展。

同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指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要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并提出了由群众选举产生的领导班子负生产责任。1967年以来普遍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组”第一线指挥部。在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原来主抓经济工作的经济工作委员会，就被命名为“抓革命促生产组”。但是，《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而且过于强调政治挂帅，忽视了生产的发展。

既是实务派对抗文革派的撒手锏，“革命不能影响生产”，赋予革命政治以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又为生产保留实际地盘，用革命的名义为生产签发通行证；也确实在事关国计民生的要害部门部分保障了生产。又是文革派的辩护策略，“革命不会影响生产”，借口磨刀不误砍柴工，而只磨刀不砍柴，要生产为革命让路，攻击务实派“以生产压革命”。意识形态的优先、优越地位，使“政治”、“革命”横冲直撞无往不胜，生产成了理不直、气不壮的受气小媳妇。甚至有造反派把生产受到冲击、滑坡的罪责也推到当权派头上，并以“破坏了生产”作理由对他们进行批判。这个口号成了一个争论缠讼的战场，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虽然如此，“抓革命，促生产”却从此成了“文革”中的一个主要口号，后来还由此衍生、发展出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及“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等口号。

1980年代有批评者说，当年“三支两军”的“所谓‘抓革命’，无非是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那一套（联合的目的还是要造所谓‘走资派’的反；文斗也是斗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即使在生产方面，也是搞了不少瞎指挥，推行了‘左’的东西”。

（参考资料：《林彪1966年1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讲话》；李德生《彻底否定‘文革’的一个重要问题——谈正确认识‘三支两军’中的错误》，《人民日报》1984.10.09）

##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毛泽东提倡的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齐名的体育政策，实际上形成了中国体育事业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政策主导下，体育的竞技性特征被淡化了，主张把政治功利性摆到第一位，体育服从于政治、服从于国家意志，特别强调交流情感、加强感情以推动处于被遏制状态下的中国外交发展。这一口号公开见诸报端在1971年，而实际在1960年代就已经形成并广泛指导中国体育实践。

谢晋成名作电影《女篮5号》（1957年）由于强调竞技非要拿第一不可，被批评为没有反映出党的领导，有“技术第一”“锦标主义”趋向，违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原则。文革中受到强烈批判。主张训练从严、技术挂帅、锦标第一被当作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修正主义体育路线”，受到严厉批判，世界冠军们也因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白专尖子”受到批斗。

1966年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邮政发行了《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邮票（纪121，4枚），1973年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北京举行，中国邮政发行了《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邮票（45-48，4枚），

画面没有亚洲体育竞技和亚非拉乒乓球比赛的对抗场面，只见亚洲选手、亚非拉运动员友好交流的情景。就是要宣传、体现那个时代国际体育赛事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

1971年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前动员时，周恩来反复交代、强调，体育比赛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国际斗争中既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广交朋友，扩大影响。实际是要乒乓竞技服从于国家政治需要。当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与郎诺柬埔寨代表团的比赛中就弃了权。由于带队团长赵正洪不熟悉情况，放任队员打败朝鲜主力队员、全部淘汰日本选手，回国还受到批评，并责令其向朝鲜官方负荆请罪。

最极端的是中国绝对领先于世界的乒乓球项目。1961年，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进入男子单打决赛的是庄则栋和李富荣。当时国家体委决定，要李富荣让给庄则栋，是考虑到庄则栋的潜力比李富荣更强，有可能在下几届世乒赛上继续夺冠。理由是人才是国家培养，就要服从于国家利益。于是，世乒赛冠、亚军之战，成了一场假打！这一举措客观上造就了庄则栋的三连冠。以后“让球”成了中国乒乓竞技源远流长、弊端丛生的潜规则传统。本来不让庄也可能拿下李，“让”的决策却在“让”“受”双方运动员心理都结下疙瘩、投下了阴影。造成胜者不光彩，输者输得委屈的后果，伤害了运动员，使得人才外流（何智丽、焦志敏、陈静等）。

1980年代以后这一口号逐渐淡出中国体坛。2000年代有批评者指出，“重义轻利的体育思想不利于竞技运动的开展和水平的提高”，“‘体育政治化’思想盛行时期，特别是‘文革’时期，中国体育事业总体上是处于涣散状态”。甚至是违背奥林匹克体育精神，搞权大于赛、弄虚作假，会给比赛的公平性、激烈性、运动员精神文明、观众感情等带来消极影响。并把它当成1990年代以来普遍存在的假球的渊藪。

但也有人为之辩护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内涵与奥运会名言‘重要的是参加，而不是取胜’相吻合，其意义与‘团结、友谊、和平、进步’的奥林匹克宗旨相一致”。

（参考资料：郭育《加强体育队伍的思想建设》，《红旗》杂志1975年第9期；赵正洪《我所知道的“乒乓外交”》，“为中华之崛起”[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c/yc\\_i/yc\\_i\\_029a.htm](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c/yc_i/yc_i_029a.htm)；叶永烈《是是非非何智丽》，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张泽洪，陈肖沫《“毛泽东与体育”研究综述》，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临汾）第18卷第4期2003年12月）

### 三个副词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被合称为“三个副词”。围绕它的使用废存问题展开的政治战争，是有史以来最罕见的修辞学争议。

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

理，一句顶一万句”。

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开始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尔后又正式出现在《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中：“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自此这三个副词成为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官方权威评价，写进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为当时已达狂热的毛泽东崇拜推波助澜，为打倒走资派、批斗抄家等集体越轨行为积蓄了巨大的心理能量。从此，报刊上的社论、文章一提到毛泽东，几乎都要用这三个副词。

毛泽东 1969 年审阅“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时，圈去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是毛泽东对林彪掀起的个人崇拜热潮进行“降温”的第一步，也是对他的天才论正式表明态度，公开进行抵制和批判的开端。

在 1970 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推动的修改宪法议程，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以免有人生出觊觎之心）。林为了坚持设国家主席，援引“三个副词”之一的“天才论”。他在会上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并要陈伯达连夜编选《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火速印发。借口有人利用毛泽东的伟大、谦虚反对毛，让人感觉一场重大路线斗争爆发在即，利用人们对毛的狂热迷信推动继续设国家主席的提案，得到一批盲目跟进者的拥戴。毛泽东写下了名义上批评陈伯达，实际是批评林彪的《我的一点意见》。明确指出：在才能问题上，我们只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决不能陷入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决不能同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1970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斯诺写道：“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

1971 年 9 月南巡返京途中，毛泽东再次利用追究“三个副词”，通过沿途接见的地方大员传话，“‘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声色俱厉地公开暗示对林的巨大敌意，以收敲山震虎的心理战威慑作用。成了林彪败落的预言，和日后全面清算林彪的正当性理由之一。

（参考资料：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 1993 年版；《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 年版；《对等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中国晶牛毛泽东思想网”；彭凯《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

## 小爬虫

爬虫是爬行动物的分类学科学定名以前的俗称。冠以“小”的词头给予限制，既形容丑陋、卑小又危害程度不大，含有蔑视的贬称意味。

主要被用来指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曾主持两报一刊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及受其牵连的一批人。在 1967 年夏天“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炮制、出台

过程中先后起过积极作用。常冠以“政治”的修饰语，与“变色龙”相提并论。他们出身低微，不是中共领导层通过级级宦海沉浮循序历练上来的，而是在文革意识形态批判中投机立功、一跃进入中共高层的外来人。没有根底。他们给人的刻板印象是：文革新贵，一时炙手可热的暴发户，乘势而起，对风向特别敏感，津津乐道于窥测方向、揣摩圣意，也敢于下注冒险；对中共党内的行为规则不在行，却适应了乱世英雄起四方的时势；他们唯一能倚仗的本钱就是唯上是从，下手特狠，没有政治道义感的制约，成为顺手的棍子；积怨甚多，一旦落水，没有人肯援之以手。

由于“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危及军队权力生态的制衡，引发了军队整体和元老的强烈反弹，影响到最后能控制局势的军队的稳定，毛泽东只能舍卒保车。让他们停职检讨，后被投入监狱。给他们安的罪名就是模糊而蹊跷的“小爬虫”。指控他们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虽然不足为患，却帮了刘邓党内走资派的忙。

对他们的清除，是向军队实力派和中共高层元老的暂时妥协、退让，但不会伤到文革派的元气，却可以使毛泽东摆脱政治上的被动局面。加深了毛泽东党内走资派根深蒂固、随时可能复辟、必须锄恶务尽的判断。

他们后来与1968年3月失意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捏合到一起，被指为“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说两者互相联动、呼应，成为后者罪名的一部分。号召“根据我们这两年的斗争经验”，“要警惕，高度的警惕，警惕两面派，警惕变色龙，警惕小爬虫”（陈伯达语）。“把斗争矛头始终指向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彻底扫除一切‘变色龙’、‘小爬虫’”。

这一称谓被迅速泛化，借用来指称不听招呼，继续派性对抗、干扰大联合部署、滋事生乱的派头头等一系列人。全国各地掀起了层层揪“小爬虫”、“变色龙”的浪潮。由于缺乏确定内涵，整肃、处分随意性较大，落网者众，也方便了对混乱局面的收拾、治理。

2000年代的语言流通里，有一种被用来作为小孩儿爱称的用法：“义乌小爬虫婴幼儿用品有限公司”；也被用以指称微型车：“小爬虫车队南京周边趣味游”。

（参考资料：《解放军报》通讯员、《解放军报》记者、《北京日报》记者《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掌握斗争大方向 狠抓阶级斗争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人民日报》1968.03.22；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海水群飞《告诉你我亲眼所见的政治小爬虫真实的生活》，“天涯社区”）

## 四清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运动后期，几乎全简称为“四清”。不同于1957年秋冬之间中国农村中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比较起来，四清的整肃味道更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似乎仅仅是一次正面的思想教育运动。

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的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我国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在实际工作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年年底到1963年初，一些地区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和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



清工分)工作,以清“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下干部的多吃多占、经济问题为目标。是河北省保定地委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为解决年终分配问题而创造的经验。运动方向具体而有明确边界。毛泽东肯定了这些做法。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于3月1日发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5月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前十条”对农村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文件传达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由此“前十条”对“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这实际上是在为大规模的“社教”运动作准备。

同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后十条”贯彻“前十条”的指导思想,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又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政策。意识形态内容更显突出。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规定将两个“十条”印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并在党内外宣读。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5、6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社教”运动问题时,对全国基层的政治形势的严峻性作了夸大估计,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四清运动大规模展开。

刘少奇不明就里,认定农村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交叉的背后是敌情严重、阶级斗争尖锐。派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化名董朴),整理出了一个《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习称“桃园经验”)。要求“访贫问苦”“扎根串联”,“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通过背靠背等方法展开对敌斗争、夺权斗争。补“土地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的课。该文件充分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使四清发展日益左倾;得到毛泽东称赞。

1964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发展、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加错误的观点(被称为“大四清”,而此前的则称为“小四清”)。重心已经转移到思想、政治方面,根本目的被概括为“挖修根”。反修防修的内容被放到了首位。到1965年7月,国营工交系统3.9%的单位开展了“社教”运动。1966年春,全国1/3左右的县、社进行了“社教”运动。

四清运动主要是依靠外部力量，依靠大量工作队，利用农民对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满，对农村利益格局进行重新分配，其做法与土改非常类似：首先是由城镇派遣大量的工作队进入农村，工作队进入农村后实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其次是对干部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清理整顿。第三是处理一部分基层干部，同时发展一部分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入党，提拔一部分人当干部。工作队员与农民的比例为 1: 25 左右，规模比土改时还大。

运动中，由于人为地制造了不少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事实，产生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如在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1963 年在 11 个区中共斗争了 331 人，其中被打的 21 人，被捆的 65 人，被吊的 3 人，被罚跪的 42 人。运动中发生干部对社员打击报复的案件；群众打骂、体罚犯错误干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个别地方发生了自杀性事件，北京市郊区自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至 1964 年 1 月 23 日，先后发生自杀事件 40 起。

四清运动的动能来自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积累的社会矛盾。那时以“反瞒产”等名义不少农民被直接迫害致死，间接迫害致死的数量就更多了。1958 年 12 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搜查和没收群众的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沷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

一些冤案往往是在不了解当地情况的上级工作队手中制造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后的落实政策工作中，大部分在四清运动中受处理者得到平反（平反的比重各地不同，有的地区超过 90%，有的地区在 60%左右）。

与此同时，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也进行得如火如荼，战火不断蔓延，频繁地展开了各种名目的批判运动。

1966 年 5 月，长达 10 年的文革正式爆发。在文革发动时，各地正按既定计划开展四清运动。为了能使文革顺利进行，各地都对四清运动进行重新部署，并把文革纳入四清计划之内，实际上是文革取代了四清。

四清运动对于解决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作风问题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多种性质的问题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的处理和打击。四清运动，实际上是“文革”发动的准备、预演。

（参考资料：李若建《安全阀：四清运动的潜功能》，中国农村研究网 [http://www.ccrs.org.cn/article\\_view.asp?ID=2668](http://www.ccrs.org.cn/article_view.asp?ID=2668)；陈佩华、赵文词、安戈：《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转自《开放时代》1999 年 5 月号）

## 翻案风

指称推翻原来的处分、结论、评价等的政治行为、社会思潮。是一种负面的否定性描述、判断、指控。

20 世纪的中共党内斗争、国共内战、政权易帜以及 1949 年建政后一个接一

个的政治运动……“一些阶级（恒河沙数的个人置身其中）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个人命运以处分、结论、评价等形式，被固化、闭锁在社会组织体制和庞大的档案库里。它积聚起来的数量、能量，成为社会压迫和强制性威慑力的组成部分。这一社会分裂提示的社会对抗，既维系着、也销蚀着现存统治。

围绕这些处分、结论、评价的争论、攻守、甄别，一直困扰着施受双方当事者。由于定案事实认定和结论的随意性、涉及面的广泛性、后果的严重性（通过阶级斗争、贯彻阶级路线等制度累及当事者亲属、子女），一些明智的组织管理者感到其消极后果已经危及社会活力，不断有施受双方重新复查、审理积案。

在普遍紧张的社会结构中，这些敏感的质疑-回应远远超出了就事论事的范围，而被赋予更加广泛的意义：1962年前后清算、化解造成三年困难局面的努力被反攻者指为翻案风，1965年文革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矛头据说就是背后的翻案风，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整顿治理后来被定性为右倾翻案风，都在固执定见的人们那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弹、攻击。在1960年代的批判热潮里，小说《刘志丹》的创作，被说成是习仲勋为“高岗翻案”，“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文革中电影《怒潮》被指控为替彭德怀树碑立传和鸣冤翻案；描写1950年代农村生活的小说《风雷》被戴上“翻案”的帽子，说作家“捏造了一个所谓‘特殊落后’的黄泥乡，把总路线光辉照耀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污蔑得一塌糊涂”，“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给三面红旗抹黑”。

个人性质的历史复查请求也被一律赋予政治含义，不论事实怎样，都要被上纲上线为与党闹对抗、闹独立的高度；对“翻案风”神经过敏的批判，成为政治正确的固定观念，堵绝了历史纠错的可能。个人的卑微、不足道，使他理所当然地被屏蔽在议事日程的视线之外。人们在噤若寒蝉中瑟缩，连跳猴筋的女孩子唱着儿歌时也唱“反击右倾翻案风”。冯雪峰在文革间歇期曾天真企图提出重新入党问题，被现实感更强的朋友劝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劝阻是明智的，至少是避免了更大麻烦的问候。积案的迁延，使左倾错误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得以继续发展、延续。

文革后为了实现社会和解，大面积清查历史积案，创造了一个平反“冤假错案”的名词。1980年代初期一个法院系统的统计数字指出，重新审理的文革反革命案件中冤错比例约占64%，有些地区达到70%或80%。

（参考资料：新华社《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12.31；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人民日报》1965.11.30；舒积成《一具僵尸，三个鬼影——评反革命招魂幡——〈怒潮〉》，《人民日报》1968.04.03；江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1980年9月2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人民日报》1980.09.17；余焕椿《“文革”前夕的〈人民日报〉》，《百年潮》2004年第5期）

## 勒令

用命令方式强迫、强制人做某事，通常是执法部门中人才拥有的权力，强势之于弱势人群的说话方式。文革初期成为造反派向被称作牛鬼蛇神的人下达命令的专用语，充满灾难将至的恐吓意味。主要流行于1966年—1969年。类似的词还有“通令”、“禁令”、“号令”等等。

“勒令”用于强迫走资派靠边站、牛鬼蛇神揪出来，写材料交待问题，端正

态度，在种种罪名里主动对号入座，自证其罪，交待与刘邓黑线在历史上的黑关系，交出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或珍稀藏书、藏画、财物，交出私人存款，停止、取消拿定息、股金的寄生虫行为，出租房屋者上缴白拿的房租给国家，离开以前从事的工作岗位，做冲刷厕所、修补牛栏等惩罚性繁重体力劳动，限令多少时间内（几小时、两天内）搬出自己的宽敞住房，搬进没有暖热供应的简陋房屋，烧毁与无产阶级革命习俗、文化不相宜的什物（书画、旗袍西装等奇装异服、胭脂香水、旧照片），强制迁离市区，遣返回乡，命令丈夫或妻子与被划入敌我矛盾的一方离婚以示划清界限，不允许公开表达宗教信仰并从事宗教活动……勒令有的是直接口头告示，有的是大字报墨迹训告，有的被安排学习毛泽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有的是专门负责管理牛鬼蛇神的小头目，有的就是造反派组织或革命群众中的随便什么人。勒令的常用词汇有“不准乱说乱动”，“不许”、“不得”、“必须”……“如有发现，格杀勿论”等，给人以预警，促使其低头顺服、避免因对抗姿态而招致不能预测的更糟结局，因为它后面是可以给不驯服者加上种种罪名、批斗、游街、打骂、关押，甚至移交公安机关的权力。

勒令是文革极端时期法律-话语秩序暴戾之气肆行无忌的外部投射。是暴力、混乱、冲突、自说自话、无政府主义的集中投射。在它面前，人就象一只可以被随意踢来踢去的皮球，没有任何个人尊严，随时可能遭遇灭顶之灾。人人都可能成为它的人质。这些勒令的发布，仅仅是造反派、革命群众的一时兴起、即兴创造，没有理性的思虑、论证、推导，更没有法律条文作根据。带有闹剧色彩。今天可以这样说，明天可以那样说，可以朝令夕改。但个别内容仍然表现出维持最低限度秩序、避免完全混乱的要求，如抄家需持红卫兵组织证明，应打收条等。

勒令是让牛鬼蛇神自觉就范的第一步，它以后续的武力相威胁。是精神恐吓，却不是全然空言无据的恐吓。所以在暴力面前如惊弓之鸟的多数人，只能被迫选择顺从。因为勒令的命令是明确的，不服从的后果是不能预测的。有多少人仅仅由于态度不好，无事也变为有事，小事也变为大事，遭致可怕的惩处，以杀一儆百。这种以自我保存为宗旨的选择，没有选择的选择，恭顺的服从，客观上也助长了“勒令”这一法外施虐的有效性。

这一用语也被移用于派性组织间的警示语，勒令对方放弃敌对行动，认错、服输、道歉甚至解散等等，带有最后通牒的霸道色彩，显示强烈敌意。其实只是一种无效的自说自话。多见于武斗期间。

有时勒令也被用于越界的行为：一些国家的驻华外交官外出时，他们被勒令佩戴毛泽东像章和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他们所受的教养使他们感觉受到了侮辱。这些无视内外有别的“革命行动”，很快遭到中共中央的明令禁止。

（参考资料：《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随想录〉》，载《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http://www.china.org.cn/chinese/zhuanti/443243.htm>；《“文革”风浪中的外交部》，《文汇报》2004年12月19日；）

## 农业学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位于昔阳县城东南5公里的虎头山下，地处太行山腹地，平均海拔1000米，总面积1.88平方公里。1949年前那里是七沟八梁一面坡，自然环境恶劣，人民生活十分艰苦的贫穷小山村。

1952年大寨建立合作社，当年取得丰收。最早入社的农民尝到了依靠集体

力量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获得丰收的甜头。当年底整个大寨农户都入了初级社。1956年，中国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普遍试办高级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高级社。依靠集体化后形成的经济力量和农民的生产热情，对大寨土地进行了初步改造，以陈永贵、郭风莲等为代表的大寨人建设起层层梯田，并引水浇地，连年取得丰收，粮食生产自给有余，还上交国家。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

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现场会，对大寨党支部工作经验和农业生产管理经验进行了概括，并在全地区加以推广。

1963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百分之七十农民无家可归。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拨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但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却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决定：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

这年大寨大队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在大灾之年夺得了丰收。粮食产量不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平均亩产达到700多斤，总产量达到了20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12万斤。

山西省委派干部到大寨进行认真的调查和总结，将其树为先进典型。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要向大寨党支部学习，党员要向陈永贵学习。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同年底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这句口号从此一直流传到1970年代末。大寨、陈永贵经验，当时被总结为（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会议上的概括）“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到1965年9月全国产生了52个大寨式先进典型。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山东黄县下丁家大队、湖南岳阳县毛田区、河南林县等。由毛泽东提议，周恩来亲自布置11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全国省、地、县级领导干部，都到北京参观了这次展览，对各地学大寨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各地来参观的干部回去以后，几乎都作出计划，要在每个县都树一个学大寨典型大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

1965年、1966年中国农业连续两年丰收（全国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3.5%和8.1%），被算到当时全国农村通过学大寨，树立苦干实干精神的账上。周恩来一生曾三次陪同外宾到大寨。第一次（1965年5月21日）是陪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斯皮罗·科列加率领的阿国政府经济代表团，第二次（1967年4月9日）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副总理武元甲，第三次（1973年4月23日）陪同墨西哥总统阿尔瓦雷斯和夫人来大寨参观访问。越来越多的人来大寨参观学习，到1967年开始形成高潮，全年来参观的人共有370多万，高峰期竟然达到每天数万人。学大寨也成了当时旅游幼稚期最火红的公费旅游项目。为了接待外宾和中央领导人，推平了一个小山建起了青石窑洞和平房的中国旅行社大寨支社，后来填了一条沟建起了拥有现代化楼房的国际旅行社大寨支社。

大寨经验推广时正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动，也被套上了“四清”框子。当

时山西省委在总结大寨经验时认为，它不仅是发展生产的典型，而且是在农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说从建立互助组起“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到1966年3月陈永贵介绍大寨经验时，就有意识地强化政治，强调阶级斗争：“首先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影响，使集体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一切工作的纲。”相当典型地反映当时运动一政策一先进典型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央每发动一个运动，新华社记者就在上级精神安排下蹲守着大寨要新经验，大寨也在这样的内外合力推动下成了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达到“要什么经验，有什么经验”的程度。

1967年陈永贵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又任山西省委副书记。1969年中共九大被选为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之一，并当选中央委员。1973年中央召开十大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召开四届人大时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的“普及大寨县”运动，就是让全国农村都学大寨经验，建设成大寨式农村。运动也有具体的生产指标，粮食亩产量要达到或者接近大寨的亩产量，但更主要的是推广大寨的抓阶级斗争和政治工作经验。大寨的经验进一步被概括为：一天也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一天也没有放松无产阶级专政。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了到1980年要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的目标。

但农业学大寨运动此时已经走入末路，不仅没有为中国农业找到出路，反而强化了人民公社的固有弊病。农民负担沉重，收益下降，普遍陷入贫困境地。连年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大量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钱粮，把社队“搞空了，搞穷了”。农民收入20年间几乎没有提高，1976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还低4斤，人均年收入在6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38%，全国有1.4亿农村人口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农民开始自发寻找新的出路。还在1978年“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就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口号。“落实政策”的内容涉及到：一，改善按劳计酬，落实分配兑现；二，提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包括尊重生产队的所有权、分配权，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三，减轻农民负担，特别是缩小农田会战规模，减少对农民工的无偿平调；四，解决干部打骂、克扣农民的违法乱纪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再要求全国搞所谓“普及大寨县”的达标活动，全会公报甚至连“学大寨”的口号都没有出现。

1980年下半年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从路线上”一分为二地总结山西省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把“文革”前的大寨与“文革”中的大寨区别开来，把大寨作为治山治水、改变农村面貌的生产典型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典型区别开来。基本肯定前者，对后者进行了系统批评和彻底否定。指出大寨、昔阳经验中的“左”集中在“三条基本经验”：“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促大干”。这一经验的核心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体表现为：不断地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乱批乱斗使相当多干部群众遭到迫害，有的致死，有的致残；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限制社队集体工、副业，扼杀多种经营，取消集市贸易；不断地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干部群众把“大寨工”叫做“大概工”、“混混工”。昔阳在农田基本建设中，“一平二调”问题相当严重。实质上是从所有制到交换、分配、劳动管理等各方面不断地限制或剥夺农民，所谓“七斗八斗”说明这种剥夺是用强制手段进行的。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出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批语指出：文革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大寨工作中执行左倾路线的错误，是违背大寨社员群众的意愿的。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当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不应当人为地去“保”。那种把先进典型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生产情况和耕作习惯千差万别，农村经济水平也很不相同。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一个典型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

（参考资料：霞飞《陈永贵与大寨》，《文萃精华》2005年10月；肖冬连《一个时代的终结：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总结》，《党史博览》2004年第11期；宋连生《农业学大寨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一元化领导

一元化原指“由多样向单一发展；由分散向集中发展”。把它用于规定政治体制的性质，即指称党委大权独揽和重要工作由党委决定的领导体制。毛泽东指出：“这样分工而又一元化方针，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许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P901，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这一体制是中共在夺取政权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历史形成的，那是一个处于非常状态、需要权力—意志高度集中的特殊年代[注1]。其具体运转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意见无法一致的情况下，一把手赋有决断权。1949年建政初期曾安排过一批非党人士担任政府部长职务，部分带有准联合政府的色彩。但中共从未放弃一元化领导体制，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公有制成为主导性的单一经济成分，1957年反右后非党人士更加急速退出政治舞台。

至文革一元化领导体制被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注2]：一则因为经过天下大乱的红卫兵造反运动，派性组织林立，强调一元化领导有利于社会稳定，有运转功能上的需要[注3]；一则因为毛泽东个人专断的领导作风影响到全党、社会各领域，成为时代政治的个人色彩；一则因为谁战胜谁的阶级斗争被强调到惊人严重的程度，中共当然必须占据压倒优势的政治地位。1968年3月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说：“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1973年8月24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组织上应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文革时期政治权力高度集中造成民主空气稀薄，权力的滥用，统一战线形同虚设，无法调动其它社会力量，中共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也被大大侵蚀、削弱

了。

1980年代邓小平基于文革教训，对党和国家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作过深刻分析：“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此思想指导下剖析了滥用一元化在文革集中表现出来的弊端：一，必然走向家长制，使主要领导者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破坏集体领导，“大权独揽”堕落为“凡权必揽”、“凡权尽揽”；二，易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阻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三，容易导致一言堂，造成思想僵化，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四，权力高度集中，必然导致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并产生严重的特权和腐败现象；五，导致政治成本高昂，财政不堪重负；六，容易造成重大决策失误，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1980年代、1990年代推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党政分开的目标，试图靠理论方针、路线和政策，来达到实现党的领导。但由于党的地位、政治体制未变，东欧突变等国际政治因素影响，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政企分开的经济改革目标也每每搁浅，难于实现。

[注1]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全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经此调整，中共中央将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力量彻底“请出”，实现了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并奠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至尊地位。

[注2] 该词浮现率的峰值在1968年（8.08%）、1969年（13.21%）两年。是文革权力重建的阵痛过程。而另一个高潮则在1975年（9.03%）、1976年（11.57%）、1977年（8.21%）间。

[注3] 军队“支左”、介入地方政治斗争，并由军队干部主持各地、各单位工作，使“一元化领导”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几乎全由军人所把持。从组织系统角度保证了一元化，保障了天下大乱时的稳定。但由于打破了政治生态平衡，又迅速被毛泽东瓦解、否定。

（参考资料：王洪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马晓黎《我国一元化领导体制面临的困惑与改革探索》，<http://www.qddx.gov.cn/journal/20040307.htm>；王贵秀《政治体制改革为何不能缓行》，《半月谈内部版》1999年第11、12期；温相《从秘书处到书记处——毛泽东强调一元化政治领导的范本》，“飞扬军事”）

## 反修防修

反对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的合称、简称。[注]

1958年代末毛泽东拒绝赫鲁晓夫访华时提出的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的主张，致使两国关系恶化。1960年代初，由于中苏两党领导人执著于论战，并把两党论战扩大为两国之间争端，苏共对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经济压力，迫使中共和中国政府不得不对苏共“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行径展开斗争。但在



对苏共理论的意识形态界定上，中共认为反思斯大林主义是“修正主义”，因而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其间亦杂有在国际共运中扛旗意识形态图谋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军事考量，并以此在党内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

其实对什么是“修正主义”的界定模糊，中共当时并无准确的解释，反而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东西，将苏共调整国内外政策的改革措施、党内外正常的不同意见看成马列主义异端；把中共党内一些在大跃进遭挫后顺应客观形势休养生息的主张看成对他个人权威的挑战，当做“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来批判，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领导干部指责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6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各项政治和思想斗争均是围绕着“反修防修”这个命题展开的，致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在思想文化领域，许多文艺作品亦被错误地扣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草之类政治帽子。它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扩大化。

1962年1月初，毛在接见日本客人时谈到：高岗、彭德怀是修正主义者，同国际修正主义者有联系。在随后的七千人大会期间，毛又进一步提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国家。以此作为抵御普遍批评的一张王牌。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总题目是“反修防修”，集中讨论国内防修和国际上反修的问题。

毛泽东认定，苏联所以产生修正主义，在国内是本国资产阶级的产物，是贵族工人和富裕农民的产物，在国际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产物。苏联为修正主义所控制，已经是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而中国全国有地主资产阶级3千5百万，在工厂、农村、机关，有那么少数人就赞成修正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搞了15年社会主义革命，结果还有一些人民公社在敌人手中，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则为资产阶级所掌握。对党内存在修正主义份子的估计更加严重化了。把对修正主义的防范作为摆脱个人政治窘境、反败为胜的战术。以战术为战略。

反修防修成为发动“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的理由。毛泽东“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把文革当作“反修防修”的一场重大实验和演习来进行。“反修防修”的狂热情绪刺激了红卫兵的“过火”行为，神经过敏地把一切文化都当成封资修来革除，甚至论断“知识越多越反动”；以斗私批修为号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把道德政治化，进行广泛思想治罪和控制，彻底取消私人生活空间，把中国社会整个儿变成了一座集中营；批三名三高，批物质享受，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灭绝、删除人的一切欲望，以此从根本上堵死变修的途径；把商品社会、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用大锅饭、平均主义神话点缀无差别的理想社会；把“资本主义复辟”、“千百万人头落地”作为“和平演变”、修正主义上台的恐怖预言，反复描绘，以构造、推动人们对现存秩序的倚赖、认同；创造新世界的乌托邦憧憬，使人们把一切秩序、制度都当成条条框框来砸烂，在反现代化的幼稚遐想中折腾“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工农兵上讲台”、“群众专政”等新生事物自娱自乐……

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修正主义概念，从而使得文革的发动被釜底抽薪地抽掉了逻辑前提。1990年代以降，新左派在学术界崛起，一种反启蒙、强行割裂自由和民主、乃至推崇文革的势力开始形成，其灵感来自当代西方文化批评理论，包括其中的文革情结。

[注]该词浮现率分布为1968年4.2%，1974年9.23%，1975年35.77%，1976

年 37.46%。说明文革后期对文革的合法性质疑达到高潮，围绕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形成了激烈的对峙。

(参考资料：程越《学好理论 执行政策》，《红旗》杂志 1977 年第 6 期；李丹慧《1964 年：中苏关系与毛泽东外患内忧思路的转变》，“冷战中国网” 2005-6-29 <http://www.coldwarchina.com/zgyj/wjjc/001641.html>；郭建《当代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幽灵》，《二十一世纪》2006 年 2 月号)

##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发出的号召。主要流行于 1969—1972 年间。

1969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大会开幕和九届一中全会上都发表了讲话，中心内容就是“团结”问题。他希望“九大”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可见其时中共党内和中国社会普遍处于分裂状况，团结已经成了头等大事。从 1967 年到 1968 年经历了近两年的折腾，才在三支两军、军队干部介入地方政治[注]的框架下勉强完成全国地方政权重组，而派性瘟疫流行的结束仍然没有可预期的时间表。“一打三反”那样空前严厉、连死刑核准权都下放了整肃运动就是为了扫除影响政局稳定的消极因素。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的政治家们整天穷于应付局面的忙碌，连一个稍微象样、具体的奋斗目标都无法确定、提供出来，只能以一个热热闹闹、空空洞洞的“更大的胜利”相号召、期许。把“已经取得胜利”作为话语出发既定前提，要求“更大的胜利”，就免去了对“已经取得胜利”的证明责任；是诡辩技巧之一。一如当时张扬而浮泛的文风。

此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教导”见诸报端，还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期，尤其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增强党内和人民内部团结的一句流行口号。成了 1972 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标题。仍然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以“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代词指称已经折戟沉沙、尚未公开谴责的林彪，控诉其“里通外国，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要求“继续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这样的口号不但被粉刷在机关营房、车站港口、街道广场的大幅标语上，置于报纸、信笺的天头，插播在电影正片放映前的幻灯片上，装饰在茶杯、脸盆等实用器具上，作为篆刻治印的内容，还被印到粮票、布票上——辽宁发行的布票（辽宁省革命委员会 伍市尺 1970 年布票 物品号：330004885793）就印有这样的字样。同一题材的宣传画也不止一种：有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赵大鹭作，大全开的（画面是工农兵群众簇拥着挥手的毛泽东），“藏品交易频道”2005 年（[http://trade.artron.net/buy/show.jsp?collection\\_id=12834](http://trade.artron.net/buy/show.jsp?collection_id=12834)）叫价 2300 元；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出版、李敏和胡希仁绘制的同名宣传画（画面是工农兵、各族人民相聚一堂）。1974 年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编号 J2 纪念邮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全套共 1 枚，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主图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像构成，象征着中国人民决心团结一致，争取建设祖国的更大胜利。1974 年署名为“辽宁省革命样板戏学习班歌曲”（实际为刘文玉词、秦咏诚曲，辽宁歌舞团演唱，董军工、顾企兰领唱）的

创作歌曲“结句”就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注]虽然军政分开本来是现代政治的一个严格禁律，中共党史上也有党指挥枪的传统。但当时的政治现实已经使最高当局无法顾忌，而只能依靠解放军这一尚未分解的统一力量了。

(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七〇年九月六日)》人民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票目录》，人民邮电出版社 1997 年版)

## 社会帝国主义

源于列宁 1910 年代的定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也称“社会沙文主义”[注 1]。这是列宁批评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的论断。因为后者被指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鼓吹对帝国主义战争持“中间立场”，为“保卫祖国”的口号辩护，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中，对政府军事拨款问题不投赞成票，也不投反对票，而投弃权票。被认定是“公开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而列宁的主张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

自 1960 年代初期中苏两党、两国交恶之后，苏共领导集团继续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甚至动用武力（苏军 1968 年对“布拉格之春”以突然袭击方式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并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时时制造挑衅事件，1969 年初屡次侵犯中国东北（黑龙江珍宝岛）、西北（新疆铁列克提），招致中国政府、人民和军队的反击。“社会帝国主义”的称呼[注 2]，是借用苏共第一代被公认领袖的语言、逻辑，来为当时苏共领导人命名，揭示其社会主义理念与帝国主义行径嫁接的内在矛盾、悖谬，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话语策略。按当时的解释，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帝国主义”，主要是指苏联领导集团。1979 年版《辞海》延续了文革观点[注 3]说：“赫鲁晓夫集团[注 4]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打着‘社会主义’、‘和平合作’的旗号，推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侵略扩张政策，成为最危险的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

与新沙皇的谴责性修辞同义，但语体色彩显得更学理化、更正宗列宁主义，也多少含蓄一点。但其指控的强度并不稍减。

“打倒社会帝国主义”是 1969 年中共建政 20 周年国庆提出的口号，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和立场。这个口号一直沿用到 1980 年代初期。如果说，1969 年还有基于边境冲突的现实紧迫感起作用，1970 年代的许多时候更主要地把它当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对外、对内政策合法性的支撑。

邓小平后来否定了苏共修正主义的批评，却仍然认为反对它的扩张、称霸的政策是正确的——虽然对使用激烈的意识形态语言的有效性有保留，主张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

[注 1]使用得最多的概念是社会沙文主义。

[注 2]这一用法始于 1950 年代，而普及于 1968 年，1969 年 (14.23%)、1974

年 (10.38%)、1976 年 (18.26%)、1977 年 (13.82%) 该词的浮现率达到峰值。

[注 3]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 (1977 年) 仍然认为:“苏联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到处侵略扩张,使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同它的原则争论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坚持同它的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90 年代以后修订的《辞海》删除了该条。

[注 4]其时已经是勃烈日涅夫当政。但中共仍以“赫鲁晓夫集团”称之,源于指控他们的本质、政策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勃烈日涅夫时期的政策设计多沿袭、少创意,也是事实。

(参考资料: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见《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论第三国际的任务》,《列宁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人民日报》1970.04.22)

## 单位

原指禅林僧堂中僧人坐禅的座位。因在座位上方贴有各人的名字,故称单位。在英文中 Unit, 是一个单元、一个位置。现代以此词指计算事物数量的标准。后也把机关、团体、军队、厂矿企业、公社大队、学校、医院、街道等或其所属的某一部门称为单位。

该词具有超强的构词-繁衍能力:各单位、本单位、原单位、所在单位、有关单位、个别单位、对口单位、相关单位、上级单位、主管单位、直属单位、所属单位、基层单位、新闻单位、出版单位、文教单位、演出单位、文物保护单位、保密单位、科研单位、工交单位、先进单位、重点单位、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单位、集体单位、全民单位、工作单位、用人单位、建设单位、立档单位、主办单位、协作单位、挂靠单位、单位级别、单位宿舍、单位食堂、单位领导、单位职工、单位意见、单位上……

单位制是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产生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文革时单位的重要性达到极致。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位一体功能。单位所有制性质决定着人们来自工作组织的获益,单位行政级别也影响着人们的福利水平。对于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历程而言,进入好的单位就等于获得好的社会职业地位;其次,好单位也为个人进一步的地位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最后,单位资源带有一定的“代际遗传性”。其外部特征有:收发、传达室,食堂,大院式围墙,大门旁的挂牌,公章、介绍信等等。

单位是中共基层组织活动的场所,党委书记、行政首长(工厂厂长、公社社长、医院院长、公司经理、学校校长等等)是由上级党委任命的党政兼任的负责人。其主要职责是向上级负责,保证政令的畅通贯彻,使中共的管理网络覆盖全社会,直至神经末梢。行政负责人也是中共党员,或者是书记,或者是副书记,但终极处分权在书记手中。单位就兼有了机关的性质,经营只是单位所需处理的众多事务中的一项。

单位是自然人就业谋生的场所,它不但管你的职业培训、使用、升迁、工资,还管你的户口登记(未婚者有集体户口)、粮食标准,和住房分配、公费医疗、退休养老等福利(从洗漱用品、鸡鸭鱼肉的发放,到交通车和夏季高温、冬天烤

火费)的获得(从摇篮到墓地);你几乎是终身属于这个单位了,无论是否与你的专业对口,你对它的满意程度如何,社会流动的概率很小;管着你的人事档案,除了职业表现外,它还主宰着决定你社会地位高低的政治生命,入团、入党,右派、先进分子的评定都在单位;结婚要在单位开介绍信,闹家庭纠纷由单位调解,家里人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单位要劝你划清界限、离婚;被盗了要由单位报案,司法机关办案(拘捕、判刑)要征求单位意见;连生育指标由单位替你办理,发放防疫、灭鼠药要通过单位……有了单位就有了家的感觉:它没有办不到、也没有不办的事情。

毛泽东“五·七指示”要各行各业都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为把单位办成党政社经文卫集于一体、自给自足的社会,勾画了蓝图。这一浪漫设计,把非经济目标加之于作为生产实体的厂矿企业、农村,取消社会分工,由单位办社会,其大锅饭的超经济特征发展到了极端。使单位穷于应付,彻底丧失了活力。文革后期由于经济发展乏力,安排就业困难时发明了顶替就业制度,子女就业顶替也在父母单位。从业于全民单位的父母亲,都想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子女安排或调动进大全民单位——父母受益于好的单位部门,一定意义上也意味着下一代能获得好的单位地位。形成了“近亲繁殖”,单位成了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家族组织。

所以“你是哪个单位的……”,成了中国人第一次见面的习惯问候语。因为其中凝聚了受询者关于职业、身份、经济状况等最重要的信息。媒人做媒的第一要务也是介绍双方都是什么单位的。

1980年代开始、1990年代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一就是改变单位办社会的体制,因为这一职责使它无从专注于以投入产出为评价标准的生产经营。住房、医疗、养老渐次从单位剥离出来,而由正在创建的社会保障体制代之。市场成为资源配置主体,单位的资源独占性被打破,其影响力也急剧下降。1992年以后,单位的好坏,除了垄断性行业(银行、水、电、气、铁路、电视、新闻、出版、教育、医院等)逐渐沦为一般性的影响因素,甚至出现倒转——原属于好单位的人们反而更有可能流向较低的社会阶层,比如国营企事业单位人员随关、停、并、转和破产的大量下岗。

研究文献: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田毅鹏、漆思《“单位社会”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王沪宁:《从单位到社会:社会调控体系的再造》,《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5年第1期;李汉林、李路路《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

## 南京长江大桥

建成于1968年,是长江上第一座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上层公路桥长4589米,车行道宽15米,可容4辆大型汽车并行,两侧人行道各宽2.25米;下层的双线铁路桥长6772米,宽14米,两列火车可同时对开。江面正桥长1577米,其余为引桥,是我国桥梁之最。大桥共有9个桥墩,最高的桥墩从基础到顶部高85米,底面积约400平方米。正桥桥孔跨度达160

米。

正桥路栏上，公路引桥采用富有中国特色的双孔双曲拱桥形式，正桥两边的栏杆上嵌着 200 幅铸铁浮雕，人行道旁还有 150 对白玉兰花形的路灯，洁白雅致。南北两端各有两座高 70 米的桥头堡，堡内有电梯可通铁路桥、公路桥及桥头堡上的了望台。堡前还各有一座高 10 余米的工农兵雕塑。

1958 年 9 月，中国政府决定兴建南京长江大桥。选址定在南京市下关和浦口之间。由于这里水深 30 至 40 米，水下泥沙覆盖层厚，江底岩层情况复杂，外国桥梁专家曾预言：在南京造桥，基础工程这一关就过不了。中国建桥工人和技术人员根据江底不同的水文地质情况，分别采用几种类型的管柱基础和沉井基础，攻克了基底质量检验与水下焊接、氧割等技术难题，终于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这是桥梁工程中的创举。

新华社报道说，“南京长江大桥的全面建成通车，把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线沪宁线[注]连接了起来，把大江南北的公路交通连接了起来，在政治上、经济上、战略上有着重大意义”。“……实践证明，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定不移地依靠工人阶级，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就能创造出人间的奇迹来。”

大桥曾以“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拍摄了纪录片《南京长江大桥》，大型漆器平磨螺甸座屏“南京长江大桥”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展，油画《南京长江大桥》入选 1974 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在 1981 年 6 月 27 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称为 10 年文革的重要建设成就之一。大桥设计、勘察者因此在 1990 年获得中国设计大师和勘察大师称号。描写大桥的文章还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文。

2000 年代有报道说，当初设计的车流量仅仅为 1 万—2 万辆，现在它的公路荷载量已经是设计时的 5—6 倍，列车编组也已经比设计之初翻了几倍。虽然 30 多年来进行了多次维修，但由于管理权属、体制争议，资金不足，技术力量薄弱等原因，加之老化损毁、铁路提速，大桥引桥梁体横向振幅早在多年前就已经超过设计限制；2002 年，大桥有两孔钢梁支座更是严重变形损坏(后成功更换)。大桥两侧的栏杆很多已经被破坏，有的甚至裸露出里边的钢筋，很多栏杆断裂。

灯饰工程收点后的整座大桥如彩虹凌空江上，十分壮观。每到晚上，桥栏杆上的 1048 盏泛光灯齐放，桥墩上的 540 盏金属卤素灯把江面照得如同白昼，加上公路桥上的 150 对玉兰花灯齐明，桥头堡和大型雕塑上的 228 盏钠灯使大桥像一串夜明珠横跨江上。并被列入南京的旅游景点。

1931 年美国万吨级“加利福尼亚”油轮曾自长江口直达武汉。但南京长江大桥净空高度仅有 24 米，丰水期仅能通过 3000 吨级船舶，万吨级外轮根本不可能通过，严重限制了长江水运作用的发挥。欧洲的莱茵河虽只有中国长江流量的 1/6，但其货运量却是长江的 6 倍。因为莱茵河管理部门科学调配运输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河流的承载能力。因此有人提出炸桥的主张，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注]后来连通的还有宁芜线。

(参考资料：新华社南京长江大桥工人通讯员、《新华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工人阶级的壮丽凯歌——记我国工人自力更生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英雄事迹》，《人民日报》1968. 10. 04；大河报《南京长江大桥已不

堪重负 体制之伤大桥永远的痛》，2004年11月25日；新民晚报《专家：炸南京长江大桥绝不可能 “增高”无意义》，2006年05月11日）

## 群众专政指挥部

简称“群专”。由各单位抽派人员（一般要求出身好，年轻而身强力壮，较多复转军人）组织的，经官方认可并代行公安部门维持治安秩序的半官方半民间组织。有的存续期是一年（1968—1969年），有的时间三年或更长一些（1971年撤消或更晚）；更名为“地区治安联防指挥部”。有点儿类似旧时代团练那样的居民区域性联合防卫的自助组织。主要是按地域区划（市、区、县、公社）设置[注1]，上下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隶属于革委会的政法、保卫组。个别地区的群众专政指挥部甚至是从文攻武卫指挥部承袭、转变而来的，与派性组织有很深渊源。

这一方面是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数量众多的失学学生、停产青年工人队伍，造就了能量极大的不稳定因素，而砸烂公检法使司法公安系统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客观情况需要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填补治安空白。一方面，群众路线、“全民皆兵”的社会动员模式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政治理论[注2]，也为这种机构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它一般担任治安巡查、维护公共秩序，处理暴力冲突型的民事纠纷、抓获的偷窃分子等职责。实际兼有上门警告、羁押（有的称为学习班）、问讯、搜查、刑讯[注3]、处罚等权力。羁押时间长的可达数月。在清队、一打三反等政治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注4]办公地点是本地区征用的公用建筑。与派出所的功能有部分重叠、相似（但不管理户籍）。有的甚至规定公安部门凡属需逮捕、少教、劳教的对象，必须与之讨论，并征得同意后才能决定。由于它的成员是临时抽调、组合的，人事、工资关系仍在原单位，只拿一定数量（通常很微薄）的津贴，不便管理；同时缺乏必备的法律常识，足够的专业技能训练，廉明公正负责的政治素质和职业精神。所以常有畸轻畸重的处置，挟隙或受人请托而报复重责、徇情开脱，甚至随心所欲的过分使用武力而造成伤害。用殴打的方法刹刹当事人的傲气，介入私人间的纠纷冲突，擅作主张、随意拘留的情况时有发生。法外执法的异化特征突出。

随着政治挂帅的全社会泛政治化，司法专政职能由专职机构外移，罪与非罪的认定及处罚分寸较多听取单位领导、人保组和群专等行政部门、社会组织的意见；连缺乏法律依据、较难掌握的“民愤”大小也列为量刑尺度。在个别地区他们甚至握有司法权，如浙江常山县被“群众专政指挥部”判刑的有四百多人。公安司法机关则主要成了执行机构。江青曾有言：“内蒙古阶级斗争比较复杂，革命群众挖出了一些坏人和一些反动党派组织，群众专政指挥部是个好形式。”

1970年代末期的批判清算指责说，这一组织“一不要党的领导，二不要专门机关，三不要社会主义法制。他们私设‘公堂’，任意判群众的刑。”“到处私设公堂、私立监狱、滥施刑罚，对广大革命干部，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进行骇人听闻的法西斯镇压。群众专政完全变成了对群众的专政。”而县、社、队干部私设公堂，任意处罚、鞭打群众的“群众专政”，在文革后不同时期仍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在21世纪人们漫画化的记忆里，他们已经成了“一群头歪戴军帽，手持皮带的打手”，“可以于光天化日之下，以‘革命’的名义随意抓平民

打人，他们打死一个人，就像捏死一只蚂蚁”。

[注 1]少数大型企事业单位也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

[注 2]1967 年毛泽东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注 3]江西万年县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贡子、站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

[注 4]《中国石家庄大事记》载：1968 年 3 月 18 日 石家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改称群众专政指挥部。在群专字第 1 号公告中提出“刮十二级台风”的口号。《石家庄日报》发表社论：《刮它一场群众专政的十二级台风》。从此，各单位也相继成立“群众专政”机构，搞所谓“揪叛徒”、“抓反革命”，致使自杀、打死人事件不断发生。

（参考资料：本报特约评论员《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人民日报》1978.09.28；老石《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文革中的砍监放犯与毛泽东的“群众专政”观浅谈》；《中国石家庄大事记》，“中国石家庄”网；图们、祝东力《康生与“内人党”冤案·十一 滕海清夜访钓鱼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5 年版；丁抒《文化大革命死亡人数的一家之言》，）

## 小靳庄

小靳庄位于天津市[注 1]宝坻县林亭口镇东南部、箭杆河畔。是林亭口公社的一个大队。1960 代末他们改造盐碱地，把箭杆河挖下一米多深，给村里所有土地铺上一层厚厚的河泥，使村里“早收蚂蚱、涝收蛤蟆”的主要盐碱地块得到改良。小靳庄粮食产量由原亩产 100 多斤提高到“上纲要”的 400 多斤，人均吃粮也上升为 420 斤，每年春夏季各上缴公粮 10 万斤，因而成为学大寨的先进单位。1971 年 9 月，宝坻县委在小靳庄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推广了小靳庄学大寨上纲要的经验。

1974 年 6 月江青到天津市批林批孔“抓点”，听说小靳庄有办政治夜校，农民学文化，学农业科学技术，学毛主席著作和时事政治，本土诗人朗诵自己的作品，唱样板戏的活动、经验，就把它列为自己扶持的“点”，树成了农村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以后又两次到那里活动，还派联络员常驻小靳庄。

江青派人送材料，又派梁效写作组人员去辅导，让小靳庄的政治夜校大讲儒法斗争史，大批“当代的大儒”，写诗吹捧江青，宣扬妇女掌权。还派人到小靳庄辅导排练样板戏，致使全村五分之一劳动力经常脱离生产，却强令一些部队和机关干部去支援生产，支援大量物资，出现“社员唱戏，请人种地”的不正常局面。

从 1974 年 6 月到 1976 年 8 月，江青多次让写作组“总结经验”，两年间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了 69 篇有关小靳庄的新闻、通讯、诗歌[注 2]等，吹捧小靳庄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模范”，是自觉抵制“右倾翻案风”、“和修正主义‘对着干’的反潮流战士”等。

各地为了“紧跟形势”，纷纷派人去小靳庄参观学习。有些穷得一个劳动日只值几分钱的队，也要拿出经费去朝拜这个圣地。因为赛不赛诗，唱不唱样板戏，学不学小靳庄经验，已经成了一个“路线问题”。但小靳庄的蹦蹦跳跳并没使参



观者脱贫，反因组织大型演唱队伍而荒疏主业、使粮食减产。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曾撤掉在第三届全运会团体操中安排吹捧小靳庄的画面，撤了小靳庄“联络员”。但“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小靳庄又被抬了出来，连篇累牍地报道，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炮弹。

小靳庄党支部书记王作山因得到江青的“垂青”，先后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拔为县委书记。1976年10月后被撤消一切职务并隔离审查。很长时间当地人出外都不敢说自己是小靳庄人，感觉灰溜溜的。

2000年代的小靳庄，仍以种小麦和蔬菜为主要农作物；村里每家都有外出打工的，在外做服装生意的，干建筑活的等等。由于没有村办企业，资金和资源都缺乏，做不成企业。但因距宝坻和天津市区近，交通还算便利，种蔬菜的收入还可以，平年人均收入接近4000元。

[注1] 1973年以前属河北省，后划归天津市。1970年代有101户、582人；2000年代有190多户人家，700多口人。

[注2] 编选出版了《小靳庄诗歌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空洞矫情的“小靳庄诗歌”成了用快板、顺口溜形式写的政治宣传韵文的典范。这种诗歌创作当然与个体体验表达无关，僵硬的政治语言对诗的“入侵”使它失去传达诗人语言和想像上的敏感的可能性。

（参考资料：新华社记者、《天津日报》记者、本报记者《江青与小靳庄——彻底清算叛徒江青在小靳庄的反革命罪行》，《人民日报》1978.01.12；王辉《文革后期江青为什么把天津小靳庄树为典型》，“中国红色旅游网”2006-1-20 <http://www.crt.com.cn/news/Html/shmw/00003142.html>；胡学常《江青与小靳庄》，《百年潮》2005年第5期；司杰《小靳庄“出名”的前前后后》，《雨花》2005年第2期；路遥《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路遥文集》）

## 陈阿大

（1942— ）出生于浙江绍兴。工人出身的社会活动家。

10岁到上海读小学，读到初一辍学。1958年进入中华造船厂，先做搬运工，后做钳工。1961年应征入伍，任饲养员、炊事员、高炮指挥仪测手，1963年退伍复员到上海良工阀门厂，1966年加入共青团。

1966年11月6日代表良工阀门厂造反派参加上海工总司筹备会，成为七个发起人、常委之一；积极参加安亭事件的北上告状、《解放日报》事件、抓支联站头头、砸上柴联司（上海柴油机厂工人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围攻青浦县反对派等主要武斗，率人冲击朱家角镇派出所、青浦县公安局等处，凶悍善战，人称工总司“五虎将”之首。1967年一月夺权后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交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副主任，负责工宣队进驻市革会各部门、区县局重要部门何和文教、科研各单位的工作。1968年“四一二炮打”他带队反游行时呼出“反对张春桥就是反革命”口号。

1968年10月在张春桥、王洪文提携下突击发展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成为中共九大代表，1971—1976年为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列席常委会议。曾参加中央第四期读书班。经常参与外宾的接待工作，1974年7月以副团长身份率上海市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

以粗鲁而闻名于上海,出口多国骂。最著名的流行笑话是:把秘书发言稿写的“巧”字看成23,“大干苦干加巧干”念成“大干苦干加二十三干”。他形容自己的特权时夸耀地说:“人民币对我们不起作用。”

1976年在四人帮组阁名单里列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人选。被指控同年10月12日参加了预谋上海武装叛乱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声称要率领上海民兵“打巷战”,要“宁死不屈”。

1982年8月21日,被指控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和诬告陷害罪,处以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权利3年。[注]被妖魔化为“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漫画为“喜剧人物”。2000年代未见已被释放的此人近况报道。

著有《发扬“一月革命”精神 认真搞好斗批改》(《人民日报》1968年11月5日)。

[注]他在审判的最后陈述时说:“十年动乱,我私心恶性膨胀,出于个人目的,为了往上爬,死心塌地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我对一伙小兄弟讲,只要大胆造反,不怕死就能当上头头,将来能当大官。我当时已窃取了市革委常委、市委列席常委的位子。为了实现这个野心,我就死心塌地干了!”

(参考资料:叶永烈《王洪文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google搜索引)

## 工总司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简称。成立于1966年11月9日,是文革时中国工人造反派组织中最早的最具代表性、规模最大、影响最大而持续时间也最长的群众组织。

1966年11月6日下午,“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受中央文革小组委托,与上海造反派召开“上海工学串连交流经验会”了解情况。与会者有首都红卫兵包炮、姜涛(主持会议),上海工人造反派有在各单位造反并受打压的潘国平(上海玻璃机械厂)、王洪文(国棉17厂)、蒋周法(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徐美英(741服装厂)、叶昌明(合成纤维研究所)、陈阿大(良工阀门厂)、范佐栋(保暖瓶二厂)、黄文海(沪光灯具厂)、丁德法(五一电机厂)、戴祖祥(上钢三厂)、岑麒麟(822厂)等。会上建议组成全市性造反组织,议定使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名义,推举除了七人主席团(筹委会),决定11月9日在文化广场开成立大会,并安排了起草宣言、准备旗帜袖标等。

上海党政机关循例对此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态度。工总司10日北上“告状”,在上海近郊的安亭卧轨拦车,致使沪宁铁路中断31个多小时。代表中央文革前来处理此事的张春桥擅自签字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并争取到毛泽东追认,从此打破了中共中央关于“工矿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

1966年底“康平路武斗”事件以武力解散了对立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上

海工人赤卫队”，接着以工总司为主体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造反组织联络站”拥趸张春桥、姚文元夺取了上海党政大权。迅速打垮了上海市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委）等组织旋即宣布欢迎赤卫队员加入造反派。由此上海工人保守派绝大多数加入造反派，大大降低了对付反对力量、进行社会整合的成本。1967年8月又发动“砸上柴联司”[注]，一举扫除造反派内部的反对势力。从此“工总司”成为上海唯一工人造反派组织，组织人数达到号称百万之众。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独立于上海警备区的文攻武卫指挥部和上海工人民兵，1976年成为预谋上海武装叛乱的基本力量。

1967年底，工总司召开“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大会”，其实就是工总司一家的大会，成功地将自己的组织体系全盘保留，而且仍然保留“工总司”的名称。而在同一时期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都被解散。直到1972年，工总司才自上而下更改名称为“上海市工代会”。1973年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原工总司骨干成员全部成为总工会的领导成员，各级基层也都是原来的造反派担任工会主任。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这样成功地整合了自己的力量，保存了自己的组织体系。

1967年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19名“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中，工总司占了4名；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105名委员中占43名；1971年恢复成立的第四届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书记占2名，16名市委常委中占4名；1974年全市工宣队总人数10713人，被“结合”为党的书记、委员或革委会的主任、委员的人数共4142人，其中进党委者189人。

工总司领袖王洪文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而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第三号人物），又使工总司系统的延续取得合法的保护伞。

1966年12月起，工总司便创刊了机关报《工人造反报》，刚开始发行时只有3万份，以后发行量不断增加，最多时64万份，增刊达到105万份，超过《解放日报》的发行量。《工人造反报》上的许多文章，是当时上海基层必须学习的政治读物。更有不少文章被中共机关刊物《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转载。外省市造反派将《工人造反报》上的文章作为中央报刊的补充读物，以“学习上海经验”，揣摩中央文革“最新精神”。直到1971年4月才停刊。1976年10月逮捕、隔离了四人帮上海余党，并彻底清查其武装叛乱的活动和帮派体系。这个组织系统的影响才被终止。

[注]上海柴油机厂有983人被打伤，663人被关押，121人被打致残，18人被打死。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物资损失达355万元；全厂停工两个月。

（参考资料：王年一《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2期；李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与工人阶级的实际地位》，“天益网”<http://www.tecn.cn/data/deatail.Php?id=9679>；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 徐景贤

（1933— ）江苏奉贤（今属上海）人，现代作家、政治活动家。

出生于教师家庭，1949年前就读于南洋模范中小学，参加过学生运动。1951年进入中共上海市委工作，先后任宣传部文艺处干事、市委文艺工作部干事、副

科长。1950年代发表杂文、散文、评论、剧本、报告文学，1959年加入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主要作品有话剧《年青的一代》（与陈耘、章力挥合作）、散文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电影文学剧本《曙光在前》。

1964年调至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丁学雷”）任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姚文元批判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1966年12月中旬在姚文元“路线交底”策动下，与王承龙、郭仁杰一起，带领写作组全体成员火线起义，组织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会同“红革会”“工总司”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1967年1月24日深夜去复旦大学说服“红革会”放弃夺上海市委权的行动、交出私自夺得的印章。28日被“炮打张春桥”的红革会红卫兵扣押了一宿。

他追随张春桥、姚文元诬陷、批斗陈丕显、曹荻秋，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宣传、文教等工作），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等职。在上海滩上人称“徐老三”（位居张春桥、姚文元之后）。领导“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材料组整理了陈毅、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陈丕显、曹荻秋等人的大量材料。以擅长口才闻名，每每紧要关头的高谈阔论，数他的发言最有“理论色彩”和煽动性。领导了对“炮打张春桥”群体事件的清查、整肃。〔注〕

1974年3月30日张春桥妹妹张佩淙在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做手术时意外死亡。徐在张授意下成立了由他亲自指挥的绝对保密的“特别调查组”，把医疗事故升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精心策划谋害张佩淙”并再扩大成“谋害柯庆施的政治事件”，欲致麻醉师方兆翳等於死地。并曾在张春桥授意下揭发王洪文腐化变质行为。1976年在四人帮的组阁名单里，被安排为财政部部长。

据指控，1976年10月7日，伙同王秀珍、王少庸等人打听中央情况，策动调集上海民兵发动武装叛乱。后来在中央严密的政治军事威慑下被迫取消了叛乱行动。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并逮捕，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以“积极参加反革命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8年，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1992年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释放，1999年恢复政治权利。撰写、发表有回忆文革的文章。耗时10年撰写的40万字回忆录《十年一梦》由香港时代国际2004年2月出版。自称“我所写下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或是亲见、亲闻……忠实於事实，对历史负责，是我写作回忆录的基本信条”。被批评为“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业绩，有王洪文、王秀珍甚至有江青、马天水的错，就是没有他自己的错”，“对自己在文革中犯下的罪行是避重就轻”，或“只字不提”。也有人说写得“很生活化”，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政坛内幕，“真实朴素的回忆录自有惊心动魄之处”；“总比什么都不出版好”。

〔注〕《十年一梦》：“上海因为参加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打击迫害的有2500人，一般请罪和写检查的不计在内，其中隔离审查、不能回家的，有两百多人，办学习班审查、但可以回家的，有440多人，在审查中5人被逼死，6人被逼疯。”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编《“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版，P289；徐景贤《邓小平“策反”马天水》，《今日名流》2001：3，P44；《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海帮罪恶，谁来清算？——读徐景贤〈十年一梦〉》）

## 大寨田

大寨搞农业基础建设改土造田的物质成果，大寨经验的核心——一种高质量的土壤改良标准。

大寨自然条件恶劣，找不到合适库址修堤坝蓄水、防洪、灌溉；山上没有水源引水灌溉；从远处引河水提水灌溉，扬程太高。大寨人就根据当地常年雨量并不算少，坡地、梁地的土层也比较厚的有利条件，采取提高耕地蓄水保墒能力的办法，抗旱、抗涝。他们设法使雨季、雨天既不致造成洪涝灾害，水土流失，又能把雨水保存起来供应旱季、旱天农作物生长的需要，由土壤承担起对农作物供应水分的调节作用。

大寨人不但把坡地修成水平梯田，闸山沟淤地，做到“三保”（即保水、保土、保肥），克服水土流失；还通过不断深耕土地、连年不断地大量施用秸秆沤制的农家肥〔注 1〕，使耕地里腐殖质增加，团粒结构增加，微生物增殖快，结构绵软，提高土壤蓄水保肥能力，十分有利于农作物根系发育。这种耕地疏松的活土层几乎都在一尺左右，就像一层一尺厚的海绵，一脚踩进去，像踩在棉絮上一样，国家农业部将其总结为“海绵田”，并在北方普遍推广。这种田，保水性能好，肥力高，抗旱能力强，因此是稳产高产田。

当 1960 年代国家粮食生产困难时，发动开荒改土种地种粮食学大寨的运动在一些地区客观上起到一些作用。在这个浪潮中，河北沙石峪、陕西高西沟等在建造大寨田上成为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但普遍出现了不管各地土质气候适合农林牧副的具体条件（连低丘陵地区也不例外），把建造大寨田作为政治任务强行推广的问题。造成劳动力严重浪费，生产费用过多，粮食成本高，投入产出、经济效益倒挂，农民生活水平降低。连一些遗址也被毁于一旦：济南市长清区张曾遗址作为出土过铜爵杯、石斧、石刀、陶片等遗物的商周遗址，在整修大寨田时被毁。山东境内大段大段的齐长城在平整土地或垒砌梯田的过程中被平毁〔注 2〕。

为了推广大寨田，1973 年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科教片《大寨田》，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在国内外发行；还作为宝贵经验向墨西哥、柬埔寨等外国来宾、首相介绍。1976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把大寨农学院、山西农学院《大寨田》编写组编的《大寨田》，列入“科学种田丛书”出版（224 页，0.48 元）。在中小学生学习作文里与此关联的“梯田”一词，不仅意味着美丽，更意味着“似锦”的生活、“如绣”的蓝图、“光明”的未来，能激发出无数的形容词和抒情、比喻段落……很容易得到老师的好评。

2000 年代，大寨严重缺水，有时连人畜吃水都很困难，再找水浇地，既得不偿失，又困难重重。他们在科学总结基础上看到昔阳县连年干旱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最根本的是四周植被稀少、生态环境恶劣，而这与当年不顾生态环境、一味在山上修“大寨田”、“海绵田”有直接关系。于是决定从全村 700 亩海绵田中，拿出 300 亩退耕还林，种上风景生态树松树、柏树和耐旱的干鲜果树杏树、桃树和枣树，力争使全村披上厚厚的绿装，彻底改变大寨的生态环境。争取把大寨逐步建成四季常青的旅游胜地。

〔注 1〕在秋后把玉米、高粱等秸秆铡碎铡烂，然后掺水，拌上圈肥或人尿粪，搅和后用土蒙盖起来，使其发酵。等秸秆完全腐烂后，撒在地里。

[注 2] 其中有：长清县陡岭子东山脚至岗路北山西脚的大段城址；齐长城起点的岭子头堊上；西太平山顶的 200 米；陡沟至后峪河的 2000 米；高家石岭、垛庄、大店子等地的数千米；长清北傅北山石砌长城……

(参考资料：宋连生《农业学大寨》，湖北人民出版社；舒志钢《亟待保护的齐长城》，“中国长城网”2005-02-23；王开岭《“家乡巨变”与“大寨田”》，“莽昆仑” <http://art.westcn.com/article/go.asp?id=6967>；新华社《我国科教影片为工农兵服务取得可喜收获》，《人民日报》1973.09.10；杨荣《大寨 300 亩海绵田退耕还林》，《光明日报》2000 年 05 月 14 日)

## 大港油田

位于天津市东南的渤海之滨，东临渤海，西接冀中平原，东南与山东毗邻，北至津唐交界处，地跨津、冀、鲁三省市 25 个区、市、县，总勘探面积 18802 平方公里。油田机关所在地距天津市区中心 60 公里，距北京 190 公里。始建于 1964 年 1 月。对外称“641 厂”。

通过勘探开采发现，这里是很有利的含油地区，油田分布广，面积大，油层厚，渗透性能好，油井产量高；原油质量也比较好。经中央批准在天津以南、山东东营以北的沿海地带，开展了华北石油会战。会战主力班底是大庆石油工人。遵照毛泽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思想，集中人力、物力，开工一批，建成一批，投产一批。据说，1968 年 3 月大港油田革委会成立以后，“领导工人群众破除迷信，根据实际情况改革工艺，大大加快了钻井速度，一个钻井队年进尺超过了 5 万米”。[注]到 1978 年，大港油田原油产量从 1966 年的 11.4 万吨提高到 315 万吨，增长 25 倍。昔日芦苇丛生，人烟稀少的沼泽、盐碱海滩，已变成绵延百里的油区。

当时的报道说，“这是我国石油工人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战天斗地，培植出来的又一朵绚丽的大庆之花。‘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油田的建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石油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促进油田生产和建设阔步前进。”吸引了许多采访记者和搞歌颂性创作的作家，得到报章广播的大量报道，诗画音乐等文艺作品的表现。一些国家元首和外宾也被特意安排来参观访问，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经济建设成就。

会战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睡帐篷、住干打垒屋；蚊子云集如阵，防不胜防；由于盐碱重，用水洗衣服不用打肥皂，有患胃病胃痛的经常返酸，吃了一段时间这里的水竟不治而愈。最开心的是休息日搭伙食团采购车去劝业场饱饱眼福，买上一、两个“狗不理”打打牙祭。

会战队伍不分白天黑夜，顶着寒风，踏着冰雪，选井位，修道路，架桥梁，千方百计加快油田的勘探进度。不少人打井时受伤住了医院；没有等伤完全好，又回到井场，继续工作；磨钻头一磨就是五六个小时，手掌都磨出了血。“电焊工打破了‘有水不能焊’的老框框，采取有效措施，冒雨作业。钢管被水淹没了，就由两个人把管子抬起来，一个人焊接。泥瓦工在雨下砌砖抹墙，雨水冲掉了泥灰，就几个人顶一块塑料布进行操作。”

1995 年 12 月改制为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所属国有独资公司，并更名为

大港油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6月，大港油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核心业务与非核心业务分开，核心业务改组为中油股份大港油田公司，非核心业务作为存续企业，仍然沿用大港油田集团公司名称，直属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到2000年代，该油田已经拥有年产420万吨原油和3.6亿立方米的生产能力。在中国石油、天然气开采行业中名列第八。

15679名“油田家属工”随着石油工人1964年大港油田开发初期来到大港，因无正式工作，便在家属管理站或集体企业里参加集体劳动。几十年他们为大港油田创业做出了贡献。但由于历史原因没有和油田企业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他们离岗时不能享受任何生活保障待遇。2004年，他们拿起法律武器把油田集团公司等七个单位告上了法院，伸张自己的权益。终于调解结案。

[注]据彗星凌日网友提供的材料，会战时在冒进思想指导下大干快上，出现了许多明星钻井队，钻井速度奇快。后果严重。越是标杆队、明星队打的井质量越差，井斜大，有的甚至连套管的丝扣都不上紧就匆忙下钻，为后续开发工作造成极大困难，本来应该可以使用20年到30年的井，10多年就废了。

(参考资料：新华社记者《坚持学大庆 碱滩飘油香——记发展中的大港油田》，《人民日报》1974.05.16；《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林松冰《在大港油田的日子》；《大港油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简介》；《大港法院：为滨海新区建设助力》，《人民法院报》)

## 反潮流

毛泽东的主张、风格。喻指遇事不随大流，敢于坚持真理的行为方式。后来被规定为党员的基本义务和行动原则。它要求在阶级斗争、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条件下，同占据主导地位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恶流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青年毛泽东就提倡“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1959年4月5日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说：列宁提出反潮流，有许多时候是这样的，要反潮流。1971年回顾庐山会议反击林彪集团挑战时他又说：“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毛曾称许江青“优点是反潮流”。中共十大党章提出反潮流原则，要求党员具有“敢于反潮流”的精神。

“性不好束缚”、“好独辟蹊径”的性格，凭借超强意志力特立独行，贯彻于毛泽东的一生，渗透在他思想、行动的各个方面。有学者注意到毛曾先后为秦始皇、商纣王、王莽等史书公认的暴君辩护。[注]从“反潮流”、反正统的文化价值取向出发，毛泽东往往对那些多少有所偏离于正统秩序的人物都抱有一定的好感。从政治实践上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的“农村包围城市”、1958年大跃进、1966年炮打司令部，都是毛泽东反潮流的功过互见的代表作。

在渐趋平淡中恢复理性和秩序的1973年成了反流成年。被先后树立为反潮流的代表人物、先进典型有李庆霖（告御状反映知青问题）、张铁生（在仅得6分的理化卷上陈情求告录取）、黄帅（因师生冲突被拔高为小学生反师道尊严）、钟志民（后门大学生退学）、柴春泽（拒绝招工扎根农村）、白启娴（嫁给农民的

女大学生)等。这些被借用的典型从不同侧面触及到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敏感点,勾画了文革派意识形态乌托邦理想,并附丽着他们借以发动质疑的合法性理据。

李庆霖以“反潮流英雄”身份在1973年第11期《红旗》杂志上发表《谈反潮流》,已经上山下乡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也现身在《人民日报》(1973.08.18)上发表署名文章《毛主席的红卫兵永远在战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组编写了《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反潮流的光辉事例》(商务印书馆1975年出版)……其引起的震荡,经由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使之达到沸腾的顶点。一些闹腾的造反派补课进入领导班子。此前在经济-社会压力下,政治、生产、社会开始悄然回归的科层秩序再次受到强烈冲击。

对于错过了1960年代造反运动的学生来说,这一波教育界“反潮流”潮流推动了他们怀疑主义的想象,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学生或多或少获得了幻想的“翻身作主”权力。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战斗队之类山头组织,反对“管、卡、压”,离开工作岗位搞串联,造成停工停产,一些刚落实政策的领导干部又被当作“孔老二”打倒在地,省市和单位的领导班子又陷于瘫痪状态,并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这一思潮成为1974年、1975年邓小平复出全面整顿的阻力。

后文革时代人们较多从政治上清算“反潮流”。2000年代有学者指出,晚年毛泽东实践的基本取向是要彻底解构延续了几千年的精英文化传统,完成对正统文化秩序的革命性变革。这些思想、实践脱离了理性规制,对儒家思想一味地否定,造成了对其所蕴含的有价值的思想内涵的漠视;而对法家思想的片面揄扬,将其中负面内容带入现实实践,种下种种文化和政治恶果。用高蹈而脱离、否定现实的反潮流建立理想国的强制秩序,是毛泽东的悖论。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曾论述过“质疑启蒙、提倡多元”的“反潮流”。18世纪法国主流启蒙哲学家相信,在一种固定不变的、超越时空的理性精神指导下,借鉴牛顿和笛卡儿的科学方法,人类可以推断出最佳的社会模式,预测历史的潮流,最终迎来消除一切矛盾和价值冲突的自由王国。而维柯、哈曼和赫尔德等人代表了启蒙运动的对立面,他们反对在人文领域引入科学方法,强调不同历史时期各具特点,不同文化应共存共荣。孟德斯鸠也主张对不同的社会不应进行整齐划一的改革。

2000年代商家广告偏爱把反潮流作为个性、独特的招徕:“反潮流的精彩 八款超级大块头手机导购”,“反潮流生活—王府井书店,致力于提供读者最需要的图书影音产品”……

[注]毛泽东说:“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王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有被杀么。”

商纣王其实“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他的失败只是在于“俘虏政策做得不太好”。

1926年毛泽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谈到历史上没有人研究过农民问题时提出:均田制是王莽时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惟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毛把篡汉的王莽称作“农民利益的代表”。



(参考资料:《1974年:反潮流》,载宋强、乔边《人民记忆5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何显明《毛泽东的翻案与反潮流》,“新华网”2003-04-08;杨小滨《精神的考古层》;《伯林的“反潮流”:捍卫不同的价值观》,《环球时报》2003年05月26日)

## 柴春泽

(1952— )河北省青龙县人。知识青年“反潮流”扎根派典型。

1971年12月毕业于辽宁省赤峰市6中,是赤峰市“红代会”副主任兼6中红卫兵团长。主动到条件艰苦的辽宁省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插队。1972年加入中共,并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

1973年8月他父亲准备将他招工到矿山。他断然拒绝了父亲好意,并写下那封以后被吹捧为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回信,表示要“扎根农村六十年”。当时《辽宁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小将们的挑战》为题刊登出来,接着《人民日报》也在显著位置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予以转载,并加《编者按》评价该信“代表了革命小将在思想领域向老将的挑战”。被人视作“对老干部是新疗法”。此信后选入中学课文。因此声名大震,成为反潮流英雄。收到来自全国信件足有六七麻袋、近万封之多。

武汉市39中75届高中毕业生张静1976年3月写信给他,列出令广大知青面对现实与理想、理论与实践冲突而无所适从的6大问题请其解答。柴回了7封信,封封豪言壮语,满纸阶级斗争,上纲上线,将知青们的真实想法与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联系起来,以适应当时政治需要。这些信先后在《辽宁日报》、《湖北日报》上刊出,并被国务院知青办印发各地知青办要求组织学习、讨论,从而在全国知青中引起“扎根还是拔根”的大讨论。这些信被利用来形成当时揪“党内走资派”运动中引入注目的浊流。而张静因此受到审查和牵连,并且得了病。

湖北省通城县平山学校教师汤明大写信指责说:“你每天过闹市,进华堂,一举成名天下知,你是一只带领知识青年走向屠场的头羊,请你立刻悬崖勒马!”这封信则被他看成是阶级斗争,把它转到湖北省委,致使汤明大被抓进监狱。

1975年起参与辽宁省政府投资40万元的翁牛特旗玉田皋改种水稻组织工作,带动了翁牛特旗东部数万亩水稻的开发和种植。1975年作为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成员,应日本青年团协议会邀请赴日本进行旨在促进日中友好条约缔结的友好访问。1976年6月12日,与张铁生、吴献忠等19名模范知青联名写出《向“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的公开信,在《辽宁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

1976年12月被当作四人帮爪牙送进翁牛特旗林场学习班。1977年3月被隔离审查,1978年4月被关进当地监狱,代号012。1979年12月被宣布“无罪释放”。

1980年初与等了他几年的女友刘立新结婚。同年得到“恢复柴春泽同志的党籍,党龄连续计算……”通知,并被安排到辽河工程局工建三队做工人。1982年考入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赤峰建立分院读书,1985年毕业留校任教。常同时任几个班的辅导员;1994年获赤峰市人事局、市教育局授予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1996年被评为赤峰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参与过多种著作的编写,入选多种《人才辞典》。沈阳一私人业主曾以高薪请他去沈阳开“柴春泽知青大酒

店”，为其婉拒。

2006年，赤峰电视台、乌敦套海镇党委政府、红山水库管理局及赤峰电视大学联合摄制了电视纪录片《柴春泽》。提及前尘往事，他沉痛地说：“当时我鬼迷心窍，伤害了不少人。”同时又说：“我到农村，是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坚定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前面缴了学费。我认为我的追求没有错。靠激情不够，要做出来。”

（参考资料：申平《柴春泽其人其事》，《通俗小说报》1992年第9期；《知青典型—囚犯—人民教师》，“泉南文化网”；刘晓航《柴春泽迟到的忏悔》，“华夏知青网”）

## 老人家

对老年人的一般性尊称，文革中被附着、固化到毛泽东名下。[注1]变化形式有与第三人称结合的“他老人家”、与第二人称结合的“您老人家”。也有单称“老人家”，或“毛老人家”的。

这一称谓是把五伦中的君亲两伦合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同位词组众口一词，声震寰宇，此起彼伏，把政治领袖、国家元首毛泽东神圣化并将自己的所有希望、敬慕都盲目付之于他的同时，还把炽烈情感投射到他身上，虚拟地将其当成家长和父辈亲人。这既是官方舆论的诱导、劝降，软化民间的疏离，让社会各阶层更易于、乐于接受，又是细民百姓的顺从、迎合，向权力的真心输诚、攀附，“（他）是咱家尊长呢……”，双向互动、相互为用。如此称谓不但被广泛用于发言、作文和公开表态，而且在日常生活、私人场合里也这么说。

从修辞上看，它是基于崇拜的匍匐姿态的谀词、换词，使崇拜表达具有多样化效果，免于审美疲劳。虽然带有部分世俗色彩，但它使政治权威的外部承认，内化为此在生命的切身呼应。是政治权威合理化的一种方式。

人们接受这一称谓，除了垄断舆论机器的强力灌输，还因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强大的政治权威使他能慑服中共打天下的一帮老臣，超迈的思想能力使他能提出“五七指示”式理想国图画，民粹主义的亲民倾向使他“揭露阴暗面”、“打倒走资派”的口号能征服不知底细的群众，抚慰、抚平了庸众在无物之阵里的受挫感。

它出现在政治动荡的1966—1970年、1976和1977年，还意味着官方和人们是把毛泽东作为一种巨大的政治符码、政治资源来使用，以此对抗、拒斥、谴责他们心目中的敌人，增加自己的安全感。

“毛老人家”的称呼出现较晚，在1970年代的中晚期，且多出现在私人场合。用简称姓氏“毛”与“老人家”组合，佻薄，而含旧时青洪帮“老头子”意味，带有轻微腹诽、抵牾的叛逆色彩。既让人挑不出什么毛病，无法打小报告，又可以多少排遣、宣泄一些莫名愤懑。

2000年代的话语流通中，一方面还有历史回声的宏大响应：“真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为我们搞出两弹一星……”（江泽民），“华赋桂说，山坳里一位老人曾问他：‘毛主席他老人家现在身体可好？’”，在改革的利益受损者那里这样的称呼更觉亲切；一方面又通过恶搞使之戏谑化：“毛主席他老人家太牛了，早就预见‘神舟五号’的发射成功”。[注2]以“毛主席他老人家”为关键词，通过google、百度引擎能分别搜索到45.3万和48.6万

个查询结果。

能指的流变际遇述说着所指的沉浮悲欢。

[注 1]据人民日报' 49—97 数据库提供的材料, 该词浮现率峰值的 1966 年有 5.44%, 1967 年 10.44%、1968 年 14.50%、1969 年 9.35%、1970 年 3.66%、1976 年 7.34%、1977 年 3.21%。这 7 年就占了全部的 53.94%; 其余年份的年平均浮现率仅 1.12%。

[注 2]据说,《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 年):“三十八年过去”  
1965+38=2003 (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预告了  
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

(参考资料: 库尔班吐鲁木《我们维吾尔人民永远跟着毛主席》《人民日报》  
1966.06.19; 云淡水暖《江泽民同志说: 真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 失落的天堂  
《毛主席他老人家太牛了》,“成都理工大学校友论坛” )

## 乌兰牧骑

蒙语“红色的嫩芽”, 意为“草原红色文艺轻骑兵”。第一支乌兰牧骑于 1957 年诞生于内蒙锡林郭勒草原苏尼特右旗。

这是一种由 10 人左右组成的轻便文艺队, 营运成本低廉, 方便在人口稀少、分散的草原为牧民巡回演出; 演员一专多能, 说、唱、弹、拉、舞都能上手, 多数能掌握蒙、汉两种语言; 演出前点汽灯、化妆、布置场地, 演出后拆洗服装、修制道具, 都是自己动手; 节目形式小型多样, 歌舞、戏剧、戏曲、曲艺、杂技、魔术等都行, 丰富多彩; 内容大多是自编自演, 反映牧区生活, 具有浓郁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所到之处受到牧民热烈欢迎。同时还为农牧民群众提供幻灯放映、图书销售、时事政策宣传、科普展览、辅导业余文艺骨干以至理发、修理钟表等一系列文化-社会服务。一年至少有 6 个月活动在农村牧区, 每队平均演出 150 场次以上。

这种文艺演出组织形式受到牧民喜爱, 鼎盛时发展到有近百支乌兰牧骑。1965 年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艺术团。成为文艺工作者思想革命化, 走《延讲》道路,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先进典型。作为“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报纸和新闻电影上被广泛报道过。

成为“深入基层, 巡回服务, 方便群众, 通俗、民间”的一般名词, 出现“‘乌兰牧骑’党校”、“司法‘乌兰牧骑’”、“企业管理的‘乌兰牧骑’”等形容词化用法。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袖曾多次接见过乌兰牧骑演员。其中周总理曾 12 次接见乌兰牧骑。他说, 要把乌兰牧骑这把火在全国点燃起来。在他倡导下, 1965 年乌兰牧骑第一次走向全国, 到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区演出, 总行程有 10 万多公里。同时还外出在 18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乌兰牧骑的影响、带动下, 全国 16 个省、自治区建立了乌兰牧骑和乌兰牧骑式的演出队。

文革中乌兰牧骑曾一度受到影响, 但仍然得到重视, 并介绍了“他们批判刘少奇一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硬把一些封、资、修的黑货塞给乌兰牧骑的罪行, 坚持把自己的演出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目标紧密联系起来, 人人争当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和“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努力运用‘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不断提高创作和演出水平”的经验。

乌兰牧骑从民族民间优秀丰厚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创作演出了如“顶碗舞”、“牧民的喜悦”、“彩虹”、“鄂尔多斯婚礼”、“筷子舞”、“翔”、“梦中戈壁”、“炒米飘香”、“腾飞的骏马”、“富饶美丽的内蒙古”等等优秀的文艺节目，成为内蒙古民族艺术的精品和典范。德德玛、图力古尔、拉苏荣、牧兰、金花、达日玛、敖德木勒、敖登格日勒、道尔吉仁钦、朝鲁、巴达玛、那顺等等都是从乌兰牧骑走出去的杰出艺术家。

200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精简到有46支乌兰牧骑，演职人员1400多名。举办了“乌兰牧骑艺术节”。市场经济环境给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乌兰牧骑以严重考验，队员的待遇较低，人才流失严重，一些尖子队员跳槽去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为了探索生存之道，他们既抓从婚礼到开业典礼、旅游景区演出的商业演出，也艰难地坚持着“文化三下乡”、“进牧区宣传队”的公益演出。

(参考资料：新华社记者《乌兰牧骑在前进》，《人民日报》1972.03.01；布赫《“乌兰牧骑”三十年》，《人民日报》1987.07.21；牟野《乌兰牧骑：草原文艺轻骑兵》，“内蒙古音乐网”2006-8-24)

## 革命

本义指改朝换代。革，变革；命，天命。《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古代以为君王是受命于天的，所以把王位改姓、年号更换、权柄易手，以武力推翻前朝，包括对旧皇族的杀戮，称为“革命”。

到现代，革命作为普遍名词[注]，意指事物的根本质变过程，包括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这两种不同范围、不同形式的重大变革。改造自然、改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的根本突破，有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等。以突变、暴力方式，革除、摧毁旧的丧失生命力、合法性的社会制度、国家政权，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国家政权的过程，是社会革命。通常伴随着战争或动乱，具有极大破坏性。由于是根本性的利益格局变更，其震荡遍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伦理、民族乃至家庭的各个角落。革命成了一种绝对价值，当其他价值标准发生冲突时秉有优先权。它以长远利益和社会整体的名义，鼓励、呼唤激情迸发，给当下的破坏、无序颁发了赦免符。

处于后发赶超型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改革者们，受到众多挫折引发的焦虑症的不断刺激，一再趋向激进。社会革命成为他们赖以施展的舞台、医治痼疾的良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甚至内化成为他们的生命本能（就像贾宝玉的通灵宝玉）。尤其是领导中国人民获得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把他们从长期战争中得来的经验用之于和平建设，无论在什么领域（生产关系、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国际关系）都通过社会急剧变动时适用的革命手段来解决。方便利用社会动员，逾越规制，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以满足领袖意志设定之超常目标的实现。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所有循序渐进的社会改革理论和实践，都被斥之为反对变革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毛泽东担心官僚主义阶层会丧失对实际情况反应的敏感性，形成拥有特殊利益的利益集团，出现修正主义的倒退。革命被当作促使社会肌体保持活力的兴奋剂。而革命的基本形式是政治运动、群众运动。

由于革命是社会急剧变动时期的行动纲领，它要求冲破常态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文革时期经常性中心工作冲击了经济、军事、行政工作（连中小学教育也严重中断，大学停课5年），冲击了秩序化的行政体系，迫使人们接受践踏人道和人类尊严的运动伦理学：红色恐怖就是这一逻辑的极端表现，要求一切规范服从于当下的政治需要；文化革命成了革文化的命，思想革命革除了人们的个人利益和改善生活的渴望，把物质欲求当作卑下的东西来唾弃。“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就是这类现实的概括反映和催化剂。政治正确性被放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人划线、你死我活的力量重组、阵营冲突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以致于可以无视人道主义的普世原则，冷淡经济建设的生存铁律，践踏法律的制衡和秩序，抛闪科学研究、技术进步的客观尺度。一切曾经被视为神圣的东西，都可以在革命的名义下亵渎之、蹂躏之。还被当成高尚、悲壮的牺牲、代价。

该词的构词衍生能力本来就极强，到文革更进入了迸发期：革命路线、革命事业、革命权威、革命政党、革命理论、革命真理、革命历史、革命舆论、革命学风、革命战争、革命高潮、革命变化、革命实践、革命行动、革命无罪、革命斗争、闹革命、干革命、为革命、革命现代戏、革命大联合、革命委员会、革命团结、革命干部、革命性、革命精神、革命意志、革命斗志、革命干劲、革命思想、革命觉悟、革命气节、革命激情、革命朝气、革命化、革命传统教育、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任务、革命派、革命阵营、革命队伍、革命组织、革命同志、革命战友、革命战士、革命小将、革命学说、革命干部、革命群众、革命教师、革命先烈、革命母亲、革命人民、革命乐观主义、革命需要、革命形势、革命洪流、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科技革命、卫生革命、思想革命、社会革命、民族革命、人民革命、世界革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继续革命、三大革命运动、反革命、抓革命、自觉革命……

无论语法、逻辑上成立、圆通与否，一切事物都要贴上革命的标签，以封杀所有潜在攻击的可能性，才能保证说话人的政治正确。几乎到了离开革命就不能开口说话的地步。用精神病学标准衡量，这种话语生产疑似罹患有某种强迫症。它所造成的革命崇拜弥漫到社会精神生活的所有角落。

20世纪末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因为“我国二十世纪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给中国很深的灾难。……革命“激情有作，理性不足”。所谓“激情”，就是指急进地激烈地要求推翻、摧毁现存事物、体制和秩序的革命情绪和感情。要改良，要进化，不要革命；为了十二亿人要吃饭，不论是何种名义，都不能再‘革’了”。这一观点问世后招致普遍质疑。

2006年上海“通过了高层的详细审查”的新版中学历史课本，不再探讨战争、王朝和共产主义革命，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经济、技术、社会风俗和全球化等多种主题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辩，被指为“消解历史”“告别革命”用“盖茨取代毛泽东”。

[注]日本人将英语 revolution 一词译为“革命”，既指政权的激烈交替，也指“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的“淘汰”或“变革”。20世纪初梁启超由此使用这个词，希望中国能象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以和平方式完成政治现代化。1905年发生革命和改良之争的结果，“革命”被等同于政治结构的激烈变革，它与暴力密切相连，并与“改良”相对立，形成革命与改良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到

1917 年新文化运动，出现认同全盘反传统主义和社会秩序整体而彻底变革之、主张并实践彻底和激烈变革的“革命”。而当辩证唯物论作为新的天道，革命的流行不仅意味着对整体彻底变化的推崇，也意味着视暴力为正当观念的普遍化和斗争哲学的成熟。

参考文献：陈建华《“革命”的现代——中国革命话语考论性》，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红旗》杂志 1968 年第 1 期；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 年版；金观涛《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原载《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十三期（台北：2005 年 6 月），转自“中国思维网” 2005 年 9 月 29 日 <http://www.chinathink.net>；《上海新历史课本：不再探讨共产主义革命》，原载《青年参考》，转自“中国网络资讯中心” 2006-9-7

## 乌审召

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的乌审召公社。被称为“牧区大寨”。

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毛乌素沙漠中。面积 1400 平方公里，多半是流沙，草原牧草稀疏，夹杂着碱滩、硬沙梁和死水泡子。常发生沙、旱、涝、雹、寄生虫、毒草等灾害。人口稀少，仅 705 户、2800 多人，平均每人占有土地 700 多亩。

从 1957 年开始，当地牧民种草种树，使约 6 万亩流沙变成牧草丛生的牧场；由于家家种树，队队有林，在原来百里不见树的地方植树造林 20 万株。在低洼牧场上开了全长 50 多里的 6 条排涝大干渠，使牧场不再受洪涝灾害。全社打井 450 多眼，牲畜改饮井水。为了培育草场，他们采用扎柳笆、打土墙、挖防畜沟的办法，大修“草园”，封滩育草；围起了大则上千亩、小则成百亩的上百个“草园”。用以收割饲草解决牲畜冬春缺草问题。

过去没人种过地，由于开辟了水利灌溉耕地 3300 亩，1960 年代年产 78 万斤粮食和精饲料；粮食和饲料的自给率达 70%。到 1965 年，牲畜由 4.9 万多头发展到 8.2 万多头，向国家交售牲畜 3 万头、绒毛 40 多万斤、皮张 4 万多件。每个牧业人口每年的纯收入，6 年间增加近两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发出号召，要求全区向乌审召学习。

1965 年 12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诗人记者郭小川等的长篇报道《牧区大寨》，同时配发社论《发扬乌审召人民的革命精神》。热情洋溢地评价“乌审召人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以党的总路线挂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号召全国学习他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发展社会主义畜牧业大经济的伟大抱负”、“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的革命风格”、“吃大苦，耐大劳，苦干实干的革命干劲”、“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坚持群众运动的群众路线”、“虚心学习，勇于实践的科学态度”（尤其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生产技术知识、当地的有益遗产）。乌审召被当作在蒙、疆、藏等牧区、牧业，大寨经验普遍性的一个验证，牧区牧业学大寨的道路。

从此引来记者采访的高潮，各地、各种媒体的记者都来了；各少数民族地区、各牧业地区参观团也来学习取经，如潮水般涌来；为此还破天荒地在荒野的沙漠牧区，盖了有平房有蒙古包的两大排招待所。来访外宾也被安排来参观。元帅诗人陈毅为之题诗：治沙种草获胜利，牧业农业大向前，马里贵宾来参观，乌审召美

名天下传。乌审召的代表性人物——宝日勒代，从乌审召公社的大队支部书记，升至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中央委员（第9—11届）、全国人大常委（第4、5届）。

1970年代，在“牧区大寨乌审召”发动的治沙造林运动，推动了牧区改造沙漠、建设草原的进程，涌现出镶黄旗、泽库县等学大寨的先进县。1973年上映的彩色科教片《征服沙漠建草原》，用动画手法形象地介绍了乌审召人用“前挡”“后拉”办法治服沙丘，建成树木成行、草丰畜旺牧场的先进经验。

据一位亲历过当年报道的资深记者万炜明透露说，作为乌审召“人定胜天”、征服沙漠主要经验的移植沙蒿，消耗人力资源较大而存活率低，风沙却从移出的密集沙蒿梁缺口入侵；风沙反而比以前更大了。大面积普及乌审召经验，1970年代中期加速了对自然的毁灭和破坏。

到2004年，累计完成飞播及人工造林40.8万亩，植被覆盖率由28%提高至45%，森林覆盖率由15%提升至19%。有各类井1019眼，新架高低压线路30多公里，乡村道路300余公里，牧业年度牲畜头数达10.9万头只。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近400元。乌审召镇作为2000年代上马建设的天然气化工城基地核心地区，总规划面积119平方公里，工业核心区占地20平方公里。这一项目强劲地拉动了乌审召经济的飞跃。

（参考资料：满都呼、厚和、霍建文、徐兰池、林沫、郭小川《牧区大寨——记乌审召公社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的革命道路》，《人民日报》1965.12.02；新华社记者《牧区学大寨 建设新草原——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侧记》，《人民日报》1975.10.14；《弘扬乌审召精神根除荒漠化危害纪念“牧区大寨”乌审召命名40周年活动在乌审旗举行》，“呼和浩特农牧业信息网”《万炜明：谁在制造英雄》，“田炳信个人官方网站”）

## 亚非拉

指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这些地区的国家。在口语、歌词里，亦作“亚非拉美”。拉丁美洲是美国以南所有美洲地区的通称，因历史上曾沦为拉丁语系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现仍以拉丁语为这些国家的通用语言；故称。主要流行于1960—1970年代。是“第三世界”概念的前身。亚非拉的定义着眼于地缘、地域，和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历史，第三世界的定义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类型。

中共建政时面临冷战爆发和两大阵营的对立，决定了它只能依据自身国家性质选择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还是按照传统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思想来指导中国处理国际事务。他认为必须争取利用世界大战的空隙抓紧建设，尽快强大起来，所以着急发展原子弹、钢铁、军工，一五计划、二五计划都强调发展重工业，在将来的战争中才能战胜敌人。而单靠中国或苏联的力量对抗美国是不够的，必须发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来牵制、打击、推翻帝国主义。因此亚非拉就具有了重要战略意义。特别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亚非拉的砝码就更重了。

反帝、反殖，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成为最具时代特色的口号和中国外交最典型的意识形态语言。“亚非拉，人民要解放，反帝怒火高万丈”，“亚非拉人民要解放，自由的旗帜在飘扬，一起赶走帝国主义殖民列强”……激越歌声传遍神州。它不仅是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现实利害需要，而且基于被压迫共同

历史命运的情感、道义感召。

1965 年林彪纪念抗战的署名文章说，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于当时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亚非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具有普遍现实意义。朝鲜和越南的例子已经证明，“人民战争是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有效的法宝。”“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

于是，人们被告知：古巴革命军在战斗空隙，传阅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西班牙文油印本，称为“来自中国的食粮”。马里革命者写道：“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半封建国家人民的最好指引，这条道路将是第三世界大多数人民要走的道路。”在印度支那丛林，在阿尔及利亚游击区，在安哥拉、莫桑比克、葡属几内亚和波多黎各……在广袤的第三世界各种政治、军事、文化和地理环境中，毛泽东曾赋予亚非拉各种肤色的人民以一种战斗性的思想意志和战略战术。使用这一话语体系进行描述时，似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陲地区，对中心国家的包围之势已渐渐形成。

在这种外交政策指导下，1960 年代以来，自身资金紧张的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向亚非拉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保证帮助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战争”提供装备和军事培训上的支持。

在文化上，中国大学、学术机构的历史系、研究所里设立了亚非拉教研室，世界近代史教学重点讲述控诉列强如何扩张、如何压榨亚非拉等落后国家；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增设亚非拉文化研究所；亚非拉文学的译介受到重视，一些文学刊物上经常以专刊方式重点介绍亚非拉文学，因为它有助于“加强亚非各国人民的团结，有利于各国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举办亚非拉乒乓球友谊赛，免费请亚非拉国家的乒乓球选手来，比赛中还经常让球。中国同亚非拉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官方和民间在卫生领域的交往，1963 年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疗队，1964 年开始援助一些缺医少药的亚非国家建设医院、卫生中心、医疗器械厂以及小型制药车间和生物制品车间等。还邀请一些亚非国家专家、学者到中国参加一些专业（如外科、儿科）学术会议。

中国也因此得到回馈：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二次万隆会议上，大体排斥、孤立了苏联。1971 年联合国大会以 2/3 的绝对多数，恢复中国一切合法权利。毛泽东评论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去的，我们不能忘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给予中国的巨大支持。

1974 年中国提出“三个世界”表述后，亚非拉概念的使用渐次下降，但仍交替为用；1980 年代以后，由于专注于国内经济建设，意识形态话语和对外援助日益趋于务实，亚非拉一词越来越淡出话语流通领域。

（参考资料：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红旗杂志》1965 年第 9 期；新华社驻外记者《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全世界》，《人民日报》1966. 06. 16；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南出版社 1992 年版；沈志华、李丹慧《在探索与矛盾中求生存：毛泽东晚年的外交战略》，“搜狐·精彩网摘”；祝东力《毛主席的两件事》，“乌有之乡”）

## 邢台地震



1966年3月8日早晨5点29分，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震中在隆尧县马兰、白家寨一带，震级为6.8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烈度为9度强。3月22日在宁晋县东汪一带东南分别发生了6.7级和7.2级地震各一次。从3月8日至29日这21天时间里，邢台地区连续发生了5次6级以上地震。这一地震群被统称为邢台地震。

邢台地震的破坏范围很大，造成8064多人死亡，38451余人受伤，倒塌房屋8万余间；破坏京广和石太等5条铁路沿线的桥墩和路堑16处，震毁和损坏公路桥梁77座，地方铁路桥2座；毁坏农业生产用桥梁22座共540米。经济损失达5亿元。

极震区地形地貌变化显著，出现大量地裂缝、滑坡、崩塌、错动、涌泉、水位变化、地面沉陷等现象，喷水冒沙现象普遍，最大的喷沙孔直径达2米。地下水普遍上升2米多，许多水井向外冒水。低洼的田地和干涸的池塘充满地下冒出的水，淹没农田和水利设施。地面裂缝纵横交错，延绵数十米，有的达数公里。

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极为关切和重视。总理周恩来曾三次到邢台灾区视察慰问。人民解放军2万多指战员在震后一个多小时就赶赴灾区，用铁锹、双手从瓦砾里扒人，修路修桥，抢建临时简易住房。据报道，当地救灾人群喊出“毛泽东思想是战胜地震灾害最有力的武器”、“地动心不动，房倒志不倒”、“你震你的，我干我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等激昂亢奋的口号。

全国各地、各部门100多个单位送来食品衣被、急救药品、医疗器械等救灾物资，3.7万人奔赴邢台地震灾区参加抗震救灾，医疗队工作队火速赶来救死扶伤。仅个人汇款就收到68万多元，汇款人写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雷锋的战友”等等。

奉命赶赴现场体验生活的词曲作家洪源、李劫夫合作写下的歌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注]把颂歌和战歌奇异地糅合在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很快唱红了全中国，为当时已经如火如荼的毛泽东崇拜添了一把火。

这次地震距离《五一六通知》仅二个月多点，距离北京400公里。心理震慑更大于实际破坏。象一个不祥的预言，它和1976年唐山地震，后来被民间视为文革一始一终之警示的“天人感应”凶兆，赋予了神秘色彩。

1987年在邢台地震的震中区隆尧县县城东建成邢台地震纪念碑。

[注]歌词为：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参考资料：新华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邢台地震区救灾工作迅速进展》，《人民日报》1966.03.14；《不堪回首的的1966年邢台地震》，“新华网河北频道”；国印周《这首歌从这里唱向全国》，“新华网河北频道” )

亮相

原义是戏曲表演者上下场或舞蹈表演时由动的身段突变为短暂静止姿势，以突出角色情绪，加强戏剧气氛。亦可引申比喻为公开表示态度，亮明观点。

1967年开始风行夺权的一段时间，“亮相”一词流行起来。它被用来专门指称已经靠边站的各级党政领导人公开支持某一方某一派群众组织主张和行为的举动。其必要条件是得反复检讨，承认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态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通过这样的亮相，取得造反派的谅解，可以作为“老干部”的代表参加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去。

检讨的功能，是迫使亮相者自诬、自虐，在群众大会上承认自己是走资派，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心理上、道德感上，以失败者姿态向造反派和时势示弱、投降，来求得过关。甚至还不止一次、二次地检讨。所以在公众形象上，是一个犯了错误、肯改悔的人得到宽大，而戴罪立功的。

亮相的人选，一般是原党政领导班子的二、三把手，或级别更低一些的人，与原一把手关系相对疏远，处于比较边缘地位，行事低调，造反派对其意见不大的。有的人是看到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大势所趋，再坚持与原有党政领导保持一致没有出路，主动向造反派靠拢、示好，积极入伙以分一杯羹。公开表明与前一把手划清界限，在斗争大会上揭发、批判的，叫“火线亮相”。有的是造反派主动伸出橄榄枝，争取其出山为之补台、助阵，当事人被动应对，半推半就，或采取拖延战术等待更有利情况才慨然允诺。这样的亮相实际上是权力运作的结果，上一级领导示意，三结合的主持者与造反派协商、说服，达成妥协。

由于可以借此脱离住牛棚、被批斗的窘境，立刻能够回家，家人孩子也因此得到正常对待，自己也能获得重新工作机会，除了少数例外，一般干部对亮相的态度都是积极的。

但被结合后初期，这些亮相干部唯唯诺诺、谨小慎微，在支左军队干部主导、造反派扎堆的革委会里，说话不硬气，没人听，作用也有限。时间长了，长期从政经验让他们发挥出维持党政机构运转的专长，起到稳定作用。但到文革后期或文革后，亮相经历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污点，当事人自己不愿提起，对立面却往往借此说事，成为新的人事纠葛里的材料。

2000年代前后，该词复归原义，在包装风气日盛情况下大行其道。以此为关键词，用 google 搜索，得到“16,800,000 项符合亮相的查询结果”。

(参考资料：陈益南《华国锋：在文革中崛起——文革史研究之四》，“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文章选刊”；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 年版)

## 五一六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简称五一六兵团。最初只是受极左思潮影响而自发建立起来以炮打周恩来为主要目标的青年学生组织，在清查过程中被升级定性为反革命阴谋集团。进一步简化为五一六，其成员叫五一六分子。

该组织前身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属于钢院造反公社红一团的。成员有张建旗、李连菊、李芳、陈力等。1967年5月初反击二月逆流活动中，受“怀疑一切”思潮影响、意欲投机建立不世奇功的张建旗最先提出揪二月黑风总后台，矛头指向周恩来。《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以后，张提出所谓“要掀起深

入揭发高潮”和“抓新的一小撮”，并派李连菊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派的张新民、戴达明等5人串连。5月底6月初，张等人成立了“钢院五一六兵团”，发表了一个宣言。同时他们还向毛主席、中央文革等写信，信中希望中央文革在6月4日前给以指示。

6月3日，中央负责人严肃地批评了北外、二外反总理的活动。一些人退出，而101中学郭海燕、师大苏东海、商院程镇华、财办何畏以及农大、北外、二外等有反总理思潮的人加入了进来，因此更名为“首都五一六兵团”。6月30日至7月2日在外语学院5楼召开了所谓“第一届代表大会”并形成“决议”。7月11日—12日，经过串连后，活动范围扩大到农口和八机部。以后又有三中卢平化（化名×东兵），二外张广武、欧阳江，农大周明灯、崔碧君等参加。

6月初他们把《致总理的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7月3日—5日深夜，张及其同伙在财贸口贴出“枪毙××”、“打倒李先念”等大标语。8月9日凌晨，把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公开贴在北海公园前后门、王府井大街北头一个胡同里、西四、平安里、动物园、商学院等处，并向北京大专院校以及湘、鄂、粤、新疆等地邮寄传单。还到城里挨门挨户塞传单。

8月11日，江青等中央负责人宣布“五一六兵团”是阴谋的反革命组织，该组织从政治上、组织上迅速土崩瓦解。25日，“五一六兵团”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全部被抓起来了。

1967年9月7日，新华社播发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公开提出批判“反革命组织”“五一六”的问题。毛泽东为此加写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由吴德担任组长的“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步伐。

各地也设置了专门机构，先后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定案范围被扩大为“三指向”，即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注1]而实际上是以追查反周恩来为主，包括了涉及“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打砸抢搞得太厉害了等等。如震动全国乃至世界的围困中南海、火烧英国代办处，造成死人、伤人的北京百货大楼、永定门粮库、琉璃河水泥厂武斗，都受到严厉追查。推而广之，举凡被认定影响当时政局稳定、需要排除干扰的，都能装进“五一六分子”这个筐。

清查“五一六”运动长达数年，一些人被隔离审查，受尽折磨。由于使用逼、供、信手段，“罪行”在反复交待中，一些细节被编得神乎其神。“五一六”被描绘成了一个罪大恶极、无孔不入的组织。用办学习班、超时连续审问等方法追查五一六的登记表、组织情况（政委、司令）、组织网络图，不交代就不让过关；越查越多。直接遭受诬陷迫害的有数百万人，受到牵连的人就无法计数了。[注2]不过一百五、六十人的东方歌舞团就抓出了“五一六”分子五、六十人，在不足两千人的外交部清出“五一六”六、七百人，《光明日报》职工中打了108个“五一六”分子。北京市群众揭发出来涉及五万多人。还根据抓出人数的多少评先进单位。江苏有一句顺口溜：“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来就是友”，便反映出

清查“五一六”的广泛性。

吊诡的是，连解放军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当时已被隔离审查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也放到一锅烩，都说成是“五一六”幕后。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的操纵者。“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也成了“五一六”的操纵者，而且名列首位。到1973年冬，身任公安部长、“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成员、并兼管专案办公室的李震，也自杀身亡了。

有人写匿名信给毛主席，告状说追查五一六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毛泽东把信转给北京市委，在信上用红铅笔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于是北京“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都摘了，这样就没有‘五一六’分子了”。但外省抓五一六的风仍然不止。“九一三”事件后虽曾一度降温，但仍然延续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才不了了之。邓小平1975年抓全面整顿措施之一落实政策时，就提到五一六：“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如果按五口之家来算，再加上他们的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波及的面就有好几万人。必须使他们很快把包袱放下来。”

2000年代，人们提及清查五一六最先浮现到脑海里的字眼就是：“随意制造”“混乱不堪”“蹊跷”“悬案”“变魔术”“莫须有”“组织和罪行都不明晰”“灾难”……

[注1]《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1970年1月24日）中，周恩来点了学部吴传启、潘梓年和王关戚的名，说：

67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手了，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现以查清“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文件有一个宣言，七月一日通过的，另外“六一六”跟着发表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的口号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很反动，正好在这时开始有二月逆流，传到社会上，他们把矛头对准中央各部委，对准解放军。武汉事件发生后，他们就变成了什么角色，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依靠的伟大长城，六、七月闹得最凶。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

[注2]文革学者王年一提供的数字说，被打成“五一六”的人，估计全国至少有几十万人。

参考文献：王年一《关于“五一六”的一些资料》，《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期；《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

版社 2004 年版；邓小平《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1975 年 5 月 29 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穆欣《秦城监狱 6 8 3 1 号犯人》

## 巴黎公社

1871 年 3 月 18 日至 5 月 28 日反对法国政府的巴黎起义。被共产党人称为“法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在巴黎建立的工人革命政府，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1870 年 9 月 2 日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9 月 4 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普军继续进攻法国，9 月 19 日包围巴黎。为了保卫巴黎，巴黎工人阶级建立了 30 万人、194 个营的国民自卫军，由选举产生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

1871 年 3 月 18 日凌晨，梯也尔派国防政府军偷袭蒙马特尔高地，企图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巴黎工人随即发动起义，占领市政厅。3 月 26 日巴黎人民进行投票，选举产生了自己的政权——巴黎公社。公社由普选产生的巴黎各区代表组成。采取了 1793 年的政治措施（停止支持宗教）和社会措施（10 小时工作日，面包师停止夜班）。

5 月 10 日梯也尔与普鲁士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普鲁士答应放回 10 万名法国战俘，并同意凡尔赛军通过普军阵地去进攻巴黎。里昂、马赛、图卢兹等地闻风兴起的公社被相继镇压。5 月 20 日梯也尔发动了对巴黎的总攻，约 2 万名公社起义者被屠杀，凡尔赛军在内部策应下攻入巴黎。

马克思著有《法兰西内战》总结这次起义。他指出公社的原则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废除旧军队；新建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机构，没收逃亡资本家的工厂，由工人团体管理，严禁克扣工人工资。公社还规定工作人员薪水最高不得超过工人最高工资，不受群众信任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撤换。他说，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而教训是没有革命政党的领导，未能建立工农联盟，没有及时向凡尔赛进攻，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这些经验、教训指导列宁领导的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并衍生出 20 世纪中叶一时蔚为壮观的社会主义阵营。

1926 年毛泽东就曾发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的讲演。建政时毛泽东和中共把自己政权的性质、作用和新政权中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定位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后来一些政权机关出现机构庞杂并产生官僚主义作风，引起毛泽东不满。他曾多次强调，一定要解决国家政权机关产生的这些问题。在毛泽东的最初设想里，人民公社不仅是农村政权形式，而且要利用它对国家政权机关进行彻底改革。只是 1958 年“大跃进”的失误，才使毛泽东决定不在城市推广人民公社。

1966 年发动文革时，除了通过《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描绘社会改革蓝图并宣示意识形态理由，毛泽东还把北大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称作“20 世纪 60 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宣言”，以作为新的政治形态的展望。《十六条》再次提到巴黎公社：“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并一再要求“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在运

动中自己解放自己”。

196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这一读物为最早觉悟的红卫兵开始思考社会制度、巴黎公社原则、民主制度、直接选举等问题提供了契机。一些工人造反组织要求通过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成立厂“文革委员会”。红卫兵早期组织领导人的更迭频繁，与巴黎公社原则经宣传深入人心也有关联。

1967年夺权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时，否定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公社体制。一方面因为涉及国体、政体、国号、外交承认、党的设置等问题，一方面因为巴黎公社“全面的选举制”不适合当时国情。夺权后，各地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沿袭了文革前的委派制，由上一级政权委派，其中有相当多都是从外地调任的（即易地作官）。各级新领导班子执行原各级政权机构的一切职能，只是内部设置的名称有所改变：原来的司、处、科、股被取消，改称为“领导小组”，如文教组、宣传组、工交组等；每个“组”的实际职能，就是原政府相应机构的职能。所不同的是，党政不分了，革命委员会既是党，也是政。并厉行精兵简政。

文革后的官方史学肯定“毛泽东确定了关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三条基本经验，抑制了造反派，这是后来党和国家政权没有被毁灭的重要因素”。虽然党政企不分更为严重。但2000年代以来也有批评家认为“毛泽东又一次违背了巴黎公社精神，又一次偏离了中国民主化建设的进程，使中国的政治体制走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权模式，也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潜伏下了更深刻的危机”。

（参考资料：《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于是乎《毛泽东与巴黎公社》，转自凯迪 <http://www.cat898.com>；《文革时代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如何产生》，原载《党史博览》，转自“中华网”2005-05-26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526/12348176.html](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526/12348176.html)；阳敏《穿过红色岁月的阅读之路》）

## 王曼恬

（1913—1977）湖南人，社会活动家。毛泽东的表侄女（大姨表兄王星臣之女）。1930年代就读于上海新华艺专学习美术，做过地下党工作，从事文艺界的抗日统战运动。后到延安边中一队任美术教员。

1949年后曾任天津教育局分局长。1938年与鲁藜结婚，育有一子二女。1957年虽与被打为胡风分子的鲁藜[注1]离婚，仍多少受一些牵连。

文革中造反起家，任天津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因与毛泽东的亲戚关系，被倚为毛的私人信息源之一，说话能直达天庭，实际影响力超过职务。一些牵扯面大的敏感事项常拉她参与办理，以开辟方便通道、协调关系。曾为地下工作时期的文艺界老战友作过证明。

1971年7月经万里推荐兼任国务院文化组党组成员，分管全国美术工作。每星期到文化部一两次，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当文化组党组成员、8341部队驻北京电影制片厂支左干部狄福才挨整时，附和吴德意见，使之免于进一步批判。1973年11月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副校长。曾提出“美术创作也要搞三突出”；组织一个改画小组，把所有全国美展的参展作品改得更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积极扶持、推广户县农民画。1974年组织炮制批

李苦禅等“黑画”文章。保护过写整顿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的蒋子龙。

是江青在小靳庄的联络员。1975年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辞去文化部职务。[注2]1977年10月后自杀。

在文革后的各式回忆录里常被称为“江青的亲信”、“死党”、“‘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有人批评她是“四人帮的爪牙”，“文革整人时很刻薄”[注3]；有人辩护说“没必要因为她是毛泽东的亲戚就格外严厉”，“其人主动攻击性并不强”，“文革中的表现不能说就坏到哪”。吴德评价她（在国务院文化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据说是孙犁“芸斋小说”《王婉》里官气十足、红极一时的政坛新贵王婉的人物原型，一个可怜的人。

[注1]鲁黎被胡风案所累。毛泽东探询周扬，鲁黎怎么样？周揣测圣意不悦纳于鲁，答曰挽救不了了。

[注2]11月16日信中说：“全国正在进行组织整顿，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在这次整顿中，免掉文化部的工作，而集中精力在天津，深入基层做点工作。”

“我目前的情况，太特殊了，一个地方干部，又兼文化部部分工作，别的部找不到这样的例子。作为您的亲戚，深感影响不好。加上我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很低，专业水平很低，非常不适应文化部的工作。”“我已六十二岁，能力很差，两头跑，既做不好工作，也有点吃不消，集中精力在天津，可能为党还能做点工作。”

毛批示：“请汪（汪东兴）酌处。我看可以同意她回天津。”

[注3]据称，被刁难、申斥或整肃者有方纪、黄宗英、李骆公、李苦禅、黄永玉、郭修琳、沈尧伊等。

（参考资料：毛泽东《对王曼恬要求免掉文化部工作来信的批语》[1975年11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中国晶牛毛泽东思想网”<http://mzdthought.com/html/mxzz/mzdwg/13/8287.html>；《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洛恪《忘年之恋》，中国妇女1988年第1期）

## 一月风暴

1967年1月由上海肇始、定调、波及、推动全国的夺权运动。称呼出自《人民日报》社论。又称“一月革命”，是张春桥等意欲与苏俄十月革命相应、比肩的对称。史家亦称“一月夺权”，直陈其事。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开展总进攻的一年”。

1966年底，上海工总司头头王洪文等人制造了矛头直接指向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造成上海党政系统瘫痪和社会生活极度混乱。

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上海策划夺权。1月4日，夺了《文汇报》的权，并发表夺权宣言。5日，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声明不再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6日，张春桥、姚文元借工总司等全市各造反组织名义，召开“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

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并将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大会发出三项通令：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陈丕显交代所谓“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会后，市委、市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权力落到张姚王等人手里。这次大会是上海“一月革命”的开端和标志。

1月8日，在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下，成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成为全市生产的实际领导机构。张春桥称之为“经济苏维埃”。随后又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取代公安司法机构。还企图用上海市“造反组织联络站”，取代中共上海市委。

同日，毛泽东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表示支持。“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1日，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9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造反组织《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

在这一时期上海市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等其他组织曾经先后发动过四次全市性夺权，都被张春桥等人分化、搞垮、镇压。2月5日，正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后来由于毛泽东不赞成用公社之名，于24日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为副主任。

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影响，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山西（1月14日）、山东（2月3日）、黑龙江（1月31日）、贵州（1月25日）等省纷纷夺权。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的新阶段。夺权引起的震荡，革委会筹备委员会的权力争夺中进一步搞乱了全国，造成派性分裂，迫害了大批干部；同时林彪集团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在各地乘机膨胀，扶植党羽，攫取了相当部分党政大权。

1967年天马电影制片厂“造反派”拍摄完成纪录片《一月革命》（5本）。同年创作、排演了话剧《一月风暴》，演员章非饰张主任一角。1970年创作了电影剧本《一月风暴》并投入拍摄。

风闻收藏家藏有“一月风暴”香皂纸：16.5厘米×12厘米，基本色调为红、黄、白三色。正面是无数面红旗，红旗中央衬出一柱火炬，火炬右侧是品名“一月风暴”香皂，红旗下方是红底黄字“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侧面和背面分别印着“一月风暴香皂”、厂名“上海制皂厂”和重量“100克”。包装纸设计简洁，印刷粗糙，留下了浓郁文革时代印记。

（参考资料：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廖盖隆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董光中《未出笼的反动影片“一月风暴”》，《联谊报》2006年7月15日；张斌阶《香皂纸也有“一月风暴”》，）

黄



黄色的简称，组成“黄歌”、“黄书”、“黄画”等词。象征腐败堕落，特指色情。19世纪末美国《世界报》曾用黄颜色版面刊载淫秽、色情漫画，招徕读者，扩大销量。后用黄色形容书刊、音像、图片的色情内容。

在性观念上，从宋明理学以至近现代中国进入性压抑状态，人们把“人欲”当成应该“灭”掉的坏事，性是不洁的、需要避讳的事；而崇高的革命排斥个人和情欲，文革把道德政治化的思想革命，“斗私批修”在实践中成为漫无疆界的强制性思想禁制，更加进入一个禁欲、反性、无性的时代。

由于纯而又纯成为思想革命追求的目标，性观念被建构为：异性婚姻之内的、男尊女卑的、一本正经的、为了生孩子（革命接班人）的、排除老的与小的、许做不许说的事务。“黄”就越过腐败堕落、色情淫秽的界限而无限推衍，所有与情爱有关的都被冠以“黄”的罪名。该时期性被从所有的传媒中一扫而空，公开的性信息等于“零”。中国人对性信息的获取日渐困难。以性无知、性恐惧、性冷淡为特征的病态，反倒成为正常、健康、“革命”的标榜。

不但爱情歌曲、民歌被划入“黄歌”范围，连抒情歌曲如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中有“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词句）、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印尼民歌《宝贝》、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包括整本的《外国民歌200首》）等，都被视作颓废淫荡、低级趣味的“靡靡之音”，有违“思无邪”之旨，列入“黄歌”范围受到禁止。小提琴爱好者拉拉《梁祝》，也要被人告发，罪名竟是演奏“黄色音乐”。即使专业工作需要去图书馆查阅书刊杂志，因外文医学刊物有上半身裸露的女性患者图像（插图）就不能外借，也不许复印。一位工程师因公出国，回国时海关查出他带的杂志刊有全裸女人体图像，被判三年徒刑。

不仅《三言二拍》（冯梦龙）、《红楼梦》（曹雪芹）、《十日谈》（薄迦丘）一类经典被理所当然地算作“黄书”，连《牛氓》、《苦菜花》、《晋阳秋》这样的革命小说甚至《赤脚医生手册》都被当成“黄书”看待。处罚的方式，从没收、思想帮助、批判、戴坏分子帽子、调离较好职位，直到劳教、判刑。其严苛程度，史无前例。共青团组织专题开展肃清黄书、黄歌活动，并把收缴黄书、黄唱片、黄歌本作为政绩写进总结报告（《大连市志》《市政府机关党务工作》报告说，1960年代收缴黄书66册、黄唱片117张、黄歌本16册、歌篇43份）。

就象物理学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一样，以权力强行推行性禁制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压抑，而是创造了有关性的不断增生的需要和表达。既然“黄”的泛化到了没有标准，无远弗届的禁制约束力也自然随之衰减。与青春期性成熟一起萌动的怅惘要寻求出路，“黄”简直成了挡不住的诱惑。唱黄歌成为“坏”孩子的专利。到处抄“黄歌”成为一种神秘、刺激的时髦，有个性的表现。买票反复看电影《列宁在1918》，巴巴地等到看完一小截《天鹅湖》（有的换从座位上往下蹲），就一哄而散。

“黄”成了禁欲时期叛逆青春的标榜、“酷”（京腔称之“拔份儿”）的艳羡。虽然这一切更多表现为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但它的弥漫、渗透力却并不稍减。以否定的方式，成为涌动的人性冲决文化禁制的暗流。越到文革后期，违规越界的发生越多，以至于罚不责众。

1990年代以降，色情、淫秽书刊和音像制品被不法商人盗版制造出来，通过街头小贩兜售，形成与赌博、毒品相当的社会危害，合称“黄赌毒”。国家新闻出版署专门设有色情与淫秽品鉴定委员会，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法律规定，以

指导治理。但随着电视台开设性卫生讲座，街头出现性用品商店，人体艺术风行一时，人们的性观念逐渐发生改变。在泛滥的本能欲望面前，管制变得日益迫切、困难、乏力、低效。

(参考资料：《文革时期流行的“黄歌”》；解玺璋《读“黄书”》；《“性”观念的中国式变化》，“中国频道”2006年2月22日)

## 工业基础知识课

文革时期课程改革的成果之一，由原物理、化学两科合并而成。简称“工基”。

1967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复课闹革命，并提出师生自订方案、自定课程、自选教学内容、自编教材。秉承毛泽东指示“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要删繁就简”，各地从1968年开始，展开以服务生产、培养普通劳动者为宗旨的中小学自编教材工作。

1969年1月27日《红旗》杂志第二期介绍兰州第五中学实行半工半读的经验，师生每周2天学习，4天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把原来中学17门[注]合并为5门课：毛泽东思想课、工业基础课、农业基础课、革命文艺课、军事体育课、劳动课。这就成了一个样板，全国不少城市也模仿实行了类似改革。使中学课程出现大混乱，生产知识被抬到极高地位，系统的基础知识受到轻视，课程结构、教学大纲、教材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处于无政府状态。文革前教材被诬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产物，统遭废弃。培养“普通劳动者”、“反修防修”的教学目标，以政治正确性抛开了追赶现代化目标。

1969年11月上海、北京等地根据中共中央通知自编的中学教材开始试用，后来没有自编教材的省市区都采用这套教材。

课程设置各地情况不一：多数地区是把物理、化学合并为工业基础知识课，少数如甘肃省的工业基础知识课由数学和物理合并而成，四川新都则把物理、化学、生物合并为工农业基础知识课，个别地区仍把物理单列改称工业基础知识课。课时也减少了。在具体课程安排上，大量削减原物理课内容，而结合“三机一泵”(电动机、柴油机、拖拉机、水泵)讲物理知识，结合土壤改良、农药化肥使用讲化学知识，严重破坏了知识系统，大大削弱了基础知识。学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在办学方法上，师生下厂、下乡参加劳动，与工厂、农村社队挂钩，在校内办工厂、农场，建立学工、学农基地，实行“开门办学”，“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自1968年工宣队进驻学校，各地中小学建立了“工农兵讲师团”，甚至聘请工人当专职教师，改变教师队伍成分；请他们讲授工业基础知识课。并采取淡化分数、开卷考试的考核办法。

虽然课本内容大幅度删削而普遍变薄，但两科合并的课本还是比其他科目略厚一些。因工业基础知识课简称“工基”，与“公鸡”同音，也被学生玩笑地称为“公鸡课”。没把知识学习当成校园生活的重要内容。

2000年代网上有河南省中小学教材编选会议小学组编写的《工业基础知识课化工》(河南省新华书店1969年出版，32开，123页)出售，8成品相，叫价5元。有投资指导的文章说“这些使用不足十年的教材……已经成为今天众多收藏爱好者的收藏对象，一般每册在2—8元不等”。

[注]语文、数学、外国语、政治、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劳动等 13 门正式课程，和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制图、历史文选、逻辑 4 门选修课。

(参考资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白月桥《我国中小学第一代课程发展历程》，“中教网”；《“文革”期间的教课书》，“中国集藏”总第十三期（2001 年 6 月 12 日））

## 毛泽东思想课

文革中取代政治课的课程名称。

毛泽东思想作为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民族解放、建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 1949 年以后的意识形态建构，处于日益重要地位。1966 年，毛泽东几乎是乾纲独断地发动了文革，为了赋予这场史无前例运动以合法性，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个人的崇拜宣传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毛泽东思想不但成了中共党魂、立国基础、法律准绳、真理本身，还成了教育革命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成为政治课的主题、主体，在当时是一种现实和逻辑的双重必然。

1966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 1966—1967 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不能再用。……不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教育部党组报告中还规定，政治和语文合开，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这一文件，为日后毛泽东思想课取代政治课，政治、语文甚至包括历史合并为一门课程，提供了政策根据。

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 1968 年 9 月设置的毛泽东思想课就是原来的政治课。兰州第五中学改为兰州铸造厂厂办中学设置的毛泽东思想课，就是由政治、语文两门课程合并而成。这些样板的示范作用，规范并带动了普遍的课程改革。在山东莘县一中等地还有把政治、语文、历史等合并为“毛泽东思想课”的做法。

这门功课被放到主课的位置，课时安排得最多。课程的主要教材是《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语录》，结合政治时事学中央文件、读报纸社论，“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教学核心内容。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的讲解，让学生形成领袖毛泽东就是党的化身，高瞻远瞩、化险为夷的胜利保证。常要求运用毛泽东观念，写以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靶子的大批判文章，帽子和口号齐飞，政治上正确得空洞无物。由于课程的性质，对教师的政治身份有特殊要求，成分不好的是不准任课的——不管他是否受过相关教育、具备相称资质。还引进大量新旧社会对比的忆苦思甜教育，让工人农民来讲课。教材的系统性和知识性无从谈起，课堂教学无从着手。

由于课程脱离学生生活实际，成了应付的官样文章，老师讲得千篇一律，老生常谈；学生没有兴趣，教室里乱哄哄的象自由市场，根本听不清老师讲什么，胆大的学生干脆溜号逃学。唯一好处是，老师教起来保险，不担心教学内容走偏方向；学生考试可以开卷，没有学习压力。而仍要求闭卷考试的学校，就训练了学生背书能力和记忆力。

高校政治理论课内容之一、1996 年开始设置的《毛泽东思想概论》是大学

本科段各专业的一门公共课，是从《中国革命史》演变而来的。有时习惯上也被简称为毛泽东思想课。

(参考资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谢海涛《探访中国最后的工农兵大学生》，《南都周刊》2006 年 8 月 22 日；丰捷《新一代高校政治教材能否适应新时代》，《光明日报》1999 年 1 月 22 日)

## 农业基础知识课

文革中取代生物，或由化学、生物合并而成的中学课程。简称“农基”。

1968 年 10 月 19 日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发出《关于复课闹革命并做好教材改革工作的通知》，决定中学学制改为“二·二制”（初中、高中各二年），知识课中化学和农学合并为农业基础知识课。1969 年兰州五中、吉林梨树县《农村中小学大纲（草案）》都设置了农业基础知识课。权威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先后作了报道、推荐。也有个别地区把化学课改为农业基础知识课，以土壤、农药、化肥知识为主要内容。反映出教学秩序、课程设置的混乱和无政府状况。

这门课主要讲解“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口猪”，和被冠以毛泽东招牌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教材和讲授以作物栽培、化肥等常识介绍、具体操作为主，但教材编写者和教师都不熟悉生产实际，始终有隔靴搔痒之感。教材、教学片面强调“联系实际”和“为工农兵服务”，根本不讲学科的基础知识。课本编写多数粗糙、浅陋、杂乱无章、泛政治化，枯燥乏味，难以卒读。

个别尽心尽责的教师，仍能秉承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道德，细心讲解水稻、甘蔗的育种、栽培，嫁接果树，白木耳真菌种类的种植方法，结合校园的学农基地进行实际操作；教会学生饲养禽畜和防治疾病。一些县镇、农村学校由农宣队队员或聘请贫下中农在田间地头给学生讲农业基础知识课。上海等城市还开设了兽医、赤脚医生、农机、机电、林果等专业班。

城市学生听到农业知识，也有感到新奇的。但多数学生在漠视知识的大环境下，嘻嘻哈哈，听课并不认真；还模仿称工业基础知识课为“公鸡”的方法，对称地管这门课叫“母鸡”。只是顺手拣到一些名词给同学起绰号：管身材矮的同学叫“矮壮素”（一种农药化肥）[注]。极个别学生下乡插队后用上了课堂知识，大多数人丢下课本就扔到一边去了。

1970 年代末教育界在课程、教材方面的拨乱反正，重新把这门课分解为生物课、生理卫生课和自然常识课。

[注]ISO 通用名称为 Chlormequat Chloride，中文译名为氯化-2-氯乙基三甲铵，也称三西、氯化氯代胆碱、稻麦立。是一种用途很广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激素），可用于小麦、水稻、棉花、烟草、玉米及西红柿等。喷在植物叶面后，经叶片、幼枝、芽、根系和叶子吸收进入植物体内，抑制植物体内赤霉素的合成，控制植株徒长，使植株节间粗壮，根系发达，抗倒伏，叶绿素含量增多，从而改善作物品质，提高产量。

(参考资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

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甘肃省 1968 年大事记》，“甘肃经济信息网”<http://www.gsei.com.cn/aboutgansu/gsgk/nianb68.asp>；黄秀莲《我阅读的第一本书》，《东南早报》2005 年 12 月 22 日；薛勇《种菜妙用矮壮素》，《甘肃农民报》2004 年 04 月 30 日）

## 敌情观念

对敌人警惕的观念。不是文革特有的词语，但在文革时代流通的广度、使用的多样性、重要性都达到了极致。

既然中共基本路线认定阶级斗争普遍存在，国外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国内地富反坏右时刻梦想复辟，敌情观念当然不容有丝毫松懈。微小到一句顺耳的好话，一颗不值几文的发卡、水果糖，都可能是别有用心的糖衣炮弹；东西方古典名著、名曲（封资修黑货），或外文原版的科技书籍，高跟鞋、香水、旗袍、西装，都是资产阶级细菌；更不用说偷摸混拿，暧昧私情，都被当作不应孤立看待而需给与快速反应、处理的事务。

中共中央 1969 年 8 月 28 日发布广泛、紧急的战备动员号令，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安定形势。命令提出，美帝、苏修正加紧勾结，阴谋犯我。所以边疆军民必须高度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加强军民联防。命令要求：大敌当前，要加强军民、军政及军队内部团结，巩固革委会；反对资产阶级派性；解散跨行业群众组织，解散各种武斗队，拆除武斗据点；镇压反革命分子；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而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做好战斗准备。

敌情观念对现实的非现实描绘、捏造、催眠，却有着非常现实的功能，满足着集权政治的需要。它造成社会-人群的分裂，使人们在安全本能颓丧推搡下争相逃难似地躲开黑五类贱民，把别人往低阶层驱赶以避免自己被划进另册；它多少类似基督教末世概念，唤起人们的恐惧，在恐惧想象和生存本能双重推搡下依附权力，在万众一心的仇恨中完成想象的集体认同；分裂、恐惧造成的统一意志，使得管理者能够从容地驾驭人们。

它迫使人们整天都问：敌人在哪里？明明没有你死我活的敌人还要制造敌人，没有敌情还要千方百计发现敌情，这就是“敌情观念”。它通过对敌情观念的强调，制造一种迫在眉睫的紧张，保持对意欲危及权力者的威慑力，论证所有打击措施的合法性。当阶级斗争新动向成为领导者警惕性高、路线斗争觉悟高时，发现敌情成了政绩，被鼓励得泡沫化地制造出来，更加不是什么怪事了。[注 1] 而从消极方面看，把不明原因造成的损失和负面影响归咎于敌情、阶级敌人破坏，一则宁枉勿纵，保险系数大，二则可以减轻直接责任人的过失——一句管理责任理当控制、改善，人为破坏无法遇见的推脱就完事了。

敌情观念方便理直气壮地搞“有罪推定”：先认定某人有罪，在此前提下再挑选、拼凑甚至伪造证据。都是对敌斗争的需要。难道大敌当前，还要循规蹈矩谨慎行事、自缚手脚吗？最典型的论证是列宁的话——面对高尔基减少不必要的残忍的责难，他说，在敌我对决时，你能判断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

它像是一副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文革时的典型状况是，带着敌情观念去看档案外调，对本单位员工历史状况逐一摸底排队后会惊讶地发现，居然有那样多的中老年教师都像特务。“像”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神经过敏，把“像”等同于

“是”更是逻辑上的以无知为据的谬误。

它的推理模式建立在不相容选言判断基础上：在或我或敌的情况下，非我即敌。而实际是，敌我之间存在很广阔的过渡地带，如果判定对象恰好处于敌我的中间地带，这一判断就犯了肯定不当的错误。

敌情观念的想象兴奋点，在对象上集中在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漏网地主……上，在物证上集中在秘密电台、变天帐、……上，在行动上集中在施放糖衣炮弹、投毒、纵火、爆炸、盗窃国家机密……上。想象的源头来自反特电影、小说[注 2]和渲染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的论文、报道。

受这样的观念影响，连对西方文化、学术的接触也抱定“毒草可以肥田”、“在批判和斗争中发展”先入之见。由于事先确定了“针锋相对地回答挑战”、“无情揭露”、“坚决打击”一类的方针，当然就无法客观了解，更谈不上汲取健康的养分。

有学者批评，1990年代出版的《汉英词典》仍然强调阶级观念、敌情观念，突出革命斗争：对“暗藏”的释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a hidden counterrevolutionary (p. 10) 对“蠢蠢欲动”的释义：敌人又在蠢蠢欲动。The enemy is going to start something again. (p. 161) 对“敌”的释义：与人民为敌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Those who oppose the people will come to no good end. (p. 211) 这种状况会给使用者造成错觉，以为当今中国还是 30 年前的社会状况，当今中国人的生活还是文革时期的生活，这将给我们造就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尴尬”。

2000 年代定义“国家安全意识”时，仍把敌情观念作为它的固有外延之一。要求机关党员“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敌情观念，不断提高对敌斗争本领，在同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勇有谋、善打能赢”。

[注 1] 嘉兴县人武部某政委 1968 年 8 月 11 日报告：

5 月，对阶级敌人进行全面进攻。召开 11400 余次革命大批判会，揪出 2 个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黑手夏良常和聂敏之，破获 3 个国民党区分部、1 个三青团区分部，揪出 36 个反革命分子，280 余件反革命证件，还有一个有番号、有纲要、有武器的“忠义救国军”。

全县查清国民党党员 1798 人，三青团员 1358 人，军统、中统特务 1200 余人（其中组长以上 81 人），反动军官 43 人，反动军警 595 人（其中将级以上 8 人）。……荷花公社许勤光在国民党总统府曾任副秘书长。中统、军统组长 42 人。戴帽子的地富反坏右 13100 人。以上共计有阶级敌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2.4%。

新滕，解放前的地下组织，实质上是叛徒集团，有的参加特务组织，有的本人就是阶级敌人，还渗入托派成员。……

嘉兴，解放前是国民党的模范县。解放后又成为“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前沿阵地。1954 年砍掉农业合作社三分之一。“三年自然灾害”大刮“三自一包”黑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叛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于 1966 年底派来刘瑞龙。1967 年 1 月，又派来郑重之流，企图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注 2] 代表作《羊城暗哨》（1957，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 1960 年代初中期《跟踪追击》（珠江电影制片厂）、《秘密图纸》（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是反特电影专业户，曾出品有《无形的战线》、《虎穴追踪》、《寂静的山林》、《国庆十点钟》、《徐秋影案件》、《神秘的旅伴》、《前哨》等有影响的影片。文革

中流行的反特小说有手抄本《一双绣花鞋》、《梅花党》等。

(参考资料: 郭建《当代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幽灵》,《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 郑谦《六十年代末中国备战秘闻》,“浴火凤凰”[http://a.lasphost.com/chinatownbbs/news/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63](http://a.lasphost.com/chinatownbbs/news/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63); 茆振华《我的回忆》,《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第四十三期[2005年1月20日]<http://user.jiaxing.gov.cn/sites/jxszx/extra/coll14/wszltx0543.doc>; 徐友渔《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葛校琴《从接受者阐释视角看“汉英词典”例证的一些问题》; 中共河北省委政法委《省委政法委机关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

## 一分为二

1. 哲学上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述,指称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都可以分为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统一又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各自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用毛泽东话语来说,就是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对抗性和斗争哲学(阶级斗争学说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哲学论证)。波浪式前进的历史必然性成为决定论的单向度线形思维。

他早期就强调运动、对立、斗争、冲突是宇宙规律,神旺于与天、地、人的斗争(迭叹“其乐无穷”);中年豪迈地论断“一切过程矛盾的运动,同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是任何过程如此”,“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晚年更把冲突、对抗看成积极因素,执著于“庐山出现的这一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都半个世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否定综合、渐进改良、稳健,中庸主义、中间道路成了反革命的贬义词。

在现代化受挫的路上,不是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总结,而是用两军对垒、谁胜谁负、你死我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眼光看待一切,在政治上敌我、革(命)反(革命)两分,在经济上姓社姓资两分,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两分,哲学上唯物、唯心两分。认为它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只要抓住它,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试图跨越经济水平、物质条件制约,调动战争时代的政治动员经验,走出一条多快好省冒进捷径。

文革更加趋于极端:在“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逻辑支配下,“分清敌我”、“划清界限”到了罔顾人伦亲情,“亲不亲阶级分”“爱不爱路线分”的地步。“一分为二”惯性狂热取消了正常理性,演化成一种人整人、人害人的现世惨剧。“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一个“造反有理”的口号,就造成了全国范围党政机器整体瘫痪的无政府主义灾难。

有学者认为,中国长期的战争环境和军事斗争中产生了主观唯心论和意志论哲学,离开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原意,其中所谓“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即所谓“斗争哲学”,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中的“不断革命”理论。

2. 指称全面看待人或事物,既要看到积极方面,也要看到消极方面的方法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毛泽东《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讲话》)。

任何问题只要能套上“一分为二”,都能说出一大溜正反面的道道来,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没有一个确定的界限,辩证法成了建立在权力话语基础上的跷跷板、诡辩术、变戏法、文过饰非。

明明是“井喷”引起的大火，偏偏可以唱出“3211 钻井队救火”的“共产主义凯歌”。明明是大面积食物中毒，偏偏可以唱出“抢救 61 个阶级弟兄”的“共产主义凯歌”。

“抢险”成了“灾难”的代名词，“共产主义凯歌”成了“灾难”的代名词。不追究灾难发生的原因，像是没有事故、灾难的抢险。丧事办成喜事，没有读职责任人，只有英雄、彩带、大红花，皆大欢喜。以后事故、灾难照常出，再高奏一次共产主义凯歌，仍然是新人辈出，社会主义事业一日千里。

毛泽东自己可以对自己“一分为二”，可以说三七开。容不得别人批评，否则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用心何其毒也”只能他“舆论一律”。这也就是他晚年犯错误、国家动乱不止的悲剧的原因之一。

一分为二陷入相对论的极端是，连彻底否定文革，说批判人性论没人性，破坏了中国文化、经济、政治，伤害知识分子，毁坏社会伦理、人民心性，枉杀无数无辜同胞，破坏经济、毁弃文物。也有人说凡事都要讲辨正法，对文革也要一分为二，比如让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就锻炼了知识分子么，斗走资派还打击了官僚主义，偿清了内外债，发射了卫星、修了南江长江大桥[注]——整个成了一大搅和。

1990 年代治中国思想史学者庞朴，为补救一分为二积弊提出一分为三，如儒家谓“执两用中”，道家谓“一生二，二生三”，或“得其环中，以应无穷”，黑格尔谓发展的正、反、合规律。认为中国智慧标举建设需要的非此即彼之外的中庸、和谐。该词释义的第一义项基本退出流通，第二义项仍在广泛使用中。

[注]据聂荣臻回忆录说，卫星早就研制成功并准备发射。给中央打报告时让晚点发，等开九大时再发，以证明是文革的胜利成果。南江长江大桥也是在文革前修的，本该早就通车，因为文革建桥工人打派仗，所以推迟了通车。

(参考资料：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平头百《谈谈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思想》，“智识学术网”；牟传珩《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时代的“一分为二”》；庞朴《从一分为三谈中国人的智慧》，《解放日报》2005-05-22)

## 广交会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Chinese Export Commodities Fair)，因举办地在广州，又简称广交会 (Canton Fair)。以简称行世。定期于每年 4 月和 10 月举行，会期一月，分称春交会与秋交会。创办于 1957 年春季。即使在十年文革期间，受到极大冲击，也从未中断。作为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被称为中国“特殊年代坚持对外贸易、对外交流的唯一窗口”。

1967 年 4 月春交会，北京工艺品学校红卫兵赴穗造广州工艺馆的反，说传统出口工艺品是“封资修”，应禁止展出、出口。接待科担心万一红卫兵冲击，使交易会就无法顺利进行。周恩来闻讯即发出明码电报，要求交易会是为交易会服务的宾馆、旅店、剧院一律停止“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同时一些群众组织武装占领了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4 月 13 日，周恩来审



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开好广州春交会给广东省军管会和中南财经委员会并各军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通知，增写了“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内容。并于14日亲赶赴广州，多次同黄永胜、刘兴元、林李明、卢绪章、陈德、温玉成等有关负责人谈话，四次与广州群众组织代表座谈，讲清“广交会是中央的，不是哪一派的，大家一定要团结。广交会要和往届一样，保证准时开幕”。当届春交会才得以正常开幕。

广交会被看成对外宣传的窗口，整个展馆里有几十个“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讲解员用普通话、日语和英语3种语言讲解。[注1]每次采购谈判前，中方都要和外商客户先念一段毛语录。1966年秋交会时，场馆内的大小语录标语就有2673条，连厕所门口都贴着标语。领袖画像照片有445幅，“甚至在谈判桌上都摆放着领袖照片”。1974年广交会乔迁新馆，流花路新馆楼顶放置了一块长达50米标语牌，写着“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宾馆职员根据上级指示，主动教外宾从学普通话入手，教外宾学习毛泽东语录，唱革命歌曲，进行“早请示晚汇报”。日本客商们主动要求学语录歌，在吃饭前对着毛照片大喊：“翻身不忘共产党！”啃着鸡腿也照样高呼：“毛主席万岁！”有日本企业为拉关系，在参会时特意在公司名称前加上“毛主席万岁”，变成“毛主席万岁××公司”。[注2]

1966年成立大会展卖品审查小组，对672个出口商品类别逐一审查，分类批展。提出“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神佛鬼怪”等“四旧”内容工艺品一律不能展出，使展品数量从3万多种急剧下降到2万多种。后周恩来批示，强调一些工艺品出口换回外汇也是间接为革命服务；并下文明确：“凡是反动的、黄色的、丑恶的工艺品和以神佛鬼怪、帝王将相为题材的工艺品不能出口，对以古代神话故事人物为题材的工艺品，在历史上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健康的可以出口”，一些工艺品重见天日。直到1978年国家才允许传统工艺题材和人物的工艺品可以展出、出口。

出口成交以农副土特产品为主，每届平均占较大份额。纺织服装、工艺、五矿等都比较受欢迎。轻工业产品谈不上什么设计，质量也不太好，外商客户主要看中价格优势。“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等中成药每届也能为国家换汇上百万美元。[注3]1972年、1973年秋交会出口成交额分别突破10亿美元和15亿美元。出口成交额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由文革前的20%上升到40%。这一增长也源于其他口岸的萎缩。[注4]

接待来宾有三个办公室，第一接待室专门接待西方人，安排入住东方宾馆；第二接待室接待日本人，安排入住广州宾馆；第三接待室接待港澳华侨，安排入住爱群大厦、华侨宾馆。外商客户以东南亚为主。外商只能在广州市区内活动，要离开广州必须到公安机构办理通行证。有时候接待人员会陪同客人出行，提防其拍摄有损中国形象的照片。每晚都有文艺节目，在友谊剧院、中山纪念堂有样板戏、花鼓戏或放电影等。这些演出由经贸部付费，各个接待办公室免费给来宾发票。

当时整个广交会工作人员有200多人，完全是后勤部门，不直接和来宾打交道。各地交易团集中住在广东省政府招待所。开幕前半月就要住进去，每天封闭式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外事报告等，一直到开幕后，白天参会，晚上还要继续政治学习。商务洽谈时，按外事纪律不能只由一个业务员出面，一般都是一个主谈、一个副谈，还有一个翻译。如果是重要客户须领导出面。对一线业务员来说，

都必须按照规定谈判，稍有变动、逾越都要向上报告批准。

工作之余的乐趣是伙食特别好：猪肉、粮食、副食品都从各地调配来保证供应，开幕闭幕聚餐时有酒喝，有肉吃。各地参展商和工作人员都像过节一样，因为大家很久没有吃过肉了。

2006年广交会已经办了100届。有人质疑：它发轫于中国的“锁国时代”。今天“电子商务时代”已隐约可见，中国经济已由卖鸡毛的农业社会，过渡到“后WTO时代”，“在线广交会”业已由憧憬演进为现实。广交会的大旗还能继续扛下去吗？2002年，海尔、长虹、康佳、TCL等家电巨头的集体离去，成公众质疑其必要性的开端。

但也有人断言，广交会仍是一个中小企业冲刺国际市场的舞台。而且在电子商务破解诚信难题前，不可能从根本上撼动面对面的传统交易。根据国外同业经验，展览业的壮大是个趋势。广交会不是要不要办，而是怎么办好？它的官办色彩是历史涂抹上去的，可以尝试交给市场和民间办。

[注1] 顾城《解释》一诗提及此事：有人要诗人解释/他那可怜的诗//诗人回答/你可以去广交会上/那里所有的产品/都配有解说员。

[注2] 无独有偶，国外当时流行《与中国人做生意的秘密》一书。介绍说“当今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一切都要服从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按常规的办事方式已经行不通，你必须根据新的情况来调整你的策略和生活方式。为了使你能及时捕捉贸易机会并取得成功，本书收集了这个国家的最新情况并告诉你一些诀窍，供你参考……”

书中告诫读者“不论你心里是否同意‘文化大革命’，但口头上你一定要表现出你是赞成和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你对中央文革小组和当地的革委会一定要装出十分敬重的样子，你不能只谈生意，一定要谈点政治，最好能引用一二句毛的语录，这样效果更佳……”

在具体活动方式方面建议采取以下做法：你在广州下飞机前要检查一下胸前是否佩戴了毛的像章以及公文包中是否装上毛的语录（像章和语录可以向中国使馆索要，他们会乐于向你提供的）。你去旅馆后争取尽快约见广交会的负责人或者你的贸易伙伴，但不要马上谈生意，也不必约他吃饭，而是最好表示你想要观看一次样板戏，说你对《红灯记》等戏仰慕已久，希望这次来中国能有机会实现这一夙愿。这样既通报了您已经抵达，同时又表示了您政治上的友好态度，会使对方一开始就对您留下一个极好的印象。第三天，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最好上街去买一套中山装（此点如果你实在感到别扭，也可不办），另外你在同对方交谈或接触时要很自然地显露出你读过毛的语录（在你拿文件时也可“无意地”亮一下你公文包中所装的那本语录）。最后当交易谈得差不多时，你要赶在决定之前，特别是在协议签字前夕，寻找机会再次向对方表示，你想要一本毛主席的《老三篇》，你应当说这本书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革命人民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回去后你会好好学习，并且要显得十分真诚。书中最后说，“你这样做也许会感到这是在进行表演，但不要忘记这是目前在中国最行之有效的的手段，要克服自己的心理反差，始终要记住这样一句至理名言利益是不变的，手法是可以变的。你的政治态度也许比你产品的质量 and 价格更为重要。你现在同中国做生意一定要着眼于政治，因为当前在中国最重要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是政治，第三还是政治。如果你被中国列入国际友人的行列，那你将财源茂盛……”

[注3] 当时药盒上印的“名医施今墨处方”被当作“四旧”破掉了，结果

外商不买，说是假药。据说最后还是请示恢复补印上原标识，外商才继续购买。

[注4] 当时全国5个出口口岸，人称“广大上青天”（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

（参考资料：谢涛《周恩来情系“中国第一展”》，《党史博览》2005年第6期 2006-5-5；王方康《广交会演义政治激情》，《南方都市报》2006年9月28日；陈永华 田桂丹《文革时期广交会的外商吃饭前常唱语录歌》，《信息时报》2006-9-28；卢秋田《一位中国大使眼中的东西方思维差异》，“光明日报”“书摘”；章敬平、杨兴云、张轶骞《广交会大旗还能扛多久 未来能否由官办转为民办》，《经济观察报》2005年10月22日）

## 备战、备荒、为人民

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的战略方针、战略思想，由毛泽东首创。被写进1975年宪法序言。流行于1966年—1978年。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恶化，国家关系和边境出现紧张局势；印度不断蚕食中国领土；美国继朝鲜战争后又发动了越南战争；在美国多方支持下台湾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三年困难“反攻大陆”，部分武装特务窜扰东南沿海地区。

1964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对中国国民经济作一次重大区域性布局调整。对东部（“一线”）和中部（“二线”）经济建设项目实行“停”、“压”、“搬”、“帮”，重点开发和建设西部（“三线”、“战略后方”）。

对这一战略调整，毛泽东用“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加以概括。[注]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关于各省发展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中说：“第一是战备，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并指出：“我们有过几年竭泽而渔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

口号提出后，从1965年开始大小三线几乎同时动工，可谓举国之力，集全民之才，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为中国建设史所罕见。在随后的16年中，国家总计投入2052.68亿元，动员了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建设者，在祖国的大西北、大西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原，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这些措施，一方面促进了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改善，内地与沿海差距逐步缩小，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立足于打大仗筑牢了战略后方，一方面由于是在国力单薄情况下，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立足于打大仗需要建设的，边建设边计划，规模大战线长，选点多在偏远山沟，布局分散且不尽合理，生产、生活设施简陋，有的企业还建在地质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的地方，缺乏经济效益的考量。

同时毛泽东提出“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指示各级党委都要认真地抓军事工作，抓民兵工作。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3月15日，在中

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毛泽东具体地谈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他要求：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并提出，如果发生战争，要让对方打进来，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我们的战略是后发制人。4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

10月中下旬，为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军委办事组撤至北京西郊办公，总参谋部组成了以副总长阎仲川为首的战时指挥班子，“前指”进入京郊战备工事。10月19日到20日，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战备活动很快进入了突击性的高潮阶段。客观上对当时派性遗留的普遍社会分裂有抑制作用。

为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毛泽东又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战略口号，号召全国加强战略物资储备和合理调整工业布局。1969年6月军委办事组座谈会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并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成立了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196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注意工作方法》的社论，传达了这一政策：“要考虑到全局。一切工作都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出发，用这个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就是全局观念。”因此从1969年开始，每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搞人防工程建设，挖防空壕，建防空洞，修筑战备设施，储备粮食和布匹，形成了全民搞战备的运动。

这一口号不仅对军队建设、备战和国防工业建设起指导作用，而且还被广泛用以指导工农业生产、粮食仓储、水利建设、技术革新、科研、中西医结合……成为中国面临周边险恶环境的背景性整体设定。被印在粮票上，制作成报刊通栏标题，贯穿在各式通讯报道里，作为标语书写在公共建筑上，用作部署各项工作的前提……形成了持续紧张的临战氛围。被当成要求人们同心同德地顺从以应急、权变的一种口实。

“备战、备荒、为人民”有时与“抓革命，促生产”联动使用，成为动乱年代强调经济保证的理性策略和声音；有时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联动使用，成为冷战时期中国国际战略防御的强硬概括。中国经济战略重点转向备战，提高了国民经济积累率，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它不单是左倾激进思想在经济建设上的反映，更为严重的是政治上制造的紧张态势也强化了由国际而国内阶级斗争的情势，以国家安全名义为文革提供了战略-道义制高点和合理性支持。

[注]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以解决吃穿用为主题的计划被改为以国防建设为主题的计划。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它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早提出。

（参考资料：《毛泽东军事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廖述江《“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由来和历史演变》，《党史文苑》[纪实版]20060710，转自“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 见马克思

死的委婉语(限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在世俗社会,不直接说死,而是说死后将去见某人,以此间接指称,取得委婉的修辞效果。信仰什么就假定见什么人(祖宗、上帝等)。<sup>[注 1]</sup>

毛泽东 1960 年代以后多次以此喻死<sup>[注 2]</sup>:“我死后上天去,不会去见玉皇大帝,要去见马克思汇报工作,也向他报个‘三七开’吧。”“我早晚会去见马克思,我已经收到了请柬。”1972 年 2 月 21 日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起坐须人搀扶,他说自己“老了,腿脚不方便了,快去见马克思了”。1976 年得知朱德去世感叹道:“‘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变主动(见)为被动(请):“我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在中共党内成为一种风气,陈毅、邓小平等都使用过这样的委婉语。

国外共产党人中也有此说法,甚至有不少人身体力行。伦敦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墓附近安葬着不少各国共产党领袖。如南非共产党前主席优素福·穆罕默德·达度(音译)、塞罗·莫埃提(迈克尔·勒贝瑟)(1953—1988)、生于特力尼达岛的克劳迪娅·维拉·琼斯、伊拉克共产党前总书记萨阿德·萨阿迪·阿里(1945—1987)、伊拉克女权运动和社会正义运动的领袖萨比哈·梅赫迪·阿尔—卡哈尔、贾米尔·穆尼尔·阿布杜—哈密德,等。

它首先是关于言说者身份自我认同的想象,其话语的文化功能、弦外之音是表白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矢志忠诚,是信仰表达的献祭,追慕伟大导师道德人格的自我期许、鞭策——“就图将来闭了眼,见了马克思时不脸红”;<sup>[注 3]</sup>二则暗示自己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嫡系、正宗,以取得对论敌、政敌的优势地位,具有含蓄的进攻性;三则相对于党外人士又是一种身份流露、资格炫示,隐然划出一道内外有别的界限。

虽然文革时在口头流行此一话语形式,充盈着对革命亲近的时尚、崇高感。但它毕竟披着一层调侃、谐谑的外衣,在对语言书面表达的庄重、纯洁有洁癖的时代风气下,极少见诸报章文章。但较常见于人们对突如其来、难以接受的无辜死亡(黑五类等敌对分子除外)的指称,具有一种心理防御姿态和治疗效用。

由于官方意识形态占据压倒优势,世俗社会通过模仿、借用获取利益的努力自然不绝如缕。流风所及,从 1990 年代前后日渐盛行的世俗化发端,中国有人说自己死后不是见列祖列宗,而是“去见马克思”。发展到 2000 年代,借用范围越来越宽泛,不论是否革命领袖、革命志士、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都说“我要去见马克思了”。但这毕竟被老资格的正宗中共党人看成一种修辞的僭越、冒犯,这里有党内党外、资格深浅、职务高低的区别,隔着森严等级差序藩篱。虽不能实际禁止外、浅、低者使用,却被认为透着一种自高身份的攀附;受到他们的鄙夷。

<sup>[注 1]</sup> 中国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描绘的是,人死后升天堂。基督教国家人民不论是否教徒,都相信善人升天堂,恶人下地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报道一项针对 1000 名成年人做的调查表明,有 87% 的美国人认为自己会进天堂。

<sup>[注 2]</sup> 他同时也偶尔使用西方的表达方式:“上帝要请我去喝烧酒了。”

[注 3] 所以有道德污点的人被归类为不敢见马克思的人：修正、歪曲、抛弃马克思主义，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当棍子、横扫一切的人；弄虚作假，“把成绩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别人”，浮夸谋利，崇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人；自私自利和损人利己的人；卖友求荣，卖师叛教，屠杀功臣，消灭患难朋友的人；演绎着“株连之爱”的男女。

(参考资料：赵廷鹏《谁敢去见马克思》，《中国青年报》1998年12月28日；陈晋《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第22章 业未竟，鬓已秋”，万卷出版公司2003年12月版；《去见马克思？墓难求 相见容易相邻难》，“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http://www.singtaonet.com))